罗马的复辟

THE RESTORATION of ROME



罗马史诗三部曲
THE ROME TRILOGY
VOL.II

帝国陨落之后的欧洲

BARBARIAN POPES and IMPERIAL PRETENDERS

PETER HEATHER

[英] 彼得·希瑟——著　马百亮——译

中信出版集团

版权信息

书名:罗马的复辟：帝国陨落之后的欧洲

作者:[英]彼得·希瑟

译者:马百亮

ISBN:9787521711691

中信出版集团制作发行

序言

公元476年9月4日或那天前后，意大利的罗马军队高级军官奥多亚塞（Odovacar）抓住并杀死了在位的西罗马皇帝罗慕路斯·奥古斯都路斯（Romulus Augustulus，即“小奥古斯都”）的叔叔。7天前，奥多亚塞对罗慕路斯的父亲做了同样的事情。皇帝本人还是个孩子，他的父亲和叔叔一直在管理这个帝国。现在大权在握的奥多亚塞还算仁慈。罗慕路斯被送到坎帕尼亚的一个庄园，在那里度过余生。在欧洲历史进程上意义更大的是，奥多亚塞还敦促罗马元老院向在君士坦丁堡的东罗马皇帝芝诺（Zeno）派遣了使节，宣称：“我们不需要分裂的统治，一个共同的皇帝对（帝国东西部的）领土来说就足够了。”不久，又有一批使节向君士坦丁堡进献了西罗马皇帝的行头，包括皇帝的披风和皇冠。这套行头除了皇帝之外，任何人穿戴都会构成叛国罪。尽管奥多亚塞一直维护着芝诺拥有帝国主权的假象，但在实际操作中，他丝毫不想让君士坦丁堡干涉他现在统治的以意大利为基地的国家的事务。奥多亚塞的两批使节结束了罗马延续近750年的帝国传统。[注]

但是，奥多亚塞对奥古斯都路斯的废黜不过是最后的一击。在此前三代人的统治过程中，随着一场战略力量均势的非凡革命在整个欧洲展开，罗马帝国的西半部已在逐步消亡。除了非常早期的一些成功，如公元前3世纪攻占西西里岛，罗马帝国的大部分领土是在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世纪这两个世纪内获得的。这个时代，非地中海地区的欧洲大致分为三个地理区域，即西部和南部、中北部、北部和东部，每一个区域都有人类社会，这些社会的发展水平差异很大。在粮食生产、人口密度、经济复杂性、聚落规模和政治组织规模等方面，欧洲西部和南部的拉坦诺地区（La Tene）发展水平最高，而越是往东和往北的区域，发展水

平就越低。在这至关重要的200年帝国建设中，罗马的地中海心脏地带提供了足够的经济和人口资源，再加上强大的军事组织，它征服了欧洲所有值得征服的地区。实际上，在战争结束后，只有西部和南部提供了足够的收入和战利品，来证明大规模的战役是值得的，而正是在其遥远的边境上，罗马军团停止了前进的脚步。

尽管如此，出于野心，罗马人还试图征服主要由讲日耳曼语的人控制的欧洲中部地区。人们通常认为，阿米尼乌斯（Arminius）于公元9年在条顿堡森林大败罗马军队，阻止了这一进程，但事实就比较乏味了。罗马人后来的进攻摧毁了阿米尼乌斯，让罗马最终止步于莱茵河而不是继续向东推进的，是帝国对成本收益的权衡。在第一个千年之初，中北部地区不值得花代价去征服，至于欧洲外围地区，即北部和东部这个第三区，甚至从未进入帝国的考虑范围。

然而，在接下来的400年里，尤其是由于与罗马帝国从经济到政治和文化模式的互动，这个中部地区的发展加速，生活方式也随之改变。公元4世纪中叶，该地区的农业生产得到加强，人口密度大幅增加，经济模式变得空前复杂。该区域整体的军事能力也有了显著的增长，这尤其要归功于使用罗马武器，区域政治结构也更加健全。但在该区域建立大型持久的国家仍然是不可能的，因为经济和行政基础仍然不能支持复杂的政治上层建筑，因此，罗马总体上保持着战略控制权。尽管如此，到了4世纪，帝国不得不小心地用“大棒”和“胡萝卜”一起来维护其边境安全，以管理一系列相当持久的中等附属国，这些附属国现在占据了边境之外的每一寸土地。中部地区小而分散的部落社会的旧秩序早已消失。虽然这些附属国可能并没有威胁到帝国的整体存在，但它们肯定拥有足够的政治和军事能力来制定自己的中长期政治议程。当条件对它们有利时（通常是在罗马与波斯交战时），它们甚至可以抵御罗马帝国支配中最具侵略性的方面，即对军事人力、粮食和原材料的不断要求，帝国有时还会要求允许基督教传教士自由活动。尽管转变后的中北部地区在政治上仍很分散，不会构成全面威胁，但罗马帝国原有的人口和经济优势大多已被这些革命性发展进程所破坏，而在500多年前，正是这

种优势让罗马得以建立其欧洲帝国。(注)

我父亲是一名炸药专家，他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在和危险物质打交道。他在早期受训时学到的一个基本的安全原则是，只要人类活动在什么地方制造了易燃的环境，“上帝（或者说某种意外）就会提供火花”。换句话说，要保证安全，就必须防止积累起燃烧条件，因为试图防止火花是完全不可能的。就欧洲历史而言，中北部地区的根本变革造成了一种高度易燃的政治局势，至少对罗马帝国的长期未来而言是如此，而“火花”最终以匈人的形式出现。从4世纪后期开始，匈人分两个阶段向欧洲的边缘地区扩张，将罗马帝国两个主要的附属群体从转变后的中北部地区（和其他更遥远地方的群体一起）赶到了帝国的领土上，第一个阶段是从375年至380年，第二个阶段是从405年至410年。第一个阶段正好是匈人占领黑海北面土地的时间，第二个阶段很可能是他们进一步向西渗透到匈牙利大平原的时间。罗马人（自然）对此很不满，大量卷入这些迁徙的人要么被杀，要么沦为奴隶。到了5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两个移民群体的幸存者（许多最初的参与者在中途丧命）已经在罗马帝国西部的土地上重组成两个新的混合群体，即西哥特人联盟和汪达尔人—阿兰人联盟，这两个群体比4世纪时边界另一边的任何群体都更大，也更加团结。每个联盟都由至少三个以前独立的主要军事力量组成，而且两个联盟都形成了更集中的领导结构。它们力量增强，可以更好地面对罗马人的还击，罗马世界的财富也比边疆之外更充足，新的统治家族因而有可能调动足够的资源来维持自己的统治。

虽然这些移民最初的动机主要是逃离匈人的掠夺，但他们也一直想从罗马的财富中获益，他们的到来严重损害了帝国的生存能力。从根本上说，帝国的运作方式是对农业生产征税，为其专业军队和其他政府机构提供资金。这些新的移民联盟迫使西罗马承认自己对其部分领土的占领，从而大大减少了帝国的收入，并继而减少了帝国所能支持的军队的规模。其他没有直接受到匈人威胁的外来者很快就利用了这些税收损失带来的军事和政治紧缩，比如入侵不列颠南部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特别是在汪达尔人—阿兰人联盟于439年占领帝国西部最富裕的北非省份

之后，罗马帝国发现自己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军队数量的减少意味着更多的领土损失，这些领土有的落到了原有的外来者群体（西哥特人和汪达尔人—阿兰人）手中，还有的落入新来者群体（如法兰克人）手中，帝国军事实力日渐衰落，新的群体也想来分一杯羹。

奥多亚塞的政变完成了这个帝国解体过程的最后仪式。他是来自原来中北部地区的最后一批难民中的一员。5世纪50年代晚期和60年代，由于阿提拉的匈人帝国在中欧瓦解之后发生的内讧，他们来到了罗马帝国的领土之上。奥多亚塞是希里人（Sciri）的王子，阿提拉的一个主要追随者的儿子，当他所在群体的独立地位被摧毁时，他被迫迁往意大利。他利用军队的不满发动政变，而这种不满是因为意大利内部缺乏支付士兵薪饷的资金。这种短缺是各省税收收入减少的直接结果，因为各省逐渐落入外来入侵者手中，这一过程构成了5世纪西罗马历史的核心叙事框架。支持意大利罗马军队的资金逐渐减少，奥多亚塞则正好受益于由此产生的动乱。匈人提供的“火种”引发了一场战略爆炸，将欧洲中北部的大量军事力量推到了罗马的土地上，削弱了西罗马对其领土的控制。(注)

在人们的记忆中，这些政治上相当团结的军事力量来自帝国边界之外，其领导者现在成为西罗马故地大部分地区的支配者。除奥多亚塞外，盎格鲁—撒克逊的国王控制了不列颠中部和南部的大部分地区，法兰克国王控制了高卢北部和东部，西哥特国王控制了高卢西南部和西班牙，勃艮第王朝控制了罗讷河谷，罗马北非最富饶的土地则掌握在汪达尔哈斯丁（Hasding）王朝手中。基督诞生时还在欧洲中北部地区的一些群体，如今在罗马土地上发起了一场巨大的革命，以一系列的继承国取代了原来的单一帝国。

公元476年之后的一个世纪左右，中部地区也发生了一场同样意义深远的革命（尽管记录要少得多），欧洲北部和东部这个原来的第三区中讲斯拉夫语的群体兴起，在中欧和东欧的大部分地区崭露头角。相关故事无法详细再现，不过有足够迹象表明斯拉夫欧洲的建立是一系列复

杂、多样和旷日持久的过程的综合结果，而不是一场突然的革命。然而，它确实清楚地表明，必须将西罗马的解体视为整个欧洲战略力量平衡全面调整的一部分，就像在我们这个时代，随着近东、亚洲和一些南方经济体大规模扩张的区域和全球政治后果显现，力量平衡也出现了变化一样。[注]

但是，在所有这些重组的过程中，罗马帝国的概念不仅没有消亡，还存续了很久。在500年的辉煌历史（相比之下，大英帝国的鼎盛时期只持续了不到一个世纪）之后，这或许并不出人意料。西罗马的超级帝国可能已经消失，但在它的许多（尽管不是全部）原有领土之上，帝国虽然衰落，许多行省的人口却未受影响，社会、经济、法律和文化结构也完好无损。在这些群体中，罗马的观念乃至一些行政机构依然很活跃。事实上，那些摧毁了罗马帝国的外来者也并非对罗马的一切都怀有极大的敌意，他们中的许多人是罗马帝国原来的附属，并没有打着反对帝国的旗号蚕食罗马帝国的领土。长期以来，他们一直习惯于在罗马的总体框架内运作，尤其是后继国家的新领导人，他们试图从崩溃的混乱中创造一个新的秩序时，可以从罗马政府、社会和文化结构中找到很多对他们有用的东西。

本书是《罗马帝国的陨落：一部新的历史》的续作，从奥多亚塞派使团把西罗马皇帝的行头送到君士坦丁堡这一重要事件说起，讲述了三个试图复兴西欧罗马遗产的帝国觊觎者的故事，他们分别是狄奥多里克、查士丁尼和查理曼。他们三人都取得了惊人的成功。他们来自完全不同的背景，在完全不同的环境下，依靠不同的权力基础，各自恢复了原来罗马帝国西部的不少做法，从而对西罗马皇帝的头衔提出了似乎合理的主张。

但即使他们成就了非凡的事业，整个欧洲大地上的普遍生活模式仍在继续脱离基督诞生时的那种三速模式。因此，虽然这些帝国觊觎者本身都很成功，但公元第一千年后半叶的情况越来越不利于维持像此前500多年的西罗马那样持久的帝国结构。最终事实证明，只有当来自罗

马人一度视为完全野蛮地区的“新鲜血液”使用一些罗马帝国的手段来创造一个全新的帝国时，才有可能在真正罗马帝国的规模上恢复稳定的帝国权力。通过在11世纪重塑教宗制度，欧洲的蛮族人找到了建立一个新罗马帝国的方法，而这个帝国已延续了1 000年。

---

1. 当然，罗马帝国延续了多久，取决于怎么算。我把罗马帝国的建立时间定在罗马首次征服意大利本土之外地区（征服西西里）的时候。引文来自Malchus fr.14，trans. Blockley (1983)，410。
2. 对这些关键转变的更详细讨论见Heather (2005)第三章；Heather (2009)，cc. 2–3对该图景依据的许多不同研究做了全面概览。
3. 这是对所发生事件的简要总结，我的《罗马帝国的陨落：一部新的历史》（Heather 2005）一书里有丰富得多的细节。
4. 关于重绘中欧和东欧版图的所谓欧洲斯拉夫化，见Heather (2009)，特别是第7—8章，书中也全面列出了上述图景所依据的参考文献。

第一部分

“对唯一的帝国的复制”

第1章

紫袍家族

公元507年前后，统治意大利的哥特人狄奥多里克写信给君士坦丁堡的东罗马皇帝阿纳斯塔修斯（Anastasius)：

> 您是天下最美好的装饰，是全世界最有益的防御，其他所有的统治者都理所应当地对您满怀敬仰，因为他们知道您的身上有与众不同的品质。多亏神灵的保佑，我们有幸在您的国家（君士坦丁堡，童年时期的狄奥多里克在此生活了10年）学会了如何公正地统治罗马人。我们的王室效仿的是您的王室，以您的善意为榜样，是对唯一的帝国的复制。只要我们追随您，我们就可以优于其他所有的国家。

这封信很不寻常。在任何时代的罗马人看来，狄奥多里克可能都是一个蛮族人，但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一位哥特人国王声称自己模仿罗马的理念。自然，这封非比寻常的信变得非常有名，常常被用来证明一点：在最后一位披紫袍的西罗马皇帝之后又过了一代人的时间，罗马在心理上的支配地位仍然在延续。

但是，仔细考察一下，就会发现事实远非如此简单。和人类历史上几乎每一个时代的很多外交书信一样，这封信是用某种语言代码写就的，以通信双方都可以充分理解的一套惯例来仔细传达其完整的意义。理解这封信的关键是长期支撑罗马帝国自我理解的意识形态。罗马的意识形态认为，帝国的存在和仁慈神灵的计划密不可分，那就是要最充分地实现人类的潜能，因此，天赐神力让帝国得以建立，并为其不断提供

支持。这是对最早由亚历山大大帝的后继者们提出的一套理念的延伸，他们根本就不是基督徒，因此常常被称为希腊化君主，他们提出这套理念是为了实现自我扩张。君士坦丁皇帝宣布改信基督教后，基本上不需要对这套理念做任何改动。声称在神灵的支持下履行神灵授予的任务，这一点并没有发生变化，只是在君士坦丁这里，提供支持的神灵变成了基督教的上帝，任务被调整为传播基督教的福音。

如果在此背景下来读这封信，狄奥多里克的话就远没有那么满怀敬仰了。“神灵的保佑”（auxilio divino）这个短语很关键，利用这个短语，这位哥特人向阿纳斯塔修斯表明，自己作为合格的罗马统治者统治意大利并不是因为偶然，甚至也不是因为他在君士坦丁堡10年观察“罗马性”所获得的个人能力，虽然这种能力也起到了作用；上帝的直接干预才是最根本的因素。当然，这是他本人的观点，没有人知道东罗马的皇帝听人读这封信时有何感想，虽然我可以大胆猜测一下。罗马国家意识形态的核心就是声称帝国之所以存在，就是因为它是实现神灵对人类计划的关键。与此相呼应，狄奥多里克声称他本人以罗马方式进行正确统治的能力源自神灵，这就相当于说他本人以及他所统治的疆域和罗马帝国东部一样，是“罗马的”，即神定的、合法的。就像信中所说的那样，狄奥多里克的“罗马身份”并非间接得自东罗马，而是直接源自上帝。提出这些非比寻常的说法的哥特人到底是何许人也？他所声称的“罗马身份”究竟有多少实质性的内容呢？(注)

《哥特史》

少年狄奥多里克最早出现在历史舞台上时只有七八岁，他被当作人质送到东罗马的首都君士坦丁堡，时间是461年前后。虽然年少，狄奥多里克却肩负着重要的使命。他的伯父刚和当时的东罗马皇帝利奥一世签署了一份新的外交协议，根据协议，他可以获得每年300磅（1磅≈0.45千克）黄金的援助（也可以称其为贡金），而根据协议的担保条

款之一，狄奥多里克被送到君士坦丁堡。所有这些都是例行程序，自古以来，罗马政权一直要求地位高的人做人质，以确保条约得到履行。(注)

这一画面来自约达尼斯（Jordanes）的《哥特史》（*Getica*），该书创作于公元550年前后的君士坦丁堡，现代人对这位少年的理解主要依据这本书。后来，在意大利坐稳王位之后，狄奥多里克总喜欢说（尤其是对外国的统治者）自己来自一个独一无二的“紫袍家族”（gens purpura）。他本人的合法性源自这样一个事实，即到520年前后，权力移交给他的孙子、继承人阿塔拉里克（Athalaric）时，他的家族已经连续17代统治哥特人而没有受到挑战。长期以来，约达尼斯的《哥特史》一直被视为对这一观点的关键性支持，书中不仅有一份完整的狄奥多里克所在的阿马立（Amal）家族的世系表，还有其中一些突出成员的事迹。(注)

但是，在全盘接受这一说法之前，一定要更加仔细地看一看其来源。就像约达尼斯在前言中所说的那样，其主要信息来源之一是罗马元老院成员卡西奥多罗斯（Cassiodorus）所写的《哥特人史》（该书现已佚失），和约达尼斯流传下来的其他作品的比较也证实了这一点。我们在下一章还会提到卡西奥多罗斯。约达尼斯告诉我们，卡西奥多罗斯的《哥特人史》他只看了三天，但是这里真正重要的一点是卡西奥多罗斯是狄奥多里克朝廷上的人，而且这本书是他在为这位国王服务期间写作的。显然，由此看来，如果说约达尼斯所提供的是阿马立家族独特王族地位的独立证据，这是很难让人信服的，因为无论是狄奥多里克的说法，还是《哥特史》所提供的支持，最终都源自同一个地方，即狄奥多里克本人的朝廷。(注)一旦认识到这一点，如果你继续深入挖掘，很快就可以对狄奥多里克真实的家族背景有更好的了解。5世纪60年代早期，他作为人质来到君士坦丁堡。他肯定来自显赫的家族，否则不会被当作人质，但家族的显赫地位并非由来已久，也没有到狄奥多里克后来所声称的程度。

他的父亲在三兄弟中排行第二，老大瓦拉米尔（Valamer），老二

狄奥德米尔（Thiudimer），老三维迪米尔（Vidimer）。根据比较可靠的史料，三兄弟在5世纪50年代后期成为人数众多的哥特人的首领，在此前的几十年，这些哥特人臣属于阿提拉的匈人帝国。5世纪40年代，阿提拉可怕的征服大业已经从君士坦丁堡的城墙延伸到巴黎郊外。有关阿马立家族的传统观点（该观点直接源自狄奥多里克希望在意大利传播的那种信息）是，最晚从3世纪中叶开始，他们就统治着哥特“民族”的一半，即东哥特人。另外一半传统上被称为西哥特人，也是从3世纪开始，他们和阿马立家族所领导的东哥特人分道扬镳。但所有这些都是狄奥多里克本人的宣传所直接产生的空想。在狄奥多里克本人获得巨大成功之前，阿马立家族远不像他后来所宣称的和现代评论者据此所认为的那样辉煌。

一方面，公元463年时还留在中欧和东欧的哥特人根本不统一。狄奥多里克的父亲和伯叔所领导的那部分定居在从前罗马行省潘诺尼亚（Pannonia）所在地，在今天的匈牙利的巴拉顿湖（Lake Balaton）附近。此外，还有一大批哥特人联合起来，根据协议生活在罗马帝国东部的色雷斯地区。另外一批人数也不少，依然处于匈人的支配之下，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467年。还有其他两个独立的哥特人群体，人数似乎比较少，生活在克里米亚和亚速海的东海岸。当然，我们无法得知精确的人数，但是在中欧和东欧，匈人政权崩溃后，阿马立家族领导下的哥特人至多不超过我们所知哥特总人数的四分之一。这还没有考虑到另外一点，即还有其他我们尚不知道的哥特人群体，这是完全可能的。(注)

同样重要的是，甚至就连三兄弟对潘诺尼亚地区哥特人不受挑战的统治也是后来才有的说法。从《哥特史》中一段被误解的叙述中，正好可以看出阿马立家族的辉煌是虚构出来的。这一段表面上描述的是征服哥特人的匈人国王（文中说他是Valamver）的几次胜利，但实际上说的却是狄奥多里克的伯父瓦拉米尔（Valamer）的早期生涯。所描写的场面让人激动。这表明瓦拉米尔并不是不受挑战地统治一半哥特人的王族之一员，而是在和其他的哥特领导者争夺之后才成为首领的。他亲手杀死维尼塔里乌斯（Vinitharius）并娶了其孙女瓦达梅尔卡（Vadamerca）

为妻。与此同时，一支敌对势力也被稳步消灭，其中包括托里斯蒙德（Thorismund）和格西蒙德（Gensemund）两兄弟，两兄弟的父亲胡尼蒙德（Hunimund），以及托里斯蒙德的儿子贝里蒙德（Beremund）。经过上一代人的互相杀戮，格西蒙德选择接受必然，服从瓦拉米尔的权威，而贝里蒙德则带着他的人马西迁，退出争夺。到了5世纪50年代晚期，瓦拉米尔及其兄弟通过对各路敌对势力的艰苦斗争，在潘诺尼亚地区的哥特人中脱颖而出，这些斗争可能都发生在453年阿提拉去世之后，因为阿提拉通常不容许他的附庸民族中有过于强大的统治者。注

事实上，这一材料将阿马立王朝的经历变成了人们耳熟能详的5世纪的故事。要成为一个庞大武士集团无可置疑的领导者，需要强大的政治手段。尽管细节方面可能不同，但总是需要软硬兼施：用武力让潜在的对手不敢将矛头指向自己，用充足的金钱让足够多的步兵和中层领导者满意，而武力实际上就是由此产生的。然而，在匈人到达之前，罗马欧洲边境之外地区的经济活动还很简单，武力和金钱往往相对短缺，金钱尤其如此。例如，在公元400年之前罗马以外的考古遗址中，只能发现少量的白银，几乎没有黄金，并不是说当时没有黄金，而是它太宝贵了，不会被用来陪葬，并且人们也很少会将其丢失。

在罗马之外，以农业为主的经济每年也会产生少量盈余，但只能支撑相对少数的非农民从业者。因此，无论是职业武士，还是用来招募他们的现金，都远远称不上充足，只有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主要是不择手段地获取罗马的资助），边境之外的这些国王才能聚集足够的军队，支配更大的地盘。当时常见的情况是各路军阀拥有小规模王国，而不是经历多个朝代的大帝国。大型的霸权往往昙花一现，仅限于某个精明强干的领导者的有生之年。

阿提拉帝国的兴衰从两个基本的方面改变了这种形势。首先，在罗马边境之外的世界，黄金出现了爆发式的增加，特别是在匈人位于多瑙河中游的核心地区。可移动的罗马财富是匈人征战的主要目标，无论是作为战利品，还是作为一年一度的贡金。匈人每次获胜后，贡金的数量

就会增加，最终高达每年2 000磅黄金。这一切不仅在文本中有清楚的记载，也体现在考古发现中，匈人时代的这类新财富出现在大量埋有丰富黄金的墓葬中。5世纪50年代中期，匈人霸权开始瓦解。有了足够的财富在世上流通，这引起了敌对军阀之间的激烈竞争，就像狄奥多里克的伯父和他的竞争对手之间所发生的那样。这些军阀已经成为匈人帝国的第二梯队领导层，财富也在短期内维系着这个冲突频发的政治结构。

其次，即使在5世纪50年代中期匈人帝国崩溃之后，匈人时期留下的总体影响（阿提拉的胜利，以及他为赢得这些胜利而积聚的军事力量）也将使多瑙河边疆的长期战略力量平衡不利于罗马帝国。东方和西方的帝国当局现在不得不应付大量更庞大、军事实力更强的邻国军队。这意味着5世纪中期围绕瓦拉米尔这样的人物形成的新势力，仅凭其自身的能力（或暴力）就能继续获得罗马的财富。他们一边向原来属于罗马帝国的部分地区推进，这些地区的经济依然比边境之外发达，一边和罗马帝国建立政治关系，从中获得金钱。在阿提拉去世之后的十年里，匈人势力急剧衰退，匈人不再能在政治上支配像哥特人这样的臣属部落，这些附庸部落之间很快形成了军事上更有效的新组织。除了彼此争吵，他们开始对原属西罗马的部分领土和东罗马的贡金虎视眈眈。

瓦拉米尔严格遵循了这两条成功秘诀。在排除了眼前的哥特对手后，他不仅占有了在西罗马潘诺尼亚行省的部分土地，还大力争取君士坦丁堡的外援。狄奥多里克被送到君士坦丁堡是为了给协议做担保，作为回报，君士坦丁堡每年要给瓦拉米尔300磅的黄金。要想说服武士们效忠，这笔定期而至的现金是十分有用的。事实上，考古证据清楚地表明了瓦拉米尔等人是怎样用这些财富赢得政治支持的。匈人时代之后的中欧遗址出土了各种各样的罗马物品，除了双耳细颈酒瓶之外，还有一些极其华丽的男女个人装饰品。宴会和贵重的珠宝是赢得潜在追随者的捷径。5世纪西罗马崩溃后，一方面非罗马王朝进入（至少是靠近）罗马领土，另一方面这些王朝利用罗马的财富增强势力，吸引比以前更加庞大的军事支持，两者之间一直有非常密切的联系，此时依然如此。(注)

例如，在5世纪前半叶分别在北非以及高卢南部和西班牙创立了罗马的后继国家的汪达尔人和西哥特人那里，我们发现了同样的情况。起初，汪达尔人和西哥特人都是由独立的群体组成的松散联盟，小群体有各自独立的领导者，后来到了罗马的土地上才集中到一个领导人之下。促进这些部落权力集中的，不仅是罗马世界巨大财富所带来的可能性，还有这样一个事实，即它们的统一发生在西罗马依然强大到足以毁灭它们时。史料所保留的历史细节表明，当时罗马的威胁依然重大，这一负面因素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使原本独立的各个部落愿意推翻长久以来的分离传统，建立新的政治关系，并以此为基础重新组合。

然而，在许多方面都与阿马立家族的故事十分接近的，是法兰克人的墨洛温王朝，与狄奥多里克家族一样，墨洛温王朝的兴起基本上发生在西罗马灭亡之后，并没有受到什么帝国威胁的影响。在这方面，图尔主教格雷戈里（Gregory of Tours）于6世纪90年代撰写的《法兰克人史》提供了确凿的证据。在西罗马政治崩溃的时代，墨洛温王朝的希尔德里克（Childeric）在现为比利时的地区强盛起来。大约在5世纪80年代，他让儿子克洛维（Clovis）继承了一个以图尔奈为中心的强大王国。后来，克洛维把墨洛温王朝的势力范围扩大到了几乎整个法国和莱茵河以东广大的非罗马地区。他还以改信基督教而闻名。在现代法国的政治神话中，这两件事确立了他“建国者”的地位。但是在我看来，和开疆拓土至少同样重要，甚至可能对于开疆拓土来说至关重要的是，克洛维悉数歼灭了敌对的军事首领，将其残部收归自己麾下。根据格雷戈里的记载，克洛维除掉了至少7个竞争对手。这些人中有一些至少是他的旁系亲属（瓦拉米尔可能也除掉了一些亲属）。格雷戈里在相关章节的末尾引述了据说是克洛维在法兰克人集会上的演说：

> 生活在陌生人之中，就像孤独的朝圣者，在我遭受灾难威胁时，却没有人能来帮助我，多么可悲！

格雷戈里对这段话的评论体现了其本人的典型黑色幽默：

他这样说，不是在为他们的死亡而难过，而是因为狡猾的他希望还能找到一些幸存的亲属，以除之而后快。

倘若瓦拉米尔有幸拥有一位像格雷戈里这样杰出的历史学家为其作传，那么在传记中，这位创立了阿马立政权的大人物很可能也会说出类似的话。当然，二人的人生经历十分相似，但是所有这些都只是让我们一开始提出的问题更为迫切：一个几乎名不见经传的哥特人首领的侄子，怎么能影响上帝拣选的罗马皇帝的特权呢？(注)

君士坦丁堡

这个年轻的哥特人质对他的新环境有什么想法，他有多么焦虑，这些都没有记载，但是到了463年，博斯普鲁斯海峡边原本古老却不大显眼的希腊小城拜占庭已经成了一个强大的帝国首都。这一过程历时不到150年，始于4世纪20年代，这要归功于让基督教成为整个罗马帝国官方宗教的那位君士坦丁，虽然他也有过一些犹豫。他一度产生古典情结，无疑也受到罗马人一个古老说法的影响，即他们的城市是由特洛伊灭亡之后的幸存者建立的，这位皇帝想过要在特洛伊城光秃秃的废墟之上进行重建。根据史料记载，君士坦丁还曾宣称“塞迪卡（Serdica，即今天保加利亚的首都索非亚）就是我的罗马”。但事实证明这是一次起步失误，最后他选择了位于半岛之上的拜占庭。半岛的位置赋予其战略优势，可以控制经过达达尼尔海峡从欧洲到亚洲的交通，那里有足够的掩护水域供大型船队停泊，除了博斯普鲁斯海峡本身，还有东部海岸的金角湾。

在第一代人那里，君士坦丁的决定看起来无足轻重。在337年皇帝去世的时候，许多建筑都只建造了一半，他很难说服东罗马那些富有的地主搬迁到他的新首都，而且，供水这个基本问题还没有解决。和在地中海周围的很多半岛一样，哪怕是4世纪20年代时只有几千居民的拜占

庭，也很难汇集足够的水来供应，更不要说供应蜂拥到帝国首都的大量人口了——对于各个阶层的人来说，首都意味着工作机会、免费发放的食物和各种奢华的娱乐。事实上，多年以来，许多罗马皇帝会把他们最喜欢的城市变成新的首都，这些首都至多延续一两代人的时间，然后政治和行政的中心就会因为一时兴起或形势所迫而改变。

君士坦丁堡是个例外。君士坦丁的儿子君士坦提乌斯二世（Constantius II）在位期间，政治上的两个重大变化将政治权力永久固定在了君士坦丁堡的新城墙之内。首先，这位新皇帝在此为罗马帝国的东半部建了一个元老院，其目的是与宏伟的罗马元老院相匹配。现在有了足够的诱因，为了获得新的房产、职务和荣誉，东地中海地区的富有地主乖乖来到了博斯普鲁斯海峡边。从此，君士坦丁堡的元老院成员成为帝国政策的主要听众：帝国的政策要对他们解释说明，他们在家乡省份依然举足轻重，因此帝国政策若要成功执行，就离不开他们的支持。其次，在4世纪，帝国中央官僚机构的规模稳步扩大。这在东西方都是如此，但是在帝国的东半部，所有的新机构都牢牢固定在君士坦丁堡，这让更多重要的官员和职能部门到了这个城市。由于这两个政治上的新发展，从此以后，要想从东地中海的任何其他地方行使有效的中央权力都是不可能的。一旦中央权力被牢牢固定在这个地方，人们自然就有意愿既解决所有的后勤困难，又为新首都提供种种便利。因此，当狄奥多里克来到君士坦丁堡时，这个普普通通的中小希腊城市已经破茧而出，成了令人惊叹的大都会。注

从西北方向，沿着穿越巴尔干半岛的军事要道，这位年轻的哥特人通过查利修斯门（Charisius Gate）进入了君士坦丁堡。这是最北端的主大门，位于守护着这座城市的狄奥多西城墙上。很少有城市能有这么好的防御。要跨越的第一个障碍是一条宽20米、深30米的护城河，完成这一步之后，经过20米长的杀戮场地，是底部厚2米、高8.5米的外墙，总计96个塔楼矗立其上，塔楼与塔楼之间有55米的间隔。接着要经过一个20米长的平台，然后才能最终见到宏伟的主城墙：厚5米，高12米，上面也矗立着96座塔楼，和外墙上的塔楼交错而立，从墙根到城垛，足有

20米高。这些工事建于公元410年前后，在今天的伊斯坦布尔依然可以看见。它们十分坚固，守卫着城市不受陆上的攻击，直到1453年5月23日，大炮最终将城墙轰出一个缺口，根据一些传说，拜占庭末代皇帝君士坦丁十一世（Constantine XI）英勇牺牲。[注]

和5世纪的其他所有人一样，狄奥多里克没有大炮，所以在8岁的他看来，这个城市的防御工事给他留下的印象只有绝对压倒性的力量。他应该知道，在不到20年之前，这些坚固的防御工事足以抵御匈人阿提拉的进攻。出于军事上的考虑，城墙被设置在高地上，北部的地势最高，而狄奥多里克就是从这里进城的。一通过大门和拱门，整个帝国的首都就呈现在他的眼前。

他当时的感受只能是震惊。狄奥多里克刚从中多瑙河平原（今天匈牙利喀尔巴阡山脉以西）骑马而来，他在那里度过了早年岁月。在罗马鼎盛时期，那里是重兵防守的边境地区，在公元后的四个世纪里，帝国大量投资，那里一度非常繁荣。多瑙河两岸驻扎着很多兵团，士兵的购买能力催生了真正意义上的罗马城镇。退伍的士兵开发了腹地的农业潜力，而来自意大利的新移民和当地人口则变成了不折不扣的罗马人。正如多次发掘所凸显的那样，在鼎盛时期，该地区建有城墙和神殿，基督教传入后，又有了大教堂，还有剧院、露天剧场、渡槽、道路系统、雕像、镇议会、碑刻和富丽堂皇的别墅。但这些都发生在西罗马崩溃之前，到了5世纪中叶，除了少数几个防御森严的别墅（可能本来属于皇室）被这里的新统治者改为己用之外，其余的别墅都成了残垣断壁。这里的人口依然数量可观，其中有些居住在旧址，但是古老的文化形式已经荡然无存，石墙和雕像很快沦为瓦砾，托加再也没有人穿了，大部分别墅早已经被破坏。[注]

一边是旧罗马行省繁荣过后的废墟，一边是帝都君士坦丁堡5世纪中叶全盛时期的辉煌，两者有天壤之别。首先让他震惊的是这座城市的恢宏气势。按照时间顺序，狄奥多西城墙是城市的第三道城墙。古希腊城市拜占庭建立了第一道城墙，在半岛末端围出了一块大致呈长方形的

区域，长2公里，宽1.5公里。君士坦丁于4世纪20年代建造的城墙使城区的面积增加了两倍多，而皇帝狄奥多西（Theodosius）所建的又使城区面积在此基础上增加了一倍多。并非所有的城区都建起了房屋，菜园和园林也占据了很大的面积，尤其是在狄奥多西城墙和君士坦丁城墙之间的区域。但是，到了463年，这个罗马晚期人口约1万的城镇可能已经成为地中海最大的城市，据估计，其人口超过了50万。

在此过程中，巨大的后勤问题得到了解决。狄奥多里克骑马离开城门时，见到了其中最迫切问题的部分解决方案。在狄奥多西城墙和君士坦丁城墙之间的区域，有三个巨大的露天蓄水池，埃提乌斯（Aetius）所建的那个就在狄奥多里克所经之路的一侧。这些蓄水池的遗迹现在依然可以看到（至少在撰写本书时还在），每个里面都有一些似乎是临时性的房屋和几个足球场。除了这些巨大的人造湖泊，还有100多个小一点的地下蓄水池，其总储水量超过了100万立方米。但这并非事情的全部，为了装满这些蓄水池，250多公里的沟渠从城市蜿蜒而出，呈扇形向北部和西部延伸，以收集色雷斯山区的降雨。像供水问题一样，粮食供给问题的解决方案也映入狄奥多里克的眼帘：在他的左前方，是这个古希腊城市的两个小港口；在正前方，他可以看到两个巨大的新港口，分别由皇帝尤利安（Julian）和狄奥多西所建，旨在接收运送粮食的船队，正是这些定期而至的粮食（尤其是来自埃及的）供养着整个城市。两个大港口都排列着巨大的粮仓，运来的粮食就储存于此。

一个来自潘诺尼亚行省的废墟的8岁大孩子，是否会将思绪转向如何养活50万人的后勤问题，我想这还是值得怀疑的。更有可能的情况是，这座城市惊人的纪念建筑让他目不暇接，使他在故乡或沿途看到的任何遗迹都相形见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君士坦丁修建的圣使徒教堂，这里既是皇陵，又是圣安德烈、圣路加和圣提摩太的圣体所在地。狄奥多里克本人是基督徒，所以对他来说，这种神圣力量的集合意义重大，建筑本身也令人叹为观止。这条路线接着穿过凯旋柱，其顶端是阿提拉的征服者、皇帝马尔西安（Marcian）的雕像（凯旋柱的一部分至今依然可见），然后就到了主神殿。从这里左转就进入了这座城市的仪式中

心，大理石纪念碑一个紧挨着一个。在狄奥多西广场（现在的巴耶赛特广场）上，有另外一个凯旋柱和雕像（当然是狄奥多西本人的），还有巨大的四柱凯旋拱门，以及元老院议事厅所在的圆形广场。最后就到了伟大帝国的心脏，这里有竞技场和宫殿建筑，还有分别象征神圣智慧与神圣和平的圣索菲亚大教堂（Hagia Sophia）和伊莲娜教堂（Hagia Irene）。在今天的伊斯坦布尔，依然可以看到这两个著名的圆顶大教堂，但是在463年，有的只是它们的前身：古典式的长方形教堂，屋顶有柔和的倾斜，而不是圆顶的。原有的屋顶是如何被取代的？这是第3章的重要内容，现在我们只要认识到这一切是多么宏伟就够了。当狄奥多里克骑马穿过查利修斯门时，正是这个城市的鼎盛时期，到处是光彩夺目的大理石外墙、金碧辉煌的青铜屋顶和镀金的雕像。这些与他所知的一切形成极其强烈的反差，只会让他眼花缭乱。(注)

如果你有孩子，就会很自然地根据你对年轻人的了解去想象狄奥多里克。快速翻阅儿子的成长记录后，我发现在公元2000年前后的英国，8岁男孩的平均身高是128厘米，体重约为28公斤。大多数8岁孩子的注意持续时间不长，精力充沛，他们生来就需要不断获得适度的刺激、食物和关爱。但是，狄奥多里克出身王族，他身上流淌的是王室的血液。无论是因为从小受到的教养还是其他什么原因，他能够比大多数人更加从容地应对君士坦丁堡的新生活，以及新生活所带来的情感剥夺和被展示在人前的命运。

他是父辈三兄弟的子嗣中最年长的一个，可能这就是为什么他会被送去作为担保。瓦拉米尔似乎没有子嗣（业余心理学家或许会怀疑这是因为他杀害了妻子的祖父），但即使他有，狄奥多里克依然会被当作未来的领导者来培养。而此时，依然是瓦拉米尔和他的兄弟们共同拥有对潘诺尼亚哥特人的领导权。由于没有长子继承制度，因此每一个男孩子都有可能成为将来的领导者。此外，这个位置十分特殊，也十分危险，需要有大量备选者，以免某人早逝，或者是某人的性格使其难当此任。他不仅要在危急关头一马当先，冲锋陷阵，还要从一开始就能以自信鼓舞一众首领满腔热情地跟随他投入战斗。这需要的不仅是强健的体魄和

超人的胆识，还有那种源于自信、极具感染力的人格魅力，还需要有足够的智慧，能够知道何时应该发起战斗以及如何战斗。

在这种情况下，继承绝不仅仅是简单的从父亲到长子之间的传递。历史学家常常批评这一时期的墨洛温王朝未能发展出长子继承制，因为这个王朝的演替历史总体上是反复的内斗。但这就是不得其要领了，只有当继承者的个人特征不那么重要时，也就是说，当领导权不那么具有个人色彩，个人魅力不那么重要的时候，才能实行长子继承制。例如，军队不会愿意被一个诗人领导着上战场，也不会愿意（至少不会两次愿意）跟着一个愚蠢的壮汉上战场，他虽然可能身材魁梧、充满魅力，却会让士兵在毫无胜算的战斗中丧生。关于中世纪早期的继承问题，我能想到的最好类比来自《教父》。在这部作品中，维托·柯里昂（Vito Corleone）的主要顾问和独立的二线领导者——如汤姆·黑根（Tom Hagen）、卢卡·布拉西（Luca Brasi）和彼得·克莱门沙（Peter Clemenza）——仔细考察了他各个儿子的能力。我认为尤其值得考虑的是三个儿子中老大桑尼·柯里昂（Sonny Corleone）的优缺点：

> 他有力量，有勇气，慷慨大方，心胸宽广。然而他没有其父的谦逊，而是恰恰相反，暴躁的脾气会让他做出错误的判断。虽然他对父亲的生意很有帮助，但依然有许多人质疑他是否能成为继承人。(注)

最终，更安静、更聪明、同样勇敢的老三远胜于虽有魅力却过于鲁莽的老大，而老二则缺乏足以参与竞争的素质。要率领一个战团，无论大小，都要担负很大的责任，未来的继承人总是要受到考察。

因此，狄奥多里克的家庭环境不可能培养出多愁善感的性格，即使是在一个8岁的小孩身上。我们知道他有兄弟姐妹，尽管我们不清楚他们是否生于公元463年之前。然而，他们很有可能是不同联姻的产物。就连有一半王室血统的战团领导者，联姻时也既会考虑爱情或欲望，也

会考虑政治需要。根据形势的需要，他们常常会通过娶妻和纳妾的方式同时结成各种联盟。有时候，事情并不像所计划的那样。据说，格皮德人（Gepids）的公主罗莎蒙德（Rosamund）谋杀了自己的丈夫——伦巴第人的国王阿尔博因（Alboin)，因为他总是吹嘘自己将她战败的父亲的头骨做成了酒杯。对于瓦达梅尔卡是否怀有向瓦拉米尔复仇的念头，并没有记录。但即使王室的生活没有如此复杂，妻妾之间的关系仍然很紧张，她们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出头。因此，在5世纪时，即使是在一般的王室家庭，生活也与现代核心家庭的规范和希望千差万别。这还没有把三兄弟之间的紧张关系算进去。瓦拉米尔、狄奥德米尔和维迪米尔可能已经达成一致，要在他们的有生之年分享权力，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对此后的事情也达成了一致（我认为那些从父母那里共同继承某些东西的人，在考虑下一代人时，会对此产生共鸣）。根据约达尼斯的记录，狄奥多里克的父亲不想让瓦拉米尔以他为人质，这应该是事实。作为三兄弟中的老大，瓦拉米尔把狄奥多里克送到了君士坦丁堡，很可能是为了防止他干政，避免他赢得二级领导层的拥护，因为如果狄奥多里克得到拥护，就会顺理成章地成为下一代的继承者。或许瓦拉米尔还希望能够在此期间有自己的子嗣。注

这些想法中可能有比较离谱的地方，但其大致思路肯定是正确的。骑马穿过查利修斯门的这名8岁男孩可不是寻常之辈。当时他肯定焦虑不安，如履薄冰，但是他的成长经历使他具备了不同寻常的坚毅。在接下来的10年里，他在君士坦丁堡究竟做了什么，我们无据可查，但是通过罗马朝廷上其他许多人质的例子，我们可以很好地了解这一切背后的动机。虽然狄奥多里克被送去是为了确保瓦拉米尔率领的哥特人能够遵守新的条约，如果他们违背了条约，他的确有可能会被处死，但是罗马人收留人质这一做法背后的动机却要宏大得多。简而言之，罗马人想要从思想上影响这些王室人质，让他们以后能够更加驯服，为己所用。他们希望让这些人质既真心尊重罗马文明的辉煌，又明智地对罗马帝国的威力充满敬畏。这样，在他们最终返乡之后，就会影响其所在部族的外交政策，使其有利于罗马。

虽然狄奥多里克肯定要受到监视，但是他身边有一些自己的随从，也至少部分接受了罗马上层阶级的标准教育（就像在致阿纳斯塔修斯的信中所提到的那样）。毕竟，较长远的计划是要塑造他的思想，而要想灌输罗马的价值观念，还有什么比罗马式教育更好的方法呢？他可能也能在朝廷和城市里自由行动，观看马戏和戏剧表演，去教堂，因为此时的君士坦丁堡里仍然有一个独特的非尼西亚教会社群。年龄渐长的他甚至有一两次随罗马军队去作战。总之，虽然有一丝阴影笼罩着他，毕竟他的确是人质，但是罗马人赋予他一切机会去了解关于罗马的一切，希望他回故乡继承王位之后，能够成为可靠的合作伙伴。[注]然而，不管针对狄奥多里克的教育方案具体细节如何，它都彻头彻尾地失败了。他返回潘诺尼亚之后不到五年，二十出头的他返回君士坦丁堡：这次是率军一万兵临城下。这是怎么回事？他的教育出了什么问题？

辛吉度努姆

没有什么策略是万无一失的。面对各种刺激，人们总是可以用要么完全接受，要么完全拒绝的极端方式来回应，大部分人的做法可能会介于两者之间，对于灌输给他们的思想，选择其中的一些，而拒绝其他的。就阿马立家族的狄奥多里克而言，有证据表明，他的反应非常复杂，也非常有趣：他充分意识到了罗马帝国的势力之大，也认识到了罗马人在思想和行政结构等方面的优势；与此同时，对于所看到的一切，他丝毫没有胆怯，而是精心盘算罗马精神（Romanitas）中哪些因素可以拿来为己所用。所有这些都只能是推理，因为狄奥多里克没有日记存世，但是从他后来的所作所为来判断，这是显而易见的。

狄奥多里克为什么会在18岁时返回故乡，我们并不清楚。他显然已经长大，但根据罗马法，25岁才算成人，我们不知道哥特人的传统是什么。基本有两种可能：要么条约里原本就规定了返回日期，要么是出现了新情况。如果是后者，又有两种可能。第一种可能是，5世纪70年代

早期，瓦拉米尔在一场争夺霸权的斗争中丧生。在阿提拉去世后的多瑙河中游地区的历史上，这样的斗争时不时会发生。这不仅使得狄奥多里克的父亲狄奥德米尔成为潘诺尼亚哥特人的首要领导者，也使狄奥德米尔的长子狄奥多里克成为最直接的继承人，因为瓦拉米尔似乎仍然没有子嗣。显然，当务之急是让狄奥多里克赶紧回来。

但是，瓦拉米尔可能早在5世纪60年代中期就去世了，如果是这样，那么狄奥多里克返回故土这件事就与其没有什么关系了。另外，到了5世纪70年代早期，君士坦丁堡也在酝酿巨变。在过去的20年中，决定皇帝废立的是身为将军和贵族（patrician)的阿斯帕（Aspar）。他不是罗马人，而是阿兰人（Alan），因此不可能亲自称帝，对此，他本人似乎心知肚明，但是皇帝马尔西安（在位时间应该是450—457年）和利奥一世（Leo I，457年继位）都是他扶上宝座的，他在君士坦丁堡的显赫地位无人敢于挑战。他还和色雷斯哥特人关系密切，这些人是东罗马巴尔干半岛军队的主力，尤其是首都的卫戍部队，这为他提供了震慑任何可能对手所需要的军事实力。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皇帝利奥一世开始策划独立，并利用新招募的托罗斯山区（Taurus，今土耳其）的伊苏里亚人（Isaurian）军队的首领来与阿斯帕的势力抗衡。在5世纪40年代帝国需要扩充军队以抵御阿提拉的时候，在这一地区的大规模招募就已经开始了，到了5世纪60年代，此举的政治后果开始显现。伊苏里亚人中最突出的是芝诺（Zeno，希腊语为xenon，意思是“陌生人”“客人”，就像在表示“仇外心理”的xenophobia一词中），芝诺在466年羞辱阿斯帕之子阿尔达布尔（Ardaburius）的事件中崭露头角，后来在军中飞黄腾达，结交了不少达官贵人。

471年，皇帝和伊苏里亚人先下手为强。据说，在芝诺的鼓动下，利奥一世在宫殿里砍杀了阿斯帕，因此赢得了“屠夫”的称号。色雷斯哥特人马上发动了叛乱，这并不出人意料。但是，和古往今来的许多类似情况一样，利奥一世发现依靠别人来摆脱依附关系并不是好办法。芝诺娶了利奥的女儿阿里阿德涅（Ariadne），他们的儿子利奥二世是王位继承人，所以只不过是一个幕后掌权人取代了另一个。至于“屠夫”夜里

是否睡得更安心，历史上并没有记载。[注]

正是在这样的混乱中，狄奥多里克离开了君士坦丁堡，在某种程度上，他可能就是因此离开的，即使不是这样，由于这位哥特人的政坛新秀后来的所作所为，两个本来独立的事件很快纠缠了起来。回到潘诺尼亚之后，狄奥多里克最迫切需要的就是确立自己作为父亲继承人和未来领导者的合法性。果然，很快他就对萨尔马提亚人（Sarmatians）发起了掠夺性的远征，这些人占据着古老的罗马城市辛吉度努姆（今贝尔格莱德）附近的区域。萨尔马提亚人也曾凶猛彪悍，但是在古代晚期，他们已经成为人人喜欢攻击的对象。罗马人在阿德里安堡（Hadrianople）遭遇惨败后，很快就要成为皇帝的狄奥多西一世对萨尔马提亚人发起挑衅，试图以此表明上帝站在自己这一边。近100年后，狄奥多里克选择了同样的攻击对象。根据约达尼斯的记录（很有可能还是依据卡西奥多罗斯的观点），狄奥多里克是在父亲不知情的情况下发起远征的，但我完全不相信这种说法。长期离开故土，现在瓦拉米尔已经去世，没有留下任何子嗣，在这样至为紧要的时刻，确立狄奥多里克的威信是父子二人共同的当务之急。他凯旋时带回的萨尔马提亚人的“奴隶和珠宝”很好地表明了这一点。[注]

萨尔马提亚人苟安软弱，但选择辛吉度努姆本身也是一个重大的决策。刚刚回来的狄奥多里克雄心勃勃，他说服父亲，阿斯帕被杀所造成的政治动乱是个不容错过的机会，潘诺尼亚哥特人要全力以赴地抓住这个机会。如同大多数真正“重大”的决定一样，证据表明这一决定背后有诸多动机。一方面，在羁旅君士坦丁堡期间，狄奥多里克充分意识到哥特人在潘诺尼亚的局限。在潘诺尼亚，他们陷入了一场区域内争夺支配地位的斗争，阿提拉的战争机器瓦解后，这里涌现出了众多高度军事化的部落，其中包括鲁吉人（Rugi）、苏维汇人（Suevi）、希里人、格皮德人和阿兰人，更不用提古老而可怜的萨尔马提亚人和阿提拉的儿子们领导下的匈人了。阿提拉的策略是把几乎所有这些人都团结起来，剑指罗马，勒索大量黄金和其他形式的财富。如我们所见，对这一地区的

考古挖掘发现了数量惊人的匈人时期的财富。但是，这些群体不再共同行动后，新财富即便没有停止流入这一地区，也很快就减少了。新的区域内部冲突取代了为获得财富而对罗马发起的长距离远征，并很快沦为对越来越少的财富的争夺（特别是因为现有的财富被用来陪葬），但斗争依然激烈。瓦拉米尔就是在这样的斗争中丧生的：

> 为了鼓舞士气，他一马当先，身先士卒，坐骑受伤倒下，把他翻倒在地。他很快就被敌人的长矛刺中，当场毙命。㊟

据说他的追随者们为他报仇雪恨，但是对于以如此不快的方式死去的国王来说，这无法带来什么安慰。继续无休止地争夺在多瑙河中部的支配权，争夺对总量不断下降的财富的控制权，最终的结果可能是悲惨的死亡，狄奥多里克并不觉得这样的前景诱人。羁旅君士坦丁堡的岁月开阔了他的视野，让他看到了一个更为广阔的世界。

具体说，色雷斯哥特人的反叛让潘诺尼亚哥特人的领导者有切实的理由认为，一个振奋人心的机会到来了。要想理解其本质，就有必要理解色雷斯哥特人在东罗马所拥有的特权地位。在任何时代的罗马军队里，蛮族士兵都不算是奇怪的存在。从奥古斯都时期开始，至少有一半的帝国士兵不是罗马公民。然而，在罗马帝国的后期，出现了一种新的安排，即非罗马人组成的部队获准在罗马的土地上定居，在军队名册上永远从属于他们自己的领导者，在法律和政治上（可能还有文化上）保留相当程度的自治权。这和较早时期形成了鲜明对比，那时蛮族士兵在罗马军队里长期处于罗马军官的领导之下，由蛮族军官领导的蛮族队伍被视为从边境之外附属国征募来的临时增援。这种新的安排最早出现于什么时候，对此有很多争论。这种安排造就了被罗马人称为“同盟者”（foederati，在英语里这个词经常被译为federates，虽然这个词的用法太不严谨）的群体。虽然这种新的安排可能是经过几个阶段才形成的，但我们有充分理由认为，其完整形式最早用在了色雷斯哥特人身

上。他们最开始是臣属于匈人的一个部落，5世纪20年代，罗马在潘诺尼亚的军事行动把他们从匈人的统治下解放出来，重新安置在色雷斯。罗马的收获是双重的：匈人的军力大大削弱，自己的军力则加强了。哥特人则摆脱了侵略性十足的匈人的霸权统治，获得了东罗马内部的特权地位。

等到5世纪60年代狄奥多里克第一次见到它的时候，这种关系已经进入了第二代和第三代，它带给色雷斯哥特人的好处显而易见。一方面，酬劳相当不错。按照条约，瓦拉米尔把侄子送到君士坦丁堡的朝廷，每年可以从东罗马获得300磅黄金，而作为付给其追随者的报酬，色雷斯哥特人的领导者每年得到的是这个数量的7倍。另一方面，色雷斯哥特人和朝廷的关系也十分密切。5世纪70年代早期，他们的最高领导人也叫狄奥多里克：你可能会说这个巧合很惊人，甚至可以说让人想不通，不过，在哥特语中，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人民之王”，所以很可能任何自尊自重的王子都会采用这个名字。这位色雷斯的狄奥多里克还有一个绰号叫斯特拉波（Strabo），意思是“斜视者”，可以用来避免混淆。我们知道，斯特拉波是阿斯帕妻子的亲戚，这种联姻使色雷斯哥特人的领导层和贵族紧密联系到了一起。他们也和朝廷的一些高级官员保持密切联系，并提供至少一部分的卫戍部队。和潘诺尼亚人不同，他们不用花费时间来对抗苏维汇人、希里人和其他部落，也不必在多瑙河中部徒劳争夺匈人所留下的不断减少的财富，他们在色雷斯平原占据着很好的定居点，在每年的报酬之外，其土地权也得到承认。(注)

由于利奥一世偏爱伊苏里亚人，又谋杀了色雷斯哥特人的保护人，这种愉快的形势戛然而止。很容易理解他们为什么会发起叛乱。和罗马晚期的政治常情一样，像阿斯帕这样举足轻重的人物轰然倒地，带来了一段政治上的动荡时期。色雷斯哥特人的领导者肯定以为他们的反叛会削弱伊苏里亚人的地位，让他们回到往日的好时光。他们未能注意到的是，潘诺尼亚哥特人的年轻王子已经充分盘点了他们的特权，并在色雷斯哥特人的叛乱中发现了自我提升的巨大机遇。这就是为什么以对抗辛吉度努姆的萨尔马提亚人来证明其勇气的决定有更为广泛的意义。狄奥

多里克拒绝将辛吉度努姆交给帝国控制，因为这里是一个重要的咽喉之地，只要控制了这里，就开启了向南通往东罗马巴尔干地区的主要路线。狄奥多里克带着一个大胆的计划回到潘诺尼亚，这个计划就是他和父亲应该把他们共同的大业全部转移到东罗马的土地上，他们毛遂自荐，直接取代那些叛乱的色雷斯哥特人。可能是在472年夏末，潘诺尼亚哥特人集合起来，开始向南行进。即使在鼎盛时期，君士坦丁堡的政治也十分复杂，而它马上将变得更加复杂。

这并非轻巧的决定。仅后勤问题就十分惊人。狄奥多里克和狄奥德米尔支配着超过一万名武士，但这次上路的不仅仅是武士。在回顾4世纪到6世纪之间的历史时，19世纪的民族主义者把潘诺尼亚哥特人这样的群体视为现代欧洲民族的“先民”。因此，民族主义者，尤其是德国的民族主义者，经常会一厢情愿地把他们眼中自己民族的某些道德品质强加到那些“先民”身上，认为他们是自由平等、有着同质文化的群体，他们不接受外人，男女老少一起，带着农具、牲畜和民族舞蹈踏上了迁徙之路，经过长途跋涉，这些“先民”小部落中有的幸存下来，建立了长久的小王国，有的则没有。

过去的两代学者对这种极具浪漫色彩的描绘做了大量必要的修正。他们产生了一些共识，但还有争议点。在我看来，学者们达成了两个方面的共识。首先，武士之间并不平等。同时期的史料表明，仅在武士之中就存在至少两个等级的群体，多少属于同一时期的法律文本证实了这一点。这些法律文本描述了武士的自由等级和半自由等级，还提到了没有武装的奴隶（法律法规无法告诉我们的是每个等级在每个群体中所占的比例）。其次，大家一致认为，一个人在一生中是完全可能改变群体归属的，这表明战后人们理解个人群体归属的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因此，过去的人将这些群体视为小型的、文化同质的祖先民族原型，这样的看法是不合理的。

然而，还有两个问题依然颇具争议。首先，一些个体确实改变了其归属关系，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在史料中见到的更大的实体（如潘诺尼亚

哥特人）根本就不具备真正的群体身份？如果不具备群体身份，就意味着其不过是由不同武士组成的松散易变的联合体。其次，这些群体的建立仅仅是为了作战吗？这些武士也是从事农耕和其他活动的更大社会群体的成员吗？这两点实际上是密切联系的。

争论仍在进行的时候，参与者很难预测可能会达成什么样的共识，我的处境就是这样。最终结论还有待分晓，但不管怎样，我要陈述一下我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因为你对这个问题的认识，绝对会决定你对472年从匈牙利沿罗马古道朝巴尔干地区南迁的队伍的想象。从后往前说，到达罗马人所辖的巴尔干地区后，一边是潘诺尼亚哥特人的领导层，一边是帝国派来和他们进行谈判的代表，双方都明确认为，要想妥善处理他们之间的关系，就必须在罗马的土地上为潘诺尼亚哥特人找一块农田，让他们自己来耕种。换句话说，他们既是战士，也是农民。这是很有道理的。只有在经济相对发达的情况下，当不事征战的农业人口能够生产出足够的剩余财富，并且能够提供足够的食物、衣服和武装时，万人以上的专业武士队伍才能存在。罗马之外的农业经济根本就不可能这么高产，而且我们知道，在公元4世纪和5世纪，非罗马国王只保留几百名专业武士作为随从，而不是数千人。

我们不能仅仅因为一些人改变效忠对象，就认为他们先后所在的群体毫无凝聚力可言。这里关键的是制约个人加入方式和后续行为的规则与惯例。成员资格是否对所有人开放？新的成员在群体里是否享有充分的权利？成员资格是否既涉及特权，也涉及责任？这些群体里显然有不同等级的武士，更不用说还有奴隶，可见成员资格绝不是不受限制的个人选择，当然，除非你认为5世纪的欧洲有成千上万的人一心想成为奴隶。因此我认为，在每一个群体中，至少上层的武士精英确实有强烈的群体政治认同（至于他们是否像19世纪的民族主义者所想象的那样，有同样的民族服饰和民族舞蹈，我不清楚），不过这种认同和其他所有的认同一样，在恰当的时机也会发生变化。而对于地位较低的武士甚至是奴隶来说，群体的存在并没有那么利益攸关，因此随着一个人社会地位的下降，他对群体的认同感也会大幅降低。[注]

不管怎样，你在这些争论中的立场会影响你对迁徙中的潘诺尼亚哥特人的认识。我们知道这个群体包括许多非战斗人员，以及至少2 000辆马车。自封的修正派学者把他们看作一个自由的武士群体。他们认为这不过是伴随大部分前现代军队的普通辎重车队，队伍里会有很多妇女，包括妻子和妓女，还有儿童、厨师、理发师、艺人和其他各色人等。然而，在我看来，当时的经济结构（这是5世纪与前现代时期乃至中世纪盛期欧洲的一个重要不同）不足以供养大量的专业武士，群体在外交上重视寻找耕地，还有高级的群体成员资格绝不对所有人开放，这一切都让人想起一个不同的模式。在我的脑海中，迁徙中的潘诺尼亚哥特人不像是带着辎重车队奔赴前线的现代早期军队，而更像是为了逃离大英帝国的统治而一路向北隆隆行进的布尔人车队，他们既是农民，也是战士，拖家带口，带着全部的家当踏上漫长的迁徙之路。按照这一模式，这个群体包括更多的非战斗人员，其年龄分布更加“正常”，除了武器和大量的食物之外，还需要携带与农业有关的一切。

但如果说，光是物流问题就意味着人们不可能轻易做出迁徙的决定，那么毫无疑问，在这次迁徙中，一切都和政治有关。必须让地位较高的武士相信，君士坦丁堡的混乱带来了足够诱人的潜在机遇，值得付出如此巨大的努力。在这个问题上，当时的情况又帮了狄奥德米尔和狄奥多里克的忙。和定居人口相比，有着悠久迁徙历史的群体更愿意通过迁徙实现自我提升，即使中间隔了一两代人，这是一个已经被证明了的事实。至少，武士精英这个需要被说服的关键人群有悠久的迁徙历史。他们的哥特人祖先也经历了漫长的迁徙，可能是分成几个较短阶段进行的，一次是3世纪和4世纪早期从波罗的海迁徙到了黑海，另一次是4世纪后期和5世纪从喀尔巴阡山脉东部迁徙到了多瑙河中游的匈牙利。因此，他们更容易被说服，相信这次迁徙是值得的。[注]

至少他们中有些人是如此。虽然有各种潜在的利好，但狄奥多里克劝服其父亲去做的的确是一场豪赌。5世纪70年代早期，罗马帝国西部国库空虚，缺兵少将，风雨飘摇，朝不保夕，而帝国东部依然是一片繁盛的景象。阿提拉已经被震慑，东罗马和波斯帝国之间处于和平状态，

作为其军队的命脉，来自东部省份的税收完整无损。因此，作为不速之客闯入其领土，即使你声称是前来帮忙的，依然很有可能造成很多龃龉，群体里只要有点头脑的人都不会怀疑这一点。果然，迁徙的决定造成了群体内部的重大分裂。

根据4世纪后期和5世纪的史料，和潘诺尼亚哥特人相似的几个非罗马群体也面临类似的决定：是迁徙，还是继续留在原地？他们的决定都是由正面和负面动机促成的（就潘诺尼亚哥特人而言，正面动机是，他们有可能通过东罗马的土地获得巨大财富，负面动机则是，在多瑙河中部展开激烈争夺，可以得到的好处越来越少），虽然两种动机的轻重对不同群体而言各不相同。例如，在376年就渡过了多瑙河的哥特瑟文吉人（Tervingi）和格鲁森尼人（Greuthungi），与潘诺尼亚哥特人一样，也被罗马经济结构中的巨大财富所吸引，但是最初迫使他们迁徙的是匈人的残暴。就我们有详细证据的例子而言，无论其正面和负面动机如何，这样的大迁徙总是会在群体内部造成政治上的分裂。这反映了大迁徙过程中的压力之大，即使是对于习于迁徙的人口来说也是如此。很自然，这种分裂表现为领导层中一个有影响力的团体支持这一举动，另一个则表示反对。至于潘诺尼亚哥特人，约达尼斯记录了以下内容：

> 从邻近部落掠夺来的战利品越来越少，潘诺尼亚哥特人开始缺衣少食，对那些长期通过战争来获取生活必需品的人来说，和平变得令人厌恶。于是哥特人都去找国王狄奥德米尔，大声求告他，要他率领全军出发，无论朝什么方向都可以。于是他招来他的弟弟（维迪米尔），经过抽签，弟弟奉命进入意大利，他本人势力更大，所以将率部东进，剑指更加强大的东罗马。

在这里，约达尼斯又一次至少部分再现了哥特人历史的净化版本，也就是卡西奥多罗斯在狄奥多里克的意大利朝廷上创作的那个版本。抽签行为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哥特领导阶层在东迁时的掠夺性意图，还试图掩盖他们之间的明显分歧。三兄弟中的老三维迪米尔显然不乐意

跟随狄奥德米尔去东罗马，而我可以自信地说，狄奥德米尔也很乐于利用这个问题将他分割出去。

长大成人的狄奥多里克返回潘诺尼亚，这就带来了一个棘手的问题，即继承权。在此之前，阿马立家族的三兄弟实行权力共享，老大去世之后，首要领导之位就会传给老二。然而，在狄奥多里克这一代，没有这样的安排，虽然他至少有一个弟弟提奥迪蒙德（Theodimund）。在我看来，显而易见的是，狄奥德米尔利用是否迁入巴尔干地区的问题，给二级领导层指出了当前继承人难题的解决方案：他的长子刚从君士坦丁堡回来，又在与萨尔马提亚人的战争中打了胜仗，在继承问题上应当优先。毫无疑问，意见征询工作在关键时刻之前就已经做好，由于心里想着要对东罗马巴尔干地区发动掠夺性入侵，狄奥德米尔不能失去太多的军事力量。这招奏效了。维迪米尔（和上一代的贝里蒙德一样）启程前往西方，这样一来，狄奥多里克就无人挑战了。显然，维迪米尔只带走了少量的追随者，可能只有他的家人（因为他的确有一个儿子，而这也是狄奥德米尔和狄奥多里克想让他离开的另一个原因），还有他个人的武士随从，数量也就几百人。作为避难者，他们不再构成一个独立的单位，而是不得不去投靠高卢的西哥特人国王尤里克（Euric）。[注]这就完成了狄奥多里克从君士坦丁堡归来所引发的戏剧性革命：继承问题解决了，潘诺尼亚哥特人准备沿着罗马的道路向巴尔干进发，而狄奥多里克对辛吉度努姆的占领为他们打开了进入巴尔干地区的门户。

埃庇丹努斯

让一万多名勇士同时朝着一个方向行进，带着他们的家眷、农具、家畜和各种能够装上这几千辆马车的私人物品，在组织方面，这是一大壮举。路上的交通拥堵肯定异常严重。在葛底斯堡战役之后，运送南方军伤员回家的车队要用一天一夜的时间才能通过一个地点，这是最令我难忘的历史事实之一。472年哥特人沿巴尔干半岛向南行进的马车队虽

然没有那么悲惨，但是其队伍短不了多少。狄奥德米尔和狄奥多里克面临的问题是：由于有如此庞大的队伍跟在身后，他们的行动被限制在主干道上，而这样的主干道只有一条。事实上，时至今日，巴尔干半岛的山区地形依然将人们的行进路线限制在几条公路上。当时，瓦尔达尔河谷是关键道路。道路一部分有两个分支，根据约达尼斯的明确记录，两个分支都被用到了。在攻下奈苏斯（Naissus，今天的尼斯）之后，狄奥德米尔直接向南前进，而狄奥多里克率领军队通过赫库里乌斯堡（Castrum Herculius）前往乌尔皮亚娜（Ulpiana）。然而两人目的地相同，都是塞萨洛尼卡，这是罗马巴尔干地区的都城，也是伊利里库姆（Illyricum）行政区的首府，负责苏齐关（Succi Pass）以西的一切事务。在那儿他们面对的是罗马贵族西拉利亚努斯（Hilarianus），他接到命令，带着他能召集的全部人马来见他们，然后就开始了谈判。哥特人的策略很简单：对塞萨洛尼卡形成威胁，提出他们想谈判而不是战斗，看看东罗马能够开出什么条件。

约达尼斯对巴尔干事件的讲述在此戛然而止，他话锋一转，巧妙地谈起了东罗马皇帝和哥特人领导者之间的一个约定：经过几年的愉快共处，后者将迁往意大利，因为这种和平与融洽使他的追随者们有点厌烦了。[注]究竟是卡西奥多罗斯出于尴尬（这并非不可能）而跳过了后面发生的一切，还是因为就像很多学生在写论文时出现卡壳现象，眼看三天期限将至就胡乱凑合一样，约达尼斯的记录在此变得散乱起来，我们不得而知。

值得庆幸的是，东罗马的史料接上了这个故事，事实证明，这个故事非常复杂。约达尼斯略去了整整16年的政治斗争，而这是哥特人最终离开巴尔干前往意大利的真实背景。这对父子的大胆策略引发了一场他们和色雷斯哥特人之间的权力斗争，这不仅在巴尔干半岛引起了巨大反响，甚至还严重影响到君士坦丁堡的宫廷。

在此期间，政治上的活跃人物有很多。潘诺尼亚哥特人来到东罗马，让形势变得更加棘手，如果我们从一开始就熟悉这些人物，就会明

白为什么会如此。首先，在巴尔干半岛有两个哥特人群体：一个是来自潘诺尼亚的新贵，另一个是早已确立其地位的色雷斯“同盟者”，虽然目前处于反叛状态，但是已经习惯了内部特权角色。无论是谁在君士坦丁堡掌权，资金（或者可能还有必要的政治意愿）都只够支付给其中一个群体，这种数额巨大的年度补贴要能够配得上羽翼丰满的罗马同盟军，传统上作为援助金的那一点是远远不够的。因此，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有一个哥特人群体可以真正成为统治联盟的一部分（君士坦丁堡喜欢这样宣称）：事实上，两个群体领导人的利益如此格格不入，即使设法给双方都送钱，他们可能依然会打仗。注

在君士坦丁堡内部，至少在一开始，皇帝利奥和皇室成员卷入了各种常规的宫廷斗争，要么是争夺王权本身，要么是争夺与他们显赫地位相匹配的各种要职。这些纷争在朝廷官员、帝国元老院成员和军队的高级将领这些传统的观众面前上演（有时他们自己也参与其中）。而在5世纪70年代，除了君士坦丁堡这些常规的政治角色之外，又多了新招募来抗击阿提拉的伊苏里亚人军队的高级将领。到了5世纪70年代早期，他们已经飞黄腾达。其中最著名的是芝诺，他娶了皇帝利奥的女儿阿里阿德涅，育有一个儿子（出生于467年），极其意味深长的是，芝诺的这个儿子与其外祖父重名，显然他注定要继承外祖父的皇位。前面提到过，芝诺惊人的上升之路直接导致了阿斯帕的倒台和哥特人同盟军的反叛，因此在某些方面，伊苏里亚人和色雷斯哥特人是天生的政敌，任何统治联盟都很难将他们联合到一起。更麻烦的是，芝诺仅仅是几位伊苏里亚领导者中最突出的一个，这些领导者率领着各自的人马，可能各自为政。因此，芝诺不能简单或顺理成章地让伊卢斯（Illus）这样的伊苏里亚将领效忠于自己，而必须赢得他们的忠诚。两个哥特人群体，以及至少两个伊苏里亚人群体，以激动人心的方式和君士坦丁堡政治肥皂剧的常规演员组合到一起，让公元473年之后的演出成为必看节目。

到了这一年的末尾，初步的妥协已经达成。贵族西拉利亚努斯将潘诺尼亚哥特人从塞萨洛尼卡转移开，让他们在塞萨洛尼卡西边优卑亚（Euboia）的几个农业小镇驻扎下来。但在召集军队面对巴尔干半岛西

部的狄奥多里克和狄奥德米尔的过程中，利奥被迫将军队从巴尔干半岛东部转移开，这让另外一个狄奥多里克即斯特拉波得以放手行事。斯特拉波的队伍在厄纳齐雅大道（Via Egnatia）上的城市之间自由行进，火烧腓立比的郊区，还包围了阿卡狄奥波利斯（Arcadiopolis），以此向皇帝施加政治上的压力。利奥很快就不堪其扰。色雷斯哥特人重新得势，斯特拉波被任命为皇帝直卫军队的统领（magister militum praesentalis），这是帝国将领中最重要的职务，任命之后，他的部下将每年获得2 000磅的黄金。

吊诡的是，潘诺尼亚人到来最初的影响竟然是让皇帝不得不和色雷斯哥特人达成交易，但这仅仅是权宜之计，并不是长期性的解决方案。阿马立家族领导的哥特人南迁，他们追求的好处一个也没有实现。皇帝利奥同意每年付给色雷斯哥特人巨额黄金，这意味着他们不可能再得到与此类似的待遇。同样重要的是，两边的哥特领导层此时都陷入了生死斗争，他们知道这一点。对于狄奥多里克·斯特拉波和皇帝之间的协议，东罗马的历史学家——非拉铁非的马尔库斯（Malchus of Philadelphia）为我们做了详细的总结。其中有这样一条意味深长的规定：

> [狄奥多里克·斯特拉波]将是哥特人的“唯一统治者”，皇帝不应该允许任何想进入其领地的人进入。

斯特拉波显然感受到了压力。他不希望狄奥多里克和狄奥德米尔来到他的地盘，占有他的荣誉，或者把哥特人从他这里吸引走，因为他的权力来自这些人的支持。这是很有可能的，认识到这一点十分重要。虽然有些亲信会对某个王朝忠心耿耿，不会改变立场，但是就4世纪后期和5世纪散布于罗马境内的这些哥特群体（以及其他非罗马群体）而言，“待价而沽”显然是大部分武士的信条。克洛维不仅铲除了他的对手，还兼并了他们的战团，以此扩大自己的势力，而这并非孤例。在公元473年之后的几年里，哥特人的军队在两边的领导者之间摇摆。斯特

拉波得到了皇帝的支持，成为哥特人的首要领导，这不过是他“先下手为强”罢了。注

473年的妥协本来就不会持续太久，三位主要人物的接连去世可能加速了其瓦解。前两个事件发生在君士坦丁堡。474年1月18日，皇帝利奥去世，享年73岁，他的外孙、芝诺的儿子利奥继位。利奥二世在其外祖父去世的当天加冕。如此匆忙，本身就表明紧急议程正在进行，2月9日，这位年轻的皇帝就将其父加冕为“共治皇帝”（joint Augustus）。芝诺似乎已经完成了从伊苏里亚军阀到神选的罗马人皇帝的过程，这是一条惊人的职业发展道路，也是阿提拉留给罗马世界的最奇特的遗产。

但在这一年的年底之前，年轻的利奥死了（自然死亡；对利奥家族来说，474年是非常糟糕的一年），留下芝诺独占王位。本来，无论如何，这个伊苏里亚人都可能面临争夺他儿子控制权的竞争，而利奥之死剥夺了芝诺作为皇帝的合法性——他的儿子毕竟是帝国公主的后代。朝廷上有一股浓厚的阴谋气息。特别是利奥一世的遗孀维瑞娜（Verina）有一个名叫巴西利斯库斯（Basiliscus）的兄弟，这两个人都更容易赢得君士坦丁堡内部传统权势人物的支持。芝诺的天敌狄奥多里克·斯特拉波非常乐意加入争夺，而另一个主要的伊苏里亚人权力掮客——将军伊卢斯也是如此。芝诺感到权力正从自己手中逐渐流失，于是在新一年的第一个月悄悄出逃，巴西利斯库斯于475年1月9日加冕称帝。

这场典型的君士坦丁堡政变取得了预期的效果，但结果却非同寻常。大多数被废黜的皇帝很快会被除掉，除非仍有大量军队及指挥官对其保持忠诚，而这些是芝诺没有的。但是身为伊苏里亚人的首领，芝诺拥有其他的资源，他显然注意到了阴谋，所以早早地逃走，快马加鞭逃到了伊苏里亚，在其领地中心区域的一个山上堡垒中避难。

于是，伊卢斯被派到伊苏里亚围攻芝诺，这其实是派一个伊苏里亚人去抓另一个伊苏里亚人。我们不知道芝诺堡垒的精确位置，但在对托罗斯山脉进行的广泛实地考察中，发现了值得我们注意的那种结构。如果你想到的是光秃秃的峭壁之上的高墙，俯视着下方狭窄但很高产的山

谷，那基本上就对了。有蓄水池提供充足的用水，又有很多隐秘的方式可以不时获取食物，这些山寨基本上是坚不可摧的，只有饥饿或背叛才能将其攻克。5世纪80年代，伊卢斯自己的大本营就经受了长达4年的包围。[注]因此，在475年春天，虽然身着紫袍，巴西利斯库斯依然无法安心，因为他知道芝诺依然逍遥在外，让他就范并非易事。当他得知巴尔干半岛西部正在发生的事情时，不安马上变成了担忧。

具体是什么时候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原来的潘诺尼亚哥特人在马其顿立足之后不久，我们的第三个主要人物狄奥德米尔就一命呜呼了。他当时只有40多岁，但他将弟弟维迪米尔淘汰出局的远见卓识得到了回报。在没有挑战者出现的情况下，王位顺理成章地传给了狄奥多里克，那时他才二十出头。对于巴西利斯库斯来说，这是一个问题，因为狄奥多里克是不会满足于现状的。在一片混乱中，狄奥多里克嗅到了新的机会，因此他与芝诺取得联系，保证他可以得到哥特人的支持，作为回报，他希望能够成为帝国的将领，能够获得利奥在473年赋予斯特拉波和色雷斯哥特人的金钱与其他特权。于是，所有的东西都被重新装上了马车，整个队伍从巴尔干半岛的穷乡僻壤出发，朝着最终的目的地——距离君士坦丁堡更近的色雷斯平原——进发，他们的当务之急是消除哥特对手给他们带来的巨大挑战。这位年轻国王又一次表现出惊人的勇气，尽管这一举动实际上只是将所有人从潘诺尼亚南部带到这里的冒险的延续，而且，狄奥多里克的的确确别无选择，只能继续。就算手下的武士们还没有开始投奔他的对手，被困在优卑亚这个政治上的无人区也绝非长久之计。

回到君士坦丁堡，狄奥多里克的运作，再加上一个简直像命运弄人的意外机会，打乱了巴西利斯库斯政权的安排。狄奥多里克从优卑亚的转移正是针对色雷斯哥特人，其效果是让斯特拉波和他的军队在476年的夏天无暇他顾，斯特拉波的人是巴西利斯库斯可以利用的最明确反对芝诺的队伍，而此时正是东山再起的芝诺向着君士坦丁堡前进的关键时刻。这次进军本身就是运气的结果，虽然起初似乎并非如此。到了476年春，伊卢斯已经在芝诺的堡垒大门前徘徊了一年多，毫无进展，却意

外捕获了芝诺的兄弟朗基努斯（Longinus）。你可能会认为，对于被废黜的皇帝来说，这是又一个挫折，但在一个讲究个人关系的政治世界里，这件事的影响是惊人的。捉住了芝诺的兄弟朗基努斯，伊卢斯就有了可以和前皇帝谈判的筹码，有了这个人质，他们可以让芝诺同意他们所提出的任何条件。也许他们已经在谈判了，我们不得而知，但朗基努斯是伊卢斯所需要的重要担保。他立即和芝诺站到了一起，两个伊苏里亚人将队伍联合起来，返回君士坦丁堡。

到了这个阶段，巴西利斯库斯的担忧变成了恐慌，他派出最后一支队伍前去迎战，率领队伍的是他的外甥阿玛图斯（Armatus）——你可能会认为这是个足够安全的选择。但是，巴西利斯库斯有孩子，包括儿子，而在利奥二世死后芝诺没有了儿子。因此芝诺给予阿玛图斯所有通常的宫廷荣誉，然后抛出了最重的砝码：他会让阿玛图斯的儿子（也叫巴西利斯库斯）当恺撒，成为王位的实际继承人。阿玛图斯上钩，改变了阵营。突然之间，巴西利斯库斯完全失去了武装力量，成了孤家寡人。由于关键人物看到从芝诺的复辟中能够获得更多，加上狄奥多里克让色雷斯哥特人无暇他顾，巴西利斯库斯的政权已经分崩离析。

这简直是展现人性之龌龊和野心之虚妄的完美教科书式案例，事件很快有了一个适当的结局。巴西利斯库斯和他的家人在一个教堂里寻求庇护，芝诺承诺不会处决他们，将他们引诱了出来。他将他们流放到卡帕多西亚的利姆奈（Limnae），芝诺遵守承诺，没有处决他们；不过，他把他们扔进无水的蓄水池里，四面围上高墙，让他们等死。至于芝诺，他在476年8月重获王位，正好赶上接待意大利新统治者奥多亚塞派来的使节，后者以本书在开始时描述的惊人姿态呈上了被废黜的罗慕路斯·奥古斯都路斯的皇帝行头。延续这么多个世纪之后，罗马帝国的西半部现已不复存在。在第一次尝试恢复它的过程中，年轻的狄奥多里克如何以及为什么扮演了主要角色，都与皇帝芝诺后来所做的有直接关系。注

尽管在18个月的流亡之后，芝诺重新获得了权力，至少表面上如

此，但他的处境并不好。首先，对于一连串拥立他坐上王位的人，他欠得太多了，尤其是对阿玛图斯和伊卢斯，他们在关键时刻由于各自的原因而改变了阵营。然后是哥特人的问题。色雷斯哥特人没能保住巴西利斯库斯的宝座，但斯特拉波的势力依然完好无损。有些事情很容易就解决了。似乎没有人在意阿玛图斯，这个傲慢的花花公子喜欢打扮成阿喀琉斯的样子，在赛马场上大肆炫耀，他对舅舅巴西利斯库斯的背叛使他成为人人喊打的对象。芝诺让他庇护的一个人将阿玛图斯杀死，这个名叫奥诺夫斯（Onoulphus）的杀手实际上是意大利统治者奥多亚塞的兄弟，但他决定在君士坦丁堡建功立业，而不是跟随奥多亚塞西行。两人本来都是希里人的王子，但希里人在5世纪60年代被潘诺尼亚哥特人打败，他们被迫走上了新的道路；瓦拉米尔也是在这场战役中丧生的（此事的影响后文还会谈到）。阿玛图斯的儿子幸免于难，但是被任命为神职人员，对此似乎没有人在意。芝诺喜欢采取直接行动，在试图理解他的各种政治对手在未来十年的行为时，我们要记住这一点。

色雷斯哥特人构成的问题更大。根据保存在我们史料中的数字（以中世纪早期的标准来看，已经相当不错），他们可以派出超过1万名武士。在一次交易中，斯特拉波获得了能够供应1.3万人的军粮和军饷，可见他手下有多少人马。我们所掌握的阿马立家族的狄奥多里克追随者的数据表明，他的人马与此差不多，而总体的叙事梗概也证实了这一点：两个群体谁也不能决然向对方发起对抗。芝诺的问题就在这里。狄奥多里克最初承诺要攻打色雷斯哥特人，但到头来，双方仅仅是在476年和477年有过一些小规模战斗，而且他还向芝诺寻求援助。皇帝犹豫过，甚至想过要与斯特拉波达成交易，尤其是考虑到后者吸收了一些潘诺尼亚哥特人的逃兵。[注]听起来有点奇怪，但我们应该记住，此时的狄奥多里克还不是战无不胜的意大利统治者，而是一个率领人马冒险进行一场豪赌的年轻领导者。有些人显然开始认为斯特拉波是更好的选择。

最终，芝诺没有抛弃他年轻的盟友，在477—478年的冬天，他们围绕接下来的战季达成了协议：

> 狄奥多里克应该调动他集中在马尔西安堡周围的兵力，使其靠拢过来。他们到达巴尔干山脉的山口时，色雷斯士兵的首领会带着2 000名骑兵和10 000名步兵前来接应。他越过巴尔干山脉后，另一支由20 000名骑兵和6 000名步兵组成的部队将在阿德里安堡附近与他会合。

在色雷斯平原城市的驻军部队还会有更多的士兵，但肯定不需要他们。斯特拉波和狄奥多里克一样，可能有1万多名士兵，因此他们的计划是动员近5万名士兵来对抗斯特拉波，保证至少四比一的优势。这足以彻底粉碎色雷斯哥特人。㊟

然而，结果却与狄奥多里克设想的相去甚远。18个月后，他发现自己又回到了巴尔干半岛西部，在罗马大港口埃庇丹努斯（Epidamnus，今阿尔巴尼亚的都拉斯）外，与一位帝国使节陷入谈判。相对于原来的计划，哥特人对478年的实际战况有三个具体的不满：

> 首先，你承诺色雷斯的将军会和他的部队一起立刻加入我军，但是他根本就没有出现。其次，你承诺哥特人的军需官克劳狄乌斯（Claudius）会带着雇佣兵的薪饷到来，我也没有见到他。第三，你给我们的领路人没有带我们走易于迎击敌人的道路，而是带我们走了一条两边都是悬崖峭壁的险路。在这里，因为我和骑兵、马车以及军队的全部辎重一起行军，一旦敌人突然发起攻击，我的军队可能会全军覆没。㊟

事实上，正如我们从马尔库斯的叙述里知道的一样，领路人带的路把狄奥多里克的军队直接送到了斯特拉波和色雷斯哥特人眼前与刀剑之下。这不是意外。477—478年的冬天，在芝诺决定通过帮助狄奥多里克取胜来解决他的哥特人问题之前，他已经在和斯特拉波谈判，所以他清楚地知道色雷斯哥特人扎营的地点。478年，芝诺的真实意图不是执行已经达成的协议，而是操纵两个哥特人群体陷入他们自476年以来一直

在避免的对抗。他确实动员了在与狄奥多里克的协议中提到的军队，却没有让他们出战，大概是想等到两个狄奥多里克的军队陷入僵局后，把两边剩下的军事力量扫荡干净。除掉阿玛图斯之后，这位伊苏里亚人皇帝试图通过戏剧性的方式一举歼灭两个哥特人群体，以继续简化政治棋局。

结果，芝诺的狡猾计划被两个新情况破坏了，一个在他控制之外，另一个是他自己造成的。首先，哥特人拒绝战斗。马尔库斯描绘的场景很有戏剧性，狄奥多里克·斯特拉波不得不说服比他年轻的阿马立家族的狄奥多里克认清皇帝背信弃义的嘴脸：

> 他们把你们召集过来，宣称要过来与你并肩作战，（罗马人）没有露面，也不在他们所承诺的（巴尔干山脉）山口与你会合。他们要让你独自面对可耻的毁灭，让你为自己的鲁莽向你背叛的人付出代价。

我真的很怀疑狄奥多里克还需要有人向他指出他被出卖了，因为他已经失去了增援和薪饷，而且还被带上了一条奇怪的路线，正好把他引向斯特拉波。马尔库斯还借斯特拉波之口明确表达了芝诺的真实意图：

> 在维持和平的同时，（罗马人）希望哥特人互相残杀。无论我们哪一方落败，他们都有好处，而且不用费丝毫力气。正如他们所说，无论我们哪一方消灭了另外一方，这都将是卡德摩斯式的胜利，获胜一方会付出惨痛的代价，将伤亡惨重，无力面对罗马人的背叛。

再一次，我怀疑狄奥多里克是否需要提醒才能明白这一点，也怀疑斯特拉波会把卡德摩斯（底比斯城的创始人，数千名龙牙武士自相残杀，最后只剩下5个）的故事作为其论证的关键因素，但是马尔库斯所描述的事件结尾似乎比较真实。在他的笔下，迫使狄奥多里克不去战斗

的是其潘诺尼亚追随者。他们清楚地知道如果发生对抗，己方可能会遭受多大损失，如果他们年轻的领导者试图战斗，他们就要用脚投票（就像他们的一些同胞已经做过的那样）。[注]结果是签订了一个哥特人互不侵犯条约。双方都可以与君士坦丁堡做交易，能捞多少捞多少，但他们之间不会发动战争。

哥特人并不傻，芝诺肯定料到了有可能出现这样的结果，他动员军队，是为了在必要时介入并挽回损失。或者说，军队本来应该这么做，而事实上并没有，因为伊卢斯一怒之下离开了君士坦丁堡，中央军团（和往常一样，这意味着他们的军官）发生骚乱，他们不得不被送回冬季营房。哥特人的问题再一次和君士坦丁堡的事件交织在一起。478年，芝诺似乎过于贪婪，希望运作一个和《教父》相类似的结局，同时消除他权力上的一切阻碍。你应该还记得，在476年芝诺重登王位的过程中，伊卢斯起到了关键作用，但他之所以这么做，只是因为他有皇帝的兄弟作为人质，可以对芝诺施加影响。芝诺是不会长期放着这个问题不管的，至少如果他能解决。按照他惯常的做法，他在477年第一次试图暗杀伊卢斯，结果，这个伊苏里亚人不仅幸存了下来，而且利用这个机会从芝诺那里获得了额外荣誉，包括478年的执政官之位，以此作为他继续参与政权的条件。478年年初，芝诺进行了第二次尝试。伊卢斯又一次幸存下来，但这次事件之后，伊卢斯带着行凶者去了伊苏里亚以协助调查。这次矛盾使得中央军团不再可靠，把哥特人吸引进来的正是这样的事态发展。

一旦这两个狄奥多里克明白了怎么回事，并决定不再打斗（这一过程不过是转瞬之间），其中更年轻的那一位就开始向君士坦丁堡进军。遭人背叛，被人讨厌，而且到现在为止大冒险都没能有所回报（如果前面他所抱怨的哥特人军需官没有出现属实的话，而我认为没有理由怀疑这一点），他的追随者变得越来越难以驯服，年轻的狄奥多里克极其需要成功。他的一些追随者一年前就已经投奔斯特拉波，他们的整体忠诚是基于个人能力，而不是古老的、从未中断的王室传统。478年，对于5年前潘诺尼亚哥特人（完全是不请自来和出于自身考虑的）向南行军所

宣称要提供的支持，东罗马（至少芝诺本人）给出了明确拒绝的回复；每个人都想弄明白该做什么。芝诺在首都附近要面对两个敌对的哥特群体，而且他没有可靠的军队。因为斯特拉波对这件事的愤怒要比他年轻的对手小一些，皇帝决定与他做一笔交易，给他一张空白支票，而斯特拉波也适时地填写了这张支票。他成为帝国的高级将领，黄金和口粮从君士坦丁堡流向他的追随者。

这为芝诺赢得了一些时间，狄奥多里克也冷静下来，但巴尔干地区各省的贫困人口不得不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从他做人质的时候起，狄奥多里克就知道君士坦丁堡的城墙是坚不可摧的，所以他沿着帝国最伟大的古老公路之一厄纳齐雅大道向西缓慢撤退，这条大道长达1 120公里，始建于公元前2世纪，连接了从亚得里亚海到博斯普鲁斯海峡的一系列罗马殖民地。为了让他的追随者对战利品满意，为了发泄他的怒气，为了迫使芝诺向他提出几乎和给斯特拉波的一样的条件，沿途的主要城镇都被洗劫一空，所留下的伤痕在对腓立比和斯托比（Stobi）的考古发现中还可以见到。然后，他决定率领更机动的部队攻入防御森严的战略性港口埃庇丹努斯。479年夏天，他利用诡计将其攻占。马尔库斯告诉我们，在这里，狄奥多里克的计划是观望，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注]

正是在这个城市郊外的一个小据点，他会见了帝国的使节，并表达了他对478年战季的不满。在城墙后面的他非常自信，在把所有的不满都发泄出来之后，他还向这位使节提出了一系列无疑让后者很为难的提议。如果他们之间的所有问题都能得到解决，他愿意将他的非战斗人员安置在芝诺所指定的城市，将他的母亲和妹妹作为人质，并派遣6 000名士兵在皇帝选择的任何地方加入战斗。毫不奇怪，他的第一个想法是：

> 与伊利里亚人的军队和皇帝派遣的任何其他队伍一起，他会消灭所有的色雷斯哥特人，条件是如果他这样做，他将取代斯特拉波成为将军，并且被接受为罗马公民，以罗马人的方式生活。

或者：

> 如果皇帝下令，他愿意前往达尔马提亚，帮助尼波斯（Nepos）复辟。

尤利乌斯·尼波斯是君士坦丁堡的利奥所承认的最后一位西罗马皇帝。作为西罗马在达尔马提亚军队的指挥官，他于474年6月19日在波图斯港口（Portus，罗马的两个港口之一，沿着台伯河再向下就是大海）登陆，推翻觊觎皇位者格利凯里乌斯（Glycerius），在同一天取而代之，被宣布为皇帝，几天后又在罗马称帝。后来，他又被意大利军队指挥官欧瑞斯特（Orestes）推翻，欧瑞斯特的儿子罗慕路斯，也就是奥古斯都路斯，被普遍认为是西罗马最后一位皇帝。476年，奥多亚塞将其废黜，并将其皇帝行头送到了君士坦丁堡。

因此，帮助尼波斯复辟意味着需要进军意大利和罗马。(注)狄奥多里克在479年提出这个提议时究竟有多认真还很难说。我想他更希望的是建立某种新的联盟来对抗斯特拉波。但事实证明，他的提议是有预见性的：10年之内，狄奥多里克的车队将从巴尔干半岛向北行进，但其目的不是回到潘诺尼亚，而是要去意大利。479年夏末，狄奥多里克结束他和芝诺使节之间的会晤时，还预见不到导致这一结果出现的局面。

拉韦纳

相对于狄奥多里克从辛吉度努姆到埃庇丹努斯的历史，要想了解他从埃庇丹努斯到拉韦纳的历史更加困难，因为从马尔库斯非常详细的历史作品中，我们已经找不到什么资料可用了，很可能是因为这部历史作品到此就结束了。其他史料中概述这段历史的内容很多，尤其是因为马尔库斯的历史作品为了解长期的谈判立场、竞争态势和动机提供了很多洞见。就像我们马上会看到的那样，对于解释上的一个重大问题，现有

的材料依然持一种开放或者半开放的态度，但我想这已经不错了，毕竟这些事件发生在1 500多年以前。

到了479年的秋天，事情已经陷入僵局。芝诺和色雷斯哥特人达成了一项对后者非常有利的协议，因为他别无选择，而狄奥多里克夺取了一个战略要地。狄奥多里克不知道的是，在他和芝诺的使节讨论事宜时，他向埃庇丹努斯缓慢移动的辎重车队中了埋伏，导致2 000辆马车和大量的战利品被缴获，还有5 000人被俘。这次成功足以使芝诺认为，相对于阿马立家族的兵力，他还可以获得足够的军事优势，在持久解决方案的条件上说了算，甚至还可能让哥特人从罗马土地上撤出去。遗憾的是，车队和俘虏们究竟经历了什么，我们不得而知，也不知道狄奥多里克听说这一损失后做了什么。他马上可以做的也许并不多，但是随着君士坦丁堡政治肥皂剧的曲折发展，这种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主动权的局面将被逆转。

虽然芝诺和斯特拉波做成了交易，但一个无法掩盖的事实是，他们无法信任彼此，理由很简单：他们的长期利益是截然对立的。因此，479年，当一个针对芝诺的新阴谋展开时，斯特拉波选择提供支持。某位年轻王室成员往往是这种阴谋的核心，这一次是一个名叫马尔西安（Marcian）的人，他是利奥之前的东罗马皇帝马尔西安的外孙。小马尔西安娶了利奥的小女儿莱昂蒂亚（Leontia），因此他和芝诺是连襟。阴谋开始实施后，斯特拉波迅速向君士坦丁堡前进，以色雷斯哥特人的力量来支持政变，但是政变很快就被镇压，让斯特拉波陷入难堪的境地。当芝诺的使节质问他时，他声称是前来救助芝诺的。你不得不佩服斯特拉波的胆量，但是没有人相信他，478年达成的协议很快就瓦解了。在480年的战季，芝诺从边境之外雇了一些保加尔人（Bulgar），让斯特拉波无暇他顾，但是从481年开始，斯特拉波已经可以自由行动，大概是因为芝诺的可用部队大部分在巴尔干西部对付另一个狄奥多里克——其根据地依然位于埃庇丹努斯。

斯特拉波做出了大胆且不可挽回的举动。他动员所有的队伍，再次

向君士坦丁堡进军，这一次他决定对其发起猛攻。第一次攻击集中于城市的几个大门，但是被伊卢斯队伍击退了。狄奥多西城墙再一次证明了自己的价值。随后，斯特拉波从金角湾另一边的锡卡（Sycae）重新发起进攻，但仍然一无所获。最后，他转移到博斯普鲁斯海峡旁边的港口小城赫斯提亚（Hestiae）和索斯塞尼乌姆（Sosthenium），试图将他的军队转移到小亚细亚，但帝国的海军挫败了他的这一企图。

正如这最后的行动所表明的，斯特拉波此时完全放弃了与芝诺达成协议的想法。自从上次政变失败后，他一直在庇护马尔西安的两个兄弟，他很可能在计划让他们中的一个登上皇位。事实上，他是否真的认为自己能完全征服这座城市，这是值得怀疑的。马尔库斯强调了斯特拉波与朝廷重要人物的密切联系，毕竟，他在连续两代皇帝的军队中都是不可或缺的军事领导者。我觉得，这个计划可能是靠哥特人的推进在内部引发一场重大政变。政变失败后转到小亚细亚，肯定不是为了从另一个（更困难的）方向发起进攻，而是要在帝国东部的心脏地带激起对芝诺更广泛的反抗，将他孤立起来并最终推翻。

然而，芝诺拥有伊卢斯的队伍来保障君士坦丁堡的安全，又有帝国的海军来挫败斯特拉波的宏伟计划，这位哥特人领袖不知下一步该怎么做了。最终，他决定沿着厄纳齐雅大道向西转移他的队伍，也许他希望制订一个新计划，将仍然躲藏在大道另一端的那位狄奥多里克吸纳进来。这个计划究竟是什么我们并不清楚，因为这时发生了历史上的一大意外事件：“一天清晨，他骑上马背时被马甩了下来，正好落在一根立在帐篷旁边的长矛上。”狄奥多里克·斯特拉波就这样退出了历史舞台。

约达尼斯对此的记述反映了阿马立家族的宣传，他只用一句话就把斯特拉波打发了，言外之意是他并非阿马立家族的一员，因此微不足道。实际情况显然不是这样。从475年到478年，就在阿马立家族的狄奥多里克可能因为缺乏经验而忙着和芝诺签署一个又一个可疑的协议时（这位皇帝如果做二手车销售，一定会非常成功），斯特拉波却保持冷静，把眼光放长远，成功地将对手的一些支持者吸引到自己这边。如果

运气稍微好一点，在两个狄奥多里克的冲突中胜出的很有可能就是斯特拉波，因为就像我们在第3章将会看到的那样，无论是前期还是后来，这些哥特人都愿意接受阿马立家族之外的领导者，只要他有能力。当然，这注定不会发生了，斯特拉波的英年早逝给阿马立家族的冒险者狄奥多里克提供了全新的机遇。[注]

最初，斯特拉波的儿子雷西塔克（Recitach）继承了色雷斯哥特人的王位，与斯特拉波的两个兄弟联合执政。这种权力分享的安排与阿马立家族的狄奥多里克的上一代人非常相似，而且与后者相同的是，这个安排所依据的协议也瓦解了，而且瓦解的速度更快，过程也更龌龊。很快，雷西塔克就将两个联合执政者杀害，成为唯一的掌权者。这再次表明，在位高权重的家族，家庭关系有不同的运作方式，在这样的家族中，亲属既是潜在的盟友，又是潜在的竞争对手。这显然是在考验那些关键二级领导者的忠诚，而任何统治都有赖于他们的选择。好的，雷西塔克是斯特拉波的儿子，斯特拉波是一流的领导者，但是雷西塔克有这样的能力吗？

很快，外部事件就联合起来表明答案是否定的。481年，斯特拉波之所以有可能发动那场伟大但最终失败的战争，仅仅是因为帝国的军团不在君士坦丁堡附近。芝诺的应对方式是撤回在西方对抗狄奥多里克的军队，这反过来意味着他在与潘诺尼亚哥特人打交道时，不得不从军事手段转向外交手段。狄奥多里克从芝诺那里索取了一大笔好处，他的辩论热情无疑是被这位皇帝之前的背叛激发出来的。根据482—483年的一项新协议，他的军队被重新安置在东巴尔干、滨河达西亚（Dacia Ripensis）和下默西亚（Lower Moesia），而狄奥多里克本人被任命为帝国高级将领，这意味着他的队伍将获得更高的报酬。经过10年断断续续的转移和战斗，这场豪赌终于有了回报。

此外，狄奥多里克还被任命为484年的指定执政官（consul designate），这一任命是在483年宣布的。在帝国历史的这一时期，执政官之位并不是一个职务，而是帝国所能赋予的最高荣誉，这是一种不

朽，因为罗马人会以当年执政官的名字为那一年命名，通常只有皇帝和他们最亲密的伙伴才能拥有这样的资格。他在政治上的显赫地位得自他麾下有一支非罗马军队，还没有这种人得到这样荣誉的先例。很明显，芝诺不得不用一些完全超出常规的东西来弥补他在478年对狄奥多里克的背叛。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现在，局面对阿马立家族的狄奥多里克非常有利，而他是不会浪费这样的机会的。在483年年末或484年年初，但肯定是在对狄奥多里克有利的协议生效之后，在君士坦丁堡一个名叫波诺法提亚纳（Bonophatianae）的地区，雷西塔克在从浴场到宴会的路上被狄奥多里克派人谋杀了。

就是在这里，我们的史料出现了一个关键性的缺口。我们无从得知色雷斯哥特人中的大部分二级领导人接下来做了什么。少数人什么也没做。东罗马军队里一些下一代高级军官被称为没有追随狄奥多里克去意大利的哥特人。而在这一时期，色雷斯哥特人联盟完全从东罗马的历史上消失了，这绝不仅仅是默证那么简单。例如，在针对芝诺的下一代继任者阿纳斯塔修斯的大反叛中，巴尔干军队是主要的焦点，留存下来的史料对此有详细的记录。5世纪70年代，色雷斯哥特人曾起到重要作用，而现在，作为有凝聚力群体的他们已经无迹可寻。在离开巴尔干地区时，狄奥多里克带走的人马显然远多于他带来的一万多名武士，最可靠的统计是两万多，当时被看好的是谁，毫无疑问了。雷西塔克被除掉之后，色雷斯哥特人中的大部分二级领导者转而效忠狄奥多里克，逆转了477—478年一些阿马立家族追随者叛离的趋势。（事实上，在波诺法提亚纳暗杀之前，这些可能都已经精心谈判好了。）484年年初，狄奥多里克志得意满。执政官之位保证了他的不朽地位，他为其追随者获得了大量的现金流，还消灭了另一个敌对的哥特家族。[注]

根据我们的史料，芝诺不仅参与了这个计划，而且推动了它。对他来说，收获是双重的。一方面，它极大地简化了政治舞台。曾经，他要面对两个哥特人领导者，其中一个总是不受欢迎并因此充满敌意，而现在他只需要面对一个。另一方面，这个计划使他将目光投向了一个更大的目标。最让芝诺头疼的实际上是伊卢斯。在关键时刻，伊卢斯保住了

他的宝座，将伊苏里亚军队带到首都，既镇压了479年的马尔西安的政变，又于480年在城墙前与斯特拉波的哥特人作战。但伊卢斯手里也有芝诺的兄弟作为人质，这使他有了让人无法接受的影响力，芝诺一直在寻找机会消灭他。到了481年，他已经是第三次试图暗杀伊卢斯，这对伊卢斯没有造成什么伤害，而芝诺却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后来，为了恢复良好关系，皇帝不得不在帝国最富饶的东部地区或多或少地给了他一些自由决定权。伊卢斯在帝国的第二大城市安条克（Antioch）建立了根据地，并在那里实行几乎独立的统治。从长远来看，这不是芝诺能忍受的，他通过将狄奥多里克提拔到这样的高度来解决哥特问题，从而为最后的摊牌做了准备。现在，他可以把所有的兵力（包括狄奥多里克手下的大量哥特人）都集中起来对付他的伊苏里亚对手了。因此，在雷西塔克被消灭的同时，芝诺与伊卢斯决裂，名义上撤下了他的官职，开始了一场实力的较量。或许是狄奥多里克的哥特人队伍打破了军事上的平衡，这场较量很快就结束了。双方调动了一切力量，而当两军于484年9月在安条克附近相遇时，伊卢斯被彻底击败了。他逃到了伊苏里亚的山上堡垒，就像芝诺在475年所做的那样，伊卢斯的堡垒同样难以攻克。他苦心策划了4年，但最终还是没能回到君士坦丁堡。最后，堡垒遭到出卖，伊卢斯被抓获并处死，但其实早在484年秋天，伊卢斯的势力就已经从君士坦丁堡的政治中彻底消失了。㊟

还有两个难题没有解决。皇室成员已经被稳步消灭：老皇帝利奥姻亲中所有可能的皇位觊觎者都已经采取行动，也付出了代价。芝诺主要的伊苏里亚人对手已经被消灭，而色雷斯哥特人也失去了作为独立政治力量的凝聚力。484年年末，芝诺唯一的心头大患就是阿马立家族的狄奥多里克，他身兼执政官和帝国将军，最重要的是，他是一支独立军队的指挥官，现在军队的人数已超过两万，主要效忠于他而非皇帝。鉴于芝诺在容忍政治多元化方面的过往记录，这种局面不太可能会持续很久。尽管狄奥多里克本人不是东罗马皇位的有力竞争者（他甚至比阿斯帕更不像局内人），但他有可能会支持其他的皇位觊觎者。最后的清算不久就会到来。甚至在和伊卢斯作战期间，就有了流言蜚语，狄奥多里

克因而返回君士坦丁堡，不过他派遣的军队仍在继续战斗。然而，一旦确保伊卢斯已被遏制，军队返回，狄奥多里克就在485年发起了公开叛乱。

据说发动叛乱时，狄奥多里克想到了阿玛图斯的命运，后者在476年被芝诺封为将军，但很快遭到暗杀。这是说得通的，但狄奥多里克可能也一直在思考巴西利斯库斯或伊卢斯的命运。当涉及分享权力或做出承诺时，芝诺是不可信任的，当然，在芝诺眼中，狄奥多里克同样不可信任。487年，事情已经到了终局。狄奥多里克向君士坦丁堡进发，给城墙外的一些富裕郊区造成了相当大的破坏，但更重要的是，这次行动切断了部分引水道。当年他在这座城市做人质时，就知道它的50万居民是多么依赖色雷斯山上收集的雨水，但狄奥多里克并不想真正占领这座城市。与六年前的斯特拉波不同的是，他似乎也没有想过要做皇位候选人。他的目的是迫使芝诺以双方都能信任的方式最终解决对彼此的不满。然而，这就是问题所在。在过去的十多年里，芝诺一直在抵抗过于强大的下属的影响，而狄奥多里克就是这样一个人，尤其是在大部分色雷斯哥特人加入他的追随者队伍之后。

对于此后城外进行的谈判，没有留下详细的描述，我们甚至也不知道谈判花了多长时间。但最终（也许很快）双方都认识到不可能真正共存，于是达成这样的共识：哥特人去意大利是解决他们问题的理想办法。后来，正如你可能会料到的那样，来自意大利狄奥多里克朝廷的史料强调了他在此过程中的主动性，忽略了芝诺。尽管如此，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史料一定是错的，即使君士坦丁堡一方持完全相反的观点。早在479年，在埃庇丹努斯城外的那次会议上，狄奥多里克的注意力就转向了意大利。无论他当时的想法有多认真，从那以后，这个想法都一直在他的脑海中酝酿着。不管采取主动的是谁，双方都很快接受了这项提议。在长达一年的休整之后（这再次突出了这类行动所带来的后勤上的困难），488年秋天，哥特人的马车队从东罗马巴尔干半岛的西北部隆隆驶出：他们的目光坚定地盯着意大利富饶的新土地。(注)

其他人有不同的想法。哥特人还没到达意大利边境，就不得不与格皮德人大战一场，与萨尔马提亚人也进行了一系列小规模战斗。当然，意大利也不会张开双臂欢迎他们。从476年开始，意大利就被奥多亚塞统治着，他并不打算辞职，即使狄奥多里克会让他辞职。格皮德人与萨尔马提亚人企图在途中削弱狄奥多里克的意志和力量，可能也是因为得到了奥多亚塞的好处。但狄奥多里克还是克服了这些障碍，亲自率军强行渡过了今天的武卡河（Vuka，靠近1991年那场可怕屠杀的发生地），经过维帕瓦河谷把他的车队及时带到了意大利，该河谷位于通过尤利安阿尔卑斯山脉的主要路线上，连接着弗留利低地（Friulian lowlands）和今天的斯洛文尼亚中部。在庞斯伊松提（Pons Isontii），奥多亚塞的军队正等着他们，但是在经历了489年8月28日的惨败之后，他的军队被驱赶到意大利本土。9月30日，狄奥多里克在维罗纳附近再次击败了他，似乎这已经够了。奥多亚塞逃到了拉韦纳，在5世纪时这里先成为西罗马的都城，在西罗马灭亡后依然作为都城，因为沼泽使它很难被攻破，其港口也很难围攻。

事实上，事情有一些波折。奥多亚塞手下一位名叫图法（Tufa）的将军先是投奔狄奥多里克的阵营，但后来又在489年结束之前再次改变阵营。同样，一支鲁吉人队伍487年在他们位于今奥地利的王国被奥多亚塞毁灭之后，投奔狄奥多里克；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他们又被奥多亚塞的承诺吸引，转而效忠于他。在489—490年的冬季，狄奥多里克本人被迫躲进了一个坚固的堡垒，即帕维亚城。但在490年8月11日，在从洛迪（Lodi）到克雷莫纳（Cremona）的道路穿过阿达河（Adda）的地方，狄奥多里克赢得了第三场大捷。在接下来的两年里，他收紧了套在奥多亚塞脖子上的绞索。图法的部队被消灭了，鲁吉人也回归了。492年8月，狄奥多里克开始从附近的里米尼对拉韦纳实施海上封锁。事情拖了很久，因为拉韦纳很难被攻占，直到493年2月25日谈判终于开始。3月5日，在同意分享权力后，狄奥多里克进入了这座城市。但是狄奥多里克在君士坦丁堡及其周围度过的日子没有白费。10天后，在一个宴会上：

狄奥多里克本人冲上前去，一剑击中奥多亚塞的锁骨……致命的一击把他劈为两半，一直切到腰部。据说狄奥多里克惊呼道："显然，这个可怜的家伙身上一根骨头也没有。"

就在同一天，奥多亚塞的主要支持者及其家人被集中起来屠杀。20年前开始的谋划终于得到了回报。[注]经过几千公里的长途跋涉，经历了一系列的小战役和几场大战之后，狄奥多里克成了意大利的统治者。哥特人的统一是他通过谋略最终实现的。但狄奥多里克在君士坦丁堡学到的远不只是如何恶意达成协议。有了意大利的资源可以支配，这位还不到40岁的新国王开始了更加宏伟的规划，甚至比他之前所做的还要野心勃勃。复辟西罗马的第一次尝试就此拉开了序幕。

---

1. 卡西奥多罗斯《信札》(Cassiodorus，Variae) 1.1，Hodgkin译（1886），141—142。对于希腊化时期的王权观及其在罗马时代晚期（几乎没有）经过基督教化的延续，最好的导论是Dvornik (1966)，MacCormack (1981) 探讨了这种王权观念在帝国仪式中的表现。
2. 《哥特史》52.271。
3. 紫袍家族，见《信札》 4.1; 9.1; 10.1—4等。《信札》9.25历数了各代人。《哥特史》14.79—81列出了更详细的阿马立家族世系表。
4. 约达尼斯在《哥特史》前言2—3提到自己使用了卡西奥多罗斯的《哥特人史》。Momigliano (1955) 有一个著名论点，即约达尼斯为掩盖自己和卡西奥多罗斯的密切关系而说了谎；Goffart (1988)则持相反观点。两种观点都有其他支持者。我在Heather (1991)，c. 2 (1993)中详细说明了自己的观点。卡西奥多罗斯信件中与该争论特别相关的是《信札》9.24—25。
5. 色雷斯哥特人在接下来发生的事中起了很大作用。匈人统治下的哥特人，见Priscus fr. 49。克里米亚和亚速海岸的哥特人，见普罗柯比《战史》8. 4.9 ff.;《论建筑》 3.7.13。
6. 《哥特史》48.246—252，在Heather (1989)中有详细阐述。
7. 每年给瓦拉米尔的300磅黄金，见Priscus fr. 37。4世纪哥特人主导的切尔尼亚科夫（Cernjachov）文化中的可见财富与匈人时代的黄金反差惊人。例如，比较Heather (1996)第三章与Bierbrauer (1980)或Bona (1991)。Heather (2009)第五章较详细地讨论了匈人帝国起落的宏观影响，也完整列出了当前的学术成果。
8. 对汪达尔人和西哥特人的更详细讨论及完整的参考文献，见Heather (2009)，c.4。克

洛维，见图尔的格雷戈里《法兰克人史》2.40—42。

9. 关于城市建造的政治，见Dagron (1974)，参考Heather and Moncur (2001)，书中涉及元老院的建立及元老院在其后的政治作用。Grig and Kelly (2012)中有额外的贡献。

10. 他的尸体一直没有找到，因此产生了许多浪漫传说，包括他成了“大理石皇帝”，像亚瑟王一样的传奇人物，会将君士坦丁堡从土耳其人手中夺回：详见Nicol (1992)。

11. Alföldi (1974); Mocsy (1974); Lengyel and Radan (1980)仍是最好的导论，尽管在那之后又有了许多新进展；例见Christie (1996); Whitby (2000)。

12. Croke (2005) 启发我构想少年狄奥多里克的进城过程。对于与这座城市相关的考古研究发展，最好（也极为简明）的指南还是Mango (1985)，书中有全面的参考文献。

13. Puzo (1969), 16.

14. 关于罗莎蒙德，见Paul the Deacon, History of the Lombards 4.28。关于在送狄奥多里克去君士坦丁堡一事上的分歧，见《哥特史》52.271。

15. Braund (1984), esp. 9–31.

16. 关于利奥、阿斯帕和伊苏里亚人，见Brooks (1893); Thompson (1946); Scott(1976); Stein (1949), c. 10, (1950), c. 1等。

17. 《哥特史》55.282 ff.；关于狄奥多西战胜萨尔马提亚人的文献，可参照《晚期罗马帝国人物志》（PLRE）1, 905。

18. 《哥特史》53.276；关于后阿提拉时代的余波，详细讨论参见Heather (2009),246及以下。

19. 报酬，见Malchus fr. 2。根据Theophanes AM 5931，至少有一部分色雷斯哥特人从5世纪20年代开始住在帝国的领土上。该文本不是完全没问题，但可以与一系列其他证据互证，这些证据（狄奥多里克·斯特拉波与阿斯帕的姻亲关系，这些哥特人为君士坦丁堡提供卫戍部队，等等）突出表明，到5世纪70年代，他们已与君士坦丁堡的政治有了很深的关联。更多细节见Heather(1991), 251–263。

20. 对于与古代晚期的罗马人所谓的“蛮族”身份有关的争论，我的观点详见Heather（2008），其中列出了较完整的参考文献。不同的观点可参考Gillett（2002）中的各篇论文和Halsall（2007）, c. 2；关于这一时期各种身份概念之间的知识联系，以及大规模的迁徙是否确有其事，见Heather（2009）, cc. 1 and11。关于潘诺尼亚哥特人倾向于务农的关键证据，见Malchus fr. 18.3, p. 430.5 ff.; fr. 20, p. 438.55 ff.; fr. 20, p. 446.199 ff.，进一步的探讨见Heather（1991）, 242 ff.。所有后来援引马尔库斯的历史残篇的内容都参考了Blockley（1983）的译文。

21. 关于车队，见Malchus fr. 20, p. 448, l. 245; 可参考Heather（2009）, 28 ff.，其中列出了与迁徙习惯相关的完整参考文献。

22. 抽签，见《哥特史》 56.283。维迪米尔的儿子维迪米尔在高卢可能收到两封来自利

摩日主教鲁利修斯（Bishop Ruricius of Limoges）的信，见Epp. 2.61 and 63: trans. Mathisen（1999）。

23. 向塞萨洛尼卡的进军，见《哥特史》 56.287。离开塞萨洛尼卡，前往意大利，见《哥特史》 57.289 ff.。

24. 关于一次只能向一个群体付款的原则，见Malchus fr. 15, p. 420, ll. 10 ff.。

25. 优卑亚，见《哥特史》56.285—7。斯特拉波与利奥的条约的文本，见Malchusfr. 2. p. 408. ll. 22 ff.。在10世纪之前，马尔库斯历史著作中的大量语录得以保存。关于拜占庭皇帝“生于紫室者”君士坦丁七世，见Blockley（1981），c. 4。Brooks（1893）仍然是对君士坦丁堡宫廷政治的优秀导论，不过应该注意的是，他倾向于把所有的伊苏里亚人都看作天然的盟友，然而证据很明显，当时有不同的群体，群体也各自有潜在的内部竞争。

26. 对新兴的伊苏里亚考古的介绍，见Foss（1990）; Mitchell（1993）; Hill（1996）。

27. 对巴西利斯库斯的兴衰的详细讲述，见Brooks（1893）； Heather（1991）， 272–278; Stein（1950）, c. 1。

28. 关于阿玛图斯及其灭亡的信息，见《晚期罗马帝国人物志》2, 148。关于斯特拉波的1.3万人马，见Malchus fr. 18.4。阿马立家族的狄奥多里克曾在皇帝需要时主动请缨，率领他的6 000“精锐人马”出征，把非战斗人口安置在迪尔拉奇乌姆城（Malchus fr. 20, p. 446.215 ff.），而守卫这座城市还需要2 000人（Malchus fr. 20, p. 440.83 ff.）。在这样的时候，他是不敢冒险的，因此他的士兵应该也是1万名左右。关于换边站，见Malchus fr. 18. 1。

29. Malchus fr. 18.2.

30. Malchus fr. 20, p. 444.175 ff.

31. Malchus fr. 18.2, p. 428.30 ff.

32. Malchus frr. 18.3–4, 20. 考古调查已经发现了这些哥特人攻击的一些证据：Pallas（1977）; Wiseman（1984），有参考文献。

33. Malchus fr. 20, p. 446.212 ff.

34. Malchus fr. 20, p. 446.226 ff.

35. 479年年末马尔西安试图发动的政变是马尔库斯（fr. 22）讲述的最后一个事件。从480年开始，我们的主要史料来源是安条克的约翰遗留下来的残篇，其译文见Gordon（1966）。关于斯特拉波之死，见John of Antioch fr. 211.5和其他史料，如《晚期罗马帝国人物志》2, 1076。

36. 关于雷西塔克杀害两个叔叔，见John of Antioch fr. 211.5。雷西塔克本人之死，见John of Antioch fr. 214.3。关于大多数色雷斯哥特人可能会改变效忠的充分探讨，见Heather（1991）, 301 ff.。

37. 典型的生动描述，见Brooks（1893）。

38. 秋天，收获已毕，但是草还在生长，是采取这类行动的好时机。关于他的叛乱和对君士坦丁堡的行动，见John of Antioch fr. 214.4 ff.。

39. 引文出自John of Antioch fr. 214a。关于对意大利征服的第二手讲述，见Wolfram（1988）, 278 ff.; Moorhead（1992）, c. 1。

第2章

紫袍哲学家

我们在前面看到，狄奥多里克是一位极其精明的冒险家，可以在谈笑间把对手一劈两半，然而，狄奥多里克统治意大利时的公认形象完全是另一种样子。他死后不久，他晚年的主要大臣之一卡西奥多罗斯对他做出了以下描述：

> 当他把国事暂放一边时，会通过与你谈话来了解古代先贤的想法，以便通过实际行动效法他们。这位思维敏锐的求知者十分好学，探询星星的轨迹、海洋的流向、涌泉的奇迹。他对万物的勤奋研究似乎让他成了一个穿着紫袍的哲学家。(注)

与其说他是一个残暴的军阀，不如说他是一位探寻大自然最深奥真理的智者：《信札》（*Variae*）中很多存世的信件都强化了这个形象，而这段话就来自其中之一。这些书信意在表现他是怎样进行统治的。这些信件是用无可挑剔但稍有些奇怪的晚期罗马拉丁文写成的，从中可以看到狄奥多里克忙着铲除腐败，伸张正义，修筑城墙和引水渠，甚至支持作为古典文化支柱的教育，并经常顺便进行一些古典的说教。外交事务也体现出他对于智慧的重视。在这方面，他的做法广为人知，那就是让在他势力范围内的主要王国之间建立一系列婚姻同盟，这些主要王国包括西哥特人、勃艮第人、汪达尔人和法兰克人的王国，此外还有一些小王国，后来，西哥特人和法兰克人在505年前后爆发了一场大冲突，他努力维持和平。

然而，如果看到表面之下的本质，那么，一个是曾经在长达15年的时间里让君士坦丁堡疲于应付的凶暴之人，一个是统治意大利的紫袍哲学家，这两种形象之间的反差就会很快消失。

卡西奥多罗斯

历史上每一位被载入史册的开明君王背后，都有至少一名出色的政治化妆师，狄奥多里克也不例外。卡西奥多罗斯不仅写了一部涉及国王年轻时事迹的《哥特人史》（我们在上一章就探讨了这部分内容，所依据的是约达尼斯重新加工的版本），还作为意大利哥特国王的高级官员写作并收集了他那个时代的很多官方信函，结集为《信札》。《信札》里有468件信函、敕令和书信模版（formulae），分散在12卷中，这些史料树立了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个智慧且热爱和平的狄奥多里克形象：这位高尚的哲学家想要让西罗马团结起来，防止它堕入野蛮和暴力。这也是一份需要十分谨慎对待的史料。

尽管乍一看它不像政治自传，但实际上它是一部特殊的政治自传（无论是通俗意义上的，还是这个词语最初意义上的）。这些信件中有很多是以意大利王国不同哥特统治者之名写的，大多是写给狄奥多里克本人的，但是在526年狄奥多里克去世到538年或539年卡西奥多罗斯最终离开政坛的这段时间里，也有不少是写给其继承人的。但卡西奥多罗斯在两篇前言中向读者保证，原始的信件确实是他起草的，并且《信札》中的信件也是他挑选并排序的。换句话说，《信札》其实并没有包括卡西奥多罗斯为他效忠的每一位哥特统治者所写的每一封信，所收录的信件是经过精心挑选的。

问题就出在这里。政治自传可以说是所有文体中最靠不住的一种。它结合了自吹自擂和自我辩解，在历史学家看来它基本不可靠。卡西奥多罗斯的作品也不例外，尽管他在前言里写下了常见的瞎话，说自己是在朋友们的劝说下，为了公众的利益才承担这项工作的。在这部《信

札》中，自吹自擂的成分十分突出，尤其体现在本章开头的引文中。这段话摘自卡西奥多罗斯为宣布自己被任命为高级官员而写的一封信。换句话说，卡西奥多罗斯就是那个彻夜与狄奥多里克交谈，向他讲授从哲学至天文的一切知识的人。这完全是一派胡言。对于早期历史的评论家来说，这一形象是很有吸引力的，他们从哥特野蛮人对古典文化的渴望中找到了一些安慰，但是对狄奥多里克的统治来说，卡西奥多罗斯显然并没有那么重要，至少在其晚年之前都不重要。在493年早春把奥多亚塞劈为两半之后，狄奥多里克统治了意大利王国33年之久，直到他于526年8月30日逝世。在他统治期内，卡西奥多罗斯在507年至511年之间担任财务官，又在524年到皇帝去世期间担任最高级的文职职位——近卫军长官（praetorian prefect，首席财政和司法官员）。也就是说，在狄奥多里克统治的大部分时间里，卡西奥多罗斯没有任何职位，尤其是在他统治的前十年里，而狄奥多里克统治的大政方针是在这一期间确定的。即使从511年到524年卡西奥多罗斯并没有在他的庄园虚度时光，除了他之外，我们依然可以令人信服地在狄奥多里克的朝廷上找到许多其他的罗马人顾问，其中有些对古典文化的了解即使不比卡西奥多罗斯更多，也至少和他一样多。只有在狄奥多里克33年统治的最后两年里，卡西奥多罗斯为我们描绘的关于二人关系的画面才看上去有些可信。(注)

更重要的是，在卡西奥多罗斯创作《信札》的时候，他还是一个有很多问题要解释的人。那时，面对志在全面征服的东罗马大军，这个哥特王国走向了灭亡（这有时被人称作“再征服”，但君士坦丁堡以前从未统治过，甚至也从未试图统治意大利）。这场战争开始于536年，尽管《信札》最后几封信的确切日期不可能确定，但它们肯定写于538年年末甚至是539年的盛暑，此时不祥之兆已经显现出来。东罗马的军队完全掌握了战略主动权，正迅速向卡西奥多罗斯和他效力的最后一位哥特统治者维提吉斯（Wittigis）逼近，他们躲在王国的最后堡垒拉韦纳。因此，卡西奥多罗斯是在失败已经不可避免的时候创作了这部作品。作为哥特政权的首席财务官，他本人至少在三个战季里帮助抵抗东罗马的军队。他的工作包括提供军粮和军饷，从这些信件可以看出，随着哥特

政权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在不得不做出令人不快的政策决定时，他很可能曾参与其中，尤其是在处决一些元老院人质时。在539年至540年之间，如果胜利的东罗马士兵会玩印有他们主要对手头像的扑克牌，那么卡西奥多罗斯的头像一定会在上面。因此，当拉韦纳在540年夏天沦陷时，他被押送到了君士坦丁堡。对于卡西奥多罗斯来说，《信札》要完成一个极其重要的使命：它必须向意大利那些来自东罗马的新统治者证明，他为什么会在他们已经来到意大利的情况下还继续为哥特国王服务。

有了这样的动机，歪曲历史的可能性就很大了。身为富裕的意大利地主，卡西奥多罗斯可能会失去很多，在最糟的情况下甚至可能失去生命。对我们来说幸运的是，在6世纪30年代末，他的策略与这些信件最初起草时的狄奥多里克十分一致，这一点已被其他史料所证实。对于继续为哥特国王服务这件事，卡西奥多罗斯自我辩解的中心论点是，这样做是正确的，因为从根本上讲，他一直全心全意服务的哥特政权无论是在本质上还是在实践中都是“罗马的”。如果上帝凭借无限的智慧，最终决定了要让君士坦丁堡胜利，那么凡人是无法对其提出质疑的，但就像《信札》中所暗示的那样，不能因此就责备卡西奥多罗斯本人，因为他始终都只是一个好罗马人，完全按照一个好罗马公仆的标准行事。因此，在王国倾覆时，卡西奥多罗斯的需要与国王在其权力鼎盛时期的宣传相呼应，都是要从根本上把狄奥多里克的哥特王国塑造成一个罗马政权，因此卡西奥多罗斯几乎不需要改变书信的内容。(注)

先是狄奥多里克本人，后来是卡西奥多罗斯，他们都宣称意大利的哥特政权实际上是“罗马的”，而很明显，狄奥多里克所属的阿马立家族不久前来自旧帝国边境之外。要想理解为什么会这样，就有必要研究一下“罗马性”（Romanness）是如何被理解的，这个概念并非存在于真空中。自我定义时，往往需要另一方来展示自己所宣称的品质的对立面，对罗马人来说，另一方就是“蛮族”。晚期罗马帝国的意识形态确定了一些互有关联的特征，用于区分罗马人和蛮族。一个中心论点是，罗马帝国（或者至少是其精英阶层）的人比其他人更理性，因为他们在传统上

接受的是古典文学的教育。理性被定义为个人运用智力控制身体激情的能力。沉浸在古典文学中，个人会接触到大量好坏行为的例子，如果适当地加以消化，身体就能得到控制。相比之下，蛮族人则受制于激情，完全无法走上理智的道路，尤其容易沉溺于肉体欲望的满足。就整个社会而言，个体成员更加理性意味着罗马人也愿意让即时的满足服从于成文法的规定，而这才是一个有序社会的保证。因此，对于罗马人来说，帝国社会的压倒性优势体现为受制于成文法律。在帝国后期，这种优势被概括为civilitas（大致可以理解为“文明”）一词。

基督教则使这种优越感有了另一个维度。希腊罗马的自然哲学认为，宇宙有一个基本秩序，其结构自始至终反映的是神圣的组织原则，这种原则从原始的混沌中塑造了宇宙。因此，从毕达哥拉斯和托勒密以降的观点来看，从地球到行星的距离反映了和谐的比率，严格合乎比例。深受异教皇帝的影响，基督教的罗马帝国宣称这种宇宙秩序具有政治上的意义。若不是神的命令，地上的君王就不可能掌权。这一观点被进一步发展，用来支撑这样一个主张：罗马帝国是神圣力量的特殊工具，其目的是完善人类。因此，该撒利亚主教优西比乌（Eusebius of Caesarea）认为，基督诞生于奥古斯都统治时期并非偶然。基督教的创始人和罗马帝国的缔造者出现在同一时期，这是神圣计划的一部分。更普遍地说，基督教皇帝擅自宣称自己为基督在世间的代理人。帝国的仪式呼应了上天的威严，基督教的神圣灵晕笼罩着皇帝和他的官员。因此，适当的古典教育能使个人认识到罗马生活方式的好处，以及它在神圣计划中的历史重要性。注

狄奥多里克政权充分利用了这种“罗马精神”，尤其是宣称这一政权是神启示的世界秩序的一部分。在本书第1章开头他给阿纳斯塔修斯的信中，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一核心思想，在《信札》的其他许多地方也能找到。幸运的是，有大量的外部证据表明，这种自我呈现是狄奥多里克自己的，而不是卡西奥多罗斯在拉韦纳面对越发收紧的东罗马的绞索，在绝望中做出的某种建构。最重要的是，拉韦纳有圣阿波利纳雷诺沃教堂（St Apollinare Nuovo）的镶嵌壁画，最初描绘的是威严地坐在宝座

上的狄奥多里克，在他新建的宫殿里被朝臣环绕。他对面是“万有主宰基督”（Christ Pantocrator）和天堂的威严。画面表现的是，更大的权威（天堂）直接支持较小的权威（狄奥多里克）。他在意大利的宫殿（拉韦纳的宫殿最广为人知，另外两座分别在帕维亚和维罗纳）似乎模仿了君士坦丁堡皇宫的建筑风格。当然，狄奥多里克在那里当了10年人质，对其非常熟悉，他不仅建造了“帝国”宫殿，而且还在其中发起了对神圣统治者的帝国崇拜。在重大的公共场合，他有意效仿君士坦丁堡，宣扬自己统治的神圣性和神启性，比如他在公元500年上演的进入罗马的凯旋式，就完全仿照旧帝国仪式“入城式”（adventus）。注

这是他自我展示中特别突出的一部分，因为他不是正统的基督徒，至少他的大部分意大利—罗马臣民是这样认为的。也就是说，他没有坚持325年尼西亚会议上规定的三位一体的定义，根据这一定义，圣父和圣子是完全平等的。和许多哥特人一样，狄奥多里克属于基督教的一个分支，在教科书中，这一分支被称为“阿里乌派”（Arianism）。这一教派得名于亚历山大里亚一位教士的名字，他活跃于4世纪20—30年代。我们并不知道阿里乌的思想究竟是什么样的，因为他的作品只留下了一些片段，而且是因为他获胜的对手引用才留下来的，而他们往往会断章取义地引用他们认为最具破坏性的部分。我们可以确定的是，狄奥多里克所属的基督教分支完全起源于罗马（而不是出自蛮族的奇谈怪论），并没有以任何有意义的方式继承阿里乌的教义（不管教义是什么）。它实际上代表了尼西亚会议以前根植于福音书证据（例如，耶稣向圣父祷告说“愿你的旨意成就”，归根结底，这听起来并不像是一种平等的关系）的传统基督教信仰的一个分支，在4世纪70年代哥特人第一次大规模改信基督教时，这一信仰还属于正统。在经历了两代人的犹豫之后，4世纪80年代，罗马世界果断地转向尼西亚正统，而哥特人中的大多数和其他接触到基督教的蛮族人保留了旧的信仰，宁可把圣子定义为与圣父“相似”，而不是像尼西亚会议所声称的那样，两者是“同一实体”。

鉴于他统治的是意大利，教宗和尼西亚正统学说的总卫道士的所在地，你也许会认为，狄奥多里克宣称自己是上帝指定的这一说法可能会

引起分歧。不是这样的。在他统治的大部分时间里，狄奥多里克和天主教会都非常尊重对方。例如，在500年他进入罗马的盛大入城式中，狄奥多里克说教宗“就像圣彼得本人”，他的赞扬得到了应有的回报。罗马教会本身因为一场教宗继承的争论而分成两派时，也寻求国王的斡旋。这个分裂就是所谓的劳伦蒂乌斯分裂（Laurentian schism），得名于参与者之一，也是最终的失败者劳伦蒂乌斯（Laurentius），与他对立的一方是教宗西马库斯（Symmachus），因此劳伦蒂乌斯注定要被当作僭称教宗记入史书。曾经有人认为，狄奥多里克对这场争论的处理带有浓厚的偏袒色彩（在维基百科的相关文章中，我发现这种观点现在仍然存在），但是，关于这场争论有大量的文献得以保存，其中最好且最新的学术研究已经得出结论：这位国王不辞劳苦，努力做到不偏不倚，遵循既定程序办事，尽其所能促成了迅速和解。虽然如此，这场争论仍然用了8年时间才得以结束。该争论是一个有力的证据，表明天主教会实际上承认了狄奥多里克的合法性。

在正式的教会会议上，他也得到了类似的认可。499年3月罗马宗教会议的官方记录流传了下来，读来趣味横生。会议开始时，聚集在那里的教士都跳起来大声喊道：“基督，请听我们说。狄奥多里克万岁！”他们这样重复了30遍。这样的赞美是帝国仪式的常规部分，但是教士们完全没有提到皇帝阿纳斯塔修斯。许多教士也愿意从实际行动和意识形态方面为狄奥多里克服务。例如，507年，一位名叫恩诺迪乌斯（Ennodius）的天主教执事在国王面前发表了公开的赞颂，解释了上帝是怎样将狄奥多里克送到意大利，以镇压好像被恶魔附了体的奥多亚塞。[注]尽管他有自己独特的信仰，狄奥多里克还是宣称他的统治受到了神的启发，在所有的教会事务中都采取了相应的行动，并得到了他统治范围内主要教士的适当回应。

从狄奥多里克政权的宣传和公开行动中，也可以看出他对“罗马精神”的其他基本要素非常熟悉。狄奥多里克特别认识到成文法律在意识形态上的重要性，也意识到通过古典教育进一步提高个人理性的重要性。恩诺迪乌斯的赞颂进一步指出，支配狄奥多里朝廷的是ius（应得）

和civilitas（文明），ius指罗马法的基本，就像前文提到的那样，civilitas是成文法所产生的一种更高级的文明状态。与此密切相关的是个人真正自由（libertas）的概念，而只有遵守这一法律的人才能获得这种自由。卡西奥多罗斯写给狄奥多里克的许多书信都要求尊重罗马法，引用它，对其基本的正确性进行思考，有的还提到这位国王所维护的持久文明。[注]教育也得到了应有的重视。恩诺迪乌斯的赞颂再次强调了狄奥多里克在君士坦丁堡所接受的古典教育的重要性。正如我们所见，在给阿纳斯塔修斯的信中，狄奥多里克声称正是这种教育教会他如何正确地统治罗马人。《信札》中的许多信件强调了他对教育的关注，或者更好的表达是他希望人们看到他对教育的关注。他宣称教育是道德的关键。通过教育，个人学会了自我控制，而没有自我控制，也就不可能服从罗马的法律。同样，缺乏自控能力的人也不能被信任去管理他人。为了维持良好的社会秩序（也就是文明），教育必须起到应有的作用，而狄奥多里克家族希望人们看到他们资助语法学家，也是有原因的。[注]

于是，他们动用了一整套手段让人们明白，在最基本的意识形态意义上，狄奥多里克的政体是“罗马的”：它与上帝对人类的计划是一致的。颂词、官方信函、硬币（狄奥多里克的一些钱币上刻着“invicta Roma”，意为罗马不可战胜）、视觉表现和建筑都被用来维持这一主张及其支柱——对罗马法律和古典教育的尊重。所有这一切最充分且最清楚的表达可以在《信札》中找到，但其中的思想在其他地方也可以找到，政权的基调在卡西奥多罗斯上任之前就已经确定。对于卡西奥多罗斯在晚上休息时对狄奥多里克进行有益指导的描绘也是在后者去世之后才出现的。卡西奥多罗斯的自命不凡是一回事，但毫无疑问，狄奥多里克政权坚决实行自我罗马化的方案是由他本人设定的。[注]一个来自阿马立王朝的哥特军阀，为什么要如此费尽周折地把自己呈现为一个彻头彻尾的罗马人呢？

作为罗马人的重要性

这有时被归因于情感因素：一种对帝国一切事物的深刻尊重。但是，这并没有恰当反映出狄奥多里克在营造其意大利政权的公开形象时的深思熟虑。这也与狄奥多里克在巴尔干时的形象不符，那时，如有必要，他就会与东罗马正面对抗。他之所以渴望与君士坦丁堡建立更密切的关系，完全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只要再多想想，就能得到更令人满意的答案。狄奥多里克坚持罗马精神，这是一种非常聪明的做法，坦率地说，是一种野心勃勃并且非常实用的策略。

借用罗马统治的意识形态，狄奥多里克掌握意大利统治权的行为就有了一层语言和仪式的外衣，其罗马臣民（尤其是其中最重要的成员）立刻就可以理解，他的政权在众人面前也获得了一个特别可靠的基础。这样，人们就更容易对他在意大利着手建立的政权做出积极回应，这对双方都有明显好处。以天主教教士为例，狄奥多里克声称自己是由上帝任命的，也照此行事——比如，对罗马主教表现出近乎夸张的尊敬——这样一来，教士就能在会议祈祷时明确接受他的说法并以报之以恭敬。教士们得以保留他们在基督教帝国统治下一个半世纪积累起来的所有利益，包括土地、收入、权利和由此产生的影响，甚至可以要求获得新的利益。就这样，狄奥多里克从教士的认可中获得了额外的合法性，甚至对教会这个强大的机构具有了一定的影响力，不过在像教宗选举这样的重大事件中，他还是会小心翼翼地公平行事。从同时代非洲的汪达尔人那里，可以看到不和教会互相示好的危险。汪达尔人的统治者与狄奥多里克属于同一个基督教分支，但他们的国家和教会却冲突不断，汪达尔人有时会迫害天主教徒。在关系最糟糕的时刻，他们之间的冲突使王国实际上陷入内战，特别是在484年，给天主教会的建筑和收入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更不用说其在王国大部分地区的声望和影响了。这种冲突不仅使汪达尔国王难以与天主教教士保持良好关系，而且还破坏了他们与一些较富裕的罗马臣民之间的关系，因为此时他们大多是天主教徒。在这样的冲突中没有赢家。(注)

狄奥多里克精心设计的自我展现也意在赢得意大利社会世俗精英的心。世俗精英包括一些大家族，其数量相对较少，却控制着王国的财

富。和天主教会各机构一样，他们的社会地位建立在他们拥有的土地之上。这些土地为他们提供了财富，也让他们得以主导当地的政治和行政。事实上，在帝国统治下，正是因为他们愿意从自己庄园的农业活动中，以及从佃户和社会地位较低的人那里收税并交给国家，才支撑起了整个帝国大厦。军事上占统治地位的统治者大可以用强力迫使人交税，但税收是一个政治问题，要成功收税，人们的同意是很重要的。在罗马帝国，税收是国家从拥有土地的精英阶层手中买来的，国家给他们好处，部分是通过授予官职，但更根本的是通过法律体系。由于人数相对少，拥有的财富却很多，罗马的地主精英们很容易受到那些比他们不幸得多的人的攻击。如果把所谓理性、受神启示的社会秩序之类的胡扯放到一边，我们就会看到，罗马法其实就是定义和保护财产权的。因此，国家创造和国家支持的法律体系是现有精英阶层社会主导地位的基本支柱。这确实是一种基本的交换条件，使他们愿意征收和缴纳税款。

在这方面，狄奥多里克也是完全正确的，因为他坚定的罗马精神的一个关键方面是对罗马法的延续做出了基本的承诺。从本质上讲，这相当于向意大利的罗马精英们（更不用说那些更富有的教士）明确保证，在新的政治时代，他们仍可保有自己的地产。旧的协定将受到新管理者的尊重。这也远不仅仅是因为狄奥多里克的惰性。在与奥多亚塞的斗争中，他一度威胁要取消所有那些没有积极支持他的罗马地主的遗嘱权。受影响的人将失去把财产留给他们选择的继承人的权利，因此将面临实际上的剥夺。最终，在米兰主教埃佩法尼乌斯（Epiphanius）领导下的使团面前，狄奥多里克做出了让步，地主们心中悬着的石头终于落下。我怀疑狄奥多里克并没有真的打算实施这一政策，至少不会全面实施，但这一威胁是一个有益的提醒，即如果新国王愿意，他是可以做些事的。对意大利的罗马地主来说，威胁的提出和撤销清楚地表明，积极参与新政权的政府结构是非常明智的。

它还帮助狄奥多里克解决了执政初期无法避免的公共关系方面的大问题。关于这位意大利的新统治者，有一点显然不是罗马的，那就是他从巴尔干带来的军队。其中一些人，尤其是以前的色雷斯哥特人，长期

以来一直领取罗马帝国的薪饷。但是在反叛时，即使是色雷斯哥特人同盟也没有表现出正常的罗马军队的样子，而狄奥多里克带来的潘诺尼亚哥特人、鲁吉人和其他各种各样的人都没有罗马血统。到了493年，一些军队已经跟了他近20年。在此期间，他们行军数千里，战斗无数次，在一些主要战役中幸存下来，包括进入意大利之前和之后的所有战役。自始至终，狄奥多里克都无法简单假定其追随者是忠诚的，而是不得不去赢得他们的忠诚。他父亲一死，哪怕是老部队潘诺尼亚哥特人的忠诚，他也要去努力维持。5世纪80年代中期，他已赢得大部分色雷斯哥特人的支持，同样的问题又发生在意大利，鲁吉人见风使舵，倒向他们认为对自己更有利的一方。如今，在他的种种努力之后，他的军队赢走了头奖，获得了意大利及其所有的财富。这个巨大的成功让军队过去的忠诚问题以另一种形式出现。通过惊人的武力和耐力，他的人完全控制了一个极其富裕的国家，他的追随者自然期待获得充足而适当的回报。

这是一个潜在的巨大问题。在论功行赏的问题上，狄奥多里克不能有丝毫吝啬。不能按照追随者的期望来做出回报的中世纪早期统治者往往活不长，而且会死得很惨。在古代和中世纪早期，财富只有一种基本的形式：土地和土地的产出。于是问题来了。如果意大利—罗马的地主精英们（无论是世俗的还是教会的）能够规规矩矩，那么其他事情就太好办了。然而，狄奥多里克的战士们需要报酬，而如果不从既有意大利精英们的地产中拿，要去哪里获得必要的资金呢？

如果任其自由发展，事态就可能完全失控。发生在意大利的奖励过程并没有失控，许多历史学家对此早已熟知，甚至意识不到当时的情况有可能引向灾难性后果。失控的可能的确是存在的。《土地调查清册》（Domesday Book）生动呈现了当胜利的军队不受约束地夺取土地时可能会发生的情况。在黑斯廷斯战役后的20年里，几乎在整个英格兰，诺曼贵族和他们的追随者取代了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地主。狄奥多里克的哥特军队不仅比威廉的更加庞大，而且在后罗马时代的西部，在军事化入侵者的控制下，其他地方的罗马地主在5世纪90年代就已在走向灭亡（同样，尤其是在不列颠群岛）。[注]狄奥多里克的政权是如何解决问题

的，在《信札》中几乎没有讲述。部分原因是，在507年卡西奥多罗斯担任他的第一个正式职位之前，这项工作就已经完成。因此，我们对此事的细节知之甚少。然而，解决方案的主要轮廓基本上还是可以拼凑出来的。卡西奥多罗斯告诉我们的两件事都很重要。第一，狄奥多里克任命了一个罗马的负责人来帮他寻找解决办法，他就是彼得勒斯·玛策林·费利克斯·利贝里乌斯（Petrus Marcellinus Felix Liberius），常被简称为利贝里乌斯。他来自罗马旧地主和元老院成员的家庭，他的贵族血统毋庸置疑。他在奥多亚塞手下开始从政，因为在旧主去世之前拒绝投靠狄奥多里克而受到褒奖。直到奥多亚塞在拉韦纳宴会厅的地上倒成一堆（如果我们掌握的史料没错的话，应该是两堆），利贝里乌斯才投奔狄奥多里克。他被任命为近卫军长官，全面负责将军队安置在意大利的乡村。第二，卡西奥多罗斯说，所提出的解决方案使哥特军队获得了适当的财富，而罗马人却“几乎感受不到任何损失”。同样的提法再次出现在执事恩诺迪乌斯写给利贝里乌斯的信中，前者长期在狄奥多里克朝廷的边缘晃荡，以寻求好处。所以这显然是狄奥多里克政权官方的说法。(注)

然而，高压政权（即使是古代的）的官方说法不一定与现实有多大关系，那么对于利贝里乌斯的做法，我们究竟知道多少呢？由于战略上的需要，他的任务更具体了，某种程度上也更加复杂，因为狄奥多里克不能将他的武装追随者分散在意大利的各个角落，毕竟这是其军事力量的基础。6世纪30年代晚些时候，东罗马军队入侵意大利。他们发现哥特人集中聚居在东北和西北部、拉韦纳周围和南部沿海地区，以及穿过亚平宁山脉从拉韦纳到罗马的要道两边。这样的分布非常合理，覆盖了所有可能从北方进攻的主要路径、东罗马从海岸东方进攻的主要路径，以及王国两个政治中心之间的关键通道。(注)

定居点集中地以外的地区是最容易处理的。这些未受影响的地区中正常税收的三分之一被指定给军队作为进一步的支持，被用作现金补助（被称为捐赠），定期发给处于参军年龄的合格男子。用拉丁官僚惯常的富有想象力和创造力的话说，这些地区是“三分之一区”（tertiae）。

此外，东罗马的史料坚持认为有土地授予现象，这也很有道理。近年来，有人极力否认在5世纪90年代有土地转手的情况，但这些都建立在默证的基础之上，即罗马地主并没有抱怨土地被剥夺。但是，关于狄奥多里克的统治，现有的相关史料全是官方的，因此你不可能看到这样的抱怨，虽然，就像我们看到的那样，即使是卡西奥多罗斯和恩诺迪乌斯所重复的官方的说法，也没有说罗马人没有遭受损失，只不过损失不太大而已。如果连官方史料都愿意承认这一点，那么我们没有理由不去接受它。5世纪90年代中期，的确有所有权易手的情况。

利贝里乌斯和他的团队究竟是怎样找到必要资源的呢？在军队的具体驻地，各个地方的情况各不相同。一方面，不同规模的军队驻扎在不同的地方，正如我们在上一章中看到的，这些群体中有一些已经有了相当复杂的社会结构。此外还有两个等级的武士和没有武装的奴隶。似乎不同的武士等级有资格获得不同的土地分配，也许在法律上和数量上都是如此；奴隶们似乎不太可能得到任何东西。然而，利贝里乌斯一直知道的是，每个地区有多少土地（以其产生的年收入衡量，而不是以其面积），以及谁拥有这些土地。正是为了征税，晚期罗马帝国保存了这些信息的详细记录，我们知道这种官僚结构在奥多亚塞统治时期仍然存在。因此，对于利贝里乌斯来说，所有必要的基本资料都是可以得到的，而这就是他发挥政治技巧的地方：平衡哥特人的所得和罗马人的损失，尽可能让双方都满意。在这方面，他很有创造力。

他各种解决方案的细节已经完全无迹可寻，但可供他选择的方案还是可以重构的。在有些地方，这项工作可能并没有那么困难。奥多亚塞在476年开始统治时也经历过类似的过程。随着越来越多的省份脱离罗马帝国的轨道，税收收入已不足以像往常那样支持帝国军队，而这正是意大利军队容易叛乱的原因。奥多亚塞的一些部队被狄奥多里克重新雇用，但有些没有。至于那些没有被重新雇用的队伍，它们的所有物就成了不需要付出政治成本就能得到的资产。从政治角度来说，另一种低成本的土地储备是属于城镇和各种自治机构（澡堂、行会等）的公有土地。5世纪50年代，汪达尔人征服了罗马帝国的中部行省，大量罗马地

主流离失所，当帝国的管理者（和利贝里乌斯及其团队一模一样）不得不在北非的其他地方为他们寻找土地时，他们就将目光转向了这种资源。虽然无法证明，但是我倾向于认为，失去部分土地的私人土地所有者能通过税收减免获得补偿，这样一来，他们实际年收入受到的影响将尽可能小。换句话说，利贝里乌斯手下的管理者（我相信他做的是政策制定，而不是细节）将队伍与特定地区匹配的具体过程应该是复杂而多样的，肯定也很费时间。㊟

最终，任务还是完成了，当利贝里乌斯在公元500年正式从他的职位上退下来时（也许这的确标志着这一定居过程的结束），老板显然很高兴。利贝里乌斯被授予了一个完全是荣誉性的却极有声望的罕见头衔：贵族。就我们所知，这完全是实至名归的。罗马的土地所有者仍然十分活跃，不公正的定居过程从未被作为对政权的批评而提出过，哪怕在6世纪30年代东罗马人试图诋毁它时（我们将在下一章看到）也没有，而狄奥多里克的军队似乎也很满意。虽然后来国王不得不处死一些贵族，但是没有任何大规模叛乱的迹象，而如果他们的期望没有普遍得到满足的话，这样的叛乱肯定是会有的。的确，《信札》中有关哥特军队的内容很少，最近有人据此提出，狄奥多里克最初的追随者都对他们所得到的非常满意，从5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原来的军队基本融入了意大利的社会生活，安心制作橄榄油和葡萄酒。你甚至都不需要认为狄奥多里克的军队在文化方面基本上是哥特人的，就可以发现这种描绘很不可信。

首先，如果去找的话，还是可以在卡西奥多罗斯所收集的信件中找到定居之后军队管理方面的小片段。我们看到，狄奥多里克会召见来自特定地区的小团体来接受他的捐赠（显然，为了使该制度能够发挥作用，必须保留一份有资格个人的名册），会为了保护某个已经过了服兵役年龄、生活困难的老兵而做出特别安排，甚至会批准一个小团体选出的领导者作为当地哥特人的首领（prior，字面意义为“第一人”），他的继任者有时也会这样做。㊟当然，最初这样的安排可能有更多。当王国

在他旁边轰然倒塌时，从档案中找出与哥特军队有关的信件对卡西奥多罗斯并没有什么好处。尽管如此，幸运的是，有更充分的证据表明，5世纪90年代以后，狄奥多里克的军队依然存在，依然十分重要。因为，虽然他自称的“罗马精神”在外交事务中肯定起了一定的作用，也让罗马地主们对一切都感觉更好，但在最初征服意大利之后，在狄奥多里克政权后来的命运中，军队继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正是这些活动使哥特人最冠冕堂皇的主张有了实质性的内容。

哥特史两千年

关于狄奥多里克在意大利的统治，完整的叙述无法重构。卡西奥多罗斯已经佚失的《哥特人史》中最初有哪些内容，很难说。这本书诞生于6世纪20年代初国王在位的最后几年，多达12卷，肯定带着得意扬扬的基调。但我们不知道每一卷有多长，而约达尼斯选择了将其中涉及狄奥多里克成年后活动的内容排除在外。正如我们在上一章中看到的，约达尼斯的《哥特史》比较详细地介绍了狄奥多里克从君士坦丁堡归来以及473年向塞萨洛尼卡挺进之前发生的事件，但对于其后53年的历史，他的叙述拼拼凑凑，只讲述了很少几个亮点。接着是对狄奥多里克死后事件（不可能出自卡西奥多罗斯的原作）同样简短的总结，最后以维提吉斯在540年的投降作为结尾。

这次投降把卡西奥多罗斯带到了君士坦丁堡，同样也是这次投降让他开始《信札》的写作。在记录这次投降时，约达尼斯做了如下评价：

> 一个长期占据支配地位的著名王国和勇敢民族，在延续了差不多2 030年之后，终于被战胜了。(注)

2 030这个数字非常奇怪，实际上，它只可能推算自对所谓哥特王国建立2 000周年纪念的记录。540减去“差不多”30，大概相当于510年，

在卡西奥多罗斯已经佚失的历史作品的时间范围内。事实上，我可以非常有信心地说，约达尼斯在卡西奥多罗斯的作品中找到了这个所谓的周年纪念，尤其是因为卡西奥多罗斯在写作其历史时已经确定了自己计算年代的形式，他之前刚刚创作了一本世界编年史，一直写到519年。因此，从为哥特人发明这样一个盛大的周年纪念上，我们不难发现他的想象力是多么丰富。同样重要的是，当你回到狄奥多里克的统治可以重构的那部分时，就这个最庄严的纪念日而言，也只有一个可能的时间。要想理解为什么，我们有必要再一次深入《信札》中我们面对的双重形象塑造的背后：随着6世纪30年代末期哥特王国的瓦解，卡西奥多罗斯非常需要为自己留条后路，因此狄奥多里克最初宣称的“罗马精神”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

我不相信所谓的哥特人的斯堪的纳维亚血统（这个说法同样来自《哥特史》，卡西奥多罗斯的历史可能也是这样认为的），但是对于狄奥多里克的外交政策，最初阅读《信札》给人的印象是，他简直是一个铆足了劲的挪威和平使团。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他沉迷于外交联姻。他本人娶了克洛维的妹妹；他还拥有许多女性亲属，而且不怕利用她们。因此，她们中的许多人嫁给了西哥特人、勃艮第人和汪达尔人的国王或王子。在后罗马时代的欧洲，建立一个以阿马立家族为中心的家庭和谐网络，还有什么能比这更有利于国际和平呢？

他在处理当时的重大国际关系问题上也颇有成效：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中东问题，而是高卢问题。476年，罗慕路斯·奥古斯都路斯被废黜，那时的高卢并不是像恺撒发现时的那样分成三部分，而是分成四部分。这里的支配力量是西哥特王国，它控制着从卢瓦尔河谷向南的一切，除了形成勃艮第王国核心的罗讷河中上游，罗讷河进入地中海的下游地区，即现在法国的里维埃拉（Riviera），也掌握在西哥特人手中。高卢最东北的地方处于法兰克人的统治之下，而从苏瓦松向西的全部地区都处于当地某个多少算作罗马军队的势力的控制之下。

几十年后，在狄奥多里克如日中天时，势力大幅壮大的法兰克人对

既有局面构成了挑战。正如我们所见，这与狄奥多里克王朝崛起的过程很相似。在法兰克人这里，希尔德里克和克洛维这对父子，尤其是儿子，联合了许多以前独立的战团，建立了空前庞大的权力基础（见前文），公元6世纪的前10年，他们忙着重新绘制后罗马时代西部的地图，尤其是高卢。此时，西北地区的罗马各部族早已被征服，而法兰克人也在向南部的西哥特王国和勃艮第王国施加压力。克洛维还盯上了勃艮第人东北方的邻居阿勒曼尼人（Alamanni）。这一切在505年左右达到了高潮，当时克洛维先是打破了阿勒曼尼人的独立，然后对西哥特人形成包围之势，迫使勃艮第人成为他的小帮凶。507年，爆发了著名的武伊勒（Vouille）战役，在这场战役中，西哥特军队被粉碎，他们的国王阿拉里克二世（Alaric II）被杀。根据法国的民族神话，在一定程度上，现代法国的疆界就此形成，分裂的高卢变成了统一的法兰西。[注]

从这一年起，《信札》保存了一系列的信件，这些信件是狄奥多里克为了维护那个时代的和平而写的，虽然大大提升了他的历史声望，但是他这方面的努力却付诸东流。空气中可能弥漫着战争的味道，但狄奥多里克并没有被吓倒。在写给姻亲西哥特国王阿拉里克二世的信中，他说：

> 不要让盲目的怨恨蒙蔽你的理智。自我克制对长远有利，有助于部落的存续。而愤怒往往会引发危机。只有当正义在对手那里找不到立足之地时，诉诸武力才会有用。[注]

对于夹在中间的勃艮第人的国王贡多巴德（Gundobad），他在信中既有训诫，又有恳求：

> 伟大的国王（克洛维和阿拉里克）不应该在他们之间挑起令人遗憾的争执，他们自己的不幸也会伤害到我们。因此，请你出于同胞之情，在我的协助下，努力恢复他们的和谐。[注]

对于强大的克洛维，他是这样说的：

> 如果你知道我忽略了你们之间的纷争，你会怎么看我呢？不要打仗了，你们中间总有一个会落败而自取灭亡……我已经决定差遣我的使者到阁下那里去。我也借着他们送信给你们的兄弟和我的女婿阿拉里克，无论如何不能让外邦人的恶意在你们中间播撒纷争的种子。你们应该和平共处，通过朋友的调解，结束你们的争端……你应该信任为你的好处而欣喜的人，因为把别人引向危险道路的人肯定不会是一个诚实的顾问。[注]

也许这一切最终都是徒劳的，但《信札》中的狄奥多里克无可挑剔，他派遣和平使者拿着他写的信穿梭在后罗马时代的西方宫廷，竭力避免即将到来的摊牌。事实上，把这些信与本书开头他写给阿纳斯塔修斯的那封不同寻常的信放在一起，一幅几乎无法抗拒的迷人画像就浮现了出来。狄奥多里克就这样名垂青史，作为一名曾经的罗马人质，在君士坦丁堡的10年里，他深受罗马价值观的影响，在此后的生涯中，他试图在一群接管罗马帝国西部其他区域的桀骜不驯的野蛮人中间维持秩序。

但是，我们面对的依然是狄奥多里克对他的政策及其动机的自我表述。如果现代政治史对我们有所教益的话，那就是它一再强调，你绝不能不加审视就接受任何政治领导人的自我展示。同样重要的是，我们看到的只是狄奥多里克书信中的一小部分，卡西奥多罗斯认为，这部分书信能够最好地展现他对这位国王及其继任者的服务。我们已经有了两个需要谨慎的理由。而且，正如我们在前一章看到的，相对于罗马的价值观，年轻的狄奥多里克总是对追求罗马的金钱更感兴趣。因此，从整体上看，有关高卢危机的证据表明，此时狄奥多里克的外交政策远不像《信札》表面上显示的那样和平，对此我们应该不至于感到惊讶。

回头说他写给阿纳斯塔修斯的信，从中我们已经看到了一定程度的

颠覆：狄奥多里克的权力和整体的“罗马精神”直接来自上帝，而不仅仅来自他在君士坦丁堡度过的岁月，这让他和东罗马的皇帝一样合法，一样是适当意义上的“罗马的”皇帝，并且也和东罗马的皇帝一样，凌驾于其他统治者之上。在提出这些初步观点后，信中继续说：

> 因此，我们认为有必要派遣使节前往无上仁慈伟大之陛下那里，使因种种原因而被破坏的和平，通过消除我们之间的一切争端，得以牢固地恢复。因为我们认为你不会让两个国家（东罗马和西罗马）之间存在任何不和。毕竟，在古代君王的统治之下，两者曾经结为一体。两者的联合不应该仅仅建立在同胞之情的基础上，而是应该竭尽全力，互相帮助。在罗马王国里，应当只有一个意志，一个目的。因此，我们在恭敬地向你致意的同时，恳请你不要剥夺我们对你的温和之情的崇高敬意。如果你的温和之情从来没有给予过别人，我们有权希望得到它。㊟

就这样，这封信的后半部分不知不觉中成了一张缴款通知单。因为狄奥多里克掌管着世界上唯一的另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罗马国家，所以君士坦丁堡应该与狄奥多里克建立和平和谐的联盟。哥特人的“罗马精神”已经成了一种有效的修辞手段，用来抨击皇帝，以结束所有的争端。

狄奥多里克没怎么掩藏自己的锋芒，证据表明这不是孤例，事实上，这是他与君士坦丁堡关系中的常态。例如，学者们花了大量笔墨，试图弄清楚在488年或489年把狄奥多里克送到意大利的协议的本质。这反映了史料方面的一个基本分歧，读过之前的内容后，我们已经可以料到分歧点在哪里了。东方的史料强调了皇帝芝诺的主动性，认为狄奥多里克是作为一个完全依附于他的下属去统治意大利的，而西方的史料（许多直接或间接地来自狄奥多里克的宫廷）则强调了狄奥多里克的主动性和独立性。这个外交协议旨在解决眼前危机，要知道当时有成千上万全副武装的哥特人等在君士坦丁堡城外。像许多意在解决眼前危机的

协议一样，这一协议之所以难以明确，正是因为它仅仅想在短期内把双方的分歧糊弄过去，指望着双方经历一段时间的和平之后，长期内不会再想重燃战火。协议从一开始就是敷衍，在意大利成功掌权之后，狄奥多里克便开始坚定地就协议条款重新谈判了。

我们知道，第一个使团早在491年就到了芝诺那里，第二个使团在492年芝诺去世后到了阿纳斯塔修斯那里，但完整的协议是在497年或498年第三个使团赢得了君士坦丁堡的让步之后才签署的，其中的条款包括向拉韦纳送皇家服饰。

意大利发生的情况远不止于此。我们已经提到，在正式的场合，总是会有仪式性的大声欢呼，不但欢呼的是狄奥多里克的名字而非东罗马皇帝的名字（以前可能是），而且狄奥多里克的雕像也被放置在尊贵的位置，东罗马皇帝的雕像则被放到了他雕像的左侧。当然，能有雕像就已经不错了，但是东罗马皇帝希望自己的雕像能够放在右侧。此外，狄奥多里克还赢得了或者说霸占了授予罗马国家主要荣誉的权利，如决定执政官的提名、贵族的任命和元老院成员的人选，他还对罗马贵族和天主教会的要人都拥有完全的法律权力。[注]

我们不知道其中有多少是阿纳斯塔修斯在498年明确同意的，又有多少是狄奥多里克自作主张的。但是皇帝显然同意了很多，因为皇袍被送去了，狄奥多里克提名的执政官人选在东方得到了承认。还有十分重要的另外两点我们可以绝对肯定。首先，这些不是白白得来的，而是狄奥多里克用进攻性的外交手段争取来的，也就是《信札》里那封写给阿纳斯塔修斯的信中透露出来的外交手段。其次，君士坦丁堡方面的外交让步，加上狄奥多里克方面的自作主张，说明了一件事，而且只能是一件事：从498年起，狄奥多里克就开始享有西罗马皇帝的所有权利和特权，身穿皇袍，住在一座仿照君士坦丁堡风格建筑和装饰的宫殿里。正如他在给阿纳斯塔修斯的信中所述，狄奥多里克显然在君士坦丁堡学会了如何作为罗马人进行统治，而且是作为一位不折不扣的皇帝，而不是作为一个下属。再思考一下，很快就清楚了，不仅仅是他与君士坦丁堡

的关系，狄奥多里克的整个外交政策都是在完全相同的前提下运作的，即使在他看起来在从事穿梭外交时也是如此。

最早感受到狄奥多里克威力的外邦势力是非洲的汪达尔人。在奥多亚塞时代，汪达尔人对西西里保持了部分控制，并以不再对其发动攻击为前提榨取保护费。早在491年，狄奥多里克的军队就在那里打败了汪达尔人，因为汪达尔人企图利用狄奥多里克对奥多亚塞的战争浑水摸鱼。这导致汪达尔人放弃了对西西里财富的控制，大约在公元500年，两个王国缔结了婚姻联盟。一笔丰厚的嫁妆，连同新娘——狄奥多里克的妹妹阿玛拉弗里达（Amalafrida）一起，被送给了汪达尔国王色雷萨蒙德（Thrasamund），但这位东哥特公主的送婚队伍是一支据说由5 000人组成的军队，其中一些人在婚礼结束后留了下来。婚姻双方并不平等。大约10年后，狄奥多里克发现色雷萨蒙德在积极支持他的一个对手。非常“失望”的哥特国王写信给他的妹夫：

> 我们相信，在这件事上，你不可能同你的妻子商量过，因为她既不会愿意看到自己的哥哥受到伤害，也不会愿意看到她丈夫的名誉因为这种可疑的阴谋而受到玷污。我们已经派出了大使……他们将与你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

色雷萨蒙德回复后，狄奥多里克写了另一封存世的信：

> 你这位最通达的君王已经证明，聪明人知道怎样改正自己的错误，而不是像畜生那样固执己见。你以最高贵、最真诚、最像国王的方式自谦，承认了自己的错误……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并衷心接受你从这罪恶中得到的净化。至于你送来的礼物，我们心领了，但是不能接受。请你将其归还你的府库，好叫人看出，我们发怨言原是因为热爱正义，而不是因为贪图钱财。(注)

这一交流完美地表明了此时意大利和北非之间关系的性质。色雷萨蒙德俯首听命，马上试图通过送礼来重新获得狄奥多里克的好感，但是狄奥多里克根本就不吃这一套。在送礼的语言中，把礼物退回去，不管说得多好听，总是一种蓄意的侮辱。狄奥多里克在警告色雷萨蒙德，汪达尔王国依然处于以观后效的状态。

狄奥多里克下一个有记录的扩张行动发生在504—505年，他在多瑙河中部地区扩大了王国的疆界。他从奥多亚塞那里继承了达尔马提亚的部分地区和萨维亚（Savia）行省。通过一场针对特拉塞里库斯（Trasericus，他父亲在488年年末试图阻止狄奥多里克进军意大利时被杀）的格皮德人而精心策划的战役，他得以兼并古罗马的第二潘诺尼亚行省及其主要城市——前帝国首都锡尔米乌姆（Sirmium）。狄奥多里克并没有从与君士坦丁堡的冲突中退缩。阿纳斯塔修斯并不乐见哥特人日益强大，他组织了一支主要由保加尔雇佣兵组成、由一位帝国将军领导的军队进行干预。这支军队也被狄奥多里克打败了。(注)因此，即使在征服意大利之后，狄奥多里克也远非一位和平缔造者。对君士坦丁堡的侵略，对汪达尔人的支配，在多瑙河中部的扩张，尽管叙事来源零碎而简短，但足以证明狄奥多里克并没有仅仅因为活动中心的转移和开始雇用一流的政治化妆师，就改变他的本性。这一记录也证明，狄奥多里克的军队已经完全融入意大利的说法是错误的。如果更仔细地看，与506—507年高卢危机有关的信件记录也表明，狄奥多里克并不像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致力于和平。

西哥特国王阿拉里克二世无疑是狄奥多里克的主要盟友。在对抗奥多亚塞的战争中，西哥特王国提供了一些额外的兵力。在现存的材料中，没有任何证据表明狄奥多里克对西哥特王国的支持是不认真的。然而，细看之后我们就会发现，他给贡多巴德和克洛维的信件总体上并不像个别语句所显示的那么柔和。勃艮第国王受到了这样的严词警告：

> 如果我们允许自己的亲属卷入血腥的战争，我们的恶意将受到

谴责。我对你的感情绝对是真诚的，我们两个是团结的，你若为自己的缘故行了什么恶，让我伤心，那你的罪过就大了。

事实上，在整部《信札》中，狄奥多里克对贡多巴德的语气总体上是居高临下的。即使是赠送两个计时器（一个日晷和一个水钟）这个表面上友好的举动，也可能成为大肆展现优越性的场合：

> 在你的祖国拥有你曾经在罗马看到的东西吧……在你的统治下，勃艮第人要学会细察最具独创性的器具，赞美古人的发明……通过他们的发明区分一天的各个部分，精确地确定时间。如果这种区分不为人知，生活的秩序就会变得混乱。实际上，通过肚子的饥饿来感知时间，那是野兽的习惯，它们不理解那种显然是赋予人类的东西。

前面说过，根据古典时期的文化观念，是理性把真正的人类和那些仍然像野兽一样生活在无知中的人区分开来。即使在送礼物的时候，狄奥多里克也摆出要在文化上帮对方一把的姿态，强调勃艮第人仍然像笨拙的动物一样。贡多巴德的宫廷里还是有许多受过良好教育的罗马人的，尤其是维也纳的阿维图斯主教（Bishop Avitus），他们完全能够理解这种蓄意的侮辱。(注)

勃艮第人被敦促利用他们的斡旋来帮助维持和平，而且，狄奥多里克还在一定程度上命令他们，不要偏离他的路线而站到克洛维一边。至于克洛维，他太强大了，不能像对贡多巴德那样对他颐指气使，但他又没有强大到能够避免受到责备的程度：

> 神圣的亲属法（与法兰克人和西哥特人统治者的姻亲关系）就是为了这个原因而在君主中生根的：使他们精神宁静，带来人民渴望的和平……考虑到这一切，我很惊讶你的精神被琐碎的事情所扰，竟然想投入一场最严酷的斗争。

接着是一个警告：

> 你的勇气不应成为你的国家意料之外的灾难，因为国王对小事的嫉妒是一件大事，对他们的人民来说是一场大灾。

克洛维面临的是什么灾难呢？可能是他会被西哥特人打败，因为战争的结果往往没那么简单，但也可能是狄奥多里克会亲自干预。事实上，狄奥多里克并不介意警告克洛维；大约一年前，克洛维威胁要把一些战败的阿勒曼尼人赶到意大利时，狄奥多里克就警告过他：

> 请接受一个在这类事情上有长期经验的人的忠告：我那些最后比较有节制的战争结果都很好，因为只有懂得在一切事情上克制自己的人才是永远的胜利者。……请温柔地听从我的指导……这样，就会有人看见你满足我的要求，你就不用为你知道会影响到我的事情挂虑了。[注]

当然，这比对贡多巴德说的话更圆滑，但传达的信息却很清楚：克洛维最好能够保持克制，否则狄奥多里克就会介入，而作为一个自我克制的人，他还没有打过败仗……

这些书信的潜台词不足以证明狄奥多里克挑起了这场危机。他似乎真的在努力避免其发生。不过，在语气上，他给克洛维和贡多巴德的专制而傲慢的信件远谈不上是调停，也不可能被很好地接受。因此，就算他不是在煽动战争，他也不是在竭力避免战争。同时，他还向挑衅者指出，如果自己被迫加入，可能会有什么后果。

事实证明，这场危机的主要受益者是狄奥多里克本人。这通常被忽略，因为克洛维王朝和法兰克人注定要彪炳史册，我们将在本书的后面看到。但即使从我们现有的支离破碎的叙述看，狄奥多里克所取得的成就也已经足够绚丽多彩。但并不是每件事都按计划进行，507年，东罗

马人在意大利亚得里亚海沿岸发动海上突袭，阻止了狄奥多里克前来支援阿拉里克。实际上，这突出了那封写给阿纳斯塔修斯的信的全部和最后一层含义。狄奥多里克对协议进行了激烈的重新谈判，还击败了君士坦丁堡的保加尔雇佣军，受够了的君士坦丁堡当局与克洛维结成了联盟，在盟友与西哥特人作战的时候，让哥特人无暇他顾。克洛维战胜了阿拉里克，这虽然令人震惊，但并不是故事的结局。508年，狄奥多里克的军队从君士坦丁堡的威胁中解脱出来，冲出意大利，翻过了阿尔卑斯山。法兰克人和勃艮第人的军队（贡多巴德没有理会狄奥多里克的警告）都被击退了，尽管法兰克人确实获得并保留了对阿基坦大部分地区的控制权。事情远没有结束。

武伊勒战役的失败使西哥特王国陷入一片混乱。权力先是落到了阿拉里克的儿子基萨里克（Gesalic）的手中，他是阿拉里克在与狄奥多里克的女儿结婚之前和别人生的。击退入侵者并保住新的、缩短了的边界之后，狄奥多里克终于准备行动了。511年，他的指挥官们把基萨里克赶出了王国（色雷萨蒙德对逃亡者的支持导致了那次书信往来，之后如我们所见，可怜的汪达尔人不得不卑躬屈膝）。有人说狄奥多里克之所以发动这场政变，是为了支持他女儿与阿拉里克二世的儿子，即阿马拉里克（Amalaric）。然而，没有丝毫证据可以证明这一点。狄奥多里克所做的，是把两个哥特王国作为一个完全统一的国家进行统治，一个是他自己在意大利的王国，一个是位于高卢南部和西班牙的西哥特王国。西哥特王国的王室财富被运往拉韦纳，狄奥多里克控制了记录西哥特军人名单的登记簿。在卡西奥多罗斯的《信札》中，一封与此有关的信（只有一封，因为卡西奥多罗斯正是在511年卸任的）表明，西哥特王国政府管理的问题是由拉韦纳集中处理的。[注]

因此，毫无疑问，511年是卡西奥多罗斯为纪念哥特王国建国2 000周年而挑选的“奇迹之年”（annus mirabilis）。凭借军事力量，狄奥多里克现在已经直接控制了意大利、地中海高卢、西班牙的大部分地区、达尔马提亚海岸，以及多瑙河中部以南的一大片地区。在他的干预结束时，他也在对汪达尔王国行使霸权（尽管色雷萨蒙德显然对此深恶痛

绝），甚至可能还对勃艮第人行使霸权。简而言之，到511年年底，一个地位中等的哥特战团领袖的儿子，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指挥着西罗马故地三分之一到一半地区的事务，他对后罗马时代西方的统治是无可匹敌的。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年份来盛大（即使完全是在名义上）纪念哥特力量的崛起呢？

永远的奥古斯都

虽然狄奥多里克取得了惊人的成功，但他并没有明确要求西罗马皇帝的称号，即使他已经实权在握。他控制着广阔的疆域，采用帝国仪式，自命为理性之源和西地中海古典学问之源，这些都表明，这个哥特人已经自视为罗马帝国的皇帝。他为什么迟迟没有迈出那一小步，这个问题发人深思。我认为，狄奥多里克可能是在显示他的惯常能力，即认识到什么时候谨慎比勇猛更重要。举例说，进一步明确他的主张只会恶化与君士坦丁堡的关系。早在507—508年，阿纳斯塔修斯就已表明，如果能够杀一杀狄奥多里克的威风，他很愿意趁火打劫，当时狄奥多里克还没有入侵西班牙。如果狄奥多里克自封为皇帝，这种敌意只会加剧，从而威胁到他付出如此大的努力才争取到的一些外交让步，其中尤其重要的是，让他提名的执政官（这是深受意大利精英喜爱的荣誉职位）在东罗马得到承认。

我猜测，他可能也想避免疏远他的主要哥特人追随者。将511年当作哥特王国名义上的2 000周年是一个意味深长的选择。所有的通用说法都将罗马历史的开端定于公元前753年罗马城的建立。248年，皇帝腓力（Philip）为庆祝罗马建城1 000周年举行了盛大的庆典，此事就体现了这种观念。简单一算就能知道，把511年作为哥特人的2 000周年纪念，就等于宣称哥特王国比罗马城还要古老。这表明，卡西奥多罗斯（以及狄奥多里克本人）可能不得不考虑狄奥多里克一些亲密追随者的观念，这些人不愿意接受罗马在一切方面都很优越的观点，对他们来

说，“皇帝”狄奥多里克将是难以接受的。

虽然对于一些必须与之合作的主要支持者，狄奥多里克照顾了他们的情绪，但他实际握有很大的权力，也对权力本质做出了主张，这是毋庸置疑的。天主教的教士对此当然毫不怀疑。508年的胜利和511年的政变将南高卢的大片新领土置于狄奥多里克的支配之下，其中包括阿尔勒教区及其杰出领导者该撒留主教（Bishop Caesarius）。511年之后不久，主教去了一趟意大利。根据他的传记，这并不是出于自愿；他去，是因为他的忠诚受到了怀疑。我认为，其传记作者（该撒留的执事之一，在主教死后不久就为其写了传记）可能并不希望人们记住他的天主教英雄与阿里乌派哥特人过于亲近。但即使是这部传记也没有试图掩盖，这位阿里乌派准皇帝和天主教主教一拍即合，相见恨晚。狄奥多里克立刻承认了该撒留的神圣性，送给他很多礼物，把他送到罗马，请教宗授予他披带（pallium），承认该撒留是宗座代牧和南高卢最高级的主教。这一地位让主教得以奠定他在教会中享有盛名的基础：6世纪20年代的一系列教会改革会议，使中世纪早期基督教的许多通行做法固定了下来。另外一个不常被注意到的问题是，该撒留的活动与狄奥多里克的计划究竟有多合拍。披带赋予该撒留一种名义上的权力，使其管辖范围从他本人的教区一直延伸到他的大主教辖区范围内的所有主教区，包括此时属于勃艮第王国的许多主教区。同样，狄奥多里克声称对勃艮第人拥有霸权，这也是哥特人在6世纪20年代早期对勃艮第王国支配地位的进一步主张（我们稍后会讲到），这将确保后来这些教区的主教出席该撒留的宗教会议。[注]

天主教的罗马神职人员像讨好皇帝一样讨好狄奥多里克，狄奥多里克这个哥特人也没有阻止他们，种种暗示被罗马世俗精英看在眼里。实际上，这些暗示明目张胆，明晃晃像黄铜一样，或者更确切地说，像金子一样——狄奥多里克统治时期留下了一样独特的东西，就是所谓“塞尼加利亚金币”（Senigallia medallion），这是一枚纯金铸币，上面是国王的形象。金币背面的铭文称他为“多个民族的征服者”，所以金币也许正是为了庆祝511年达到顶峰的伟大胜利而发行的。但发行金币是皇帝

的特权，这一点在原来的西罗马普遍受到尊重，至少一直到6世纪晚期都是如此。狄奥多里克对这种微妙的规矩置之不理，他的意图已然显露，没有人会相信他不称帝的伪装。在他的实际权力之外，狄奥多里克在许多方面都有意让那些有此愿望的人把他看作新西罗马皇帝中的第一个，许多人都很乐意这样做。有一位名叫凯西那·马佛提乌斯·巴斯利乌斯·德西乌斯（Caecina Mavortius Basilius Decius）的元老院重要成员，在一段特别著名的题词中，以“永远的奥古斯都”（semper Augustus）这个至高无上的头衔来称呼狄奥多里克，他只是大声说出了每个人心中应有的想法。[注]

然而，虽然在511年大获成功，狄奥多里克的心头依然有两片阴云。首先，东罗马并不愿意接受他新获得的辉煌。东罗马在508年就有了敌意。狄奥多里克兼并西班牙和高卢南部以及西哥特王国的军事力量后，权力基础几乎扩大一倍，不难想象，阿纳斯塔修斯和他的顾问们对此会有何感想。另一个问题是内部的。511年，狄奥多里克已经年近花甲，却还没有子嗣，他与克洛维的妹妹奥德弗里达（Audefleda）结婚后只生下了一个女儿，即阿马拉斯文塔（Amalasuentha）。继承问题十分严峻。虽然事后我们知道狄奥多里克实际上还能再活15年，但对于中世纪的统治者来说，60岁已经够老了。没有人有耐心计算出所有中世纪统治者的平均死亡年龄，但查理曼王朝的男性平均寿命约为50岁，这或许能给我们提供一个合理的指导。狄奥多里克在西方的劲敌克洛维于511年逝世（这无疑会让意大利人把注意力集中在王位继承问题上，尽管我相信他们已经注意到了），而后者大约也就活了50岁。虽然女性继承并非绝对不可能，但肯定有困难。这一工作的主要内容是控制一群可能很难驾驭的武装追随者，而要让这些人接受女性的统治并非易事。到了511年，狄奥多里克随时都有可能死去，而眼前却没有一个靠谱的继承人。

此外，不确定的继承是古代和中世纪世界所有内部政治问题的根源，它给政体带来的内部冲突比其他所有问题加起来都要多。原因很简单。首先，继承问题出现时，哪怕只有一点可能性的竞争者都会跳出

来：无论是旁系的男性亲属，还是娶了王室年轻女性成员的强势将军，只要有野心，稍微有点资格的人都会跃跃欲试。结果必然是王国领导集团内部的分裂和争夺。更糟糕的是，不同的候选人都需要争取支持者。显然，在当前政权下过得不太好的人会支持其他候选人，因为不满的人总是相对容易聚集到未来变革的旗帜之下。但这种招募活动只会让那些已经过得很好的人感到不安，因为他们需要一名候选人来保持连续性，以确保国王驾崩后他们不会失去当前的特权。当然，这并没有考虑到那些目前过得相当不错，但是认为还可以过得更好的人：这就是人类愿望的本质。换句话说，不稳定的继承，就像美国总统第二任期结束时的总统选举，或者在经济不好的年份举行的总统选举，会催生多位相互谴责的候选人和激烈的争权夺位，有可能颠覆所有既有的政治联盟。511年年末，如果说君士坦丁堡的持续敌对状态很不方便，那么狄奥多里克没有继承人的情况则可能是灾难性的。事实证明，东方发生的事件给狄奥多里克提供了一个机会，让他得以在这10年结束前解决这两个问题。

最晚到515年，狄奥多里克显然放弃了拥有自己儿子的希望，而是找到了另一种方法，以便将继承权赋予自己的直系亲属。为此，他把阿马拉斯文塔嫁给了一个名叫欧塔里克（Eutharic）的人，其全名是弗拉维乌斯·欧塔里克·凯里加（Flavius Eutharic Cilliga）。这是一个精明的好选择。约达尼斯《哥特史》中阿马立家族的谱系肯定源自卡西奥多罗斯的《哥特人史》。根据这一谱系图，欧塔里克是旁系亲属：他是胡尼蒙德后代贝里蒙德的孙子。5世纪40年代后期，贝里蒙德放弃了与迅速崛起的瓦拉米尔之间的斗争，向西逃亡到了西哥特王国。在《哥特史》之外并没有独立的证据证实这种关系。我们完全不清楚贝里蒙德本人是否像谱系表所显示的那样，最初与瓦拉米尔有血缘关系（虽然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克洛维不遗余力地铲除旁系男性亲属可能是一个很好的对照），但欧塔里克似乎很有可能就是贝里蒙德的孙子。在血统往往众所周知的显赫政治圈子里，应该不会有人在这么近的亲属关系上撒谎。因此，狄奥多里克选择的这位女婿和继承人，可以合理地从狄奥多里克那些最初的潘诺尼亚哥特人追随者中得到一些残余的忠诚。与此同时，

作为西哥特王国的贵族，欧塔里克本人也很重要。他从西班牙来到拉韦纳完婚。因此，在我看来，毫无疑问，狄奥多里克打算让这对幸福的夫妻继承他的意大利、西班牙和南部高卢，换句话说，新统一的哥特王国将在他死后继续存在下去。当然，这里的重点是，欧塔里克与西哥特贵族本来就有紧密的联系，因此可以合理地指望他帮助稳定这部分领土。一份大约是同时代的史料说他“非常粗野”，而对于需要控制数千名哥特武士精英的人来说，这种品质正合适；这些精英分散于从意大利亚得里亚海海岸到西班牙东部地中海海岸的弧形地区。注

君士坦丁堡的敌意被一条更曲折的路线化解了。当狄奥多里克掌权时，在罗马人看来，东方教会在很大程度上处于分裂状态，特别是君士坦丁堡的宗主教区。除了要面对阿提拉和匈人帝国，5世纪中叶的罗马人在神学方面也不好过。人人都承认耶稣身上结合了人性和神性，但究竟是如何结合的就不清楚了。君士坦丁堡的一位宗主教聂斯托利（Nestorius，428年出任宗主教，431年被革职）主张，说基督身上全能上帝的一面可以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是荒谬的，因此，钉十字架只涉及他身上人的一面。然而，东部的其他神职人员认为救赎的奥秘绝对需要上帝死在十字架上，尤其是亚历山大里亚的宗主教区利罗（Cyril）。结果是一场跨越几代人的激烈争论。为了解决这个问题，451年，皇帝马尔西安在隔博斯普鲁斯海峡与君士坦丁堡对望的卡尔西顿（Chalcedon）召开了全教会的主教会议（公会议）。当时的教宗利奥一世没有出席，但他派出了代表，发表了一份重要的教义声明，即《利奥大卷》（*Tome of Leo*）。因此，教宗的威信不可避免地与会议上神学讨论的结果联系在一起。这次会议非常有益地宣布，基督具有“二性”，既是人，又是神。

除此之外，这次会议一点益处也没有。它足以排除聂斯托利派最极端版本的观点，但是，在区利罗后来的许多支持者看来，它提出的信仰的定义十分模糊，足以让一些狡猾的、具有聂斯托利派倾向的思想家仍然认同它。因此，争议并没有在公元451年之后消失，而是围绕着卡尔西顿决议本身的争论重新定位。到了482年，皇帝芝诺受够了这种争

吵，迫使当时的君士坦丁堡宗主教阿卡修斯（Acacius）发布了一份妥协文件，即《联合敕令》（*Henotikon*，字面意思为“合一法案”），试图让人们对“本质”这个词闭嘴，然后继续探讨其他的内容。但这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从卡尔西顿会议的决定后退一步，因此遭到了教宗的拒绝。紧接着就是互相通信和指责，结果是在484年，教宗腓力斯（Pope Felix）和阿卡修斯互相将对方处以绝罚，于是就开始了所谓的阿卡修斯分裂。基督教的分裂的名称通常是正统一派（换句话说是胜利一方）定的，也就是说，用失败者的名字命名分裂，以示他要为整个事件负责。注

通过当时国际外交的曲折道路，这种分裂的最终解决为狄奥多里克提供了化解东罗马敌对情绪所需要的机制。对东罗马来说，分裂是非常尴尬的。鉴于罗马教宗与圣彼得和圣保罗的关系，没有人会怀疑其威望。所以，作为皇帝统治下由神任命的教会首领，君士坦丁堡的宗主教如果在信仰问题上被贴上错误的标签，就是一个重大的公关问题。毫不奇怪，人们想方设法寻找解决方案。514年7月，教宗西马库斯去世，此后的一段时期特别繁忙。然而，使节的来往和信件的交流没有任何效果，是君士坦丁堡的政权更迭最终提供了合适的时机。518年7月9日，阿纳斯塔修斯去世。他没有子嗣，也不愿（更有可能的是无法）为他的几个外甥之一（下一章我们还会提到他们）争取足够的政治支持。帝位传给了一位相当年长、一表人才的警卫官，他就是查士丁（Justin）。

因此，当新政权试图通过结束令人尴尬的分裂来与前任划清界限时，狄奥多里克的机会来了。常规的罗马帝国意识形态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因此，人们会期待一个由神任命的皇帝采取果断行动，在宗教问题上实现统一。从东罗马人的角度来看，这也是一个好主意，因为自514年以来，在将军维塔利安（Vitalian）的指挥下，东罗马的巴尔干军队一直处于叛乱状态，维塔利安之所以对阿纳斯塔修斯不满，原因之一是后者拒绝接受卡尔西顿决议。如果查士丁和他的顾问们决定将维塔利安纳入他们的政权并结束叛乱，他们就会致力于恢复卡尔西顿决议的全部权威。

事态的发展十分迅速。518年8月1日，查士丁第一次写信给教宗贺米斯达（Pope Hormisdas），宣布他的继位。9月7日，他又发出一封由帝国使节送出的信，让教宗将准备和谈的代表送回他这边。新皇帝的外甥查士丁尼也致信询问教宗是否愿意来君士坦丁堡。帝国的使节直到12月20日才到达罗马，但在519年1月，教宗的代表团已经上路了。3月25日，也就是当年圣周的星期一，包括维塔利安将军在内的帝国高级代表团在城外十几公里处接见了他们。仅仅三天后，君士坦丁堡的宗主教若望就在罗马的信件上签了字。可怜的老阿卡修斯被从宗主教名录（diptychs）上抹去，这份名录是官方列出的虔敬宗主教的名单，在教堂礼拜仪式中，经常要为他们祈祷或者是对他们祈祷。(注)

这一切都很好，但是与狄奥多里克有什么关系呢？如果你认为没有多少关系，这是可以原谅的。事实上，有一派学者一直认为分裂的结束标志着狄奥多里克王国历史的不祥转折。当他开始掌权时，分裂的事实使罗马教宗和意大利的虔诚天主教徒（尤其是拥有土地的元老院阶层）与东罗马的天主教徒隔离开来。一旦分裂问题得到解决，什么也阻挡不了这些人向君士坦丁堡献殷勤，阿里乌派的狄奥多里克与他们之间的和平与和谐必然会受到影响，而他的王国的政治与行政运作也必然会受到影响。这听起来似乎有理，但与实际情况不符。警觉的读者可能已经注意到，查士丁的使节花了相当长的时间才到达罗马。他9月7日离开君士坦丁堡，12月20日才到达罗马。这是因为他在路上花了很多时间在狄奥多里克位于拉韦纳的宫廷里。同样，教宗在送回他自己的使团之前，也与狄奥多里克进行了仔细的磋商。在519年的圣周期间，他的使团主持了君士坦丁堡的大妥协。换句话说，狄奥多里克完全参与了这一交易。他与罗马的关系很好、很密切，在没有得到他同意的情况下，教宗不敢擅自行动。事实上，在教宗对年迈的阿纳斯塔修斯提出的和平提议的回应中，我们就已经看到了这样一种模式。

因此，狄奥多里克并没有将分裂终结视为威胁，事实上，是他让这一切成为可能的。他利用我们现在已经了解和喜爱（或至少承认）的绝妙手段，把形势变得绝对有利于自己。518年秋天在拉韦纳的宫廷里所

达成的是一举结束所有问题的交易。作为对他结束分裂的斡旋的回报，东罗马正式承认了狄奥多里克对其继承人的选择，这个人选就是阿马拉斯文塔的丈夫欧塔里克。两人已经有了一个儿子，他就是后一代的继承人阿塔拉里克。这种承认有两种形式。首先，欧塔里克被接受为查士丁皇帝的“侍从义子”（son-at-arms)，这涉及赠送武器作为礼物的正式仪式——这是6世纪在帝国广泛使用的承认方式。更引人注目的是，查士丁同意在519年与欧塔里克共同担任执政官。他们在519年元旦正式开始任职，因此最迟在此前的秋天就商定了这一安排。

新皇帝同意与狄奥多里克选定的继承人共同担任执政官，还有比这更能表明两者之间友谊的吗？

狄奥多里克志得意满：东罗马的敌意和继承问题被一举解决了。在这条道路上有过不少艰难的时刻，但狄奥多里克复兴的西罗马似乎注定要繁荣到下一代，这不仅基于蛮力和自我主张，而且基于君士坦丁堡的正式承认。519年1月1日是新的西方帝国大喜的日子，为了庆祝，卡西奥多罗斯率先在历史上有所作为，完成了他的《编年史》（*Chronicle*，依然存世）。在这本书中，世界历史和救赎历史在欧塔里克担任执政官时达到了顶点。[注]

然而，狄奥多里克最终于526年8月30日去世时，这些欢乐而花费高昂的庆祝活动已成为遥远而痛苦的记忆。当时，天主教会缺少教宗。526年5月，在被派往君士坦丁堡之后，若望一世返回意大利，这在罗马教宗的官方传记中被认为是一次巨大的成功。狄奥多里克显然不这么认为，因为他立即把教宗关进了监狱，教宗很快就死于狱中。在隐喻意义上讲，他被关进监狱是加入了罗马元老院两位主要成员的行列，即叙马库斯（Symmachus）和他更著名的女婿波爱修斯（Boethius），两人都被控叛国罪，入狱后分别在525年和524年被处死。更糟糕的是，一份史料称，这位在其统治期间与天主教会关系良好的统治者，正打算发动一场大规模的迫害，只是遭到了死神的干涉。与意大利地主和罗马教会交好30多年的珍贵关系已经土崩瓦解。这一变化十分令人费解，一位匿名

的意大利编年史家在狄奥多里克死后的几十年写道，他无法理解，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狄奥多里克的确去了魔鬼那里。[注]无论是人间还是地狱，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死在拉韦纳

关于狄奥多里克最后的岁月，除了我们的意大利编年史家之外，史料中的沉默是惊人的；但一些学者相信，他们知道哪里出了问题。特别是战后古典学研究的巨人之一阿纳尔多·莫米利亚诺（Arnaldo Momigliano），他发表了一篇精雕细琢、极具影响力的论文，这篇论文脱胎于他20世纪50年代末给英国科学院做的讲座。在这篇文章中，他认为狄奥多里克晚年灾难的根本原因在于，与表面不同，狄奥多里克最初的魅力攻势从未真正奏效。在他看来，意大利—罗马地主精英中间有一条鸿沟，一边是上层等级的官僚机构工作人员（如我们的老朋友卡西奥多罗斯），一边是真正的罗马元老院贵族，前者很高兴地接受了新政权，而后者却从来就没有信服过。叙马库斯和波爱修斯这样的人总是更愿意成为罗马帝国的一部分；6世纪20年代，他们被发现与君士坦丁堡有叛逆性的通信，这不过是长期政治失败传奇中的最后一幕。

这个故事很能满足人的情感需求，故事的主角是罗马的贵族，他们的行为就像你可能认为他们应该做的那样：拒绝蛮族人的统治，坚持罗马的理想，不管他借了多少件帝国的服饰。我想，也许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过去还不太久的时候，这个原有官僚机构与外来征服者愉快合作的故事让人们产生了额外的共鸣。[注]但是，尽管这个故事在情感上令人愉悦（而且文笔优美），但是当面对所有证据时，它真的难以自圆其说。

波爱修斯的职业轨迹是一个大问题。这位学者兼政治家入狱之前，在为狄奥多里克服务的过程中一度获得巨大的成功。他的岳父叙马库斯和他本人似乎都积极参与了终结阿卡修斯分裂的活动，虽然是间接参与的，而正如我们刚才看到的，分裂终结正是狄奥多里克所乐见的。因

此，狄奥多里克不会认为他们的行为有问题，而这正是我们的证据所表明的。522年左右（由于缺乏叙事史料，年代有点模糊），波爱修斯离开书斋，开始担任整个体系中最重要的行政职务之一——政务总管（magister officiorum）。这个职位极其重要，因为政务总管负责监督其他许多官僚机构，以及朝廷的许多日常工作，比如安排法律听证会，引见外国大使，还要经常出现在统治者身边。如果这还不足以表示狄奥多里克对波爱修斯的喜爱，要知道，波爱修斯的两个儿子都被任命为522年的共同执政官。执政官之位是罗马后期最大的公共服务荣誉，以前还没有任何人的两个孩子同时在这个职位上。狄奥多里克和君士坦丁堡通常各自任命一位执政官，也就是说，这样的安排得到了皇帝查士丁的首肯。(注)

因此，这里没有什么贵族与官僚之分，意识形态的问题也完全不存在。我们所能找到的有限资料体现了高级贵族和狄奥多里克政权积极接触的历史与莫米利亚诺的生动描绘大相径庭。首先，他没怎么提到我们的老朋友利贝里乌斯，后者负责在狄奥多里克执政初期为即将到来的军队找到适当的经济补偿。利贝里乌斯是贵族出身，几乎是皇室血统，但他与意大利的新统治者合作得非常愉快。同样重要的是，有许多不同的参与方式。即使在意大利还是帝国西部的一部分的时候，意大利古老的精英家族也认为积极参与政府和行政部门不合乎礼节，实际上也不太常见。有些人这样做了，但这只能说明那些人很有野心。精英们基本上都极其富有，除非他们真的想要参与政治，否则他们不需要这样做。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在更广泛的公共生活中不重要。元老等级古老的悠闲（otium）观念意味着不必担任职务和不必从事日常劳作的自由，但这并不意味着整天坐在家里剥葡萄。元老院成员应该积极参与文化活动，编辑古老的经典著作，对其进行注疏和讨论，当然他们偶尔也会把自己的作品加进去。同时，由于他们的财富和人脉，他们也成了意大利各地各种团体的赞助人。而且，在这一切之外，还有元老院本身。作为一个由极其富有的人组成的团体，元老院本身就是一个公共团体，虽然它没有现代民主国家中某些同类团体的正式权力。因此，元老院成员的身份

就足以使你成为公众人物，在各个层面上与统治者直接接触。[注]

从积极参与的广义定义来判断，在6世纪20年代之前很久，波爱修斯和他的岳父就已经是狄奥多里克王国的活跃公众人物了。很多证据都来自卡西奥多罗斯的《信札》，当然，相关内容的时间跨度仅限于卡西奥多罗斯在任的短暂时期，也就是506/507年到511年，但这只会让它更为突出。在这几年里，波爱修斯负责在两个不同的场合为外国统治者（克洛维本人和勃艮第国王贡多巴德，关于后者，见前文提到过的著名计时器）寻找外交礼物。在第二次提出这种要求时，狄奥多里克表现出了对波爱修斯的学术活动广泛而详细的了解（当然，狄奥多里克并没有读过这些书，但他可能会选派一位官员去进行必要的研究）。叙马库斯负责在元老院提起诉讼；有5名元老院成员被任命为顾问，负责审判一些被控有巫术行为的元老院成员，他是其中之一，他自己也审理过一起弑父案。所有这些都说明，叙马库斯与狄奥多里克有广泛接触，狄奥多里克还偿还了他在罗马庞培剧院维修工程中承担的费用，所以当时他显然深受朝廷的青睐。事实上，从抄本注释中我们知道，他也在拉韦纳做了一些文化研究。这条注释没有注明日期，也可能写于奥多亚塞时期，但写于狄奥多里克时期的可能性更大。无论如何，它所突出的是，莫米利亚诺在贵族和官僚、罗马和拉韦纳之间做出的区分太绝对了。[注]

高级官僚有的出身贵族，有的因其在任职过程中获得的财富和声望而成为新的贵族，有时，他们会让子女和那些声望很高但经济状况较差的人的后代结婚，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有这样的事。贵族不仅会和官僚争斗，同样（甚至更有可能）会与其他贵族争斗，因为在争夺最高权力和特权时，他们通常的对手是其他的贵族。在这种背景下，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的一些贵族同僚（不仅仅是莫米利亚诺所说的官僚）不仅很乐意对波爱修斯和叙马库斯进行审判，也很乐意在他们倒台之后继续和哥特人合作。这两个人是被他们的元老院同僚定罪的，像利贝里乌斯这样的人并没有因为这两个人的倒台而放弃对哥特人的忠诚。

简而言之，无论是波爱修斯和叙马库斯的活动，还是我们能够重构

的有关总体背景的信息，都无法真正支撑莫米利亚诺关于意大利政治运作的观点。同样也没有证据支持他的其他关键论点。莫米利亚诺认为波爱修斯是因为与君士坦丁堡的叛国通信而被捕的，在这些信件中，他鼓励东罗马人介入，以恢复东罗马对意大利的直接统治。狄奥多里克死后十多年，查士丁的继任者查士丁尼下令入侵意大利，这一事实影响了莫米利亚诺的看法。但是，正如我们将在下一章中探讨的，6世纪30年代中期君士坦丁堡的情况与20年代完全不同，而且在20年代，军事干预根本不可能。就在519年，查士丁甚至认可了狄奥多里克对继承人的选择。有一部写于6世纪20年代早期的东罗马编年史，其作者是一名与朝廷有联系的官员，因此他的观点可以被认为是对当局官方路线的呼应，他谴责阿纳斯塔修斯在508年对意大利的攻击是“对罗马同胞的海盗式袭击”。(注)一直持不同政见的贵族阶层试图策划一场东罗马的军事干预，这样的重构并不成立。波爱修斯的倒台看起来不太像是贵族长期反抗故事的最后一幕，而像是统治者突然和在他统治期间一直围绕着他的朝中大人物闹翻了。

是什么导致了这种灾难性的关系破裂？它不可能影响到意大利—罗马贵族的全部，甚至也影响不到大部分，因为大多数有嫌疑的人后来还是继续为狄奥多里克工作。有些人甚至从中受益，尤其是卡西奥多罗斯，他在波爱修斯失宠后立即成了政务总管。波爱修斯在狱中写下了著名的《哲学的慰藉》，但全书的主旨只是说对他的指控是假的，他之所以被关进监狱，事实上是因为哲学促使他在任期内建立合乎正道的政府形式，这使他在实际上已经高度腐败的朝廷上四处树敌。但是，他没有说明指控的内容，总的来说，这本书并没有让我们更加明白，是什么让狄奥多里克和不久前还关系友好的政务总管波爱修斯发生了不和。(注)

但是，如果你从狄奥多里克晚年的细节和骚动中退后一步，就会发现实际上只有一个问题可能造成如此大的混乱，那就是继承问题。狄奥多里克把阿马拉斯文塔嫁给欧塔里克，而他们又很快生下了可当继承人的阿塔拉里克，这时，狄奥多里克以为继承问题已经解决了。但是，国

王自己的长寿起了反作用，因为狄奥多里克活了70多岁，比他选择的继承人活得还久。我们不知道欧塔里克究竟是什么时候去世的，但应该是在522—523年这段时间前后。事情一下子乱了套，复杂的继承问题扑面而来。阿塔拉里克出生于516年或518年，所以最多只有7岁。对于一个未成年人能否继承狄奥多里克的衣钵，显然存在着尖锐的意见分歧。

狄奥多里克最终决定他可以。我们不知道他花了多长时间才做出这个决定，但史料表明，他的确是这样认为的。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在卡西奥多罗斯担任政务总管的时候，我们在前一章中遇到的关于阿马立家族是独一无二的紫袍家族的无稽之谈，开始不断出现在他为其主人所写的信中。王朝的延续性是对阿塔拉里克有利的一张牌，意识到自己大限将至的狄奥多里克一有机会就把这张牌甩出来。但是，如果被选中的继承人缺乏必要的能力来有效履行战争领导人的基本职责，即使是狄奥多里克无可置疑的声望，也不足以保证其平稳继承。

我们也不知道狄奥多里克在全力支持阿塔拉里克之前，是否考虑过其他可能性，但别的人肯定考虑过。也许最明显的其他人选是狄奥多里克的外甥狄奥达哈德（Theodahad）。他已经成年，在阿塔拉里克统治初期得到了一大笔钱，因为他一直很“服从”。这种“服从”很可能是指在狄奥多里克去世之际，他没有以继承人的身份站出来，而当时的形势确实动荡不安。例如，卡西奥多罗斯告诉我们，围绕阿塔拉里克的继承问题，哥特人的主要聚居地之一利古里亚（Liguria）发生了严重的骚乱，可以想象，这是为了拥护不同的继承人。其他人则把目光投向别处。有位高级贵族叫图鲁因（Tuluin），他在战场上已经名声大振，同样因为支持阿塔拉里克继任获得了重大奖赏，其中包括贵族这个荣誉头衔，他由此成为第一个获得该头衔的意大利哥特人。在历史上曾经拥有这个荣誉的是像埃提乌斯这样的杰出人物，他在5世纪30—40年代为维系西罗马的统一付出了漫长而艰苦的努力。图鲁因还收到一封信，信中明确地把他比作哥特历史上伟大的英雄格西蒙德。身为胡尼蒙德之子，格西蒙德选择支持阿马立三兄弟建立权力基础，而不是继续战斗，他的哥哥托里斯蒙德和侄子贝里蒙德则与他分道扬镳，继续保持独立（见前文）。

显然，图鲁因所做的与其相似，也就是说，他没有强求自己的权利。《信札》表明，人们一度考虑过阿马立家族之外的继承人。注

在西班牙，欧塔里克之死的后果也开始显现。选择欧塔里克的一个原因是，西哥特贵族出身的他可以保持狄奥多里克通过驱逐基萨里克而获得的广阔疆域的统一。但阿拉里克二世还有一个儿子阿马拉里克，他是狄奥多里克自己的外孙，为他的女儿提奥得哥多（Theodegotho）所生。在狄奥多里克的传位方案中，这个外孙无足轻重，他甚至派了一个名叫提奥迪斯（Theudis）的亲信到西班牙，以确保没有人利用阿马拉里克来挑起事端。然而，欧塔里克死后，提奥迪斯有了不同的看法。他在西班牙娶了一位罗马豪门女继承人，用她的钱维持了一支由几千人组成的私人军队。在欧塔里克离世造成的不确定形势下，提奥迪斯越发独立行事，断然拒绝了拉韦纳的几次传唤。他不是要辅佐阿马拉里克，而是积极推动自己的事业，将自己定位成未来国王背后的掌权者，最终他如愿以偿。狄奥多里克死后，意大利和西哥特王国被重新划分，阿马拉里克继承了西哥特王国。但这是在狄奥多里克死后才达成的协议，不是他批准的。对此，我们在东罗马的主要信息来源——历史学家普罗柯比（Procopius）说得相当明确：这一分裂是阿塔拉里克和阿马拉里克在狄奥多里克去世之后达成的一致，而不是老国王想要的。就提奥迪斯而言，他不服从命令，并非出于对年轻主子的某种忠诚，而是为了自己的利益。阿马拉里克死后，他继承了西哥特的王位，并在位达17年之久。注

简而言之，欧塔里克的死让狄奥多里克陷入了与即将任满离职的总统类似的境地。70岁左右的狄奥多里克已经当不了几天国王了，很难让人人都继续对他俯首帖耳。朝廷上的主要成员都忙着盘算谁会成为合适的接班人。担心失去当前收益的人都在寻求向能让他们放心的人提供支持，发展得不太好的人则试图找到能够扭转他们命运的人。在更远的西班牙，如果狄奥多里克的朝廷没有如此混乱，提奥迪斯是绝对不敢如此公开地攫取权力的。他不是唯一一个嗅到机会的局外人。522年，勃艮第国王西吉斯蒙德（Sigismund）处决了他的儿子和前继承人塞格里克

（Sergeric）。塞格里克是西吉斯蒙德和狄奥多里克的女儿奥斯特罗哥塔（Ostrogotha）的儿子，他被处决之时其母刚刚去世，西吉斯蒙德这么做，部分是为了摆脱狄奥多里克霸权的影响。523年，色雷萨蒙德死后，新的汪达尔国王希尔德里克杀死了和狄奥多里克的妹妹阿玛拉弗里达一起留在北非的哥特军队随从，并将阿玛拉弗里达抓了起来。她最终在监禁中死去。在这两个事件里，都有狄奥多里克家族成员的适时死亡，欧塔里克之死和狄奥多里克朝廷的瘫痪也是重要因素。两个不情愿受狄奥多里克控制的卫星国都欣然抓住了千载难逢的机会。

其中一个成功了，另一个则失败了。据说在526年夏天，一支舰队做好了征伐汪达尔王国的准备，但是在狄奥多里克死后，这支舰队并没有起航，所以希尔德里克也就没有受到惩罚。勃艮第人就没那么幸运了。权力传给了西吉斯蒙德的弟弟戈多马尔（Godomar），在法兰克人和哥特人的干预下，戈多马尔保住了其王位，但图鲁因将普罗旺斯更多的领土从勃艮第统治中分离出来，并入了狄奥多里克的领地，为他潜在的候选资格增添了光彩。老国王至少心满意足地看到傲慢的勃艮第人得到了某种惩罚。[注]

仿佛这一切还不够，旧秩序将亡时的血腥味还吸引了一条更大的“鲨鱼”前来参加狄奥多里克政权的最后仪式，它就是君士坦丁堡。勃艮第人和汪达尔人都试图通过与东罗马结盟来巩固他们从拉韦纳独立的新主张。这些都被欣然应允。与此同时，在容忍这些群体一个多世纪之后，查士丁的政权开始迫害居住在其境内不信奉《尼西亚信经》的基督徒，他们与狄奥多里克和他的哥特人有同样的信仰。狄奥多里克认为这是对他个人的轻视，威胁说要对意大利的天主教徒采取反制措施。这似乎是老国王的过度反应，但有件事说明情况并非如此。查士丁的政权拒绝给予狄奥多里克最终选择的继承人阿塔拉里克与其父亲一样的认可。我们知道这一点，是因为卡西奥多罗斯在阿塔拉里克登基后不久，就代表他的新主人给皇帝写了一封信，要求阿塔拉里克像他父亲一样被收为侍从义子。我毫不怀疑这符合狄奥多里克的要求，他很可能在欧塔里克死后、他自己去世前一两年很快就做出了选择。这让人们得出这样的结

论：查士丁的政权故意拒绝了昔日盟友的请求，虽然后者的斡旋帮助结束了阿卡修斯分裂。这种立场只能意味着，它是在试图加剧导致狄奥多里克朝廷瘫痪的政治动荡，鼓励所有想削弱他权力的人动手。在我看来，这可能也是导致教宗若望在狄奥多里克的监狱里去世的原因。很明显，尽管据说教宗在君士坦丁堡得到了许多赞美和掌声，但他这次出使并没有实现狄奥多里克想要的目标。在这个阶段，狄奥多里克最有可能想要的让步是东罗马人承认他的继承人，但这并没有实现。注

从这个角度，你可以理解这位老哥特人对突然爆发的宗教迫害的愤怒。宗教迫害，再加上东罗马与叛乱的汪达尔人和勃艮第人结盟，不承认狄奥多里克的继承人，一个不可避免的结论是，6世纪第二个10年后期所有的友好都毫无意义。机会一出现，两面派的东罗马人就原形毕露，他们不再是盟友，而是尽其所能削弱狄奥多里克的权力和威望。虽然没有任何记录，但我怀疑他们这样做并不是在为入侵意大利做准备。我们将在下一章中看到，在未来10年左右的时间里，在君士坦丁堡开始认真考虑将意大利并入其直接统治之前，还有很多偶然的事件会发生。在我看来，东罗马人想做的，更有可能是在王国的精英政治圈内散布足够多的不和，以瓦解狄奥多里克的哥特人超级国家，并将西哥特王国从拉韦纳的统治中分离出来。这完全说得通。在狄奥多里克死后，无论是谁在拉韦纳掌权，都没有比这更能削弱其力量的单一行动了。而鉴于西哥特王国是最近才并进来的，这是一个非常容易实现的目标。

波爱修斯及其岳父恐怕最终正是在这张充满欺骗的大网中落入圈套的。在《哲学的慰藉》中，波爱修斯太过含糊其词，我们无法完全确定他为什么会遭遇如此可怕的命运。他在君士坦丁堡确实有很强的人脉，因此，也许像教宗若望一样，他也与查士丁的决心相冲突，后者拒绝承认新继承人的人选，以便在意大利王国挑起尽可能多的麻烦。波爱修斯有这些人脉，因此狄奥多里克很可能希望自己的政务主管能够帮他获得想要的认可，这种认可将有助于确保阿塔拉里克的继任，并再次稳定拉韦纳的政局。这种认可没有到来的时候，国王的愤怒是无情的，波爱修斯的境遇有点像没能帮助亨利八世实现那场著名离婚的红衣主教沃尔西

（Cardinal Wolsey）。

我认为，这种重构是完全可能的，但还有另一种更具体的可能性。波爱修斯说过，他的垮台是由于狄奥多里克的政权拒绝了哲学对统治艺术的良好教导。就像其他人之前提出的那样，这可能是一种暗示。因为，在欧塔里克死后众多可能的王位候选人中，狄奥达哈德对新柏拉图哲学有着浓厚的兴趣。我们也碰巧知道他和波爱修斯之间有相当密切的联系。因此，有可能与红衣主教沃尔西不同，波爱修斯倒台的主要原因是，在欧塔里克死后的激烈政治斗争中，他站错了队。[注]不管怎样，可以肯定的是波爱修斯被卷入了这场矛盾。继承问题是狄奥多里克最后几年里最重要、最混乱、最难以解决的问题，波爱修斯肯定就是因为这个问题而丧命的。

哥特人的罗马帝国

在狄奥多里克死后的几个月内，帝国的光环迅速而决然地从他以前的领地消失了。意大利、高卢和西班牙联合王国的分裂是根本原因，但汪达尔国王希尔德里克彻底拒绝了东哥特人的霸主地位，勃艮第人也部分实现了自我主张，这也加速了帝国光环的退却。在公元511年之后的鼎盛时期，狄奥多里克确实建立了一个非常像样的统一帝国，正如他在写给阿纳斯塔修斯的那封著名的信中所宣称的那样。他直接统治着广袤的疆域，他的霸权不仅延伸到北非和罗讷河谷的勃艮第王国，而且以越来越松散的形式一直延伸到中欧。这一点值得强调，因为它经常被忽略。我们在本书后面将会看到，法兰克家族注定要成为更长期的历史明星，但这不能掩盖这样一个事实：在他们自己的有生之年，狄奥多里克的事业成就比克洛维的大。在公元6世纪的第二个10年里，狄奥多里克的权力才是真正帝国性质的。高卢教会的领袖（如阿尔勒的该撒留）和教宗追求的是狄奥多里克的友谊，而不是克洛维的。狄奥多里克是那个时代最伟大的统治者，“永远的奥古斯都”这个称号并非夸大其词，而是

完全名副其实的。

多年来，人们认为他的帝国工程后来失败有几个原因，很重要的一个是阿里乌派和天主教之间潜在的宗教分歧，还有一个原因是政治上的，即他只得到了罗马那些重要贵族不冷不热的接受。然而，宗教分歧只在查士丁和查士丁尼统治时期才成为问题，因为他们迫害其领地上的旧阿里乌派社区，同时在欧塔里克去世之后拒绝承认狄奥多里克对新继承人的选择。考虑到6世纪第二个10年的和解和519年共同担任执政官的安排，我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狄奥多里克将君士坦丁堡的新宗教政策理解为蓄意的外交怠慢是完全正确的，而他威胁要发起反制也完全是合乎情理的。然而，狄奥多里克统一的哥特王国没能在他死后存续，而无论是在意大利国内，还是在拉韦纳与君士坦丁堡之间的外交关系中，天主教徒和阿里乌派都很快就恢复了以往的和平共存状态，于是，所有的争论都平息了。例如，阿尔勒的该撒留的影响力如日中天的时候是在狄奥多里克死后，特别是在529年阿塔拉里克统治时期的奥兰治宗教会议上。同样，如果仔细审视的话，波爱修斯、他的父亲和叙马库斯的失宠，并不能很好地证明狄奥多里克的统治基础上有一条长期存在的断裂线。毫无疑问，他们的死是一场重大危机的一部分，但是与通常围绕他们展开的那个故事不同。这更像是在一个重大的新问题上原本忠于政权的人失去了专制统治者长期以来的宠信，而不是对一个令人憎恨的暴君的长期抵抗。

失去帝国地位的真正原因要平淡得多：狄奥多里克选定的继承人无力维持压倒性的军事力量。组成这种军事力量的，既有古老的西哥特人的军队，也有狄奥多里克新的东哥特王国的军队。狄奥多里克死后，这种结合没能继续存在下去，这并不奇怪。511年他才将两支军队联合到一起，因此，两者之间没有长期存在的纽带和传统，甚至也没有联合作战的经历能够将他们团结在一起。因此，即使欧塔里克没有先他一步离世，狄奥多里克的哥特式罗马帝国是否真的能在下一代复制自己也很值得怀疑。对旧的哥特人领土做出重新划分后，狄奥多里克的继任者在西罗马故地远远达不到他在政治上的那种卓越地位。狄奥多里克于489年

率领军队进入意大利，由这支军队发展出来的队伍显然依然比勃艮第或汪达尔王国的军队更强大，从6世纪头10年的事件来看，可能也比彻底改造后的西哥特王国的军队更强大。但是，特别是在克洛维的继任者完全整合了在莱茵河东西部新征服的地区之后，法兰克人至少变得同样强大。在这种更广泛的战略背景下，意大利和西班牙哥特军队再次分裂，这使得狄奥多里克的继任者们不可能像他那样大步跨越西罗马故地。

狄奥多里克在帝国的舞台上之所以会失败，根源在于他对那些新加入其军事权力基础的西哥特人的控制太弱。但与此同时，值得指出的是，他一生政治计划的核心部分——他于489年带到意大利的联合军队——具有可与之抵消的持久性。最近的学术研究关注5世纪和6世纪所谓蛮族群体身份的普遍流动性，却忽略了这一点。因此，我们有必要花一点时间了解该群体的主要组成部分。当然，狄奥多里克的追随者并不是由古代的文化共性联合起来的古老“民族”，到目前为止，我对修正史学家处理这个问题的方法完全没有异议。狄奥多里克的东哥特人是由两个主要部分组成的全新群体，即潘诺尼亚哥特人和色雷斯哥特人同盟——在他们于5世纪80年代统一之前，在至少几代人的时间里有着完全不同的历史（事实上，可能已经有几个世纪了，因为他们4世纪的祖先很可能分属黑海北部不同的独立哥特王国）。然而，即使这些也远远不能充分表明军队起源的混乱程度。潘诺尼亚哥特人本身是在5世纪50年代才由狄奥多里克的伯父创建的，来自一系列被并入阿提拉匈人帝国的战团，而色雷斯哥特人实际上也可能是由不同起源的较小群体组成的混合体，虽然看起来确实像是始于5世纪20年代原本附属于匈人的群体从潘诺尼亚重新定居到色雷斯。军队的两个主要组成部分有着混乱的起源，而且，到狄奥多里克进入意大利时，他已经从阿提拉帝国崩溃后的废墟中招募了大量散兵游勇。来自被奥多亚塞摧毁的王国的鲁吉人是最大的族群，但比提古尔族（Bittigur）的匈人也出现在意大利，此外还有其他族群。

从这样复杂的开端入手，狄奥多里克设法将各种力量联合起来，形成一台高效的军事机器。他拥有的工具大多来自罗马，有些是积极的，

有些是消极的。消极的因素是，芝诺的两面派和敌意给所有这些新加入者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合作理由。如果他们不这样做，皇帝就会操纵他们互相毁灭。但东罗马也提供了更积极的动力，因为只有他们团结起来，才更有可能以年度补贴的形式从芝诺的税收中分得一杯羹。正是这种积极的一面在意大利赢得了胜利，联合军队的力量使狄奥多里克得以完全控制这片土地，从而能够以土地赠予和持续税收的形式调动意大利的财富，回报他忠实的追随者。他们对狄奥多里克的忠诚，以及他集结的整体力量，让狄奥多里克在西哥特人加入之前，就已经控制了西地中海。

考虑到其军队来源的巨大差异，这是十分了不起的成就，而且以中世纪早期的标准看，他创建的军队的群体身份是极其持久的。当然，并不是每个人都对他们的领导者有同样程度的忠诚。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鲁吉人在最初的征服行动中轻易改变了阵营，但当时他们还是新成员，是487年或488年才加入的。当东罗马军队在6纪30年代进入意大利时，国王死后的那一代哥特军队的一些成员立即投降了。注但事实上，只有一小部分人这样做，我们将在第4章中看到，在长达25年的战争中，狄奥多里克带到意大利的那些人的后裔绝大多数一直战斗到最后，那时他们的群体身份才瓦解。这种群体身份并不古老，最初是在狄奥多里克在世时被创造出来的，尽管如此，它远非昙花一现。一起参加战斗的经历，以及先后同芝诺和奥多亚塞对抗所形成的纽带大大改变了他们。我认为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征服意大利之后的财富分配，这使得最初的军队成员和他们的后代有了重要的共同利益，促使他们共同捍卫新获得的主要特权。其结果当然是一个新的群体身份，而且对于军队的大多数成员来说，这身份绝不是暂时的，毕竟在经历了长达20年的武装斗争之后它才被瓦解。

即使这支军队本身并不是后罗马世界中维护帝国的强大基础，它的本质特征也确实让人注意到，为什么西欧的罗马帝国到5世纪末就已经不复存在了。帝国刚建立时，在日耳曼人支配的中部地区所能见到的最大政治结构是由许多独立群体临时组建的军事联盟，这些人为了迫在眉睫的进攻或防御而集结在一起。这样的政治结构最多只能维持一场大

胜，就像阿米尼乌斯在条顿堡森林击败瓦卢斯率领的军团那样，但这种现象非常罕见，而且在那次胜利后的几年内，获胜的联盟就不复存在了。相比之下，狄奥多里克只要把两个已经相当庞大的基本单位（潘诺尼亚哥特人和色雷斯哥特人）集合在一起，就可以创造出一支十分庞大的军队：他面临的政治问题比较简单，涉及的关键决策者要少得多。除此之外，还有一系列共同的纽带，这些纽带来自重要且最终获胜的联合战役，以及维护狄奥多里克在征服意大利后建立的奖赏体系这一共同利益。完全可以理解为什么这支军队中的绝大多数人，即使是其第二代和第三代后裔，在面对东罗马人入侵意大利时表现得如此坚韧顽强。

就像狄奥多里克的哥特人一样，所有建立了西罗马继承国的军事力量都是在行进过程中形成的新群体，但他们的群体认同并不因此就比意大利哥特人的更短暂。西哥特人、汪达尔人，最终还有法兰克人，所有这些群体都有非常相似的经历，结果也大同小异。他们在罗马土地上竞争的烈火中得到锻造，最初是为了在罗马人的反击中生存下来，但是后来随着中央帝国日益衰弱，他们希望能够在罗马税基中获得越来越大的份额。他们的基本单位本来就已经相当大了，而在此过程中变得更大，也更加持久。这与公元前1世纪和公元1世纪的日耳曼民族形成了十分强烈的对比。长期的变局为真正庞大而持久的军事群体的形成创造了条件，当这些人被迫进入政治统一的最后关键阶段时，他们有能力分割罗马的领土。一旦他们开始这样做，罗马中央当局很快会发现税基和它所支撑的军队都在逐渐消失。罗马扩张时期，即使是最大的日耳曼联盟也无法以这种方式对抗罗马帝国的强权。在5世纪，有几个这样的群体在罗马的土地上横行，这确实解释了为什么中央帝国当局发现再也不可能维持帝国结构的完整了。(注)

5世纪时罗马土地上的日耳曼群体有了新的规模和持久性，这能够解释为什么帝国会失去赖以生存的军事优势；而这些新群体大体上也足够强大，足以抵挡彼此的不良企图。且不提狄奥多里克511年的举动，在6世纪后罗马时代的西方，没有一个继承国能够调动足够强韧的军事力量，去建立一个长期存在、规模称得上是帝国的国家。巅峰时期的狄

奥多里克可以威吓勃艮第王国和汪达尔王国，并在西哥特王国被击败时实现对它的直接统治，但无论是他的王国还是他的对手，都同样产生于5世纪时激烈竞争的环境，都没有足够的军事实力来兼并足够多的邻国，并建立一个长期看来像是复辟的罗马的国家。因此，在西方重建帝国的第二次重大尝试必须来自旧的西方帝国的领土之外，这并不奇怪。它植根于东罗马，东罗马的资源使任何一个西方继承国相形见绌。当然，东罗马势力一直都存在，但是在468年东罗马舰队战败（那是它最后一次试图维持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西方帝国的存在）之后的两代人时间里，君士坦丁堡将其对地中海西部的干预限制在很有针对性的外交干预范围内，就像狄奥多里克晚年所经历的那样。这种变化是如何发生的？为什么会发生？这些问题把我们直接引向了查士丁尼大帝。

---

1. 卡西奥多罗斯《信札》 9.24。
2. 对这些信件的整理见Mommsen（1894a）。Hodgkin（1886）是对《信札》的高度浓缩译本；Barnish（1992）对其中一些信件提供了充分的注释和最新的翻译。要了解卡西奥多罗斯和他的职业生涯，请参考O’Donnell（1979）；Barnish（1992），ix–liii; Heather（1993）。在狄奥多里克统治之初，利贝里乌斯肯定是他的顾问，叙马库斯和波爱修斯可能也是，他们都比卡西奥多罗斯更加重要。
3. Bjornlie（2009）很好地讲述了书信集产生的背景，但是他认为在公元540年后，这些书信被大幅度重写，我认为这种可能性不大。这些书信的语气和内容都很适合狄奥多里克政权的古典化方案，见Heather（1993）。这并不是说卡西奥多罗斯在选择和安排书信时没有大耍花招，我们将在本章后面看到这一点。
4. Kaster（1988），尤其是12–19，详细介绍了教育的作用；关于这些思想是怎样与古代宇宙观产生交集的，见Sorabji（1983），尤其是cc. 13 and 20。关于古代政治理论和基督教有限影响的经典研究，见Dvornik（1966），尤其是cc. 8，10–12。
5. 镶嵌画装饰，见MacCormack（1981），236–239。关于狄奥多里克的宫殿，见Johnson（1988）; Ward Perkins（1984）。
6. 对于哥特人非尼西亚基督教的介绍，见Heather and Matthews（1991），cc. 4–7。关于狄奥多里克和教宗，见《瓦勒西阿努斯匿名著作》12.65关于入城式的内容，以及Moorhead（1992），c. 4关于有争议的选举的内容。宗教会议，见《罗马宗教会议纪要》（Acta synh. Habit. Romae）I，p. 405。关于恩诺迪乌斯，见ed.Hartel，pp. 267–268; cf. id.，Life of Epiphanius 97.35。

7. 关于“文明”，见Barnish（1992），xxiv–xxv；比较《信札》 1.27; 2.24; 6.5; 8.33;9.18。关于法律的重要性，见《信札》 2.7; 3.17（cf. 18）; 4.22; 5.40; 10.5。对《狄奥多西法典》和其他帝国法律的实际交叉引用，见Mommsen（1894a），pp.281–283。关于自由，见《信札》 12.5和11.13。

8. 颂词，见ed. Hartel，p. 264，13 ff.；比较《信札》 3.13，8.15，8.31。关于语法学家的报酬，见《信札》 9.21。

9. 对这些问题更详细的探讨，见Heather（1993）;（1994a）。

10. 关于罗马晚期教会权利和财产的积累，见Jones（1964）, c. 22; Wood（2006），尤其是c. 1。与汪达尔人的对比，见Courtois（1955）, 289–310; Heather（2007）;Merrills and Miles（2010）, c. 7。

11. 关于这一威胁，见Ennodius, Life of Epiphanius 122–135。关于意大利贵族，见Barnish（1988）; Schäfer（1991）; Wickham（2005）, 155–168。

12. 对诺曼人的土地掠夺的介绍，见Hooke（1998）; Williams（1991）; Baxter（2007）,c. 7。关于477年前后狄奥多里克的人马流向斯特拉波，见上文。

13. 卡西奥多罗斯《信札》2.15—16。Ennodius, Ep. 9.23.《晚期罗马帝国人物志》 2,677–681收集和讨论了我们的史料来源提到他的其他地方。

14. Bierbraüer（1975）, 23–39，基于普罗柯比关于东罗马征服的叙述中附带出现的信息。

15. Goffart（1980）提出了著名论点［并在（2006）, c. 6中重申］，即并没有土地易手的情况，这一说法赢得了很多追随者。在我看来，他的论点正确的地方在于将税收调整纳入了考虑范围，也是他令人信服地指出了“三分之一区”的概念。但是他坚持认为没有土地易手，这有点走极端，因此很多学者对此做出了回应，见Barnish（1986）; Wickham（1993）; Halsall（2007）, 442–447；以及Riviere（2012）的论文集。

16. Amory（1997）认为狄奥多里克的军队基本上消失在了这片土地上，和Goffart的观点一样，这一观点也有其追随者。Heather（1995）收集和讨论了《信札》中与哥特军队管理有关的各种证据，包括《信札》 5.26–27（召集皮切诺和萨莫奈的哥特人来领取他们的礼物）；5.36（书面的解散令）；8.26（列蒂的队伍选择自己的首领）。

17. 《哥特史》 60: 313。

18. 精彩的讲述见James（1988）, c. 3; Wood（1994）, c. 4。争论的焦点在于时间上的细节和苏瓦松周围群体的大小。

19. 《信札》 3.1.2—3。

20. 《信札》 3.2.3—4。

21. 《信札》 3.5.2—5。

22. 《信札》 1.1。

23. 以前的学者试图确定狄奥多里克作为意大利统治者的准确制度地位，如Jones（1962），但这最终证明是一项无望的任务。Prostko-Prostynski（1994），c. 1 and 131 ff. 收集和讨论了不同谈判回合的可用证据，我在这里大致遵循的是他的重构。有一点我不是很确定，即君士坦丁堡是否正式同意狄奥多里克实际上所做的一切，如雕像的摆放和欢呼仪式。在我看来，这无法确定。

24. 关于阿玛拉弗里达的婚礼，见普罗柯比《战史》3.8.12。关于信件往来，见卡西奥多罗斯《信札》5.43—44。

25. 参见Wolfram（1988）, 320 ff.。

26. 《信札》 3.2.1，关于计时器，见1.46.2—3。Shanzer and Wood（2002）中有对阿维图斯部分作品的精彩翻译，有助于不通拉丁语的读者进一步了解勃艮第王国文化和政治的重要方面。

27. 《信札》3.4.1—2; 2.41.2。

28. 对西班牙的征服和对国库的集中管理，见普罗柯比《战史》 5.12.33 ff.。公元511年后，在卡西奥多罗斯卸任财务官之前，对包括西班牙在内的地区的集中管理，见《信札》5.35和39。

29. 关于这次会议，见Life of Caesarius 1.36–43，译文见Klingshirn（1994b）。Klingshirn（1994a）, 124及以下详细介绍了这些会议。

30. 《拉丁铭文选》827。

31. 《哥特史》33. 174—175中提到了欧塔里克。《瓦勒西阿努斯匿名著作》14.80对他的粗野进行了评价。人们经常认为狄奥多里克的外孙、西哥特国王阿拉里克二世的儿子阿马拉里克将会统治西班牙，但是见下文。

32. 介绍阿卡修斯分裂背景的作品汗牛充栋，但是请参考Allen（2000）; Gray（2005）; Millar（2006）, c. 4。

33. 有完整参考文献的更加详细的介绍，见Moorhead（1992）, 194–200。参照Noble（1993）; Sotinel（2005）。

34. 关于卡西奥多罗斯的《编年史》，见O’Donnell（1979）, 36–43。《信札》8.1.3中提到了查士丁对欧塔里克的收养；关于这一行为的重要性，见Claude（1989）。

35. 这些失败早已被注意到，《瓦勒西阿努斯匿名著作》 14.83给出了这样一个解释（狄奥多里克去世之前打算发动对天主教徒的迫害的说法也源自这里）。参考Momigliano（1955）; Moorhead（1992）, c. 7。

36. Momigliano（1955）；从那以后，关于罗马和拉韦纳分裂的说法就一直很有影响力，例见Moorhead（1992）, c. 5。

37. 《信札》6.6对政务总管的工作提供了很有帮助的描述。《晚期罗马帝国人物志》2, 233—237收集并探讨了关于波爱修斯的职业生涯的史料。

38. Matthews（1975），cc. 1–2对“悠闲”这一概念进行了精彩的阐述：精英这种追求理性和文化的理想，与希腊–罗马人对于使其优越于其他民族的文化特征的自我理解是紧密相连的。见上文。

39. 关于波爱修斯，见《信札》1.10；关于贡多巴德，见《信札》1.45，关于克洛维，见《信札》2.40。关于叙马库斯和狄奥多里克，见《信札》1.23; 2.14; 4.6; 4.22;4.51。

40. Marcellinus Comes ad a. 508. Croke（2001）很好地介绍了这位编年史家和他的人脉。

41. 《哲学的慰藉》的译文见Stewart et al.（1918）。该书闪烁其词，我怀疑波爱修斯是故意为之，因为在写作该书时，他还抱有幻想，希望最终能够有好的结果。很多历史学家费心去解读，但是它并没有把我们想知道的事告诉我们。见Chadwick（1981），尤其是56 ff和c. 5, 还有Gibson（1981）中的多篇论文。

42. 紫袍家族，见上文。关于狄奥达哈德，见《信札》8.23; cf. 9.25.9。关于利古里亚人的骚乱，见《信札》8.16。关于图鲁因，见《信札》8.9—11；《信札》8.3明确承认，曾经考虑过让阿马立家族之外的人来继承。

43. 关于这种分裂，见普罗柯比 《战史》 5.13.4 ff; cf. ibid. 5.12.50–54。关于提奥迪斯在西班牙的崛起和独立，见约达尼斯《哥特史》 58.302。

44. 更详细的叙事重构，见Wolfram（1988）, pt 5, c. 10。

45. 见《信札》8.1.3；对于狄奥多里克晚年问题的详细讲述，见Moorhead（1992）,c. 5。

46. Barnish（1990）充分探讨了两人之间关系的证据。

47. 例如，一个名叫皮特扎斯的人率领定居在萨莫奈的一半哥特人对贝利萨留投降，见普罗柯比《战史》 5.15.1–2。关于当地整个群体内部独立的权威结构，Heather（1995）提供了更广泛的证据。Amory（1997）试图表明狄奥多里克的追随者并没有形成坚实的群体认同，他依据的主要是贡狄拉斯（Gundilas）的例子，他在战争中显然为了一时的考虑而改旗易帜（见其App. 1, pp. 321–325）。但这完全无法解释为什么拜占庭帝国的征服战争会持续20年之久：Heather（2003）。

48. Heather（2009），特别是cc. 2 and 7更详细地探讨了帝国边缘日耳曼世界的长期变化及其战略影响，并提供了完整的参考文献。

第二部分

“多国的征服者”

第3章

“上帝所赐”

即使按照塞尔维亚的标准，这里也相当偏远。这是一个狭窄的高原，两边是两条小河形成的陡峭河谷。从远古时代起，通过巴尔干半岛这一地区的交通主要依靠两条通道，一条是摩拉瓦河—瓦尔达尔河（Moravia-Vardar）走廊，另一条从古老的奈苏斯（今天的尼什）通往斯库皮（Scupi，今天的斯科普里），但是它们都没有经过这个高原。在潘诺尼亚哥特人的车队长途跋涉，向南进入东罗马的领土时，他们走的就是这两条道路。在这附近，种一些作物是可行的，但是高原周围的气候和土壤条件从来不足以养活非常密集的人口。

尽管存在这些缺陷，君士坦丁堡当局还是于6世纪中叶在其上建造了一座全新的宏伟城市，当时距离狄奥多里克在拉韦纳去世还不到10年。这里的考古挖掘工作仍在继续，目前由一个法国和塞尔维亚联合团队进行；迄今为止的发现已经非同寻常。高原的西北端是城市最后的堡垒，即其卫城，四周是因为地形而很不规则的巨大城墙，上面点缀着五座巨大的塔楼，只有一个门。在卫城内部，有一个巨大的教堂建筑群（长方形教堂、洗礼堂和礼堂），对面隔着一个带柱廊的广场，是一个同样宏伟的世俗权力所在地。这座堡垒四周是另外一组城墙，这些城墙划出了大约5公顷范围的上城区，上城区有两个城楼。在这里，罗马人建造了更多的教堂，还有拱廊街道和一个巨大的谷仓，另有几座富丽堂皇的住宅和古代世界管理水的一些常用设施，包括一座水塔。如果没有水塔，在这个十分干旱的地区就不可能有密集的人口。在城墙外面，下城区占地3公顷，到目前为止，挖掘工作已经发现了更多的教堂、一个巨大的水槽和两个巨大的浴池。

催生这一巨大土木工程的不是经济、行政、宗教或战略上的需要，甚至也不是后勤上的需要。事实上，它是为了纪念一个伟大人物——查士丁的外甥查士丁尼一世。前文讲过，查士丁的升迁解决了阿纳斯塔修斯死后的继任危机，而狄奥多里克之所以会促成阿卡修斯分裂的终结，也是为了他的缘故。这个高原曾是查士丁尼亚纳普里马（Justiniana Prima）的所在地，今天的名称是察里琴格莱德（Caricingrad，意为“王后之城”），建造这个城市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纪念这位历史伟人默默无闻的出生地——不过，他的出生地似乎在附近，而不是在这个高原之上。不仅这座城市就这样拔地而起，而且世俗和教会的机构分布也围绕它重新安排。535年颁布的一项法律宣布，皇帝打算将伊利里库姆行政区（负责管理巴尔干半岛西部和希腊）的首府从古老的塞萨洛尼卡迁往查士丁尼亚纳普里马，而这座城市的新主教被赋予了都主教的权利，成为整个巴尔干半岛北部的高级教士。注

就纪念罗马帝国历史上最杰出的人物之一而言，察里琴格莱德是完全合适的。查士丁尼为大众所熟知，但如果他生活在公元1世纪，应该会更加广为人知。他像卡里古拉（Caligula）、尼禄（Nero）和克劳狄（Claudius）等人一样，激发着人们的想象力。他于527年即位，当时狄奥多里克可以说尸骨未寒。历史学家认为他是罗马历史上最具远见卓识（可能也受了不少误导）的皇帝之一。在许多人看来，在公元476年之后君士坦丁堡的统治者中，只有他真心想把罗马的实力恢复到其古代辉煌时期的巅峰状态。人们常说，他登上王位时，怀着一种强烈的愿望，想要重新征服西罗马那些失去的省份，然后他开始着手此事，同时还利用空闲时间对整个罗马的法律体系进行彻底的改革。但是，如果说在他生命的最后，罗马的疆土得到了极大的扩张，他修订的罗马法对中世纪和近代早期的欧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那么同样老生常谈的是，和所有的反英雄一样，查士丁尼留给后继者的遗产是一个被下了剧毒的金杯。在他死后两代人的时间里，东罗马不仅失去了他所征服的大部分地区，而且失去了其大部分领土，在面对最可怕的失败时，又陷入了最深层次的政治、经济甚至意识形态的危机。

对查士丁尼的评价褒贬不一，最重要的原因是，在他那个时代最伟大的历史学家的著作中，查士丁尼的形象前后矛盾得惊人。这位名叫普罗柯比的历史学家是来自该撒利亚的律师。他的家乡是古代晚期一个繁荣的港口城市，其中大部分正通过大规模的发掘显露出来，尤其是港口区域。在这里，已经有一代海洋考古学家在地中海东部温暖的水域里游泳，享受夏季。关于自己的背景，普罗柯比并没有告诉我们太多具体信息，但他显然属于贵族地主阶级，因为从其作品可以看出，他在古希腊语言和文学方面受过广泛的教育，在罗马帝国晚期，这是他这个等级以及更高等级的标志，因为这种教育完全是私人的，只有他们才负担得起。根据他自己的著作，他似乎是查士丁尼最著名的将军贝利萨留的法律顾问（assessor），他后来似乎转向了法律研究，而法律研究的成本再次证实了他优越的出身。在普罗柯比的陪伴下，贝利萨留先是领导了533年查士丁尼对非洲汪达尔人的征服，随后又在意大利战争的初期阶段领导军队。6世纪30年代后期，他的成功使卡西奥多罗斯注定要来到君士坦丁堡。

《秘史》

普罗柯比用笔（也可能是用声音，因为当时口述很常见）给我们留下了三部不同的作品。其中一部规模宏大，比其他两部要长，讲述的是从527年到552/553年之间查士丁尼的战争。没有人会认为这是对查士丁尼统治的充分描述（甚至作者本人也不会），它的写法符合罗马晚期写作这类历史的惯例，很有特点。你不能使用“现代”词汇，正式说起来，就是不能用任何古典时期的希腊语法奠基人没有认可的词，而这就意味着需要找到其他表述方式来描述基督教主教、神父、修士等等，因为在公元前4世纪和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是没有主教、神父、修士的。在开始讲重点之前，还有必要说些引子性质的题外话，这些话未必是为了教导，有时只是为了娱乐和炫耀知识。主题也是严格规定的，比如说不能再说新流行的基督教，而是要严格关注军事和外交史。渐渐成了常规甚

至必须的做法是：作者应该亲身参与其中的一些事件，这既是为了让读者更加感兴趣，也是为了保证他在文章中讲的是事情的真相。注普罗柯比的战争叙事提供了大量的细节信息，这些信息的真实性还没有人提出过理由充分的质疑。事实上，他作品的信息量是如此之大，除非你非常努力，否则在写查士丁尼统治期间的历史时，人们往往只是用自己的话复述普罗柯比所写的内容，外加一点评论。

普罗柯比的第二部著作同样难懂，但难懂的原因不同。这部著作通常被称为《论建筑》，全书洋洋洒洒四大卷，描述了皇帝所批准的建筑工程。它同样包含很多信息，但也有一些潜在的严重问题。首先，至少就现代人的口味而言，普罗柯比阿谀奉承得太厉害了。在这部作品中，皇帝完全是帝国宣传中所暗示的样子：受命于上帝，圣洁而虔诚，他的许多不同的建筑作品既是帝国的装饰，又是帝国的防御。历史学家长期以来一直关注书中宣称的建筑活动的规模，其中一些是没有问题的。第一卷的焦点是君士坦丁堡，即今天的伊斯坦布尔。在这里，依然可以看到当年查士丁尼的一些建筑，尤其是圣索菲亚大教堂，几乎和普罗柯比当年描绘的样子一模一样（在查士丁尼统治期间，558年，原来的圆顶在强烈地震中倒塌，不得不加以重建）。但在第三卷，还有更为突出的第四卷，普罗柯比基本不再像起初那样做出精确而多样的描述，而是列出一份份名单，这些名单非常长，让人怀疑是否真有那么多建筑被建成。历史学家的确是一种反暗示的动物；20世纪80年代出现了一种趋势，认为被普罗柯比归于查士丁尼的很多建筑，实际上是在查士丁尼的前任阿纳斯塔修斯统治时期建造的。这种看法的一个重要立论基础，是一个关于波斯边境要塞达拉（Dara，下一章将详细介绍）的论据；最初，普罗柯比就和贝利萨留一起驻扎在达拉，他对这里据说是查士丁尼所建的东西做了详尽而具体的描述。有人认为其中大部分是无稽之谈，几乎所有的东西都是阿纳斯塔修斯建造的，这里的城防建设肯定是从他开始的。如果普罗柯比在他曾经去过的某个地方犯了如此严重的错误，我们为什么要相信他关于大片土地上无数其他建筑的说法呢？毕竟，他从来没有到过那些地方。

值得庆幸的是，总的来说我们不必如此悲观。如果你去达拉的话，现在还能看到的建筑的确有很多是阿纳斯塔修斯建造的，但是普罗柯比所描述的查士丁尼建的建筑也在那里，看起来的确像是第二阶段的建设。它们中有些现在已经消失了，但在格特鲁德·贝尔（Gertrude Bell）和其他人在19世纪末与20世纪初拍摄的黑白照片中却依然可见。总体说来，普罗柯比对察里琴格莱德的描述与考古学家发掘出的东西之间存在着令人愉快的一致性。总之，看起来普罗柯比的《论建筑》中有大量的夸张，但并非完全虚构。虽然查士丁尼肯定很乐意为他统治时期完成的建筑居功，即使是由阿纳斯塔修斯开始的，但是还没有人发现普罗柯比把某些根本就不存在或肯定是别人建造的东西归功于查士丁尼。尽管《论建筑》中的阿谀奉承令人作呕，但其总体观点并非完全虚假。查士丁尼确实建造了大量的建筑，而普罗柯比提供具体细节的那些很可能就是他所记录的样子。(注)

就普罗柯比对查士丁尼统治的描述而言，关键问题既不在《战史》中，也不在《论建筑》中，而是在他的第三部，也是最短的作品《秘史》中。10世纪晚期拜占庭一位百科全书编纂者见过这本书，但后来它就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直到梵蒂冈图书馆发现了一份单独的手抄本，并于1623年在里昂将其出版。但是找这本书时遇到的麻烦只是小问题，更麻烦的是它的内容。《战史》和《论建筑》在某种意义上都属于古代文学中公认的范畴，分别是仿古典风格的历史和颂词，因此我们基本上知道如何去阅读，而《秘史》则不然。它的内容完全有可能推翻普罗柯比在他那些长得多的作品中所说的一切。

《秘史》所带来的问题（如果这是问题的话）事实上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谜题，它最终呈现在几个互相交织的层面。这本书的序言写明了普罗柯比写作这本书的确切原因。时间是在6世纪50年代初，除了《战史》的最后一卷之外，他已经写完并出版了他所有的作品，但是他告诉我们：

以前叙述许多事件时，我不得不隐瞒导致这些事件的原因。因此，在本书中，我有必要不仅披露那些至今仍未披露的事情，还要披露那些已经描述过的事件的原因。注

由于害怕“最残酷的死亡”，害怕被皇帝的“大量密探”当场发现，普罗柯比对于征服战争的讲述是高度净化了的。现在他承诺要将真相告诉我们，全部的真相，并且只有真相。

到目前为止一切都很好，但是你继续读下去，就会发现普罗柯比所说的“真相”到底是什么：他痛斥了他的前雇主贝利萨留将军和他的妻子安东尼娜（Antonina），但是他的主要批判火力留给了查士丁尼皇帝本人和他的妻子狄奥多拉（Theodora）皇后。先是查士丁尼：

这人既是作恶的，又容易陷在罪恶里，他们管他叫道德败坏的人。对和他谈话的人，他从来不会主动说真话。在他的每一句话和每一个行为背后，都隐藏着诡诈的意图……他毫无真诚可言，狡诈，虚伪，善于掩饰自己的愤怒，是一个狡猾的两面派，一个完美的演员，他可以把假装持有的观点表演出来，甚至能够一把鼻涕一把泪……总之，他自己没有钱，也不让世上任何人拥有它，仿佛他不是为贪婪所害，而只是被对有钱人的嫉妒所折磨。因此，他毫不在乎地将财富从罗马世界中排除出去，让所有的人都很贫穷。注

狄奥多拉也留下了很多不尽人意之处，似乎也留下了很多想象的空间：

她刚一长大成人，马上就和从事舞台表演的女人混到了一起，很快成为妓女，并且是被古时候的人称为“步兵”那种妓女，因为她既不会吹笛，也不会弹琴，甚至连跳舞都不会，但是她把自己的美卖给她遇到的人。

在普罗柯比看来，驱使狄奥多拉这样做的并不仅仅是经济上的需要：

> 从来没有一个人像她那样成为各种形式的享乐的奴隶；有许多时候，她和10个或是更多的青年一同赴席。他们都是身体健壮、善于淫狎的。她会和所有参加宴会的人一起淫乱，通宵达旦，等到他们都累得不行了的时候，她就到他们的侍从那里去，一共大概有30个人，挨个和他们淫亵。

她曾抱怨大自然没有赋予她更多寻欢作乐的方式，这还没有算上她那场著名的舞台表演：她让人把麦粒撒到她的私处（如果她还有什么“私处”可言的话——按照普罗柯比的说法，实际上她的这一部位已经完全谈不上“私处”了），让鸡去一粒一粒地啄食掉。与此同时，她意志坚强，聪明绝代，用身体和心计成功地俘获了查士丁尼的心；为了娶她为妻，查士丁尼甚至改变了法律。(注)

他们两个组成了完美的犯罪搭档。他们一样贪婪，都不能容忍任何违背他们意志的行为，所以他们联合起来，毁灭了他们接触到的每一个人，也就是整个帝国。这一结果也不完全是人类的愚蠢行为造成的。因为查士丁尼的母亲曾承认：

> 在她怀上查士丁尼之前，有个恶魔来找她。这个恶魔是看不到的，却让她产生了一种和男人交媾的感觉，然后恶魔就消失了，一切恍如一场梦。有些深夜和皇帝在一起的人断言他会突然从宝座上起身，四处游荡，走来走去（事实上，他从来不习惯于久坐）。查士丁尼的脑袋会突然消失，而其身体的其他部分会依然不停地来回游荡……还有一个人说，他侍立在查士丁尼身边时，突然发现查士丁尼的脸变成了一个没有五官的肉团，眉毛眼睛都不在其应有的位置了。

一位神职人员最终确认了他的魔鬼身份，他到君士坦丁堡觐见皇上，却无法进入正殿，因为他看到坐在那里的是魔鬼之王而不是皇帝。原来这个魔鬼早就和狄奥多拉达成了协议，有了他做情人，她就再也不缺钱了。㊟这就是我们读到的查士丁尼统治时期所发生事件的原因和真相。当“驱魔人”遇见“深喉”，当他们心中只有贪婪，结果除了人类的灾难，还会是什么呢？

显然，所有这些都让人怀疑普罗柯比对查士丁尼的描述是否可信。他在《论建筑》中告诉你，皇帝是上帝指定的，是正义的，几乎是绝对可靠的，当圣索菲亚大教堂在建筑过程中遇到亟须解决的难题时，皇帝甚至通过一个梦从上帝那里得到了解决方案；但是同一位作者又告诉你，这个皇帝简直是《凶兆》的前传。对此，我们很难一下子明白该怎么理解。《秘史》一边声称揭示了查士丁尼政权的全部和最终真相，一边却包含了对狄奥多拉的色情描写以及对查士丁尼的妖魔化描写，我们该如何调和这种不同寻常的并置呢？在我看来，《秘史》中有很多线索表明，普罗柯比是在逗他的读者。这并不是说他在诋毁这一政权时所说的话言不由衷，而是说他不希望我们直接把他书上内容的字面意思当作“真相”。一个例子是对狄奥多拉那段生动的色情描写。对于这段描写，尤其是那些鸡，在过去的25年里我所教过的学生中，至少有95%的人的反应是开怀大笑（只有少数在非常封闭的背景中长大的人有点震惊）。判断另一个时代和地方的文化价值总是有点危险，但是我非常确信，笑声正是普罗柯比追求的反应。这并不意味着这种描绘没有严肃的目的，要知道，嘲笑是杀敌人威风的最有效策略之一。在狄奥多拉的例子中，这一描绘彻底将她变成了帝国宣传的形象的对立面。她不是神选的贤惠皇后，而是一个贪婪任性的花痴。她在君士坦丁堡建了一个改造过的妓女的收容所，普罗柯比尤其喜欢与此事有关的一切讽刺。㊟

《秘史》对查士丁尼的刻画也是如此。统治帝国的不是上帝选择的皇帝，而是魔鬼之子。我相信他这么写也是为了博我们一笑。对于无头之身和模糊面目的描述都很有趣，如果你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其措辞十

分用心，这表明我们不能按照字面上的意义来理解：文中多处出现“好像”“据称”“据说”这样的字眼。普罗柯比对于查士丁尼长相的荒唐描述更是如此：

> 他个子不高，也不特别矮，中等身材，不瘦，还有点胖。他是圆脸，并不难看。即使禁食两天，他的面色依然红润。如果用一句话来形容他的整个外貌，我要说，他非常像韦斯巴芗（Vespasian）的儿子图密善（Domitian）。

普罗柯比能够知道查士丁尼长得像图密善，这并不简单。图密善是终极恶魔，是整个罗马帝国历史上最糟糕的暴君，他在古代的名声比卡里古拉和尼禄要差得多，而卡里古拉和尼禄则更为现代人所熟知。普罗柯比告诉我们，图密善声名狼藉，以至于民众不仅把他的身体撕成碎片，而且在他死后，元老院下令毁掉他所有的雕像。普罗柯比是怎么知道查士丁尼长得和图密善一样的呢？

> 图密善的妻子把他的肉块收集起来，一块块准确地拼在一起，一一对应起来，把全身都缝起来。然后，她把它展示给雕刻家，吩咐他们用一座铜像来体现她丈夫的命运……她把铜像立在通往卡皮托广场的街道上……直到今天，它既表现了图密善的特点，也反映了图密善的命运。

如果你还没有笑，我真的认为你应该笑了。整个故事完全是一派胡言。要知道，当普罗柯比为君士坦丁堡的读者写下这些话时，他所说的这座雕像正安全地立在遥远的罗马，因此谁也无法去核实。我们见到的，仍然是普罗柯比想象中的精彩世界。他不过是用了一个聪明的办法，好把查士丁尼和帝国历史上最坏的暴君相提并论。换句话说，在《秘史》中，我们看到的是高质量的政治讽刺；罗马晚期还有一些作者用了这种办法，利用性与妖魔化来贬低和摧毁目标人物的公信力。[注]

关于查士丁尼时代这位伟大的历史学家，我们可以从上述情况得出两个宽泛的结论。一个比较令人欣慰，另一个则不然。一方面，我很有信心，我们可以大致了解普罗柯比对查士丁尼政权及其成就的看法。我想，就像许多其他的东罗马人一样，普罗柯比深受533—534年在北非的第一次胜利的鼓舞，甚至可能因此决定投身历史写作，因为他作为贝利萨留的助手深入参与了这次行动，但他的热情很快就会被深深的幻灭感取代，因为此后战争在整个6世纪40年代一直持续，最迟到了550年前后。在那以后，他对这个政权及相关的一切一直怀有无法化解的敌意。因此，我们可以将《论建筑》仅仅看作一篇可能是受委托而写的颂词。

然而另一方面，从《秘史》中鲜明浮现出来的聪明而顽皮的普罗柯比的形象却不那么令人欣慰。这似乎有些矛盾，其实不然。作家越聪明，尤其是像普罗柯比这样见多识广的作家，就越难摆脱自己巧妙构建起来的世界观。历史曾被视为修辞学的一个分支，对于身处古代修辞学传统中的作家而言，这更是个问题，他们总是会把来自古代权威文本的典故编入他们的著作，因为他们和他们的潜在读者接受的都是这种教育。有时用的只是一些文字典故，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仅仅说明特别巧妙的短语往往会被记住并传承下去，这有点像《哈姆雷特》中数量惊人的谚语，早在你看到或读到这出戏之前，你就已经从其他地方知道它们了。但是作者也可以利用典故来搭建额外的意义层。例如，作者在他的文章中写下一个著名的引语的一半，当读者添加另一半时，就会扭曲甚至颠覆文章表面的意思（就像在正面陈述结尾加上“才怪”一样，只是复杂一些；“查士丁尼是一位神所任命的神圣皇帝，才怪”，这句话可以很好地总结《秘史》的内容）。对于像普罗柯比这样受过修辞学训练的古代作家，麻烦在于，他们十几岁时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专业指导下梳理古代文学，而我们今天大多数人不是这样。因此，要完全确定你领会了这样一位作家的全部意图是极其困难的。你面对的作者越聪明，他的意图就越难理解。在我写作本书时，我认为“陪审团”仍在考虑对普罗柯比的“裁决”。他是一个聪明机智的作家，这样的判断似乎是必然的。但究竟有多聪明呢？最近有人指出他实际上非常聪明，在公元6世纪的君士

坦丁堡，他为一群志同道合的分析人士构建了基于哲学之上的对查士丁尼政权的批判，而不仅仅是表达一种基于压倒一切的厌恶感的讽刺。虽然这个观点可以从普罗柯比的作品中构建出来，但它可能在作者本人的意图之外加上了一层没有根据的深意。由于缺乏独立的证据来证明这类读者的存在，所以至今还没有定论。(注)

然而，幸运的是，我们还有另一批材料可以使用。与普罗柯比所探讨的征服战争相比，查士丁尼统治期间对罗马法的全面重新修订无疑具有更大的意义。从本质上讲，法律文献比普罗柯比的标准历史叙述更难处理。因此，尽管其体量巨大，或者可能正是因为其体量巨大，法律文献并没有得到过那么详细的讨论。然而，如果解读的角度正确，法律文献就能为我们了解查士丁尼政权（尤其是其最初几年）提供一种很好的、幸好不同于普罗柯比的视角。

《查士丁尼民法大全》

后来证明，查士丁尼对罗马晚期法律的改革，对欧洲大部分地区而言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当时并非如此，因为当时的君士坦丁堡连一个西罗马故地的地区都没能控制，欧洲的其他一些地方更是从来就没有被罗马统治过。然而，查士丁尼的工程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从本质上说，它通过编纂法典，保存了近一千年罗马法理学中精心挑选出来的内容。这是以一种十分系统的方式完成的，由此产生的文本就是《查士丁尼民法大全》（*Corpus Iuris Civilis*），对于中世纪至近代早期中欧和西欧许多正在形成的法律制度来说，它提供了一个整体模式和许多具体的法律条文。因此，正是多亏了查士丁尼，罗马法的研究直到最近一直是许多大学法律课程的核心（例如，在20世纪90年代，牛津大学才将其从必修课降为选修课）。查士丁尼的法典是如何产生如此惊人的影响力的呢？这将是本书最后一部分的核心内容。但是在6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当它被编撰出来的时候，这一切都是无法预测的。现在重要的是

这一工程在当时的性质和意义。

实际上，法律改革很快成为查士丁尼新政权最重要的内政工程。527年8月1日，他在舅舅查士丁去世后独掌大权。这一工程分为几个部分，第一部分早在528年2月13日就宣布了，当时距新皇帝登基仅6个月。作为罗马人的统治者，如果你想高声宣布自己是适合统治的人，那么，至少在罗马国家的内部事务方面，你最好致力于法律改革，原因有二。

首先，我们已经看到狄奥多里克对这一点的反应，罗马帝国的国家意识形态早已认定，成文法的存在是罗马世界作为受神启示的更高级人类社会的唯一因素，罗马远比任何已知或可想象的邻国优越。正如530年12月15日查士丁尼在第二阶段内容（后来的《学说汇纂》）的编纂令（*Deo Auctor*e）中说的那样：

> 在任何领域，没有比法律的权威更值得研究的东西了，因为他将神与人的事安排妥当，并除去一切的不义。(注)

将成文法认定为罗马人优越地位的关键组成部分，这是一种习惯，这种习惯直接源自古希腊人对其社会为何优越于其他所有社会的思考。然而，希腊人不是仅仅重视一个因素，而是同时重视几个相辅相成的因素，尤其是希腊人非常强调强化的教育体系的价值（普罗柯比就是在从希腊教育体系沿袭下来的体系中接受训练的）。这样的教育体系培养的是具有高度道德敏感性的个体，他能够在面对人生沧桑时看到自我控制的价值。因此，他愿意让个人意愿服从于成文的规章制度。在这种思想体系中，一个人在愿意接受成文法之前是否已是优秀的人并不完全清楚。然而，晚期罗马帝国的意识形态逐渐抛弃了其他因素，使法律成为罗马人无可争议的核心优势。我们5世纪以后的史料在正式比较文明的罗马社会和野蛮社会（甚至包括高度复杂的波斯社会）时，都表示使前者显得如此优越的因素就是成文法的存在。一位罗马作者借西哥特国王

阿陶尔夫（Athaulf）之口说过一句著名的话，即他之所以放弃用哥特帝国取代罗马帝国的想法，正是因为他的追随者不能遵守成文的法律。因此，他能想到的最佳选择是使用哥特人的军事力量来支持罗马。另一位作者讲了一个同样著名的例子：一个罗马商人加入匈人之后，生意兴隆，但是当他回忆起成文法律所能维持的整体生活质量时，不禁潸然泪下。在后罗马时代的整个西方世界，颁布一部成文的法典，无论它是多么虚幻和不切实际，都等于宣布你的政体属于文明的基督教国家俱乐部。(注)

为什么法律能够从一系列古老的因素中脱颖而出，扮演这个主角呢？这并非我们要讲述的重点，但我的直觉是，罗马帝国意识形态的基督教化起了作用。关于希腊优越性的古老意识形态是赤裸裸的精英主义。只有受过充分教育的人才是出类拔萃的，而这种教育是私人的，费用高昂，因此根据定义，只有少数人（一般为男性）才可以加入这个精英俱乐部。然而，基督教认为，每个人（不分男女）都有灵魂，都可以被拯救，所以古希腊罗马人的优越意识太过狭隘。如果放弃其余的意识形态工具，只专注于法律，就能克服这个问题，因为法律及其定义的社会结构赋予每个人一个位置。有些人拥有更大的权威和权力，有些人比较卑微，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这样的思想在基督教帝国更行得通。遵照福音书的文本，这个基督教帝国坚信这样一种中心论点，即每个人都可以得救。不管怎样，帝国晚期十分重视成文法，认为它是罗马优越性的关键，这意味着对于任何政权而言，不可能有比进行法律改革更雄心勃勃的举措了。

查士丁尼选择法律改革的第二个原因需要更多的梳理。这是从一个简单的认识开始的，即到了527年夏天，改革罗马法已成为一项肯定需要做的工作。当他登上皇位时，法庭上可以引用的权威法律的潜在来源数量太多，也过于多样，较为复杂的案件难以解决。然而，我们不能仅仅这样就得出结论说，新皇帝是一位有远见的统治者，为了臣民的利益推行了全面的法律改革。要知道为什么，我们需要更深入地探讨这个问题。

公元6世纪（事实上，在此之前的几个世纪就已如此），人们在帝国的法庭上通常参照两种主要类型的法律权威：一种是历代皇帝或多或少正式授权律法师（所谓的法学家）撰写的权威性法律著作；另一种是由皇帝直接做出的不同种类的裁决，包括官方的一般裁决，以及最初可能只与特定案件有关，但是具有更普遍意义的裁决。查士丁尼的改革分为三个阶段，解决了每种材料本身所构成的不同问题，以及当你试图同时使用它们时产生的更大的问题。最简单的是第三个阶段。这是最后一个阶段，其成果是一本新的法学入门教材，反映了工程其他阶段对法律的修订。在可能的情况下，它还严格遵循了2世纪的法学家盖尤斯为学生所著的手册，收入了这部早期作品约一半的内容。[注]然而，如果说完成最后这本教科书是一项相对容易的任务，那么在它之前的工作要繁重得多。

改革的第一部分于528年2月启动，其任务首先是收集自上次采集（438年的《狄奥多西法典》）以来新颁布的帝国法令，涵盖的时间范围从公元300年开始。然后，还要将从90年的帝国立法中选出的新内容与现存的其他三部帝国法典结合起来，分别是《狄奥多西法典》，以及3世纪90年代由赫莫根尼（Hermogenianus）和格列高利（Gregorianus）编纂的两部法典。后两部法典包含了可以追溯到2世纪30年代的一系列帝国法律。这项工作由一个委员会负责，该委员会由8名高级行政人员兼政府高级官员和2名执业律师组成。

他们的大体工作范围已经确定，他们遵循的是《狄奥多西法典》和后来编纂的法典所规定的采集方法：

1. 首先抛弃所有只适用于某一个具体案件的法律，从而确定具有实际或潜在普遍意义的法律（这里所遵循的是拉丁语中的generalitas，即“普遍性”这一概念）。

2. 随后编辑这些选出来的法律，先抛弃皇帝在宣布裁决之前发表的大部分自我辩护的胡扯。

3. 然后，法律条文中涉及不同主题的部分分开，因为皇帝经常颁布涉及多个主题的复合法律。

4. 最后，在编号的各卷中，将编辑过的摘要安排在主题章节标题之下，各个章节中按时间顺序排列。

这部分比较简单，因为编辑方法，甚至大部分卷和章节标题都可以遵循旧法典的已有模式。更困难的任务是决定旧法典中哪些内容应该保留下来，以及如何将它们的材料与委员会刚刚制定的法律条文结合起来。

这个委员会证明了自己能够胜任这项任务，他们在一年多一点的时间内完成了新的法典，法典于529年4月7日正式公布。相比之下，当年编纂《狄奥多西法典》的委员会花了9年时间才完成了前述任务中的第一个，他们甚至没有尝试把这些法典集合起来。虽然，公平地说，查士丁尼的官员采用了新的官僚化收集方式，又有一个可以遵循的模式，工作会简单一些。(注)但是在13个月的时间里编写新法律并将所有的帝国立法整合到一起，这个速度是惊人的。

我猜想，正是这种速度促使查士丁尼在530年12月成立了第二个委员会，以解决法学家的著作这一更大的问题。《学说汇纂》的编纂令提出了这些原则：

因此，我们命令你们阅读和研究古代学者（法学家）所写的罗马法的书籍，最受尊敬的皇帝授予他们制定和解释法律的权力；你们要掌握其全部精髓，尽可能地消除所有重复和矛盾，汇编出一部足以取代它们的作品……一旦成书，书中一点可以删减的东西也没有……在这50卷中，所有古老的律法（处于混乱状态将近1 400年，现在被我们纠正了）就像被一堵城墙保卫着，什么也不会遗漏在外面。所有的法律作者都会受到同样的重视，任何作者都不享有任何特权，因为没有人在每个方面都更好，也没有人在每个方面都更

差，而只是在某些方面更好或更差。(注)

新委员会的主持工作交给了参与前一项工作的律师特里波尼安（Tribonian），显然他在完成上一工作的过程中脱颖而出。从529年4月新法典的公布到530年12月新项目的宣布之间，他肯定一直在做准备工作。此时他们已经知道，下一步著作将由50卷组成，他们研究法学家著作的原则被认真确定下来：不能有先入之见，每一个观点都要根据是非曲直来权衡。

准备工作不足以降低这项任务的难度。根据委员会自己的说法，他们必须阅读总共2 000本书和300万行的法律意见。最后，他们把这些浓缩到50卷和15万行，但这远不能说明问题。法学家的材料不仅数量庞大，而且极其杂乱。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此类法律著作，几乎都经过了特里波尼安及其同僚的修订，他们赋予了这些材料从前所无的秩序和逻辑。关于律师，要记住的关键一点是，在很大程度上，他们是靠客户谋生的，而客户聘请律师是为了打赢官司。打官司（尤其是非刑事案件，而法学家提供意见的大部分是非刑事案件）代价高昂，其目的在很大程度上是保护或获得某种经济利益。因此，不足为奇的是，特里波尼安及其同僚发现，法学家材料的主要问题并不是其数量，而是主要法学家之间经常存在分歧。这并不奇怪：许多分歧之所以产生，无疑是因为需要为特定客户提供巧妙的论据。因此，整理法学家的著作不仅涉及编辑问题，而且涉及智力决策问题。对于关乎某一具体问题的相互冲突的意见，委员会将如何取舍？

这是个大问题，因为几百年来法学家发表的相互对立的意见造成了一种混乱，而这种混乱正是付费律师的天堂。在这方面，你不妨想一想在狄更斯的《荒凉山庄》中，没完没了的诉讼程序是怎样最终吞噬了争议财产的价值的。罗马法是一个“丛林”，“律师”就是其中的“老虎”，其中最优秀的就是那些最擅长利用法学家的意见和帝王的裁决为其客户需求服务的人，他们可以得到天文数字般的报酬。(注)

不了解这个背景，就不可能理解查士丁尼法律改革的第二个要素实际上是一个什么样的高风险策略。要想取得成效，它必须突破传统罗马法律权威的难题，并以此挑战从现状中获得巨大利益的既得利益者。改革是必要的，这一点毫无疑问，但是这项任务要面对的现实问题吓退了狄奥多西的法律团队，到了5世纪30年代末，他们已悄悄放弃了这部分工作；到了查士丁尼这里，事情并没有变得容易。《学说汇纂》的编纂会不仅提出了合乎逻辑的工作原则，而且也表明了决心。530年12月，查士丁尼政权承诺要大胆地去做以前没有皇帝敢做的事情。

法律改革也不是查士丁尼上台后推进的唯一高风险项目。且不说那些多毛的欧洲蛮族人，东罗马还从希腊人那里继承了一个传统敌人：波斯。3世纪20年代，新的萨珊王朝对今天伊朗和伊拉克所在地区实现了空前程度的中央集权，这预示着罗马将迎来延续两代人甚至更久的政治灾难，其中包括三次巨大的失败和一系列的羞辱，尤其是皇帝瓦勒里安（Valerian）的被俘和随后的展示，这些都被镌刻在“帝王谷”（Naqs-I Rustum）附近的巨大岩石浮雕上。经过50年动荡的政治和行政改革，皇帝们得以将更大比例的国家资源用在他们所希望的地方，在3世纪的最后十年，东部才恢复了平静。在4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还会不时发生进一步的冲突。但是，在4世纪的最后15年里，以及尤其是在5世纪，超级大国之间的周期性对抗让位给了现实的和意识形态上的共存。在其他的前线，这两个帝国都要面对凶猛的敌人，尤其是草原游牧民族。484年，当波斯国王波尔泽斯（Perozes）和他的军队被嚈哒人（Hephthalite Huns）屠杀时，波斯人遭受了相当于罗马人在阿德里安堡的痛苦。这也许只是个传说，但到了6世纪早期，两个帝国都认为，皇帝阿卡迪乌斯（Arcadius）和波斯国王伊嗣俟（Yazdegerd）之间的协议拉开了这段相对友好的关系的序幕。根据这一协议，后者将阿卡迪乌斯的幼子狄奥多西二世收为养子，这样万一阿卡迪乌斯早逝，狄奥多西二世也能顺利继位。这一安排被证明是具有预见性的，因为公元408年，在狄奥多西只有6岁时，阿卡迪乌斯就去世了。

随着游牧民族对双方的威胁最终消失，6世纪初的局面多少回到了

旧的“冷战”模式，争端问题有时通过战争而不是谈判来解决（就像整个5世纪所发生的那样），双方都希望在边境地区给对方制造麻烦，特别是在黑海东端。然而，5世纪时的善意并没有完全消失，522年，当时的波斯统治者卡瓦德斯（Cavades）重新向君士坦丁堡伸出了橄榄枝。他这样做有一个非常特别的理由：他想绕过和自己闹翻了的大儿子，让小儿子科斯罗伊斯（Chosroes）成为继承人。他所做的是诉诸狄奥多西二世和国王伊嗣俟的例子，要求当时在位的查士丁皇帝采取完全一样的行动，收科斯罗伊斯为养子。根据普罗柯比的叙述，查士丁和查士丁尼正要同意这一要求，却从当时的首席法律顾问普罗库勒斯（Proculus）那里得到了一些令人不安的建议：

> 这个使节从一开始就公开而直接地要求这位科斯罗伊斯（不管他是谁）成为罗马皇帝的养子。对于这件事，我希望你们能够这么考虑：父亲的财产本来是属于他儿子的，而虽然各处的法律总是由于性质不同而相互冲突，但是在这件事上，罗马人和所有的蛮族人是一致的，他们都宣告儿子为父亲产业的继承人。如果你愿意，可以采取原来的决定，但是如果你这样做了，你就必须承担所有的后果。

多亏了普罗库勒斯！他大声说出了卡瓦德斯想让科斯罗伊斯统治罗马和波斯帝国的阴谋。经过一段时间的反复谈判，这一要求最终在527年夏天遭到了拒绝，当时查士丁尼已经被封为奥古斯都，实际上已经是共治皇帝了。罗马人并没有完全满足波斯人的要求，而是提议像对待西方继承国的统治者和其他所谓的蛮族人那样，接受科斯罗伊斯为自己的侍从义子。因此受到冒犯的卡瓦德斯中断了谈判，很快就对罗马发动入侵。注

这是一段有趣的插曲，但是我一直觉得奇怪的是，普罗库勒斯的建议总是会被认真对待，有时这让我们想起普罗柯比获得的信息的质量：他竟然能够知道那么多朝廷上的秘密谈话。只要你停下来想一想，就会

发现整件事完全是一派胡言。自古以来，要想成为君士坦丁堡的皇帝，就要从关键人群中赢得足够的支持。这些关键人群包括主要的元老院地主、行政官员、朝廷官员和军队的长官，而这些人物之间有相当大的重叠。即使查士丁接受科斯罗伊斯为养子，后者也不会得到任何一个关键人群的支持，查士丁死后，科斯罗伊斯根本不可能继承君士坦丁堡的皇位，正如就算波斯国王伊嗣俟收养了狄奥多西（如果真有此事），狄奥多西也没有希望继承波斯王位。

毫无疑问，以这个借口拒绝卡瓦德斯的外交倡议是蓄意侮辱，当然，把波斯王位的继承人当作西方蛮族人来对待的提议也是如此。这不是我们第一次看到查士丁和查士丁尼在继承问题上动手了。就在卡瓦德斯的提议先是遭到回避，然后又遭到拒绝的同时，他们还忙着拒绝承认狄奥多里克在欧塔里克死后选择的继承人。在我看来，查士丁尼最后拒绝了卡瓦德斯的提议，这是故意侮辱人的，从这段插曲中不可能得出任何别的结论。就像对待哥特王国的政策一样，他大概是希望通过科斯罗伊斯不合法、有争议的继承来破坏波斯帝国的稳定。

换句话说，查士丁尼执政之初在外交和国内事务中采取了高风险的策略。就像他的法律改革工程一样，罗马的行为让罗马与波斯之间的战争几乎不可避免，这场战争如果能够获得良好的结果，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回报可能是巨大的。自从波斯人在3世纪将瓦勒里安的皮肤剥下来做成酒囊以来，波斯就一直是宣示胜利时首选的意识形态上的敌人。357年，君士坦提乌斯二世嘲笑尤利安在斯特拉斯堡对阿勒曼尼人的胜利，称与波斯人相比，这些衣不蔽体的野蛮人并不是真正的敌人。尤利安本人曾试图通过对波斯发动一场大规模的入侵来巩固自己的权力，但最终失败了。对于那些声称自己得到上帝的任命和支持的皇帝来说，合法性的最终证明是一两次像样的军事胜利。因为，全能的上帝（他的确是全能的）的支持还有能比战场上的胜利更好的表现形式吗？还有什么敌人比波斯人更让人闻风丧胆呢？[注]

在我看来，法律改革和与波斯的纷争需要结合起来考虑，这样才能

理解查士丁尼统治初期的政策。在最初的几个月里，这个政权进行的不是一次高风险的赌博，而是两次，并且是同时进行的。这实际上反映出查士丁尼此时对权力的掌控十分缺乏安全感。他的舅舅查士丁在阿纳斯塔修斯去世后登上皇帝宝座，完全是临时之举，而非经过精心安排、在君士坦丁堡的政治阶层中获得广泛认同的皇位继承。阿纳斯塔修斯本人显然对自己在生前安排继承人的能力缺乏信心，否则，他大概会从三个近亲中挑选一个，他们分别是外甥希帕提乌斯（Hypatius）、庞培乌斯（Pompeius），以及侄子普罗布斯（Probus），因为他们是他的近亲。查士丁是禁卫军中的一名杰出军官，根据我们的消息来源，他利用权力真空发动了一场政变。他被委托完全代表一位名叫忒奥克里特斯（Theocritus）候选人用一大笔钱来行贿，却把这笔钱花在了收买禁卫军的忠诚上，随后禁卫军迅速将他推上了权力宝座。一登上皇位，查士丁就着手清除对手，包括真正的和潜在的对手，特别是那位被他挪用了资金的忒奥克里特斯，还有一位就是曾领导卡尔西顿派反对阿纳斯塔修斯的高级将领维塔利安，他在查士丁与教宗的和解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与教宗的和解标志着查士丁统治的开始，狄奥多里克显然从中获益良多。

所有的叙述材料（不仅仅是普罗柯比）都说，在这些不太顺利的开端之后的几年里，查士丁尼孜孜不倦地工作，以获得对权力的有效控制，并使自己在短期内成为老皇帝直接继承人的不二人选。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已经大权在握。在君士坦丁堡的政治世界中，舅舅到外甥的继承并不是自动发生的；毕竟，阿纳斯塔修斯死后就没有发生这样的事。在其他可能的候选人中，阿纳斯塔修斯的侄子和外甥们还在朝廷里游荡，还有一些身居要职，而罗马帝国的政权总是由权势人物组成的联盟。到了527年夏天，查士丁尼已经通过自己的努力登上了皇位，但是他的权力并不稳固。承担这些庞大而危险的工程，完全是为了赢得足够的政治资本，将仅仅占据皇位的事实转化为实际掌握的权力。无论在哪个方面获得成功，都将证明神的实际力量在有力地支撑着查士丁尼的皇位，他是罗马世界完全合法的统治者。[注]

在其统治的头几个月里，查士丁尼的形象是富有想象力、雄心勃勃的投机主义者，他试图利用东罗马皇帝所掌握的两条主要意识形态路线来巩固自己的权力。这种形象与普罗柯比对查士丁尼的两种极其不一致的描述都有差别，但后来实际法律改革的一些细节证明这是基本准确的。事实上，在基本的工程设计中，就已经有很强的要抄近路的意识。对罗马法律制度进行必要改革的《狄奥多西法典》设想了一种最终的超级法典，它将皇帝的判决和法学家的著作天衣无缝地结合起来。查士丁尼的版本远没有那么雄心勃勃，它希望最终得到的是两部不那么超级的法典，一部涉及皇帝的判决，另一部涉及法学家的著述。这比较容易，但是两种材料之间可能存在分歧，或者更有可能是侧重点不同，可供雄心勃勃的律师在法庭上利用。查士丁尼改革的速度本身也很能说明问题。就像《学说汇纂》的生效令（*Constitutio Tanta*，533年12月16日颁布）中所说的那样，最初宣布这项任务时，没有人指望它能在十年内完成，因为狄奥多西的团队仅仅完成皇帝判决部分的法典就用了十年。[注]在三年内完成这一切，所需要的不仅仅是效率，这还反映了查士丁尼政权的政治意愿和为解决众多法律难题而愿意投入的资本。关于这个过程的一些证据流传了下来。

要想解决法学家意见分歧的混乱局面，一项基本策略就是所谓的“五十项决定”，通过新的立法，这些决定解决了罗马法理学中一系列棘手的老问题。据研究这一过程的最伟大的现代学者估计，实际决定超过50项，它们都是在530年8月1日至531年4月30日之间定下来的（这再次表明，在530年12月正式宣布启动该工作之前，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其中一些问题已经存在了几个世纪，如此迅速地解决它们，需要的不仅仅是逻辑论证或行政效率，还要在既得利益集团面前坚持自己的观点。这些既得利益集团无疑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保留了这些分歧。特里波尼安和查士丁尼是如何让它们得以通过的呢？他们肯定使用了强力（稍后我们会更详细地看到），但他们还向一些利益相关方提出了交易。在最后重建东罗马法律行当的过程中，君士坦丁堡和贝鲁特的法律学校的代表（他们似乎是最杰出的）是核心力量。然而，在这一过程的

最后，该撒利亚和亚历山大里亚的两所法律学校遭到了明确的打压，那里的教师不再被允许招收学生。这是典型的分而治之。改革方案获得法律界最杰出人士的同意，部分原因在于其确保了前两所学校在法律专业学生中享有双头垄断地位，从而获得比以往更高的学费收入。㊟

简而言之，查士丁尼的法律改革既是一项法律工程，也是一项政治工程，而且是一项以最快速度匆忙完成的政治工程，因为其成功被认为对政权的威望至关重要。《查士丁尼民法大全》的前言部分声称“现在一切法律都要改革并重新安排”，但要完成这项工作，还有一些问题要去解决。我认为，很好地表明问题的一段话出自《学说汇纂》的生效令。法律改革第二阶段的主要目的是精简法学家的作品，去除多余和重复的内容，更要处理互相矛盾之处。关于重复的问题，生效令评论道：

> 如果在大量的法律条文中，偶然出现一些重复的情况，没有必要严厉对待；这首先应该归因于人类的弱点，这是我们本性的一部分……还应该记住，对于一些极其简短的条文来说，重复可以达到良好的目的。㊟

这里的意思是，如果你发现有重复的地方，不要对我们太苛刻，但是不管怎样，重复的地方并不多，而且可能是有意为之。这是一块多么美妙的遮羞布呀！最妙的是生效令对矛盾之处的评论：

> 至于本书中出现的任何矛盾，如果我们充分考虑到多样性的话，就没有任何矛盾可以在书中占有一席之地，也不会找到任何矛盾。无论多么模糊，终究会发现一些特征，它们能消除不一致的责难，使问题具有不同的面貌，避免被认为前后矛盾。

也就是说，书中没有矛盾，如果你认为你找到了一个，再努力一点，你会找到一种方法让它消失。乔治·奥威尔笔下的真理部也不可能

比这做得更好了。改革通过与一些法律机构达成政治交易而迅速推进，而就连委员会的成员们也意识到，在匆忙之中，并非所有的问题都得到了充分解决。

因此，在查士丁尼统治早期的政治动荡中，以其首席设计师特里波尼安为代表的法律改革会成为一个问题，也就不足为奇了。未必是人们对“五十项决定”的具体细节或委员会法律工作的其他具体方面有什么不满，动荡只是反映出法律改革关系重大。因为一场成功的法律改革很有可能会让查士丁尼在政治上不可动摇，所以那些反对他的人自然会试图阻止法律改革。在这方面帮了查士丁尼反对者大忙的，是查士丁尼另一场大冒险的灾难性结局。

查士丁尼做出侮辱性的断然拒绝后，卡瓦德斯不出所料地入侵了两个帝国之间主要的美索不达米亚边境上的罗马领土。与此同时，他开始破坏罗马在拉奇卡（Lazica）和伊比利亚的利益，这两个边缘国家位于帝国之间的高加索地区和黑海东端。528年，罗马人两次试图威胁波斯在美索不达米亚的主要基地尼西比斯（Nisibis），均告失败，从君士坦丁堡的角度来看，形势黯淡了下去。然而，530年，罗马人在其主要基地达拉城外战胜了前来围攻的波斯军队，避免了这场灾难。这是在贝利萨留的带领下赢得的胜利，当时普罗柯比也与他在一起。查士丁尼政权开始庆祝胜利，但是庆祝活动为时过早。531年，波斯人对罗马领土发动了一次突然袭击，贝利萨留在卡里尼库姆（Callinicum）战败，情况十分糟糕；于是专门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来调查这一情况。(注)到了531年年底，暴风雨的阴云开始笼罩查士丁尼的统治。撇开达拉不谈，针对波斯的策略失败了。在卡里尼库姆战败之后，查士丁尼再也不能声称自己在对抗宿敌方面取得了军事胜利，以此来证明上帝是他统治的幕后支持者了。政治上的秃鹰开始在其头顶盘旋。

尼卡暴动

他们的机会来自一个完全想不到的领域。在东罗马，有一种相当于今天的足球的东西，那就是赛车。与宗教相比，这才是真正的人民鸦片。赛车手是那个时代的超级体育明星，他们的薪水很高，也很受欢迎，换队伍时总能引发人们失望或欢庆的反应。城市里有固定的车队，其中绿队和蓝队最受欢迎，而红队和白队总是落败。总的来说，至少在帝国最大的城市里，这些派系不仅仅是粉丝的俱乐部。到了6世纪，它们已经成为等级森严的组织，拥有强大的力量，用强力控制着特定的街区，就好比曼联球迷俱乐部加上黑手党。普罗柯比告诉我们，这些年轻人喜欢浓密的胡须、复古的发型、宽大的翻领和大量的珠宝首饰。一般来说，他们与更官方的城市当局密切合作。在一个极端贫困人口过多、没有什么警察部队的世界里，人们很容易越界。对敲诈和恐吓的容忍是有限的，尤其是在帝国首都内部。在532年1月11日的那个星期日，两大派系绿党和蓝党的七名成员将要被绞死，但是出现了严重错误，两根绳子断了，两名死刑犯（绿党蓝党各一名）逃到附近的教堂避难。

之后的星期二又是赛车日，按照古代的传统，人们会在这一天举行有组织的“欢呼鼓掌”仪式，请求获得支持。聚集在一起的人请求坐在包厢里的皇帝赦免这两名犯人。查士丁尼拒绝，于是绿党和蓝党发起暴动。他们呼喊着“尼卡”（nika，意即胜利）这个罗马军队的传统战斗口号，冲入首都的监狱，释放了所有的囚犯。事情本来就够糟的了，但更大的变化随之而来。星期三还将举行多场车赛，皇帝担心叫停车赛会带来更大的麻烦，于是允许其正常举行。在这次活动中，人们提出了更多的要求，但这一次提的是公开、具体的政治要求。群众现在想要的不仅仅是赦免几个小流氓，他们还要求解除查士丁尼手下三名主要官员的职务，其中包括特里波尼安，当然，此时他还在忙着把古典罗马法理学的大部分混乱内容扔进废纸篓。

查士丁尼非常害怕，把他们三个都罢免了，但依然无济于事。星期四，人们的要求进一步升级，他们试图找到阿纳斯塔修斯的侄子普罗布斯，要把他推上宝座以取代查士丁尼，普罗布斯不在城里，但是这一举动引发了三天的骚乱，与之相比，2011年夏天英国的骚乱就像是过家

家。激烈的巷战和大火席卷全城，查士丁尼在星期六决定将在宫殿里避难的几位重要的元老院成员驱逐出去，其中包括阿纳斯塔修斯的两个外甥希帕提乌斯和庞培乌斯。星期日，一大群人聚集在竞技场，这里是战车比赛的主场，皇家包厢通过一条封闭的通道与宫殿相连。这些人来到这里，既是因为兴奋，也是因为听说查士丁尼会出现在人群面前，向所有暴乱者道歉并无条件赦免他们。这种做法在阿纳斯塔修斯统治时期（因当时的宗教政策）出现动乱时是有先例的。可能是这么宣布的，但实际上这并没有发生。人群（至少是其中一部分人）拥立希帕提乌斯为皇帝，他最终在皇家包厢里被欢呼的人群包围着加冕；我们并不清楚当时竞技场的10万个座位中有多少是有人的。

身为面临叛乱的独裁者，查士丁尼已经到了做决定的关键时刻：是该逃跑，还是该命令军队开火？根据普罗柯比的讲述，查士丁尼的第一反应是离开（这是已经发表的《战史》中的记载，也就是说到了550年左右，在君士坦丁堡公开这样讲大概是可以接受的）。也许，就像现代的一些独裁者一样，他不确定军队会不会真的开火。狄奥多拉让他重燃战斗意志，根据普罗柯比在《战史》中的说法，狄奥多拉说了一句几乎是经典的话："紫袍是最美的裹尸布。"

换句话说，这位从前是女戏子的皇后宁死也不愿放弃宝座。查士丁尼就这样壮了胆，对剩余的资源做了部署。太监纳尔西斯（Narses，我们将在下一章中再次见到他）独自走进竞技场上的人群，找到了蓝党的首领，许诺给他们一大笔金子，据说他随身也携带了一些。他还提醒他们，他们目前正忙着为其加冕的希帕提乌斯长期以来一直支持绿队。这个论点被证明是充分的。在加冕仪式进行到一半时，蓝党直接离开了竞技场，留下绿党在那里目瞪口呆。

蓝党离开了，取而代之的是两支队伍：贝利萨留率领的来自波斯前线、最忠于政权的军队、卫兵和私人侍从，以及蒙都斯（Mundus）率领的来自巴尔干地区的赫鲁利人（Herulians）同盟。惊讶变成了恐慌。这两支军队原本与君士坦丁堡并没有什么联系。最初的计划是让贝利萨

留的人从皇家包厢冲进竞技场，但持观望态度的宫廷警卫拒绝支持任何一方，没有打开通道尽头的大门。贝利萨留被迫绕到另一个入口，带头发起冲锋，这时，蒙都斯听到了喧闹声，从对面的黑门冲了进来。大屠杀开始了。绿党有自己的武装，但他们根本就不是精锐的帝国骑兵的对手。在屠杀中，甚至没有人试图保护希帕提乌斯和庞培乌斯，他们束手就擒。他们被关在监狱里一夜，声称自己所做的不是出于自愿，但查士丁尼不信这一套。他们在星期一早上被处决，尸体被扔进大海，所有财产被没收，上交国库。

这个政权保住了，但有点像20世纪80年代初或现在的叙利亚，其公民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而且这件事不是发生在某个省城，而是发生在帝国的中央首都。根据两名当时人的说法（他们并未互相影响），大约有3万人死于巷战和竞技场的大屠杀。人们都认为，这一规模与20世纪80年代初叙利亚所经历的相当，但你也必须考虑到相对规模。一般认为君士坦丁堡的人口在5世纪中叶达到了50万的高峰。所以尼卡暴乱导致了该城约5%的人口死亡，相当于现在的大伦敦地区死了40万人。大火还摧毁了圣索菲亚大教堂的第一教堂、附近较小的伊莲娜教堂、元老院、宫殿的许多外围建筑，以及市中心的几个礼仪拱廊。同样，如果以今天的伦敦作为参照，就相当于摧毁了议会大厦、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以及直到皇家骑兵卫队和海军部拱门的几乎整个白厅。因此，暴乱造成的分裂和破坏怎么说都不过分。[注]

但是，尽管我们的史料很详细，仍有一些关键问题不能得到最终的解答。星期二的时候，抗议者要求赦免两名暴徒，但在接下来的48小时里，他们先是要求查士丁尼削弱他的政权，然后是要另立新皇帝，究竟是什么人将抗议活动政治化了呢？查士丁尼把阿纳斯塔修斯的两个外甥赶出宫殿的时候，他是怎么想的？他没有遵守教父维托·柯里昂的名言“亲近朋友，但更要亲近敌人”，难道这是一个错误吗？或者，皇帝是想通过公开他们潜在的反对意见来策划一场摊牌？在普罗柯比描绘的著名一幕中，狄奥多拉让查士丁尼重拾战斗精神，其中有多少真实的成分呢？她的名言是一句错误的引语，其原文是“暴政是最好的裹尸布”。因

此，合理的猜测是，也写下了《秘史》的普罗柯比认为，他可以利用政权高层缺乏古典教育，开个皇帝夫妇的小玩笑，知情人士是能明白的。注然而，关于皇后的勇气的这个故事出现在公开出版的《战史》一书中，所以它可能概括了政权总体上乐于公众看见的这场骚乱的一个方面，至少在6世纪50年代之前是如此。

这些难题是无法回答的，但贝利萨留和蒙都斯的部队开进君士坦丁堡，表明皇帝可能早已预料到自己需要不会被朝廷中不满分子收买的军队。这可能反过来又表明，他把阿纳斯塔修斯的外甥从宫中赶出去，可能是个圈套。虽然这也可以解释为，他希望杜绝宫殿之内宫廷守卫突然发生政变的可能性。守卫拒绝打开通往皇家包厢的通道，这表明反对者和他们有过某种接触。至少，查士丁尼很清楚谁该为暴力政治化负责。在竞技场内，纳尔西斯通过贿赂将蓝党和绿党分离开来，毫无疑问，暴力政治化也是通过同样有针对性的贿赂来实现的。星期一，阿纳斯塔修斯不幸的外甥们被处决，另外18名元老院成员也被驱逐出城，财产没收。这里面可能有些清算旧账的成分，因为皇帝的官员们对他们的谴责毫不留情。我也不怀疑查士丁尼的设想是完全正确的，即在那可怕的一周过半的时候，阴谋完全取代了简单的流氓行为，把流氓暴行引向了某些非常具体的政治目的。

所有这些都没有消除笼罩在这个政权上空的失败和灾难的气氛。故意挑起的与波斯之间的纷争已经导致了一连串的失败，最近的一次失败十分严重，引发了一个调查委员会的调查；法律改革的首席设计师和另外两名主要亲信被解职；5%的首都人口丧命街头，其仪式中心也毁于大火。这样的记录与查士丁尼由上帝任命、在上帝的直接帮助和指导下执政的观点是完全相悖的。简而言之，在532年1月那场长达一周的可怕暴乱结束时，这个政权已经丧失了几乎所有的政治资本，以及对其统治的所有明显认同。它曾在矛尖上站稳，现在却在悬崖边上摇摇欲坠。令人吃惊的是，查士丁尼甚至觉得自己不够强大，无法让被解职的大臣们官复原职。

我们需要在这样的背景下来思考他征服西方的政策，许多现代历史著作认为向西征服是查士丁尼政权的主题。根据这种观点，在西方发动征服战争一直是查士丁尼的主要目标。他是来自伊利里库姆的说拉丁语的传统主义者；在罗马晚期的大部分时间里，伊利里库姆一直是西罗马的一部分。人们认为，他不顾一切地想要收复失去的罗马领土。此外，在他的宣传中完全有可能找到这样的说法：

> 这样的希望鼓舞着我们：上帝将让我们统治剩下那些原在古罗马人统治之下，后因他们疏忽而失去了的地方。

然而，问题是，这是人们所知的第一个有收复失地的说法，时间是他在位的第10年，即536年，那之前有两次成功的征服，分别是533—534年占领阿非利加和535年几乎兵不血刃地占领西西里。征服阿非利加的最初理由是宗教的而非政治的。

> 全能的上帝如今认为，可以通过我们展示的超过了历史上一切丰功伟绩的成就，也就是说，通过我们，阿非利加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获得了自由，而在105年之前，阿非利加被精神和肉体的敌人汪达尔人占领……用上帝认为合宜的、配得上他的语言或功德，叫教会所受的伤害因我这最小的仆人而得报。

查士丁尼在取得这两项初步成功后，寄望于在意大利取得更大的收获，也将目光投向了狄奥多里克古老的哥特王国。直到这时，我们才第一次听到有必要重新征服西罗马故地的声音。(注)

查士丁尼做此宣传的时间节点早已为人所知，但人们仍认为这个巧妙的计划始终存在：波斯边境的麻烦一结束，皇帝就下定决心要夺回失去的罗马领土。在我看来，我们掌握的每一个细节都表明情况绝非如此。查士丁尼政权在527年与波斯发生了一场蓄意的争执，而当时至少

有机会达成暂时的和解。如果查士丁尼真的致力于征服西方，他大可以抛弃关于收养科斯罗伊斯的废话，直奔西方的要害。同样重要的是认识到，征服政策是在非常偶然、无法预测的情况下缓慢成形的。

第一次征服是对汪达尔王国的征服，是由最初属于北非内部的事件触发的。在狄奥多里克时期的意大利，阿里乌派统治者和天主教的尼西亚派信徒在那里相处得非常融洽（除了教宗若望被不幸监禁之外）；与此不同，在地中海以南，各教派之间的关系发展得并不顺利。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汪达尔王国建立时的环境造成的。这里是439年汪达尔人征服迦太基时，从一个仍然生机勃勃的西罗马的“活体”上切割出来的；而其他所有的西方继承国家都是在大约一代人之后，随着罗马中央政府国库逐渐空虚和势力逐渐衰落，以一种两相情愿的方式更加缓慢地形成的。天主教无疑是帝国的国教，汪达尔的君主往往对天主教怀有高度敌意，所以他们故意在帮助自己掌权的武士中培养另一种基督教。起作用的另一个因素是，北非的天主教会有长期竭力抵制迫害的历史，而且和其他地方相比，那里的信徒更愿意把受迫害视为美德。尽管如此，在系统性、小规模迫害天主教的教俗人士方面，汪达尔人毫不手软，这种迫害有时非常残酷，尤其是在484年胡内里克（Huneric）统治时期；即使在西罗马不复存在之后，这种迫害依然是汪达尔王国的特征。(注)

新国王希尔德里克打破了旧有的模式，迦太基迎来了春天。他之前的国王是那位被狄奥多里克毫不客气地退还了礼物的色雷萨蒙德，色雷萨蒙德于523年5月6日去世。希尔德里克是484年那个著名的迫害者胡内里克的儿子，但是他的主要新政策是结束所有的迫害，允许北非天主教会不受阻碍地运作，尤为突出的是，525年在迦太基举行了两代人以来的第一次全体主教大会，类似的反讽在历史上比比皆是。他的宗教政策是汪达尔外交政策重大调整的一部分，正如我们在上一章所看到的，他想摆脱东哥特王国的主导和支配，将重心转向君士坦丁堡；受东哥特人支配的局面是从色雷萨蒙德和狄奥多里克的妹妹阿玛拉弗里达的联姻开始的。结果，他很幸运。当图鲁因在高卢从勃艮第人手中夺取额外的领土时，勃艮第人是在为类似的傲慢行为而承受狄奥多里克的愤怒；至

少，北非远征军的舰队还在等待这位国王的最后命令，而狄奥多里克在526年夏天死去了。

希尔德里克在其统治之初表现出危险的独立姿态，他兴许逃过了惩罚，但他最终会在另一个方面遇到麻烦。在整个北非，或者更确切地说，在其边缘，巨大的政治问题来自土著摩尔人群体，汪达尔人统治时期，他们的规模、组织和效率都在提高。529年至530年，其中一些群体在拜萨西恩（Byzacena）重创了希尔德里克的军队。530年5月19日，他的亲戚盖利默（Gelimer）领导了一场推翻他的政变（对于6世纪的汪达尔国王来说，5月似乎有点不吉利）。盖利默是北非第一位汪达尔国王盖萨里克（Geiseric）的曾孙，而希尔德里克则是其孙子（来自家族的不同分支）。这个年轻人开始全面掌握权力，既清除支持希尔德里克的汪达尔人，又温和逆转了他的亲天主教政策，虽然没有迹象表明他重新发起了任何形式的全面迫害。(注)

希尔德里克一直是查士丁尼的忠实盟友，但他被推翻的消息传到君士坦丁堡时，皇帝一心扑在波斯战争上，并对其良好结果充满希望（在卡里尼库姆的失败是之后那年的事）。因此，他仅仅给新国王写了一封生硬而简短的信，还写信给狄奥多里克的孙子阿塔拉里克，建议他不要承认迦太基的新国王。直到两年之后，也就是532年的夏天（不要把时间顺序弄乱了，这一点很重要），查士丁尼才开始表现出比偶尔写信更多的兴趣。到了那时，两个关键事件已经发生了。尼卡暴乱先发生后平息，严重损害了立在君士坦丁堡中心瓦砾堆上的查士丁尼政权的威望。尼卡暴乱后不久，即公元532年春天，查士丁尼与波斯签订了“永久和平”协定，根据其条款，他每年要向波斯提供巨额赔偿，这完全证实了查士丁尼政权的衰落趋势。

因此，那年年中时，查士丁尼非常渴望在政治上取得某种成功，因此，阿非利加的冒险被认真提上日程。尽管如此，通过在那里的成功干预来拯救政权的决定还没有完全确定。朝廷还在探索其他可能的宣传途径，开启了可能弥合东罗马教会内部分裂的讨论。在尼卡暴乱发生后不

久的2月份，双方进行了一系列的“对话”，虽然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没有取得任何最终的积极成果。值得注意的是，解决分裂所需要的那种宗教妥协疏远了西地中海非罗马地区的教徒。因此，这些对话在某种程度上把查士丁尼政权引向了与进军阿非利加相反的方向。但即使对话没有得出任何结论，皇帝仍然对发起战争犹豫不决。(注)

他的犹豫是有充分理由的。自从汪达尔人在439年占领迦太基以来，三次从他们手中夺回失去省份的尝试都以灾难告终。最根本的问题是如何派遣足够多的队伍穿越地中海，安全抵达北非。在441—412年的第一次远征中，来自东西罗马的队伍在西西里组建了一支联合远征部队，但这时匈人阿提拉第一次进军巴尔干半岛，东罗马国内急需部队，因此不得不放弃这次远征。在461年的第二次远征中，队伍在西班牙集结，试图抄近路跨越直布罗陀海峡，但是汪达尔人听到了这次行动的风声，趁罗马船只还在港口的时候就将其摧毁了。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尝试是在468年，一支庞大的东罗马舰队从君士坦丁堡起航，却在北非附近遭遇不幸。不利的风向将这支舰队牢牢地钉在多岩石的海岸线上，舰队成了汪达尔人炮舰的攻击目标，伤亡惨重。这支舰队的惨败标志着使罗马帝国西部存续的认真尝试就此罢休，混乱的争夺随之而起，西罗马最后的资产被离得最近的蛮族势力大量侵吞。这次远征还掏空了东罗马的国库，5年后利奥皇帝去世时，国库还没有充实起来。尽管查士丁尼非常渴望成功，尽管阿非利加如此诱人，但从表面上看，征服它的胜算并不大。(注)

根据普罗柯比在《战史》中的描述，神的启示最终解决了这个难题。查士丁尼在梦中被告知应该发动进攻。我完全相信皇帝可能真的做了一个梦，但促使查士丁尼下定决心的似乎是另一组偶然事件。532—533年的秋冬，两条重要消息传到君士坦丁堡。首先，在汪达尔王国东端的的黎波里塔尼亚（Tripolitania，今天的利比亚），爆发了一场由当地贵族普登提乌斯（Pudentius）领导的反对盖利默的叛乱。汪达尔王国的这一偏远地区没有汪达尔人定居，因此其实没有发生多少为独立而进

行的战斗。普登提乌斯立即派人到君士坦丁堡寻求帮助，要求的黎波里塔尼亚回归帝国的直接统治。这件事本身可能还不足以引起帝国远征汪达尔王国的兴趣，但第二条消息把阿非利加推上了帝国的议事日程。紧接着来自利比亚的消息，传来了汪达尔王国内部第二次叛乱的消息。这一次，盖利默最北端的领地撒丁尼亚的总督哥达斯（Godas）宣布独立，他也写信给君士坦丁堡，请求帝国的支持。这条消息也是在532—533年的秋冬传到查士丁尼那里的，足以促使他投入军队。有两场叛乱撼动盖利默的王国，现在成功的机会大得多了。(注)

拜占庭远征部队（Byzantine expeditionary force，首字母缩写BEF）的准备工作在533年春末夏初得以完成，庞大的舰队集结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和金角湾平静的水域，其任务是向北非运送1万名步兵和5 000名骑兵，由贝利萨留指挥。贝利萨留是尼卡暴乱中竞技场大屠杀的“英雄”，如果我们可以这样说的话。6月中旬，这支舰队离开君士坦丁堡，向意大利东海岸缓慢进发，偶尔有些颠簸，然后又驶向西西里岛，在埃特纳山（Mount Etna）附近一处荒无人烟的地方藏身。两名匈人士兵因醉酒杀死一名战友而被处死，另有多达500人因食用变质的面包而死亡。尽管这些在当时看起来是不祥之兆，但幸运女神坚定地站在远征军的一边，帮助它避免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早期英国远征军（British Expeditionary Force，BEF）的那种耻辱命运。当时，英国远征军经常需要在猛烈的空袭下撤离，因此英国皇家海军的一些士兵觉得，BEF的真正含义应该是“每周五返回”（back every Friday，首字母缩写BEF）才对，当然，这么说是不公平的。普罗柯比被派往锡拉库萨（Syracusa），他带回了一些重要情报。事实证明，盖利默对东罗马人的入侵完全没有准备，为了镇压哥达斯的叛乱，他派遣了汪达尔舰队和一支7 000人的精锐部队前往撒丁尼亚。过去，远征军面临的问题总是一样的，这个问题在441年、461年和468年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但关键的困难都是首先要把军队送到北非的土地上。多亏了哥达斯，通往迦太基的道路现在畅通无阻。(注)

我想，就在那个时候，在埃特纳山附近的那个荒无人烟的地方，大概就在美丽的陶尔米纳城和它那美妙的希腊剧院附近，查士丁尼的西方征服政策终于诞生了。正如普罗柯比告诉我们的那样，直到听说汪达尔舰队在别处，贝利萨留才决定直奔盖利默王国的心脏。仔细想想，情况应该是这样的：贝利萨留从君士坦丁堡出发时，得到的命令是相机行事。查士丁尼和他的主要顾问们知道汪达尔王国有些混乱，但是在古代世界，哪怕是在地中海一带，消息传播得也非常慢，因此君士坦丁堡在533年6月中旬得到的消息，可能是发生在几周甚至几个月之前的事。正因如此，贝利萨留无法在了解更多情况后回报查士丁尼，要求进一步的命令。因此，他得到的命令实际上应该会包含几个选项，有最谨慎的，也有最雄心勃勃的，采用哪个选项取决于他到达西西里时在那里实际发现的情况。如果形势看起来不太乐观，舰队还是能安全驶向的黎波里塔尼亚，获得该省后，查士丁尼的宣传人员至少能够利用这一“胜利”尽量做点文章。发现汪达尔人的精锐部队不在，他们的眼界一下子开阔多了。向西征服发生在查士丁尼统治早期的种种曲折之中，并不是由一个浪漫幻想家长期抱持的坚定计划推动的，而完全是另外一种现象，历史学家对此更为熟悉：海外冒险是一个破产政权的最后一搏。尼卡暴乱和在波斯人手中的失败把查士丁尼的政权置于极危险的境地。三年后，随着各种偶然因素的出现，皇帝和他的顾问们最终决定，为他们的老盟友希尔德里克报仇是重建政权的最佳机会。贝利萨留终于可以掷出战争的骰子了。

到十里城及更远处

汪达尔的舰队远在撒丁尼亚，这极为重要。在此之前，无论是西罗马、东罗马，还是联合起来的，还从来没有一支罗马军队能够在汪达尔王国的海岸上安然无恙地登陆。然而，贝利萨留的舰队却能够信心满满地从西西里向南推进。他们在中间的戈佐岛（Gozo）和马耳他岛短暂停留后，抵达拜萨西恩省对面的卡布迪亚角（Ras Kabdia），当时距舰队

离开君士坦丁堡大约三个月。一个加固的离船营地迅速建立起来，食物是从附近地区获得的（为了安抚当地人，对一些抢劫者实施了有计划的惩罚），三天之内，军队开始向汪达尔王国的首都迦太基进发。他们经过小列普提斯（Lepcis Minor），到达哈德鲁梅图姆（Hadrumentum）和格拉斯（Grasse），在那里他们与盖利默的部队发生了第一次小冲突。到了第四天，也就是9月13日，军队到了十里城。这个城市之所以叫十里城，是因为它距离迦太基有十里。战斗在这里打响了。

首先，贝利萨留的轻型侦察部队冲向汪达尔人的先头部队，杀死了其指挥官阿玛塔斯（Ammatas），他是盖利默的兄弟。当他们继续追击正在撤退的敌人时，罗马主力部队的一些人到达了同样的地点，在那里发现了盖利默和他的大军，后者立即向他们发起进攻，并把他们击退。然而，贝利萨留和他的大部分骑兵就在不远处，当他们骑马越过地平线前去救援时，发现汪达尔人的军队正处于胜利后的混乱之中。将军看到了机会，立即发动攻击，击溃了混乱的汪达尔人，造成重大伤亡。就这样，罗马人在没有任何计划的情况下，赢得了第一次重大胜利。贝利萨留军队的主力（步兵）甚至都没有离开他们的营地。9月14日，军队转移到迦太基郊区，但没有入城，因为贝利萨留担心盖利默可能会发动伏击。他还希望确保他的士兵不会利用夜幕在城市里抢劫。但是，根本就没有什么陷阱，第二天罗马军队就胜利进城。[注]最初登陆后大约一周，贝利萨留的士兵就安全地在北非最大的城市安顿下来。他们的命运与441年、461年和468年的前辈形成了极大的反差。

然后是一段很长的安静时期。贝利萨留一如既往地小心谨慎，而且无疑也意识到，夺取迦太基已经大大超出了皇帝对这次远征的最低期望。他小心地加强了这座城市的防御，汪达尔人曾任由其城墙残败。与此同时，盖利默在舔舐伤口，巩固兵力，向迦太基挺进，但他只做了一点袭扰。起初，他在等待他的舰队和7 000名来自撒丁尼亚的增援部队返回，但即使在部队回来之后，他也不想攻击迦太基，不想卷入那种几代汪达尔人都没有实践过的攻城战。战术主动权完全掌握在贝利萨留手中，最后的战斗将在他选择的时候开始。

3个月后，贝利萨留准备好了。他的军队分成两路前进。先头部队依然由大批骑兵组成，他们曾在亚美尼亚裔军官约翰（John）的指挥下取得十里城战役的胜利，还率领掩护部队杀死了盖利默的兄弟。紧随其后的是贝利萨留本人率领的主力部队，包括所有步兵和500名骑兵，以及将军的私人卫队。到了晚上，先头部队果然在距迦太基约30公里的特里卡马鲁姆（Tricamarum）发现了盖利默和他的军队。第二天，一切都很平静，但是到了中午，汪达尔人从他们的营地里出来，摆出战斗的架势，在一条小河边排成队形。在河对岸，约翰的军队也做了同样的事，但在战斗开始前，贝利萨留和最后一批骑兵赶到了现场，步兵尽其所能尾随其后。

一开始是一系列由罗马人发起的小规模战斗，最终发展成全面的战斗。贝利萨留的人马优势明显，据说损失了不到50人，而汪达尔人则损失了800人。最终汪达尔人吃不消了，撤退到他们的营地，但贝利萨留并不罢休。此时他的步兵已经到达，准备在下午3时左右发动全面进攻。其实没有这种必要，因为盖利默惊慌失措地逃离了营地，他其他的队伍意识到这一点后也陷入混乱。有组织的抵抗消失了，溃败的汪达尔人在逃跑时被纷纷砍倒，其中许多人带着妻子儿女。汪达尔人的营地有大量可以搬动的财富，因此贝利萨留的军队也失去了凝聚力，从战斗转向抢劫。

最后，特里卡马鲁姆之战变得极其混乱，但它依然是一场决定性的战役。盖利默一直沿着他前王国的沿海城市向西奔逃。贝利萨留停了下来，想在他自己的人中间恢复纪律，并尽可能地捉拿汪达尔人的残兵败将，以确保他们永远不会再被用来与他为敌。事实上，他们并没有。贝利萨留很满意事情已经处于其掌控之下，于是开始追赶盖利默，最终在希波勒吉斯（Hippo Regius）拿到了汪达尔王室的宝藏，俘获了一群士气低落的汪达尔人首领。为了安全，盖利默逃到了努米底亚边界上很难进入的巴布亚山，那里有一些友好的摩尔人，他在那里很安全，但无法阻止贝利萨留围捕汪达尔人残部。没有资源可以让他东山再起，到了534年3月，盖利默已经受够了，于是就投降条件进行谈判。在卡布迪亚

角登陆后的10个月内，一切都结束了。同年夏天，贝利萨留带着盖利默和一群汪达尔人囚犯回到君士坦丁堡。他得到了查士丁尼所能想到的一切荣誉，这些都是他应得的。他是几个世纪以来第一位不是皇帝而被准许进行凯旋游行的人；第二年，他被任命为执政官，这是皇帝能够授予的最高荣誉。㊟

532年1月尼卡暴乱的恐怖终于过去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场胜利，查士丁尼政权恢复了活力。上帝的权威得到了彰显。在这场空前的胜利中，皇帝的美德得到了体现。这是一场谁也没有预料到的大胜，而且胜利来得很容易。还有比惊人的军事胜利更能彰显上帝之手的事吗？或许，推动法律改革算一件。被解职之后，特里波尼安似乎还在工作，532年秋天，他正式回到原来的岗位上。一年后，他的工作已经可以发表，而此时查士丁尼的军队也占领了迦太基。即使是在盖利默还没有彻底失败的时候，这种不彻底的胜利也足以让皇帝拥有他所需要的最后的政治筹码，来推动改革的完成。533年12月16日，特里卡马鲁姆战役的消息还没有传到君士坦丁堡，查士丁尼就颁布了《学说汇纂》的生效令，并把他所有的胜利联系起来：

> 我们与波斯人达成和平之后，在上帝的支持之下，我们战胜了汪达尔人，占领了整个利比亚，夺回了著名的迦太基，完成了恢复古代法律的任务。这是在我统治之前的皇帝想也不敢想的，他们也不会认为这是人力所能及的。

上帝说话了，政权现在安全了。在喝彩声中，扬扬自得的查士丁尼可以表现得宽宏大量。在尼卡暴乱后被流放的18位元老院成员获得赦免，希帕提乌斯和庞培乌斯的家产也归还给了他们的家人。皇帝最后一次孤注一掷的赌博获得了丰厚的回报，他的地位现在是不可撼动的，大家都知道这一点。㊟

5世纪中叶时，对汪达尔人发起的远征遭遇了种种灾难，贝利萨留

却取得了迅速得惊人的胜利，二者之间的强烈反差提供了无可辩驳的证据，证明查士丁尼的确是借着上帝的权威统治，很明显，这也使得君士坦丁堡的朝廷陷入思考。三个月里的两次交战竟然足以结束一个王国，要知道，在5世纪大部分时间里，这个王国一直让地中海世界的大部分地区谈之色变。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实力对比的逆转？

在某种程度上，这真的很简单：因为这一次，东罗马人能够完好无损地让他们的军队在北非海岸登陆。也许，如果5世纪时罗马的军队能够安然登陆北非，汪达尔人就会被轻易打败？但事实上，在汪达尔人不得不从摩洛哥向东挺进，在439年夺取迦太基和该省最富饶的土地之前，他们与东西罗马联军进行了8年的斗争，这表明他们当时并非没有能力击退罗马军队。实际上关键在于，贝利萨留前往北非时，东罗马的军队已然经历了重大的重组。

传统上，罗马军队依靠的是步兵。恺撒和奥古斯都的军队曾是罗马统治整个地中海及其大部分内陆地区的基础，它们都是围绕军团的力量建立起来的，而军团士兵都是最精锐的步兵。相比之下，贝利萨留的军队中有近三分之一是骑兵，他们发挥了关键作用（正如我们所见，在十里城战役中，罗马步兵甚至没有参战）。此外，这些骑兵中有许多是一种特殊的骑兵，即重装弓箭手。东罗马的军队发展出了重装弓箭这种新的军事武器，结合了5世纪中叶他们被迫与之作战的匈人骑兵弓箭手的远距离打击能力，以及装甲骑兵近距离冲锋的冲击力和震慑力，形成了一支能够支配6世纪战场的全能军队。

一般来说，我本人并不十分相信军事技术具有更广泛的解释力。上帝通常站在兵力强的那一方。然而，偶尔（通常持续时间很短，对手也做出改变或找到替代方法来应对之后，这种优势就没有了），新的硬件可以赋予其中一方暂时的优势。在这个例子中，由于东罗马的军队更灵活地采用了匈人骑兵弓箭手的技能，罗马人获得了暂时但充分的优势，而其结果是毁灭性的。普罗柯比对汪达尔战役的叙述还有很多不足之处。他没有确切地告诉我们在特里卡马鲁姆战役的初期战斗中，为什么

汪达尔人损失了800人，而罗马人只损失了50人。但是，考虑到约翰和骑兵们不断出击，然后又撤退，可以肯定大部分损失是他们的弓箭手造成的。至少对于此后在意大利与哥特人进行的一些战役，他描述得更为明确。在这些战役中，哥特人面临的问题一直是如何与东罗马骑兵部队作战，而东罗马骑兵的远程攻击力是一种巨大的战术优势。这种改变可以追溯到5世纪晚期，肯定主要是为了对付君士坦丁堡在东方的传统敌人——波斯。这场针对汪达尔人的冒险表明，罗马军队已经把西罗马继承国的军队远远抛在后面。一旦你知道自己拥有了一个重要的军事优势，只要没有第三方控制你，就像我们在这个时代看到的那样，使用它的诱惑就会压倒一切。(注)

然而，这个政权极为谨慎，并没有贸然在西方推行全面战争政策。击败汪达尔人之后，最初的宣传称这场胜利是对压迫天主教徒的异教徒的胜利。换句话说，它的措辞完全是针对北非局势的，没有对其他西方势力构成任何明确或含蓄的威胁。事实上，如果东哥特人的意大利没有允许罗马舰队进入其领海，贝利萨留的整个远征是不可能完成的。但是，东罗马军队的下一个目标可能就是东哥特人的意大利。在6世纪的君士坦丁堡，获得和维持权力，可不是通过忠于随时可以抛弃的朋友来实现的（甚至你的词典里都不应该有“朋友”这个概念）。

在意大利，继承问题这个古老的“猎场”适时地提供了一个干扰的借口。当然，欧塔里克死后，君士坦丁堡一度在那里收获颇丰，当时的目的是破坏狄奥多里克新近统一的西哥特和东哥特王国。对于《信札》中现存的在狄奥多里克死后承认阿塔拉里克，以及西班牙重新从意大利分离的要求，君士坦丁堡是否做出了更积极的回应，我们并不清楚，但是很有可能，因为关键目标已经实现，而且6世纪30年代初的时候，两国关系还不错，贝利萨留的舰队能够在意大利沿海找到所需的后勤支持。然而，如果你打算制造麻烦，大多数继承国的总体政治局势是不稳定的，往往有利于侵略者实现梦想：目标国内部起纷争，同时又有一个很好的宣传角度来让侵略者获得必要的体面。

狄奥多里克死时，阿塔拉里克只有8岁或10岁，从政治角度来说，此时他不可能凭自己的力量真正行使权力。因此，拉韦纳的新游戏是，通过摄政委员会对阿塔拉里克施加影响，实际上是摄政委员会在统治着这个王国。普罗柯比对随之而来的政治斗争做出了特别的解读，声称阿塔拉里克的母亲（狄奥多里克的女儿阿马拉斯文塔）希望她的儿子能接受更加罗马化的教育，而摄政委员会中年长的哥特男性则希望他能被培养成一个更传统的哥特人。我相信，这只是简单的概括，而不是故事的全部，但控制国王的成长无疑是直接获得政治权力的关键。因此，如果这确实是让对立的政治集团联合起来的问题之一，也不奇怪。

最终，阿马拉斯文塔发现自己陷入与三大哥特贵族之间的斗争，《战史》中并没有提到他们的名字。在这件事上，普罗柯比写得比较精确。情况十分凶险，她一度在一艘船上装满珍宝，以备迅速逃离之需，而君士坦丁堡就是她所选择的目的地。最后，她赢了，但只是勉强赢了，而且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她设法让这三个人被任命为重要的省级指挥官，在他们任职的地方杀害了他们。这三个人中很可能有我们的老朋友图鲁因，他在哥特普罗旺斯（可以算是一个行省军区）拥有大量的地产。另外一个贵族叫奥苏因（Osuine），他被任命到达尔马提亚一个同样重要的行省军区。此后二人消失得无影无踪。第三个人是谁，我不知道，其他人也不知道。

王后安全度过了一个极度危险的时刻，但等待她的并不是舒适的未来。阿塔拉里克于534年10月2日去世，年仅16岁或18岁，生存的真正代价变得很清楚。由于压力太大，阿马拉斯文塔不可能独揽大权，于是她任命自己的表兄、狄奥多里克的外甥狄奥达哈德为共同统治者。然而，他早在6世纪20年代就已经是王位的潜在候选人，其支持者也颇有影响力。像《教父》中的情节那样，阿马拉斯文塔同时暗杀多位对手，这也疏远了被她消灭的对手的许多支持者，让狄奥达哈德很容易获得很多的人支持来反对她。权力很快从她指间溜走，想逃到君士坦丁堡也并非易事。狄奥达哈德先是逮捕了她，然后在她的浴盆里将她处决，这是历史上很著名的事件。我们不知道她被杀的确切日期，但肯定是在535年4月

之前。㊟

意大利即将陷入动荡的消息传过亚得里亚海，查士丁尼嗅到了远处新机遇的气息，他派出了贵族彼得作为密探，此人有点像詹姆斯·邦德（James Bond）和卡灵顿勋爵（Lord Carrington）的结合体。卡灵顿勋爵是英国前外交大臣，一位美国国务卿曾形容他为“两面三刀的混蛋”。彼得来自美索不达米亚的达拉，贝利萨留在那里战胜了波斯人，彼得（当时他还不是“贵族”，539年他从意大利回来后才获得了这一荣誉）在那里学习和实践法律，并作为学者而闻名。根据普罗柯比的说法，他聪明、友善，很有说服力，但这是《战史》中记录的好的一面。《秘史》中写到了不好的一面，说他贪婪成性，是世上最大的小偷。然而，他的聪明和狡诈，以及皇帝对他的信任，是毫无疑问的。㊟

在阿塔拉里克去世之前，彼得就被派往了意大利，他走到半路的时候，遇到了来自另一个方向的使者，宣告国王的死讯。阿塔拉里克死于一种消耗性疾病，其影响和可能的结果在534年10月之前就已经相当明显。因此，没有理由怀疑即将到来的意大利的动荡是彼得被派往意大利的原因。即便如此，他得到的命令还没有将年轻国王的死考虑在内，所以他不得不待在原地等待指示。实际形势变化太快，通信速度太慢，以至于当他终于带着命令来到意大利，明确表达查士丁尼对阿马拉斯文塔的支持时，王后已经死了。这可能并不是什么大问题。《秘史》声称，无论如何，他已经得到了安排谋杀王后的秘密指示。如果是这样，那肯定是为了进一步破坏局势的稳定，而且在查士丁尼宣布支持她之后，把贝利萨留送到北非的那种借口重现了：支持一个被废黜和被谋杀的君主。535年夏天，彼得在君士坦丁堡和其他地方间穿梭，显然是要传达狄奥达哈德的信息，即阿马拉斯文塔之死并不是他的主意（是被谋杀的三个对手的亲属所为），并带回查士丁尼的回答。他要在这个王国散播尽可能多的纷争，因为它如今已成为东罗马的头号消灭对象。

535年夏天，贝利萨留和他的舰队第二次被派往西部，这次他带着4 000名正规军、3 000名伊苏里亚人和几百名其他人员，以及自己的卫

兵。他的目的地表面上是迦太基，但他也接到了临时命令，要试探一下哥特人，如果他们对西西里的控制能轻易推翻，他就得这么做。他在卡塔纳（Catana）附近登陆，卡塔纳很快就投降了，岛上的其他城市也纷纷效仿，除了在帕诺姆斯（Panormus）之外，他几乎没有遭遇抵抗。锡拉库萨是最后一个打开城门的，贝利萨留在12月底胜利入城，碰巧这也是他担任执政官的最后一天。查士丁尼依然很谨慎，注意他给贝利萨留的命令是视情况而定。在兵不血刃地攻占西西里之后，皇帝和宣传部门终于“出柜”了。此时，在对西西里胜利的庆祝活动中，政权第一次表示将采取不受限制的西方征服政策。

在拉韦纳，彼得开足马力向狄奥达哈德施压，说有一股强大的军事力量正朝他这边冲来。惊慌失措的狄奥达哈德同意交出王国，他希望自己可以过上表妹在把所有的财宝装上船时所设想的那种富足的退休生活。但是他有点进退两难。536年复活节前后，东罗马人在达尔马提亚袭击哥特人领地的行动被击退。消息传来后，他彻底改变了主意，对君士坦丁堡宣战，并把折磨他的罗马使节投入监狱。

要是在一年前，这种哥特人的决心，再加上一次军事上的挫折，或许会让查士丁尼三思而行，但在兵不血刃地占领西西里岛（在古代世界，西西里岛本身就是极其宝贵的战利品）之后，这位皇帝开始了另一场豪赌。事实上，狄奥达哈德对罗马使节采取行动还是太慢了。彼得被送进监狱，在那里他要忍受整整3年的煎熬，但是在进监狱之前，他送出了一封至关重要的信，这是查士丁尼命令贝利萨留等待的信，内容是让将军和他的军队奔赴意大利。[注]

帝国在西方的战争不再像533年夏天贝利萨留和第一支舰队被派遣时那样，依赖于极为有利和十分偶然的情况。3年后，哥特人奋起反抗，赢了一轮。但就像近1 500年后的新保守主义势力一样，查士丁尼确信自己拥有足够的军事装备，能够像对待汪达尔人一样迅速推翻哥特王国。战争的骰子被用力地掷出，君士坦丁堡决心收复罗马的每一寸领土。经过漫长而曲折的道路，查士丁尼政权终于做出了政策选择，自那

以后，这一政策一直为历史学家所称道。谁会是赢家，他们会大获全胜吗？

---

1. 查士丁尼《新律》11；对于新发现的总结，见Bavant（2007）。
2. 亲眼所见被认为是事件真实性的最佳保障，因此古代世界青睐那些亲身参与过其所描述事件的历史学家。同样的惯例也适用于希腊语和拉丁语历史学家，但他们受的限制没有那么多，还是可以传达出非常不同的作者的声音。关于古代晚期的希腊传统，见Blockley（1981），（1983），而Matthews（1989）考察了现存的主要拉丁语代表作家。
3. 《论建筑》的英译本见Dewing（1940）。Croke and Crowe（1983）质疑其真实性，但是参考Whitby（1986），（1988），c. 3; Curta（2001），c. 4。
4. 《秘史》1.3。译文见Dewing（1935）。
5. 《秘史》8.22—33。
6. 《秘史》9.10—30。《查士丁尼法典》5.4.23.1—4记录了法律上的有关变化，修改后，法律允许以前的女戏子嫁给任何等级的人。
7. 对两人恶魔特征的详细描述，见《秘史》12.14—32。
8. Averil Cameron（1985），c. 5很好地描述了对狄奥多拉正面形象的精心颠覆。
9. 《秘史》8.12—22。4世纪晚期和5世纪初的讽刺诗人克劳狄安为西罗马帝国的大将斯提里科服务，他利用性的问题来讽刺斯提里科在东罗马帝国的最大敌人欧特罗皮乌斯（Eutropius），将他的另一个敌人卢菲努斯（Rufinus）妖魔化，见Alan Cameron（1970），cc. 4，6。普罗柯比对查士丁尼的妖魔化描写和对狄奥多拉的描写一样，是一种修辞手段，而不是普罗柯比的真实想法，这种观点见Kaldellis（2004），特别是150–159和Averil Cameron（1985），56–59；但在Kaldellis看来，普罗柯比的幽默用心要少得多。
10. 这方面的分析，见Kaldellis（2004），但是对其的评价褒贬不一，也有人提出不同的观点，如Greatrex（2000）。就我本人而言，我毫不怀疑，Kaldellis为我们对普罗柯比的理解增加了许多令人信服的见解，但是我怀疑他对普罗柯比讽刺的总体解读政治色彩过于浓厚。
11. 狄奥多里克对于成文法重要性的认识，见Deo Auctore 1。
12. 关于阿陶尔夫，见Orosius 7.43。罗马商人加入匈人，见Priscus fr. 11.2[Blockley译（1983），pp. 269 ff.]。Rivers（1977）翻译的巴伐利亚法典的前言最精彩地体现了成文法在中世纪早期的总体意义；很多作品都谈到了这种意义，例如Heather（1994a）。
13. 盖乌斯的早期课本侥幸以一部重写本抄本的形式流传下来，也就是说，虽然后来上面又写上了其他内容，但依然可以读到原文本的内容。查士丁尼的新版本的译文见Birks

and McLeod（1987）和Metzger（1988）。

14. 对查士丁尼这一工程的精彩概括，见Honoré（1978），特别是c. 7。关于赫莫根尼和格列高利的工作，见Honoré（1994）。Matthews（2000）和Sirks（2007）对狄奥多西的工程提供了现代的讲述，在有些方面互相矛盾，但分歧主要在于进展缓慢的原因，而不是相对于查士丁尼工程进展缓慢的事实。

15. Deo Auctore 4–5.

16. 关于这一法律改革所要解决的法律上的混乱，见Jones（1964），c. 14（可能有些悲观）; Harries（1999）, c. 1; Humfress（2007）, pt 1。

17. 关于更深层的背景，见Dodgeon and Lieu（1991）; Heather（2005）, cc. 1 and 3;Dignas and Winter（2007）, 9–32。

18. 引文来自普罗柯比《战史》1.11.17—18。对于背景进一步的评论和更详细的探讨，见Greatrex（1998）, c. 7; Greatrex and Lieu（2002）, 79 ff.; Dignas and Winter（2007）, 34–44。

19. 关于君士坦提乌斯二世、尤利安和波斯人，见Matthews（1989），c. 6。

20. 《晚期罗马帝国人物志》2, 650收集并探讨了与查士丁的政变有关的史料。在有关古代晚期和中世纪早期的现代学术研究中，登上王位和真正行使权力之间的区别是一个一般性的主题。研究加洛林王朝的历史学家尤其强调这一点，据估计，成为一名有效的统治者需要五年到十年的时间，而且要有相当好的运气，见下文。

21. Const. Tanta 12.

22. 关于“五十项决定”，见Honoré（1978），142–146。对其他法律学校的打压，见Const. Omnem 7。

23. Const. Tanta 13; 15.

24. 更详细的讲述，见Greatrex（1998）, cc. 7–9; Greatrex and Lieu（2002）, c. 6;Dignas and Winter（2007）, 100–106。

25. 关于这种派系之争，Alan Cameron（1973）,（1976）提供了最佳的介绍。关于尼卡暴乱，我们的主要史料是普罗柯比《战史》1.24和Whitby and Whitby（1989）, pp. 115 ff对Chronicon Paschale的译文。更详细的评论，见Alan Cameron（1976）; Greatrex（1997）; Sarris（2011）, 148–153。

26. 就像Evans（1984）所发现的那样。对Kaldellis（2004），24 ff来说，这是一个绝佳的例子，表明普罗柯比是多么聪明，多么具有颠覆性。见本章注释10。

27. 引文分别来自查士丁尼《新律》 30.11.2（536年）和《查士丁尼法典》. 1.27.1.1–2（534年）。对查士丁尼传统认识的变化，学者的作品，见Jones（1964）， 269ff.。更加通俗的作品，见Norwich（1988）, c. 10。也有怀疑者，如Moorhead（1994）, 63 ff.。

28. 关于背景，见Courtois（1955）， pt 3, cc. 1–2; Heather（2007）; Merrills and

Miles（2010）, c. 7。

29. 关于摩尔人的崛起，见下文。关于盖利默的政变，见Courtois（1955）, 269 ff.;Merrills and Miles（2010）, 74 ff.。

30. 532年“对话”的关键史料的译文见Brock（1981）;更宏观的背景，见Gray（2005）。

31. 关于以前的几次进攻，见Heather（2005）, 385–407。

32. 关于普登提乌斯和哥达斯，见普罗柯比《战史》3.10—11。

33. 普罗柯比《战史》3.11.13—14.13记述了这次航行。关于普罗柯比的侦察任务，见《战史》3.14.1—5。

34. 关于攻占迦太基之前这场战役的情况，见普罗柯比《战史》3.14–21。

35. 普罗柯比《战史》3.21—4.3.

36. 普罗柯比《战史》4.4—9。关于记录这次凯旋式的许多其他史料，见《晚期罗马帝国人物志》 3, 192—193。

37. Const. Tanta Pref.;关于计划中对时间表的重建，见Honoré（1978）, 170 ff.。

38. 对于东罗马军队这支骑兵队伍的产生，还需要深入的研究，但是在哥特战争（《战史》第五卷）的前言中，普罗柯比对其重要性做出了一个程式化的讲述，随后的战争叙事为其提供了强大的支撑。一些相关评论，见Thompson（1982）,77–81, 90–91; Elton（2007）。

39. 关于阿马拉斯文塔的统治，我们的主要史料是普罗柯比《战史》5.2—4，卡西奥多罗斯的《信札》也有重要的补充资料，尤其是9.8—9（关于奥苏因）和8.9—10（关于图鲁因）；进一步的讨论见Wolfram（1988）, pt 5, c. 9; Heather（1995）。

40. 《晚期罗马帝国人物志》 3, 994—998搜集并谈论了关于贵族彼得的史料。好消息：《战史》5.3.30。坏消息：《秘史》 24.22—23。

41. 普罗柯比《战史》5.3.30—7.25。

第4章

驶向拜占庭

在普罗柯比看来，根本就没有赢家，这并不奇怪。

> 我想，要确切地说出那些被他毁灭的人的数目，对任何人，甚至是对上帝来说，都是不可能的。我想，数清所有的沙粒，还比数清被这个皇帝消灭的人要快。

他的审视是从北非开始的，此时（550年前后，创作《秘史》时），北非“已经被彻底毁灭，长途跋涉的旅行者要遇见一个人都很不容易”。至于后来在意大利，“到处都比北非更加人烟稀少”。受破坏的不限于查士丁尼的军队攻击过的地方。

> 从查士丁尼接手罗马帝国开始，（整个罗马巴尔干半岛）几乎每年都会被匈人（指保加尔人）、斯克拉文人（Sclaveni）和安特人（Antae）侵占，他们在该地区的居民中造成了可怕的破坏。我认为每一次入侵都有二十多万罗马人被消灭或奴役。

与此同时，在东方：

> 科斯罗伊斯治下的波斯人四次入侵罗马其余领土，摧毁城市，对于被占领的城市和乡村的居民，他们杀死一部分，带走一部分，所到之处，十室九空。

这还没有算上罗马人的敌人的伤亡人数（就像作者接着列举的那样），以及恶政和自然灾害造成的伤亡人数。所有这些都可以理所当然地归咎于他笔下的恶魔皇帝。总之，普罗柯比认为，死于查士丁尼恶魔统治之下的人数为“一万的三次方”，即一万亿人。一个标准英语译本的脚注很有帮助：“‘一万的三次方’并不是精确计算的语言，普罗柯比是在试图提出一个强有力的理由来反对查士丁尼。”注

但是，文学的夸张并不意味着基本观点是错误的，许多人认为查士丁尼的统治确实耗尽了帝国，使它很容易受到各种灾难的破坏。那么，反对查士丁尼的理由究竟有多充分呢？这里需要回答三个互相关联的问题。首先，他的军队在西方吞并的领土是否值得他付出那些代价？其次，这些代价是否对他从舅舅那里继承下来的帝国的人口产生了重大的负面影响？最后，是否可以合理地认为，后来巴尔干半岛和东部的领土损失是查士丁尼政策的长期后果？

哥特人的黄昏

最终，正如普罗柯比的判断暗示的那样，查士丁尼从事哥特战争的代价远远超出了皇帝及其顾问们的预期。这有点像西方国家21世纪初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部署，代价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显现出来。在最初阶段，意大利战争看起来像是北非战争的重演，令人欣慰。这场战争真正开始于536年夏天，贝利萨留在意大利南部登陆，包围了那不勒斯，经过长时间斗争，那不勒斯最终沦陷。我们知道，到了11月，它已落入东罗马人之手。与此同时，仍在罗马的狄奥达哈德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大概是希望通过谈判找到摆脱困境的办法。但是，他的主要支持者们认为，那不勒斯的陷落太沉重了，于是在年底前废黜并处决了他。伟大的狄奥多里克家族里最后一位统治帝国残余部分的男性就这样死掉了。哥特人的领袖把维提吉斯推到了狄奥达哈德的位置上，而维提吉斯已经确立了能干的军事领袖的声望。和查士丁尼一样，哥特人现在的政权致力

于武装对抗。小规模冲突一直持续到那不勒斯沦陷才结束，537年春，随着天气转好，草木复苏，战争又要开始了。㊟

维提吉斯整个冬天都在备战。12月离开罗马后，他前往拉韦纳集结和装备部队。他还把狄奥多里克在508年赢得的、图鲁因在6世纪20年代扩大的高卢地区割让给法兰克人，以确保哥特人北部边境的安全，并腾出原本需要驻守在那里的军队。由于他的军队已经遭受了一些人力损失，这种需要是很迫切的。那不勒斯守军被贝利萨留摧毁了，而且一些哥特人（就像我们将看到的那样，不是大多数）显然对汪达尔人的轻易破坏印象深刻。于是，一个名叫皮特扎斯（Pitzas）的将领和萨莫奈（Samnium）一半的哥特人立刻投降了贝利萨留，而不是为维提吉斯战斗。

到了537年2月，维提吉斯已经调动了他的部队，而贝利萨留把他相对有限的军队调到了罗马，他是在维提吉斯于12月9日和10日撤出罗马后不久进入的。537年，哥特人包围了这座古老的帝国首都，但毫无结果。此时，普罗柯比仍然在跟随他的将军，他写下了扣人心弦的第一手叙述，里面充满了对勇敢哥特人和坚定罗马人的描写。从根本上说，维提吉斯缺乏攻城的兵力和技能，而贝利萨留尽管在武器装备上依然拥有战术优势，但每次遇到敌人时，他都缺乏出兵作战的兵力。537年12月，罗马增援部队的到来促使哥特人休战3个月，封锁一度中断，而这一年中，在达尔马提亚的巴尔干前线只发生了一些同样无关紧要的战斗，哥特人再次围城失败，他们这次试图围困的是罗马人在535年占领的萨罗那（Salona）。㊟

新年伊始，围绕罗马的僵局被打破。贝利萨留的增援部队主要由骑兵组成，他一有机会就派他们去袭击皮切诺（Picenum）。皮切诺位于亚得里亚海旁边的亚平宁山脉的另一边，这里的哥特人聚居区相对密集。贝利萨留意在通过威胁围城士兵的家室来打破对罗马的包围。这一策略很管用。到了538年3月，向维提吉斯施加的压力已足以迫使他放弃包围。哥特军队向北撤退，沿着弗拉米尼亚大道（Via Flaminia）穿过

亚平宁山脉，切断和摧毁了贝利萨留的骑兵，在此之前，这些骑兵已经在里米尼城的城墙后面建立起了自己的堡垒，将最大的破坏扩散到了更南部的地区。撤退时，维提吉斯建立了一系列的据点来保护后方。处于战略位置的奥克西姆（Auximum）得到了一支特别优秀的驻军。其他的队伍驻扎在因国王拉斯·波希纳（Lars Porsena）而出名的克鲁西乌姆（Clusium）以及乌尔维温图斯（Urviventus）、都德拉（Tudera）、佩特拉（Petra）、乌尔比努斯（Urbinus）、恺撒纳（Caesena）和蒙特费特拉（Montefertra）。

然而，罗马围城结束了，贝利萨留的军队现在享有完全的行动自由。在忙于建立据点的维提吉斯的主力部队到达之前，他通过另一条穿越山区的道路向里米尼派遣增援部队，用船只向热那亚派遣了第二批部队。队伍接着向北进军，接受了米兰和西北部利古里亚其他城市的投降。贝利萨留率领主力部队随着维提吉斯向东北方向进入了皮切诺，在得到更多增援后，他开始沿着海岸向拉韦纳进发。[注]皇帝似乎一直很谨慎。尽管他的政权已经投入了战争，但他在看到最初阶段的战斗进展后才增派部队。推测起来，如果贝利萨留表现不佳，皇帝可能会考虑以在某种程度上分割半岛为基础达成一项协议，这是在小规模冲突时期与狄奥达哈德讨论的一种安排。但是，到了538年年底，皇帝已经可以想得更远了。冬季无法移动作战，维提吉斯的队伍集中到里米尼周围，贝利萨留在他身后迅速逼近，哥特人对西北地区的控制正在减弱。

539年，贝利萨留基本上把握着战略主动权。在亚得里亚海的主要前线，他慢慢地收紧了对维提吉斯军队的包围。夏天，他将奥克西姆和菲耶索莱（Fiesole）一起攻占。这些成功打开了通往拉韦纳的道路网，贝利萨留于12月向这座城市推进。与此同时，维提吉斯派他的侄子乌拉斯（Urais）率领一支远征军前往利古里亚，夺回了失去的城市，并在此过程中洗劫了米兰。但是，对于哥特人来说，这还不足以夺回战略主动权。罗马人对该地区的威胁仍然很大，足以阻止乌拉斯离开波河流域，如维提吉斯所希望的那样在关键时刻去保卫菲耶索莱。[注]

到这年年底，维提吉斯的地位迅速恶化。个别的哥特人甚至一些小群体都抛弃了他，希望与贝利萨留达成妥协。贝利萨留再次采取在皮切诺的策略，直接威胁哥特士兵的家庭和财产，哥特人在科蒂安山的驻军和乌拉斯的大部分机动部队纷纷逃回家中。由于在拉韦纳日益受到孤立，维提吉斯开始尝试外交手段，试图通过谈判从北部的伦巴第人和法兰克人那里获得援助。绝望之中，他甚至求助于东边的波斯帝国，希望波斯入侵叙利亚会削弱查士丁尼在意大利同时作战的能力。㊟但这一切都没能及时实现，削弱不了贝利萨留的战略优势，而就是在这个时候，卡西奥多罗斯奋力书写《信札》，拼命确保自己不受迫在眉睫的政治灾难的影响。

相比之下，贝利萨留面临的是他眼中这场战争的最后问题：拉韦纳。在沼泽和城墙的保护下，拉韦纳几乎坚不可摧，就像在他之前的狄奥多里克在493年所做的一样，贝利萨留试图另找方法进入城内。谈判开始了，在许多层面上同时进行，就像战争爆发时那样。明面上，哥特人正式提出向查士丁尼屈服，并将大片意大利领土割让给他。根据这个计划，被缩小的哥特王国将被限制在波河以北的土地上，即利古里亚和威尼西亚（Venetia），大部分哥特人在5世纪90年代被狄奥多里克安置在这里。在战争开始的阶段，查士丁尼可能会接受这一方案，但他既然已经获得胜利，也有了增援，自然会想要一个更好的结果。与此同时，哥特人秘密接触贝利萨留，试图诱使他放弃对皇帝的忠诚，提出让他“统治西方”：贝利萨留军队和哥特军队联合起来，进一步在西方复兴帝国。

540年5月，维提吉斯以为他已经争取到了贝利萨留，于是打开拉韦纳的大门，但哥特人被骗了。据普罗柯比所说，他们投降时以为贝利萨留会宣告自己为西方的皇帝，但是在罗马人进入城市之后，什么也没发生，而维提吉斯对此无能为力。他和他的主要支持者被拘留，哥特军队的其他成员被遣散回家。贝利萨留的戏剧性转变似乎结束了战争。㊟如果战争就此结束，历史学家恐怕就不会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焦虑地讨论

战争的代价了。处理掉盖利默花了8个多月的时间，战胜维提吉斯所花的时间更长，而且成本也更高，尤其是那不勒斯和米兰遭遇的洗劫。540年春天，通过三场战役，东哥特王国被推翻了，而就在一代人之前，东哥特王国还是可能复辟西罗马的支柱力量，对于查士丁尼来说，他的投资似乎得到了非常合理的回报。

然而，事情远没有就此结束。在遥远的东方，查士丁尼对汪达尔人的胜利开始在波斯宫廷引发思考：罗马在西方的成功是否改变了两个帝国之间的权力平衡，如果有改变，那改变的程度有多大？539年夏天，维提吉斯的一个使者不知从何途径抵达波斯首都泰西封（Ctesiphon），带来了一个使波斯人越发感到形势严峻的消息：

> 很明显，如果他可以完全摧毁哥特人，就会与我们和已经被他奴役的汪达尔人一起向波斯进军，他不会尊重友谊，也不会因为违背誓言而感到羞耻。

这个使节的目的是鼓动波斯人，缓解哥特人的压力，但我相信即使没有绝望的哥特国王或亚美尼亚人的协助，波斯人也完全能够明白这一点。根据普罗柯比的说法，亚美尼亚人也在忙着用罗马实力增强的消息来煽动科斯罗伊斯。不管怎样，540年春天，科斯罗伊斯率领军队进入了罗马的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完全无视阻挡他直接前往安条克的一连串要塞。安条克是罗马东部的地区首府，也是罗马帝国最伟大的城市之一。他觉得自己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很多罗马军队被调往北非和意大利打仗，他因此确信自己在率军冒险深入罗马领土的时候，不会遭到来自后面的攻击。

结果是毁灭性的。波斯人首先占领了贝洛亚（Beroia，今天的阿勒颇），然后在540年6月开始进攻安条克。几天后，这座城市就被攻陷，几乎夷为平地，只剩下两座教堂，一座在城墙内，一座在城墙外，还有郊区一些被忽略的房屋，这些房子里并没有住人。幸存下来的人们被带

到了波斯，在距离泰西封一天路程的地方建了一座新的城市，在某种程度上复制了他们的旧城。这座新城被称为“库思老（Khusro）的大安条克”，有一个澡堂，一个竞技场，有赛车手和音乐家。为了永远纪念波斯国王所取得的最伟大胜利，他们在建造这座城市时不惜代价。[注]就这样，科斯罗伊斯在西方的冒险间接地使查士丁尼失去了帝国的第二大城市，这本身就是一次毁灭性的打击，但绝不是清算的结束。

在意大利，大部分哥特人已经被贝利萨留精心策划的战术驱散，该战术旨在攻击他们的家园，但实际上他们并未在战斗中被击败。此外，贝利萨留没有足够的军队来占领波河以北的哥特人中心地带。该地区归罗马管辖的只有特雷维索（Treviso）维塔利乌斯（Vitalius）手下的一群赫鲁利人。因此，随着贝利萨留的诡计越来越明显，更加能干的哥特领导人完全有战术机会和军力来重新点燃战火。540年夏天，还有两个人在继续抵抗，一个是帕维亚的乌拉斯，另一个是维罗纳的伊尔德巴杜（Ildebadus）。两人都没有采取积极行动，但是都拒绝投降，并继续向贝利萨留施压，要求他统治西方。

如果此时贝利萨留能够把队伍迁移到波河以北，战争真的有可能就结束了。但是东线已经乱成一团，士兵缺乏，查士丁尼（据说他也为哥特人向他的将军开出的条件而担忧）最终决定把贝利萨留召回。因此，540年12月，贝利萨留离开了拉韦纳，带着维提吉斯和他俘虏的其他哥特人，不用说还有我们的老朋友卡西奥多罗斯。诱使将军放弃对查士丁尼的忠诚的所有希望都化为泡影，哥特人需要尝试新的策略。伊尔德巴杜召集支持者起兵反抗，维塔利乌斯和他手下的赫鲁利人试图把反抗扼杀在萌芽状态，但遭到了惨败。[注]哥特战争的第二阶段即将真正开始，但首先，哥特人需要理清他们的政治。

一开始，乌拉斯尊重伊尔德巴杜。但权力分享实际操作起来很难，两人闹翻了（据说起因是他们的妻子在着装方面的竞争），伊尔德巴杜设计除掉了乌拉斯。这疏远了一群重要的哥特人，他们反过来又杀死了伊尔德巴杜。葛西尼（Goscinny）和优德佐（Uderzo）认为派系斗争与

内战是哥特人的顽疾，这并没有错。到了541年年底，两人都死了。与此同时，在489年跟随狄奥多里克来到意大利，并在与奥多亚塞的斗争中脚踏两条船的鲁吉人的最新领导人埃拉里克（Eraric），将自己塑造成了未来的国王。他的主要政策是与君士坦丁堡谈判，恢复分裂意大利的想法。后来他也被谋杀了，权力落到了伊尔德巴杜的侄子托提拉（Totila）手中。㊟在短期内，托提拉更倾向于通过战争来解决问题。

托提拉的成功一直延续到6世纪40年代，依靠的是两个因素。首先，与波斯的战争使查士丁尼无法增援他的意大利军队。查士丁尼从安条克的溃败中吸取了教训，他小心翼翼，不再让东线暴露得如此之多。其次，托提拉靠速战速决取得了一些胜利。在军事上，这些胜利让他重新获得了战术上的主动权。在政治上，这些胜利激励了更多的哥特人加入反叛。托提拉对待囚犯也很宽容，结果许多罗马士兵（通常是为此雇来的蛮族同盟的分遣队）最终加入了哥特人，特别是当他们没有拿到薪水的时候。托提拉用这种方式获得了少则数百人，多则几千人的增援部队。有一段时间，一些罗马奴隶也在哥特军队中占有一席之地，但普罗柯比没有告诉我们其数量。㊟面对托提拉和重新爆发的反抗，1.2万人的帝国军队于541—542年冬季北上，包围了主要抵抗中心之一的维罗纳。春天，托提拉率领5 000人追在他们后面，在波河以南的法恩扎（Faenza）大获全胜，罗马军队从这里撤退。托提拉的300名骑兵冲进了罗马的后方，战斗的关键时刻来了。据普罗柯比讲述，这次胜利鼓舞了更多的哥特人加入，将托提拉的军队扩充到2万人。他迅速利用这次成功，包围了罗马军队控制的佛罗伦萨，并在那里战胜了罗马的援军，再次赢得胜利。这两场战役足以使意大利的罗马军队处于守势。他们只想保住自己已经占领的防御中心，而托提拉得以将他的反抗向南蔓延，先后占领了贝内文托（Benevento）和库迈（Cumae），最终在543年春天占领了那不勒斯。㊟

在接下来的两个战季里，托提拉小心地瞄准了罗马的重要据点，包

括战略要塞奥克西姆。对奥克西姆的占领切断了罗马和拉韦纳之间的陆路交通，为哥特军事野心的升级铺平了道路。545年年底，托提拉准备对罗马本身发动围攻。在接下来的一年里，他对这座城市施加了很大的压力，最终这座城市在546年12月17日向他打开了城门。在维提吉斯失败的地方，托提拉取得了成功，但哥特人的人力已经到了极限。在围城期间，托提拉得出结论：必须将威尼西亚省移交给法兰克国王提奥德贝尔特（Theudebert），以便让更多的哥特人从那里的驻守任务中解脱出来。(注)

托提拉的成功让查士丁尼感到警觉，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东部的稳定之后，他派贝利萨留在544—545年冬天回到意大利，但没有援军跟随，对此他也无能为力。贝利萨留最辉煌的时刻是547年4月，当时他重新占领了罗马。由于长期缺乏人力，托提拉决定放弃这座城市，他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那就是没有摧毁其防御。但贝利萨留也不能再做什么了，他最终于548年被召回君士坦丁堡，而哥特人还在继续取得军事胜利。在为自己的错误付出代价之后，托提拉从549年夏天开始再次围攻罗马，第二年1月，罗马再次落入他的手中。在此期间，哥特军队还占领了一系列其他要塞，包括塔伦图姆（Tarentum）和里米尼。托提拉也选择在这个时候建立一支突袭舰队，由来自东罗马军队的逃兵因达尔夫（Indulf）指挥。后来，这支舰队被用来骚扰君士坦丁堡的领地。达尔马提亚海岸在549年遭到蹂躏，西西里岛在550年被占领，科孚岛和伊庇鲁斯岛在551年遭到袭击。(注)

尽管取得了这些成功，托提拉仍面临一个巨大的问题。东罗马拥有的财富和人力资源远远超过了他本人所有的。就像他之前的维提吉斯一样，他被迫将狄奥多里克王国的部分领土割让给法兰克人，以腾出哥特人兵力用于他的战役，而每次战役都会带来进一步的损失。6世纪40年代中期，查士丁尼的资源仍然被两条战线的战争所消耗，和科斯罗伊斯之间始于洗劫安条克的战争依然在继续，但不可能无限期地持续下去。在这种情况下，哥特人是不可能彻底取胜的，托提拉需要找到一种方

法，在保持哥特王国一定程度上完好的情况下结束战争。托提拉积极寻求从军事上解决问题，取得了很大成功，他并不试图彻底赢得战争，而是尽量提升继续战争的代价，促使查士丁尼愿意与他达成协议。因此，即使在他军事上如日中天的时候，托提拉也不断做出让步。例如，在他第二次占领罗马之后，托提拉立即第三次致信查士丁尼，信中的语气非常和缓。在信中，托提拉提出将达尔马提亚和西西里割让给君士坦丁堡，每年向君士坦丁堡进贡，并为东罗马的战役提供军事分遣队。[注]托提拉清楚地知道，如果不给些好处让他挽回面子，就永远不可能说服查士丁尼结束战争，而说服他结束战争对哥特人很有好处。

然而，查士丁尼拒绝了他的每一次请求。我想，从皇帝的角度来看，征服政策已经被寄予了太多的期望，要放弃是极其困难的。到了6世纪40年代后期，东部前线又恢复了稳定。544年夏天，波斯军队包围了埃德萨（Edessa），但以失败告终。此后，美索不达米亚前线再也没有发生过严重的战斗，而在高加索地区，罗马人在549年取得的重大胜利扭转了早些时候的损失，并使科斯罗伊斯相信自己无法获得进一步的优势。正式的和平协议要到551年才能达成，但到550年托提拉的第三封信件到达时，查士丁尼已经很清楚，从战略环境看，他将很快找到完成意大利战争所需的部队。托提拉的请求都被拒绝了，最后摊牌的时候到了。

查士丁尼更喜欢的策略是通过巴尔干半岛进入意大利北部，进行陆上远征，这是狄奥多里克在大约60年前走过的路线，比试图从海上运输一支大军要容易得多。准备工作始于550年，皇帝的表弟日耳曼努斯（Germanus）被任命为远征军的指挥官。此时维提吉斯已经去世，日耳曼努斯也娶了阿马拉斯文塔的女儿玛塔斯文塔（Matasuentha），企图混淆哥特人的忠诚。然而，日耳曼努斯在他被任命的那年去世了，直到552年年初，由太监纳尔西斯将军指挥的远征军才整装出发。但是在其他方面，套索已经在收紧。551年夏天，一支帝国军队在安科纳（Ancona）完全摧毁了托提拉的突袭舰队，普罗柯比描述了哥特阵营得

知这一消息后的惊慌和沮丧。[注]

552年4月，一切就绪，现在青草又长出来了，可以用来喂养驮行李的牲口，纳尔西斯开始向意大利挺进。托提拉试图通过放水淹没维罗纳南部的土地来堵上通往拉韦纳（仍在东罗马人手中）的道路。他还另外派遣了一支由自己的指挥官泰亚斯（Teias）率领的精锐部队，去骚扰纳尔西斯的行动。然而，东罗马的军队沿着海岸线有条不紊地向拉韦纳挺进，而第二支罗马军队在南部的卡拉布里亚（Calabria）登陆，并在克罗托内（Crotone）击败了一些哥特人。纳尔西斯在拉韦纳补充了储备后，开始寻找战斗机会。最终在6月底或7月初，托提拉在亚平宁山脉北部一个叫作布斯塔加洛伦（Busta Gallorum）的平原上与纳尔西斯展开对峙。托提拉集结了大部分可用部队，战斗的核心是由他军队的精锐哥特骑兵发起冲锋：“哥特全军接到命令，不许使用弓，也不能用除了长矛以外的武器。”这大概是为了近距离地制造震撼和恐惧来战胜对手，但不幸的是，这被证明是误判：哥特骑兵发起冲锋时，闯进了8 000罗马步兵中间，左右两侧都受到了弓箭的射击。他们甚至还没来得及与罗马人的阵线决战，就被击溃了。他们的撤退导致了哥特人的溃败，据说有6 000人丧命战场，随后所有战俘都被处决，伤亡人数迅速增加。托提拉本人也受了致命伤。获胜之后，纳尔西斯迅速占领罗马，征服了托斯卡纳所有残存的哥特驻军。不过哥特人并没有被彻底打败。泰亚斯在帕维亚集结了尽可能多的剩余哥特人，他意识到自己需要帮助，于是同法兰克人进一步结盟。552年10月，在南方坎帕尼亚的拉克塔里山（Mons Lactarius），战役打响。在又一场激烈的战斗之后，泰亚斯战死，剩下的大多数哥特人达成了停战协议。[注]

意大利哥特人作为一支团结一致的军事和政治力量被消灭了，但是查士丁尼还没有完全占领意大利，纳尔西斯在冬天制服了一些顽固但完全孤立的抵抗势力。泰亚斯死后，三位哥特领袖继续斗争。因达尔夫带着1 000人退到了帕维亚，阿利根（Aligern）在库迈继续战斗，拉格那利斯（Ragnaris）在康扎德拉坎帕尼亚（Conza della Campania）继续抵

抗。后来，在553年年初，泰亚斯购买的最后一批法兰克人援助（一支主要由阿勒曼尼人组成的军队）终于到达了。他们通过利古里亚和埃米利亚（Aemilia）向南推进，在狄奥多里克前追随者分散的残余势力中赢得了一些哥特人的支持，其领导人之一布提林（Butilinus）甚至被授予哥特人的王位。然而纳尔西斯已经准备好了。553年，他的军队征服了整个托斯卡纳，并于12月让阿利根投降。554年，在卡西利努姆（Casilinum）战役中，布提林的远征最终被击败，拉格那利斯的追随者也在555年春天投降。

剩下的就是收拾残局了。到了560年，帝国已经牢牢控制了利古里亚、希斯特里亚（Histria）和威尼西亚的大部分地区。只有威尼西亚的东部还没有被征服，而这个地区见证了哥特人最后的反抗。561年，一位名叫维丁（Widin）的哥特伯爵在布雷西亚（Brescia）造反，并再次请求法兰克人的帮助，造反以失败告终。(注)维丁的失败标志着哥特人对查士丁尼征服意大利的抵抗终于结束。562年11月，纳尔西斯正式向君士坦丁堡汇报了对维罗纳和布雷西亚的占领。在几乎兵不血刃占领西西里27年后，东罗马终于确立了对意大利半岛的统治。

天大的代价？

仔细考察他早年的事件，以及他下达给贝利萨留的命令的具体细节后，我们不难看清查士丁尼政权是如何随着事态发展而逐渐采取向西扩张政策的。多亏了普罗柯比，要想再现实际征服的戏剧化事件也相当容易，虽然他倾向于将同时发生在不同战线的事件分散到不同的书中，而这隐藏了事件之间的重要联系。然而，要想对征服政策及其短期和长期影响做出令人信服的全面判断，总的来说要更加困难。这些战争花费了多少，被征服的领土为帝国的财政基础增加了多少税收，等等，这些数据都无法得到。(注)定性判断比统计分析更现实，考虑到我们面对的是公元第一千年中期的事件，这也许并不太令人惊讶。

然而，更根本的问题是：我们在做出这种判断时应该采用谁的视角？人们往往会问耶特曼（Yeatman）和塞勒（Sellar）的《1066年的那些事》（*1066 & All That*）里的那种问题，比如“查士丁尼的西部扩张政策是好事吗？”（在许多大学的试卷上都看到过类似的问题）。此类问题的关键在于，你是从谁的角度来判断的。在民族主义时代，在西方的史学中，国家被普遍认为是“好事”（再一次用《1066年的那些事》的话说），判断事件通常根据的是它对政治权力中心的繁荣或其他方面的影响。但这只是一种视角，对于受到查士丁尼发动的征服战争影响的每一个人都要公平对待，这一点很重要。

对许多相关者来说，战争的经历是毁灭性的。更重要的是，两次战争摧毁了汪达尔人—阿兰人和哥特人的政治精英，而北非和意大利的两个继承国是围绕这些精英建立起来的。最近的一些文献有轻视这些政治单元的强烈倾向，理由是它们不是民族主义时代的学者想象的统一的、文化上一致的民族。它们被认为是松散的群体，来得快去得也快。这样一来，它们在政治上受到破坏自然算不上重大损失。然而，正如我们所见，这些政治实体固然不是古老的“民族”，但人们之所以会认为它们在历史上无足轻重，是因为对群体身份起作用的方式一知半解。的确，有些人能够而且确实改变了群体认同，而认同很重要的一点在于你怎么想，在于你认为自己的身份是什么。但是，个人对自己想法的主张必须得到更广泛群体的承认。你的主张可能会被你想要加入的团体认可，也可能不被认可，而群体规则会随时间和空间而变化。一些群体对想成为或已经成为其成员的个人施加了相对严格的规定，因此群体身份比较固定，而另一些群体则不是这样。因此，从原先认为群体身份完全固定，到现在认为群体身份完全流动，只不过是抛弃了一种过于简单化的观念，转而接受另一种过于简单化的观念。

来到了北非的汪达尔人—阿兰人和狄奥多里克的哥特人显然是新的联盟，有时是文化上非常不同的群体在5世纪时联合的产物（汪达尔人是说日耳曼语的农耕民族，而阿兰人是说波斯语的游牧民族）。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这些联盟没有真正的群体认同。汪达尔人—阿兰人联盟是

在与西罗马的战争熔炉中锻造出来的。同样，正如我们在第1章看到的，狄奥多里克领导下的哥特人也是在一系列斗争的背景下组织起来的，首先是对抗阿提拉帝国的其他继承者，然后是在罗马的巴尔干半岛作战。社会科学家证实了直觉所暗示的：冲突以及在冲突中生存的需要是一种至关重要的社会凝聚力。这些群体肯定很喜欢这样的凝聚力。他们在北非和意大利的定居提供了另外一种社会凝聚力。除掉奥多亚塞之后，狄奥多里克最重要的政治任务是为那些助他掌权的追随者提供经济上的支持。在5世纪40年代的北非，汪达尔人—阿兰人的领袖盖萨里克不得不经历同样的过程。在这两个地方，在分配资产时，狄奥多里克和盖萨里克都以地产赠予的方式奖励主要的军事支持者，地产将继续由其继承人持有，作为对其军事服务的回报。虽然在定居过程中确实发生了变化，但在这两个王国的总人口中，这些最初的群体将因此继续作为明显受到奖赏和明显负有责任的群体而存在。就哥特人而言，我们知道，凝聚力是通过集群定居点和随后的定期聚会来维持的，在这些聚会上，还会有更多的奖励被授予出去。(注)

我们在普罗柯比的战争叙事中见到的，正是这种虽然发生了变化但依然与别的群体不同的汪达尔人—阿兰人和哥特人。如果跳出具体军事冲突的细节来看整体，你看到的将是这些核心群体被各种方法所摧毁。汪达尔战争很快就结束了，故事很快就传开了。但是在最初的征服完成时，绝大多数的汪达尔—阿兰男子已经不在北非的土地上了。在意大利，这一过程花费了更长的时间，也得到了更完整的记录，其总体状况是很清晰的。狄奥多里克的追随者由两种不同身份的武士组成，他带领到意大利的军队之所以能够保持凝聚力，高级别的武士是关键。他们并非中世纪晚期意义上的少数贵族，而是占到了追随者总人数的大约四分之一，即5 000人或更多。东罗马征服的故事就是这个群体被消灭的故事，少数人投降了，但更多的人或者战死，或者被驱逐出去。由于目前人们倾向于强调身份的流动性，这一证据往往不会得到讨论，但证据是丰富、连贯、详细的。它也与该群体最初形成和随后在意大利境内定居的历史完全吻合。因此，汪达尔人—阿兰人和哥特人固然不是种族群

体，但也没有理由认为这样的群体只是不可捉摸的幻影。他们的灭亡（许多人的确遭到了灭顶之灾）可以也应该算在查士丁尼征服的代价之中。[注]

当然，还有对被征服地区的人民造成的所有附带损害。卡西奥多罗斯称，在狄奥多里克创建王国的过程中，其意大利—罗马臣民的生活没有发生任何变化，这自然是一种粉饰。在整整一代人的时间里，周期性的战争，加上时不时爆发的暴力冲突，肯定给意大利带来了巨大的人口损失。普罗柯比生动地描述了一些城市遭到洗劫的情景，如战争初期的对那不勒斯和米兰的洗劫，还有后来对台伯河口的洗劫。甚至在早年，卡西奥多罗斯就提到过一场饥荒，这场饥荒可能是由军队供应的混乱造成的。贯穿这一切的是一个子主题：战争以城市为中心目标，扰乱农业生产，社会分裂时有发生——比如在战争的最后阶段，托提拉无奈之下把罗马奴隶武装了起来。要对这场战争的影响做出任何定量的判断都是不可能的，但很明显的是，意大利再也不是以前的样子了。

特别是被伦巴第人占领的意大利北部，那里未能从战争的破坏性影响中恢复过来，几乎没有证据表明那里存在复杂的交换系统，而且虽然不完整，但有证据说明那里出现了人口锐减。我们无法得知人口到底减少了多少，但这个罗马晚期世界的重要中心不仅人口数量出现了下降，其经济也一去不回地朝着仅限于本地交换的方向发展。

在君士坦丁堡控制下的地区，情况则大不相同。意大利南部保留了商业性的制陶业，其产品在相当广阔的地区销售，这表明较普遍的交换模式保留了较大复杂性。罗马城也从多次围城中恢复过来，再次成为财富中心，大量进口商品，进口商品的数量按7世纪的标准来说相当可观。这一切与罗马晚期的规模完全不同，人们通常认为，当时这个城市的人口从几十万降到了只有几万。尽管出现了衰退，但有人认为，在7世纪和8世纪早期，意大利南部可能比西罗马故地上的其他任何地方都更加富裕。很难估计如果查士丁尼的军队没有攻打到该地区，这种经济衰退是否能够避免，或者能够避免多少。卡西奥多罗斯的《信札》给人

的印象是，在536年之前，一切都在正常运行，但这只是表面现象。的确，我们在伦巴第人统治下的意大利看到的那种经济简单化现象，在罗马治下的和平不复存在以后，也出现在了后罗马时代西方的所有其他地区。因此，我毫不怀疑查士丁尼的战争在意大利半岛造成了许多不必要的破坏，并导致了许多人的死亡。但也有可能的是，即便仍受东哥特统治，意大利的经济也会走向中世纪早期北方的那种简单模式。(注)

尽管最初征服的速度很快，但在北非并非一切都光明美好。同我们这个时代的新保守主义者一样，东罗马当局发现，赢得战争比建立有效的政府结构容易得多。有一个与查士丁尼无关的问题。得益于阿特拉斯山脉（Atlas Mountains）带来的降水，在罗马古老的北非省份，靠近沙漠边缘和山地的游牧摩尔人与人口密集、农业发达的罗马中心省份非常接近，其中包括东努米底亚、普罗康苏拉里斯（Proconsularis）和拜萨西恩。这些省份经常会发生一些地方性的小规模冲突，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游牧者和定居者之间的关系“控制得比较好”，并不会导致持续冲突。汪达尔人—阿兰人在439年攻占迦太基后接管了这些关键省份，他们继承了与摩尔人建立的联系网络，开始在地中海的一些军事冒险活动中利用摩尔人，尤其是在457年著名的“洗劫罗马”过程中。以某种方式（我怀疑是在此过程中获得的新武器、新财富和新野心的结合），非洲边缘的摩尔人开始不服从汪达尔人的统治，到了5世纪80年代，随着更大的政治结构的出现，摩尔人已有能力周期性地集中足够的兵力打败汪达尔人的军队。事实上，盖利默之所以能够获得很多人的支持来反对希尔德里克，这样的一次失败是主要原因。

贝利萨留推翻汪达尔王国之后，查士丁尼的新管理者要面对的是摩尔人的问题，早在534年，就有报告称努米底亚和拜萨西恩遭到了袭击。(注) 533年到534的快速胜利被证明是虚幻的。与天主教会的关系仍在磨合，剩下的汪达尔人和罗马士兵薪酬短缺。很快，更大的问题来了，那就是与摩尔人的对抗。汪达尔人统治的混乱让摩尔人有能力实现大肆掠夺定居农业地区财富的野心，这些地区是该省的生命线。这个问

题花了10年时间才得以解决，在此期间，新任罗马指挥官约翰·特洛哥利塔（John Troglita）在547—548年取得的胜利再次稳定了中期的局势。这些绝不是小问题，即使没有迹象表明由此产生的冲突所造成的损失与意大利各省遭受的损失一样大。只有一个城市曾经易手，对平民的主要损害似乎来自广泛但小规模的袭击。从5世纪40年代开始，北非沙漠边缘的定居点内外似乎回归政治稳定，考古证据表明，北非各省的经济出现了相当大的复苏，尽管从未完全恢复到罗马晚期的水平。

迦太基腹地似乎特别明显地繁荣起来。在这一时期，人们对城市防御和宗教建筑进行了大量投资。高档餐具和葡萄酒、橄榄油等农产品的出口也略有回升。罗马晚期北非之所以繁荣，是因为它与更广泛的西地中海交换体系联系在一起，而实际上这在很多方面依赖于西罗马，尤其是因为西罗马出于自己利益的考虑而补贴了运输成本，而在6世纪中叶，这些补贴都不复存在。北非不再是西罗马经济繁荣的中心，而仅仅成为东罗马经济中一个相对繁荣的外围地区，东罗马的经济中心位于更靠东的爱琴海和近东。因此，北非仍在出口，但规模要小得多，而该地区的总体财富似乎已回到较为一般的繁荣水平。注

无论是对汪达尔人—阿兰人、哥特人、罗马军队，还是对北非和意大利的各省来说，查士丁尼的战争都只能是一场大灾难。虽然较长期的考古证据并不能表明其毁灭性有普罗柯比所说的死亡人数显示的那么大，但是，在有些地方，无论是意大利的战争本身，还是为控制北非而进行的长期斗争，其影响都极为重大。意大利和北非这两个区域的人口水平似乎都没有恢复到战前的水平，尽管显然有大量的农业活动，而且和平最终恢复后，经济交换和专业化也有一定程度的复兴。当然，我们还必须考虑东罗马赋税的影响。所以，总的来说，很难证明当地的人口从并入东罗马中获得了什么好处，或许仅有的一点好处是即便查士丁尼没有发动入侵，他们也得在北非与摩尔人一决胜负，而查士丁尼的军队应该能比汪达尔人更好地保护定居农业地区。

从受其影响的第二个主要群体即东罗马纳税人的观点来看，征服政

策也没有什么好处。当然，其中一些人也遭受了与北非和意大利那些更为不幸的人类似的间接损失。成千上万在洗劫中幸存下来的人长途跋涉，到数百公里外科斯罗伊斯的新安条克居住，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尽管除了540年之外，东部省份的居民似乎很少受到特别严重的伤害。更经常受到战争不良后果影响的是罗马巴尔干半岛的人口。他们有充足的防御工事，普罗柯比的《论建筑》中列举了数百座堡垒（注意，大多数是“修复过的”，而不是新建造的，所以它们早就存在了），而在查士丁尼统治时期巴尔干半岛的入侵者中，没有一个擅长攻占有堡垒的城市。但问题是查士丁尼经常从巴尔干半岛调出军队去参加意大利的战争。因此，在我看来，第一次对巴尔干半岛真正具有破坏性的攻击发生在539年并不奇怪。当时，查士丁尼刚为贝利萨留找到增援部队，以便利用他在意大利取得的初步成果。这些防御工事表明，皇帝并非完全没有考虑过他的巴尔干臣民，但他更需要军队，不惜将他们置于更大的危险之中。[注]

除了巴尔干半岛和东部的一些省份，对于东罗马的大部分人口来说，征服政策的主要影响体现在税负的增加，而这是为了应付战争和驻守新征服地区的开销，因为来自被征服地区的额外收入肯定要花许多年时间才能稳定下来。参与军队供应（武器、食品、货车、船只和许多其他物品）的特定个人当然会从中受益。对于那些参与供应的人来说，战争总是会带来丰厚的利润，因为需求迫切，通常可以谈成利润丰厚的合同。然而，东罗马的大多数人只能看到这些合同所需要支付的税单，而这些合同的履行对他们几乎没有任何好处。正如我们在上一章看到的，贯穿《秘史》的一个重要主题是查士丁尼对他人钱财的贪婪。《秘史》通篇谩骂，也写了不少受皇帝或其妻子贪婪所苦的人的具体个例。

在非洲的胜利不仅使查士丁尼在政治上不可动摇，还鼓舞了他去挑战更富有的纳税人。在盖利默于君士坦丁堡遭受羞辱后的那一年，东罗马各地区出台了至少9项单独的措施，目的是通过从富人身上获取更多好处来增加整体税收。这是在6世纪40年代对哥特人和波斯人同时开战的代价产生之前（尽管值得注意的是，查士丁尼从未试图同时打两场全

面战争，托提拉的经历表明了这一事实）。我一点也不怀疑查士丁尼统治时期的税收账单增加了，而这确实让我更好地理解了普罗柯比的抱怨。他在《秘史》中提到的所有被毁了的人都是富人，而正如他的教育所证明的那样，他本人肯定来自一个相当富裕的绅士地主家庭。查士丁尼的战争确实增加了税收，但对普罗柯比所属的阶级来说，增加的税收很不成比例，由此引发的愤怒仍在他的著作中燃烧。(注)

过度征税大致有两种类型：政治上的和经济上的。当一群人或者其中大部分人发现自己面临的税收水平十分不公平，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去抗议或偷税漏税时，这就是政治上的过度征税。当然，从政治角度看什么样的税收属于过重，是靠主观判断的。相比之下，经济上的过度征税就有数据可循了。在工业经济中，对生产征税会增加所生产商品的成本，如果你把成本提高到买家不再感兴趣的程度，生产和国内生产总值就会下降。因此，经济上的过度征税可以通过它对整体经济产出的负面影响来衡量，而在总产出实际上没有降低的情况下，依然可能会发生政治上的过度征税。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才需要适当考虑农业经济固有的特点。如果没有充分的理由（谁又能责怪他们呢？），农民并不会在实践中使他们的生产最大化。除非有一个运作良好的市场，可以让他们出售经济作物，否则他们往往不会太努力，只要能够养家糊口并支付他们应交的费用就够了，他们更愿意有更多的空闲时间，以悠闲的形式消耗掉一些潜在的盈余。在这样的背景下，增税有时会增加整体生产，因此，增税并不会必然导致现代工业经济中的那种总产出下降。对农民进行经济上的过度征税，其残酷性体现在无论他们多么努力地工作，都得不到足够的产品来长期维持家庭生活。这通常以慢性、不是立即致命的营养不良的形式出现，营养不良使人更容易患病，而粮食储备很少或者是没有，因此，不可避免的周期性作物歉收会造成高死亡率的爆发。疾病和歉收都会降低人口水平，进而先是导致较贫瘠的土地抛荒，最终或许更好的土地也会抛荒。以这种框架来做定性判断的话，查士丁尼的征服政策是否造成了东罗马心脏地带的过度征税呢？

毫无疑问，征服政策造成了对帝国地主阶层的政治过度征税。普罗

柯比的谩骂是一个迹象，但还有一个更好的例子可以说明。新政权要想迅速获得政治资本，最简单的方法之一就是彻底或部分地逆转其前任最不受欢迎的政策。查士丁尼死后，他的外甥查士丁二世的新政权立即推翻了他对富人征税的政策（或其中一些政策）。[注]这些政策显然很不受欢迎，但这未必说明其对帝国结构造成了严重损害。政治上的过度征税只有在导致重要的政治支持者寻求与现行秩序完全不同的选择时，才会造成严重损害，而实际上，查士丁尼统治时期很少或根本没有出现这种情况。例如，在查士丁尼时代或之后，我们并没有发现拥有土地的精英们离开传统的罗马人的政权，转而效忠波斯政权（尽管普罗柯比故意把查士丁尼描述为不比波斯的国王好多少）。因此，很难证明皇帝的增税对帝国的结构产生了长期的严重损害。更有可能的是，这些政策只是严重惹恼了已经很富有的人。

查士丁尼是否在经济上对东部过度征税，这个问题更加复杂，因为在他统治期间还暴发了一场大规模的瘟疫，在6世纪40年代影响了整个地中海地区。541年，瘟疫沿着红海，经过埃及，到达亚历山大里亚这个繁忙的中转站，此后疫情又迅速蔓延到帝国的其他地方，甚至蔓延到了帝国之外。瘟疫在542年春天到达君士坦丁堡，年底到达叙利亚、巴勒斯坦和非洲的城市。到了543年，瘟疫已经侵袭了亚美尼亚、意大利和高卢，并最终到达不列颠群岛。这就是众所周知的查士丁尼瘟疫，它与黑死病以及19世纪晚期的一场类似的瘟疫大暴发一起，成为迄今为止已知影响人类历史的三大流行病。但是，查士丁尼瘟疫的每一个方面都很有争议，尤其是原因。6世纪30年代末，整个亚欧大陆出现了极端的气候不稳定，536—537年发生了一次尘幔现象，部分太阳光线被大气中的重粒子阻挡，全球气温下降（冰芯样本记录了这一情况）。这一现象似乎是由东亚的火山爆发引起的（尽管这还不确定），随之而来的气候变化可能导致携带鼠疫的中非啮齿动物比以往更广泛地进入红海地区，从而引发了疫情。然而，目前还远不能确定这场瘟疫是否为黑死病（及其相关突变），因为当时的报告表明，这次暴发的情况与黑死病不同。例如，尽管接触和传播速度较慢，但是它比19世纪晚期那场留下了充分

观察证据的疫病流行起来快得多。

这场瘟疫的影响也引起了巨大的争议。同时期的记录显示，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在农村，它都造成了大量的死亡。然而，对于它是否造成了14世纪黑死病那样规模的破坏，仍然存在争论，后者造成了西欧受影响地区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口死亡。那些热衷于将这场瘟疫视为重大危机的人试图找到一些明确的考古学证据，证明东罗马在550年左右出现了经济衰退。但是，正如最近一次全面调查相关证据得出的结论一样，这一论点总体上是很站不住脚的。事实上，东罗马的城市和乡村在6世纪末都显示出持续繁荣的迹象，而且根本没有任何经济衰退的迹象。正如我们将在本章后面看到的那样，对于公元600年之后出现的明显衰退，是有一个与此不同的非常好的解释的。虽然这场瘟疫的确很可怕，夺去了许多人的生命，但没有证据表明它导致了任何普遍或结构性的严重经济混乱。[注]

不过，我希望说明的是，对于地中海地区相当大一部分人口来说，查士丁尼的战争完全是一连串可怕的事件，对此我毫不怀疑。战争肯定给东部居民带来了更高的税负，无论是地主（我对他们的同情通常要少得多）还是农民。许多东罗马人、汪达尔人—阿兰人和哥特人的士兵痛苦地死去。由于附带的破坏和随之而来的不稳定，北非和意大利各省人口中数以万计（甚至更多）的无辜者失去了他们的财产和长期的生计，甚至还有他们的生命。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满足一个专制统治者的要求，他推行这一政策是为了拼命夺回失去的政治资本，后来又陶醉在轻易的胜利所带来的喜悦之中。对许多地区来说，查士丁尼的战争是一场不折不扣的灾难，这或许是比其他任何战争都更需要强调的结论。在描述专制统治者的辉煌胜利时，历史往往过于偏向他们本人的观点，而实际上还有许多其他东西需要说明。

但是，从帝国中心这个更传统的视角来看，查士丁尼的战争到底有什么意义呢？先不说所有人遭受的损失，从帝国中心的角度看，这些战争是否值得呢？对于查士丁尼这个自称为多国的征服者的人来说，毫无

疑问答案是肯定的。在北非的胜利给了他最佳的脱身之计，也让他获得了必要的政治资本，以便在6世纪30年代后期及以后重建政权和君士坦丁堡的礼仪。他平安度过了这一切，最后以83岁高龄寿终正寝，留下了一系列纪念建筑，至今依然让人惊叹不已（圣索菲亚大教堂的确很惊人）。在他看来，他的每一场战争都带来了相当好的结果。到了565年，非洲已经平静了近20年，意大利的大部分地区已经平静了10多年，西西里岛则平静了近3年。对于这位在532年1月的尼卡暴乱中准备坐船逃之夭夭的伊利里亚冒险家来说，征服政策非常成功。但这是这个暴君自己的观点。他所统治的整个东罗马又是怎样的呢？

我认为，可以用两种方法来思考这个问题。一是考察被征服的省份。从君士坦丁堡中央的观点来看，关键问题是战争是否能够在足够长的时间里带来足够的收入，以支付最初的征服和随后的防御的成本。笼统地看——当然，我们只能采用定性而非定量的方法——答案似乎很复杂。西西里无疑是值得的。与西西里在现代意大利政治体中所扮演的角色不同，在古代乃至中世纪的世界中，西西里是一个巨大的奖赏：13世纪，英格兰的亨利三世为了染指西西里而几乎破产。相比之下，查士丁尼大帝几乎没花任何代价就拿下了西西里岛，东罗马轻轻松松地占领着西西里岛，一直到7世纪50年代第一次阿拉伯人的袭击开始之前都是如此，之后占领又以更大的代价一直延续到9世纪。此时，从这个岛屿所获得的肯定已经超过了为它花费的。我认为北非可能也值得。在北非，成本要高得多，而且和在西罗马的前辈相比，东罗马的税务官最终得到的征税地区似乎要小一些。它也更早落入阿拉伯人手中，迦太基在7世纪90年代的沦陷标志着东罗马统治的实际结束。尽管如此，大部分被征服的北非地区此时已经在东罗马人手中150年了，这段时间足以偿还当初征服的代价。事实上，在6世纪末和7世纪初，西西里—北非轴心十分富裕，足以为希拉克略（Heraclius）父子（稍后将更多讲到他们）接受整个帝国提供权力基础。

棘手的是意大利。令人惊讶的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意大利大部分地区仍然是东罗马的一部分，而且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考古证据

表明，和脱离罗马帝国统治的地区相比，那些仍然在东罗马辖下的地区经济更加繁荣。直到8世纪，拉韦纳周围的一块重要飞地，连同罗马和意大利中部与南部的大部分地区，都一直由君士坦丁堡直接统治。后来拉韦纳失守了，罗马也脱离了君士坦丁堡的直接控制，我们会在第7章探讨这件事。在那之后的200年里，意大利半岛的南部地区将继续牢牢掌握在东罗马手中，东罗马对一些孤立的社区的控制则持续了更长的时间。贝利萨留对那不勒斯的占领开启了东罗马人在意大利南部长达500年统治中最辉煌的时期，使人很难得出结论说，10世纪时，征服的代价才刚刚得到偿还。注然而，比这些东罗马人长期统治的例子更引人注目的是，查士丁尼死后，东罗马很快就失去了意大利北部大部分地区和两个中部高地的公爵领地（以贝内文托和斯波莱托为中心）。568年，伦巴第人离开他们在多瑙河中部地区统治了三代的土地，来到了意大利北部，如前文所述，纳尔西斯刚刚扑灭了这里哥特人独立的最后一线希望。他们的到来破坏了这位年迈将军的退休生活。这种突然的、毁灭性的损失，显然打乱了从君士坦丁堡的角度，对查士丁尼征服意大利的价值进行的成本效益分析。对历史学家来说，这也成了一个更普遍的论点的出发点，即不管查士丁尼的短期成功如何，他的征服都或多或少导致了帝国扩张过度，而这是致命的。东罗马不仅没能守住整个意大利，而且在查士丁尼死后的40年里，近东和中东的中心地带税基开始遭受一系列重大损失，而这永远改变了东罗马的性质。这些损失是查士丁尼帝国过度扩张的长期后果，这种说法在多大程度上成立？

大象和黄金床

583年，使节往返于君士坦丁堡和当时的阿瓦尔人联盟的可汗之间。东罗马和阿瓦尔人目前处于和平状态，在这些接触中，可汗向皇帝提出了一系列外交礼物的要求：先是一头大象，后是一张黄金床，最后还有一大笔现金。东罗马的历史学家狄奥菲拉克特·西莫卡塔

（Theophylact Simocatta，他的姓氏意为“独眼猫”）提到了这些交流，但未做任何评论。阿瓦尔人是草原上的游牧民族，他们刚从中国的边缘地区来到亚欧大陆西部，从未见过大象，可能也没怎么听说过大象。显然，之所以会有大象和黄金床之说，是因为可汗及其顾问试图通过向君士坦丁堡当局索要其无法提供的东西，来形象地展示皇帝权力的局限性。在罗马人交付了大象之后，阿瓦尔人又索要一张黄金床，这是他们能想到的最不可能的外交礼物。黄金床也送来后，阿瓦尔人趁机表示蔑视，接着狮子大开口，索要明知会导致战争的大量现金。索要精美的礼物，然后又拒绝，整个烦琐的程序就是一场外交舞蹈，目的是显示阿瓦尔人的优越性，然后打破眼下的和平状态。[注]撇开超现实的元素不谈，这个故事最终有助于我们从根本上理解，为什么在查士丁尼死后的几年里，东罗马会无法继续控制更多意大利半岛的领土。

直到查士丁尼统治的最后10年，阿瓦尔人才进入帝国的考虑范围。此时，哥特人抵抗的余烬已经熄灭，约翰·特洛哥利塔的远征已经稳定了北非的局势。阿瓦尔人的第一个使团于558年抵达君士坦丁堡，据历史学家米南德（Menander Protector）讲述，他们进行了公元500年前后游牧政权所擅长的那种恫吓：

> 一位名叫坎蒂克（Kandikh）的人被选为阿瓦尔人的首席使节，当他来到君士坦丁堡朝廷的时候，他告诉皇帝说，阿瓦尔人的部落是所有部落中最伟大、最强大的一个。阿瓦尔人是不可战胜的，可以轻易地粉碎和摧毁所有阻挡他们的人。皇帝应该与他们结盟，享受他们的有效保护。如果能换取最有价值的礼物、一年一度的付款和非常肥沃的土地，他们会对罗马国家好一些。

现实情况却相当平淡无奇，就像第一个千年的不少游牧民族那样，他们很可能是正在逃避西突厥人的难民，6世纪中期，西突厥人才是真正占统治地位的草原力量。当此时生活在黑海边缘的阿瓦尔人派坎蒂克前往君士坦丁堡时，西突厥人的势力正在崛起。事实上，避开西突厥人

是明智的，他们的政权才是历史上第一个游牧民族的超级大国。阿提拉已经够糟糕的了，然而，尽管他经常被拿来与成吉思汗和忽必烈等伟大的蒙古征服者相比，但他的事业实际上只是局限于中欧和东南欧的小打小闹。著名的匈奴人（Hsiung-Nu）曾经让秦朝的皇帝不堪其扰而修建了长城，但是他们的势力局限于中国的北部边缘地区。然而，西突厥人势力和蒙古人相当，横跨亚欧大陆，从中国一直延伸到东欧。㊟

当时大草原上正在发生一件非常重大的事情，但究竟是什么尚不清楚，因为游牧民族很少写作，而西方和中国的史料都没有涵盖这些，这让我们无法详细地探索大草原内部的过程。因此，一些学者打出了环境牌。当然，6世纪30年代后期，在查士丁尼瘟疫中可能发挥了作用的尘幔事件可能也减少了草原上可用的草料。这一定在某种程度上增加了游牧民族之间的竞争，如果这种影响足够大，那么对其定居人口较多的邻居来说，后果就太容易预测了。

但这并非唯一的可能性。游牧民族依靠以定居农业为主的邻国提供大量的基本食品和其他物品，这些可以通过贸易或榨取来获得。对邻国政治结构的影响力往往是游牧群体建立帝国能力的核心。因此，西突厥人空前的帝国建设，其根源很可能是草原周围世界的变化，也可能是草原本身的变化（两者的某种结合也是可能的，即使这种可能性不是很大）。当然，在此过程中大瘟疫可能发挥了作用，但是在缺乏足够证据的情况下，切记不要过早地排除各种可能性。㊟幸运的是，我们在这里关心的不是西突厥汗国的崛起本身，而是其主要影响之一，即阿瓦尔人在西方的出现，而这方面的记录要明确得多。

即使阿瓦尔人是难民，他们也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可以在6世纪中叶中欧和东南欧的战略要地所向披靡。在公元558年之前，情况相当简单。喀尔巴阡山脉以西的多瑙河中部地区（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匈牙利和罗马尼亚西部）有两个讲日耳曼语的王国：西部的伦巴第人王国和更往东的格皮德人王国。黑海北部的土地上有两个讲突厥语的保加尔人游牧群体，分别是乌特格尔人（Utigurs）和库特里格尔人（Cutrigurs）。在

两者之间的特兰西瓦尼亚高地和多瑙河湾部以北的一些土地，一系列非常小的斯拉夫群体在这一时期定居下来，这里实行的是某种形式的酋长制而不是王国制。6世纪20年代前后，斯拉夫人才开始与罗马国家防御的多瑙河边界发生有记录的接触，从那时起，他们对罗马领土的掠夺成为日益严重的问题。

如果你像查士丁尼一样，在君士坦丁堡的宫殿里运筹帷幄，那么总体战略是很明确的，那就是在北部边境的一端，让伦巴第人与格皮德人对战，在另一端，让乌特格尔人与库特里格尔人对战，同时尽量减少斯拉夫人的突袭对中部可能造成的伤害。总的来说，查士丁尼在位的大部分时间都致力于此。但任何政策都不是完美的，而且，他要从巴尔干半岛撤回军队到意大利作战，这肯定会在巴尔干半岛造成额外的损失。539年和559年，库特里格尔人发动了两次大规模侵袭，罗马各省均受到了影响，第一次侵袭使成千上万的俘虏沦为奴隶。而在6世纪40年代后期，斯拉夫人的侵袭也变得更加猛烈。(注)

考虑到当时的情况，阿瓦尔人似乎大有可用，米南德记录了查士丁尼对第一次接触的最终回应：

> 他派出了御前侍卫瓦伦蒂努（Valentinus）作为大使，敦促这个部落与罗马人结盟，拿起武器对抗他们的敌人。这是一个非常明智的举动，因为无论阿瓦尔人获胜还是失败，罗马人都会获利。(注)

起初，一切都甜蜜而愉快。到了562年，阿瓦尔人的势力已经扩张到黑海的北部海岸，经过一系列没有记录的战役，他们吞并了乌特格尔人和库特里格尔人。毫无疑问，这完全符合559年库特里格尔人第二次大规模入侵罗马巴尔干半岛之后的帝国计划。因此，没有理由不给予阿瓦尔人有利的盟友地位和大量的援助（或者说是“补贴”，取决于你怎么看）；直到565年11月查士丁尼去世，他们都享受着这种援助。

查士丁尼去世后，政权的更迭带来了政策上的决定性变化。我们已

经看到，查士丁二世试图通过推翻他舅舅的税收政策来赢得政治资本，而这一政策也被描述为他停止对外援助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当阿瓦尔的下一个使团一路小跑来到君士坦丁堡，要领取一年一度的礼物时，他们大吃一惊，因为新皇帝告诉他们：

> 从此以后，你们再也不能靠损害帝国利益致富，也不能自行其是而不给我们好处了。因为你们不能从我这里得到任何东西。

据米南德说，这让阿瓦尔人的使节“大吃一惊”，对于空手而归非常犹豫，尽管他们最终还是空手而归了。[注]

使节们的反应并不仅仅是心胸狭隘。东罗马取消对外援助将威胁到阿瓦尔联盟的整体稳定。就像他们之前的匈人一样，阿瓦尔人缺乏直接统治他们联盟中被征服者的能力，甚至可能连这样做的愿望都没有，而是借助下属的首领来统治。这意味着为联盟添加新成员很容易，而且整个联盟可以迅速发展。只需要一次快速的军事行动和一场正式的屈服，一个新的臣服群体就基本上算是加入了这个联盟。但是，由此产生的政治结构也会十分脆弱，因为臣属民族旧有的忠诚模式并没有被打破，在争取独立的过程中很容易重新确立。尽管第一个千年的资料记载了游牧民族的豪言壮语，但维系其联盟的唯一因素是占统治地位的领导者及其直接支持者的威望，与所有的臣属群体相比，他们的人数往往并不多。声望不过是现实中的或被感知到的军事支配，再加上重复利用的声望礼物。两者通常都是成功战争的产物，而且两者都维系着这样一种认识，即相对于试图发起抵抗，接受阿瓦尔人的统治是更好的选择。582年，阿瓦尔人包围了重要的多瑙河要塞锡尔米乌姆，却意识到自己无法取胜。罗马指挥官后来接到了其对手的一个特别的通知，说阿瓦尔人愿意撤退，但前提是罗马人交出一份大礼，让可汗用来掩盖战败的事实。声望的任何重大损失都可能导致阿瓦尔当局受到考验，即使它最终没有被推翻，也要付出时间和相当大的精力及生命代价。[注]

566年皇帝的故意轻慢实在是太明显了，可汗别无选择，只能做些什么来弥补失去的收入，同时弥补他在威望上的损失。在一项富有典型中世纪早期想象力的政策倡议中，可汗和他的顾问们决定，他们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发动一场战争。他们选择的战争对象是法兰克人；同一年，他们大败法兰克人最东边的国王西吉贝尔特（Sigibert），西吉贝尔特后来“立即把面粉、蔬菜和牛羊送到了阿瓦尔人那里”。[注]正是这种对西行日益增长的兴趣最终把我们带回了意大利。

就在查士丁忙着拒绝阿瓦尔人的时候，格皮德人和伦巴第人之间发生了一系列争执。566年，格皮德人获得了帝国的军事援助，但他们后来没有遵守约定，拒绝将锡尔米乌姆城交还给帝国。因此，罗马人并不打算在公元567年再次干预，当时伦巴第人以高昂的代价获得了阿瓦尔人的帮助，一劳永逸地粉碎了格皮德人的独立地位。据说就是在这个时候，伦巴第人的国王阿尔博因把被他打败的敌人库尼蒙德（Cunimund）的头骨做成了一个酒杯，但他后来却犯了一个错误，就是娶了库尼蒙德的女儿罗莎蒙德。

568年4月2日，春草初生的时候，伦巴第人组成一支协调一致的队伍，离开了多瑙河中部，这情形就像90年前狄奥多里克率领大队人马经过同样的关口一样。队伍有好几万人，其中既有伦巴第人，也有其他部族，既有贵族，也有自由人和奴隶，他们对东罗马新征服的意大利的安全造成了致命的威胁。很快，伦巴第人的“首领”（duces，你可以将其翻译成“公爵”，但这有点时代错乱的感觉）占领了（除拉韦纳附近一块飞地外）意大利北部平原的大部分城市，在意大利中部和南部的山区高地建了两个独立的公爵领地，即贝内文托和斯波莱托。

根据200多年后的一份史料，伦巴第人是受到了消灭哥特人的纳尔西斯的“邀请”，才迁徙到意大利的，因为纳尔西斯和查士丁的妻子索菲亚发生了争吵。考虑到纳尔西斯过去的丰功伟绩，尤其是他很快就要退休，当时正在东罗马的城市罗马安享晚年，这样的说法完全不合情理。这只不过是伦巴第人后来说法的一个方面，这个说法与8世纪的情况

（具体的我们将在下一章中看到）关系很大；伦巴第人声称，他们有完全合法的权利在意大利建立王国。野心可能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因为在迁徙决定的背后，常常既有“推”的因素，也有“拉”的因素。我毫不怀疑，伦巴第人的领导层这么做，并不是因为他们认为东罗马人软弱。毕竟，伦巴第特遣队曾经参与哥特战争，亲眼看见了东罗马对哥特人和前来救援却姗姗来迟的法兰克大军的毁灭。他们不可能认为征服一块东罗马领土易如反掌。因此，很明显，就像4世纪末和5世纪初几个面对匈人崛起的日耳曼部落一样，在做出这种破坏性的危险举动时，伦巴第人的领导层决定（并设法说服了大部分追随者），有组织的撤退是对付猖獗敌人的最佳方法。566年击败西吉贝尔特，567年摧毁格皮德人，这充分表明阿瓦尔人的势力正在迅速崛起，其行动方向越来越向西偏移。阿瓦尔势力在中欧的崛起，与伦巴第人进入查士丁尼最近征服的意大利之间，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注]

查士丁尼对意大利的征服是否野心太大，导致帝国扩张过度，答案可以归结为对两个稍微复杂一点的问题的回答。如果没有伦巴第人的入侵，东罗马在意大利的统治能够像在北非那样得到巩固吗？如果是这样的话，查士丁尼是否对阿瓦尔势力的崛起及其向西转移（正是这种转移引发了伦巴第人的入侵）负有根本责任？第一个问题的答案必然是肯定的。君士坦丁堡统治意大利的主张无疑引起了人们对帝国税务员的抱怨。查士丁尼征服意大利，仅仅是为了他自己的利益，并没有为其他任何人着想。同时，这里的税收制度基本上是东罗马本身以及北非所实行的。在没有其他选择的情况下，没有明显的理由会导致意大利的人口（无论地位高低）不能最终适应东罗马的统治规范，毕竟意大利中部和南部的许多地区实际上已经适应了。除了突然涌入的伦巴第人，没有其他敌人有能力推翻君士坦丁堡的统治。事实已经证明，至少纳尔西斯的军队远远优越于各个法兰克人队伍（这是唯一一场激烈的竞争），法兰克人在6世纪50年代来到意大利，想在狄奥多里克的王国崩溃后分一杯羹。

要想对第二个问题做出肯定的回答，你就要相信，在阿瓦尔人最初

征服乌特格尔人和库特里格尔人的过程中，查士丁尼558年提供给他们的补贴发挥了关键作用。除此之外，阿瓦尔人扩张的其余阶段都是在没有东罗马补贴的情况下完成的，而随后他们势力增长并向西迁移，可以说更多是取消了维稳支出的查士丁二世的错，而不是他那发放维稳费用的舅舅的错。阿瓦尔人势力崛起的模式与匈人非常相似，也形成了一个良性或恶性的循环（取决于你的视角）；征服带来了更多的臣民，从而增加了军事能力，但也在同盟内部造成了更大的政治压力，而两者都有一个固有的倾向，那就是引发进一步的军事扩张。我们几乎可以提出这样的观点，即查士丁尼应该已经意识到阿瓦尔人太危险了，不能用他传统的分而治之的办法来处理，也不应该在558年给他们提供最初的补贴。但这涉及大量的猜测，而且我们并不清楚在阿瓦尔人征服保加尔人的过程中，东罗马所提供的资金是否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换句话说，似乎更有可能的是，在558年，根本就没人预见到阿瓦尔势力会发展到如此惊人的高度，而查士丁尼在阿瓦尔人崛起过程中的作用微乎其微。没有阿瓦尔帝国的话，看不出君士坦丁堡有什么理由不能无限期地控制意大利半岛的大部分地区。

总而言之，把阿瓦尔人的崛起归咎于查士丁尼似乎有点牵强，因此，皇帝在战略上可能也并不是那么草率。此外，阿瓦尔人还应该对查士丁尼之后巴尔干半岛的重大损失负责。他们为自己的利益考虑，希望获得西北部的部分地区，但他们也促使斯拉夫人更普遍地侵入该地区。斯拉夫群体想要摆脱阿瓦尔人的侵略性支配，阿瓦尔人以残暴的方式统治着尽可能多的斯拉夫人，就像对待格皮德人和保加尔人一样。因此，阿瓦尔帝国的崛起从负面刺激斯拉夫人入侵罗马的领土。与此同时，依然是与匈人一样，阿瓦尔人定期在罗马巴尔干半岛发动大规模战役，以此向君士坦丁堡勒索金钱。特别是在6世纪80年代和7世纪的第二个十年里，这类战斗给巴尔干半岛的防御体系造成了巨大的漏洞，而查士丁尼的建筑活动就是为了弥补这些漏洞。这又意味着，罗马人本来可以有效对付的较小的斯拉夫群体，却转移到罗马的土地上，为自己开辟新的领土。

这是一个决定性的时刻。巴尔干大部分地区的斯拉夫化，以及君士坦丁堡对这一区域控制的丧失，的确可以追溯到600年前后的几十年，而阿瓦尔人使这一切成为可能。所以，如果仔细考虑的话，责备查士丁尼的理由并不充分，因为阿瓦尔人是这一切问题的核心。事实上，当你停下来真正思考这些年来事件之间的联系时，对查士丁尼不利的证据会被进一步削弱。因为，虽然阿瓦尔人在6世纪80年代入侵罗马巴尔干半岛导致了最初几拨斯拉夫人大规模定居，但是6世纪90年代罗马人的反攻已经大体恢复了对局势的控制。[注]事实上，7世纪第二个十年阿瓦尔人进一步的战役才是真正关键的，因为这些战役带来了无法控制的斯拉夫化，而这种斯拉夫化从未被进一步的反击所逆转。6世纪90年代之后，罗马没有再发动反攻，其原因在于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第二次战略转变。

亚洲七城

在《启示录》的第2章和第3章中，万军之主向罗马亚细亚行省（位于今天的土耳其西部）7个城市的基督教社群分别口述了一封信。这些城市中既有以弗所和萨迪斯（撒狄）这样的大都市，也有推雅推喇（Thyatira）这样的小城市。信件的基本模式是先点出教会的名字，指出其主要罪行（对于7个教会中的5个是如此），接着就忠信行事的好处提出警告或激励，再给出应许。每一封信中都有一句也许带有不祥意味的著名叠句："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圣约翰写作时，特别是在指出那些令人忧心的罪恶时，想到的是他那个时代的基督教社群。但是，要说这些城市在什么时候需要这样的警告，那就是在查士丁尼死后。

大多数城市保留了大量的基督教社群，直到1923年《洛桑条约》签订后被迫进行人口交换，情况才有所改变。但是，在查士丁尼去世后的大约80年里，罗马亚细亚行省的基督教城市，以及它南部和东部邻近地

区的城市，即东罗马的心脏地带，都遭受了一场大灾难。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埃及先是落入萨珊波斯的手中，此后不久又被先知穆罕默德在阿拉伯沙漠中心建立的伊斯兰势力吞并。被征服地区的古老基督教城市作为复合城市幸存了下来，但穆斯林的征服和改信活动注定会使这些地区的基督徒人口长期下降，并在曾经是古代基督教心脏地带的地区成为少数群体。在《启示录》中提到的小亚细亚的城市中，发生了另一种灾难。这些城市仍然掌握在信奉基督教的君士坦丁堡当局手中，但20世纪的考古研究揭示了它们曾经遭受的严重破坏。

萨迪斯尤为突出，它从一个伟大的城市沦落为一个军事要塞，也许还是一个政府中心，而且这一切发生得很突然。直到6世纪晚期，这座城市仍然繁荣昌盛，并热情地维护着它的伟大建筑。这里的商业活动似乎也像以往一样繁忙，考古挖掘人员在主要的浴场外发现了一排商店，似乎充满了勃勃生机。最豪华的房子也许在标准上有一点下降，但仅此而已。610年遭波斯人洗劫后，这里的情况变得十分糟糕。似乎很少有人被杀，但急于逃难的人们来不及从商店里带走他们的物品，这座城市从此一蹶不振。在平原的遗址上，挖掘者所发现的7世纪的一切不过是一些破旧的小房子，活动的中心转移到了附近有防御工事的山头。但这实际上只是一座堡垒，几乎完全靠对旧城材料的再利用建造而成，从来就不是人口中心。作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城市，萨迪斯不复存在。那里的生活仍然在继续，但只是以要塞和几个小村庄的形式存在。在附近的以弗所，情况没有那么糟，但新城与旧城之间的直接连续性也被打破了。人们居住在两处新的四周有城墙的区域，一处位于旧址内部，方圆一平方公里，另一处是圣约翰教堂外围一个更小的区域。这两组城墙内的人口显然比仍然生活在萨迪斯的更多，也更多样化，其经济生活也更为丰富。例如，我们碰巧知道那里有一处大市场，似乎是定期集会。但即便如此，在规模、财富和宏伟方面，公元600年以后的以弗所也仅仅是它从前的影子，而小亚细亚所有罗马晚期城市的考古情况都与此非常相似。[注]

曾经的大城市沦为驻军的小驻地或小的农业集镇，就连君士坦丁堡

也没有逃脱这种命运。7世纪，这座城市的人口急剧下降，可能减少了90%，那些宏伟建筑也从这时开始土崩瓦解。按照中世纪早期的标准，它仍然是一个大城市，但它在7世纪和8世纪的样子只是其在罗马晚期时的影子。这完美地反映了整个帝国的状况。到了640年，也就是查士丁尼死后的75年，埃及和中东地区落入了阿拉伯人之手，小亚细亚西部变成了战场。你可以用16世纪奥斯曼帝国的数据来玩一个游戏，看看这些损失对帝国税基的影响，因为这些数据和查士丁尼帝国的情况差不多。从中可以看出，穆斯林对埃及和中东的征服，再加上小亚细亚西部的经济崩溃，意味着君士坦丁堡的皇帝们将会失去每年税收收入的三分之二到四分之三。注以弗所和萨迪斯的居民所经历的是一场微观上的灾难，而帝国朝廷的灾难在宏观层面上与之对应。东罗马这种令人震惊的衰弱源于君士坦丁堡东线的崩溃，与它长期的敌人和偶尔的伙伴波斯帝国有关。

波斯阵线是一个巨大的对抗战场，涉及三个独立的冲突区域。在北方，两个帝国在高加索山区形成对峙。战斗的结果往往是赢得或丧失对以各个山谷为基础的小王国的控制，如亚美尼亚和伊比利亚，在6世纪时还有拉奇卡，拉奇卡的人口被地形自然划分开来。而在南方，战争往往是通过代理人进行的。这一次是阿拉伯人，因为传统的罗马军队和波斯军队在分开他们领地的广阔沙漠地带都很难施展。因此，地理中心往往也是主要的战场，这个中心就是美索不达米亚。自3世纪以来，双方在这里建立了强大的堡垒，配备了大量的驻军，并部署了大量的部队提供支持。在这个区域，对于处于进攻位置的帝国来说，战争（除了540年那种非常不寻常的情况）早已成为对战略要地的长期包围；如果你处于守势，就要坚决瓦解包围你的军队。

查士丁尼给他的帝国继承人留下的直接遗产是所有这三个区域的和平。在527年至532年之间，美索不达米亚发生了几次战斗，540年之后又发生了几次，但是，美索不达米亚的武力冲突很快陷入僵局，早在545年就停战了。在其他地方，似乎有更多的得失，所以战斗一直持续到551年，一次长达5年的停战结束了北方的战争状态。557年，两个帝

国达成了全面停火，562年达成了适用于各地的正式和平协议。到查士丁尼去世时，美索不达米亚已经安静了20年，高加索地区安静了15年。注

两个因素引发了一个不稳定的恶性循环，一个是罗马和波斯关系的长期特征，另一个则是全新的因素。新皇帝登基后通常需要留下自己的印记。查士丁二世面临着他舅舅查士丁尼——“多国的征服者”——留下的异常有害的遗产。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为了向朝廷上的各派势力表明自己确实是不容小觑的统治者，新皇帝不仅对阿瓦尔人的使节非常无礼，而且就像年轻时的查士丁尼在发动西方征服之前那样，他也决心通过损害波斯来确立自己的统治地位。从君士坦丁堡的角度来看，波斯人是最佳的敌人，把他们作为野心的目标还有一个额外的好处：查士丁尼从未取得过波斯人的重大胜利。胜利演说应该很容易写：“查士丁尼，我超越了你。”这是多么诱人的前景呀！

当然，问题在于，虽然波斯人是首选目标，但正如许多罗马皇帝付出代价后才发现的那样，波斯人也很难对付。让查士丁二世鼓起勇气试图通过对抗波斯来确立自身统治的，是第二个，也是全新的因素，即西突厥人的日益强大。到了6世纪60年代后期，西突厥霸权已经延伸到了咸海、里海，甚至黑海的北部边缘（这也是阿瓦尔人很乐意向西进入多瑙河中部地区的另一个原因），西突厥因而成为罗马与波斯关系中的一个潜在因素，因为其军队现在可以轻松地通过高加索地区，直接进攻两个帝国中的任何一个，甚至同时进攻两个。查士丁二世的战略集中在鼓动西突厥人对抗波斯人，为此，一系列的使节和礼物从君士坦丁堡源源不断地来到大草原，实际上，如果继续向前，再走这么远的距离就可以到达中国。在查士丁二世看来，最终的结果显然令人满意。根据计划，东罗马和西突厥的军队将在573年发动一场联合大作战。罗马人会进攻美索不达米亚的要塞尼西比斯，这是自210年前尤利安皇帝战败后，罗马人就失去的要塞，而西突厥人则通过从东方进攻来阻止波斯发起回击。

草刚长起来，罗马军队就隆隆地向尼西比斯进发，但突厥人迟迟没有露面。结果是一场灾难。在激烈的战斗中，波斯驻军坚持了下来，镇定自若的波斯人集中兵力发起了一次有力的反攻。一支部队进入叙利亚，但科斯罗伊斯一世（就是查士丁尼很久以前拒绝收养的那个科斯罗伊斯）率领他的主力攻打要塞达拉——罗马美索不达米亚王冠上的宝石。经过6个月的包围，波斯人突破了城墙，洗劫了这座城市，城中居民沦为奴隶。查士丁二世的宏大计划完全失败了。他不但没能攻占波斯的要塞，反而失去了自己的要塞。悲痛欲绝的皇帝精神和身体都垮了，权力被移交给了摄政委员会。突厥士兵为什么没有露面，我们不得而知。有人认为这是他们的诡计：让两个潜在的敌人针锋相对，自己坐收渔翁之利。也许是这样，但是当576年一个新的罗马使团到达西突厥人那里时，老可汗已经死了，军队没有露面，可能仅仅是因为他的去世。不管怎样，查士丁破坏了东方的关系，却在真正重要的美索不达米亚让波斯人获得了巨大的胜利。他在高加索地区的几次胜利根本就不足以弥补这样的损失。(注)

在接下来的10年里，战争一直在持续。576年，罗马人在美索不达米亚前线取得了一场大胜，他们俘虏了国王的妻子，扑灭了国王发动战争时带来的圣火，甚至淹死了他的大祭司。这足以维持摄政委员会的运作，公平地说，罗马人也牢牢控制着他们在高加索地区的利益。但是，美索不达米亚地区持续不断、代价高昂的战争逐渐对他们不利。到5世纪80年代后期，新皇帝莫里斯（Maurice）发现国库空虚，军事上也陷入了困境。588年，重要的边境城市马蒂洛波利斯（Martyropolis）的守军没有领到军饷，他们索性将要塞移交给了波斯人。驻扎在埃德萨附近的帝国军队的大部分人听说薪水将被削减四分之一，于是开始反叛。即使他们的将军在他们面前展示著名的曼德兰圣像（Mandylion），他们也不为所动。曼德兰是“非人手所造”的基督圣像，是基督教最神圣的遗物之一，人们曾经认为它是都灵裹尸布（Turin Shroud）的早期化身。士兵们对此无动于衷，甚至向它扔石头，莫里斯不得不收回减薪的决定，到别处去寻找必要的金钱。

正当罗马帝国这辆火车驶近缓冲区时，一条脱险的通道出现了，它就是波斯人中又一次有争议的继承。589年，波斯的重要将领巴赫拉姆（Bahram）反抗新国王贺米斯达四世（Hormisdas IV）。巴赫拉姆战功赫赫，其中包括588年对突厥人的决定性胜利，国王感受到了他的威胁，想要杀一杀他的威风。于是，在军队于高加索地区败给罗马军队之后，国王给他送去了一套女装。在随后的混乱中，贺米斯达四世遭到废黜后被杀，巴赫拉姆夺取了政权。贺米斯达四世的儿子、选定的继承人科斯罗伊斯二世逃往君士坦丁堡，请求莫里斯的支持。作为回报，科斯罗伊斯二世提出在高加索地区的阵地上对罗马做出巨大让步。巴赫拉姆则提出，如果莫里斯支持他，波斯不仅可以归还达拉和马蒂洛波利斯，甚至还可以归还尼西比斯。莫里斯最终选择了科斯罗伊斯，因为把美索不达米亚边境前后移动两三个堡垒的距离并不会带来根本的区别；而如果在高加索地区取得巨大收获，罗马人就能在战略上控制通过扎格罗斯山脉的通道的最北端，这些通道直接通向位于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之间的波斯帝国的经济中心地带，就像是插在波斯咽喉上的一把刀。

事实证明莫里斯的支持是足够的，到了591年，科斯罗伊斯二世登上了王位。在时运不济的查士丁二世试图打出突厥人的王牌近20年后，双方最终宣布和平，罗马人满怀感激地接收了亚美尼亚的大部分地区。这一切本身都很好，君士坦丁堡的史料适时地为莫里斯的胜利高唱赞歌。然而，问题是罗马人的收获实在太大了，其本身就是一个进一步破坏稳定的因素。最近的一项研究称这是东罗马的“凡尔赛时刻”。条约给了罗马人太大的战略优势，在适当的时机出现时，任何一位波斯国王都必然会再次诉诸战争来恢复平衡。[注]我相信现在已经很清楚了：这两个帝国的内部政治结构已经相当不稳定，尤其是在发生政治权力转移时，因此这样的机会不久就会出现。

事端是由莫里斯和军队之间持续的紧张关系引起的。591年的和平把他的军队从波斯前线解脱出来，皇帝把官兵派到巴尔干半岛，在那里他们逆转了阿瓦尔人在6世纪80年代取得的一些胜利。然而，莫里斯的将领们坚持认为，要想对阿瓦尔人造成真正的伤害，应该在草还没有长

出来的时候及早作战，因为这将妨碍敌军关键骑兵部队的行动。602年冬天，野战军接到命令，不准回到过冬的营房。到了11月，他们已经发起叛乱，在一个名叫福卡斯（Phocas）的军官的领导下，向君士坦丁堡进发。莫里斯于11月22日逃离君士坦丁堡，但和家人一起被抓获。福卡斯在11月24日登基，并在3天后处决了莫里斯和他5个儿子中的4个。此后不久，莫里斯的第五个儿子狄奥多西（Theodosius）和前皇帝的许多要员一起被杀。

或许，被杀的并不是狄奥多西本人。狄奥多西的头颅从未在君士坦丁堡展示过。不久之后，一个自称是狄奥多西的人出现在波斯军队的行列中，这支波斯军队称要为被废黜的莫里斯复仇，因为他是当时在位的国王科斯罗伊斯二世的恩人和资助人。我们不知道狄奥多西是否真的逃脱了，但即使他逃脱了，当他不再有用的时候，科斯罗伊斯也会很快就把他干掉。结果，这两个古老帝国之间爆发了新一轮的灾难性战争。㊟

当罗马帝国的政治充斥着政变和叛乱时，科斯罗伊斯二世有条不紊地展开了对几乎整个东罗马的侵犯。即使是帝国新救星希拉克略（和他父亲）的到来也于事无补。610年10月，希拉克略率领一支海上远征队，从北非一路赶来，翻过海堤，冲入了君士坦丁堡。到了这年年底，罗马在幼发拉底河以东美索不达米亚前线的所有据点都被有步骤地攻克了，这为波斯更宏伟的野心开辟了道路。607年时，莫里斯在591年条约中取得的亚美尼亚已经丧失，所以对波斯一方而言，形势一片大好。611年，科斯罗伊斯的总司令沙赫巴勒兹（Shahvaraz）率兵深入罗马的叙利亚，占领了阿帕米亚（Apamea）、安条克和埃米萨（Emesa）。然而，与540年不同的是，这不仅仅是一次突袭，波斯人留在了那里。

波斯人向北推进到安纳托利亚高原，占领了该撒利亚。随后在南部，他们占领了大马士革，614年，包括耶路撒冷在内的巴勒斯坦全部沦陷，最神圣的圣物真十字架也失去了；这个真十字架据说是君士坦丁的母亲海伦娜（Helena）发现的。继续向北，波斯帝国实行了焦土政策。同年，以弗所大城遭到猛攻，稍晚一点应验了《启示录》中的警

告，以弗所城中心化为灰烬和瓦砾。

科斯罗伊斯嗅到了彻底胜利的气息，拒绝了日益绝望的君士坦丁堡当局提出的所有和平提议，其中包括616年一个表面上来自元老院的极其可怜的使团（因为波斯国王拒绝承认希拉克略），使团提出接受科斯罗伊斯为“最高皇帝”，罗马人都是他的“奴隶”。621年，对埃及的一次入侵正式启动并成功完成。波斯人还同时对塞浦路斯和爱琴海岛链进行海上袭击，袭击蔓延至小亚细亚，直到626年7月底才沉寂下来。此时，帝国首都本身面临博斯普鲁斯海峡另一边的波斯军队的威胁，而阿瓦尔军队则直接逼到了狄奥多西城墙外。

《复活节编年史》（*Chronicon Paschale*）中记录了一名目击者对这次包围的描述，读来十分有趣。阿瓦尔人的军队花了好几天的时间，却根本无法冲破城墙。接着是关键时刻。一些被征服的斯拉夫人擅长水战，在整个6世纪，他们都以擅长使用独木舟而闻名，并且通过运送撤退的劫掠者离开罗马领土赚了很多钱。进入君士坦丁堡唯一可能的路线是希拉克略走的那条，即水路。因此，一支庞大的独木舟队伍奉命从亚洲海岸把波斯的增援部队送过来。罗马人一直保持镇定，直到包围他们的斯拉夫人开始返回欧洲。罗马人的船队被放了出来，上面载着希腊火，斯拉夫人的船队被粉碎了。看到这一团混乱的局面，阿瓦尔人军中的其他斯拉夫人马上开始逃窜，可汗不得不让他更忠诚的士兵对付这些人。包围在混乱中瓦解了。在坚不可摧的君士坦丁堡，波斯征服的高潮就此退去。

君士坦丁堡被围困的时候，希拉克略本人并不在城中，而是在东部的亚洲海岸重新训练和组织他的野战部队。他对君士坦丁堡的防御非常有信心。至关重要的是，他还成功地与西突厥人谈判建立了一个有效的联盟，而当年正是这个变色龙让查士丁二世发动了战争。627年，一支庞大的突厥军队冲入高加索地区，进入波斯人支配的伊比利亚王国。他们洗劫了这一地区的首府第比利斯（Tiflis），杀死了听命于波斯的国王，并将4万士兵移交给希拉克略，以便进行下一步行动。皇帝志在必

得。12月，联军越过扎格罗斯山脉，沿着底格里斯河进入萨珊帝国的心脏地带，在尼尼微城外击溃了一支波斯军队。希拉克略没有进攻首都泰西封的守军，而是采用焦土战术打击波斯帝国的经济中心。然后他停下来，坐等波斯政体内爆。628年年初，科斯罗伊斯二世被一场政变推翻，随后出现了一系列短命的政权。最终希拉克略得到了他想要的东西。波斯人从被征服的罗马行省撤退，这些行省中的大部分行政机构都没有发生变动，希拉克略带着真十字架回到了君士坦丁堡。

他重建的帝国已今非昔比。小亚细亚西部富饶的土地遭到了破坏，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埃及的忠诚也在波斯统治的15年中动摇了。巴尔干半岛的局势完全失控。由于所有的军队都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另一边，阿瓦尔人和斯拉夫人十分猖獗，后者的定居点迅速增加。也许最糟糕的是，帝国的国库已经耗尽。在危机最严重的时候，希拉克略被迫采取了非常措施。军饷减半，首都内部的免费面包停止供应，教堂宝库里的贵金属被悉数征用。这些勉强够用来支付给突厥人的费用，发动对波斯的大反击。带着胜利的荣耀，扛着象征上帝眷顾的真十字架，希拉克略现在可以着手重建帝国了。[注]

从630年前后的情况看，罗马内部并没有什么能妨碍重建的因素。过去25年的噩梦对帝国造成的损失并没有3世纪危机最严重的时候大。当时，东罗马东部行省的大片地区脱离了罗马的统治。然后，在瓦勒里安失败被俘之后的15年里，帕尔米拉城成为一个后继国的中心，这个后继国打败了波斯人和罗马人，其疆域从埃及一直延伸到小亚细亚。不过，罗马帝国后来恢复了元气，于3世纪70年代中期在奥勒留的领导下恢复了控制，又利用城市的税收重新充实了国库。到了4世纪中叶，来自这些地区的史料再次丰富起来，对帝国的忠诚再次成为人们的第二天性，而近东正处于长达300年作为君士坦丁堡中心地带的中间阶段。

一般而言，希拉克略和他的继任者没有理由不承担与此类似的重建工作。是的，巴尔干半岛是额外的问题，但它在3世纪时也是如此，并且莫里斯的战役表明，阿瓦尔人是可以被击败的。如果没有阿瓦尔人，

斯拉夫人就只不过是袭击者，他们还没有能力在公开的战斗中对抗帝国的军队。帝国内部的宗教冲突也没有人们有时想象的那么严重。的确，卡尔西顿会议上的辩论仍在继续，但即使相关教义问题最终无法解决，帝国的结构也不会受到威胁。没有证据表明宗教上的不和使东罗马更容易被波斯征服，有迹象表明在6世纪后期，围绕卡尔西顿会议的争吵正在缓和，而此时波斯带来的严重危机尚未打破来之不易的帝国政策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在6世纪80年代终于出现在了宗教领域。注因此，希拉克略返回君士坦丁堡时完全有理由保持乐观。而使这一切化为乌有的是在近东战略地理中出现的又一个新因素，其影响将大大超过西突厥人。就在希拉克略着手从废墟中重建他的帝国时，一个刚刚被伊斯兰教统一起来的阿拉伯世界彻底颠覆了过去一千年的旧格局。

伊斯兰教的兴起是另一个极具影响力的现象，因为它，第一个千年的亚欧大陆西部的历史仍然与21世纪息息相关。发生了一连串将中世纪和现代世界与过去的一切区分开来的变革，包括罗马陨落、地中海占支配地位的古老世界秩序终结、基督教兴起、东部和北部融入欧洲主流，而伊斯兰教的横空出世是这一连串变革中的最后一环。和其他那些因素一样，这也是一个极其复杂的故事。就历史而言，主要的问题是缺乏来自伊斯兰世界内部的早期原始资料，因为在伊斯兰世界中，9世纪以前关于穆罕默德生平的叙述都没有流传下来。在那之前，伊斯兰教已然经历了两次重大革命：一次是7世纪导致逊尼派和什叶派分裂的危机，另一次是8世纪中叶的阿拔斯革命。考虑到先知至高无上的重要性，9世纪对先知生平的叙述使伊斯兰教在此前的发展合法化，这是可以理解的，但这一切与7世纪早期的现实究竟有什么关系，还不太确定。注

然而，伊斯兰教崛起的背景显然与罗马和波斯之间的超级大国冲突有很深的关联。沙漠边缘的阿拉伯人是这两个帝国之间第三个沙漠边境地区的关键人物。大规模的常规军队不可能在那里作战，但沙漠至少提供了突袭的机会，并将敌人的注意力从亚美尼亚和叙利亚前线转移到北部。因此，双方都招募、资助和武装阿拉伯盟友，以保护己方易受攻击

的沙漠地区，并尽可能地给对方制造麻烦。没有人费心去写作帝国这些阿拉伯边境地区连续的历史，但是，如果你把罗马历史学家现存的零散资料串在一起，一个关于4世纪到6世纪阿拉伯历史的事实就会浮现出来。毫无疑问，由于两个帝国向该地区倾注财富和武器，由帝国的阿拉伯盟友控制的政治网络的规模大幅扩大，阿拉伯人的军事实力也随之增强。在4世纪和5世纪，罗马人通过一系列的阿拉伯盟友来运作；但是到了6世纪，罗马人和波斯人都各自只有一个盟友，分别是加萨尼人（Ghassanids）和拉赫米德人（Lakhmids）。这些群体现在非常强大，至少有时在谈判桌上有了自己的席位，当然也有自己的诉求。换句话说，夹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阿拉伯世界经历了一种转变，这类似于影响了罗马帝国欧洲边界边缘以日耳曼语为主的世界的转变。从长远来看，帝国倾向于与邻国建立的那种关系会在这些边缘地区产生更大、更有凝聚力的政治实体，而阿拉伯世界则是在两大帝国（而非一个）的干预下加速发展起来的。注

从这个角度来看，穆罕默德生涯中的非宗教因素与匈人王阿提拉的生涯有惊人的相似之处。阿提拉所做的是联合一系列主要说日耳曼语的边境部落对抗罗马，这些部落的首领本来听命于罗马，他们既会内斗，也可能会对抗帝国。这就产生了一个足够大的权力集团，足以直接对抗帝国，在鼎盛时期，该集团有时甚至还能获胜。穆罕默德的生涯与此有许多相似之处。在此前的200年里，这些阿拉伯群体已经习惯于在较大、较复杂的军事政治体系中运作，但是如果没有穆罕默德，这些群体根本就不可能达到统一的高峰。穆罕默德与阿提拉的显著不同之处在于，一个强大的新宗教是他设法建立的政治权威的一个基本元素，而在联盟最初的魅力领袖去世后，这个宗教继续作为一股统一的力量发挥着作用。阿提拉死后，他的帝国的匈人核心力量在内战中消耗殆尽，这给了许多附庸部落重新独立的机会，比如被瓦拉米尔联合起来的潘诺尼亚哥特人，以至于匈人帝国在一代人的时间内就不复存在了。穆罕默德死后，在所谓的“里达战争”（Ridda wars，又称“叛教战争”）中，有足够多的核心支持者来维持宗教团结，防止那些不那么忠诚于这项事业的人

脱离出去。本来听命于两个帝国的阿拉伯群体被穆罕默德统一后，不但没有像在中欧的匈人帝国那样来去匆匆，反而经受住了考验，迅速征服了几乎整个罗马东方，甚至更远的东方，征服了整个萨珊帝国，此外还有更多地区。633年，第一支阿拉伯伊斯兰军队从沙漠中横空出世，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希腊—罗马地中海和波斯近东之间持续了一千年的对抗被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遗产

我们再次调整聚焦，回到查士丁尼身上，就会得出一个不可避免的结论。伊斯兰教的兴起从根本上改变了东罗马的历史进程。由于穆罕默德兴起，帝国中心地带灾难性地落入他的阿拉伯联合军队之手，希拉克略和他的继任者们不可能重演3世纪罗马皇帝的大逃亡。这些损失将东罗马的疆域限制在其以前疆域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之间，而在随后的几十年里，围绕其余的许多省份将经常发生争夺。随着帝国经济的崩溃，行政不得不从根本上进行重组，因为仍然有大量的军队不得不靠多少有些微薄的资金来维持，因为无论怎样都要抵挡试图攻占剩余省份的阿拉伯人军队。这些损失甚至带来了宗教的重新调整，因为旧的帝国意识形态看起来越来越空洞。在三分之二的帝国被另一种宗教的旗手征服后，宣称自己是独一无二由神指引的国家，奉全能上帝之命把基督教文明带到全世界，这样的说法已经失去了说服力。幸运的是，犹太教和基督教的文本提供了一种更合适的模式。利用《旧约》，皇帝能够把自己从天命的世界征服者改造成一个被选中的民族的领袖，他将带领众民乘坐君士坦丁堡的救赎方舟，乘风破浪，穿过激烈的风暴，走向最终的救赎和胜利，而天启是一个反复出现的流行体裁。这一巧妙的做法既保全了面子，又避免了侮辱人们的智商，因为当时现实的重担压倒了一切。总的来说，7世纪的失败使世界性的东罗马沦为东地中海的区域性拜占庭政权，实际上成了伊斯兰世界不情愿的卫星国。7世纪以后拜占庭帝

国的所有扩张都是在伊斯兰世界四分五裂的时期实现的。只要伊斯兰世界的大部分地区能统一起来，君士坦丁堡的情况就不会太好。(注)

这促使我们认真思考对查士丁尼的质疑。真正的问题是，他的征服扩张是否超过帝国的能力太多，以至于它们不仅要为意大利和巴尔干半岛领土的丧失负责，还要为帝国无法保留其东部核心地区负责？在我看来，如果认真考察查士丁尼死后的事件，是很难做出肯定的回答的。

如果要把意大利和巴尔干半岛的领土损失归罪于查士丁尼，你就得把阿瓦尔帝国归罪于他，而我们已经看到，这是很难做到的。在我看来，伊斯兰教的崛起也是如此。如果你是一个真正的穆斯林，这个问题就不存在。穆罕默德是真主派来的，随后的伊斯兰征服是他指定的，查士丁尼说过或做过的任何事都根本无关紧要。而如果你不是穆斯林，也没法把责任直接推给查士丁尼。在阿拉伯世界出现更广泛统一的过程中，顶多只能认为皇帝扮演了无足轻重的角色。他确实促进了其帝国的阿拉伯盟友的新的统一，承认当时的加萨尼领导人为他们的共同领导人，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职位。但查士丁尼这么做是被动的，并不情愿。波斯人已经把他们的盟友统一在一位拉赫米德人统治者之下，因此，在529年，他们能够在罗马的沙漠边缘发动一次破坏性袭击，这对于君士坦丁堡的任何一个尚未联合起来的阿拉伯盟友来说，都是太过强大而无法抵抗的。因此，并且仅仅是出于这个原因，查士丁尼才建立了一个更大的阿拉伯联盟作为回应。然而，6世纪80年代，这个联盟被皇帝莫里斯解散，它并不是穆罕默德在7世纪20年代建立的联盟的前身。(注)

7世纪30年代，希拉克略的帝国被穆罕默德新联合起来的阿拉伯人接管，接管如此容易，是因为帝国财政已彻底枯竭，而查士丁尼和这种财政枯竭并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查士丁尼死后，东罗马确实显示出财政紧张的迹象，尤其是在皇帝莫里斯统治时期，但这更多是因为查士丁尼，还是因为他的继任者查士丁二世，对这个问题需要极其谨慎地考虑。查士丁二世让帝国陷入和波斯之间的灾难性正面冲突，因为他认为

西突厥人会在关键时刻驰过地平线。查士丁尼统治的最后五年基本上是和平的，甚至在波斯前线也是如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在这个阶段，来自北非和西西里岛的财政收入已大幅增加。真正消耗东罗马国库的是在美索不达米亚与波斯作战，而查士丁二世的行动造成了始于573年、终于591年条约签订的长达18年的全面冲突。让莫里斯承受巨大经济压力的，更有可能是查士丁二世的行动，以及他浪费在突厥人身上的钱，而不是继续对查士丁尼533年新兼并地区的毫无回报的支付。

603年，新一轮罗马—波斯冲突爆发；在那之前的12年里，帝国的金库一直没能得到充分的补充。在此期间，莫里斯的部队一直致力于改善巴尔干半岛的局势。与阿瓦尔人作战可能比与波斯作战花费少一些，但也少不了多少。公元603年之后，灾难性的大国冲突在东方爆发，6世纪90年代的积蓄很快就被用光了。如果穆罕默德的士兵遇到的不是刚花了25年的时间互相战斗到精疲力竭的两个帝国，作为一个非穆斯林，我很难想象他们会取得如此的成功。换句话说，阿拉伯征服罗马东部的成功，更多地要归功于（至少直接归功于）此前发生的两轮大规模罗马—波斯冲突（从573年到628年的55年里，有43年是冲突活跃期），而不是查士丁尼。正是这些战争使帝国国库空虚，对东部省份的控制放松，以至于阿拉伯军队能够轻而易举地将它们攻占。除非能使人信服地表明，查士丁尼应该对将罗马—波斯冲突升级到3世纪以来所未见的程度负主要责任，否则就不应指责查士丁尼失去了罗马东方。

毫无疑问，他应该为此承担部分责任。查士丁尼在意大利和北非的战役，为科斯罗伊斯一世在540年成功入侵罗马的叙利亚提供了借口和机会。但是在查士丁尼统治的剩余时间里，美索不达米亚前线的正面冲突只发生在540年至546年之间，除此之外，双方都满足于在其他两个地区更有限、成本也更低的接触。正如我们所见，查士丁尼统治最后几年的特点是在各地都实现了全面和平。如果没有两个帝国在573年至628年之间几乎未曾中断的正面交锋，阿拉伯人以我们所知道的形式进行的征服显然是不可想象的，而这样的交锋是在查士丁尼死后重新开始的。查士丁二世的政治决策是发起世界性的战争，莫里斯的政治决策是执行惩

罚性的和平。从根本上为伊斯兰教势力征服罗马东方创造了条件的，是这两种政策以及西突厥人的出现，而不是查士丁尼统治时期与波斯之间零星、有限的争端。查士丁尼如果在6世纪70年代依然掌权，很可能会落入和他的继任者一样的傲慢陷阱，但这完全是另一个问题。

说到这里，我大概应该明确地写出来，以防前面的段落让人觉得我对查士丁尼仁慈了。按照罗马人的标准，或者实际上是任何标准，查士丁尼都是最糟糕的专制恶棍。他为保住自己的权力，可以毫不在乎地屠杀大量本国公民，他也可以为了权力而对邻国发动投机性的攻击，不管附带的损害有多大。他没有像希特勒那样大规模屠杀本国公民，但他野心很大，他的高压统治也同样混乱。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曾有过有人认为他所怀抱的伟大梦想，因为他的政权很晚才开始实行西方扩张政策，并且完全是出于绝望才这样做的。尽管如此，我们依然很难将东罗马随后沦落成继承者拜占庭的样子归咎于他。没错，他在西方的征服引起了一些波斯人的嫉妒，但这不过是促使科斯罗伊斯一世推行一种受约束的、机会主义的侵略而已。是的，他确实在罗马边境建立了一个更加统一的阿拉伯联盟，但这并不是穆罕默德的军事政治宗教联盟的直接前身。

一个糟透了的皇帝把帝国注定崩溃的毒酒传给了继任者，这个故事大概比较符合人们的道德情感，但这种说法往好里说也是很勉强的。只有将阿瓦尔人、西突厥人、查士丁二世、莫里斯、科斯罗伊斯二世和穆罕默德都考虑进来，才能对君士坦丁堡后来的苦难产生令人信服的理解，总体而言，在此过程中，这些人的集体作用远远大于查士丁尼。在描写遥远的过去时，保持对时代的正确认识是最困难的挑战之一。在21世纪的人看来，565年和630年似乎是相邻的，但它们实际上在政治上隔着三代人，从查士丁尼到阿拉伯人征服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查士丁尼并非一上台就志在重新征服失落的罗马西部，但他也没有让君士坦丁堡战略降级。

无论如何，他无疑是君士坦丁堡最后一位利用东部心脏地带的资

源，试图在地中海西部及更远的地方重建罗马帝国的统治者。公元573年以后，东罗马东线进入了长达55年的全面对抗，此后，没有一位君士坦丁堡的统治者还能拥有足以重建罗马帝国的权力基础。随着伊斯兰教的崛起，东地中海地区从恢复西方帝国权力的潜在竞争者名单上永远消失了。东罗马和西罗马都尝试恢复罗马帝国的荣光，但最终都失败了。最后一次重要的尝试将来自北方。

---

1. 《秘史》18.3–30，洛布版译文第213页上的脚注1。
2. 关于狄奥达哈德的统治，我们的主要史料是普罗柯比《战史》5.6—11。关于查士丁尼的征服，现代的第二手讲述见Wolfram（1988），pt 5，c. 10；Heather（1996），c. 9; Moorhead（1994），c. 3; O'Donnell（2009），257 ff.。多亏了普罗柯比，这些事件都被很好地理解了，后面没有必要不断地引用这些文献。
3. 法兰克人：《战史》5.11.28—29。皮特扎斯：《战史》5.15.1—2。罗马：《战史》5.14—6.6。萨罗那：《战史》5.16.8—18。
4. 皮切诺：《战史》6.7.28—34。里米尼：《战史》6.10。驻军：《战史》6.11.1—3。贝利萨留：《战史》6.11—13。
5. 亚得里亚海前线：《战史》6.23—28。乌拉斯：《战史》6.18 ff.。
6. 抛弃：《战史》6.28.30—35。谈判：《战史》6.22.9—20。
7. 《战史》6.29.1—3。
8. 哥特使节：《战史》6.22.17—20。亚美尼亚人：《战史》2.3.31—57。普罗柯比对于这次入侵的讲述，见《战史》2.5—13。安条克的毁灭，见《战史》2.10.4—9。新安条克的建立，见2.14。第二手的讲述，见Greatrex and Lieu（2002）。cc. 7–8; Greatrex（2005），488 ff.; Dignas and Winter（2007），37 ff. and 106 ff.;Sarris（2011），153 ff.。
9. 关于乌拉斯和伊尔德巴杜：《战史》6.28.35; 29.39—41。给贝利萨留开出的条件：《战史》6.30。贝利萨留返回君士坦丁堡：《战史》7.1。
10. 《战史》7.1.25—2.13。关于哥特人的顽疾，见Goscinny and Uderzo（1963）。
11. 对与波斯之间战争的详细介绍，见本章注释8中提到的作品。Heather（1996）,327–328罗列了托提拉在不同时期招募的罗马军队的名单，但这里要注意，绝大多数人只是临时加入的，通常是因为他们没有得到报酬，一旦他们得到了报酬，就会马上转而效忠皇帝。
12. 关于托提拉最初的胜利，见普罗柯比《战史》7.3—8。

13. 奥克西姆：《战史》 7.9—12。罗马：《战史》7.13—21。

14. 关于贝利萨留和托提拉，见《战史》7.21—37。突袭舰队，见《战史》7.35,37—39, 8.22。

15. 《战史》7.37.6—7; cf. 8.24.4。

16. 《战史》8.23。

17. 关于托提拉最后一次战斗，见《战史》8.26—32。关于泰亚斯，见《战史》8.33—35。

18. 抵抗的三个中心：《战史》8. 35. 37；《战史》8. 34. 19—20。Agathias, Histories 2.1—14讲述了布提林的战斗及其失败。维丁的故事，见Paul the Deacon, History ofthe Lombards 2.2；评论见《晚期罗马帝国人物志》3, 924。

19. 但人们仍在尝试。O’Donnell（2009）， 289引用了一份较新的数据，这份数据比大多数都要缜密，但即便是这份数据，唯一一个“真实的”数字是据说查士丁尼从阿纳斯塔修斯和查士丁那里继承了2 800万苏勒德斯，其真假还无从分辨。

20. Heather（2008）更详细地讨论了对人类群体认同的新理解是如何被纳入古代晚期的讨论的。在讨论意大利的情况时，Amory（1997）的论点让一些人相信，追随狄奥多里克的哥特人实际上只是暂时追随他，但该论点的证据并不充分，其最主要的局限在于完全没有解释为什么在536年至556年之间，成千上万的追随者愿意为其战斗和献身，而至少从540年开始，查士丁尼就愿意让他们保留他们在土地分配过程中得到的土地，更充分的论证见Heather（2003）。关于汪达尔人，比Amory关于哥特人的讲述更加令人信服的是Merrills and Miles（2010），尤其是第四章，他们正确地强调，定居进程的回报使盖萨里克的追随者成为北非地区新的、独特的军事精英。在东罗马征服之后他们的消失也是一个类似的重大历史现象。

21. Heather（1996）， 尤其是第273—275页和附录1。普罗柯比用三个同义词来描述这个群体：“最佳的”“精选的”“首要的”。从普罗柯比的讲述中，可以看到他们是如何灭亡的。关于汪达尔人中与其相对应的群体的灭亡，见Merrillsand Miles（2010），第九章。

22. Wickham（2005）, 728–739；更加详细的证据，见Wickham（2009）, 140–147。这些作品中Wickham的整体模型是，罗马晚期的经济复杂性是建立在罗马晚期国家的结构和运作之上的，见（2005）， 708–717。如果是这样，那么这个国家的消失必然会导致实质性的简化，即使哥特战争加速了事态的发展。Ward Perkins（2005）的观点不这么以国家为中心，他更多是从帝国存在带来的总体情况来解释这种复杂性，而不是其自身政治经济的运作。在这个模型中，与帝国终结及其影响相关的暴力是更重要的原因。

23. Courtois（1955）， pt 3, c. 2的讲述很经典。Rushworth（2004）和Merrills and Miles（2010），尤其是第124—129页，提供了最新的补充，两本书都有参考书目。

24. Pringle（1981）收集了防御方面的证据。关于宗教建筑的重建，请参考Merrillsand Miles（2010），241 ff.。Wickham（2005）的第637—644页和第720—728页讨论了被征服

之后北非城市持续繁荣和经济复杂性的证据。

25. 关于查士丁尼对巴尔干半岛防御的重大投入，Curta（2001），c. 4（借助考古证据）令人信服地反驳了过去忽视普罗柯比所提供证据真实性的倾向。

26. 近年来对查士丁尼税收改革的一个很好的介绍是Sarris（2011），151–153；一些大人物被毁的例子，见《秘史》。

27. 查士丁尼《新律》148。Sarris（2011）, 227–228对其进行了探讨。

28. 最近有一些涉及鼠疫各个方面的优秀英文著作：Horden（2005）；Stathakopoulos（2000）；Sarris（2002）。在细节方面，我总体上遵循的是Horden的说法。关于公元550年后东地中海的持续繁荣，见Ward Perkins（2005）；Holum（2005）;Wickham（2005），443 ff.（关于农业生产），626 ff.（关于城市），548–549是他对鼠疫只有“边缘”影响的具体分析。

29. 见本章前注19，根据O’Donnell（2009），289引用的猜测，查士丁尼继承了2 800万苏勒德斯（罗马金币），征服花费了大约3 600万苏勒德斯，从意大利和北非每年获得的收入大约各为50万苏勒德斯，关于西西里的数据不可得。即使采信这些数据，你也不得不认为，从中长期看，征服确实是值得的。

30. Theophylact Simocatta 1.3.8—13。与之相对的是，511年，汪达尔国王色雷萨蒙德试图通过送礼重新获得狄奥多里克的欢心，但对方拒绝接受这些礼物，见上文。

31. Menander fr. 5.1, trans. Blockley(1985), 49. Whitby（1988）; Pohl（1988），（2003）很好地介绍了阿瓦尔人的历史。阿瓦尔考古学的英文介绍，见Daim（2003）。

32. 对于欧亚游牧民族的一些介绍，见Lattimore（1940）；Sinor（1977）；Khazanov（1994）。

33. 关于库特里格尔人的入侵，见普罗柯比《战史》2.4；Agathias, Histories 5.11ff。关于斯拉夫人的入侵，见《论建筑》4.7.13 and 17f.；《战史》7.39–40。Curta（2001），cc. 5–6（涵盖了伦巴第人与格皮德人，以及斯拉夫人）很好地介绍了当时更大范围内情况的不同方面。

34. Menander fr. 5.1–2, trans. Blockley（1985）, 50–51.

35. 查士丁二世宣布继位: John of Ephesus, H. E. 6.24, trans. Smith（1860），429；参考Menander fr. 8, trans. Blockley（1985）, 97。

36. 对与匈人相似之处更详细的探讨，见Heather（2005），c. 8;（2009），c. 5。锡尔米乌姆：见Menander fr. 12.5。

37. Menander fr. 11, trans. Bockley（1985）, 429.

38. 纳尔西斯的邀请这一说法出自Paul the Deacon, History of the Lombards 2.5,trans. Foulke（2003）。对于他们进军意大利的深入探讨，见Wickham（1981）,28 ff.; Jarnut（1983），c. 1; Christie（1995），c. 2; Pohl（2005）把重点完全放在伦巴第人的侵略

性上。

39. Whitby（1988）, 156 ff. 探索了6世纪90年代东罗马的有效反攻。对于巴尔干半岛的斯拉夫化的更详细介绍，见Heather（2009）, c. 8, esp. 399–406。

40. 众所周知，第一批挖掘工作的整体图景是Foss（1977）拼出来的，详见Foss（1996）。对于后来材料的最新总结，见Wickham（2005）, 626 ff.。Ward Perkins（2000）和Wickham（2005）, 609 ff. 都强调了相比之下埃及古老罗马城市的持续繁荣，以及伊斯兰教倭马亚王朝统治下的肥沃新月地带的情况。

41. 奥斯曼帝国的档案：Hendy（1985）, 613–669。对需要进行的重大行政、军事和政治调整的一般介绍，见Haldon（1990）。

42. 对古代罗马–波斯冲突总背景的优秀介绍，见Whitby（1988）, c. 7; Blockley（1992）; Greatrex（2005）。后来查士丁尼统治时期的事态发展，见Dignas and Winter（2007）, esp. 138 ff.; Sarris（2011）, 153 ff.。

43. Menander, esp. frr. 10 and 13的存世残篇非常详细地介绍了与西突厥人之间的外交。其他观点，尤其是涉及突厥人动机的观点，详见Dignas and Winter（2007）,esp. 109–115; Sarris（2011）, 226 ff.。

44. 对于莫里斯的战争，最好的介绍是Whitby（1988）, cc. 9–11。关于“凡尔赛时刻”，参考Sarris（2011）, 232 ff.。

45. 更加详细的讲述，见Whitby（1988）, c. 6; Sarris（2011）, 236–242。

46. 《复活节编年史》对君士坦丁堡之围做了叙述，英译见Whitby and Whitby（1989）, 168 ff.。对于福卡斯和希拉克略的波斯战争的史料的精彩分析见Howard Johnston（2010）。更加详细的叙事重构见Dignas and Winter（2007）,44 ff., 115 ff., and 148 ff.; Sarris（2011）, 242–257。

47. 关于3世纪的危机和罗马的复苏，见Dodgeon and Lieu（1991）, pt 1; Potter（2004）, cc. 6–7; Heather（2005）, cc. 2–3。

48. 对于史料问题的介绍，见Crone and Cook（1972）; Crone（1987）。

49. 在Sartre（1982）中，这一点非常清楚；关于古代晚期的阿拉伯半岛的总体情况，见Donner（2005）; Dignas and Winter（2007）, c. 5。关于和日耳曼世界的类似之处，见Heather（2009），尤其是第2和第11章。

50. 这方面最近的优秀英文介绍见Kennedy（2007），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优秀介绍。

51. 我们将在下一章通过反圣像争论回到拜占庭宗教自我理解的历史。

52. 关于查士丁尼阿拉伯政策的更多细节和莫里斯的逆转，见上文脚注42和49中所引文献。

第三部分

欧洲之父

第5章
公元800年的圣诞节

罗马，公元800年12月25日早晨。法兰克国王查理曼（Karolus Magnus，查理大帝）来到古老的帝国首都，进入圣彼得大教堂望圣诞节弥撒。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在《教宗名录》（*Liber Pontificali*）有关教宗利奥三世（Leo III）的内容中有所描述：

> 然后，可敬、慷慨的教宗用自己的双手给（查理）戴上了珍贵的皇冠。信主的罗马人看到了他是怎样守护并且是多么热爱神圣的罗马教会及其教士的，在上帝和天国钥匙的持有者圣彼得的召唤下，他们纷纷高呼："上帝为查理加冕，这位带来和平的伟大皇帝，万寿无疆，永远胜利！"在圣彼得神圣的殉道纪念间前，在许多圣人的祈祷下，他们这样高呼了三次。就这样，他成了罗马人的皇帝。

在罗慕路斯·奥古斯都路斯被废324年后，西罗马故地上出现了一位新皇帝，无论是名义上还是事实上，他的形象都崇高而慈善，他的一位宫廷诗人甚至称其为"欧洲之父"（Pater Europae）。然而，根据熟悉查理曼的传记作者艾因哈德（Einhard）的说法：

> 如果他早知道教宗的计划，他就不会在那天进教堂，即使那是一个盛大的节日。㊟

这个特别的说法该如何理解？罗马帝国究竟是如何通过法兰克人的

统治者而重生的？

200多年前，以法兰克政权为基础的帝国复辟几乎发生。上一个法兰克王朝（墨洛温王朝）的几代国王都差点称帝。想真正了解查理大帝是谁，以及为什么在公元800年圣诞节那天他最终获得了皇帝的称号，我们需要稍微探究一下法兰克人更加遥远的过去。敏锐的读者可能已经想起来了，我们以前提到过墨洛温王朝的克洛维，在公元500年前后的几十年里，他曾与阿马立家族的狄奥多里克正面交锋，因为克洛维吹嘘自己对西罗马故地的权利。狄奥多里克胜利了，但长期来看，克洛维享有更大的历史声誉。这与其说是由于他自己的成就（虽然他的成就很大），不如说是由于他死后发生的事情。他治下墨洛温王朝的崛起，以及王朝没能完全掌握帝国火炬的原因，都有助于我们理解查理曼。

狮子（没有老虎）和熊

在狄奥多里克的阿马立王朝的背景故事和墨洛温王朝在萨利安族法兰克人（Salian Franks）中的崛起之间，有许多相似之处。主要的区别在于，在法兰克人的故事中，阿提拉的匈人帝国基本没有起到直接的作用。阿提拉试图干涉法兰克人奇怪的继承权纠纷，但法兰克人不在他的势力范围之内，而且没有任何记录表明有任何法兰克人群体曾为他而战，或者是在他的命令下重新组织领导结构。

除了这些之外，两个王朝的相似程度是惊人的。首先，它们在同一时间出现在历史舞台上。我们所知道的第一个墨洛温王朝的人是克洛维的父亲希尔德里克，他死于480年前后，他与狄奥多里克的父亲和伯父属于同一代人。后面两人是最早统一潘诺尼亚哥特人并带领他们进入君士坦丁堡政治轨道的人。然而，在通往君主权威的道路上，希尔德里克并没有像瓦拉米尔走得那么远，他是一个相对低调的人，这也许可以解释围绕他的一些谜团。除了传说中他祖父是一只海怪，他给我们带来的主要困惑是，根据对他在5世纪六七十年代活动的（十分零散的）记

述，他更可能生活在高卢中部，参与过奥尔良、昂热和卢瓦尔河口的事件，与标志着西罗马故地最后一代的迅速变化的联盟联系紧密（只有一段时间，他的追随者受够了他诱惑他们的女人而将他流放）。但他留给儿子的权力基地位于更东北的地方，位于图尔奈的旧罗马军团基地，也就是今天的比利时。最后这个事实拥有最可靠的证据，因为17世纪时，在那里发现了他的坟墓，里面有许多东西，包括一枚印章戒指，上面正好刻着他的名字。㊟

历史记录和随葬品共同表明，在西罗马最后一代领导人努力维持现状的过程中，他是一支强大到需要被讨好、动员和奖赏的军队的指挥官。但是，就像这个复杂游戏中的大多数玩家一样，他最终意识到是时候和帝国划清界限，独立运作了，因为罗马中心已经不再控制任何值得牵挂的资源。我们不知道希尔德里克究竟是什么时候顿悟的，但是我们所知道的所有其他玩家在468年之后不久就放弃了，因为就在这一年，汪达尔人击败了君士坦丁堡的舰队，使得支持西方帝国权威的所有希望都破灭了。㊟然而，在当时追求完全独立的众多人物中，希尔德里克显然只是一个相对次要的角色。尽管在图尔奈的坟墓中发现了数量可观的财富，但他的儿子在开始政治生涯时，只是几个地位相当的法兰克领导人中的一个。

然而，在他的儿子和继任者克洛维的一生中，这种模式注定要发生决定性的变化。新国王的母亲是图林根人（Thuringians）的一位公主，名叫巴希娜（Basina）。据说，希尔德里克是在性瘾导致的非自愿流放期间遇到巴希娜的。7世纪后期的编年史家弗里德加（Fredegar，也是海怪说法的来源）记录了怀上克洛维当晚发生的事情。巴希娜三次叫醒她的丈夫，让他到外面看看有什么。第一次，他看到了狮子、独角兽和豹子；第二次是狼和熊；第三次是一些狗之类的小动物。你可以想象，希尔德里克可能被睡眠不足搞糊涂了，还有些恼怒，但王后让一切都清楚了。就像赫卡忒（Hecate）向麦克白（Macbeth）揭示的幻象一样，这一切是对即将发生的事情的描述，尽管这里说的是希尔德里克自己的后

代，而不是别人的后代。当然，克洛维本人是那头狮子，他生涯的三个要素是我们正在展开的法兰克帝国故事的核心。最明显的是，他取得了一系列的军事胜利，大大扩张了他所控制的领土。首当其冲的是一个名叫沙格里乌斯（Syagrius）的人，传统上认为，打败他之后，克洛维的领土就向西南一直延伸到巴黎或巴黎附近。接着是其他的胜利，这些胜利使罗讷河谷的勃艮第人至少暂时处于法兰克人的统治之下。然后，在那场将带来狄奥多里克最辉煌时刻的危机中，克洛维取得了对阿勒曼尼人和西哥特人的巨大胜利。狄奥多里克最终对勃艮第人施加了一些制衡的影响，并迫使克洛维也从普罗旺斯和地中海撤回去。尽管如此，在他大约30年的统治中，克洛维把他的控制范围从比利时一个原本相当有限的角落扩大到了旧罗马高卢的大部分地区，还占据了莱茵河以东的大片领土。

与此同时，像瓦拉米尔和狄奥多里克一样，克洛维消灭了他势力范围内所有敌对的战团首领。就像他统治时期的大部分事件一样，这件事发生的时间并不完全清楚。我们唯一的信息来源是图尔主教格雷戈里的《法兰克人史》，该书将这一过程描述为一系列黑手党式的打击，部分是通过内部人士组织的，组织得肯定很匆忙。这类打击发生在其统治末期，在他战胜西哥特人之后，也就是说，在507年到511年之间。这可能是对的，也可能是错的，但毫无疑问，他有效地消灭了所有的主要对手，其中许多人或大多数人是他的旁系亲属。我们在其他王朝中遇到过这种情况，他们对家人的“关心”实在够令人振奋的。现在，克洛维的儿子们将独自继承克洛维大幅扩张的王国。注

克洛维生涯的第三个关键因素是他最终改信了正统的天主教。在这方面，图尔的格雷戈里所说的肯定与事实有些出入。根据他的讲述，在6世纪第一个10年的中期，国王从坚定的异教信仰直接转变到天主教，从而赢得了上帝对他即将到来的对抗西哥特人的战役的支持。西哥特人和狄奥多里克一样，是不信《尼西亚信经》的基督徒，他们常被错误地贴上阿里乌派的标签。因此，利用这个说法，在格雷戈里笔下，507年的克洛维领导了一场战胜可恨异教徒的天主教运动。对于天主教教士来

说，所有这些都非常令人满意，但格雷戈里是在距事件发生三代人之后写作的，而与事件同时代的许多消息来源则描绘了截然不同的图景。首先，克洛维似乎是在他的伟大胜利之后才宣布改信天主教的。更有趣的是，做出这个声明的场合是一场法兰克人朝廷上的激烈辩论，一度看起来，国王很可能改信阿里乌派，而到了格雷戈里的时代，故事的这一部分已经完全被压下了。最后，克洛维选择了天主教，这也帮助法兰克人走上了通往帝国的道路。注他新扩张的法兰克权力基地兼并了莱茵河西面和东面的领土，这个核心区域位于今天的法国、比荷卢和德国西部，它将有一段漫长而有影响力的历史，虽然它内部政治权力的行使远非一帆风顺。

当克洛维在511年去世时，他几乎完美的记录上唯一的污点就是没能打败他的哥特对手。他的死正好发生在狄奥多里克的“奇迹之年”，这一死讯只能为意大利、西班牙和南高卢的哥特联合王国的建立增添一点额外的光彩。克洛维的天主教也不是什么王牌。511年，狄奥多里克与天主教神职人员的关系好得不得了，而后来在查士丁尼统治早期，君士坦丁堡在狄奥多里克的斡旋下重回天主教的怀抱，狄奥多里克与天主教的关系更进一步。克洛维成就巨大，但还是无法与狄奥多里克匹敌。在这个阶段已经被法兰克人统治的高卢罗马贵族中，没有人会像意大利的罗马贵族那样为称新统治者为“永远的奥古斯都”而感到内疚，这并不让人奇怪。

然而，狄奥多里克死后，他的联合王国立即分裂，甚至意大利部分也因政治斗争而四分五裂，众人先是争夺对阿塔拉里克的控制权，后来又争夺王位本身。自507年以来一直搁置的法兰克扩张终于又可以开始了。6世纪30年代初，图林根王朝和勃艮第王朝被吞并，因为不再有哥特王朝作为对法兰克王朝有力抗衡。法兰克人吞并了更多领土，先是普罗旺斯，然后是北部阿尔卑斯山麓的大片领土被维提吉斯正式割让给法兰克人，因为他拼命地想为战争调集更多的军队。

此外，克洛维的儿子和孙子（也就是上文出现过的豹子、独角兽、

狼和熊）都在莱茵河以东忙着自己的事。当克洛维的孙子提奥德贝尔特在540年写信给查士丁尼时，他已有理由宣称自己是“多个民族的统治者”，他统治的民族括西哥特人、图林根人、萨克森人和朱特人，当然还有法兰克人。到了6世纪中叶，无论是在事实上，还是在法律上，克洛维的后裔们与西方的皇权都已经非常接近。在意识形态层面上，他们甚至做了狄奥多里克不敢做的事。长期以来，只有罗马皇帝才能发行金币，这一特权可以追溯到更遥远的过去，当时罗马帝国的许多城市都发行了自己的铸币。在公元476年以后几代人的时间里，继承国的统治者基本上尊重这种特权，只保留贱金属铸币。狄奥多里克自己也只是偶尔铸造一枚金币。墨洛温王朝的国王开始定期发行金币，这是对传统的重大突破，也是普罗柯比心怀厌恶地注意到的一种冒犯。尽管如此，尽管他们都是强大的统治者，人们会用过去常用来形容皇帝的词语来赞美他们，但仍然没有人称克洛维的子孙是真正的罗马皇帝。在6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大量宫廷文献中，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有人有意识地进行过狄奥多里克的那种帝国复兴工程。因此，虽然他们已经很接近，但没有一个墨洛温王朝的成员成功称帝。

我认为，他们没有称帝的原因很简单。虽然6世纪时法兰克人统治着广阔的领土，但这些领土很少统一在一位统治者手中。在6世纪的发展过程中，墨洛温王朝的王国形成了5个核心组成部分，分别是奥斯特拉西亚（Austrasia）、纽斯特里亚（Neustria）、勃艮第、阿基坦和普罗旺斯，并对图林根和阿勒曼尼亚、巴伐利亚、弗里西亚（Frisia）和萨克森的附庸地区行使着不同程度的霸权。即使是王国的核心地区，也会被分给统治者在世的成年儿子，不管他们的母亲是谁，这是墨洛温王朝的标准做法，就像511年克洛维死时那样。要想详细描述接下来的政治斗争，需要花费很多笔墨（人们已经写下了许多相关作品），政治斗争中，有短暂的团结时期，斗争涉及许多潜在的继承人和甥侄，有人早死，有人被直接处决。但是我们在这里不需要担心这些事情，只要说一点就够了：任何一个墨洛温王朝的人若想主张自己拥有西方皇帝的头衔，都会受到严重阻碍，因为法兰克王国潜在的强大权力基础只是偶尔

掌握在同一位统治者手中。(注)

同样重要的是，法兰克人的国王必须与其他完全合法的基督教统治者共享对前西方帝国的统治权。特别是在他们于589年的托莱多宗教会议上宣布正式从阿里乌派改信天主教之后，西班牙和塞蒂马尼亚（Septimania，比利牛斯山脉以北，现在法国东南部的弧形地区）的西哥特统治者给自己戴上了罗马和基督教的神圣光环，这与君士坦丁堡的皇帝如出一辙。他们俨然西罗马故地大部分领土上完全合法的统治者。6世纪60年代末，随着阿瓦尔势力开始在多瑙河中部地区巩固自己的地位，伦巴第人入侵意大利北部，他们的确切宗教地位很难判断。对于伦巴第统治者是普遍信奉天主教、阿里乌教派还是其他什么教派，史料保留了一些令人困惑的混乱信息。至少在某些情况下，伦巴第国王可以给人留下相当好的罗马式统治者的印象。尤其是在612年，国王阿吉卢尔夫（Agilulf）在米兰（旧帝国的一个都城）的竞技场里，直接模仿罗马的仪式惯例，把他的儿子和选定的继承人阿达罗尔德（Adaloald）介绍给他的臣民。当然，所有这些都没有考虑这一事实，即到了6世纪中叶，东罗马仍然是意大利半岛上一支非常活跃的力量，拥有自己的“真正的”皇帝，控制着拉韦纳、罗马和南部的大片领土，更不用说在北非、西西里岛和亚得里亚海沿岸等西罗马故地上还维持着活跃的政府架构。(注)

法兰克人有时会对这些地方发动大规模战争，但在6世纪后期，法兰克人在入侵阿尔卑斯山和比利牛斯山脉以南的地区时，往往采取较为有限的突袭形式，并没有进一步认真努力地增加墨洛温王朝控制下的前罗马领土的数量。结果，没有一个墨洛温王朝的统治者能够像狄奥多里克在其鼎盛时期那样，统治罗马西部的广大地区，即使是直接统治和霸权统治混合的情况也没有。总的来说，法兰克帝国缺乏足够的影响力来压倒其他继承国，更不必说东罗马本身了。

***

克洛维的儿子和孙辈虽然强大，但还称不上是皇帝，而关于他7世

纪和8世纪早期的后裔（也就是巴希娜梦中的小动物）的传统描述，绝大多数取材的查理大帝所属的加洛林王朝时期的历史作品。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艾因哈德在查理大帝之子的统治早期再次拿起笔，为我们留下了墨洛温王朝最后一批国王的生动肖像。

> 国王坐在宝座上，长发披肩，胡须未剪，满足于只保留国王的名号，假装统治，除此之外，他没有别的事情可做了……他听取了来自不同地区的代表的意见，当他们离开时，他似乎给了自己的决定，而实际上这是别人叫他说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命令他（宣布）的。他只有“国王”这个空洞的名号和宫相（mayor of the palace）根据他的需要发给他的一笔微薄的生活津贴，他没有别的财产，只有一处收入微薄的庄园。他在那里有一个房子，还有服侍他、听从他的仆人，但是其人数很少……他坐着一辆由车夫牵着、拴着轭的牛拉着的大车到处走。他常常这样去王宫，也这样去参加每年一度的国民大会，以商讨国事，然后再以同样的方式回家。但是，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所有需要做的事情和管理王国的安排都是由宫相来处理的。

图尔主教格雷戈里的《法兰克人史》只讲到了6世纪90年代中期，对于此后的一段历史，并没有同样详尽的讲述流传下来，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加洛林王朝时期。因此，没有什么其他的叙述来挑战艾因哈德生动的人物塑造。总的来说，历史学家往往乐于将墨洛温王朝后来的国王们看作小动物，他们缺乏权威，导致法兰克人的世界陷入混乱，使权力稳定地集中在二流人物（宫相）的手中。宫相就是查理大帝的祖先在王国东北部的奥斯特拉西亚所扮演的角色，直到他的父亲丕平在751年觉得“受够了”，自己成为法兰克人的国王。[注]

但是，艾因哈德是在丕平成为国王后的第三代人时期写作的，他是加洛林王朝的忠实拥护者。对于他所服务的王朝来说，还有什么比墨洛温王朝因无能而丧失统治权的观点更方便的呢？如果仔细考察，就像上

一代或两代现代学者所做的那样，那么史料展现的就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情况：墨洛温王朝后来的国王并不像艾因哈德希望让我们认为的那么无用，而加洛林王朝的崛起则是一个较为偶然的现象。

即使考虑到这一点，毫无疑问的是，675—700年之间在位的墨洛温王朝的代表们，在政治上的地位远不如他们一百年前的前辈那么高。特别是在过渡时期，法兰克世界的所有核心区域都出现了根基很深的区域贵族集团，后来的国王都必须通过贵族来统治，这些贵族的权力隔断了许多地方与国王的直接接触。我们所拥有的最生动画面不是来自奥斯特拉西亚，而是来自西面相邻的纽斯特里亚。一份重要的史料《法兰克人史纪》（*Liber Historiae Francorum*）告诉我们，在这里，人们（特别是该文本的作者）期望墨洛温王朝的君主都能与一个由大约6个贵族世家组成的群体合作，通过这个群体实行统治。贵族们把时间花在互相通婚和争夺纽斯特里亚的支配权上，他们通过担任纽斯特里亚宫相来行使权力，后来，这些人也越来越多地尝试抵制加洛林王朝的干涉。[注]换句话说，每一个核心地区都有了与王室力量相当的当地家族，这些贵族的联合会大大削弱任何一个国王的实际权力，不管他个人能力如何。

这意味着虽然统治王朝被削弱了，但是加洛林王朝取代墨洛温王朝并不是一场简单的宫廷政变，不是那种首席大臣最终决定驱逐旧王朝最后一位成员的政变。从6世纪到8世纪，所发生的是一次重大的权力重组；加洛林王朝在8世纪夺取了对整个法兰克世界的控制权，标志着截然不同的第二阶段的开始。在第一阶段，查理大帝的祖先不过是奥斯特拉西亚地区内部竞争的胜利者，而在法兰克王国的其他主要地区，一群同级别的对手也忙于类似的竞争。

我倾向于认为，即便加洛林王朝没有终结墨洛温王朝末期日益脆弱的平衡，来自法兰克王国其他核心地区的贵族世家也会这么做。这听起来不像是长期稳定的良方，因为某个地方的某个人可能会想围绕自己的权力重新调整整个政治体系的方向，哪怕只是出于对竞争对手可能取代自己的担心。类似的不稳定感也出现在外围地区。6世纪的墨洛温王朝

还对一系列周边地区行使权力，部分是直接统治，部分是通过偶尔宣示军事霸权，其中包括阿勒曼尼亚、图林根和巴伐利亚，甚至在较小的程度上还有萨克森，这个地区被迫进贡。(注)随着7世纪慢慢过去，这些周边区域脱离了中央的控制，这一点，以及区域贵族势力的增长，都反映了旧体制的崩溃。加洛林王朝之所以能够完全控制法兰克王国，背后有这一系列高度偶然的事件，但是无论如何，到了700年前后，墨洛温王朝已经注定要被扔进历史的垃圾堆了。

或许艾因哈德对最后一批墨洛温王朝国王的描述是讽刺性的，但他至少给我们指明了正确的方向。从550年前后到700年，权力从国王向地区贵族发生了大规模的净转移（net transfer），导致了整体的政治不稳定，国王虽然在体制内仍很重要，但已经失去了统治国家的能力。这并不是狮子变成猫那种王朝衰落的结果，墨洛温王朝的一些统治者，如达戈贝尔特一世（Dagobert I，死于639年），并没有忘记如何吼叫；但是面对法兰克世界权力位置的结构性转变，墨洛温王朝晚期的国王毫无胜算。到了700年，6世纪时法兰克准帝国的外围地区已经脱离轨道，核心地区也在瓦解。加洛林王朝是如何从中央衰弱的过程中崛起的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直面这个新王朝中第一个伟大的查理的事业，他就是被称为“铁锤查理”的查理·马特（Charles Martel）。

法兰克人的铁锤

游览凡尔赛宫的时候，一个必去的地方是战争画廊（Gallery of Battles）。它长120米，宽13米，是19世纪30年代路易·菲力浦（Louis Philippe）在一系列较小画廊的基础上创建的。这位几乎完全和平的国王急于表明自己属于法国的军事传统，这种传统在那之前不久的拿破仑的职业生涯中达到了顶峰。正如我对一位法国前笔友所说的，除了滑铁卢战役之外，拿破仑皇帝的所有伟大战役都在那里了。

但是，那里的34幅主要画作所涵盖的时间要比这长得多。按照一般

的参观流程，从左侧开始，游客看到的第一幅画长5.42米，宽4.65米，描绘的是普瓦捷战役或者说是图尔战役中的查理·马特，传统上认为这场战役发生在732年，尽管可能是733年。在这场著名的战役中，查理是作为阿基坦公爵尤多（Eudo）的盟友参加的，尤多请他帮助自己击退一支越过比利牛斯山脉渗透到北部的穆斯林军队。在穆斯林军队于711年取得最初胜利后的十多年里，西班牙西哥特王国故地一直被穆斯林入侵者包围。经过长时间的对峙，战斗终于打响，查理获胜，他的穆斯林对手阿卜杜勒·拉赫曼（Abd ar-Rahman）死在了战场上。传统上认为，这标志着伊斯兰势力征服整个西方基督教世界的企图失败了，它启发了爱德华·吉本最著名的一段话：

> 从直布罗陀岩到卢瓦尔河两岸，一条胜利的前进路线已经延伸了1 000多英里，如果再延伸这么长的距离，萨拉森人就会到达波兰和苏格兰高地。莱茵河并不比尼罗河或幼发拉底河更不可逾越，阿拉伯舰队本可以在不打海战的情况下开进泰晤士河河口。如果这样的话，也许现在牛津大学各个学院里教授的将是对《古兰经》的解释，这里的讲道台可能会向受割礼的人们展示穆罕默德启示的神圣和真理。

除了保护基督教世界这样的分内事，查理的伟大胜利还有更多的意义。在关于封建制度诞生的传统叙事中，查理被视为重甲骑兵出现的主要推手，而重甲骑兵的出现是中世纪中欧的一个基本特征。不利的一面是，盔甲和军马都非常昂贵，因此查理也被认为是推进教会财产国有化的重要人物，他用宗教机构的财富来支付军队的费用，而军队让他得以抵御伊斯兰教。

从19世纪后期起，随着民族主义的高涨和大众教育的普及，许多传统观点在民众心里扎下了根；而就像许多看待历史的传统观点一样，支撑查理声望的这两个支柱都不太经得起后民族主义时代人们的仔细考察。阿卜杜勒·拉赫曼并不像人们认为的那样率领着几万人（令人惊讶

的是，有时竟然被认为有几十万人），他也没有遭受灾难性的人力损失（尽管他本人确实阵亡了），他所从事的可能是一次有利可图的突袭，而不是一场坚决的征服战争。不管是什么情况，普瓦捷战役都不是能够决定欧洲宗教命运的重大战争。遗憾的是，查理也没有凭借一己之力发明封建制度并解决由此产生的资金问题。在他死后的一个世纪里，人们都说他把大量的教会土地交给了俗人，但这种做法并不新。中世纪早期，通过半永久性的租约，许多名义上属于教会的土地掌握在俗人手中，这种土地被称为“恩地”（precaria），这些俗人通常是该宗教机构的“朋友”，甚至是其创始人的亲属。这种情况在查理之前和之后都发生过，而给他的名声造成大问题的可能是，他的胜利允许他把这些土地赐予那些与相关宗教机构没有任何关系的支持者。尽管重型装甲骑兵正在成为8世纪法兰克战争的一个典型特征，但这似乎是一场稳步发展的演变，而不是像20世纪30年代装甲师出现那样的革命。(注)但是，即使我们不能保留查理·马特传统形象的所有装饰，毫无疑问，他的职业生涯还是让加洛林王朝决定性地走上了掌握帝国权力的道路。

在他的父亲赫斯塔尔（Heristal）的丕平于714年12月去世时，这样的结果似乎不太可能出现。这是有记录的加洛林王朝的第一个家丑，一场肮脏的家族内斗在故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眼前的问题是丕平本人，他和现任妻子普雷科特鲁德（Plectrude）生了两个儿子，分别是德罗戈（Drogo）和格里摩尔德（Grimoald），但两人都先于他去世。德罗戈死于707年，而格里摩尔德死于714年，就在其父亲去世之前。格里摩尔德只留下了一个男性继承人，即狄奥多尔德（Theudoald）。但是丕平还和他的妾室阿尔帕达（Alpaida）生了两个儿子，分别是查理和希尔德布兰德（Childebrand）。为了保护孙子的利益，普雷科特鲁德把她的继子，也就是狄奥多尔德的两个叔叔关进了监狱，但是厉害的查理很快逃了出来，在奥斯特拉西亚召集了一群强大的支持者。

尽管从此刻起，家族内部的争执将成为加洛林王朝历史上的一个常见特征，但714年的这场争执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因为丕平对法兰克世界的统治有着明显的局限性。结果，一长串愤愤不平的派系排起队来，

要利用普雷科特鲁德与其继子查理之间的争执所导致的政治瘫痪。排在第一位的是法兰克中心地带的纽斯特里亚人，这并不让人惊讶。丕平去世后，狄奥多尔德在名义上是纽斯特里亚的宫相，但是丕平对那里的控制实际上只是消极地确保没有真正的对手出现。丕平一死，纽斯特里亚的贵族就自作主张，立即抛弃了对狄奥多尔德所剩的那点忠诚。在核心地区之外，阿基坦人也非常愿意利用这场危机来获得更大程度的独立。早在715年，他们就在自己的公爵尤多公爵的领导下揭竿而起，而普罗旺斯人也在他们的公爵安特诺尔（Antenor）的领导下起兵发难。就连法兰克传统势力范围之外的力量也被吸引到行动中来。丕平的卓越成就在一定程度上基于他在法兰克边界以外所取得的胜利。受丕平之害的包括拉德博德国王（King Radbod）统治下的弗里西亚人，他们在690年和695年两次遭遇惨败。但是，拉德博德后来仍然很有权势，丕平的儿子格里摩尔德娶了他的女儿，所以狄奥多尔德既是拉德博德的外孙，也是丕平的孙子。因此，拉德博德准备介入，很可能是出于很复杂的动机；对他来说，彻底独立是一个有吸引力的目标，无论这是通过让一个心存感激的外孙掌权来实现，还是通过击败查理和他的奥斯特拉西亚支持者来实现。

715年，查理的处境极其危险。他父亲的许多亲信都加入他的麾下，但是他的敌人的联盟可能具有压倒性的实力，最初的情况对他很不利。715年开始不久，拉德博德就在一定程度上打败了查理，但此时查理的奥斯特拉西亚支持者可能还没有完全动员起来。当然，在这一年晚些时候，查理回击了拉德博德，将他的军队赶回了弗里西亚，这是我们最后一次听到拉德博德参战，所以这应该是一次重大胜利。与此同时，纽斯特里亚人也没闲着。一个名叫拉根弗里德（Ragenfrid）的人很快成为纽斯特里亚的宫相，借着墨洛温王朝的方便旗，先是以达戈贝尔特三世（Dagobert III）的名义，在他死后又以希尔佩里克二世（Chilperic II）的名义起事。在716年4月和717年春天，两场重大但非决定性的战役爆发了，此时查理已经找到了他自己的墨洛温家族的国王，即克洛塔尔四世（Chlothar IV）。

真正决定性的战役发生在718年春天，当时，尤多领导下的阿基坦人加入了旨在推翻查理现在所代表的奥斯特拉西亚霸权的斗争。但这一次，查理的胜利是决定性的，在那之后，他成功地踏过了纽斯特里亚的心脏地带，占领了奥尔良。

一时的军事胜利变成了持久的政治控制，特别是，他任命关键支持者担任纽斯特里亚中心地带的领导职务，这是他的父亲从未做过的。他将同父异母的兄弟德罗戈的儿子休（Hugh）任命为两所富裕修道院的院长，还分给他5个主教教区，其中包括巴黎和鲁昂。到了720年，当尤多把希尔佩里克二世和大量的财宝交给他时，查理的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克洛塔尔四世已死）。注

尽管一度形势危急，但到了8世纪20年代早期，查理已经牢牢控制住了局势。此时，加洛林王朝内部的继承纠纷已经得到了彻底解决。德罗戈的儿子休得到了惊人的回报，但他显然在很早的时候就宣示了对查理的忠诚。德罗戈和格里摩尔德的其他男性后代就没这么幸运了。查理并没有杀死他们，甚至连狄奥多尔德也没有杀，但到了723年，他们已被安全监禁起来，再没有释放。此外，查理不仅重新确立了奥斯特拉西亚对纽斯特里亚的霸权，而且将其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此时，纽斯特里亚根本就没有宫相，而查理任命其关键支持者担任纽斯特里亚中心地带回报丰厚的重要职位，这一举动带来的政治影响力是他父亲的作为远不能及的。这个时候，勃艮第、普罗旺斯和阿基坦（更不用说附属的公国了）这些古老的核心地区还独立于他的控制，但是在查理于741年去世之前，其中大部分地区已被吞并。

我们不必花时间探究他随后战役的细节，尤其是因为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对其进行详尽重构，但我们可以勾勒出最可能的轮廓。到了8世纪30年代，查理已经有效控制了勃艮第，在这里，他任命了更多的支持者担任要职。这种政治上的领先地位是否需要大量的实际战争，目前还不清楚。然而，普罗旺斯的一些贵族肯定准备反抗。他们有属于自己的公爵，名叫毛隆图斯（Maurontius），当查理开始向他们展示自己的力量

时，一些人已经准备好战斗。毛隆图斯还通过谈判，从他的穆斯林邻居那里得到了一些援助，这些穆斯林不仅占领了这个王国的其他地方，还占领了比利牛斯山脉以北的西哥特老据点，即以纳博讷（Narbonne）为中心的塞蒂马尼亚省。但查理在普罗旺斯也有盟友。从这个时代幸存下来的最有趣的文件之一是贵族阿博（Abbo）739年的遗嘱。阿博是普罗旺斯的一个大地主，他跟随查理南征北战，获得了丰厚的回报。在所有的附属公爵领地中，到了734年，查理对阿勒曼尼亚的支配已经基本完成，他驱逐了在位的公爵，与巴伐利亚也维持着亲密而友好的关系，虽然最初发生了一些冲突。8世纪20年代，查理娶了巴伐利亚公主斯瓦纳希尔德（Swanahild）为第二任妻子。至于其他地方，他定期向弗里西亚人宣示自己的权力，他们仍然保留着一些自治权，但是对萨克森人，他只是偶尔显示一下威力。注

查理于741年10月22日去世，成就辉煌。在从前墨洛温王朝法兰克王国的核心地区中，只有阿基坦在他的直接控制之外，他对附属公国的影响力是相当大的。他晚年感到自信的一个明显迹象是，当他最后选择的名义上的墨洛温家族国王提乌德里克四世（Theuderic IV）于737年去世时，他觉得没有必要再任命新的了。在他生命的最后4年里，查理以自己的名义统治法兰克王国，不是作为国王，而是作为法兰克人的公爵和元首（Dux et Princeps Francorum）。从8世纪20年代开始，墨洛温王朝的国王在行使权力方面很有可能最终沦落到了艾因哈德所形容的那种地步。然而，仍然有一个重要的问题需要回答：查理为什么会如此成功？

事实上，真正需要解释的是他是如何取得最初的胜利的。一旦他开始取得胜利，事情就变简单了，一个成功会带来另一个成功。这种方法在法兰克王国和中世纪早期的欧洲其他地方都有效，其背后的原因很简单。罗马帝国旧的军事结构消失后，军事力量在很大程度上不再由全职的专业战士组成，而是由地主及其更有能力的依附者所构成的分遣队组成，至少对于更加富有的地主来说，其中可能包括一些多少有点专业的人物。这些地主有义务提供军事服务，而他们更乐于在有可能打胜仗的

领导者（也就是有令人信服的胜利记录的人）手下服役。因为这么做不仅更有可能在战争中活下来，而且有可能从获胜的领导者那里得到自己忠诚服务的慷慨回报。回报的形式包括动产，最近在英国出土的7世纪斯塔福德郡秘宝（Staffordshire hoard）中令人惊叹的黄金就是一个例证，而法兰克国王比英格兰的国王要富有得多。战功显赫者的回报会是各种各样的地产。无论如何，赢家比输家更容易获得这两种形式的财富，因为赢家完全有权没收被击败对手的财富和土地。这就是为什么在战争结束时，查理和尤多进行了艰难的谈判，要求把希尔佩里克和他的财宝都归还给查理。正是在用纽斯特里亚的资源奖励忠诚支持者（如德罗戈的儿子休）的过程中，查理得到了挥霍教会财产的名声。

从他在718年取得决定性胜利的那一刻起，查理的成功纪录就极大地鼓励了潜在的新支持者站到他的一边，因为他已经有很多东西可以用来赏赐了。随着更多的军事化地主（如普罗旺斯的阿博及其支持者）愿意为他服务，这反过来又让他在时机成熟的时候取得更多的胜利，而他的追随者也就可以得到更多的赏赐。但要让这种良性循环运作起来，你必须要赢得最初的胜利，而这正是我们的消息来源未能解释的。然而，我们可以提供一些基本上正确的观察结果。首先，奥斯特拉西亚的大部分军事化地主决定支持查理·马特作为丕平的继承人，而不是丕平的孙子狄奥多尔德，这并不奇怪。我们不知道狄奥多尔德究竟是什么时候出生的，但他那时只是个孩子，肯定没办法在丕平之死引发的政治危机中提供有效的军事领导。而查理是一个28岁的成年男性，也是一个更有可能的继承人。多年来，他一直在父亲身边扮演着某种公众角色，可能也参与过一些战役。他有很多机会与父亲的一些主要支持者建立工作关系，这大概就是为什么他们支持他而不是狄奥多尔德。

奥斯特拉西亚这些军事化地主的选择还有一个重要方面。他们不仅选择了查理，而且似乎还作为一个具有相当集体忠诚和凝聚力的整体来为他服务。至少，史料中没有迹象表明，相对于他们自己的人，奥斯特拉西亚人认为更有可能从纽斯特里亚领导人那里获得好的回报。即使在715年和716年的危机期间，查理似乎仍能指望奥斯特拉西亚人的坚定支

持（当然，重要的是他没有在这个关键时刻遭受任何重大失败）。这肯定反映出他的父亲丕平在其一生的政治成功中，在这些关键支持者中建立了相对稳固的政治基础。至少从他在687年的泰尔特里（Tertry）战役中决定性地战胜对手开始，丕平通过大量发放在法兰克王国内部和外部的战役中所获得的战利品，赢得了手下的忠诚（下一章我们将讨论这种忠诚的重要性）。在查理曼时代加洛林王朝的史书上，这一战役被作为法兰克王朝统治法兰克世界的开端来庆祝。也许正是因为继承了父亲军事上强大的抗挫折能力，查理才度过了最初的考验。[注]

查理统治的唯一缺陷是，在他于741年10月去世时，他的国家面临着一个比27年前的继承复杂得多的继承问题。在某种程度上，事情比较容易。并没有纽斯特里亚的贵族，或者说没有来自法兰克王国中心地带任何其他地方的贵族，试图利用继承问题来推翻加洛林王朝的统治。这是查理在法兰克王国政治成就的真实体现，因为随后的王朝内部纷争非常混乱，如果查理的统治没有如此稳固，的确会有一些来自纽斯特里亚、勃艮第或普罗旺斯的贵族至少会试图独立。

然而，在王朝内部，查理的死所带来的影响既重大又深远。他通过两段合法婚姻留下了3个成年的儿子：卡洛曼（Carloman）和丕平是罗特鲁德（Rotrude，特里尔主教的女儿，最好不要问……）所生；格里弗（Grifo）则是他第二任妻子——巴伐利亚公主斯瓦纳希尔德所生。此外，他还和妾室若德海德（Ruodhaid）有3个儿子，就我们所知，她从未参与过任何人的政治算计。根据编年史家弗里德加（实际上他只是在7世纪的原始文本之上做了添加）的说法，740年，查理在死前决定，他的王国只能由罗特鲁德的两个儿子分享。但这篇续文是后来写的，而且有很好的迹象表明查理的想法是三分天下，格里弗也在里面。

然而，卡洛曼和丕平没有犹豫，死亡人数开始上升。他们处决了可怜的老狄奥多尔德，他是赫斯塔尔的丕平和普雷科特鲁德的最后一个男性后代，长期以来，他都在一种保护性的监禁中饱受煎熬；卡洛曼和丕平表现得远没有他们的父亲那么内疚。他们同父异母的兄弟格里弗差不

多是在同一时间被监禁起来的，而他的母亲斯瓦纳希尔德则被打发到了女修道院。在清除了前进道路上的这些障碍之后，他们在742年瓜分了父亲的土地。值得注意的是，在此之前，他们找到了一位温顺的名义上的墨洛温王朝的国王（这是最后一位了）——希尔德里克三世（Childeric III）——并在743年任命他为国王。

有的人认为，这是为了防止其他非奥斯特拉西亚地区的法兰克贵族中发生政治动荡。他们可能会把继承看作抵抗加洛林王朝似乎势不可当的崛起的最后机会。没有其他迹象表明法兰克人内部有严重的动乱，我本人认为，任命一个墨洛温王朝的人可能是为了维持两兄弟之间的和平。从家族内部的兄弟情谊深度来判断，一旦他们清除了格里弗和其他人，他们肯定会成为彼此的潜在对手。无论背后的动机是什么，兄弟俩都表现出了对外人的残酷无情。阿基坦人决心保持自治，于是战斗就在这条战线上打响了。有些阿勒曼尼人试图抵抗，卡洛曼在746年召集该地区所有贵族到坎施塔特（Canstatt）的一个旧堡垒开会。在那里，他暗杀了他们，把他们的财产和土地分配给自己那些主要来自奥斯特拉西亚的追随者。[注]

此时，问题似乎已经解决，但这只是由两个阶段组成的继承过程的第一阶段。747年，也就是坎施塔特大屠杀的第二年，卡洛曼做出了一个非同寻常的决定：为了他的灵魂，他决定从法兰克王国的政治中抽身，前往罗马（起初并不是要去当修道士）。这是否在某种程度上与坎施塔特大屠杀有关还不得而知。有人认为他可能满心懊悔，但另一种可能的情况是，进行大屠杀和财产重新分配，是为了在他打算消失的时候，能够让手下对他本人和他的家族产生尽可能多的忠诚。卡洛曼的计划是让儿子德罗戈（Drogo）来接替自己，而任何这样的计划要想奏效，就像普雷科特鲁德在715年所发现的那样，都需要得到武士贵族群体中多数人的同意。

起初，一切似乎都很顺利。卡洛曼快步来到罗马，有来自747—748年的记录显示，最初丕平和他的侄子德罗戈统治得相当稳定。至少在

748年，双方都举行了教会改革会议（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我们将在第四部分深入探讨）。但是，后来法兰克政治的模式永远改变了。现有史料基本没有宣扬，甚至没有做出解释的是，可能是在751年（也有可能是752年）举行了某种形式的祝圣仪式之后，丕平突然以法兰克国王的身份出现了。对于像最后一个墨洛温王朝的国王被废黜和第一个加洛林王朝的国王加冕这样一个重大、划时代的事件，本应当有大量的历史记录。然而，实际上并没有大量的相关记录，而且在某些地方，我们的史料对所发生的事情做出了略微矛盾的叙述，这很能说明问题。在丕平称王的过程中，他自作主张，而这直接损害了他家庭中其他亲密成员的利益，这可能是令人尴尬的。

这个过程开始于748年年末，德罗戈在那之后就从史料中消失了。同年4月，丕平的妻子比特拉达（Betrada）为其生下了第一个儿子，他就是未来的查理曼。有人认为，查理的出生可能在丕平的盘算中意义重大，因为这让他有了一个将侄子清扫出局的好理由。我个人更倾向于认为，在与他哥哥以前的主要支持者建立适当的联系之前，丕平不可能对德罗戈采取行动。到了紧要关头，德罗戈父亲的人是会站起来为他而战，还是会接受丕平的领导呢？事实上，丕平的工作似乎做得非常好，749—750年没有任何重大冲突的记录。我认为，如果真的发生了内战，无论多么令人尴尬，还是会悄悄进入历史记录的。德罗戈得到的支持似乎足以让他远离丕平的魔爪，但还不足以在战场上抵抗丕平。还有一个人利用这个机会，帮助格里弗逃离了监禁，让形势更加混乱。

但是，这一切都不足以阻止丕平实现其最终的政治目标。据说“法兰克人”曾写信给教宗，询问由拥有王室头衔的人来掌握实权，而不是由一个没有实权的小人物掌握，这样做对不对。教宗的回复是肯定的，后来的史料对此大做文章。但目前还不清楚是否有此类信件发出（这方面的叙述有出入）。这种虚构是一种极好的手段，可以给丕平咄咄逼人的自我主张披上神圣的合法性外衣。丕平在751年或752年最初的加冕礼纯粹是法兰克王国内部的事件，可能涉及也可能不涉及《旧约》中那种古老的涂油礼，直到后来，教宗才被请来为他祈福。教宗斯德望（Pope

Stephen）在753—754年来到法兰克王国有他自己的原因，我们稍后会看到，但这正中丕平下怀。754年，丕平安排了第二次仪式，这次当然是涂油礼，这有助于最后的收尾工作。753年，教宗还在路上的时候，德罗戈和他那位从未被提到过姓名的弟弟被收押，格里弗被暗杀。在教宗之后，卡洛曼本人也回到了法兰克王国，但很快就被打发到了修道院，755年死在那里。

卡洛曼最后的旅程引发了无尽的猜测。他是想救他的儿子吗？最近还有一种说法是，他是作为伦巴第人的使者而来的。但是丕平加冕后，德罗戈就没有办法重新分享权力了。我强烈怀疑，是丕平要求卡洛曼回到法兰克王国的，目的是换取教宗试图拼凑起来的联盟。因为，在摆脱了卡洛曼的后代之后，卡洛曼代表了丕平不愿留下的最后一个隐患。也许卡洛曼回来，是为了确保儿子能在修道院里度过余生（他自己似乎已经这么做了），而不是落到与被暗杀的格里弗同样的下场。不管怎样，教宗的访问只不过是给法兰克王国锦上添花。卡洛曼的大多数（或者说足够多的）支持者显然已经接受了参加加冕仪式的邀请。(注)

就这样，奥斯特拉西亚的宫相们走上了王权之路的巅峰。查理·马特击败了对手，将自己的家族置于远远高于法兰克王国其他核心地区前同僚的地位。丕平用政治运作使每个人都得出他父亲职业生涯的自然结论：从此，法兰克人的国王应该来自加洛林家族，而不再是墨洛温家族。

查理曼的赠予

就像之前两次复兴西方帝国的行动一样，800年圣诞节前的事件也有很强的偶然性。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丕平怀有哪怕是最模糊的帝国野心，而他儿子的帝国野心也是许多巧合促成的。尽管如此，教宗斯德望愿意前往法兰克王国，在丕平宣示获得王权的第二个仪式上扮演跑龙套的角色，这背后的原因构成了查理曼称帝的关键背景。

一切起源于2 000多公里之外东部地区的事件。正如我们在上一章看到的，穆斯林在7世纪中叶的第一轮征服夺走了东罗马最富有的中东和近东地区，使其从世界强国沦为地区强国，但这还不是其斗争的结束。从7世纪90年代到8世纪初，与阿拉伯帝国的冲突再次加剧。717—718年，帝国首都面临穆斯林军队长达一年的包围。它幸存了下来，但只是勉强存活了下来；随后在8世纪20—30年代，小亚细亚又遭受了进一步的损失。东部前线只能是君士坦丁堡的首要任务，无论是军事上还是经济上，东罗马都已经无力顾及意大利的大部分地区，这些地区在伦巴第人入侵后不久就由其控制。正如我们将在第7章中更详细地看到的那样，这既使罗马城周围的地区成为一个在教宗控制下的独立国家（它自称为圣彼得共和国），又鼓励伦巴第的国王们在半岛内部进行更大的扩张。

最初，教宗发现与斯波莱托的独立的伦巴第公爵结盟，足以抵御北方的伦巴第王国，但是到了8世纪40年代，教宗撒迦利（Zachariah）就得直接与国王柳特普兰德（712—744年在位）进行和平谈判了（以割让部分领土为代价）。但是随着拜占庭的地位不断削弱，到了751年，也就是丕平加冕为国王的时候，柳特普兰德的继任者艾斯图尔夫（Aistulf）胜利进军拉韦纳和邻近的五城公国（该公国基于里米尼和安科纳之间的五个亚得里亚海沿岸城市）。艾斯图尔夫的部队也进入伊斯特拉半岛（Istrian peninsula），并且与威尼斯人单独达成了和平协议。他贪婪的目光转向了罗马。注

正是在这种新的战略形势下，教宗斯德望在753年踏上了前往法兰克王国的道路。他乐见君士坦丁堡影响力减少，但不希望拜占庭的统治被伦巴第王朝的君主所取代。在他看来，法兰克人显然是对抗伦巴第野心的力量，而希望获得教宗正式祝福的丕平也在一定程度上情愿扮演规定的角色。755年和756年，丕平两次率领军队越过阿尔卑斯山，包围伦巴第国王所在的首都帕维亚。755年，艾斯图尔夫同意将原来的宗主教辖区和五城地区的控制权交还给教宗；丕平刚回去，艾斯图尔夫就食言了，还对罗马发动了围攻。于是，丕平又回来了，再次包围帕维亚，并

取得了与上次相似的结果。艾斯图尔夫再次同意了同样的协议［757年，他的继任者德西德里乌斯（Desiderius）也同意了］，丕平回到了法兰克王国，在那里他面临着更加紧迫的问题。

丕平在位的剩余时间里，那里风平浪静。没有任何措施来强制执行双方同意的领土转移，伦巴第国王大体上满足于与罗马保持和平，就这样，后拜占庭时代的意大利北部和中部形成了一种新的平衡。这对丕平和他那些对自己的事情更感兴趣的贵族来说是很合适的。除了对萨克森人的零星战役（比如在753年和758年），在他统治的剩余时间里，丕平的重点是牢牢确保他对高卢的控制。首先，从752年到759年，通过一系列成功的战役，丕平最终夺取了对原西哥特人的塞蒂马尼亚省（当时在穆斯林手中）的控制权。然后，他将注意力转向了阿基坦——6世纪时，这里曾是墨洛温王国的一部分，但是在8世纪早期，一个顽强的公爵家族使这里获得了独立的地位。从759年起，丕平无情地骚扰阿基坦，直到768年，经过一系列的败仗之后，当时的韦弗公爵（Duke Waifer，尤多——732年查理·马特在普瓦捷战役中的对手——的孙子）被自己的一些手下暗杀。当丕平自己在768年9月意外去世时，这场斗争很快走向了结束。这给了韦弗公爵的儿子胡诺德（Hunoald）一线希望。更重要的是，一场新的王位继承即将开始，这将使加洛林王朝与教宗的关系更加紧密，并最终导向其对西方帝国帝位的主张。[注]

丕平的死并没有给加洛林王朝在法兰克王国内部的势力带来任何挑战，权力平稳地过渡给了他的两个儿子查理和卡洛曼。家族的兄弟关系一如既往，不到一年，两人就发生了争执。在最初的团结一致的表现之后，769年，查理独自消灭了阿基坦的胡诺德。而与此同时，他的母亲试图安排他和伦巴第国王德西德里乌斯的一个女儿结婚，她的名字可能是格珀加（Gerperga）。德西德里乌斯的另一个女儿嫁给了巴伐利亚公爵，所以这段婚姻看起来像是要把查理、伦巴第人和巴伐利亚人结成联盟，而这就把卡洛曼围在了中间，因此对他形成了威胁。两兄弟同父同母，所以情况应该不是像普雷科特鲁德那样的继母偏心。后来的史料显示，卡洛曼脾气暴躁，自怜自艾，喜欢奉承，所以她可能进行了清醒的

分析，以确定哪个儿子更有可能成为最好的国王（同样的分析以及贪婪和自利的问题也指导着重要贵族的政治选择），但是这些刻画都是在他死后很久才出现的。卡洛曼并不是唯一感到威胁的人。这场婚姻谈判还催生了来自罗马的信件，有些保存了下来；信中，对于法兰克国王与伦巴第人的联姻，教宗斯德望表示不安。伦巴第人仍对教宗领地虎视眈眈，他们也仍然没有履行在8世纪50年代的协议中做出的任何承诺。

对于兄弟间的冷漠是否会，或者更确切地说，什么时候会变成冲突，我们不得而知，因为偶然因素再次介入：771年12月4日，卡洛曼英年早逝。查理立即控制了他弟弟的王国，这也许表明，卡洛曼既不受爱戴，其统治也不得力，因为他的贵族们丝毫没有要反抗的意思。查理还终止了与伦巴第人的婚姻谈判，这很明显是为了建立一个联盟来对抗他的弟弟，现在弟弟死了，这场婚姻也变得多余了。

结果十分有趣。在一种非同寻常的大转变中，卡洛曼的遗孀格伯加（Gerberga，注意不是上文出现过的Gerperga，中间字母是b，不是p）逃到伦巴第国王那里避难，可见她十分不信任查理，担心他会加害自己的侄子和侄女。德西德里乌斯不仅对婚姻谈判的破裂感到非常伤心，因此愿意收留她，而且很明显认识到对于法兰克人的一切希望都白费了，于是再次开始侵占教宗在意大利中部的领地，而在那之前，在法兰克人的坚持下，他已经停止了对教宗国的侵略。772年1月，教宗斯德望去世，哈德良一世（Hadrian I）继位，这可能也鼓励了他。任何新统治者上台的头几个月都是考验其勇气的绝佳时机。

在其他情况下，查理是否会在意德西德里乌斯的行动，或者会有多在意，我们不得而知。然而，出于维护王朝这个重大理由，他于773年年底率领一支大军翻越阿尔卑斯山。伦巴第国王显然认为情况还会像755年和756年那样，当时丕平在政治上还没有足够的信心能长时间离开法兰克王国的腹地。前任伦巴第国王所要做的就是躲在帕维亚城墙后面，同意签订一个保全面子的条约，法兰克人则会离开，留下他们在城里安然无恙。但是，这次查理有足够的信心留下来。这再次表明，他将

权力扩大到他弟弟的领地，并没有带来任何潜在的、危险的政治怨恨。法兰克人的军队整个冬天都在包围帕维亚，查理对罗马进行了一次漫长的访问。到了774年的复活节，德西德里乌斯意识到大势已去，只好投降。他被送到北方的科尔比（Corbie）修道院当修道士，而卡洛曼的子女被交给他们的伯父，然后神秘地消失了。没有人记录他们的尸体被埋在哪里。(注)

这里，我们需要熟悉有史以来最重要的伪作背后的一些思想，那就是《君士坦丁赠礼》（*Donation of Constantine*）。最初的思想和其他一些观点以完整的最终形式出现在一份伪造的文件中，即《君士坦丁诏令》（*Constitutum Constantini*），它声称保存着第一位改信基督教的罗马皇帝君士坦丁一世的官方授权书。在这份授权书中，皇帝授予作为圣彼得继承者的教宗西尔维斯特一世（Pope Sylvester I）及其继任者的，不仅有对罗马城，还有对原来整个西部帝国的统治权，也就是从哈德良长城到北非的阿特拉斯山脉之间的所有地区。它还告诉我们，君士坦丁做出如此惊人的捐赠，是对西尔维斯特阐述的基督教教义和施行的洗礼的欢喜回应，而且，教宗还奇迹般地治愈了他的麻风病。就像我们将在最后一章看到的那样，今天我们看到的《君士坦丁诏令》还会出现在另一部伪作里，但那部伪作中的一些主要观念在8世纪晚期的罗马已经很盛行了。这些观念首次出现在教宗哈德良一世在778年写给查理的一封信中，因为法兰克人保存了一份他们和教宗之间的通信，这份档案得以幸存，后来被整理并收入《加洛林书信集》（*Codex Carolinus*）。这封信附有一段著名的劝诫：

> 在神佑的罗马教宗西尔维斯特时代，神圣记忆中最虔诚的伟大皇帝君士坦丁大帝高举上帝神圣的、普世的和使徒的罗马教会，把整个西部地区赠予教会，同样，在你我生活的这些最幸福的日子里，愿上帝的教会，也就是使徒圣彼得的教会，能够茁壮成长，充满欢喜，不断提升。

语言有点啰唆，但这不是重点。

这样一套思想的突然出现与查理对德西德里乌斯投降的一两方面的反应很有关系。最初把这位法兰克国王带到意大利的，可能只是很偶然的家庭事务，但是在为了解决家庭事务而摧毁了伦巴第王朝之后，查理趁机将自己称帝之事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查理并没有从伦巴第贵族中为自己找一个顺从的傀儡君主，而是做了一件几百年来从未有人做过的事情：宣布自己为他的军队刚刚征服的国家的国王。他没有废除伦巴第王国的概念，也没有废除伦巴第王国许多具体的独立运作方式，但他在现有名号的基础上增加了新的名号，从774年夏天起成为法兰克人和伦巴第人的国王。许多官员和贵族将保留原来的职位，但查理确保在接下来的岁月里，这一切都是按照他的意愿发生的。于名于实，他都把伦巴第王国加进了他通过消灭弟弟一脉而创建的统一的法兰克王国。

在这个高度紧张的背景下，君士坦丁给西尔维斯特赠礼的故事获得了一种非常直接的新意义，尽管故事的一些情节当时已经有了几个世纪的历史。教宗给皇帝施洗和治病的说法完全是一派胡言，却出现在《教宗名录》对6世纪西尔维斯特生平的记载中。伦巴第人结束拜占庭对宗主教辖区拉韦纳和五城的统治后，教宗们担心罗马会成为伦巴第人的下一个目标，而从较积极的方面说，他们则希望在落入伦巴第人之手的地区，保留对本来为教宗所有的土地的控制权，并确立教宗对这些地方原有公共收入的权利（收入由税收、过路费、法定罚款等手段产生）。正是围绕这些问题，教宗斯德望在8世纪50年代中期从丕平那里得到了承诺，但丕平并没有在实践中兑现过多少。

然而，一旦丕平的儿子成为伦巴第人的国王，情况看起来就大有希望了。查理完全控制着有争议的地区，也有能力提供大量的赠礼。然而，什么也没有发生，因此，哈德良在8世纪70年代后期的信中反复提到查理需要履行他父亲的诺言，这当然是为了他们的灵魂。在这种背景下，君士坦丁皇帝早在4世纪就向教宗西尔维斯特赠送过如此厚礼这种说法的意思就很明白了。此时哈德良并没有想过要控制西罗马故地，而

是想到了一些比较平淡无奇的东西。在以一种如此宏大的方式回顾君士坦丁的故事之后，哈德良的信言归正传。查理被直接等同于君士坦丁，他是“新君士坦丁”，因此，哈德良敦促查理效仿君士坦丁对圣彼得教会的慷慨之举。教宗特别提到了“托斯卡纳地区、斯波莱托、贝内文托、科西嘉岛的财产，以及萨宾的遗产”。他的代表带着证明教宗对这些财产的经济利益拥有合法权利的文件，向国王递交了这封信。㊟

最后，所有的施压都得到了回报；不过，平心而论，查理花了几年时间才巩固了他对意大利新领土的控制，他可能本来就打算做出这样的赠予。不管怎样，在781年和787年，他两次授予教宗财政权利，哈德良得到了自774年以来一直要求的大部分权利。这些捐赠的原始文本已不复存在，但我们确实见到了他的儿子虔诚者路易（Louis the Pious）在819年对赠予的确认，的确非常慷慨。查理没有像他父亲丕平可能已经承诺的那样，赋予教宗对旧拜占庭帝国领土宗主教辖区和五城的完整主权，但是他确实给了哈德良在这些地区的一些新权利，此外还给了他分散在这些地区的许多教宗领地。在另外的捐赠中，他还将罗马城周边新领土的全部主权移交给教宗，大部分是在781年移交的，787年又加上了新征服的贝内文托。科西嘉岛随后也被附带赠送。总之，国王确保教宗的年收入会大幅增加。㊟

就创造和传播一种对过去的虚假看法而言，虚假程度有多高是很难判断的。到了教宗哈德良一世的时代，君士坦丁和西尔维斯特故事的一部分，即洗礼和治愈，已经成为一个古老的谎言，哈德良可能认为真有其事。对于信中的其他内容，即治愈和洗礼给罗马教宗带来了巨大的权威，他是否也认为真有其事，我们不得而知。法兰克势力突然进入意大利，教宗不得不做出调整。在这样的背景下，这种新的联系是如此便利，你不禁会想，在伦巴第人被征服4年后，查理仍顽固地拒绝交出教宗的那份战利品，所以这个主意会不会是哈德良口述信件时顾问想出来的，为的是提供额外的说服力。但是，6世纪到8世纪之间教宗圈子里遗留下来的文献十分不完整，这种联系也有可能在很久以前就形成了。不

管怎样，君士坦丁和西尔维斯特的故事无疑推动了事态的发展。信寄出3年后，当罗马教宗最终从查理的伟大征服中得到属于自己的好处时，哈德良无疑非常感激。然而，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即使在获得捐赠之后，查理的成功所带来的一些其他后果仍然值得教宗忧虑。因此在另一个层面上说，这段被重新提起的君士坦丁和西尔维斯特的故事，也有可能是为了解决这些忧虑而精心构思的。

这些忧虑源于查理在拉丁基督教世界为自己创造的前所未有的崇高地位。得到伦巴第王国之后，他的领地大致与西罗马故地重合。有了伦巴第意大利和统一的法兰克王国（已经包括所有核心领土以及阿勒曼尼亚、弗里西亚和图林根），查理直接控制了大片领土，其范围甚至比6世纪最伟大的墨洛温王朝的国王手中的还要大，事实上比此前任何法兰克国王手中的都要大。故事并没有结束在774年。贝内文托和斯波莱托这两个独立的伦巴第公国也被控制。通过787—788年对巴伐利亚的一次完全无端的入侵，查理把最后一个古老的附庸公国纳入自己的直接控制。与此同时，一场长期而艰苦的斗争正在进行，目的是征服萨克森，消灭那里盛行的异教。斗争在772年就正式开始了，第一轮一直持续到8世纪80年代中期，包括强迫改信和在782年对4 500名反对者的大屠杀。在短暂的中断之后，暴乱在793年再次爆发，但第二轮主要限于北萨克森，以804年的最后一轮大规模驱逐行动告终。查理的征服清单不止于此，因为还要算上对西班牙北部的大幅扩张，以及在791年至796年之间对阿瓦尔王国的彻底摧毁，正如艾因哈德那句著名的话所言，在这之后，一长列满载财宝的马车缓慢驶回了法兰克王国。(注)

经过这段令人惊叹的征服生涯，实际上从德西德里乌斯投降的那一刻起，查理已经成了查理曼，即查理大帝，在整个拉丁基督教世界里无人可比。此时，君士坦丁堡的势力范围被限制在意大利南部一些分散的地区，西班牙西哥特王朝一脉已经被穆斯林的征服所消灭。查理曼在8世纪90年代给麦西亚（Mercia）的国王奥法（Offa）写了几封略带敬意的信，这让一些人认为奥法可以和他平起平坐，但这是一派胡言。查理曼统治着西欧和中欧的大部分地区，而奥法的势力范围只延伸到英格兰

南部诸郡。[注]两者之间没有可比性。

教宗忧虑的并不是查理曼不断取得成功这件事本身，毕竟，对萨克森人和阿瓦尔人的征服消灭了不少异教派别，扩大了基督教世界的范围。问题在于，在查理曼和他的顾问（包括俗人和神职人员）眼中，这些成功意味着什么。查理曼不仅统治着超过一个独立王国，而且几乎是整个拉丁基督教欧洲的统一者，他显然不仅仅是一个国王，“皇帝”这个头衔迟早会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查理曼本人究竟是在什么时候想到的，这是个棘手的问题。有证据表明，8世纪90年代时，查理曼的宫廷圈子里已经在讨论皇帝的称号，认为这是唯一适合他新地位的头衔。皇帝的具体头衔和更普遍的帝国概念都出现在当时宫廷知识分子的著作中，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思想没有在此前一段时间里流传。

我自己的直觉是，征服伦巴第人是真正改变游戏规则的因素。一旦国王和他的顾问们有时间来认真思考这一史无前例的成就，那么用“帝国”这个词来指代这个包含多个王国的实体就不可避免了。比查理曼所创造的更重要的，是一个相关的问题：他**为什么**能够将其创造出来？考虑到中世纪早期基督徒对历史进程的理解，对他们而言，这个问题没有别的答案：查理曼之所以能够建立由多个王国组成的帝国，是因为这是上帝的意志；查理曼是上帝在世间的代理人。[注]

长期以来，这种观念让皇帝和国王得以随心所欲地干涉教会事务。8世纪90年代，查理曼意味深长地展示了他的宗教权威。这个机会是由君士坦丁堡无意间提供的。8世纪上半叶，君士坦丁堡不断遭到穆斯林的破坏（穆斯林的破坏也让伦巴第人有机会进入拉韦纳），最终导致了意识形态上的危机。如果基督教是正确的宗教，而东罗马的皇帝是上帝指定的，那么为什么被认为是由全能的神所支持的帝国，却输给了一群不信教的人呢？《旧约》里，希伯来人经常因为错误的宗教实践而受到惩罚，于是答案很明显了：帝国做了一些冒犯上帝的事，上帝派穆斯林来警告他的子民回到正路上来。

至于究竟是什么冒犯了上帝，这个问题的备选答案就多了。在利奥

三世和他的儿子君士坦丁五世统治时期，君士坦丁堡当局正式采纳的观点是（原因尚不清楚），问题出在崇拜圣像的做法上。在东方基督教中，人们普遍认为图像能够捕捉到其描绘对象的某些本质，因此可以充当通往圣人、圣母、耶稣或任何被描绘的人的宗教热线。换句话说，圣像是一种圣物，可以作为一个入口，一扇通向天堂的窗户，可以通过它来获取其描绘对象的神圣力量。据我们所知，圣像崇拜一直是东方基督教的一部分，但从700年前后开始，人们就认为圣像实际上是“十诫”中所禁止的“雕刻偶像”（graven images），正是圣像崇拜惹怒了全能的上帝。利奥和君士坦丁统治时期，圣像被摧毁，圣像崇拜被宣布为非法，但这一教义从未在西方被接受，有几位教宗都喜欢谴责君士坦丁堡的官方政治观点是异端邪说。到了8世纪80年代后期，情况又发生了变化，当时以伊琳娜皇后（Irene）为首的新帝国政权精心策划了一次宗教上的大转变。伊琳娜皇后推翻了自己的儿子君士坦丁六世（Constantine VI），刺瞎了他的双眼（中世纪早期皇室亲情的另一个例子）。787年，在尼西亚召开了一次新的宗教会议，作为宗教力量象征的圣像重新流行起来。当消息传到西方时，教宗哈德良欣喜万分，表示欢迎君士坦丁堡在宗教上的回归。注

查理曼和他的神职人员持不同观点。经过精心准备，国王在法兰克福召开了一次大型宗教会议，就在教宗代表的眼皮底下，达成了与哈德良不同的宗教立场。大家都同意，宗教画没什么问题，但只能用于教导。君士坦丁堡把图像作为有宗教力量的圣物的教条被抛弃了。在这里，查理曼的主要目标当然是君士坦丁堡而不是罗马。到这个时候，关于帝国，查理曼的圈子里已是议论纷纷。至少在一开始，为重新主张西方帝国而辩护的说法是，君士坦丁堡的观点是严重错误的，因此，宗教上的错误是击败拜占庭人的绝佳武器。8世纪90年代，对君士坦丁堡的抨击加剧，因为又有人提出，《圣经》对男人和女人之间的次序是有教导的，而很明显，女人（所指的自然是伊琳娜）不可能合法地担任上帝任命的皇帝，因为皇帝是被上帝选中的基督教世界的领导者。这种对君士坦丁堡的侵略姿态表明，在查理曼的宫廷里，关于帝国的讨论不仅仅

是他的知识分子在玩的游戏。投入如此多的精力来争论拜占庭那个版本的帝国在上帝眼中是否合法，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查理曼自己在觊觎帝国的称号。(注)

从教宗的角度来看，所有这些都涉及一个主要问题。正如查理曼的行为所凸显的那样，8世纪晚期只有一种帝国概念，它带有很强的宗教权威意涵，人们认为帝国是神所设立的。我们将在第7章看到，查理曼已经在宗教领域行使权力，其范围不限于法兰克福宗教会议。因此，查理曼的称帝企图意味着圣彼得的最新继承人正面临一个强大的对手，要争夺在拉丁西方教会的领导权；而法兰克福宗教会议的情况表明，为了维护自己的宗教权威，这个对手完全不惮于牺牲罗马的宗教权威。这一切都是在8世纪90年代公开化的，但从中世纪早期世俗力量与上帝意志之间存在根本联系的观点看，这些思想从德西德里乌斯投降的那一刻起就已经存在了。因此，在774年以后的岁月里，尽管教宗的罗马共和国从查理曼781年和787年的赠予中获得了巨大的物质利益，教宗却不能不把查理曼视为对其宗教权威的威胁，我们有充分的证据表明，教宗很自然地要限制他的野心。

在意识形态上对查理曼的挑战做出的一种回应，可见于《加洛林书信集》中保存下来的8世纪70年代以后的教宗书信。法兰克人一致将国王的成功归功于上帝，而教宗的书信则将其归功于圣彼得的代祷，认为这是对查理忠于罗马的回报。毫无疑问，采用这一说法，部分是为了在查理曼征服伦巴第人之后，从他那里争取到最多的好处，因为这意味着如果国王不履行诺言，圣彼得就可以剥夺他的成功。而这也含蓄地限制了查理曼在上帝计划中的作用，暗示全能的上帝并不是直接通过查理曼，而是通过教宗和圣彼得来行事的。换句话说，上帝的中心目的不是让查理曼成为西方基督教世界的领袖，而是要加强罗马教会的力量。(注)

在这种背景下，最终将在《君士坦丁赠礼》中被记录下来的思想，除了与教宗的土地掠夺明显相关之外，还具有第二方面的重要性。很明显，其中还包含这样一种观点，即西方根本没有理由拥有皇帝，因为君

士坦丁在前往君士坦丁堡时，已经把整个西罗马的统治权交给了教宗西尔维斯特。鉴于查理曼在征服伦巴第王国之后就开始像皇帝一样行事，并且很快对获得这个头衔产生了兴趣，鉴于皇帝可以凭借受神任命的说法在非常大的范围内行使宗教权威，教宗论点的这一方面不可能是偶然出现的。虽然罗马教宗已经从查理曼的胜利中获得了许多好处，但他显然也在尽最大努力防止查理曼的成功失控。君士坦丁和西尔维斯特的故事，以及将一切归功于圣彼得代祷的坚定尝试，表明查理曼的成功很快就让哈德良的总部敲响了警钟。

现在，我们终于接近了解800年圣诞节背后的历史动因了。最晚从他决定发起斗争终结反圣像运动的那一刻起（我怀疑比这要早不少），查理曼就盯上了皇帝的头衔，他充分理解该头衔传统的罗马含义（完全保留在同时代的君士坦丁堡），即这是基督教世界中上帝任命的最高权威，无论是在世俗领域，还是在宗教领域。教宗很高兴能从查理曼的一些征服成果中获益，但他不希望查理曼称帝。这给我们留下了最后两个谜题。既然教宗很不希望恢复帝制，为什么教宗利奥还是为查理大帝加冕了呢？而尽管有压倒性的证据表明实际情况恰恰相反，艾因哈德却坚称，如果查理曼知道会发生什么，他是绝对不会进入圣彼得大教堂的，这又是为什么呢？

教宗利奥的危险

第二个问题的答案很简单。根据官方对帝国宣传的定义，唯一合法的皇帝是被上帝任命的。当然，问题在于如何确定某个人是上帝所指定的，因为偶尔，凭借人的意思上台的不合法皇帝也会插进来。

一般来说，人们会通过两种迹象来确定。首先，真正获得上帝任命的皇帝会很成功，因为上帝是全能的神。军事上的胜利通常被认为是上帝支持下的合法政权的最佳标志。其次，一个真正被上帝的意志所选择的人，无论他或其他人做了什么，想不成为皇帝都不行，因为这是上帝

的意志。反过来说也很简单，一个人如果野心过大，就说明他完全不适合这份工作。因此，当尤利安的堂兄奥古斯都·君士坦提乌斯二世（Augustus Constantius II）任命他为恺撒时，尤利安嘀咕了一句“紫色的死亡抓住了我”。这是荷马史诗中的说法，可以用来表达对不希望获得的晋升的抗拒。出于同样的原因，当他的军队后来拥戴他为奥古斯都时，尤利安非常小心地在某种程度上加以否定，因为这是对君士坦提乌斯权威的直接挑战。而所有的迹象都表明，他不仅知道他的军队会这样称呼他，而且事实上这完全是他自己的人组织的。同样的做法在基督教中也很流行，任何一个真正神圣的人都要在其传记中有这样的记录：他已经尽最大的努力避免担任神职，但最终还是屈服了，因为他别无选择。[注]当然，这是上帝的任命的完美标志：既然这是上帝的意志，人就不可能逃避。

艾因哈德熟读古典作品，他的《查理大帝传》在很大程度上模仿了苏维托尼乌斯（Suetonius）的作品，书中也展现出他对大量其他古代文本的了解。就像宫廷里的许多知识分子一样，对于如何着手确定真正的上帝的任命，他肯定非常了解。换句话说，查理曼和他的顾问们非常清楚，如果拥查理曼为帝的做法太过张扬，那么说查理曼受上帝任命就站不住脚了。这就是查理曼在面对5世纪时被打破的西方帝国传统时所面临的两难境地。彻底粉碎伦巴第王国后，他就满足了军事上的胜利这一标准。随后他在统治期间攻城略地，一次又一次证明上帝站在他这一边。但是，如果说上帝已经通过这种方式表明查理曼是他选中的皇帝，但查理曼和顾问都不能声张的话，要怎么样才能让大家都知道呢？

很明显，至少从8世纪90年代早期开始，他们就在操心这个问题。我们将在本书最后一部分看到，查理曼的改革计划显示出对教会的极大关怀，而这也符合上帝所拣选的基督教皇帝的工作内容。换句话说，查理曼不仅在战场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任何了解他们的政治理论的人看来，他都当得起“皇帝”这个头衔，而且他关注基督教改革（我确信这是完全真诚的，我不是在嘲讽），这从另一个方面表达了同样的观点。有证据表明查理曼及其顾问们在公元800年之前的几年里一直盯着皇帝

的头衔，而面对这样的证据时，有人会反对说，他真正得到这个头衔以后，他的行为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除了他不再出远门，而这实际上是因为他年纪大了）。这就是没有抓住重点了。在公元800年的圣诞节之前，查理曼在至少有10年（很可能是20年）的时间里一直故意表现得像个皇帝。

在教宗利奥三世身上，他们毫不费力地找到了另一个也是最后一个问题的解决方案。利奥于795年接替教宗哈德良一世，不久便与反对他继任的罗马贵族发生冲突。799年4月25日，事情到了紧要关头，利奥被他的对手抓住，被控做伪证、买卖圣职和有不正当的性行为。后来流传的故事是，他们试图挖出他的眼睛，割下他的舌头，独立的消息来源证实，他至少受了伤，但是在圣诞节那天，利奥肯定是能看到也能说话的。教宗方面的消息来源将此归功于奇迹的干预，但没有眼睛就看不见，而且刺瞎双眼也不是那么困难，所以传说有很多杜撰的成分。但利奥的确遭到了袭击，还被关了起来，他翻过修道院的一堵墙才得以逃脱，逃到查理曼在城里的一个代表那里寻求保护。同年晚些时候，他被送到北方，在帕德博恩（Paderborn）与查理曼会面。

他们见面时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们没有任何史料记录，双方随后都精心策划了各种虚假信息。而如果我们看到，查理曼显然想要称帝，而利奥宁死也不愿看到西方帝国复活，那么我们就会发现事件的先后顺序极有深意。查理曼在和他的神职人员商量后宣布，没有人有权力对教宗进行审判，因为他是使徒，是圣彼得的直系后裔。然后，他派利奥带着足够的兵力回到罗马镇压其对手，一年多之后，查理曼本人于800年11月进入罗马。12月初的一次会议重申了无人有权审判教宗的立场。尽管如此，12月23日，据说是出于他自己的意愿，利奥庄严宣誓他没有犯过别人指控他犯有的罪，两天后，他宣布查理曼为皇帝。[注]

对于帕德博恩会见的内容，没有任何史料记录，这非同一般。在此，我想向你们介绍我的一位博士生导师的一个原则。他是非常杰出的古代历史学家，研究罗马帝国晚期，却像很多（虽然不是所有）研究古

典学的人一样对基督教持怀疑态度。他说过一句名言：“我可能对基督教了解不多，但我确实知道腐烂的鱼的味道。”帕德博恩的会见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无从得知查理曼的提议是怎么表达的，是由谁提出来的（是直接提出来的，还是国王的一个手下和利奥的一个手下在树林里散步时提出来的）。我们也无从得知利奥是经历了漫长而艰难的内心挣扎，还是很快就接受了。但是我可以肯定，无论具体措辞如何，查理曼的大意是：“你帮我当皇帝，我就帮你重新坐上教宗宝座，不用多问。”注

从查理曼的角度来看，没有比这更好的解决办法了。在过去的20年里，查理曼取得了惊人的军事成就，对教会呵护有加，这些都是为了什么呢？还有什么能比让教宗大声宣布出来更完美的呢？毫无疑问，查理曼是上帝为恢复基督教帝国而选择的工具。没有人怀疑罗马教宗拥有的特殊权力，因为教宗是圣彼得的后裔，尽管对于这种权力可能意味着什么存在一些分歧。因此，教宗是查理曼问题的良好解决方案，而这些思想背后的主张后来将被写进《君士坦丁赠礼》，这个方案就显得更好了。该文本的关键主张是，君士坦丁在坐上前往君士坦丁堡的马车时，就把西方的皇权交给了教宗西尔维斯特。这一主张已经在哈德良与查理曼的通信中有所体现。简直太妙了！既然早在4世纪时，皇权就被交到了教宗手中，那么要想宣布查理曼为皇帝，还有比教宗更好的人选吗？

就像外交上强制婚姻的情况一样，双方迅速公布了各自对事件的表述。利奥在拉特兰宫（当时教廷在拉特兰宫，不在梵蒂冈）的大厅里立了一幅镶嵌画，画中查理曼和利奥并排跪在圣彼得脚下。最初的版本被毁了，但有一份复制品，现在可以在圣彼得大教堂的外面看到。这幅肖像画明确否认查理曼比教宗更有权威，这与《加洛林书信集》中存世书信里教宗坚持的看法完全一致，即查理曼的胜利是依靠圣彼得取得的，并非直接来自上帝。

查理曼的观点则大不相同。教宗在800年圣诞节当天所做的一切，不过是宣布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选择查理曼独掌帝国权威的是上帝

（主要人物），而不是圣彼得（他的代表），查理曼的功绩显然是配得上的。799年夏天在帕德博恩会面，一年多后才举行加冕典礼，这种延迟部分是为了留出时间，在外交上引起适当程度的轰动（当然，查理曼也需要安排在北方的事务，以便为自己之后的长期缺席做准备）。除了其他的奇事之外，查理曼做了这样的安排：他回到罗马时，正好有一个来自耶路撒冷宗座的代表团也在罗马，把所有城市中最神圣的基督教城市——耶路撒冷的钥匙交给他。时候到了，查理曼认为传递帝国火炬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亲自为他的儿子兼继承人路易举行了仪式，他完全自己一个人完成，连教宗的跑龙套角色也不需要了。在位的、由上帝任命的皇帝当然可以指定他的继承人，这不会被认为是傲慢之举。[注]利奥的麻烦确定了帝国的命运。这个帝国发生了什么？路易和查理大帝的其他后继者的表现如何？这是下一章要探讨的内容。

---

1. 《教宗名录》 98.23，Davis译（1992），190—191。艾因哈德《查理大帝传》28。在《查理大帝与教宗利奥》（Karolus Magnus et Leo Papa）中，查理曼被称为“欧洲之父”（Pater Europae），见存世残篇第93行（这首诗也有可能出自艾因哈德之手，见第7章，注释2），Godman译，（1985），203。它还启发了一篇著名概述，即Bullough（1985）。

2. 阿提拉试图干涉5世纪40年代法兰克人的继承权之争，见Priscus fr. 20.3；《晚期罗马帝国人物志》 2，285—286列举并探讨了有关希尔德里克生平的史料，图尔主教格雷戈里的《法兰克人史》2.12记录了他的流放。Halsall（2007），269–271，303–306是一种很有说服力的尝试，试图将他置于罗马帝国解体的背景下。对于坟墓更加详细的描述，见Perin and Kazanski（1996）。

3. 公元468年之后，帝国最后几股势力的迅速瓦解，见Heather（2005），407–430。

4. Fredegar 3.12讲述了巴希娜的梦境。关于克洛维的征服，优秀的英文著作有James（1988），79–90; Wood（1994），38–50。James认为克洛维的第一个受害者沙格里乌斯控制着一个比传统上认为的小得多的实体，但这并非没有受到质疑，见MacGeorge（2002），111 ff。图尔主教格雷戈里的《法兰克人史》 2.40—42记录了他的征服，但是时间上可能有问题，见Heather（2009），308–310。

5. 关于克洛维改信基督教的修正过的年表和神学背景，见Shanzer and Wood（2002），362–373。关于不相信《尼西亚信经》的狄奥多里克与他统治下的天主教徒之间的良好关系，见本书第2章。

6. 关于东哥特人构成的障碍被排除之后法兰克人的扩张，以及多次内战和王国分裂，都有很好的描述，见James（1988），91–108 and c. 5; Wood（1994），50–54 and c. 6。提奥德贝尔特写给查士丁尼的信，见Ep. Aust. 20。关于金币，见普罗柯比《战史》 7.33. 5–6。墨洛温王朝的宫廷诗人福尔图纳图斯（Venantius Fortunatus）只有一次使用“恺撒”来指代法兰克的国王，见6.1：西吉贝尔特和布伦希尔德（Brunhild）的婚姻。在他为诸多法兰克国王创作的大量诗篇中，他一直用的是“国王”。

7. Wickham（2009），cc. 4–6很好地概述了后罗马时代的西方的情况。信奉《尼西亚信经》的西哥特王国，见Collins（2004），c. 8，以及Heather（1999）中的论文，这些论文以英语介绍了用西班牙语对西哥特继承国家的最新研究。关于伦巴第人，见Wickham（1981），28 ff; La Rocca（2005），尤其是Pohl和Gaspari的论文。

8. 艾因哈德《查理大帝传》，c. 1。Wallace-Hadrill（1982），231 ff. 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体现了理解后期墨洛温王朝的传统模式。

9. Gerberding（1987），尤其是第8章。

10. 关于和边缘地区之间的关系，见Wood（1994），第10章。

11. 引文出自吉本（1896—1900）, c. 52。Fouracre（2000）, 1–10很好地梳理和解构了传统上对查理·马特的认识。Wood（1995）提供了一个精彩的个案研究，分析了由于新领主施加的外部压力，向“错误”的俗人授予土地而引发的紧张局势。

12. 有很多很好的英文叙述，都讨论了现存资料来源的残缺不全和偏见所引发的问题，如Fouracre（2000）, c. 3; Fouracre（2005）; McKitterick（2008）, 63 ff.;Costambeys et al.（2011）, 41 ff.。

13. 更详细的叙述，见Fouracre（2000）, c. 4; McKitterick（2008）, 63 ff.; Costambeys et al.（2011）, 44–51。关于阿博的遗嘱，见Geary（1985）。

14. 我们将在下一章回到国王提供奖励的重要性，但是好的导论有：Bassett（1989）;Reuter（1985）,（1990）。参考Fouracre（2000），尤其是第175—184页关于查理最初成功的起源的讨论，尽管我认为丕平的成功意味着无论谁在奥斯特拉西亚的权力斗争中获胜，都会占据比他想象的更加有利的位置。

15. 对这些事件更加详细的介绍，见McKitterick（1983）, 33 ff.; Costambeys et al.（2011）, 51 ff.; 对最后一位墨洛温王朝国王的任命也有类似的怀疑，见Fouracre（2005）。

16. 关于丕平的政变（充分参考了大量的有关文献），见McKitterick（1983）, c. 2;Fouracre（2005）; McKitterick（2008）, 71 ff.; Costambeys et al.（2011）, 51 ff.。

17. 关于拜占庭的损失，见Mango（1977a）; Whittow（1996）, 82 ff.。本章注释11所提到的作品也很好地讲述了8世纪伦巴第人的扩张。

18. 关于意大利的事件，见Noble（1984）, 71 ff.；对有关教宗生平的翻译和介绍，见Davis（1992）, esp. nos. 92–95。丕平和法兰克王国，见McKitterick（1983）,45–53;

Costambeys et al.（2011）, 57–65。

19. 对查理曼策略的更详细介绍，见McKitterick（1983）, 64 ff.; Nelson（1998）;McKitterick（2008）, 75 ff.; Costambeys et al.（2011）, 65 ff.。关于帕维亚被围期间查理曼访问罗马的影响，见Nelson（2005）, 28–31的精彩讲述。这些年里教宗斯德望写给法兰克国王的信件保存于《加洛林书信集》（Codex Carolinus）中，其翻译见King（1987）, 269–279。斯德望对查理曼和伦巴第王室之间联姻的焦虑，以及随后对其失败的释怀，再明显不过了[拉丁语文本: Gundlach（1892）, nos. 44–48]。

20. 译文见King（1987）, 286–288 [拉丁语文本: Gundlach（1892）, no. 60]。在6世纪《教宗名录》的西尔维斯特传中，就已经提到了这次治愈和洗礼，但是没有提到任何的权力转移，见Davis译（2000）, 14和Davis（2000）, xlvi–xlvii。许多人合理地认为，哈德良书信中出现治愈、洗礼和权力转移之间的关键联系，说明《君士坦丁诏令》的完整伪造文本已经存在，见Noble（1984）,134–137，其中有完整的延伸阅读书单。但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最近的研究表明，实际的文本（而不是它的一些关键思想）是后来产生的。

21. King（1987）, 276 ff. [拉丁语文本: Gundlach（1892）, nos. 49 ff.]精选并翻译了哈德良在这些令人焦虑的岁月里写给查理曼的信件。Noble（1984）, c. 5精彩讲述了其内容和背景，我这里概述的就是他对于查理曼赠礼的总结论。

22. 艾因哈德《查理大帝传》, c. 13。关于后来这些征服的更详细的描述，见McKitterick（1983）, 59–72; Reuter（1985）,（2005）; McKitterick（2008）, 103 ff.; Costambeys et al.（2011）, 68 ff.。

23. 最近的精彩讲述是Story（2005a）。

24. 关于查理曼宫廷的知识分子的思考，见Godman（1987）, c. 2; Collins（2005）;McKitterick（2008）, 114–118; Costambeys et al.（2011）, 160–170。

25. 对于反圣像运动的精彩介绍，见Cormack（1985）, esp. c. 3; Herrin（1987）, c. 8;Whittow（1996）, c. 6; Noble（2009）, c. 2。关于其终结，参考Mango（1977b）。

26. 见McKitterick（2008）, 311 ff.。更详细的介绍，见Noble（2009）, c. 4。

27. 这是《加洛林书信集》的教宗信件反复强调的，见King译（1987）, nos. 1, 2,6, 8, 13, 17, 18, 26, 30, 35, 37［拉丁语文本Gundlach（1892）, nos. 44, 45, 53, 50,56, 60, 61, 72, 76, 82, 83］。

28. 尤利安，见Ammianus 15. 8. 17; 参考Matthews（1989）, c. 6。

29. 对于从袭击利奥到加冕礼的一系列事件，必须从教宗和加洛林王室两边的说法来理解。事情发生后，双方立即开始以最符合自己利益的方式讲述事件，这本身就说明，至少对一方来说，加冕是在胁迫下发生的事情。最新的精彩讲述见Noble（1984）, 291 ff.; Collins（2005）; McKitterick（2008）, 88 ff.; Costambeys et al.（2011）, 160 ff.。

30. 这位导师就是约翰·马修斯（John Matthews）教授，现执教于耶鲁大学，请务必把他与研究亚瑟王的那位同名人物区分开来。

31. 见McKitterick（2008），96 ff.; Costambeys et al.（2011），194 ff.。

第6章
“中心无法维系”

814年1月28日，查理大帝离开了尘世，享年65岁（就加洛林王朝的男性而言，这是相当长寿的，因为他们的寿命基本都在50岁左右）。他身材魁梧，19世纪有一种说法认为他身高约为1.9米，但是2010年对他的骨骸进行的X射线和计算机断层扫描（CT）显示他的实际身高为184厘米。不管是1.9米还是184厘米，他的身高在那个时代都是百里挑一的。艾因哈德曾对中年后期的国王做出令人印象深刻的描绘：

> 他的头很圆，大眼睛炯炯有神，鼻子比常人略大，颈部有些粗短，头发白了，却依旧迷人，他的神态活泼而又愉快，他身体很健康，只在生命最后几年发过几次烧。后来他一只脚跛了。到了这个时候，他仍旧固执地做着他想做的事情，不肯听医生的话，事实上他非常厌恶他们，因为那些医生试图说服他放弃他已经吃惯了的烤肉，而改吃水煮的肉。[注]

除了病痛，他在晚年也经受了很多其他的痛苦，其中最明显的那些痛苦以很糟糕的方式极大简化了帝国的政治。

不难预料，随着查理曼开始衰老，甚至在他尚未衰老的时候，他的帝国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在开创者死后由谁来继承。查理曼第一次试图解决这个问题是在806年，当时一次盛大的法兰克贵族集会通过了一个方案，将其记录在正式文件中并流传至今，这就是《分国诏书》（*Divisio Regnorum*）。查理曼有过5任妻子（并非同时）和许多妾室，因此有很多孩子，最好的猜测是足有12人。然而，806年的方案只集中

在3位成年继承人身上，按照出生的顺序依次为小查理、丕平和路易。他们3个都可以进入意大利，但除此之外，他们将分别统治独立的领地。路易早已在阿基坦确立了自己的势力，丕平分到了意大利北部原来是伦巴第王国的大部分，小查理的领地面积最大，包括了纽斯特里亚和奥斯特拉西亚等原法兰克王国的中心地带。皇帝头衔的问题没有被提到，但人们通常认为它属于小查理，因为他明显处于支配地位。

但是，意大利的丕平在810年就去世了，而小查理也在811年离世，命运只给查理曼留下了唯一一个成年的儿子路易，他就是历史上的虔诚者路易。813年，继承方案不得不进行相应的修改，此时路易离开他从3岁（781年）起就开始担任国王的阿基坦，来到了亚琛（Aachen）。在另一个盛大的仪式上，路易不仅成为查理曼所有事务的继承人，而且被指定为皇帝。毫无疑问，老国王为他儿子的死而感到悲伤，但他也十分清楚，他的祖父、父亲和他本人的继位曾经使兄弟反目成仇，并因此产生了巨大的政治动荡。因此，他也许能够这样安慰自己：显然，创造了帝国的上帝，现在正以他特有的神秘方式引导事情的发展，以确保帝国后继有人、繁荣昌盛。(注)

然而，75年之后，在888年的2月，西法兰克的贵族们选择了一位加洛林家族之外的人为国王，他就是厄德（Eudes），又名奥多（Odo）。虔诚者路易的曾孙查理三世领导了加洛林王朝的复辟，但查理三世只是西法兰克王国的国王，不是帝国的皇帝。而到了929年查理三世去世之时，东法兰克王国和意大利都已经摆脱了加洛林王朝的统治，走上了各自独立的道路。尽管查理曼一生都很成功，但他建立的帝国在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就灰飞烟灭了。相比之下，罗马帝国延续了至少500年，甚至可能有1 000年，当然这取决于你怎么计算。此外，即使在西法兰克王国以内，加洛林王朝的统治也没有超过10世纪，它最终在987年被奥多之弟罗贝尔的孙子于格·卡佩（Hugh Capet）所取代。卡佩家族的统治父子相传，中间从未间断，惊人地持续到1328年。那么，为什么加洛林王朝没能持续更久一点呢？就像墨洛温王朝统治的覆灭一样，我们在讲的现象远远不是一个王朝取代另一个王朝那么简单。就像7世纪中后期的

情况一样，在9世纪中后期乃至其后，在更大范围内出现了中央权力瓦解的现象。为了理解这个王朝如何迅速失去了对其前帝国大部分地区的控制，有必要深入了解查理曼和虔诚者路易是如何统治上帝赐予他们的广袤领土的。

教父（上）

对于帝国为何不能持久，人们提出了许多解释，还从查理曼的儿子兼继承人虔诚者路易的性格上找原因。不需要费多少工夫，我们就可以在史料中找到对他性格的描述：他是一个没有幽默感、不喜欢战争的人，宁愿在修道院里生活，也不愿占据他那个时代最强大的宝座。因此，只要做一点业余心理学分析，就不难得出他生错了人家的结论。写下“精英毫无信念，渣滓却满腔狂热”的W.B.　　叶芝想必会赞同这种解释，尽管他当时想到的并不是加洛林王朝。但所有这些对路易的描述都是事后的合理化，都是那些努力解释影响了他晚年的政治麻烦的人写的，当时他被卷入与3个儿子的斗争之中，他们分别是洛泰尔（Lothar）、丕平以及日耳曼人路易。这3位都是路易和第一任妻子埃芒加德（Irmingard）的儿子。817年，路易公布了他关于继承问题的解决方案《帝国诏令》（*Ordinatio Imperii*），宣布他将不再有其他继承人。然而，到了9世纪20年代后期，路易再婚并有了另一个儿子，即查理（后来的秃头查理，但事情发生时他只有4岁，应该还没有秃头），他设法使查理也享有继承权。这引起了通常的混战，路易得到了与他同名的儿子的支持，却遭到了洛泰尔和丕平的反对。然而，在最糟糕的时刻，3个儿子联合起来反对他，833年，皇帝被迫在苏瓦松发表正式的悔罪书并宣布退位。之后一段时间，他被关在修道院，直到洛泰尔的过度野心导致日耳曼人路易再次站到了父亲一边。835年，老皇帝在圣但尼的一次仪式上重新加冕，再次闪亮登场。抛开其他不谈，虔诚者路易身为父亲却不能控制自己的儿子，于822年在阿蒂尼（Attigny）自愿进行了正式的公开忏悔，以弥补先前的罪过，这不能不给人留下一种他个人

能力不足的印象。

然而，在接受这一印象之前，我们有必要看看虔诚者路易在822年所做的忏悔到底是为了什么。814年，他刚掌权时，已经没有兄弟与他争夺皇位，但是他面临一个同样棘手的问题。从3岁开始，他的世界就是阿基坦，一开始他只是在名义上进行统治，后来才渐渐有了实权。他只去过亚琛几次，法兰克王国核心地带的大人物都不认识他，而这里才是整个帝国的脊梁所在。因此，他面临的问题是要在一个已经习惯于不在他掌控下运作的世界里维护自己的权威。路易在理解这个问题时充分展现了政治才能，在解决问题时则展现出冷酷无情。他将所有的姐妹都赶出宫殿，送到了最近的修道院。他的父亲在世时，喜欢让这些姐妹环绕在自己周围。至于他父亲的妾室和庶出的子女，还有他漫长统治所留下的各色人等，就更不用说了。路易大张旗鼓，宣称他清除了宫中数不胜数的淫妇。在同时进行的宣传活动中，他在距离宫殿约5公里的地方建立了一个模范修道院，以此确立自己政权的新基调。814年，他宣布自己发现帝国的运行中充斥着“压迫”和“腐败”。

因此，虔诚是路易维护自己权威的方式，而这从未阻止他做任何他需要做的事。他的兄长查理没有结婚，但意大利的丕平有一个儿子，名为伯纳德（Bernard），查理曼逝世的时候，他已经17岁了。按照加洛林家族的一贯风格，路易在《帝国诏令》中完全忽视了侄子的权利（只字未提）。后来，伯纳德于817年来到阿尔卑斯山脉北部进行谈判，被他囚禁起来，刺瞎了双眼，这个不幸的年轻人于两天后死去。这位在822年做忏悔的皇帝实际上是个手握大权、骄傲自大的人，他现在总算可以与自己的良心和全能的上帝达成和解了。不要被“虔诚者路易”这个绰号误导了：他绝对和他父亲一样难对付，而他和儿子们之间的危机实际上是他过于激进好斗引起的。三兄弟最初似乎愿意（至少暂时）容忍父亲让他们同父异母的弟弟继承王位的愿望，但是路易节外生枝，试图羞辱法兰克王国的两位要人，即图尔伯爵于格和奥尔良伯爵马特弗里德（Matfrid），而他们都是洛泰尔的密友，前者更是其岳父。在这种情况下，洛泰尔感到事情不妙，于是发起叛乱。[注]

因此，如果你关注一下细节，就会发现路易的统治风格与他父亲没多大区别。正如我们将在下一章更详细地探讨的，查理曼在基督教的改革过程中投入了巨大的精力，父子俩都精心运用了贿赂、伤害和基督教的虔诚等手段，以达到自己的目的。广义上讲，这就是中世纪早期欧洲北部统治者的工作内容。

加洛林政府的基本架构很简单，与他们之前的墨洛温王朝末期没有多大差别，尽管在帝国辽阔的疆土上，各地的治理在细节上有很多不同。整个帝国的版图被划分成很多行政单位，即伯爵辖区（pagus，复数形式为pagi），据计算总共有六七百个。它们的规模、富裕程度和重要性各不相同，但加洛林王朝君主的统治有赖于他们指定的首领（通常是伯爵）向居民征收的一系列税款和服务。晚期罗马帝国有发达的中央官僚制度，帝国的东西两半都有3 000名资深官员，还有无数中低级的工作人员；与此不同，加洛林王朝的统治者几乎没有中央官僚机构，只有几十个官员，这些官员常常身兼数职，而不是执行特定的任务。

老一辈学者认为，加洛林王朝失败的核心原因是缺乏中央政府机器以及给其供能的世俗文化精英，而不是虔诚者路易个人的弱点，但是这种迷思也被破除了。诚然，在查理曼时代，官僚制度的运行方法还是略显简单，但是这跟当时的统治惯例（或者缺乏统治惯例）关系更加密切，而不是文化程度不足引起的结构性问题。查理曼和虔诚者路易（事实上还有墨洛温王朝的统治者）的很多命令都是以书面形式颁布的，并且很多问题也都是通过书信形式交流的。他们的贵族完全有能力处理交给他们的任务。你也可以雇一个书吏写下你想说的话。不管怎么说，中世纪早期世俗精英不识字的旧观念已经被推翻了。这些人都是基督徒，无论他们最初的种族背景如何，他们都意识到教育与文明之间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因此，他们确实学到了足够多的拉丁语来阅读《圣经》，尽管与罗马晚期的前人不同，他们主要是在家里从母亲那里学习，而不是在学校从专业教师那里学习。因此，并不是所有的用法都绝对正确，而这加快了语法的简化，从而把拉丁语变成了教会之外的中世纪罗曼语的各种分支。他们的学习基本上是被动的，也就是说是为了阅读，而不是

写作。[注]

这确实带来了巨大的文化转变。从前，按照罗马晚期的规范，精英们学会了用僵化的古典拉丁语阅读和写作；而新的情况是，写作只由神职人员和世俗精英来完成，而他们只读一些有教化意义的书。但是，没有证据表明这严重阻碍了加洛林王朝的统治。有些矛盾的是，证据反倒指向了另外一个方向，因为在加洛林世界，随着君主权力的衰落，官僚制度的习惯变得越来越强，至少在法律领域是如此。

罗马的观念强调，成文法是高等人类社会的重要标志，在查理曼的宫廷里，这种观念十分流行，也得到了彻底的理解。然而，由于每个主要地区都有自己的法律法规，帝国内部的整体法律状况是复杂的。查理曼非常小心地尊重各地传统，但与此同时，他也仿效查士丁尼，以皇帝的名义重新颁布所有旧法律的新版本，利用一切机会把自己塑造成神圣的帝国法律改革家，尤其是在加冕典礼之后于802年在洛尔施（Lorsch）召开的第一次大集会上。而事实上，文本的内容基本没有变化，举行这场集会只是为了扩大宣传而已。与此同时，特别是在加冕典礼之后，在一系列问题上更实用、更新的规则被纳入了在帝国内合法有效的规章制度，这些问题包括宗教和道德层面的问题，也包括高度实用和直接的问题。统治者经常在例会上与贵族们讨论这类规章，规章一旦颁布，就会在帝国范围内推广，作为对已有法规的补充。从802年起，许多此类新规章被记录在纸上，而在记录和传抄相关文本的过程中，加洛林官僚制度最初的生疏显露了出来。

其中一些规章是以一系列裁决的方式记录在纸上的，这样的文本称为法令集，查理曼后期和虔诚者路易统治时期的许多法令集保存了下来。但我们也知道，查理曼统治早期有很多集会和重要的决定。然而，在那个时候，大多数的决定并没有被记录下来，就连查理曼统治后期那些被记录下来的决定，参加集会者的记录也不尽相同。至少，有时同一个集会会留下不同的文本，因而无法产生唯一的权威裁决清单。

直到虔诚者路易统治中期，才有人开始系统地收集法令集。9世纪

20年代中期，重要的圣旺德里尔（St Wandrille）修道院院长安赛吉斯（Ansegius）进行了第一次尝试（很可能是应皇帝要求，尽管我们不能确定），但他的努力表明，鉴于过去实践的不足，在那个阶段可以做的事情是有限的。许多通过其他途径流传到我们手中的法令集，他当时都没有收集到，至于他找到的那些法令，有些地方还弄错了。因此，直到9世纪20年代，这个帝国在法律事务上仍然在摸索正规化的官僚做法。直到路易的儿子秃头查理执政的时候，这些棘手的问题才算处理完。在他治下，西法兰克王国的集会通常会形成一份关于新决定的权威文本，所有新的裁决都被有系统地添加到已有的法令集中，因此，新旧裁决相互参照成为常见的做法，材料使用起来也就容易多了。㊟

因此，虽然一开始有点生疏，但加洛林的官僚机构最终还是掌握了通过文件来实现政府正规化的窍门。没有迹象表明，中世纪早期精英阶层读写能力较弱对这一进程造成了任何重大阻碍。但有趣的是，正是在秃头查理统治下的西法兰克王国，正是在中央王权受到削弱的同时，官僚习惯发展到了顶峰。事实上，查理曼帝国中，保持中央权力强大的传统（即使权力不是在王朝的一个成员手中）直到10世纪的是东法兰克王国，而在那里，书面法令集的传统根本就没有形成。并不是说中央政府的权力与其官僚机构的力量成反比，而仅仅是说在有官僚机构的情况下，这种结构在加洛林政府系统中并没有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由于缺乏中央官僚机构，查理曼和虔诚者路易的统治依赖体系的中坚力量——伯爵，可以说是他们促成了这个体系的运转。首先，可能也最重要的是，伯爵有为国王征税的职责。伯爵有时负责管理自己辖区内的王室地产，从市场或集市上收取关税和过路费，并把指定的份额交给国王。除此之外，伯爵还是负责主持普通法庭的首席法务官，会将适当比例的罚款上交给国王。作为补偿，伯爵也有权从他筹集的大部分资金中提取一定的比例，在任时，伯爵也可能获得一段时间内附近王室土地的收入。

皇家军队在很大程度上也有赖于伯爵。加洛林王朝的君主会在宫殿

内外部署一支核心部队，其成员既包括顽强的职业军人，也包括一些大地主家的年轻男性后代，他们只是暂时加入。加洛林王朝的大部分军队（和墨洛温王朝一样）不仅由专业的军事力量组成，还包括了当地地主和一定比例的依附者。地主服役的义务不是无限的，一般在1年里不超过3个月。而当军令到来时，伯爵的职责就是调集人马在指定的时间和地点与国王会合。分遣队也需要有适当的武装和足够多的食物供应，为即将到来的战争做好准备。

伯爵大多来自他们所领导的地主社群，而不是完全的局外人，因此加洛林政府本质上是统治者和当地地主社群之间的一种伙伴关系，整个政府的运转都要依靠伯爵的各种工作。有必要进行一定的例行检查，这种工作部分由国王本人完成，他会亲自到领地去检查。在查理曼的晚年和路易统治的大部分时期，他们巡视的通常是欧洲北部莱茵河两岸法兰克人的中心地带。查理曼在一生中走过了许多路，但即使在年轻时，他也不是一个为了巡视国家而经常四处巡游的君主，帝国许多边远地区的人很少见到皇帝的身影。在帝国的大部分地区，检查的职责通常由钦差（missi）来完成。虔诚者路易统治时期，这一制度越发正规，通常由两名高级官员担任钦差，一名是神职人员，一名是世俗精英。

但即使是检查也有其局限性，尤其是社会政治上的局限，因为大部分钦差和伯爵一样，与贵族和绅士地主阶层有一定的联系，所以他们在多大程度上愿意干预，可能取决于原有的关系。例如，布尔日的乌尔法德（Wulfad）主教企图控制勃艮第的一处地产，他选择那个时间动手，似乎是因为他的一个亲戚最近被任命为那里的钦差（不过他还是失败了）。因此，从根本上来说，有效的统治依赖于国王和伯爵之间的良好关系，如果关系不太好的话，伯爵有很多方法来干扰王室的工作，而不必公开叛变。例如，在军事服务方面，伯爵可以让队伍稍微晚一点到，或者是赶到错误的地点，而这可能就足以决定一场战役的成败。[注]

真正把查理曼的帝国凝聚在一起的，是统治者与当地地主精英之间建立的个人忠诚纽带，这些地主精英填补了伯爵的位置，并在其他方面

掌控着他们的家乡。到公元800年的圣诞节时，查理曼的地位已经非常稳固，没有一个伯爵敢越雷池一步，但情况并非一直如此。例如，如果他的弟弟没有死得那么突然，那么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就会有两个加洛林王室的人争夺贵族的忠诚，那样他面临的政治形势就会大不相同。最近一项研究关注查理曼的一个孙子在莱茵河以东建立的王国，得出了这样的经验法则：在中世纪早期（相对于罗马时期而言），统治者平均需要10年的时间来建立与地方领导人的关系和忠诚纽带，建立纽带后，他才真正掌控了自己的王国。也就是说，要花10年的时间才能从贵族地主阶层中选出一批人，如果将他们任命为伯爵，他们将共同忠诚而高效地为你服务。

查理曼的弟弟早逝，他自己又轻而易举地取得了对伦巴第人的大规模胜利，因此他巩固权力比较快，不过在统治初期，基本的政治进程都是一样的，不管涉及的政治单位有多大。例如，虔诚者路易被封为阿基坦的国王后也经历了同样的过程，只是规模小一些。他在其兄长们死后突然被转到亚琛，再次面临同样的问题。在这10年（或者5年，如果你确实非常幸运的话）里，你首先要做的是分发大量礼物给尽可能多的关键地主，包括任命合适的人担任所有你能支配的伯爵职位，以表明你是中世纪早期意识形态所绝对需要的慷慨的领主。我们能见到很多中世纪早期国王颁发的特许状（记载各种礼物的档案），它们一致表明国王在统治初期不得不送出很多东西，因为这时的国王需要招募对自己有利、能统治各地的忠心的仆人。例如，虔诚者路易把淫妇和腐败赶出亚琛的同时，在他统治的头3年里，他通过特许状做了100多笔捐赠。后来这一数字下降至平均每年12个。如果你像查理曼一样，在这些年里也能取得重大胜利，同时还能从失败者那里获得大量财产，那么你就可以加快这个过程，拥有很多额外的威望，还有很多额外的财产可以赠送。

能够用来分配的不仅仅是土地，虽然这是农业社会最主要的财富形式，每个人自然都想要它。还有很多其他的方式来表示恩宠，比如授予个人开办市场（并从中收取通行费）的权利，在法律诉讼中提供支持，甚至为他们的后代安排一桩理想的婚姻。只要有一点想象力，新国王就

能找到无数方法，与贵族地主们建立起有效的关系网络。

但是，不能随随便便就把东西送出去，必须有针对性。也就是说，国王必须了解贵族们，这样才能知道他们的忠诚价值几何，以及可以把伯爵这个重要职位托付给哪些人。同样一份礼物，有的人收到后会心满意足，有的人却会密谋造反。如果有不止一个加洛林家族的人可供选择，他们的要价会更高。有一些人是永远无法信任的，不管给他们多少。国王可以通过一年多次的会议和接触来发现这类情况，而最好的时机可能是出兵打仗的时候。

到查理曼登基时，国王在战季早期举行集会（此类集会后来经常产生法令集）已经成为传统。在这样的重大场合，人们不仅就当时的重要问题做出决定，而且会收集信息，相互示好。按照惯例，集会之后会有一次实际的战役。从查理·马特即位到803年或804年的约90年里，法兰克人的一支主要军队一直在战场上与外敌作战；只有5年是例外，其中3年是从749年到751年，当时丕平在为自己的加冕做准备，还有就是759年和790年。也有不打仗的时候，这种情况在史料的评论中总是会有体现。战争是建立实际忠诚纽带的重要场合，尤其是查理曼统治时期的各种成功战争，建立忠诚纽带往往有助于统治者赢得和平，因为获胜后通常会有战利品分发。

即便如此，人毕竟是人，几乎可以保证，不是所有的贵族都能同样满意，有的甚至根本就不满意。来自同一地区的相互竞争的贵族是一个明显的问题，因为如果你偏袒其中一个，另一个就会被疏远，有时，根据我们对上层社会兄弟情谊的了解，如果你提拔了一个人，他和兄弟就会成为一生的敌人。因此，另一件必须做的事就是铲除不满者，尤其是在统治初期。

对叛乱采取强硬态度，对叛乱的起因采取更强硬的态度，这是加洛林王朝的座右铭。对于这方面的威胁，任何自重的国王都会马上采取行动。查理曼竭尽全力（翻越阿尔卑斯山）要除掉弟弟的家人，以免他们被心怀不满的人所用。接着，他残忍镇压了随后的两场叛乱，一场是由

仍在为被迫并入加洛林政治机器而感不满的东部贵族发动的，另一场叛乱是围绕他的儿子驼背丕平展开的，因为他被排除在所有继承计划之外。驼背丕平本人在修道院里度过了余生，但他的支持者们都被处死了。㊟

因此，如果近距离考察的话，这位被宫廷诗人赞颂为“欧洲之父”的人更像是欧洲的教父。从本质上来说，查理曼所做的就是，按一定比例与当地地主阶级的选定成员分享来自帝国不同地区的收益。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地方事务必须由统治者信任的人来管理，他可以利用慷慨、情谊和恐吓的结合来确保自己得到应有的份额。当只有一个加洛林王朝的人选，并且有定期的胜利来支撑皇帝的名誉和金库时，所有这些都非常有效（尽管仍然会有一些严重的问题）。当这些条件不再适用时，庞大的帝国机器就会出现故障甚至崩溃，这个过程在查理曼的孙子执政时十分清晰地显现出来。

“没有比这更惨烈的屠戮”

事后之明总是件好事，但有时真的没有必要。即使在那个时候，同时代的人也很清楚，841年6月25日是查理曼帝国内部权力斗争达到空前凶残程度的日子。虔诚者路易3个幸存的儿子在比利时一个叫丰特努瓦（Fontenoy）的小村庄附近站成一排，毫不客气地展开了战斗。没有虚张声势，没有敲诈，没有障眼法，也没有修道院里的长期疗养，他们打算放手一搏。其结果，用编年史中平淡无奇的话来说，是一场法兰克人内部的自相残杀，也可以用充满诗意的语言来表达，就像在其他方面默默无闻的恩格尔伯特（Engelbert，他曾经为路易的长子洛泰尔而战）所写的那样：

> 在任何战场上，没有比这更惨烈的屠戮；
>
> 基督徒的律法被血腥所玷污，

地狱的群魔及守门的恶狗为此欢欣鼓舞……

将这可咒诅的日子从今年的日历上抹去，

将它从所有的记忆中清零，

希望阳光永远不要照到这里，

希望这里永无黎明。

恩格尔伯特曾站在失败的一方而战，但即使是胜利者也下令举行3天的弥撒，以便为这场基督徒之间的内战赎罪，让我们的诗人伤感的不仅仅是酸葡萄心理。丰特努瓦战役是加洛林王朝一系列灾难性失败中的第一次，这些失败导致权力无法从一代人向下一代人顺利过渡。

这种失败的根源与导致路易的儿子们在他还活着的时候反抗他的情况相同。虔诚者路易于840年6月20日去世，在那之前，他和埃芒加德的一个孩子丕平已经去世，这使路易能够让当时可能还没有秃头的秃头查理担任阿基坦的国王。去世的丕平留下了一个基本成年的儿子，他也叫丕平，所以在丰特努瓦战役之前的一年里，有两个同父同母的兄弟、一个同父异母的兄弟和一个侄子在装模作样、虚张声势地谈判。最后，他们把自己逼到比利时一个小村庄的角落里，他们的战士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用恩格尔伯特的话来说：

啊，悲伤和哀号！

尸横遍野，赤身裸体，秃鹫、乌鸦和狼残忍地吞食他们的血肉，

他们的魂灵瑟瑟发抖，

因为他们没有自己的坟墓和灵柩，

他们横尸战场，

永无尽头。

人们很容易将整件事归咎于虔诚者路易旺盛的性欲，但是我们要坚决抵制这样的诱惑。[注]

从查理·马特到虔诚者路易的120多年里（从714年到840年），权力相对和平地从一个加洛林王朝统治者转移到另一个加洛林王朝统治者的手中，这样的事一共发生了3次，而这3次都需要惊人的运气。查理·马特之所以能够如此轻易地掌握权力，仅仅是因为他的两个同父异母兄弟已经去世。丕平的哥哥去了意大利，丕平的掌权之路因此轻松了许多。同样，查理曼的弟弟早逝，而虔诚者路易则有至少两个哥哥早逝。这些死亡和离开并没有消除王朝争端的所有潜在原因，但它们给每一代中的一个人带来了决定性的优势，这从那些大贵族的认识就可以看出来，他们就像《教父》中的顾问和二级领导者，仔细权衡教父几个儿子的分量。每一位继承者都果断采取行动，清除年轻的旁系亲属，以巩固优势。这种对加洛林王朝历史的长远视角提供了两个重要的观点，应该能把归咎于虔诚者路易的诱惑减少到几乎为零。

首先，即使没有后来的查理，路易的另外3个儿子也肯定会在某个时候发生冲突，哪怕他们是一母同胞，冲突不一定会发生在战场上，但肯定会有某种大的对峙。正如细节本身所显示的那样，查理的加入并没有实质性地增加问题的严重性，因为在丰特努瓦战役中，他是和日耳曼人路易一起对抗洛泰尔的。其次，在每个阶段，王朝精简的工作都是在前任国王去世后才开始的，而不是在他们还活着的时候，正如虔诚者路易除掉了意大利的伯纳德，而查理曼和他父亲处理了他们兄弟的全家。可以说，精简王朝的任务是每一代人上台时的工作，而不是其前一代人的工作，这一点也可以帮助虔诚者路易摆脱罪责。

这是有充分理由的。首先，死亡是个不速之客，今天如此，在中世纪早期更是如此。国王不能像修剪树木那样来对待他的继承人，这不仅是因为他可能很爱他的孩子（也许他们之间并没有多少爱），还因为你永远不知道谁会活下来。806年的时候，查理曼有3个成年的儿子，但不到8年后他去世时，他的儿子只剩一个在世。继承人不止一个会造成问

题，根本没有继承人则是最大的噩梦（就像我们马上就会看到的那样）。你可能会控制女儿的婚姻，因为你不希望有多个孙子孙女同时拥有半正式的王位继承权。查理曼不让自己的女儿结婚并离开宫廷，除了因为爱她们之外，很可能还有这样一种考虑。但是，到处杀儿子是愚蠢的。同样重要的是，在继承问题的争议中，最重要的是权贵们对候选人能力和特点的看法，因为实际上是这些权贵的忠诚决定着事情的结果。在748—749年和771—772年，两位卡洛曼手下的权贵都不想对抗丕平和查理曼的野心以保护前国王的后代，因此权力迅速而相对和平地移交给了加洛林家族的一个继承人。从这个意义上说，虔诚者路易做得非常好。他确保下一代有足够的成年男性继承人，然后由他们来决定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此时，这个王朝的运气耗尽了，权力没有落到一个地位已稳（可以相当容易地清除所有的枝节）的成年男性继承人手中。9世纪40年代，有两个地位稳固的继承人，分别是日耳曼人路易和洛泰尔，此外秃头查理的地位也比较稳固。事实上，也许正是靠着利用两个同父异母兄弟之间的政治无人区，查理得以幸存，并牢牢掌握他父亲在去世前两年为他提供的阿基坦权力基础。结果，虽然经过了丰特努瓦战役，依然没有人能取得决定性的优势，于是他们父亲留下的暂时分裂在843年的《凡尔登条约》中得到了确认。洛泰尔保留了他父亲早在817年就授予他的皇帝头衔，比他的弟弟们更加富有，但是3人都占有广阔的领土。死去的丕平的儿子小丕平留在了波尔多，他和秃头查理的斗争持续了一段时间，但是到了848年，很明显，他父亲同父异母的弟弟更有可能获胜。因此，小丕平逐渐失去了权贵们的支持，到了851年或852年，他已被关进苏瓦松的圣梅达修道院（Abbey of St-Médard）。虽然他再次逃脱，甚至在9世纪60年代与一些维京人合作，但他始终未能吸引到足够多的贵族支持，没能成为秃头查理的有力竞争对手。注

好在我们没必要纠缠接下来事件的种种复杂细节。在某些方面，兄弟们表现出完全矛盾的行为特征。一方面，他们的公开声明非常强调兄弟之爱和互相分享的重要性。这倒也不全是胡扯，他们举行了多达70次

兄弟首脑会议，其中一些会议甚至产生了一些共同政策。而另一方面，他们紧紧盯着重要的机会，想方设法巩固自己的优势。因此，有无数中小规模的战争，比如在854年，日耳曼人路易把他的次子路易送到阿基坦，希望以此削弱他同父异母的弟弟对那里的控制。

这一轮冲突进一步稳固了局势，因为最后查理和路易都将他们认为过于偏向另一方的贵族赶了出去。

真正让事情乱作一团的是皇帝洛泰尔的中央王国的命运。855年9月29日，洛泰尔第一个去世，远远早于路易和查理。他的3个儿子继承了他的王位，但其中一个很快就去世了，并且没有继承人，他的土地分给了剩下的两个儿子，即洛泰尔二世和意大利的路易二世。问题是洛泰尔二世的妻子特贝尔加（Teutberga）没有为他生下男性继承人，所以洛泰尔二世想和妻子离婚，迎娶已经为他生了一个儿子的妾室。日耳曼人路易和秃头查理看到了机会，他们极力反对这场离婚（尽管路易二世比较愿意接受）。洛泰尔二世于869年去世时，这个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870年在默森（Mersen）举行的家族峰会上，叔叔们瓜分了他的大部分领土，也给了路易二世一小块。

所有这些冒险都需要权贵们的支持，无论是为了确保自己领地上的贵族地主坚定地站在自己一边，还是为了引诱同父异母兄弟王国的贵族效忠自己，或者是为了吸引那些无所依附的人——如果国王死时没有留下后嗣，他的追随者就会成为这样的无所依附者。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日耳曼人路易和秃头查理的孩子们长大成人，政治活动的另一个层面开始发挥作用，吸引权贵的过程还要再进行一次。秃头查理和两个妻子一共生了6个儿子，其中两个进入了政治活跃的成年期，即口吃者路易和卡洛曼。日耳曼人路易生了3个儿子，分别是卡洛曼（又一个卡洛曼）、青年路易和胖子查理。身为真正的加洛林人，这些王子希望在父亲们还活着的时候就能分享部分权力，如果什么都没得到，或者得到的东西与他们的期望不符，他们完全有可能发起叛乱。他们通常能从地主那里得到一些支持，因为总有地主在他们父辈的体制下没有其他人发展

得好。当然，这一代的成员都有一个与他们的父亲同父异母的叔叔或伯伯，而长辈们是很乐意添乱的。因此，日耳曼人路易支持秃头查理的儿子们叛乱，特别是卡洛曼的叛乱，他拒绝接受父亲为他安排的神职人员的命运，并在9世纪70年代早期将事情推向无可挽回的地步，以至于他父亲把他双眼刺瞎，关进了修道院（后来他逃了出来，在他与其父亲同父异母的伯伯的王国里度过了余生）。同样，查理也很高兴自己能率先报复，因为另一个卡洛曼在9世纪60年代早期带头对抗日耳曼人路易，他的弟弟们也跟了上去。(注)

虽然秃头查理和日耳曼人路易经受住了早期风暴的考验，地位大约从9世纪50年代开始稳固下来，但是法兰克人的政治进程很少是稳定的，这既有王朝内部的原因，也有维京人入侵的原因——维京人的入侵给上层生活带来了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方面。矛盾的是，国王的寿反而是第三个也是最关键的不稳定因素。他们活着的时候一切都好，但问题出在他们死后。日耳曼人路易于876年8月28日去世，享年70岁，秃头查理紧随其后，于877年10月6日去世，享年54岁。人们早就注意到，在他们去世之后，加洛林王朝的多位男性也相继死去。从879年算起的短短5年里，从秃头查理选定的继承人口吃者路易开始，至少又死了7人。去世的包括日耳曼人路易的所有3个儿子，继承人在父亲去世后这么短的时间内相继而去，跟他们父亲的长寿很有关系。平均下来，活过童年的加洛林男性能活到50岁左右。路易活到了70岁，所以在他死的时候，他的儿子们已经分别有46岁、41岁和37岁了。因此，他们在父亲死后不久就去世也就不足为奇了。

秃头查理也有错，尽管其犯错的方式不同。可能是从自己和兄长们的行为中吸取了教训，他希望为自己选中的继承人口吃者路易铺平道路，从自己的后代中残忍地排除可能的竞争者，比如被刺瞎了双眼的卡洛曼。但正如查理曼的例子所示，你永远无法确定一个继承人够不够，因为如果平均寿命是50岁，就意味着大约一半的人会早逝。果然，秃头查理的策略失败了。他没有让下一代人自行处理，而是试图帮助口吃者路易，结果把事情弄得一团糟。路易于879年去世，年仅33岁。他死

时，有两个十多岁的儿子，但他们都在不久后去世，也都没有留下男性继承人。另一个路易（青年路易）于882年去世，另一个卡洛曼（日耳曼人路易之子）于884年年底去世。

因此，到了9世纪80年代中期，这个王朝眼看就要没有继承人了，这带来了帝国最后一个短暂的统一时刻，胖子查理是日耳曼人路易的小儿子，他赢得了来自日耳曼人路易和秃头查理的旧王国的一大批重要权贵的效忠。为了向他表示敬意，我本来想把这部分的标题拟成“日耳曼人、秃头和胖子”，但我觉得这样可能会有点轻佻。胖子查理生于839年，他于884年在西法兰克王国获得认可时已经40多岁，他最美好的时光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这是否导致他在886年的巴黎战役中未能击败维京人的大军，目前还不清楚，但这无疑对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产生了重大影响。随着他对西法兰克王国的控制越来越弱，他哥哥卡洛曼的私生子、卡林西亚的阿努尔夫（Arnulf of Carinthia）在887年秋天发动了一场反对他的政变。查理还没来得及做出回应，就中风了。从888年年初开始，日耳曼人路易的旧王国就掌握在一个私生子的手中。[注]

然而，真正重要的发展出现在此时的西法兰克王国。好吧，阿努尔夫不是完全合法的，但他毕竟是加洛林家族的人，他的优势是只有27岁，高大健壮，有望再有20年的政治生涯。然而，西法兰克王国的权贵们却选择了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他们选择了自己中间一位名叫奥多（Odo）的贵族地主当国王。这也不是西法兰克贵族第一次选择加洛林家族之外的人：879年口吃者路易死后，一群来自罗讷河和索恩河附近地区的主教与贵族在曼特耶（Mantaille）集会，选举普罗旺斯的博索（Boso of Provence）为国王。他与王室最近的关系是他的姑母特贝尔加（也就是洛泰尔二世拼命想与之离婚的那个女人）嫁给了洛泰尔二世，而他本人为秃头查理和他的儿子服务过。当时尚在世的加洛林王朝的人虽然正遭遇“死亡盛宴”，却依然凑够了足够的力量和一定程度上的合作来击败这个篡位者。相比之下，奥多算是一帆风顺，他通过将维京人赶出巴黎盆地赢得了巨大的威望。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一部分贵族决定支持一个加洛林家族的人，即口吃者路易的遗腹子天真者查理（Charles

the Simple）。在奥多于898年死后，整个王国又回到了加洛林王朝的手中，并将在1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保持这种状态。㊟

那么，为什么要拿奥多来做文章呢？如果888年2月所发生的仅仅是个小小的波动，为什么要对它大惊小怪呢？表面上看，这只是一次暂时的波动：不到10年，国王的头衔又还给了加洛林家族。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就完全不是这样了。特别是当你把博索也考虑进来时，这个现象就变得很不寻常了。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加洛林王朝的国王和皇帝们一直牢牢地控制着这个国家，但突然间我们发现，在同一个10年里，有两个贵族觉得没有任何理由不自居为王，**并且**还有一些地主非常乐意支持他们。查理·马特、矮子丕平和查理曼共同努力在加洛林王朝与贵族追随者之间构筑的那种屏障几乎消失了。这个残酷的事实并没有被忽视。正如当时的评论者普吕姆的雷吉诺（Regino of Prum）所言：

> 胖子查理死后，各个王国纷纷脱离……不再依靠世袭的领主，而是打算自立为王。这一事件激起了许多人发动战争的冲动，并不是因为法兰克王族成员没有足够的高贵、力量和智慧来统治王国，而是因为他们之间在慷慨程度、地位和权力等方面势均力敌，这就加剧了不和。王族中并没有哪个人远远高于其他人，底下的人认为没有必要服从王族中某一个人的命令。㊟

以天真者查理为代表的加洛林王朝回归也没有改变这种情况。他绝不是无能之辈（他的绰号“天真”也不是贬损意义上的，或许应该翻译成“坦率的查理”）。但事实是，在10世纪时的西法兰克王国，加洛林王朝的君主对贵族的支配地位远不如查理曼和虔诚者路易那么不容置疑。君主与最大的贵族世家之间的财富差距远没有那么大，君主控制的修道院和主教辖区就更少了。君主的势力范围仅限于法兰西岛（Île-de-France）及其周围地区，在其他地方，本来属于君主的权力（包括古老的皇家垄断权，如拥有法院和铸币的权利）逐渐被特定地区占统治地位的贵族家庭掌握（尽管区域内的权力格局在代代相传的过程中极不稳

定）。注

简而言之，10世纪西法兰克王国的加洛林王朝君主看起来更像是墨洛温王朝后期的君主，而不是统治欧洲100年的加洛林王朝的教父们。他们的软弱不仅与查理曼形成鲜明的对比，还与东法兰克王国日耳曼人路易的继承者和卡林西亚的阿努尔夫形成了鲜明对比。911年9月，阿努尔夫唯一合法的儿子童子路易（Louis the Child）在18岁时无嗣而终。王朝的这次意外意味着加洛林家族再次后继无人。

在9世纪加洛林王朝混乱的政治进程中，东、西法兰克王国内部都出现了强大的地区贵族，但是在东法兰克王国，仍有一个强大的中央君主政体与公爵们的统治共存。事实上，通过最初属于萨克森公爵家族的人，当奥托一世于962年2月2日在罗马加冕时，重建帝国甚至都有可能。要想了解为什么9世纪的加洛林政治进程在东、西法兰克王国造成了截然不同的结果，我们需要更仔细地思考，它是如何与那些让查理曼和虔诚者路易变得如此强大的忠诚权贵互动的。

税收的终结

9世纪晚期和10世纪，加洛林王朝的统治者们努力对其王国的各个地区施加影响，就像查理曼或虔诚者路易所做的那样。这说明他们手中的权力杠杆——礼物和恐吓——已经不那么有效了。如果我们将7世纪晚期和8世纪早期的墨洛温王朝国王与其6世纪的先辈进行比较，也会看到类似的情况。这一现象与加洛林王朝的基因退化没有任何关系，而是与中央和地方所控制资产的相对数量的结构性转变有关。

如果根据这一核心因素来考虑9世纪时查理曼帝国的政治进程，你马上就能明白，为什么随着时间的推移，王室往往会失去对各种资产的控制权。首先，将帝国分给多个继承人，相当于马上缩小了统治者与大贵族之间在所持有的关键资产（土地、从教会机构或市场取得收入的权

利、任命世俗和神职人员重要职位的宝贵权利等）上的差距。在843年的《凡尔登条约》中，王室的财产（所有这些资产的总和）被分给了虔诚者路易的3个儿子。这立即大大缩小了他们每一个人与大贵族之间的差距。洛泰尔的土地最终被重新分配，这给日耳曼人路易和秃头查理带来了很大的优势，但是他们也得把土地分给自己的孩子。除了胖子查理短暂的统治时期，查理曼整个帝国的所有财富再也不会落到单独一个加洛林王朝的人手里了。胖子查理活得不够长（没有活过关键的5到10年），没能使单个统治者独掌财富的局面持续下去，而且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到了885年，无论如何，王室资产的总值已经大幅下降。

这么想的理由很简单。到了9世纪80年代，有些大贵族很清楚自己已经基本上可以与加洛林王朝的君主平起平坐（也有其他人这样认为）。人们认为足可称王的不仅有著名的奥多，还有普罗旺斯的博索。显然，这些人如果在权力争夺中获胜，就将接管剩余的王室资产。但是无论如何，他们的个人财富肯定不仅仅是接近于君主的财富那么简单。东法兰克王国的情况类似，从900年前后开始，这里的各个公爵就基本上不可撼动了。因此，在那里，与100年前相比，权贵们看起来更像国王了。这本身就是一个明确的迹象，表明大量的资产已经易手。[注]同样重要的是，9世纪的政治状况足以解释为什么会发生如此重大的转移。从9世纪20年代后期开始，总体的形势是至少在两个层面上存在激烈的政治竞争：首先是在两位或两位以上（通常是好几位）在位的君主之间；其次是在他们和其他潜在的王位觊觎者之间，后者通常是他们自己的孩子和旁系亲属。秃头查理似乎吸取了教训，试图限制他留给下一代的政治竞争，但很不幸，事与愿违。9世纪70年代后期加洛林王朝的“死亡盛宴”到来前，总体的政治背景一直是多个加洛林王朝的人争夺军事化地主阶级的支持。没有地主的支持，争夺王位就不可能成功。

权贵忠诚的价格是不固定的。如果你面对的是像征服伦巴第人之后的查理曼那样可怕的人，那不管他给你什么，你都应该感激不尽。而如果对方是一个目前还没有王国的旁系觊觎者，希望让你支持他发动政变，那你的要价就可以非常高。而一个要面对几个竞争对手、还没有坐

稳江山的君主若想巩固其统治基础，就得付出介于两者之间的代价。9世纪的政治叙事清楚地表明，加洛林家族的成员越来越为恐惧所困，而为了避免在修道院度过余生，就要吸引足够多的忠诚追随者，为此要付出的政治代价也在上升。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完全有理由接受政治叙事所告诉我们的一切，即构成权力基石的土地、收入和关键职位的任命权正以稳定且可能不断增加的速度从王室手中流失。

另外两个因素推动了事情的发展。首先，法兰克人（以及英吉利海峡以北的盎格鲁—撒克逊人）面临的主要外交问题是维京人的袭击，军事上的主要困难是维京人的行动速度。维京人坐船而来，也经常会运来马匹，或者是在到达后捕获马匹，所以他们行动很快。在加洛林王朝当时的条件下，反击快速袭击是极其困难的。消息首先要经过相当远的距离传送到宫廷，然后再由宫廷发送命令给往往尚未集结的军队，因为贵族地主并非全职军人，他们通常生活在自己的庄园里。因此，一个显而易见的策略是，将权力移交给受威胁地区（基本上是在一条可通航的河流范围内的任何地方）一个值得信赖的权贵，因为他距离更近，能够更迅速地组织反应。尤其是秃头查理，面对着他领土上的众多河流，他系统地采取了这种合理的措施。一个深得其信任的人是强者罗贝尔（Robert the Strong），他在卢瓦尔河上拥有重要的指挥权，在888年被推为国王的奥多就是他的儿子。因此，受信任权贵的家族有可能通过一代人的服务获得足够的回报，从而在下一代人中产生潜在的篡位者。

墨洛温王朝时期的情况也是如此，当时加洛林家族就是作为墨洛温王朝在奥斯特拉西亚最信赖的支持者而起家的。而在9世纪，另一个因素使形势更有利于当地的贵族地主，那就是城堡。我们这里说的还是城堡的原型，主要是用木头做成的，而不是至今仍然散布在西欧大部分地区的那种石头城堡。9世纪时，精英家族的家居改造第一次采取了防御工事的形式，这种做法迅速传播开来。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对维京人入侵的另一种回应。如果你无法指望迅速动员大量兵力来对付他们，那么可以采取另一种方法，就是更加有效地使用少量的兵力，让维京人很难得到任何值得抢的东西。设防的中心可以作为一般意义上的避难所，也

可以用来以寡敌众。

秃头查理尤其喜欢各种各样的防御工事，他不仅有普通类型的据点，还在河流关键部位的桥梁设防。然而，一旦权贵们养成这种习惯并将其推广开来，恐吓叛逆者就困难了，因为城堡既可以用来抵御维京人，也可以用来抵御国王。㊟

老一辈的评论者深信（民族主义时代的人都这么想），中央政府的权力本质上优于地方权贵的权力，他们将这一演变过程视为一场巨大的悲剧，认为作为一个整体的加洛林帝国（尤其是西法兰克王国）本来可以前途无量，却被那些坚决抵制其合法统治者的权贵用邪恶的阴谋残酷地扼杀了。在这些历史学家笔下，权贵与国王为控制土地和命运而展开殊死搏斗，法国和德国则是应许之地，更好的、集中化的趋势最终都会引向那里。最近的一些文章不那么痴迷于把事情想成“好的”（有助于形成民族国家主导的现代世界）或“不好的”（没有起相应的推动作用）。这些文章指出，国王和地主精英们大多数时候是合作的，当然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愉快共处。在经历了20世纪的极端年代之后，我们也清楚地意识到，就本质而言，中央权力并不比地方权力更优越。这个问题的热度已基本退去，人们不再坚持地方权贵坚决要摆脱中央权力，而是看到，在9世纪晚期，争夺权力的主要人物大多来自曾完全效忠于加洛林王朝的家族，如奥多和博索。

这些说法都有道理，但我们不应该简单地用效忠者只不过是收拾了王室留下的残局这种新观点，来取代那种认为权贵坚决要破坏王室权力的旧观点。在9世纪的背景下，忠诚和反叛并不是截然对立的。忠于一个王朝的人也可以靠这种忠诚来获利。显然，中央逐渐失去对资产的控制，在此过程中最有可能获利的通常是效忠者，因为不管资产如何转移，他们的位置是最有利的。同样道理，加洛林家族最初也是墨洛温王朝在奥斯特拉西亚统治的主要支持者。正如加洛林王朝早期的历史所显示的那样，在这一刻忠诚的人，下一刻也有可能自作主张。因此，强者罗贝尔家族表现出来的行为模式一点也不奇怪，在其他的权贵家族中也

能找到与之相似的模式。他们依循的实际上是一种成功妙方：先是绝对忠于统治王朝，积蓄足够的财富和权力，以便家族的后代能够独立于中央的控制。[注]当然，如果一切进展顺利，权贵家族甚至可以试着夺取王位。

与其去操心权贵的道德，操心从中央资产流失中受益的是效忠者还是篡权者，还不如提出一个更有趣的观点。9世纪的政治进程对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平衡能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恰恰表明了中世纪早期中央权力的脆弱性。除非权力从统治王朝的一代移交给下一代的过程非常平顺，否则在随后的政权建立过程中，资产就可能从中央转移出去。理想的权力交接不是那么容易安排的。两个同父异母兄弟的死亡、一个哥哥的宗教倾向、一个弟弟的早逝分别帮助查理·马特、丕平、查理曼在统治早期就垄断了权力，而两个哥哥的突然离世则为虔诚者路易扫清了道路。这四代人的继承如此顺利，需要惊人的运气，但王朝不可能永远交好运。一旦运气消失，资产转移的循环就会开始破坏王朝的整体权力，无论是哪一个王朝。这与王朝成员的个人能力无关，也与权贵的贪婪无关，而是重要结构变化的产物，这种变化意味着和罗马晚期的任何一位皇帝（如查士丁尼）相比，加洛林王朝的国王和皇帝手中的权力杠杆都要少得多。

值得强调的是，加洛林王朝和罗马帝国的皇帝面临同样的治理问题。按照当时每天40公里的通信速度，要想管理一个疆域广袤的帝国，就意味着在大多数方面，地方实行的是自治，而中央政府无法积极参与地方事务。因此，在罗马帝国和加洛林王朝的背景下，关键在于如何将权力下放，以免不可避免的地方自治转变为危险的地方独立，导致帝国瓦解。而虽说面临相似的问题，但查理曼和虔诚者路易可以使用的武器远不如500年前的有效。

最重要的是，他们既没有从帝国农业中系统性获得大量税收的法律和政治权利，也没有相应的行政能力。在前现代经济体中，农业是最大的部门，雇用了90%以上的人口。罗马世界被划分为以城市为基础的行

政单位，它们被称为“城”（civitates，单数形式为civitas），由一个城市核心和有时面积非常大的农村腹地组成。城市会保存大量关于生产能力和所有权的记录，从中计算出周围农村该纳多少税，城市官员则会负责征收和上交指定数量的税款。根据帝国政府的要求和命令，有时用实物形式缴税，有时用现金。（相对而言）巨额的年收入主要用于支持一支由数十万士兵组成的大型职业部队。最好的猜测是每年大约三分之二的税收花在了军队上，剩下的用于各种各样的形象工程，以及维护同样相对庞大的罗马中央官僚机构。和这个官僚机构相比，我们在加洛林王朝时期或之后的许多世纪里所见的一切都相形见绌。

系统化税收、职业化军队、统管一切的官僚机构形成了明确的相互依赖结构，罗马皇帝由此获得了非常有效的权力杠杆。即使在其他机构都起不了作用的最坏情况下，还有独立于地方的职业军队可用于镇压反叛者，迫使他们服从帝国。不过，异议发展到反叛的程度是很少见的，因为其他的权力杠杆对地方忠诚发挥着十分有效的吸引作用。为了有效征税，需要对当地的农业生产进行调查和测量，这意味着朝廷官员会遍布地方社会，而至少每15年就会重新评估一次税率。这些官员往往是大地主，往往与他们正在调查的地方社会有固定的联系，这一事实突显出这种关系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即庞大的中央官僚机构不仅在地方管理事务，还要负责分发恩惠。帝国官僚，尤其是退休的官僚，在为所在的社区重新评估税率时，会得到种种好处，因此，官僚工作不仅本身是美差，同时也是在当地获得政治地位的途径。这种双管齐下的聪明做法将地方的大地主和帝国的中心紧紧绑缚在一起。而且，帝国的法律体系也定义和保护了这些地主的财产权，军队为什么很少被用来惩治哪怕是最富有的地主，就很容易明白了。帝国体制给了他们太多的保护和奖励，只是时不时会有一些约束，以确保他们诚实。(注)

罗马帝国崩溃之后，这些关键的平衡因素大部分随之消失。罗马帝国陨落后，税收体系也遭到了破坏，尤其是在卢瓦尔河北部法兰克人大量定居的地方，因为墨洛温王朝的国王似乎从未对法兰克人征税（与罗马人相反）。在6世纪高卢的其他地方，税务登记偶尔会被提及。为了

争夺特定城市的控制权，法兰克国王经常互相争斗。当王国被分割给几个儿子的时候，6世纪的划分在地图上看起来常常很奇怪，个人不仅接收到分散的领土，还会接收到分散的城市群。如果各个城市仍能每年提供税收收入，这种奇怪的划分方法就很好理解了，因为这样可以让各方的年收入达到所需要的平衡。但是，到了墨洛温王朝后期以及后来的加洛林王朝时期，除了可能附属于特定机构的残留税收（以现金、实物或其他服务形式欠下的）之外，罗马的税收结构已经停止运作。没有对农业生产进行系统征税的尝试，使这一切成为可能的行政结构已经消失。如今，王室的收入来自一种更为特殊的组合，包括土地税、海关通行费和一定比例的司法罚款。各地城市还获许分裂成更多的郡县，这明显表明征税已不再是城市的核心职能。

从表面上看，放弃系统性征税的权利很荒唐，但从短期看，这么慷慨有很好的理由。就我们所能重构的而言，三个彼此平行的过程使征税权成为国王们愿意送出的资产。首先，与罗马帝国相比，对后继国家的国王来说，大规模征税的必要性要小得多。罗马税收收入的大部分用于维持一支职业化的军队。墨洛温王朝的军队（不包括半职业化的王室军队）由为了某场战争而动员起来的大小地主组成。国王对其臣民所享有的主要权利之一是臣民的军事义务。其次，更普遍的证据表明，后罗马时代的西方经济不仅在总体产出上下降，而且交换的复杂性和频率也下降了。这意味着，在征税变得不那么必要的同时，税收收益不但在总体上下降了，而且（相对于一公斤又一公斤的食物而言）越来越难转化为有用的现金。第三，我们可以推断，王国的一部分人口非常希望获得免税。墨洛温王朝的法兰克追随者们起初似乎并没有缴税，而且他们强烈抵制征税，毕竟他们提供了军事服务。根据我们的史料来源，税务官员偶尔会受到私刑。但是，最迟从6世纪早期开始，罗马地主也被系统地招募去服兵役。一些文献中有这样一个说法：后罗马时代西方的战争是由外来的蛮族及其后裔来打的，而幸存下来的罗马精英们则心怀厌恶地躲在教堂里。有一些著名的例子可以支撑这样的说法，但也有一些外来蛮族的后裔迅速进入教会的例子。只要你去寻找，就会发现有压倒性的

证据表明，绝大多数幸存的罗马贵族地主和绅士并没有变成基督教的神职人员，而是变成了中世纪早期的武士精英。6世纪时，墨洛温王朝的法兰克人军队是围绕着来自各个城市的分遣队建立起来的，城市还没有消失，其中很多城市从未有过法兰克人定居者。这些分遣队由当地的罗马地主和他们挑选出来的最善战的扈从组成。

因此，从6世纪早期开始，罗马人和法兰克定居者的后裔一起为法兰克人的统治者而战，但罗马人仍然要交税，而他们的新法兰克人战友则不用交税。这肯定很快就会被认为是不公平的，一旦这种情况发生，税收减免将成为罗马臣民最想从墨洛温王朝统治者那里得到的恩惠。现存的记录不足以让我们详细追溯这个过程。从中世纪早期到近代，只有一些教会机构持续存在并保存了一些档案，因此，我们所能知道的墨洛温时期免税的例子只涉及修道院和主教教区。然而，我毫不怀疑，对世俗地主免税的记录没有保存下来，仅仅是因为缺乏任何可能保存这种记录的机制。在6世纪，君主要想赢得一点政治上的支持，没有什么比给予罗马地主看似廉价的税收豁免权更容易的了。渐渐地，整个税收结构萎缩了。我个人的猜测是，赠予的形式是允许现在已不用交税的地主组建自己的行政单位，不受旧城市单位的约束，这也解释了原来的城市网络是如何分裂，形成加洛林王朝时期的郡县格局的。(注)

这个中短期的转变影响深远。在几个关键的方面，相关变化使中世纪早期面积广大的实体（如加洛林帝国）的统治者难以阻止地方自治过渡到独立。首先，地方精英现在都武装起来了。与拥有一支完全独立的职业化军队来对付地方平民精英的罗马统治者相比，现在的统治者想约束地方精英要困难得多（尽管在个别情况下并非不可能）。现在，不仅武装的地方精英们能够进行更有力的抵抗，而且还可能会出现复杂得多的政治局面，例如让一批武装地主来对付另一批武装地主。其次，地方精英最重要的资产——土地——没有受到系统性的王室税收的影响。税收结构被侵蚀后，中世纪早期的统治者远不如罗马晚期的统治者那么富有。因此，这些统治者不仅不太需要官僚机构，而且他们实际上也负担不起，这进一步削弱了他们对地方精英的控制。罗马晚期的官僚机构既

负责管理事务，也负责分配恩惠，它的消失使统治者失去了一个吸引权贵的利器。第三，同样重要的是，因为地方精英管理着他们自己的法院，并通过他们自己的武装能力建立了自己的法律结构和执行机制，所以中央国家机制不再是通过保护精英的产权来维护其地位的最终保障。

从本质上说，中世纪早期出现了一种新的“较小”的国家结构。由于没有了国家维护的职业化军队，没有了对农业进行的大规模系统性征税，也没有了发达的中央官僚机构，中世纪早期的国家消耗的国内生产总值比例比罗马帝国要少得多。据我们所知，这与右翼意识形态无关，而与围绕一个残酷事实而发生的中心与地方关系的变化有关。这个事实就是地主精英们现在要为他们的统治者提供实际的军事服务，而这会危及他们自己的身家性命。同样重要的是，所有这些变化共同作用（尽管我敢肯定这些变化都不是事先计划好的），使得中世纪早期的统治者难以长期将大片区域统一起来。(注)

中世纪早期较小国家结构的统治者所拥有的资产类型还有一个关键性的不同。尽管罗马晚期的皇帝和加洛林王朝的统治者一样，也拥有属于自己的土地，但他们总收入的更大部分来自税收。税收收入完全是可以再生的。如果你把第一年的税收收入都花光了，第二年你还可以得到同样多的收入，以此类推。相比之下，加洛林王朝的大部分财政力量都是以固定资本的形式存在的，包括土地和各种可能产生收入的权利（开办市场或法院，任命特定职位，等等）。如果你为了赢得权贵的支持，在第一年把这些赠送了出去，第二年你的收入就会自动减少。因此，无论继承过程多么混乱（通常极其混乱），罗马帝国都能苟延残喘几个世纪，因为罗马世界的政权建立并不会剥夺帝国的核心资产。而加洛林王朝需要或多或少不受干扰的继承才能达到同样的效果。传宗接代有很多偶然性，继承不可能次次都顺利，因此加洛林王朝（或者中世纪早期任何一个王朝）的中央权力是有时间限制的，而罗马帝国则没有。

然而，仍有可能在中世纪早期建立跨地区的帝国式政权。墨洛温王朝在6世纪实现了这一壮举，加洛林王朝在8世纪实现了这一壮举，奥托

王朝在10世纪的东法兰克王国也实现了这一壮举。这些特殊时刻背后的原因是，帝国或至少是区域间政权所面临的普遍系统性障碍已经被克服。由此，我们可以对中世纪早期西方的“小国”提出最后一个重要观点，继而更清楚地理解查理曼的成就和局限性。

德意志第一帝国

在普法战争后出现了德意志第二帝国之后，才有了“德意志第一帝国”的说法，而在那之前，它仅仅是“德意志帝国”，我们可以从很多方面讲述它的故事，可以详细，也可以简略。很容易想到的方法是讲述其统治王朝的更替，而我们也需要谈一些这方面的内容作为背景。德意志第一帝国直接源于日耳曼人路易的东法兰克王国，尽管在911年，阿努尔夫的儿子童子路易无嗣而终，加洛林王朝后继无人。当时，王国由法兰克尼亚、萨克森、斯瓦比亚和巴伐利亚4个公国组成，每个公国都有自己的世袭公爵家族。虽然并非没有争议，但国王之位从童子路易传给了法兰克尼亚的公爵康拉德一世（Conrad I），后者的妻子是童子路易母亲的亲戚。然而，为了确立自己的权威，康拉德不得不进行艰苦的战斗，最终因为在与巴伐利亚公爵的战斗中负伤而于918年去世，后者就是人们所说的恶人阿努尔夫（Arnulf the Bad）。康拉德有一个兄弟，但他本认为最有可能维系国家的人是萨克森公爵捕鸟者亨利（Henry the Fowler，我以前的历史老师讲到他时喜欢搞点成人幽默，但亨利只是喜欢打猎而已）。亨利先是在919年让法兰克尼亚人和萨克森人拥立他为国王，然后又强迫斯瓦比亚人和巴伐利亚人服从他。在把王位传给儿子奥托一世之前，他还给王国添上了第五个公国，即洛林。奥托在东法兰克王国和更远的地方都很成功，甚至征服了意大利的大部分地区，这成了他于962年2月2日加冕称帝的基础。奥托一世把帝国的衣钵传给了与他同名的儿子和孙子，即奥托二世和奥托三世。但是，奥托三世于1002年去世时，帝国的接力棒传给了他的弟弟——当时已是巴伐利亚公爵的亨利，尽管最后这个亨利（他们都叫亨利，大概是怕我们弄混吧）直到

1014年才加冕称帝。这个亨利于1024年去世，奥托王朝彻底灭亡，权力传给了萨利安家族的连续四位国王和皇帝。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出现了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王朝更替，直到1806年的奥斯特里茨战役之后，拿破仑才终结了这一切，但是11世纪中期以后的事情我们这本书不用操心。在962年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的东法兰克王国内部，王朝更替经历了从加洛林王朝到康拉德王朝，然后到奥托王朝，再到萨利安王朝的过程。因为奥托王朝明确地自称为查理曼的直系后裔，他们的政治化妆师发明了“皇权转移”（translatio imperii）这一概念，用来表明这本质上是查理曼帝国权威的直接延续，因此这是上帝的意志（似曾相识？）。如果你以为奥托大帝的神圣罗马帝国将是本书的下一个，也是最后一个目的地，那也情有可原。(注)

前面提到的那位历史老师也喜欢说，神圣罗马帝国既不神圣也不罗马。这个玩笑话背后有一层重要含义，那就是这些新皇帝虽然强大显赫（萨利安王朝将在最后一章扮演重要的角色），但他们和本书所研究的罗马帝国的复辟并非一脉相承。狄奥多里克、查士丁尼和查理曼可以被认为是“罗马的”，因为他们符合3个不同的意义维度中的一个或多个。他们的帝国之所以能够被称为是罗马的，要么是因为他们所创建的国家的特征（狄奥多里克和查士丁尼），要么是因为在地理上他们的势力范围和原西罗马的大部分重叠（狄奥多里克和查理曼），要么是因为他们创建的国家在当时的基督教欧洲版图中是压倒性的主导力量（查士丁尼和查理曼）。鉴于罗马晚期的先例及其在拜占庭时期的延续，就像我们在查理曼于8世纪90年代小心翼翼地向其靠近的过程中所看到的那样，在中世纪早期的欧洲帝国，皇帝的头衔首先意味着“基督教世界的最高领袖”。

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在这些方面都不太符合罗马的标准。即使在奥托一世统治的鼎盛时期，这个帝国也只包括东法兰克王国以及意大利的北部和中部。西法兰克王国富有而广阔的领土并没有被纳入其羽翼之下，因此奥托帝国的面积永远无法与查理曼的帝国相匹敌。此外，这个帝国诞生之时，欧洲基督教世界迅速扩张。从11世纪中期开始，收复失

地运动忙于将伊比利亚半岛的大部分领土归还给基督教阵营；10世纪，波兰、波希米亚、匈牙利和罗斯西部出现了第一批基督教国家。奥托和他的继任者根本无法在基督教和罗马版图中获得狄奥多里克、查士丁尼和查理曼那样的绝对统治地位。㊟

但是，虽说出于这个原因，我们也许没有必要在本书的范围内探究奥托王朝本身的历史，但最初的东法兰克王国的确有一个特征值得我们留意。9世纪晚期和10世纪早期在东法兰克王国发生的事，可以宽泛地理解为加洛林王朝的崩溃。该地区的政治进程与加洛林王朝统治下的其他地区大体相同。日耳曼人路易隔一段时间就要面对来自不同儿子的反叛，他们受到了路易同父异母兄弟的帮助和教唆。同样的情况产生了同样的需求，即所有的觊觎王位者都需要向军事化的地主阶级提供必要的奖励，以建立坚实的支持基础，其后果也是类似的。资产的转移显然为他们领地内的公爵家族带来了财富和政治安全，最迟从卡林西亚的阿努尔夫时代起，这就是东法兰克政治的一个固定特征。但是，尽管4个强大公国（算上洛林的话就是5个）的建立看起来十分有可能导向最终的政治分裂，就像在西法兰克王国发生的那样，但并没有真的导向分裂。先是康拉德，然后是亨利一世和奥托，有时不得不发起战争以阻止分裂，但东法兰克王国最终并没有发生政治分裂。这是为什么呢？

答案有几个方面。首先，东法兰克王国受9世纪后期加洛林王朝“死亡盛宴”的影响较小，卡林西亚的阿努尔夫有意恢复其祖父日耳曼人路易所确立的集会和接触的政治节奏。因此，在《凡尔登条约》和阿努尔夫去世之间的50多年里，东法兰克王国的政治在同一权力中心以完全相同的方式运作；由此产生的延续性在塑造东法兰克权贵的心态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更自然地希望作为一个整体一致行动，至少在希望达到某些目的时。这样的期望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在阿努尔夫死后，他们几乎一致同意接受童子路易为国王；而此时在西法兰克王国，加洛林家族之外的地方权贵们要么自立为王，要么无视王室的权威，认为它无关紧要。㊟

他们也有战略上的理由要团结在一起。在中欧出现的第一个实质性的斯拉夫人政权是“大摩拉维亚”（Great Moravia），它以今天的斯洛伐克为中心，首都米库尔切斯（Mikulcice）一些令人惊叹的建筑遗迹至今仍然可以看到。摩拉维亚王国是被查理曼摧毁的阿瓦尔帝国的一个继承国。从9世纪中期开始，在东法兰克王国的史书中，摩拉维亚王国就一直是东南方边界以外的主要附庸国。就像罗马帝国的任何边疆附属国的历史一样，史书中的摩拉维亚王国经历了战争与和平交替的时期，越来越接近法兰克人的轨道。尽管摩拉维亚王国尽了最大的努力，它最终还是接受了东法兰克版本的基督教，驱逐了最初和弟弟西里尔（Cyril）一起在那里传教的拜占庭传教士美多迪乌斯（Methodius）。但是在9世纪90年代，摩拉维亚王国被一批新兴的游牧骑兵摧毁，他们就是从欧亚大草原进入中欧的马札尔人（Magyars）。

这是真正的毁灭。所有伟大的建筑都被遗弃了，摩拉维亚王国从历史上消失了。然而，就我们所探讨的而言，真正值得注意的是，马札尔人就像他们之前的匈人和阿瓦尔人一样，其内部结构依赖于领导层自上而下的大规模财富再分配，再分配是为了缓和可能导致分裂的内部政治对抗。因此，马札尔人的到来只会给他们的新邻居带来危险，新爆发的游牧民族的暴力则成为10世纪早期法兰克欧洲历史的特征。907年，马札尔人在普雷斯堡（Pressburg）重创巴伐利亚公爵的军队；910年，马札尔人又在奥格斯堡（Augsburg）重创了童子路易的东法兰克联军。这些胜利预示着长达10年甚至更久的袭击，他们周期性地扰乱东法兰克王国的和平，还把侵袭的范围扩大到了普罗旺斯和意大利北部。因此，面对马札尔人的威胁，需要采取联合行动，才有可能成功，而萨克森家族声望上升的一个关键因素是其最终提供了有效的领导。它自己的编年史家所记载的故事是这样的：926年，亨利与马札尔人达成了一项停战协议，这对他最终的成功至关重要，尽管他为此每年都要向马札尔人进贡。休战期间，一系列的定居点加强了防御，成为农村人口的避难中心，一部分农村人口为这些中心提供了有效的驻军，而主要的东法兰克军队则被重新训练和装备为重型装甲骑兵。这个故事无疑在一定程度上

掩饰了926年协议的耻辱，但这次军事重组是真实的，它为亨利提供了必要的手段，使他在933年的利雅得（Riade）战役中第一次重创马札尔人（战役发生在他932年单方面终止进贡之后）。955年，当马札尔人最后一次离开保留地时，奥托在莱希河（Lech）战役中击溃了他们。这两件事促使马札尔人进行了重大的政治重组（他们被迫转向不那么依赖于掠夺的政治经济模式），也推动奥托走向称帝。注

但这些都没能触达问题的核心，至少还没有解答为什么早在马札尔人尚未被击败的918年，康拉德就已经认为萨克森是维护传统东法兰克统一的最佳公爵家族。在思考政治格局中权力格局的演变时，将注意力集中在经济资源上通常会有收获。此外，权力还有其他的组成部分。伍德沃德（Woodward）和伯恩斯坦（Bernstein）揭秘水门事件时，线人“深喉”给他们的著名建议是“跟着钱走”，这一建议通常也适用于历史分析，所涉及的不一定只有现金（虽然有一些），还有土地、工作，以及各种权利——就像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在中世纪早期，这些权利通常代表着现金。东法兰克王国没有什么中央官僚机构运作的迹象，因此很明显，精心利用上述资源，在军事化的地主阶级中建立忠诚，这是成功行使中央权力的基础。因此，东法兰克王国的统治者面临着与西法兰克王国的统治者同样的政治问题：怎样才能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培养出必要的忠诚，同时不耗尽下一代人建立政权所需的主要奖赏资源呢？

作为萨克森公爵的奥托家族没能恢复对农业生产的大规模征税（如果恢复了的话，他们的统治的确能算得上第四个重现“罗马”帝国的时刻）。但除了中世纪早期常见的土地、任命权和其他权利之外，他们确实得到了另外两种可再生财富的来源，可以自己不至于破产，同时赢得权贵的忠诚。第一种资源很特殊。从10世纪20年代开始，哈茨山脉（Harz Mountains）的银矿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开采，萨克森人从中获利颇丰。没有关于生产规模的数据，但开采出来的银被奥托帝国用来铸造银币，银币迅速成为10世纪欧洲的主要货币。新的采矿定居点（有很多，地名都以“rode”结尾）在该地区迅速发展起来，可再生收入流入了奥托帝国的金库，其中的大部分可以用在权贵们身上，而不会破坏提升

王朝政治地位所需的土地和权利。(注)

王朝的另一个可再生财富的来源是定期的扩张战争。特别是在中世纪，但实际上在大多数情况下，防御战争和进攻性战争在政治上有一个关键区别。进攻性战争通常更受欢迎，因为获得经济利益的机会往往多得多。在你为保家卫国而战时，几乎没有（至少是合法）收获战利品的机会，但对外战争总是可以提供很多这样的机会。如果你的战略地位让你既可以发动突袭，又可以稳步扩大边界，那么你就能为权贵们创造一系列新职位，同时不断获取新土地，从而在不减少自己的资产存量的情况下将土地分配给他们。就东法兰克王国的情况而言，只有萨克森公国在910年前后有开阔的边境。其他公国或者与法兰克王国的其他部分接壤，或者与强大的马札尔人相邻；而在易北河之外，萨克森的东部边界以外则是由斯拉夫人控制的领土。这个西斯拉夫世界当时正处于人口、经济和政治发展的进程中，这些发展最终将扩大欧洲基督教世界的版图。而在900年前后，易北河以东地区的发展程度已足以使其成为亨利一世及其继任者的军队的目标：这里有足够的人口密度和经济活动，还是很值得征服的。根据史料记载，这里经常发生战争。公爵们迅速利用了征服所带来的利润，以确保其权贵的忠诚。到了10世纪50年代，这个公国又增加了大片的边界土地，在这些区域内部，有新的职位和土地可以授予权贵们，而不需要花费奥托王室一分钱。(注)

当你把视野扩大到中世纪早期的整个西方时，就会得出一个不可避免的结论：拥有这样的开放边界，与（相对于地方权力的）中央权力的上升，存在一种结构性的联系。扩张的成果不仅使奥托家族在东法兰克王国获得了优越的地位，也是加洛林王朝崛起的关键因素。一个十分重要的统计数据是，从查理·马特即位到公元803年或804年的约90年间，加洛林军队在战场上的时间多达85年。这些战争绝大多数是侵略性和扩张性的，带来了各种形式的可再生财富，使这个王朝的四代人能够在不损失王室固定资产的情况下建立自己的政权。这种联系同样适用于墨洛温王朝，在普遍扩张的6世纪，该王朝的中央权威处于鼎盛时期。这种

联系甚至（如果你感兴趣的话）也适用于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英格兰。在那里，起初最富有、最强大的王国是那些从贸易和与大陆的其他联系中获利的国家，尤其是肯特（Kent）。在肯特，5世纪晚期和6世纪的坟墓里有大量的黄金装饰，在比德（Bede）的政治叙述开始的7世纪早期，这里的国王在政治上是非常杰出的。然而，随着7世纪的发展，政治上的优越地位日益为韦塞克斯（Wessex）、麦西亚和诺森布里亚（Northumbria）等“外围”王国所有，所有这些国家都与当地的罗马—不列颠小国接壤，能够侵犯小国进行扩张。扩张让这些王国的国王获得了可以出售或利用的战利品，不仅有奴隶，还有越来越多的土地，他们可以用这些土地来吸引更多的战士加入其麾下。公元700年之后不久，面对这股军事力量，肯特的剩余财富已不再是取得政治优势的充分基础，反而使肯特本身成了新势力掠夺野心的诱人对象。在中世纪早期欧洲的小国家世界里，扩张性战争取代了大规模征税，成为可再生财富的来源，而这是长期维持强大中央权力所必需的。

事实上，掌控扩张的成果和维护中央权威之间的联系十分密切，如果不能掌控成果，也就很难维系中央权威。原本强大的中央如果不再能从扩张中获益，其权威就会迅速受到侵蚀，因为此后的每一代人都必须用不可再生的资产来建立政权。在9世纪的加洛林王朝，我们已经看到这种关联在起作用，但这同样适用于7世纪的墨洛温王朝，以及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英格兰。在英格兰，皮克特人和英格兰北部的人在7世纪后期组织起来，抵御了诺森布里亚王国的进一步扩张，于是，这个王国8世纪的统治者在面对国内的政治不稳时，地位就下降了。这也适用于奥托帝国。到了10世纪80年代，斯拉夫世界已经发展到足以封闭开放边界的程度。先前被压迫的斯拉夫人发动反叛，加上来自新斯拉夫人势力的公然抵抗（波兰王国发挥了主要作用），奥托帝国向东扩张的进程戛然而止。后来的王朝成员和他们的萨利安继承者很快就发现，自己行使中央权力要比捕鸟者亨利和奥托一世困难得多。[注]

所有这些都引出了最后一个问题：如果扩张对于中央权力的长期行使如此关键，可以填补税收的终结给王室财政造成的巨大缺口，那么为

什么后来加洛林王朝的君主们会停止扩张呢？学者们提出了各种说法，有人认为，他们可能觉得扩张到原墨洛温王朝霸权鼎盛时期的地区以外不够正当。这很难说服人，尤其是因为查理曼的统治在很多方面都远远超出了这个范围。也有人认为，在加冕之后，查理曼年事已高，萨克森战争的代价（已经持续了20多年）和他对基督教事务的兴趣都使王室变得不再那么看重征服。这些说法都有一定的道理，年迈的查理曼更多生活在他位于亚琛的新王宫里，深居简出，但是它们没有解释为什么查理曼的继任者没有重新发动扩张。

分析扩张性战争的成本和收益可能更有助于解决这个问题。扩张性战争会带来利润，但也需要成本，不仅有钱的问题（食品、武器等），而且有人的问题，因为打仗肯定要死人。这样考虑的话，就很容易想到什么样的地区是最适合扩张侵占的：这个地区的经济需要发展到一定程度，以便在可移动的战利品和可掠夺的土地方面提供令人满意的回报；但是该地区在军事上不能组织得太好，否则远征军里会有太多的人在争取战利品的过程中死去。还有一点就是，距离越远，情感和经济上的代价就越大，因为压力和紧张都变得更加严重。当你长期在遥远的战场上征战时，你与家乡之间的联系就会被切断。

如果你回想一下9世纪早期加洛林王朝的边界，很容易就会明白为什么扩张会慢慢停止。在南方，穆斯林统治下的西班牙非常富有，充满诱惑，但是伊比利亚半岛上到处是组织良好的伊斯兰政权，它们竭尽全力地反对加洛林王朝的扩张。即使不算在比利牛斯山脉的龙塞斯瓦耶斯（Roncesvalles）战役中的惨败，加洛林王朝的广泛努力也只是将边境向南扩展到了巴塞罗那。这种缓慢的进展与对伦巴第人的征服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意大利最好的地方已经被吞并了，剩下的要么是贫穷的山区，要么仍然掌握在拜占庭人的手中，一点也不容易攻占。在巴尔干半岛，击败阿瓦尔人之后，进一步的扩张受到了保加尔人和拜占庭帝国的强大势力的阻碍。无论如何，巴尔干半岛中部并不是最有吸引力的潜在回报来源。萨克森以外位于易北河上的东部边境值得考虑，日耳曼人路易在那里打过仗，但北部地区的经济仍然不发达，要等到100年后，

奥托王朝才能更加有效地利用它；而在更远的南部，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已经出现了足够稳固的斯拉夫政权，再想向那里扩张就难了。算起成本和收益的话，边境各处都不是合适的扩张目标，要么是因为敌人过于强大（西班牙），要么是因为可能得到的好处不多（巴尔干半岛），要么二者兼有（意大利南部和易北河南部地区）。

总体而言，战略形势还不成熟，不适合进一步扩张，但这是如何促使政府决定停止发动攻势的呢？很难想象查理曼或虔诚者路易会拿着地图坐下来，像我们刚才那样分析，尤其是因为他们大概连地图都没有。我认为，答案在于，积极参与扩张战争的是政治上十分重要的地主阶级，地主提供了大部分军队。加洛林王朝扩张的快车受到了阻碍，这是他们可以切身感受到的：显而易见，越来越多的人失去了生命，得到的好处却越来越少。地主在政治上很重要，因此他们中的一些人会在定期的集会上与统治者接触。因此，关于扩张是如何真正停止的，我们可以推理出这样一个最有可能成立的模型：越来越多的人反对进一步的战争，而这最终迫使统治者做出决定。而你如果去找，就会发现少量能表明确有这种过程的证据。例如，虔诚者路易决定派图尔的于格和奥尔良的马特弗里德去西班牙打仗，这两位都是洛泰尔的主要支持者，因此引起了洛泰尔的怀疑和愤怒，使他公开造反。相比于参加扩张战争所能获得的好处，他们和洛泰尔都更看重被排除在内部政治操作之外的代价。

在我看来，这给我们的分析增加了一个更重要的层面。加洛林王朝军事化的权贵们实际上是在同时考虑两方面的成本和收益。一方面，他们计算在边界之外进行战争的潜在得失；另一方面，他们也计算国内政治阴谋的潜在成本和收益，将其与战争的得失放在一起考虑。大约从公元800年开始，战争的成本越来越大，收益越来越小，而从9世纪的第二个10年，最晚从817年的王国分封开始，内部政治斗争的收益就大于成本了。从那时起，尽管当时仍只有一个统治者，但是在政治效忠的期货市场上，股价一直在稳步上涨，因为有3名继承人在寻找支持者，而秃头查理的到来只是助长了这一趋势。因此，在我看来，来自军事精英的政治压力导致了扩张的停止，因为扩张的回报越来越少，而在内部出售

忠诚的潜在回报却增加了。后者不仅能带来权贵们非常珍视的奖励，而且还意味着他们不必徒步穿越易北河或翻过比利牛斯山脉了。因此，扩张结束，与其说是因为停止了暴力，不如说是因为矛头所指从外部敌人转向了内部敌人，这进一步凸显了结束扩张对加洛林王朝权力的威胁。注

欧洲的创生和帝国的灭亡

从各方面来看，我认为，从这三次复辟罗马帝国的尝试中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到公元第一千年结束时，已经不可能在整个欧洲版图上实现和罗马同样规模的帝国统治了。罗马曾利用地中海的人口和经济基础征服整个西欧和南欧，并广泛地威胁到中部偏北的次级发展地区。到了公元1000年，伊斯兰教的崛起已经破坏了这个权力基础的统一，将南方海岸与其他地区分离，把东罗马的残余变成了中世纪的拜占庭，成为像西方诸王国那样的继承国，只不过是以拜占庭自己的方式。

但是，地中海地区即便保持统一，也不可能提供足以让国家以同等规模主宰亚欧大陆西部的资源。在基督诞生前后，当罗马扩张走向帝国时，欧洲北部有3个发展程度不同的地区，这3个地区在人口、经济和政治方面都不如新帝国的地中海权力基础那么发达。到公元1000年，欧洲北部的内部差距急剧缩小，早期以地中海为基础的国家的总体战略优势消失了。正如查理曼和奥托一世的职业生涯所表明的那样，在那之前1000年被称为拉坦诺的西部地区和原中北部地区的一些地方，在向东至少到易北河的奥托帝国的心脏地带，此时的人口密度已经超过了地中海地区。欧洲西部和中北部现在成了可以掠夺意大利和罗马的国家的基础，而不是相反。虽然仍然在某种程度上“落后”（这不是赛跑），但就其潜在资源尚未被充分挖掘的意义而言，欧洲北部和东部这第三个地区的生活模式也已今非昔比。这里曾是铁器时代农民的散居之所，在公元第一千年的前半段与欧洲其他地区完全隔绝，从它的考古遗迹中丝毫找

不到与罗马接触的迹象。如今，这里养活着更多的人口，支撑着日益多样化的经济以及一些强大的政治结构。

这一切可以说彻底打破了区域原有的战略力量均衡，北方和东方的进步如此之大，虽然农业和其他经济活动不像西方那么复杂和活跃，但这里的新王朝仍然控制着很大的权力基础，足以抵御来自西方的帝国支配。例如，10世纪晚期和11世纪，奥托帝国卷入了与皮亚斯特王朝（Piast dynasty）的复杂外交之中，此时这个王朝正在邻国波兰建立新政权。两者之间的关系在友谊和竞争之间摇摆不定。第一帝国无疑是两者中更强大的一个，但是，当外交让位给冲突时，第一帝国发现无法简单地征服皮亚斯特政权。尽管这个波兰王国以基督教的形式接受了第一帝国的文化影响，但它太远又太强，军事征服不可能轻易实现。到公元第一千年结束时，真正发生的事是欧洲正逐步成形，这个欧洲可定义为多个在一定程度上平等的社会参与复杂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互动的区域。社会间巨大的差距已成为过去，直接的结果是，再也不可能在欧洲的某个角落，仅仅因为该地的发展比其他地区更早熟，就建立起一个占支配地位的帝国了。

有些矛盾的是，证据表明，恰恰是过去的帝国统治方法促成了上述不寻常的变化，使帝国再也无法复生。从整个第一千年看，大体上有一个由两阶段组成的过程。在最初的500年里，在罗马世界的边缘，日耳曼世界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结构经历了一系列结构性转变；随后的500年里，法兰克王国边缘的斯拉夫世界也经历了类似转变。此外，还有通过与阿瓦尔人、拜占庭帝国，以及尤其是伊斯兰教的接触而获得的一些额外刺激。描写这类题材的传统作品通常会写，帝国对欠发达的邻国做了什么什么事，或者为它们做了什么什么事，比如带去书写和基督教这样的文明成果。我们领教过全球化的作用，也走出了欧洲帝国主义的时代，因此我们有理由不那么相信帝国总是会给与其接触的人带来好处。但是，在第一个千年的前后两个500年里，与帝国进行贸易，从帝国那里学习新的农业技术，接受其外交补贴，复制帝国的武器和意识形态，自己组织起来抵御帝国统治下最恶劣的暴行，在日耳曼世界和斯拉夫世

界，所有这些都促成了更发达的经济和更大的国家结构的出现。“文明”或“礼物”的说法的确没有抓住这个过程的本质。所有的帝国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在边缘地区运作的，并不是所有的边缘国家都能在随后的长期变革中脱颖而出。实际情况是，边缘地区的一些群体能够利用与帝国邻居的一系列新接触所带来的机遇，而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全球化。在这种特殊的互动中，以那些受益最多的群体为中心，边缘国家的整体经济实力最终会大大增强，人口数量也会增加，政治结构也会更加稳固。长期来看（我们说的是长达几个世纪的接触），在边缘国家的建立过程中，罗马和法兰克帝国发挥了核心作用，虽然不是直接作用，而这最终会使它们的帝国之矛变钝。我们不能将边缘地区的群体看作帝国文明的被动接受者，而应该看到，其中的某些群体发挥了主观能动性，从新形势中获利。[注]而这在战略上的总体影响再深刻不过了。

直接的结果是，到了公元1000年，已经不可能重现能够体现罗马精髓的帝国了。不仅伊斯兰教打破了地中海的古老统一，西欧的力量平衡决定性地向阿尔卑斯山脉以北转移，而且更关键的是，整个欧洲的发展模式现在趋于均等。你可能会说，由于这种发展的均等化，接下来1000年的战争都没有结果，欧洲的王朝断断续续地追求事实上不可能获得的支配地位。在这个意义上，在经历了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噩梦之后，欧洲之梦才终于形成，人们试图制止列强之间无休止的武装竞争，而列强的力量总是过于平均，不可能有彻底的赢家。

但是，如果说到了公元1000年，像旧罗马帝国那样在军事和经济方面占主导地位的传统帝国已经不可能存在，那么一种新的帝国将在加洛林王朝和奥托王朝帝国计划的废墟上重生。以真正的罗马气概行事的罗马式皇帝已经成为过去，中心当然不能再维系。然而，在基督诞生一千年后，另一种帝国野兽正懒洋洋地等待着降生，这一次不是朝着叶芝所想象的伯利恒，而是朝着古老的帝国首都。

---

1. 艾因哈德《查理大帝传》22。

2. 《分国诏书》的文本见Boretius（1883），no. 45，trans. King（1987），251–256。关于继承问题的进一步讨论，见McKitterick（2008），96–103; Costambeys et al.（2011），194 ff.。

3. 引文来自叶芝《复临》（The Second Coming）。《帝国诏令》：文本见Boretius（1883），no. 136，trans. Dutton（2004），199–203。关于路易本人的继位和他孩子们面临的继承问题，见McKitterick（1983），c. 5; Nelson（1990）; Collins（1990）; Nelson（1992），c. 4; Goldberg（2006），pt. 1; de Jong（2009），c. 1，esp. 19–31，cc. 4–6; Costambeys et al.（2011），196 ff.。

4. 关于帝国的基本结构有很多很好的描述，如Dunbabin（2000），c. 1; McKitterick（2008），cc. 3–4; Costambeys et al.（2011），c. 4。将加洛林王朝的失败归咎于其帝国官僚机构的局限性，这主要是F. L. Ganshof的观点，但不仅仅是他一个人的观点；他的英文论文选集见Ganshof（1971）。关于中世纪早期西方和加洛林世界的识字模式，见McKitterick（1989），（1990）。

5. 关于罗马宣传的成文法律的重大意义，见上文。关于加洛林王朝统治下的立法与法律收集的发展模式，见Nelson（1982）; 参考McKitterick（1989），c. 2，（2008），233 ff.。Wormald（1999），c. 2.1提供了另外一个视角。

6. 关于军事组织，除了本章前注4提到的作品之外，参考Reuter（1985），（1990）;Halsall（2003），c. 4。关于钦差，参考Werner（1980），191–211。关于乌尔法德一案，见Nelson（1986a），53 ff.。

7. 经验法则：Goldberg（2006），尤其是导论（1—11）和后记（335—346）。关于战争的频率，见Reuter（1985）。关于查理曼对叛乱的镇压，见Nelson（2008）;Costambeys et al.（2011），65 ff.；总体情况见Leyser（1979），pt 1。王室的恩宠可能会引起怨恨，尤其是在没有得到王室恩宠的贵族兄弟心中。

8. 恩格尔伯特：文本见Dummler（1884），138–139; trans. Dutton（2004），332–333。关于这场战役的后续情况，见Nelson（1990）; Goldberg（2006），c. 3;Costambeys et al.（2011），379–388。

9. 秃头查理掌权，见Martindale（1981）; Nelson（1992），cc. 5–6。关于日耳曼人路易，见Goldberg（2006），cc. 4–5。

10. 总体情况，见Nelson（1992）, cc. 7–8; Goldberg（2006）, cc. 7–8; Costambeys et al.（2011）, 388 ff.。这些作品提供了充分的参考文献和进一步阅读书目。关于洛泰尔二世的离婚，见Airlie（1998）。

11. McKitterick（1983）, c. 7; MacLean（2003）, esp. cc. 5–6; Goldberg（2006）, 335 ff.; Costambeys et al.（2011）, 419 ff.

12. 对于这些发展更加详细的介绍，见McKitterick（1983）, c. 10; Dunbabin（2000）,cc. 3–4; MacLean（2003）, cc. 3–4。

13. Regino of Prum, Chronicle 888; text Kurze（1890）, 129; trans. Dutton（2004）,541.

14. 优秀的英文介绍，见Dunbabin（2000）, cc. 4–5; MacLean（2003）, cc. 3–4。一系列具有启发性的地区视角，见Hallam（1980）。

15. 关于奥多和博索，见Hallam（1980）, c. 1; Dunbabin（2000）, cc. 3–5; MacLean（2003）, c. 3。东法兰克公爵领，见Reuter（1991）, cc. 4–5。

16. Dunbabin（2000）, 37 ff.很好地介绍了加洛林式军队防御战的问题以及防御工事的更广泛影响；参考Halsall（2003）, c. 10和Hallam（1980）, 13 ff.。关于强者罗贝尔，见Nelson（1992），特别是183 ff.。

17. 同样，在佛兰德斯的兴起和随后的发展过程中，也有忠诚和篡权的战略混合，见Ganshof（1949）。更广泛的介绍和参考书目，见Werner（1979）; Bourchard（1981）; Poly and Bournazel（1991）; Barthélemy（2009）。Hallam（1980）, c. 2在总体模型之外，很有必要地指出了各区域的不同情况。

18. 更详细的介绍见Heather（1994b）和Heather（2005）, cc. 1 and 3，有充分的参考书目。

19. 行政重组模式的唯一例外是宗教区划，因为在中世纪早期，西罗马故地的教区往往保留着古老的城市边界，虽然在有些地方，这些边界已经失去了其他任何意义。我更加详细地探究了这种变化的原因和结果，见Heather（2000）,（2010）;Halsall（2003）, c. 3对后罗马欧洲征募军队的证据做了精彩的回顾。

20. Wickham（2005）全面讨论了国家结构的这种变化，特别是cc. 3 and 6，提供了充分的参考书目。

21. 对这个帝国的优秀英文介绍，见Leyser（1979）; Reuter（1991）。

22. 对收复失地运动的精彩介绍，见Fletcher（1989）。Heather（2009）, cc. 8–10介绍了基督教在欧洲北部和东部的发展。

23. Leyser（1979）, cc. 7–8; Goldberg（2006）, 335 ff.; Reuter（1991）, c. 6.

24. 关于马札尔人和德意志帝国的历史，见Leyser（1982a）,（1982b）。概括性的介绍见Macartney（1930）; Bowlus（1995）。

25. Reuter（1991）, 94–102, 229–236.

26. Reuter（1991），特别是77 ff.;参考Heather（2009）, c. 8提供了对更深层的背景的参考书目。

27. Reuter（1985）,（1990）发展了与加洛林王朝权力相关的模型。关于奥托帝国斯拉夫边界地区的崩溃，参考Reuter（1991）, 174–180, 253–264。关于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英格兰，见Bassett（1989）; Charles Edwards（1979）。较为笼统的比较研究，见Wickham（2005）, 339 ff.。

28. Reuter（1990）建立了扩张的成本收益方程，我基本上沿用的就是这个模型。关于奥

尔良的马特弗里德，见Depreux（1994）。Halsall（2003）, 89 ff;McKitterick（2008）, 103 ff.，特别是135–136对Reuter原来的讲述提出了一些批评和修改，这影响了我对同时存在两种成本收益分析的认识。

29. Heather（2009）, 特别是cc. 2, 9–11，更加详细地探讨了这些过程及其结果。

第四部分

复临

第7章

查理大帝和教宗利奥

罗马的圣彼得大教堂是这个世界上室内面积最大的基督教堂。最初的圣彼得教堂是4世纪时由罗马皇帝君士坦丁下令建造的。现在的建筑建于原址之上，1506年4月18日开始修建，历时100多年才完成，其落成典礼于1626年11月18日举行。这个建筑凝聚了文艺复兴时期梦之队的心血与智慧，其中包括布拉曼特（Bramante）、米开朗琪罗和贝尔尼尼。圣彼得教堂既不是罗马天主教会的母堂，甚至也不是教宗（罗马主教）的主教座堂——这份荣耀属于拉特兰教堂，教宗利奥三世下令在那里安装了著名的镶嵌画，以限制查理曼加冕对其地位造成的损害。

圣彼得大教堂之所以拥有非凡的宗教地位，完全是因为它的主祭台所在的地方，那里自古以来被罗马的基督教会视为圣彼得的葬身之处。这么认为有一定道理。公元64年，尼禄迫害基督徒，彼得在这个教堂附近的尼禄竞技场（Circus of Nero）殉道。此处也确实是一个年代久远的罗马墓地，里面有早期基督徒的坟墓，在1939年开始的长达10年的考古过程中，其中一些得到了发掘。我不会像教宗庇护十二世那样自信——他在1950年12月23日那次著名的广播中宣布，圣彼得的遗骸已经被找到——不过，发掘者顺着小径向下走，在最初君士坦丁时期教堂下方的一片区域里，发现了用皇家专用紫色金丝绸缎包裹的骨头碎片。这个地方在罗马帝国晚期被立碑纪念，从9世纪之后就没人进去过。至少，发掘者们已经发现了罗马后期和中世纪早期基督徒心目中彼得最后的安息之所。这足以使圣彼得大教堂在任何基督教教派中获得特殊地位，在罗马天主教中尤其如此。

圣彼得是将罗马天主教会凝聚在一起的教宗权威的基石，就像这座

宏伟的教堂提醒你的一样。一踏入它庄严的大门，用拉丁语大字镌刻的《马太福音》关键经文便会映入眼帘：

> 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它。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注

这并非偶然。当彼得正确地称他为“基督，永生神的儿子”时，耶稣做出了这段著名的回应，而教宗的权威便在此之上建立起来了。人们认为，圣彼得是第一位教宗，也是第一任罗马大主教，并将一种独一无二的宗教权威（概括为能够归罪和恕罪的权力）传递给了他的继任者们。这段话可以解读为耶稣本人已将这种权威赋予了圣彼得。经过多年的补充和完善，在罗马天主教会内部，教宗的权威包含了许多关键职责。教宗必须最终规定正确的基督教神学，这并不是要求他自己必须成为一名神学理论家（虽然他也许是），但他至少要发起和掌控必要的讨论及讨论结果。他还需要制定教规，并在采纳合适的建议后，立下约束教俗人员宗教实践和个人道德行为的规矩。他也有责任构建和维持确保这些标准得到遵守的执行体系。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是，他至少控制着教会中高层职位（主教及以上）的任命权。

有了这些权力，罗马天主教会就能像跨国宗教集团一样运作，并通过一套完备的规范和一位制定规范的首席执行官（也就是教宗本人）紧密联系在一起。教宗的这些权力形成了一个跨越政治边界运作的中央集权式教会体系，这实际上也是基督教世界的古老特征。然而，它们并没有人们通常想象的那么古老。

从查理曼宫中幸存下来的最有独创性的诗歌作品中，有一部佚名的维吉尔式史诗，很可能出自我们的老朋友艾因哈德之手。现代的编者将其命名为《查理大帝和教宗利奥》（*Karolus Magnus et Leo Papa*）。标题不错。其中（也许是）第三卷的残篇末尾写到了查理和利奥在帕德博

恩的会面，而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还有收尾于公元800年的圣诞节的第四卷。但是除此之外，诗歌还包括很多其他内容。另外两卷书完全佚失了，而哪怕是第三卷的残篇，也不是只谈到了那场最终带来帝国复辟的决定性会晤，还有很多别的内容。

在诗中，诗人对教宗利奥投以极大的同情和尊敬。惶恐的诗人回忆了罗马公民对这位“世界上最伟大的牧者”做出的骇人听闻的事，并且对教宗从伤害中康复的奇迹表达了敬意：

> （查理曼）深感惊讶，因为教宗的双眼一度失明，
>
> 现在却恢复了视力；
>
> 他大为惊叹，因为教宗的舌头曾被钳子毁伤，现在他却开口说话。

但毋庸置疑的是，诗人心目中的主要人物仍然是查理曼。纵览全篇，查理曼总是被放在能亲自掌控全局的最高位置。教宗抵达时，法兰克人的军队在山脚下集结，而查理曼本人则站在山顶，见到客人时才下山相迎。同样，虽然这次行动的背景是799年，“皇帝”一词却在不知不觉间进入诗中。正如我们所知，这确实是查理曼和他的朝廷的主张：早在公元800年之前很久，上帝就选中了查理曼当皇帝。作为送给全世界的圣诞礼物，教宗利奥所做的只是最终承认这个事实。与此相应，在描述会晤之前，诗人的主要焦点是作为新罗马缔造者的查理曼，而这个新罗马体现于他在亚琛的宫殿建筑群。这是诗人选择维吉尔式史诗的中心意图——他的模板是维吉尔对埃涅阿斯建立第一个罗马的描绘。然而，所用的意象经过了精心改写。读者会毫无疑问地认为，这个新罗马比第一个罗马优越（这一修辞手法在查理曼宫廷诗人的作品中更为普遍）。

在描述亚琛之前，诗人对查理曼的笼统描述更有意思。一切正如你预想的那样开始了。查理曼是一位伟大而仁慈的胜利者，在数不清的战役中，他对自己忠诚的追随者无比慷慨大度。他还战胜了骄傲的人，扶

危济困（诸如此类），而后来事情越发有趣了：

> 他告诫（不义之徒）通过虔诚的行为来学习正义，让不敬者低下头颅，
>
> 用锁链牢牢拴住他们，
>
> 并且教导他们去完成至高上帝的指示……
>
> 那些如野蛮人般一直拒绝虔诚的人，
>
> 将出于对正义的恐惧而不得不从不敬变得虔诚。

他能够这样做，是因为他具有超凡的智慧和虔诚，因此，唯独他能够明白上帝的心意：

> 唯有他配拥有通往知识的一切路径，
>
> 他能看穿隐藏的道路，理解所有的奥秘，
>
> 因为整个宇宙的发端和发展，上帝都向他启示了。

诗人声称查理曼与全能的上帝有独特的亲密关系，也描述了他简直无视我们所知教宗职权范围的工作内容：查理曼不仅强迫野蛮人成为基督徒，而且为他所有的臣民定义了基督徒的行为准则。尽管利奥获得了极大的尊敬，但在查理曼与上帝的密切关系面前，他的宗教权威就不算什么了。事实上，早在信使从罗马赶来之前很久，查理曼就对利奥的麻烦了如指掌，因为上帝曾经托梦给他。根据诗人的描绘，查理曼与上帝之间的特殊关系给他提供了在政治、道德和宗教上胜过一切可能对手的权威，其中甚至包括作为罗马大主教的教宗。[注]在将这些文字当作加洛林宫廷诗人肯定会说的话将其打发之前，我们需要更仔细地审视查理曼和利奥所继承的政治与宗教权威传统，因为两人都是在这一传统之内行事的。

皇帝和宗主教

早在《使徒行传》的时代，罗马城内就已经有基督教团体存在了。随着这一新的宗教信仰代代相传，你应当这样想象更大范围内的基督教文明，或者说是基督徒们所说的“世界”（ecumene）：基本上自治的基督教团体逐渐增多，点缀在地中海主要城市的周围（用苏格拉底的名言来说，就像池塘周围的青蛙一样）。这些信徒团体实行自我管理，相互之间只是时不时有接触，而接触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罗马对他们的迫害时有发生。这些团体之间并没有正式的、制度化的宗教权威等级制度，至少在信徒之间还没有等级差异，因为教士和主教的职务需要时间才能正式确立，而且教会的领导和神学解读有时是由所谓的俗人来提供的。但是，从围绕着早期基督教历史的迷雾里，我们偶尔可以清晰地瞥见，罗马的信徒享有特殊声望，尤其是他们的领导层，而这得益于他们与基督教早期两位伟大领袖彼得和保罗之间的联系。早在公元2世纪的第一个10年里，安条克的伊格纳修（Ignatius of Antioch）的一封著名书信就提到了这种特殊声望。这种声望有时可以转变成巨大的宗教权威。同一时代还有一封著名的书信保存了下来，是教宗革利免一世（Clement I）在公元96年写给科林斯（哥林多）会众的。在这封信中，他试图干预科林斯内部关于教士权力的争端。100多年后，教宗维克托一世（Pope Victor I）在更大范围内采取了行动，将一切坚持在逾越节当天庆祝复活节的教徒（所谓的十四日派）处以绝罚。罗马的信徒队伍本身也在不断发展壮大，在教宗科尔内留斯（Pope Cornelius）的领导下，公元253年，除了主教之外，已经有至少46名司铎、7名执事、7名副执事、52名驱魔师，还有各种诵经者和看门人。但是，由于基督教内部整体上尚未形成正式的等级结构，罗马教会对于其他团体事务的干预仅限于偶尔（很少）发表一些原则性声明，就像维克托一世所做的那样。有时其他地方的信徒会请求罗马领导层对棘手的问题做出裁决。从公元300年以前保留下来的这类请求的例子非常少，也没有线索表明幸存下来的证据仅仅是冰山一角。(注)

所有这一切随着4世纪初皇帝君士坦丁的改信而改变了，基督教随后晋升为罗马国家的官方宗教。随后，改信基督教的人不断增多，帝国内部的信徒数量成倍增加。在此背景之下，基督教会初次形成了组织严密的权力结构。教宗职位在整个基督教内部首次被确立下来。相较于后来的发展模式，甚至与当时不同的教宗对自己的评价相比，这些新结构的实际运作方式颇为出人意料。

首先，在整个基督教世界（其范围很快就与帝国的疆域重合了），罗马圣座在这个新结构内部的重要性得到了正式认可。君士坦丁改信基督教的一个重要影响是让这样一种传统得以形成（实际上是他动用帝国的资金成就了该传统）：整个帝国的基督教领袖不定期集会，召开大型的主教会议，以商讨严重问题的解决方案。第一次这样的会议是325年在尼西亚召开的，第六条教规承认了罗马主教区的特殊地位，因为它是由圣彼得创立的。在实践中，这一点具有多个方面的重要性。首先并且最具体的是，主教不再被认为是彼此平等的。某些主教获得了教省主教的地位[metropolitan rank，实际上成了大主教（archbishop），虽然当时这个术语还没有得到广泛使用]，享有既定的权利，能够以某种方式干预其所在行省内部下属主教区的事务。具体说来，他们要定期召集教会会议以维护信仰和行为的标准，还要批准所有的主教选举。我在这里使用“行省”一词是有原因的：除了少数例外情况，获得大主教区身份的城市通常是罗马帝国行省的省会城市，主教的权力范围通常和该行省的边界一致。仿佛是一夜之间，教会的管理结构开始模仿帝国政府。在这次非同寻常的巨变中，罗马主教区成为凌驾于罗马周围许多地区之上的大主教区。注

其次，从更广阔的视角来看，罗马作为偶尔解决教会难题的上诉法庭的传统角色获得了新的意义。做出裁定的方式发生了影响深远的变化。教宗英诺森一世（Pope Innocent I，401—417年在位）时期，基督教发展早期直白的书信被更加正式而独特的教宗教令所取代。这种教令以帝国诏书为模板，后者是皇帝们使用了几个世纪的一种特殊信件格式，信的前半部分讨论法律问题，后半部分则是对该问题经过深思熟虑

的正式答复。皇帝的御批具有充分的法律效力，往往决定后来类似案件的法律实践。因此，模仿这种特殊的信件格式是意味深长的一步，它向人们表明，本来简单的教宗意见陈述今后应该被视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裁决。5世纪的头几十年，来自多位教宗的教令日益增多，所涵盖的地理范围不断扩大，让人尤其印象深刻。在他们当中，于401—432年间先后在位的教宗英诺森一世、佐息末一世（Zosimus Ⅰ）、波尼法修一世（Boniface Ⅰ）和西莱斯廷一世（Celestine Ⅰ）不仅对意大利境内的教会做出正式裁决，还对远至西班牙、高卢和北非的教会做出裁决。㊟

第三，如果进一步扩大视野，我们便会看到，罗马拥有使徒遗产，意味着它将在持续的教义之争中扮演重要角色。教义之争是罗马帝国晚期基督教的一个典型特征，所谓的阿里乌派争论更是产生了一种基督教的变体，而狄奥多里克所信奉的就是这种基督教。在君士坦丁改信基督教之后的岁月里，教义争论盛行，其背后的根本原因让我们窥见了基督教成为国教的革命性影响。4世纪之前，偶尔会有教义上的争论，这导致了一些分裂派别的出现，例如实际上已经被驱逐出基督教主流传统的十四日派。罗马停止迫害基督教之后，教会团体之间的交流日益频繁，很快人们就清楚地意识到，许多基督教教义还没有得到充分发展。因此，是君士坦丁的改宗引起了这一切，而他也资助了这一切，从今天大学的视角来看，这仿佛一个长达250年的研究项目，它不定期地把主教和其他的基督教知识分子召集起来，通过小型工作坊和偶尔的国际性会议（大公会议），来填补教义上的空缺并处理好细枝末节。

从广义上讲，所涉及的神学主题是按照时间顺序排列的：首先，基督在何种意义上是神（阿里乌派争论）；其次，应该如何理解圣灵在三位一体中的位置；第三，在基督身上人性与神性究竟是如何结合的（一性论者的争论）。在这些争论进行的同时，还有其他较为本地化的教会组织（偶尔得到外部的帮助）有纪律上的问题要解决，比如在迫害面前背教的基督徒是否可以重新被教会完全接纳，即北非的多纳徒派（Donatist）争议。此外还有围绕苦行主义产生的普里西利安派

（Priscillianist）争议和伯拉纠派（Pelagian）争议。(注)

不要担心这些细节，总体情况更重要，而这很明确。早期教会中那些相对孤立、偶尔受到迫害的团体曾经认为，不同团体信仰的基本上是相同的东西。当君士坦丁和他的继任者拉近这些团体彼此之间的距离时，人们很快就意识到，对于一些问题，他们没有思考过，或者至少没有深入思考过。这一连串的争论体现一个不可避免的查缺补漏的过程，而这一过程让此时的帝国宗教在神学方面达到了充分一致。罗马的特殊地位意味着它的参与是必不可少的。如果不能获得罗马主教的认可，任何教义都难以获得合法正统的光环。因此，正如我们在第2章看到的那样，在狄奥多里克时期，皇帝芝诺的君士坦丁堡宗主教阿卡修斯主张用一种在东部教会勉强管用的折中方案解决一性论者的争论，但是遭到了罗马的拒绝。最终，查士丁和查士丁尼让东部教会服从于教宗。在罗马帝国晚期发展中的基督教世界，罗马的地位意味着它是判断教派是否正统的试金石。

第四，仍有一些时间来填补意识形态上的漏洞。这是有必要的，因为要将《马太福音》中耶稣的言论转变成为教宗权力辩护的宪章，还需要做一点论证。首先，你必须接受，圣彼得被授予的权力可以转让给他的继任者，而不是仅仅赋予他一个人的礼物。然后，你必须证明彼得的继任者是现任的罗马大主教，因为彼得曾是第一任罗马大主教，尽管基督教的重要古代文本福音书和《使徒行传》都没有这样的描述。但是，缺乏可靠的文献资料，并不妨碍真正的信徒认为自己信仰的东西是正确的。不出所料，圣彼得故事的空缺被仔细地填补上了。在这个时代的某个时间，一份关键的资料被创造出来，最初是希腊语的，在公元400年左右被一个名叫鲁非诺（Rufinus）的学者和修道士翻译成拉丁语。这份资料被称为《革利免认亲记》（*Clementine Recognitions*），据说是教宗革利免一世写给耶稣的弟弟、耶路撒冷教会领袖雅各的一封信。在这封信中，革利免向雅各讲述自己是如何被圣彼得改变信仰并受其培养的，以及彼得最终是如何通过让他接任罗马主教而把宗教权力传给他的。这一文本一箭双雕，一下子填补了意识形态上的两个空白。这份伪造文本

之所以会选择革利免，大概是因为先前那封真实的、写给科林斯人的信早已广为人知。以防万一，在一代人之后，教宗利奥一世小心翼翼地证明，所有这一切完全符合罗马法律对遗产继承的规定，至此尘埃落定。与此同时，为了避免一位使徒说服力不够，教宗达玛苏一世（Pope Damasus I）在382年召开了一次罗马地方宗教会议，宣称罗马教会不同于其他任何基督教会，因为它是由圣保罗和圣彼得两名使徒共同建立的，这进一步强化了教宗的独特性。注

到目前为止，一切都还不错。教宗充分利用了君士坦丁改信之后出现的种种好机会，来支撑他对基督教宗教权威的主张。但是，罗马教会并不是唯一的基督教会，如果你拓宽视野，去看罗马帝国晚期基督教宗教权威的整体格局，就会发现罗马主教的地位并没有那么举足轻重。明确地说，教宗从罗马地区获得的大主教权力和其他行省首都的主教无异，并无特别之处，特别是长期在罗马城市长官行政管辖范围之内的罗马周围的行省。注

相比之下，发布教令是教宗特有的权力，然而这项活动对树立教宗权威的作用不应该被过分夸大。一方面，教令像帝国诏书一样，只能在有人提出问题时才能颁布。例如，我们知道，在帝国制度最受欢迎的时期，皇帝每天要颁布大约5道诏书。即使是按照现代的法律模式，就算让皇帝们多休息几天，他们一年下来也得颁布至少数百道诏书。我们对教宗颁布法令情况的了解大多来自小狄尼修（Dionysius Exiguus）的作品。6世纪初期，从君士坦丁改宗到他所处时代的近200年中，他只找到了41个例证。这表明，在西方教会，向教宗咨询还没有成为经常性的活动。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做出自认为权威的解答仅仅是一个方面，教宗做出解答时，常常强调他们深思熟虑的正式答复应该得到充分遵守，但他们并没有强制执行的机制。如果教宗做出的答复未被遵守，他自己对此是无能为力的。在紧要关头，教宗甚至需要皇帝的支持，比如445年，教宗利奥一世在与阿尔勒主教希拉流（Bishop Hilary of Arles）的争论中，曾用皇帝的裁决来支持自己的观点。注

然而，糟糕的事还不只这些。罗马帝国晚期的基督徒很愿意承认罗马是个非常特殊的地方，但并不承认它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其他早期的基督教会同样是由使徒建立的。尼西亚会议上定的第六条教规将安条克教会和亚历山大里亚教会挑选出来，认为它们与罗马教会一样是使徒所建，而第七条教规将耶路撒冷也加了进来。381年，君士坦丁堡被宣告为新罗马（当然是在一次于君士坦丁堡举行的宗教会议上），于是也被纳入其中，自此以后在各个方面都被视为与旧罗马享有同样的地位。因此，到了4世纪80年代，典型的罗马帝国晚期模式已经出现：不是只有一个具有独特声望的主教区，而是有5个同样突出的宗座。所以，从概念上讲，基督教的正统就被定义成5位宗主教都认为是正确的东西。在这个背景下，《革利免认亲记》的出现，以及达玛苏对罗马教会双使徒根基的强调，都可以解读为罗马主教区急切想与其他地位相当的教区划清界限，其他教区乐于将罗马视为平等，但并不愿意承认罗马所谓的独一无二。注更糟的是，在基督教权威的另一个来源——皇帝——面前，这些宗主教黯然失色。

在此有必要回顾一下当时罗马天主教会首脑，也就是教宗的作用：他最终确定何为正统信仰，为神职人员和平信徒制定行为标准并加以推行，任命并控制高级教士。按照这个清单来分析罗马晚期的证据（而非仅仅关注教宗），我们很快就会发现，在罗马帝国晚期，基督教会的主管实际上是皇帝。

让我们从教义说起。君士坦丁改宗后的约300年是神学上非常有创造力的时期，关键教义中的大多数得到了完善的定义。教宗在这一过程中也发挥了一些作用，但出人意料的是，作用很小。关于正确教义的决议是在大公会议上做出的，先是325年的尼西亚会议，随后会议在塞迪卡、君士坦丁堡和卡尔西顿不定期地举行，直到476年西罗马最后一任皇帝被赶下台。这些会议都在东部举行（甚至连塞迪卡，即现在的索非亚，也位于巴尔干半岛的东部），大部分大型的神学辩论也是在东部进行的，参与这些辩论的基督教知识分子主要使用希腊语。在卡尔西顿会议上，教宗利奥一世贡献了一份重要文献《利奥大卷》，除此之外，罗

马教宗仅仅派遣了一些观察员参加会议，剩下的都交由东部教会的神职人员负责。希腊哲学和科学中的许多假设为基督教教义的发展提供了基本的方法论工具。(注)

在这一过程中，一连串信仰基督教的皇帝扮演了更为重要的角色。我们此前提到，皇帝给数百名主教提供免费的交通和食宿，用马车运送他们赶赴帝国的一场场神学盛会，从而为教义的发展提供物质支持。对皇帝君士坦提乌斯二世统治时期（337—361年）教会会议之频繁和耗资之大，4世纪一位非基督教的历史学家阿米阿努斯·马尔切利努斯（Ammianus Marcellinus）进行了严厉的批评。除了上述四次大型会议之外，还有许多规模比较小的会议，也有一些会议虽然规模也很大，但是因为最终被认为做出了“错误的”决议而并未被列为大公会议，虽然事实上它们是的。在所有这些会议中，皇帝的作用远不只是翻开帝国的支票簿，为会议提供经费。是否召开以及何时召开更大规模的会议，通常都是由皇帝决定的。没有他点头同意，会议根本不可能召开。与此相关的是，皇帝们通常还会制定至少一部分议事日程，这是很自然的，因为大多数会议召开都有特定的理由。他们会给与会者施加巨大的压力，以得到自己期望的结果，他们还提供了仅有的执行机制，以执行会议的决议，例如，放逐离经叛道的神职人员，或者是将被定罪教派的建筑充公并没收其全部财富。

不同皇帝对具体教义问题的兴趣差别很大，君士坦提乌斯二世和后来的查士丁尼都以喜爱钻研神学细节而闻名，但所有的皇帝都对教会内部的和平与统一感兴趣，这是与罗马帝国晚期教义辩论中纯粹知识辩论并行的主题。至少在这个程度上，所有皇帝都愿意参与教会事务。因此，总的来说，对于教义争论的最终结果，皇帝的意志比宗教会议上的辩论更为重要。以所谓的阿里乌派的争论为例，他们争论的是用什么词语来描述基督身上人性和神性的关系。325年召开的尼西亚会议提出了一个定义，但是这个定义花了两代人的时间才最终被接受。在此期间，罗马国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完全支持其他定义为正统。直到4世纪80年代，非尼西亚定义的支持者再也无法得到帝国的支持，国家最终决定一

致执行尼西亚会议的立场，这场争论才结束。同样的模式也适用于纪律问题。这方面的大问题来自北非：所谓的多纳徒派争议，辩论的是那些在大迫害中屈服的教会领导者的地位。在4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帝国对这个问题的立场摇摆不定，不同的政权采取不同的政策，争论激烈地进行着。然而，帝国的政策逐渐变得强硬，开始支持争端的一种解决方案，即坚决反对多纳徒派，并动用帝国之力来执行这一政策，此后，这一争端很快就平息了。这并不意味着多纳徒派全部消失了，正如并非所有非尼西亚派的观点都消失了一样，只是一旦帝国的意志明确支持某一立场，反对此立场者得到的支持就会大幅减少，很快，一场运动就会变成一个教派，而到了这个时候，皇帝就不会那么在乎了。主教和知识分子可能做了大部分的思考，但是通过召集会议决定教义是否要做出变化的是皇帝，在这些会议上建立必要的联盟以通过某一决议，然后以应有的决心执行决议的也是皇帝。[注]

在制定、推行神职人员和世俗人士的一般行为标准方面，皇帝的作用也很大。教宗的教令在讲拉丁语的西部发挥了一些作用，但是在不同宗教会议（至少在大型会议上，皇帝的作用是主要的）的决议以及帝国的直接立法中，还有许多规章制度。《狄奥多西法典》第十六卷全部是君士坦丁时代至435年之间制定的关于宗教问题的帝国法律，而《查士丁尼法典》收录了6世纪30年代早期的更多内容。罗马帝国晚期教会法的基线是由宗教会议的决议和帝国法律共同提供的，就广泛流传的约束基督教圣俗人员的规范的数量而言，教宗教令仅仅位列第三。在执行过程中，帝国法庭系统的重要性再次凸显，但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新事物。从君士坦丁时代起，主教被授予开庭的权力，每一位基督徒都能申请将自己的案子移交到这里审理。但是，在实践中，这个法庭渐渐转变成一种小额索赔法庭，旨在进行和解和调解，而不是直接进行惩罚。这显然限制了它所能审理的案件的种类（例如一切可能涉及死刑的案件肯定是不能审理的，因为主教被禁止杀生）。主教法庭最初是经帝国法律许可开设的，这又突出了帝国在教会法方面的优越地位。[注]

最后，对于教会高层的任命也是如此。你会发现，皇帝们并不关心小教区的主教是谁，例如比利牛斯山及其周围地区，但他们对于谁掌管着帝国的大城市十分关心，尤其是帝国的中心和一些区域性中心。值得注意的是，这并不完全是指罗马。到了4世纪，甚至连帝国的西部都处在米兰或特里尔，以及后来的拉韦纳的管辖之下，而东部的主要城市则处于君士坦丁堡、安条克和亚历山大里亚的管辖之下。罗马仍然是文化中心，但是在整个4世纪，皇帝们最多到过罗马4次，每次大约待1个月。因此，教宗的选举并未受到皇帝过多的直接干预，但是如果选举引发了暴乱，就像366年教宗达玛苏的选举那样，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在他们所关心的主教区，皇帝们获得并保留了对教会职务的任命权。[注]

毫无疑问，皇帝才是基督教会的领袖。包括教宗在内的其他人发挥了部分作用，但在确立正确的教义、界定和执行应有的实践标准以及人事任命方面，皇帝的作用至关重要。这种主导作用不仅存在于事实层面，在法理层面也有体现。前文提到，根据狄奥多里克采纳、普罗柯比反对的罗马帝国晚期的政治理论，皇帝是由上帝直接任命的，上帝精心选出了他作为自己在人间的代理人。这些想法直接来自希腊化时期非基督教的王权观念，而帝国向基督教的转变并没有带来什么变化。希腊化时期观念中的神被贴上了基督教上帝的标签，神的意志被重新塑造为让全人类都信仰基督教，而不是为少数人创造完全理性的文明。但是，关于皇帝与上帝亲密关系的说法并没有丝毫减少。与皇帝有关的一切都是神圣的，从他的国库到寝宫，从最重要的公共场合到最不显眼的个人接触（如被称为proskynesis的朝拜仪式，即拜倒在圣驾前以示尊敬）无不被精心编排，为的是强调这一点。皇帝并非普通人，至少在公众场合，在各种仪式的过程中，他应当保持一种超越常人的泰然自若。君士坦丁可能把事情做得过头了。他最初安排把自己的遗体安葬在君士坦丁堡的一座巨大陵墓中（圣使徒教堂），十二使徒的祭坛环绕在其周围。据说他把自己视为第十三位使徒，但一般来说，十二使徒围绕的那第十三个人是耶稣，所以你就能想到君士坦丁究竟把自己看作谁了。他的儿子君

士坦提乌斯二世悄悄地进行了重新安排，做出了一份略微谦虚的声明，但仅仅是略微而已：君士坦提乌斯和他的继任者们，无论是东部还是西部的，一直到查士丁尼及之后，都坚持宣称自己是上帝选中，要与上帝一起统治人间的。

看到罗马帝国晚期之后许多个世纪里的事态发展，特别是在几个世纪中作为西方政治传统惯例的政教分离，我们很自然会注意到导向这一状况的思想。从罗马帝国晚期起，这种思想在希波的奥古斯丁那里有所体现，正如他在《上帝之城》中所说的那样，世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如此完美地反映上帝的意志，以至于能够永久持续下去。奥古斯丁指出，上帝确实使国家不断地兴亡更替，但这仅仅是为了他的目标，国家只要能够服务于上帝的更高目标，就能延续下去，而上帝的更高的目标是与国家自己的目标系统性地分离的。奥古斯丁已经顺着这条思路思考了一段时间，但促使他写下这些的一个额外因素是410年8月哥特人洗劫罗马。他并不是唯一一个直接挑战罗马帝国意识形态核心主张的人。教会人士抵制帝国强制推行的某种教义解决方案时，其实是在含蓄地，有时甚至明确地否定皇帝干涉教会事务的权利，有时，这种抵制是很认真的。例如，4世纪40年代，亚历山大里亚主教亚他那修（Athanasius）曾使埃及在一段短暂的时期内无法治理，因为他非常反对君士坦提乌斯对非尼西亚神学的偏爱。或者说，从4世纪中期开始，整个基督教的修道主义传统在人数和影响力上都有了巨大的增长，而这也间接意味着否认帝国意识形态的主张。如果罗马皇帝和他所统治的政治结构反映了上帝对人类的意志，那么个人就不应该从中退出，去效仿基督、使徒和许多旧约先知的做法，通过自我否定和避世来寻求灵魂的救赎。但是，在这段时期的圣徒传记中有很多这样的例子，他们拒绝参与罗马国家的公共事务，甚至一些精英阶层的成员也是如此。综上所述，再加上一点后见之明，人们很容易将帝国意识形态的主张斥为空话。[注]

然而，这么理解是严重错误的。你固然能在一些教士的作品中看到反抗皇帝宗教权威的线索，但也能在其他教士的作品中发现表示支持的线索。例如，几乎在君士坦丁改信基督教的同时，该撒利亚主教优西比

乌就提出，耶稣诞生于罗马帝国第一任皇帝奥古斯都统治时期并非偶然。优西比乌认为，这表明尽管有早期的迫害，但上帝早已选定罗马作为他将人类引向基督教的工具。换言之，罗马在这一神圣计划中拥有无与伦比的地位。如果引申开来，这意味着皇帝绝不仅仅是一位世俗的统治者。同样，在451年10月25日卡尔西顿召开的第四次大公会议上，370名与会的主教（有些的确是派的代表）高呼皇帝马尔西安为"君王和祭司"。这种呼声并没有打破传统，而只是对一种已经牢牢确立的思想的具体表述。此外，在553年5月于君士坦丁堡召开的第五次大公会议上，152名主教欣然宣布，未经皇帝明确批准，任何教会事务都不能进行。注

在罗马帝国晚期，每有一个持反对意见的教士，就会有十个明里暗里支持皇帝支配性宗教权力的教士。事实上，对于反对的声音要格外谨慎。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同一个人，可能会在皇帝支持自己不同意的教义立场时表示强烈反对，在皇帝站在自己一边时表达热情支持，这种情况并不罕见。这并不是要否认某些神职人员的确对皇帝的宗教权威持有深刻而有原则的异议，但是除了少数表达意见的修道主义者之外，绝大多数基督教神职人员和高等阶层的平信徒基本上接受，皇帝是上帝选中的，因此至少应该对教会事务履行监督义务。皇帝可以，实际上也应该让主教来处理神学上的细节，但是在冲突的立场中寻找上帝智慧所指示的立场，并且确保他的臣民，即上帝的子民最终遵循真正的信仰和基督徒虔诚的道路，这完全是皇帝的职责所在。这只给教宗留下了一个次要的角色，尤其是在一个由五位平等的宗主教组成的基督教世界里，而且，大多数前沿的神学理论都是用希腊语写下的。

国王和主教

在罗慕路斯·奥古斯都路斯退位和查理曼加冕之间的这段时间内，自君士坦丁改宗以来教宗运作的大部分条件已完全改变。统一的西罗马

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众多后继国家，其中大多数国家最终在5世纪到8世纪的某个时候成为《尼西亚信经》的信奉者，尽管其统治精英最初并非如此。然而，这个新世界的政治结构并不稳定，在从450年开始的300年间，教宗制度开始在尚存的西方帝国的范围内运作。此后，教宗制度在奥多亚塞和狄奥多里克建立的后继国的统治下运行了60年，直到成为从君士坦丁堡进行统治的东罗马的一部分。在150年里，这种情况持续了大部分时间，直到8世纪，教宗才开始作为独立的政治单位管理罗马及其周边地区，并抵御伦巴第国王以及独立的斯波莱托公爵和贝内文托公爵的不良企图。这些让这段历史趣味横生。

就像对待罗马帝国晚期一样，如果你用后见之明来思考这几个世纪，你就有可能发现一种新生的关系链，它最终会帮助教宗成为罗马天主教的完全负责人。在狄奥多里克统治早期的494年，罗马教宗哲拉修一世（Gelasius I）给皇帝阿纳斯塔修斯写了一封著名的信，这封信保存至今。信的开头是“有两个”（Duo sunt），它也因此得名，接着作者就开始阐述教义：世界上有两个平等而独立的权威，即教士的神圣权力和君主的王权，而两者之中，教士的责任更大。书信内容如下：

> 有两个权力在很大程度上控制着这个世界，一个是教士的神圣权威，另一个是国王的力量。两者之中，教士的责任更大，因为他必须在上帝的审判中，为国王向上帝交账……因此，你（国王）必须知道你依赖于他们（教士）的决定，而他们不会屈服于你的意志。

上帝希望让这两种权力协调一致，但两种权力涉及的领域不同，不应该干涉彼此的职权范围。哲拉修在阿卡修斯分裂的高潮时期写了这封信，它挑战了帝国意识形态的主张，即皇帝有权指挥教会的事务。更具体地说，这是对《联合敕令》的攻击（当年芝诺试图用它促成教会在东部的和谐），但这一观点是在一项更普遍的原则声明中体现出来的。

与此知识背景类似的还有小狄尼修的重要著作。他的专长是将希腊语翻译成拉丁语，但他在教规方面的工作对我们的研究而言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他的工作为两部分。首先，他从希腊语重新翻译了大公会议的决议（有两个不同的版本）。早期也有拉丁语的译本，但不是特别准确，有的甚至将不同会议上的决议混为一谈。例如，有这样一件尴尬的事情：早些时候，一名北非神职人员曾以尼西亚会议的一项决议（依据的是教宗佐息末的翻译）为依据，向教宗佐息末请愿，结果发现这实际上是塞迪卡会议上的决议。小狄尼修的第二部分工作就是《罗马教宗教令集》（*Collectio decretorum Pontificum Romanoru*），其中收集了从西里修一世（Siricius I）到阿纳斯塔修斯二世（Anastasius II）的教宗颁布的教令（也就是从384年到498年）。我们对罗马晚期教宗法令活动的绝大部分知识来自这一文本。它以一种非常方便的形式记录了以前教宗的大量决策，这对未来教宗的重要性是一个打击。这部作品很快就广泛传播开来，巩固了罗马作为教会事务权威裁决来源的地位。㊟

这一时期值得一提的教宗还有格列高利一世（Gregory I），其著作影响巨大，他在教会的管理上也非常积极。为增加财政收入，他重组了教宗财产的运作模式；为提高教会的效率，他改革了中央官僚体制。还有一件事很有名：他在6世纪90年代与伦巴第人进行了几乎独立的谈判，当时伦巴第人正在向罗马施压，而东罗马的军队没有出现。7世纪，东罗马的皇帝试图终结卡尔西顿会议遗留下来的关于基督本质的争论，当时的教宗坚决反对。东罗马皇帝提出，无论基督在不同的时间有多少个本质（当时基督徒被完全禁止使用“本质”这个词），他都只有一个意志，这种思想被称为“基督一志论”（Monothelitism）。它含蓄地拒绝了卡尔西顿会议的教义，而教宗利奥正是在这次会议上发表了著名的《利奥大卷》。因此，教宗马丁一世（Martin I）无论付出多大代价（代价是高昂的）也不愿意接受这一点。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这一时期也首次出现了教宗有意扩大基督教欧洲疆界的迹象，这次的主角又是格列高利一世。他对一些盎格鲁—撒克逊奴隶的著名评论是“他们不是盎格鲁人，而是天使”（Non angli sed angeli）。597年，他派坎特伯

雷的奥古斯丁（Augustine of Canterbury）和40名勇敢的同伴穿过法兰克王国，向北越过英吉利海峡。格列高利死后，教宗对该项目的支持断断续续，但的确为英格兰绿色宜人的土地贡献了有史以来最杰出的神职人员之一，他就是塔尔苏斯的狄奥多尔（Theodore of Tarsus）。他出生在小亚细亚，在波斯人和阿拉伯人征服小亚细亚后逃难。66岁时，他突然被从一个安静的罗马修道院调离，改任坎特伯雷大主教。他没有被恶劣的天气吓倒，以一己之力对盎格鲁—撒克逊教会进行了改革，最终在88岁高龄辞世。去世后不久，他在人间的丰功伟绩就为他赢得了历史上最应得的宣福礼之一。注

把这些教宗的亮点串在一起，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中世纪早期见证了我们所知的教宗权力的一些关键发展。小狄尼修强调了教宗权威对西方教会法发展的重要性。教宗哲拉修和马丁清楚阐明了为什么皇帝们不应该插手宗教事务，并开始将理论付诸实践。格列高利一世的教导则使西方的许多教士定意在罗马；与此同时，他将教宗的官僚机构改造得更加严密，增加了收入，并开始了这样一个进程：教宗抛弃君士坦丁堡的政治轨道，向西寻求新的未来。虽然我们刚才说到的种种现象都是真实的，但是我们必须全力抵制这样一种诱惑，即想要把这些点连起来，以塑造教宗在这一时期有意识地转向西部的形象（当然有时会出现这种情况，比如格列高利的行动）。事实与此大相径庭。

首先，需要更仔细地审视教宗和君士坦丁堡皇帝之间的关系。我认为，对于5世纪晚期和6世纪早期的教宗来说，他们很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享受”到了脱离帝国严密控制的自由。如果哲拉修一直生活在东罗马的领土上，我很怀疑他是否还会在给阿纳斯塔修斯的信中表现得那么大胆——那样肯定会产生十分严重的后果。在540年夏天拉韦纳被查士丁尼的军队攻陷之后的近200年里，罗马发现自己实际上又变成了5个平等的宗座之一，处于至高无上的帝国的控制之下。对于一个已经学会脱离帝国而生活的教宗来说，这本身可能有点让人烦恼（虽然，正如我们在第2章中看到的，在结束阿卡修斯分裂的问题上，罗马事事都要先咨询狄奥多里克才采取行动，所以我不确定情况是否有那么不同）。被如此

强制着返回君士坦丁堡的政治轨道经常闹出问题，因为在东部，围绕卡尔西顿会议的争执依然激烈。东部一些教会的人发现，如果不做进一步的评论，就无法接受卡尔西顿会议对基督“二性论”的定义。因此，一连串的皇帝试图通过在卡尔西顿会议决议基础上添加或去除一些内容，来找到妥协的立场，从而让它被东部的教会接受。但是，因为《利奥大卷》是会议记录的核心部分（这算是西部对仍在进行的这一争论的唯一贡献了），罗马始终不愿接受任何妥协。

尽管有了这样的起点，但皇帝们有时会施加巨大的压力，教宗们只能屈服。例如，6世纪40年代后期，教宗维吉利乌斯（Vigilius）被拉到君士坦丁堡，两次被迫接受谴责卡尔西顿文本一小部分的一项妥协，这部分内容被称为“三章”（Three Chapters）。即使是这种程度的妥协也引起了一场影响到西方拉丁教会大部分地区的风暴，这些地区过去一直坚定支持卡尔西顿会议的决议。尽管如此，维吉利乌斯的两位继任者依然感受到强大的压力，接受了他签署的妥协协议。同样，在7世纪的“一志论”风暴首次刮起时，教宗霍诺利乌斯一世（Honorius I，625—638年在位）也毫无异议地同意了帝国的立场。他的继任者马丁一世在649年召开了拉特兰会议予以反击，这次会议毫无保留地谴责了基督一志论。然而，惩罚来得又快又猛。马丁一世被绑架到君士坦丁堡受审，然后被流放至克里米亚，在那里死去［这还不算最糟的：被指为马丁一世的主要教唆者的认信者马克西姆（Maximus the Confessor）失去了舌头和右手，这样他就不能再宣传或写作所谓的异端邪说了］。可见，对于“拜占庭”时期的教宗来说，帝国的权威还是很有震慑力的。但真正关键的一点是，并没有很好的证据表明，忍耐着的教宗们也在努力从根本上改变这种情况。

举个例子，格列高利一世与伦巴第人进行了独立谈判，但这是因为他别无选择，当时罗马附近没有帝国的军队。然而，他的信件清楚地表明，他的根本目的是希望君士坦丁堡对罗马的防卫做出认真的承诺，在罗马建立军事指挥权，即公爵领（ducate，之所以叫这个名字，是因为将有一位公爵来指挥）。这最终实现了，为大局考虑，格列高利一世并

没有试图脱离君士坦丁堡的政治轨道。后来，聚集了大量卡尔西顿决议反对者的东部省份最终被阿拉伯人夺走，皇帝们总算能够放弃各种各样的妥协尝试，于是教宗张开双臂欢迎他们回到正统的怀抱。681年是个奇迹之年，它见证了帝国和伦巴第人之间的和平，以及在君士坦丁堡举行的第六次大公会议，这次会议宣告了基督一性论的终结。此时，教宗似乎已经准备好在可预见的未来继续坐拜占庭帝国的宗主座了。㊟

真正改变这一局面的是拜占庭帝国日益恶化的战略地位，因为在对东边的阿拉伯人的斗争中，它的损失越来越大。这主要造成了三个方面的影响，前两个是罗马摆脱拜占庭支配的必要先决条件，第三个是这一过程的推动力量。先决条件之一说来简单。面对这些灾难性的损失，君士坦丁堡的税收收入下降了大约四分之三，因此不得不在各个方面都精打细算，结果，特别是在格列高利一世的改革之后，教宗的机构迅速成为罗马城内年度收入最高的官方机构。随着时间的推移（很难详细描绘这一过程），教宗的行政机构接管了越来越多的公共职能，这些职能使这座城市得以运转，其中包括慈善、食物和水的供应，甚至还有城市的防御。7世纪初，就官方而言，这座城市最重要的官员是它的皇家公爵，但是两代人之后，加上经历了阿拉伯人的入侵，情况发生了变化。

然而，要想充分了解这种新局面，还必须了解败于阿拉伯人之手所带来的第二个结构性变化。帝国失去了这么大一部分的财政收入，军事上的威胁还是没有减少。如果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伊斯兰军队征服并夺取更多地区的资源后，威胁实际上增加了。因此，君士坦丁堡仍然必须在其大大削弱的税收基础上维持庞大的军队。为此，君士坦丁堡在一定程度上采用了狄奥多里克及其他西方后继国的国王们所采用的方法，他们奖励那些武装起来的追随者，因为是后者让他们统治了罗马的西部。在整个帝国的范围内，土地作为军事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被分配给君士坦丁堡的军队。实际上，帝国还保留了一些税收结构，除了土地分配之外，有时还会有其他有价值的军饷分配，而后者产生了重要的政治影响，尤其是在意大利内部。整个拜占庭意大利被划分为几个独立的军事指挥中心，如以拉韦纳为中心的总督辖区（exarchate），或格列

高利为罗马争取到的公爵领。起初的军事要塞很快发展成为当地的地主武装，其主要成员现在领导着各个地区占政治主导地位的地主网络。这些武装在性质上与法兰克王国各地的武装民兵相似，虽然是通过不同的途径形成的。这些网络也自然而然地形成了自己的政治议程，这些议程考虑的不是帝国的利益，而是受当地土地所有者利益的驱使。从那不勒斯到佩鲁贾（Perugia）和五城地区的公爵领，甚至在拉韦纳总督辖区内部，都发生了这种情况，但是在罗马的表现形式比较特殊，因为这里的地主（在拉丁语中称为proceres和possessores）还控制了教宗的选举。这具体是什么时候开始的还不清楚，但到了7世纪中叶已经成为既定事实。考虑到教宗的机构是附近地区最富有和最重要的公共机构，你就能明白为什么罗马的地方网络想要控制这一职位，同时也想要管理这个公爵领了。(注)

和阿尔卑斯山以北的法兰克世界在没有扩张的情况下相类似，拜占庭意大利的默认设置是倾向于地方化、脱离中心的政治议程。这是因为君士坦丁堡的大部分收入都被剥夺了，无法积极支持地主网络，也缺乏独立的军事力量来约束它们。尽管如此，在681年，拜占庭意大利的总体形势看起来依然相当稳定。与伦巴第人的新条约以及对卡尔西顿决议的充分承认，似乎为帝国提供了一条让整个拜占庭意大利（特别是罗马城）安稳无忧的和平道路。但是，由于后来第三个因素即伊斯兰势力的出现，前两种发展在整个拜占庭意大利播下的地方主义的种子结出了奇怪的果实。

事情很简单。拜占庭暂时还没有受到穆斯林军队的袭击，但这种情况不会延续太久，事实上，其终结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皇帝查士丁尼二世。他试图扭转过去50年的一些损失，在7世纪90年代重新发动了阿拉伯战争，结果完全是灾难性的。到了8世纪初，穆斯林军队不仅挫败了拜占庭帝国的反攻企图，而且再次走上了战争的道路，其高潮是717—718年对君士坦丁堡长达12个月的围攻，几乎将这个帝国永远消灭。最后，这座城市挺了过来，但只是勉强如此，危机并没有随着围城的失败而结束。皇帝利奥三世（Leo III，717—741年在位）做了任何统治者

在这种情况下都会做的事。722—723年，他宣布大幅增税，据说是在原来的基础上翻一番，以筹措资金支持东部前线。此后不久，他和顾问们寻找上帝如此愤怒的原因，宣布发起反圣像运动。

这在拜占庭意大利内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增税引发了所有军事化地主的巨大不满。罗马的地主通过教宗格列高利二世（Gregory II，715—731年在位）宣布他们拒绝交税，并公开发动反抗。整个帝国形势危急，几乎没有多余的军队可以镇压他们。725年，罗马总督集中全部兵力向罗马靠近，事态发展到紧要关头。罗马人依靠自己的力量和外界的一些帮助，凑够足够的兵力将对手击退。就在这一刻，独立的圣彼得共和国诞生了。它就是19世纪时被拿破仑·波拿巴和拿破仑三世最终推翻的教宗国的直接祖先。

又过了几年，局势才稳定下来，每个人都意识到已经发生了不可挽回的事情。8世纪20年代后期，罗马的地主势力中仍有一个派系，在当时的公爵彼得的领导下，准备与君士坦丁堡密谋，要将格列高利二世赶下台，让忠诚于拜占庭帝国的人取而代之。但是，政变失败了。利奥三世的反圣像宣言也极大地推进了地方独立的事业，因为它让格列高利可以大肆打他的宗教王牌。他将皇帝逐出教会，告诫皇帝不应该干涉宗教事务（就像他之前的哲拉修一样，当前的军事和政治形势显然让他觉得这么做不会有问题）。但他也有损失。732年至733年，皇帝没收了意大利南部、西西里岛和伊利里库姆所有仍在皇帝控制之下的教宗领地。据说教宗的年收入因此少了350磅黄金。到了8世纪30年代中期，尘埃落定，一种新的模式出现了。原拜占庭罗马公爵辖区的军事化地主建立了一个独立的罗马共和国并让其延续下来，由教宗全面领导，而选举教宗的权力掌握在他们手中。注这当然是一场革命，但它与让教宗成为西方教会实际领袖的长远愿景毫无关系。相反，推动这一进程的是着眼于本地、讲求实际的经济和政治动机。事实上，当你进一步分析时，必然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世纪早期的种种发展实际上削弱了教宗对拉丁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影响力。

随着先是罗马公爵，然后是君士坦丁堡的中央政府开始财政吃紧，教宗接管了许多事务，而教宗工作内容中的宗教部分必然会减少。对公爵领来说，组织食物和水的供应，开办慈善事业，修建公共建筑，组织防御，最后是政治和外交事务，这些都不是小事，哪怕官僚机构扩大了也不容易办到。当然，教宗们仍然有时间处理宗教事务。格列高利二世和格列高利三世（Gregory III，715—741年在位）先后领导了这个新国家的建立，也为盎格鲁—撒克逊传教士波尼法修提供了大量支持。但是，这个新国家的政治局势需要时刻注意。8世纪20年代的严重税收危机在整个拜占庭意大利掀起了一股地方主义浪潮，所造成的种种问题已经开始产生影响。在罗马之外，皇帝重新确立了自己的权威，但事实证明，这只是暂时的。至少在北部，当地地主势力和君士坦丁堡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张，一连串的伦巴第国王迅速抓住机会，零零星星地攫取拜占庭帝国的领土，这些国王包括柳特普兰德、拉奇斯（Ratchis）和艾斯图尔夫。断断续续的攫取过程最终导向了艾斯图尔夫在751年对拉韦纳和五城地区的最终占领，在那之后，拜占庭在意大利的领土只剩下南部的有限区域。与此同时，佩鲁贾公爵领已经依附于罗马共和国，这扩大了后者的权力基础，但总体的战略形势仍不乐观。这个中等规模的共和国不再受帝国保护伞的保护，而是在四分五裂的意大利自己负责自己的防御。它的邻国是略大一些的斯波莱托公国和贝内文托公国（它们都是独立的伦巴第公国），以及北部比它大得多的伦巴第王国。为了自我防卫，教宗最终会到北方寻求法兰克人的支持（第5章），但当时的目的很简单。它的近邻都相对强大，并且都至少对圣彼得共和国的边缘地区有掠夺的意图。从这个共和国诞生的那一刻起，教宗们每天大部分时间都在操心军队、财政收入和外交关系。[注]

然而，这并不是罗马在发展中的拉丁基督教世界中总体地位下降的最根本原因。我们知道，随着教宗制的长期发展，罗马将为维护自己的宗教权威而与中世纪的皇帝发生对抗。由于罗马皇帝本身就有强大的宗教权威，人们很容易忽略一点，即在这一时期，罗马教宗的统治要在西方教会中发挥更广泛的作用，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罗马帝国晚期

的政治结构。教宗的教令不仅在形式上呼应罗马帝国的法令，而且其整体效力也依赖于帝国的存在。尽管条条大路通罗马，但罗马距离大多数地方，哪怕是西部的地区，都很远。在前现代时期，从英格兰到罗马最快的纪录大约是六周。因此，向教宗提出问题不仅过程烦琐，而且代价高昂，因为你将不得不放下其他活动，抽出几个月的时间。然而，由于教会是罗马国家的一个部门，神职人员经常能够使用帝国的国家邮驿系统（cursus publicus）在帝国各处走动。所花费的时间并不会少多少，但这大大降低了向罗马上诉的成本。此外，虽然教宗不太愿意承认，但教宗裁决的有效性实际上取决于帝国对其法律效力的支持。445年，教宗利奥一世甚至不辞辛苦地找到皇帝瓦伦提尼安三世（Valentinian III），从他那里得到了明确的裁决，这一裁决适用于整个（当时的）西罗马："任何事都不应违背或脱离罗马教会的权威。"罗马帝国晚期使罗马对西方教会日益重要的权威结构是皇帝和教宗双重作用的结果，它的运作依赖于帝国的物流和法律结构。[注]随着西罗马的瓦解，帝国的物流和法律结构都消失了，中世纪早期的西方教会形成了新的权威结构，大大削弱了教宗的作用。

在其各自的统治区域内，继承国事实上和法理上的国王都继承了以前属于罗马皇帝的那种宗教权威，至少在他们改信了天主教之后。从克洛维开始，法兰克国王（以及他们征服的所有人）在名义上都是天主教徒。589年托莱多第三次宗教会议以后，西哥特人也变成了天主教徒。从597年开始，就有盎格鲁—撒克逊的国王成为虔诚的天主教徒，到660年左右，那里的国王已经全部改宗天主教。从7世纪的某个时期开始，伦巴第人也变成了信奉《尼西亚信经》的天主教徒。所有这些国王很快采用了罗马帝国的权力意识形态。他们说，他们都是上帝任命的，都是凭借与上帝之间的特殊关系来施行统治的。[注]像罗马帝国晚期的皇帝所做的那样，他们把希腊化王权和《旧约》的模式结合起来，宣称自己并非世俗统治者而是上帝选出来的，一切都是上帝的安排。就像罗马帝国的皇帝一样，他们在意识形态上成了自己领地内实际上的教会领袖。

从我们之前用过的清单看，这些年里西方并没有太多的教义方面的活动。在那个时代，罗马晚期的文化结构正让位于中世纪早期的后继者，而这些后继者的热情不高（大多是非专业人士），所以这也许并不奇怪。但为数不多的教义活动还是显示出同样的模式，即王室的方案在教义、宗教会议和执行中占据主导地位。这方面最好的例子来自6世纪的西哥特王国。国王利奥维吉尔德（Liuvigild，568—586年在位）多次击败法兰克人，恢复了王国的政治统一，他在宗教方面也尝试了同样的手法，试图强制推行一种教义上的解决方案。其王国的西哥特人精英主要是阿里乌派，而占人口大多数的西班牙罗马人信奉的是《尼西亚信经》，他希望自己的解决方案能让双方达成妥协。这个举措失败了，但这是王室的举措，遵循的是罗马晚期的典型模式。在下一代人中，利奥维吉尔德之子雷卡雷德（Reccared，586—601年在位）也采取了一些决定和举措，为王国在589年托莱多第三次会议上正式采用《尼西亚信经》奠定了基础。就像可敬的比德所讲述的那样，在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英格兰，在664年召开的惠特比（Whitby）会议上，国王奥斯威（Oswy）做出了重要的干预，从而确保诺森布里亚王国按照罗马而不是爱尔兰的方法来计算复活节的日期。双方陈述各自的观点后，奥斯威走上前去：

> 然后国王总结道："我告诉你们，看守天堂之门的是圣彼得，我不会违逆他，而是会照我所知和所能，在一切事上遵守他的律例，以免我到了天国的门口，却无人为我开门，因为掌管钥匙的人成了我的敌人。"

教宗在这里绝不仅仅是一个跑龙套的角色，因为教宗的权威最终决定了国王的命运。尽管如此，在一个由国王召集的宗教会议上，国王在听完神职人员讨论技术细节后，自己做出了关键的决定。这其实是在较小的规模上复制了罗马帝国的总体宗教权威模式。[注]

在教会高级职位的任命方面，王室命令的影响力也很大。关于中世

纪早期的很多事情，我们最生动的史料来源是图尔主教格雷戈里的历史著作。书中收录了法兰克教会的许多逸闻，这些逸闻清楚地表明，法兰克国王在其管辖范围内对主教任命拥有最重要的发言权。决定可能会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但到了紧要关头，就得由国王来任命了，没有王室批准的候选人就会落选。格雷戈里经常抱怨这一点，但他在无意中透露，他本人也获得了王室的支持，正是国王西吉贝尔特的支持让他击败了图尔主教之位的竞争对手。但话说回来，丘吉尔还是谁说过，一致性是平庸的标志。我们缺乏来自天主教西哥特王国的与此相当的叙事来源，但尽管存在零星的反例，我相信王室对主教任命的影响在那里也同样明显（十分有趣的是，在伊斯兰征服之后，埃米尔和哈里发继承了这一权利，至少候选人被正式祝圣之前要获得他们的批准）。同样，正如比德在《英吉利教会史》中详细叙述的那样，在盎格鲁—撒克逊的英格兰，如果国王不得不跟因为某种原因他不喜欢的主教打交道，就会出问题。在这种情况下，王权通常也会占上风。注

但是，当我们把注意力转向神职人员和平信徒行为标准的制定和执行时，模式就很清楚了。这一直是罗马晚期教会会议仅次于教义问题的关键工作，而在后罗马时期，基本上依然如此。但是，在公元476年之后，西方的教会结构并不在整个拉丁教会中运作，而是在各个王国的基础上运作。

以法兰克高卢的基督教会为例，511年，克洛维在奥尔良召开了其新王国的教会会议，但随后的活动相当零星。在524年到529年之间，阿尔勒主教该撒留举行了四次改革会议，这是我们所知的唯一一段宗教活动比较集中的时期。但这是在狄奥多里克和阿塔拉里克的管辖之下进行的，他们当时在现在的法国地中海地区占据主导地位。事实上，直到6世纪80年代初，克洛维的孙子贡特朗（Guntram）才有了足够的权力和兴趣来为法兰克王国的主教们发起一系列改革会议，并逐步在全国范围内提高宗教行为和实践的标准。可以肯定的是，这迅速成为一种自觉的传统。有一份非同寻常的手稿，最初来自贡特朗王国中心的里昂，但现在被分割成两部分，分别收藏于圣彼得堡和柏林。这份手稿让我们看到

了这一过程是怎样发生的。在579年第一次马孔（Mâcon）会议之后的20年左右的时间里，主教们所做的就是收集他们能找到的已有裁决，然后通过自己的讨论加以补充。有时，讨论是由他们面前一个特别棘手的案例引起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不但找到了一些额外的会议裁决，还开始在做出新裁决时，有意参考他们已经收集或已经做出的裁决。这项工作最终产生了一部新的教会法规，即《高卢教令集》（*Vetus Gallica*），它按照主题重新排列了既有材料，寻找涉及特定主题的既有法规变得容易多了。这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充满活力的法兰克教会，它在自己的管辖范围内，坚定承担着促进基督教发展的责任。㊟

这个迷人的小插曲把中世纪早期的西方教会生动呈现在人们面前，而如果你只关心教宗制度的发展，就会完全将其忽视。有几点很明显。法兰克教会并不是完全孤立地运作的。对于更广泛的基督教传统，主教们有一种强烈的归属感，而在这个传统中，教宗有一定的作用。特别是，已有基督教传统的基本文本之一是小狄尼修收集的教令汇编，其中既有他对希腊语会议决议的拉丁语翻译，也有他整理的教宗教令。与此同时，这个法兰克教会的运作完全依赖于国王的支持。直到贡特朗开始感兴趣，整个王国范围内的改革才开始启动，我认为，就像以前罗马帝国的皇帝一样，贡特朗可能不仅召集会议，还会支付费用。在处理新问题时，法兰克主教也乐于依靠自己的智力资源，认为根本没有必要考虑罗马的意见。没有迹象表明有罗马观察员在场，也没有人认为他们可能在场。到了7世纪，也许是由于当时王室权力慢慢受到侵蚀，王室的兴趣又减退了，这一传统逐渐停止。据我们所知，整个7世纪只召开了一次会议。

来自西哥特和盎格鲁—撒克逊王国的证据表明，这些王国的运作模式与此十分相似，毋庸赘述。人们从第三次托莱多会议后改信尼西亚基督教的震惊中恢复过来后，新的西哥特王国最终形成了通过一系列王国范围内的会议来运作的传统。这些会议都是在托莱多举行的，但在一定程度上连续性的会议是从633年的第四次托莱多会议开始的。在近50年的中断之后，会议（相对而言）频频召开。不同于6世纪后期高卢的情

况，这些会议既处理教会事务，也处理世俗事务，尽管主教们会自己去处理纯粹的宗教事务。除了这一特征之外，在其他方面，两地的模式完全相同。这些会议由国王召集，会议上产生的教会立法（通常称为Hispana）不断增加，其中包括以前会议的决议和小狄尼修的教令汇编，还有很多墨洛温时期高卢宗教会议（在西班牙传统真正开始时，这些会议已经停止）的决议。虽然他们意识到自己属于一个更大的基督教世界，但是，就像他们同时代的法兰克人一样，他们开始完全靠自己来处理进一步的问题，他们依靠的是自己的智慧和信仰，没有延请外部专家，也没有什么难题被移交给罗马教宗审核。

一个世纪之后，在盎格鲁—撒克逊的英格兰，在所谓的麦西亚称霸不列颠南部时期，宗教会议的传统确立下来。麦西亚国王召集会议，会议涵盖的地理范围与国王的权力范围吻合。虽然这里的主教们同样意识到一个更广阔的基督教世界的存在，但他们也通常自己做主处理事务。唯一一次请来外部专家是在国王奥法有所图的时候。当时，奥法已经征服了坎特伯雷大主教辖区所在的古老的肯特王国，发现在英格兰南部省份有位最高宗教首领是件棘手的事，因为其范围大致相当于他自己王国的边界地区，而这些地方（按照不列颠的标准）远离他王国的心脏地带。因此，他想把教会一分为二，在位于他王国中心的利奇菲尔德（Lichfield）建立第二个大主教辖区。为了顺利获得教宗的批准，他在786年邀请了两位教宗使节。这次会议的记录读起来很有趣。在一次盛大的高级别会议上，人们记下了对最前沿的宗教思想达成的共识，例如，儿童应该全部接受洗礼。后来，在参加几次宴会并签署联合公报之后，教宗的使节就回去了。这完全是一场公关活动，没有处理任何棘手的问题，也没有建立任何执行机制来检查双方讨论的各种陈旧目标的后续进展。就这样，国王给了教宗特殊待遇，但自己并没有付出任何代价，而且，这么做奏效了。就在几个月后的787年，利奇菲尔德被查理曼的朋友哈德良一世正式宣布为大主教区，尽管这种状态不会持续太久。奥法死后，麦西亚的霸权遭到削弱，教会事务被政治风向所左右，对此你现在应该已经很熟悉了。803年，教宗利奥三世恢复了坎特伯雷

的主导地位，这种情况一直延续至今。(注)

甚至这段插曲也仅仅是强调了这样一个中心思想：罗马教会仍然享有很高的威望。在西部，罗马教会的地位独一无二，因为没有其他使徒根据地了。前往纪念建筑和殉道地朝圣的人流也没有中断过。此外，在伊斯兰征服后，圣地更加难以进入，去罗马朝圣的人可能还增加了（尽管没有全面的调查）。由于君士坦丁之前罗马帝国的迫害，罗马到处都有殉道者和圣人，因此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珍贵圣物，开国者们喜欢用这些圣物为他们建造的教堂增光添彩。(注)在罗马晚期，特别是在5世纪，在瓦伦提尼安三世（425—455年在位）统治时期以及之后的一段时间里，皇帝们都回到了罗马。在某种程度上，作为西罗马的首席主教，以及在教会问题上潜在的最高仲裁者，教宗一直能够发挥作用。但是，在帝国崩溃的混乱中，这一切都停止了。当尘埃落定，西方教会在王国大小的单元之中运作，而这些单元之上并没有统管的权威结构。在这种情况下，中世纪早期，加洛林时代之前的教宗逐渐获得了一种新的、更大的权威，将宗教和世俗职能结合了起来，但只能在自己有限的政治边界内行使。不再有西罗马皇帝之后，教宗失去了支持，而有了这种支持，教宗才有可能在整个拉丁基督教世界行使更广泛的宗教领导职能。在加洛林王朝时期，这一职能没有得到任何实质性的恢复，尽管最初的一些迹象与此相反。

教父（中）

回顾起来，可以说加洛林时期是圣彼得的继任者取得了巨大进步的时期，所以他们才在中世纪中后期拥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在意识形态方面，丕平和查理曼二人伟大的加冕时刻将被用来表明，圣彼得的继承人有权担任政治仲裁者，这一观点完全符合《君士坦丁赠礼》的主张。实际上，丕平是先让法兰克人推选自己为国王的，但人们记住的却是那封所谓的信，以及教宗对丕平的肯定答复。同样，利奥三世不情不愿地

为查理曼加冕，但由于教宗制度的历史比加洛林王朝长得多，这一事件被载入史册，用来表明教宗在所有皇帝加冕礼上都不可或缺。这不是查理曼的观点，毕竟给他儿子加冕的是他自己。但这些意识形态上的收获是经过较长时期才显露出来的，查理曼和虔诚者路易通过一些更直接的方式提高了教宗在西方神职人员心目中和工作生活中的地位。

尤其重要的是，查理曼的慷慨再次大大提升了教宗的地位。8世纪70年代后期，教宗哈德良给查理曼写了一封又一封急切的信和支持文件，查理曼所做的是对这些努力的绝佳回报。教宗收入的增长无法具体计算，但显然增加了很多，在差不多同时代的教宗传记《教宗名录》中，其惊人规模得到了反映。之前的教宗，如斯德望二世（752—757年在位）和保罗一世（Paul　I，757—767年在位），有钱翻修供朝圣者使用的慈善旅馆（xenodochia）和一座公认的大修道院；而新的收入使哈德良一世（772—795年在位）和利奥三世（795—816年在位）掀起了一股翻修、建筑和捐赠的热潮，获益的同样是罗马这座城市的世俗和宗教基础设施。

从他的投资来判断，哈德良一世很有城市规划的眼光。据记载，他曾在罗马防御工事的一次大规模修复中投入了整整100磅黄金。他还使罗马的3条古老的引水渠恢复正常使用，它们分别是萨巴提那水渠（Sabbatina）、维尔戈水渠（Virgo）和克劳狄水渠（Claudian）。哈德良还下令对圣彼得大教堂前的河岸和柱廊进行大规模的修复。这些是相当多的成就了，但仅仅是记录中的一小部分，记录中还包括圣彼得大教堂主入口处一套新的宏伟的青铜大门。而利奥三世的传记基本等同于他的捐赠清单，几乎没有别的内容。有些遗漏是故意的。《教宗名录》没有提到他在为查理曼加冕后向查理曼行跪拜礼的事情，也没有提到813年罗马贵族第二次反抗他的权威。但是一些不那么有争议的事件，比如他第二次去法兰克王国，也没有被提及。这一传记主要记录的是利奥三世对罗马各种宗教机构捐赠。特别是在807年的条目下，作者插入了一份未加修饰的捐赠清单：

我们救主的君士坦丁教堂，纯银皇冠，23磅

圣母在马槽旁大殿，纯银皇冠，13磅3盎司（1盎司≈0.03公斤）

越台伯河的圣母大殿，银皇冠，13磅3盎司

圣母古教堂，银皇冠，13磅

圣母与诸殉道者教堂，银皇冠，12磅3盎司

科斯梅丁（Cosmedin）圣母教堂，银皇冠，12磅

清单上接下来还有许多项目，总共有119件银器被送给了罗马城的不同宗教机构。据计算，利奥时期赠送的贵重金属礼物总共有1 000磅重。在8世纪晚期和9世纪早期的罗马，查理曼的捐赠远比君士坦丁赠礼重要得多，它为从供水到辉煌教堂的圣城全面整修提供了资助。[注]

由于查理曼的宗教政策，教宗在帝国大部分神职人员的思想中占据了更重要的地位，因为查理曼认为罗马是真正的基督教传统的发源地。特别是当他或他的教会人员在寻找未被篡改的主要宗教文本时，罗马是他们首选的目的地。早在774年，查理曼就向哈德良索要并获得了罗马最新的教会法。这部教会法令集被称为《小狄尼修—哈德良教令集》（*Dionysio-Hadriana*），是小狄尼修收集的教规和教令经过少许更新的版本。这仅仅是个开始。查理曼还从罗马获得了几本最好的拉丁文《圣经》，以及在那里使用的几本主要祈祷书。他还从这座城市引进音乐教师，教高卢教会的人如何以罗马的方式举行弥撒。自罗马帝国晚期以来，与罗马还没有过如此频繁的接触，这一过程明确肯定了罗马在确定“正确”基督教一事上的中心地位和权威。

由于查理曼的关注，教宗变得更加富有，得到了更多人的拜访和讨好，也获得了极大的尊重，但所有这些收获都是有代价的。查理曼对教宗的尊敬是真诚的，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他同样深信，他也有自己的热线可以与全能的上帝通话。他不是圣彼得的附庸，而是可以毫不

犹豫地利用教宗为自己服务，正如我们在加冕典礼前所看到的，因为这也是上帝的旨意。查理曼也不害怕与教宗意见相左，即使是在教义问题上。这方面最好的例子是法兰克福会议。在那里，查理曼当着教宗的面（至少是当着教宗使节们的面），让他的神职人员宣称，教宗哈德良接受君士坦丁堡关于圣像的新教义，这种做法是错误的。另一个不那么激烈的争议是著名的“和子”纠纷。这是对《尼西亚信经》的补充，但实际上是381年君士坦丁堡会议的信条。根据这一信条，圣灵是“由父和子而出”（“filioque”的意思是“和子”），而不仅仅是“由父而出”。东正教从来没有接受过这一点，这仍然是不同信仰之间讨论的关键所在。这个短语和它背后的教义都是在中世纪早期的西方发展起来的，8世纪90年代后期，查理曼和他的教会人员正式将其作为他们信仰的一部分，并在整个帝国加以推广。然后他开始左右教宗利奥。利奥进退两难，因为他深知这句话将在东部基督教世界掀起一场风暴，那里强烈抵制对传统教义的措辞做出任何改变。利奥最终同意其基本教义是正统的，但认为最好不要胡乱改动这一信条，以免与君士坦丁堡发生冲突。直到1014年，“和子”说才在罗马城被正式采用，但毫无疑问，就连教义的正统性，查理曼也觉得自己完全有资格用自己的判断来决定。注

因此，可以确定，查理曼属于一个延续了差不多500年的传统。从君士坦丁时代开始，就连确定正确教义都属于信仰基督教的统治者的职责范围，查理曼对罗马的态度不过是直接延续了这一传统。回顾一下我们之前的清单，难免得出这么一个结论：查理曼无疑是他领地内基督教会的首脑。他任命所有的高级神职人员，召集所有主要的宗教会议，其余的会议也要经过他的批准，而且，针对神职人员和世俗人士的大量实用性法律指导是以他的名义制定的。

然而，尽管这些都是事实，但这么推论有些死板，而且可能忽略了加洛林王朝时代的一个重要方面。当然，查理曼是教会的领袖（在他之后的虔诚者路易也是），无论是在事实上，还是在法理上，都和罗马帝国的皇帝一样。教宗共和国的首脑继承了使徒的衣钵，虽然大多数神职人员承认这一点，但他们甚至从来没有想到过，他竟然可以去追求至高

无上的宗教权威，因为这种权威是上帝赐给国王和皇帝的。这很有道理，但在查理曼的指示下，更有趣的事情发生了。查理曼的帝国疆域辽阔，他拥有充足的经济资源，他和他的教会领袖们又都很有野心，因此，他们要发起一项非凡的基督教改革计划，而这将改变整个西方教会。

在789年3月23日于亚琛颁布的《大劝谕书》（*Admonitio Generalis*）序言中，其原则得到了最完整的阐述：

> 我们不但要尽心尽性、用声音不住地感谢上帝的恩慈，更要不断地多行善事，以歌颂上帝的荣耀。他将如此崇高的荣誉授予我们的国家，也可以保证永远保护我们和我们的国家。因此，我们很高兴地要求睿智的你们，作为基督各教会的牧者、群羊的首领和世界上最杰出的人物，一定要谨慎小心，刻苦劝诫，带领上帝的子民到永生的草场。通过示范作用和谆谆教导，竭力把犯错的羊带回教会堡垒的城墙之内，不要让埋伏的狼发现有人违反了教规或大公会议的先祖们的教导，并将其吞噬。千万不要发生这样的事情！

为了让基督教文明在世界上获胜，上帝给了查理曼前所未有的胜利，国王（查理曼在789年时还是国王）有责任让王国配得上上帝的恩惠。这篇非凡的文本共有82条条款，内容范围从关于纯洁生活的一般性思想，到关于如何祈祷的十分具体的指导，还提到了使用可靠的度量衡和在法庭上公正审判的重要性。对于查理曼及其世俗的和教会的主要顾问来说，国家和教会之间，世俗的和神圣的之间，并没有什么区别。查理曼帝国建立就是为了执行上帝的意志，这不仅包括它的宗教，也包括它运作的所有其他方面。这样的认识绝对符合罗马帝国的意识形态，实际上是其主要影响的具体呈现，而且呈现得淋漓尽致。在查理曼整个统治时期，这一原则始终得到维护，在812年对查理曼意图的概括性描述中，这一原则以更加简洁的形式再次出现，而做出这一描述的是他宫廷中最重要的教会知识分子之一。内容如下：

> 对他来说，这些一直很重要：敦促主教探究《圣经》和审慎合理的教义，敦促教士严守训导，敦促哲学家追求关于神圣和世俗之事的知识，敦促修道士更加虔诚，敦促所有人更加圣洁，敦促大主教更加睿智，敦促法官更加公正，敦促士兵更加高效，敦促高级教士更加谦卑，敦促臣民更加驯服，敦促所有人更加谨慎、公正、坚韧、节制、和谐。

审判者审判、兵丁操练、主教读经，所有这些都可以同时谈论。加洛林王朝的方案认为这些活动在性质上没有根本区别。在上帝创立的帝国里，一切都必须遵循上帝的意志。㊟

因此，就像许多征服者一样，查理曼对自己的重要性有一种夸大的认识，而且有足够的智慧将其转化为条理清晰的原则声明，这可以用拉丁语correctio（修正）一词来概括，即希望按照基督教完美的模式来修正普遍的生活方式。我们为什么要对这些说要在世上建立上帝的社会的荒谬言论如此关注呢？正如政治叙述已经向我们表明的那样，查理曼死后，他自己的家庭甚至连表面上的兄弟之爱都维持不了，而在9世纪的整个法兰克王国，也基本没有基督教价值观大爆发的迹象。尽管这样，查理曼的计划仍然十分重要，不仅过去如此，现在依然如此。国王和他的神职人员不仅宣告了这个梦想，还试图将其变为现实。由于他前所未有的征服，查理曼有大量的资源投入他自己的事业，也有足够的影响力让其他人也加入这个项目。首先，查理曼得以在宫廷里聚集大量学术专家，包括他能从西欧各个角落找到的最好的学者，如约克（当时拥有西方基督教世界最好的图书馆之一）的阿尔昆（Alcuin）、西班牙的狄奥多尔夫（Theodulf）、比萨的彼得和意大利的助祭保罗，这些仅是其中最著名的人物。这些学者的流动集合（随着时间的推移，学者们来来去去）是一种独特的文化精英的汇集，只有拥有查理曼那样的财富和影响力的统治者才有可能聚集这些人才。这些人除了给他写一些短小诙谐的赞美诗并钩心斗角之外，还参与了查理曼宏伟的基督教改革计划。他们和查理曼以及他的大部分主要的世俗和教会顾问一起，组成了一个团

队，致力于建立《大劝谕书》中所设想的基督教社会，这一切使西方拉丁基督教会彻底改变。㊟

实现这一梦想的第一步，是敦促帝国神职人员更全面、更准确地理解真正的基督教传统和实践。而要想达到这一目的，最好的，实际上也是唯一的方法就是让重要文本更容易获得。通过这些文本，已经验证和可以验证的基督教传统——基督教的核心内容——已经被定义和传播了几个世纪。很明显，这里说的文本包括《圣经》，但《大劝谕书》也提到了教会法，即教规，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包括为即将到来的更公正的新时代背书的非宗教法律书籍，以及没完没了的圣经注释，等等。人们常说，基督教是圣书的宗教，查理曼和他的教会成员完全理解这一点。查理曼的"修正"计划必须从书本开始，而812年的改革会议（我们后面还会讲到）就准备确定到底哪些书重要。建立一个基督教社会的关键文本是《新约》里的福音书和《使徒行传》［由于中世纪手抄本的体积，单卷本的完整《圣经》（称为pandects）当时还非常罕见］、礼拜手册、教父著作、针对修道士的《圣本笃会规》（*Rule of Benedict*）、教宗格列高利对主教和司铎的《司牧训话》、教会法规，以及针对世俗官员的世俗法典。㊟在8世纪晚期的法兰克王国，获得和分发足够好的关键文本远非易事。书本当然是罕见的，豪华本极其昂贵，为了抄写林迪斯法恩福音（Lindisfarne Gospels），耗费了1 500多头牛的皮，但更大的问题在于如何找到众人认可的"正确"版本。

有时，在文本原文是希腊文的时候，许多不同的拉丁语译本就成了问题，《圣经》就是典型的例子。在罗马帝国时期，有4种不同的拉丁语译本。到了8世纪晚期，几个文本传统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混到了一起，要想弄清楚其中任何一个译本最初说了什么，判断某段经文的最佳翻译出自哪个译本，无异于一场噩梦。

但是，还有一个更根本的问题。随着罗马晚期精英阶层读写文化的消失，专业的语言教师（文法学家）不再教授拉丁语，而以前在罗马帝国大部分较大的集镇都能看到他们的身影。在罗马时期，这些语法学家

编写了复杂的语法规则书，定义了古典拉丁语的各种“正确的”词尾，而这些书是折磨今天的年轻人的拉丁语语法书的祖先。可以说，语法学家一起人为阻止了作为罗马精英的口语和书面语的古典拉丁语发生太大的变化。但是随着精英阶层向军人而非平民的职业转变，语法学家们失业了，就像语法学家在公元500年之前的阿尔卑斯山以北和大约一代人之后的意大利所经历的那样，阻碍语言正常变化过程的语法大堤被冲破了。庞贝城的涂鸦表明，在不那么显赫的圈子里，语言的变化早就开始了，变化很快蔓延到了精英阶层。日常生活中，人们似乎渐渐把原本能体现不同格词尾的发音混在了一起，这样随意的发音使很多古典拉丁语的语法结构随之消失。从长远来看，这一过程让拉丁语衍生出了罗曼语系的各种语言（如法语和西班牙语），这些衍生语都可以被视为基本没有变格词尾的拉丁语。在这些语言中，句子中的词序发挥了更大的作用（就像现代英语），因为词尾已经失去了传递意义的能力。在精英阶层中，这一过程从5世纪开始在不知不觉中逐渐发生，然后逐渐进入文本文化，不仅影响了新的作品，也影响了对以前经典文本的抄写。结果是一团糟，即使是受过教育的神职人员也未必能意识到，他们努力使用的古典拉丁语实际上是拉丁语和罗曼语的混合。正如查理曼在著名的法令《论文化学习》（*On the Study of Letters*）中所言：

> 近年来，各修道院给我们寄来了许多信，告知我们居住在那里的弟兄们为我们做了神圣和虔诚的祈祷。在他们的大部分书信中，我们发现情感很真挚，但是语言很粗俗。虽然敬虔生活非常重要，但忽视学习、没有受过教育的人是不能毫无瑕疵地表达其虔诚的。注

查理曼和他的团队必须与这个更广泛的问题做斗争，才有可能为西方教会提供基督教关键文本的正确版本，于是他们兴致勃勃地开始了。有个办法是去找教宗，因为如果其他地方不行，在罗马应该能够找到基督教传统关键文本的正确版本。虽然罗马在这方面有所帮助（《大劝谕

书》中关于教会法的内容对罗马教宗提供的《小狄尼修—哈德良教令集》多有借鉴），但事实证明这是不够的。教宗提供的一些书并不真正符合法兰克人的语境，罗马的弥撒书就是如此，它缺少法兰克人世界需要的一些阅读材料。更普遍的问题是，人们发现甚至罗马拉丁语也不够古典。为了找到合适的解决方案，查理曼决定从头开始，让他的学者们研究主要的基督教文本，形成“正确的”版本，然后分发给查理曼帝国的主要宗教中心——大教堂和主要的修道院。例如，阿尔昆不得不做最苦的差事，他分到了《圣经》中的福音书和《诗篇》，这些文本对基督徒的理解和礼拜仪式来说都非常重要，仪式中使用的许多经文都是从这里摘录的。

但是，要让这一切正常运转，还需要更多彻底的改革。如果编辑过程要产生持久的影响，就需要在西欧的教会人士中更广泛地传播“正确的”古典拉丁语知识。否则，每当抄写文本时，抄写员都会在不知不觉中重复以前的错误。因此，对加洛林王朝的“修正”方案来说，需要与编辑工作同时进行的绝对必要的工作，就是强调学习“准确”的拉丁语，而对于查理曼及其顾问来说，这指的是他们自己的古典语言的版本。他手下最优秀的拉丁语语法学家承担了这一任务，尤其是阿尔昆和比萨的彼得，他们提出了一个三步走的策略。罗马帝国晚期专业拉丁语教师所编写的教学文本被拂去灰尘，重新抄写，并广为传播，特别是多纳徒（Donatus）和普里西安（Priscian）的作品。其次，他们加上了一些自己写的新教学文本，特别是阿尔昆关于他们试图恢复的那种造作语言该如何发音的作品。事实上，盎格鲁—撒克逊人阿尔昆是将拉丁语当作一门外语来学习的，因此，和一些混用了拉丁语和罗曼语的欧洲大陆语法学家相比，阿尔昆在教授新标准方面是更好的老师。注第三，学者们开始抄写和传播大量的罗马经典文本，涉及从古代天文学到卡图卢斯（Catullus）的情诗的各种体裁。

在接下来讲著名的加洛林文艺复兴之前，我们有必要先考察一下它的轮廓。简单地说，多亏了查理曼召集的学者们所建立的抄写传统，绝大多数现存的古典拉丁语文献才流传至今。任何在8世纪晚期和9世纪早

期没有被抄写下来的东西（我们知道有很多东西是缺失的）都没能保存下来。因此，如果没有查理曼召集的学者，古罗马的许多文化成就将完全湮没。

根据14世纪的原型，“文艺复兴”的意思是对古典文学本身兴趣的复兴，就这个意义而言，用它来描述加洛林时期发生的事情显然不够恰当。查理曼的学者之所以会对古典拉丁语文本感兴趣，主要有两个原因：要么是因为它们有助于学习拉丁语，包括其罕见的语法怪癖，要么是因为它们包含了任何受过教育的基督徒可能都需要知道的有用知识。这可能导致他们忽略了一些古典文本，这些文本好不容易保存到了8世纪晚期，后来却被丢弃，因为加洛林王朝的基督教学者认为它们没有用处。就加洛林文艺复兴而言，这确实是十分重大的问题：加洛林王朝的废纸篓有多大？他们是基本上抄写了他们发现的所有东西，还是扔掉了很多？对此不可能有确定的回答。你可能会认为卡图卢斯作品的幸存表明他们几乎把一切都抄写下来了，但也许加洛林王朝的修道士认为，这些拉丁语的性描写中有一些非常有趣的语法点。无论哪一种观点更正确，我确实倾向于“多数被抄写下来了”的观点。查理曼的学者们在文化上更广泛的重要性是不可否认的。注

事实证明，情况就是如此，这也告诉了我们一些重要的事情。查理曼的学者们最终成功地将他们修正过的文本，以及古典拉丁语的知识（这种知识确保他们的复制是准确的）嵌入了西方教会的结构。这也是项目最初设计的一部分。查理曼的学者们很多都是严肃勤奋的知识分子，但人数并不多，最多只有几十个人。如果他们只着眼于“修正”及其所必需的文化基础设施，这个项目的影响只能是有限的。例如，现存的与查理曼的宫廷有直接联系的抄本不过十几份。注但是在整个加洛林时期，大约有9 000份抄本流传下来（包括现存的全部古典拉丁语文学），其中很多包含了多部作品。换句话说，这些学者的努力之所以能够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是因为他们的价值观和成果成了9世纪整个西方教会知识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一结果所需的两个工具已经存在，等待着发挥最大的作用。第一个工具是技术方面的，是一种新型的书写体，即今天所说的加洛林小写体。在查理曼时代之前，这种书写体的变体就已经开始得到使用，它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比更古老的安色尔字体更小、更草。也就是说，用这种字体可以写得更快，页面上也能容下更多的文本。因为羊皮纸价格很高，抄写时间很长，所以抄本非常昂贵；在这样的情况下，加洛林小写体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加洛林王朝的"修正"项目认为这种特殊的草书小字是最好的书写体，于是，这种书写体理所当然地战胜了所有的竞争对手。我们9 000份加洛林王朝手稿中的绝大多数用了这种字体（眼神犀利的人能分辨出不同抄写员的笔迹，但我没有这种本事）。注

加洛林小写体本身就可以加快书籍的生产，降低成本，而"修正"项目也用其他方法加快了产出。随着加洛林时期的到来，宗教机构有了更多的钱可以花，这些钱部分是查理曼从征服中获得的财富。据我们所知，他没有创建任何修道院，但他确实给修道院捐了很多钱，正如他给很多大教堂捐了很多钱一样。例如，在他的遗嘱中，帝国之内所有的大主教区都得到了特别的豁免。而从结构上看，正是在加洛林王朝时期，什一税的实践在西方教会中牢牢确立下来。在这方面，查理曼并非创新者。在他的父亲丕平和伯父卡洛曼召开的教会改革会议上，什一税已经成为重要内容，而什一税正是有待充分利用的第二个工具。查理曼坚持征收什一税，并用他的法律权威来支持这项要求。其结果是，名义上有整整10%的国内生产总值（几乎相当于发达国家目前在医疗保健上的支出）可以被用于宗教目的。当然，通常的规则也适用于这里。什一税属于宗教机构，但地主阶级的不同成员对这些机构拥有权利，包括分享其什一税。因此，在实践中，并没有10%的国内生产总值被用于宗教目的。然而，教会的收入无疑大幅增加，加洛林王朝进一步的改革措施也确保一些额外的钱花在了拉丁语教师身上，还有些钱花在了抄写那些被查理曼的学者认为是基督教重要工具的文本上。注

从《大劝谕书》开始，他们就非常重视大教堂和修道院各自办学的

重要性。这是查理曼立法的标准要求，在很多场合都得到了重复。查理曼和虔诚者路易还推动了一些更具体的改革，这些改革涉及生活在大教堂和修道院的人们的生活方式，而这些都增加了压力。与教堂教规相关的神职人员改革在查理曼之前就开始了，但他加倍努力使之成为现实，而改革的关键是需要学校和书籍，以及对基督教文化的更大投入。

隐修制度也是如此。在加洛林王朝之前也有一些修道院的院规，通常涉及某种信仰方面的指导，但院规的数量有所不同，因为大多数修道院有自己的特殊规定，这些规定是对一些最著名的院规的调整，比如最初在6世纪为意大利的蒙特卡西诺（Monte Cassino）修道院制定的《圣本笃会规》。在查理曼等人，尤其是虔诚者路易的统治下，加洛林王朝要求更严格地遵守《圣本笃会规》，不允许对其加以删减和混合，但他们用的已经不是最初的《圣本笃会规》了。路易大力支持这一规程的修订版，其中包括一个非常重大的变化。最初的规程将修士一天的活动分为三个相等的部分：祈祷、劳作（体力劳动、种植修道院所需的粮食作物）和学习。修订版是由另一位本笃起草的，即阿尼亚讷的本笃（Benedict of Aniane），他提倡将一天的活动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祈祷，一部分是学习。体力劳动现在由那些不完全属于修道院的非神职人员来做。这次修订还包括了其他一些变化，但是强调学习还是最主要的。(注)

因此，在基督教改革方面，查理曼并不是只说些虔诚的陈词滥调。他和他的学者们希望借助经过深思熟虑的彻底改革方案，来提高整个帝国的基督教文化水平。这一方案不仅要解决书籍短缺这样表面上的问题，还寻求彻底改革教会的文化基础设施，以便让真正的基督教文本以及确保其正确性的知识在整个帝国传播开来。我们马上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教宗在这一切中的作用微乎其微。所有的动力都来自查理曼的宫廷。他付了钱，学者们要么听从他的指挥，要么得到了他的认可。在《查理大帝与教宗利奥》那一章的开头，我们所看到那种承担统管责任的形象准确地反映了现实。正如查理曼在写给新教宗利奥三世的第一封信中所阐述的：

> 我们的职责是在上帝的良善帮助之下，从外部保卫基督的圣洁教会，以武力对付异教徒的入侵和破坏，在内部加强对普世信仰的认识。至圣的教宗，你要像摩西一样，向上帝举起双手，支援我们的斗争。借助你的代求，借助上帝的引导和赐予，天下的基督徒应该能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战胜圣名的敌人，让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名在整个世界获得荣耀。(注)

这是我最喜欢的中世纪早期文献之一。教宗不过是查理曼手下负责祈祷的高级副总，而查理曼本人则是教会的总裁。当哈德良和利奥忙着用查理曼给他们的钱美化罗马的宗教景点时，查理曼却在改革整个西方基督教世界。这一努力令人印象深刻，查理曼作为教会领袖的地位是不可否认的，但“修正”计划到底取得了什么成果呢？

我们这个时代的基督教？

这个计划显然没有实现查理曼创建一个基督教社会的伟大梦想。没有人会真的认为，查理曼接近了他要建立一个值得上帝支持的“更好”（甚至“更大”）的社会这一目标。要知道，虔诚者路易发现亚琛的宫殿里到处都是妓女，帝国的统治充斥着腐败，而且9世纪的加洛林政治进程丝毫没有基督教的味道。但是，路易的批评借用了梦的修辞，公平说来，无论是这些皇帝，还是他们的神职人员，都努力将查理曼对帝国基督教基础设施的更新，转化为神职人员和平信徒对基督教更高层次的虔诚。

大部分努力都是神职人员做出的，这很好理解。没有神职人员的响应，“修正”计划就无法对平信徒产生丝毫影响。该计划不是空谈虔诚的陈词滥调，而是采取了很具体，也很有针对性的措施。在查理曼统治早期，教会内部的等级制度（其中一些似乎已经失效）得到了全面恢复。正如在尼西亚会议上所规定的那样，大主教的权力在王室的立法中得到

重申，这正是为了使大主教能够对那些不积极响应的主教施加影响。接着还会有定期的询问，检查做了多少工作。然后，在查理曼统治末期，召开了一系列的改革会议。我们知道，会议于813年在阿尔勒、沙隆、美因茨、兰斯和图尔举行，可能还有其他的会议。这些会议的目的是向所有的神职人员重申，他们能对查理曼所设想的基督教社会做出什么样的贡献。

然而，神职人员只是影响平信徒的一种手段，改革会议也重申了这一点。会议上第一次阐明了一项原则，即神父必须以其会众的本族语言布道，不论这是什么语言。这集中体现了当时的一种新观点：布道是教育平信徒的关键方法，非常重要。这种观点在查理曼整个统治时期的声明中都有体现，在这方面学者们再次提供了具体的帮助。教宗格列高利的《福音书布道文四十篇》（*Forty Homilies on the Gospels*）被修订、抄录和传阅，人们还编了一些新的文集。助祭保罗整理了伟大教父们存世的布道文，查理曼这样盛赞其最终成果：

> 助祭保罗通读了不同天主教神父的专著和讲章，择其精华，为我们提供了两卷毫无瑕疵的布道文，适用于全年各个节日。我们用敏锐的判断力审核了所有的文本，凭我们的权威批准了上述两卷布道文，交给各位敬虔的人，以便在基督的教会中诵读。

这是加洛林王朝“修正”计划的完美快照：确定一个重要文本的“正确”版本，交给国王兼皇帝批准，整个帝国内只允许使用这个版本。在查理曼统治末期，拉班努斯·毛鲁斯（Hrabanus Maurus）编纂了另一部大型的布道文集。㊟

该计划也处理了平信徒信仰生活的其他方面，以及为他们提供布道的问题。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查理曼统治时期，主教法规开始出现。这仅仅是一个延续了几个世纪的传统的开端，但是现存的5部法规可以追溯到813年改革会议之前。在这些法规中，主教为其教区的神父们规定

了在向会众讲述宗教体验时应该强调什么，在不同的地方，其内容大相径庭。例如，在列日，戈伯德（Gerbold）主教觉得只能强调平信徒的基本职责，即给他们的孩子施洗和付什一税，这是最基本的基督教常识了。在更西边的奥尔良，狄奥多尔夫主教的目标比较宏大，包括要求平信徒参加礼仪年的禁食和守夜。这表明，在法兰克王国内部的不同地区，宗教虔诚的程度有很大差异，但真正值得注意的是法规本身。无论当时基督徒的虔诚程度如何，法规这一形式表明主教们已经准备好去影响教区内每个人的宗教体验了。

在我看来，这一点很有意思。正如查理曼对教育和基督教文化的改革一样，加洛林王朝“修正”项目的各个方面都出现了值得注意的务实转向。另一项帝国立法坚持认为，新的祈祷书（改编自哈德良向北送到高卢的罗马式祈祷书）应该在整个帝国范围内使用，而且，所有的平信徒都必须学习《使徒信经》和《主祷文》。当然，这个方案并没有让人们像查理曼在《大劝谕书》中明确表示的那样，在道德意义上更加虔诚，但它显然影响了一般的宗教体验。大主教们向主教们施加压力，主教们通过改革会议和他们制定的法规为神父制定新的宗教标准。对于平信徒来说，这一努力至少催生了新的教会仪式（虽然过程很缓慢），也对他们提出了新的要求。我有理由相信，作为一个绝对的最低要求，《使徒信经》和《主祷文》确实在整个帝国内得到了传授。所有这一切仅仅是一个极其漫长的过程的开始，而且还有许多限制因素：毫无疑问，某些地方的神职人员会抵制，而且书籍依然短缺。但重要的是，这个过程毕竟开始了。不管有什么限制，查理曼都用他的宗教权威确定了基督教的信仰，这种信仰适用于他帝国之内的每一个人。[注]这是第一次尝试如此彻底的计划，任何缺陷与此相比都不重要。正如约翰逊博士对一条用后腿走路的狗的评论，关键不在于这件事做得好不好，而在于这件事有人做了。

但是，除了这些相对来说好坏掺杂的记录，至少从长期来看，查理曼在一个领域内取得了绝对而明确的成功，那就是他彻底改革西方教会文化结构的尝试。在查理曼和他的知识分子所启动的计划中，这个部分

的所有关键方面都成功了。他们的古典版本的拉丁语成为教会的语言，一直延续到现代，这是加洛林王朝举措的直接结果。这也间接表明，加洛林王朝对教育和抄写文本的重视成功地改变了西方教会生活的总体文化。大教堂和修道院确实成了教育中心，建起了相应的图书馆，它们能够教导、保存和传播基督教文化，并按照所希望的模式来举行宗教仪式。从9世纪中期开始，一些修道院图书馆的目录流传下来，修道士们对他们的藏书按功能做了分类：祈祷书；与修道院有更广泛关系的著作，包括院规、教规和圣徒传记；最后是教科书，包括语法、修辞学和历史。于是，在帝国的180座大教堂和700座大修道院中，共同的拉丁基督教文化得到了维护和发展。查理曼的学者们成功汇集了自己的专业知识，并确保基督教的关键文本现在安全保存在数百个不同的机构中。

但是需要强调，这是一个长期的结果。我们不太清楚新知识、新学校和新书籍是以多快的速度渗透到以前的修道院和大教堂的。从查理曼在遗嘱中特别提到它们来看，根据“修正”计划的一般运作方式，可以确定他的所有大主教所在的大教堂很快就加入了这一行列。还有一些与王室有联系的大修道院，如富尔达（Fulda）修道院、莱歇瑙（Reichenau）修道院和圣加尔（St Gall）修道院，这些修道院似乎在很早的时候就采用了基督教文化的新标准。对于新知识传播到较小的主教区和修道院的速度，我们不太清楚，但是，从虔诚者路易统治时期以及之后对改革需要的强调来看，最好不要认为其速度很快。虽然如此，查理曼的许多知识分子以及他们的学生都是教师，这些学者的个人影响，加上王室的立法，在为教会文化的新标准赢得广泛接受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们可以肯定，至少到了查理曼孙子们的时代，在旧帝国范围内的几十个机构里，已有很好的证据表明新的拉丁教会文化在蓬勃发展。新标准在神职人员中赢得越发广泛的受众，也在继续影响平信徒的宗教体验。注

查理曼临终时对这一切有什么样的想法，这的确让人好奇。他是有了一种成功的感觉，还是越发意识到，到当时为止，新文化蓬勃发展的中心仍然相对较少，而且许多教会仪式仍未像他所希望的那样进行？从

带有现代偏见的视角看，这个计划的道德方面看起来完全没有希望，因为即使你让人们更加虔诚，他们也不一定会在道德方面表现得更好。老谋深算的查理曼也许想到了这一点。至少就历史重要性而言，查理曼的非凡成就远远超过了任何缺陷，尽管这些成就完全显现还需要一点时间。最重要的是，后罗马时期的教会分裂已经被皇帝至高无上、不受挑战的宗教权威所扭转。整个帝国现在只有一种基督教文化，基督教不再以单个的王国为基础运作（不列颠群岛除外）。事实上，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正是查理曼的改革方案首次促成了拉丁西方基督教世界的诞生，因为它确定和传播了共同的拉丁基督教文化，而后来这种文化将把这个基督教世界团结起来。一度创造西方基督教世界的皇权不复存在后，这个世界会发生什么？这一过程最终是如何孕育出第二个罗马帝国的？这些将是本书最后一章的主题。

---

1. 《圣经·马太福音》16：18—19。
2. Godman（1985），197–207提供了文本及其译文，很方便查找。Godman（1987），82 ff. 提供了比译文脚注更详细的讨论，包括艾因哈德作者身份的问题。
3. 革利免一世和伊格纳修的书信的翻译，见Staniforth（1987）。关于教宗维克托一世，见优西比乌《教会史》 5.24。关于罗马基督教社区的早期发展，见Ullmann（1970），c. 1。
4. 更充分的探讨见Jones（1964），c. 22。
5. 参考Ullmann（1970），12 ff.; Jasper and Fuhrmann（2001），7–22有参考书目。
6. 可以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应该在这里引用的文献汗牛充栋。Chadwick（1993）是一本精彩的英文概论，此外还有对具体问题更加详细的讲述，如Hanson（1988）（所谓的阿里乌派争论）；Burrus（1995）（普里西利安派争议）；Frend（1972）（所谓的一性论运动）。要想理解发展中的神学争论，需要了解基督教的广泛传播及其制度结构的转变，见Jones（1964），c. 22; Herrin（1987），cc. 1–3和Brown（1996），cc. 3–4。
7. Ullmann（1970），13 ff对此进行了很好的讨论。更充分的讨论，见Ullmann，（1960）。Schatz（1990）对其形成了有益的补充。
8. 罗马市郊隶属于罗马大主教区的主教区包括阿尔巴诺、图斯库卢姆、帕莱斯特里纳、萨比纳、奥斯蒂亚、波图斯和圣鲁菲纳。
9. 教令集：Jasper and Fuhrmann（2001），22 ff.，有参考书目。利奥一世留下了一部涉

及范围很广的教令集，但他的教令只有17条进入了这部教令集。希拉流：见《瓦伦提尼安三世新律》17。对于产生这一裁决的争议的介绍，见Mathisen（1989），c. 7。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帝国诏书系统的繁忙，见Heather（2005），108–109，其中有参考书目。

10. 参考书目见本章注释6。

11. 所有证据都有力地支持这一结论。更详细的讨论见本章注释6中的参考书目。前四次大公会议决议的译文，见Bright（1892）。关于君士坦丁堡召开的大公会议（553年），见Price（2009）。

12. 关于帝国在4世纪基督教争论中的角色，见Barnes（1993）; McLynn（1994）。关于6世纪，见Gray（1979）,（2005）和Frend（1972）。在公元4世纪和5世纪初的帝国合法性斗争中，失败一方的观念通常不会被彻底消除，但失败方的地位会降低至教派，这就是“阿里乌派”和多纳徒派所遭受的命运。

13. 对这一时期正在发展的教会法的简介，见Brundage（1995）, c. 1。关于主教法庭，见Jones（1964）, c. 22; Harries（1999）, c. 10; Humfress（2007）, c. 7。

14. 对教宗选举以及这一过程中的暴力的介绍，见Curran（2000），特别是c. 4。

15. 介绍奥古斯丁思想的一部佳作是Brown（1967）。关于亚他那修，见Barnes（1993）。彼得·布朗探讨了修道运动，见Brown（1970）;（1981）; Howard Johnston et al.（1999）。

16. Dvornik（1966）依然很重要；关于意识形态仪式表现的更多探讨，还可参见MacCormack（1981）。

17. 关于教宗哲拉修一世，见Ullmann（1970）, 31–35; Llewellyn（1971）, 38–40;Richards（1979）, c. 4; Duffy（2006）, 49–53。Somerville and Brasington（1998）, c.2不仅介绍了小狄尼修的作品，还翻译了他的各种序言。关于其教令集的影响，见Jasper and Fuhrmann（2001）, 22–28，其中列出了参考书目。

18. 对于教宗格列高利一世，最精彩的分析是Markus（1997）。关于一志论之争和教宗的抵制，参考Llewellyn（1971）, c. 5; Herrin（1987）, 207–218, 250–259。关于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传道工作和塔尔苏斯的狄奥多尔，见Mayr-Harting（1972）pt 1; Campbell（1986）, nos. 1 and 4。

19. 对于“三章争论”的精彩介绍，见Sotinel（2005）和Chazelle and Cubitt（2007）中的论文。关于格列高利和伦巴第人，见Markus（1997）, c. 7。关于681年，见Noble（1984）, 12–14。

20. 帝国重组的大致情况，见Haldon（1990）。意大利特别是罗马附近地区受到的影响，见Krautheimer（1980）, c. 4; Brown（1984）; Noble（1984）, 2–11。对理解这一关键时期十分重要的《教宗名录》已经有了很好的英译本，见Davis（2000）。

21. Noble（1984）, c. 2是现有英文著作中对相关情况的最好描述。相关教宗生平文献的极佳译本，见Davis（1992）。

22. 这一点从精心构思的叙述中清晰地显现出来，见Noble（1984）, cc. 2–4; 参考Llewellyn（1971）, cc. 7–8; Duffy（2006）, 86 ff.。

23. 《瓦伦提尼安三世新律》17；英译见Pharr（1952）。

24. Reydellet（1981）是一部优秀的概述；关于西哥特王国，参考Teillet（1984），其中也有很多更一般性的内容。

25. 对西哥特人改宗天主教的总体介绍，英文著作见Thompson（1969）, c. 4;Collins（2004）, c. 2；更详细的介绍，参考Hillgarth（1966）; Fontaine（1967）;Ripoll and Velázquez（1995）。引文源自比德《英吉利教会史》3.25，进一步的评注见本章注释18中提到的作品。

26. 图尔主教格雷戈里《法兰克人史》，英译本见Thorpe（1974）。倭马亚王朝统治下的西班牙主教的地位源于10世纪时戈尔泽的约翰（John of Gorze）在西班牙的传教，见Smith（1988）。

27. Klingshirn（1994a）更加详细地探讨了该撤留的早期举措。6世纪80年代之后的发展，见Turner（1903）; Vessey（1993）。关于《高卢教令集》，见Mordek（1975）。

28. Vives（1963）提供了西哥特宗教会议记录的完整版本，并附有西班牙语译文；英语世界利用这些材料所进行的最新研究，见Stocking（2000）。对于盎格鲁—撒克逊人宗教会议传统的最佳研究是Cubitt（1995）。关于教宗使节的到来，见Whitelock（1996）, no. 191, 170 ff.。

29. 对罗马朝圣的介绍，见Llewellyn（1971）, c. 6; Birch（1998）。

30. 关于查理曼的捐赠，见上文。哈德良一世和利奥三世的传记的翻译，见Davis（1992）, nos. 97和98，该书还提供了对《教宗名录》的精彩介绍。对建筑工程的第二手评注，见Llewellyn（1971）, 242 ff; Krautheimer（1980）, c. 5;Christie（2005）。

31. 反圣像运动的终结，见上文。对于“和子说”的深入讨论，见McKitterick（2008）, 311–315。

32. 《大劝谕书》的译文见King（1987）, 209–220。译文后面是对查理曼很多法令集的翻译。对改革总体原则的进一步讨论，见de Jong（2005）; McKitterick（2008）, c. 5; Costambeys et al.（2011）, c. 3。

33. 有关查理曼知识分子的参考书目非常丰富，更加充分的介绍，见Godman（1987）, c. 2；McKitterick（1994a）中收录的一些论文十分有用，尤其是Law,Garrison和Rankin的论文；Story（2005）中Bullough和McKitterick的论文。对单个思想家的研究可以作为补充，如Dutton（1998）（艾因哈德）和Bullough（2003）（阿尔昆）。

34. McKitterick（1994a）是一部根据不同主题编撰的论文集，提供了对关键文本的精彩介绍。

35. 《论文化学习》（De litteris colendis）的译文见King（1987）, 232–233。关于罗马晚

期的语法学家，见Kaster（1988）；关于其后拉丁语的发展，见Wright（1982），（1996）; 关于深层次的社会变化，见Heather（1994a）。

36. 参考Law（1994）；McKitterick（2005）提供了参考书目。Bischoff（1994）中收集的研究论文非常详细，很有启发性。

37. 关于加洛林时代对整个拉丁文学的文化意义，见Reynolds and Wilson（1991）。关于意识形态对加洛林时期的智力活动施加的限制，见Nelson（1977）。此外，本章注释33所列举的书目也非常有用。

38. 对这个问题的最新评价，见McKitterick（2008）, 345 ff.。

39. 对于字体的最佳介绍，见Bischoff（1990）；也可以参考Ganz（1989）and McKitterick（1994b）。

40. Nelson（1987）; Wood（2006）, cc. 14–15.

41. 关于大教堂学校，见McKitterick（1994）；Costambeys et al.（2011），142 ff.。Lawrence（2001），cc. 2–3很好地介绍了加洛林时期的修道院改革。同时代人阿尔多（Ardo）为阿尼亚讷的本笃写了传记，英译见Cabaniss（1979）。

42. Trans. King（1987）, 311–312.

43. 查理曼为表彰助祭保罗的工作而写的信，英译见King（1987），208。关于整个改革项目，见McKitterick（1977）, c. 1（主教）, and c. 3（讲道）。其他有助益的讨论包括de Jong（2005）; McKitterick（2008）, 299–311; Costambeys et al.（2011）, c. 3。以上著作都提供了参考书目。

44. 对于关键史料的整理和分析，见McKitterick（1977）, c. 2（主教法规）, c. 4（礼拜仪式的体验）。我的结论和近期其他的研究者相呼应（见前注）。

45. Costambeys et al.（2011）, 142 ff. 很好地提出了这一点，总结了一个半世纪以来现代学界对所谓的加洛林文艺复兴的研究，在这方面，本章注释33、36、37、41都提供了很好的切入点。

第8章

教宗诞生：教宗的腾飞

1215年11月11日，召开了空前盛大的基督教领导人会议。整个西方教会的400名主教和800名修道院院长亲自参与，那些无法与会的主教也派了代表，同时出席会议的还有东方宗主教派来的一批观察员。教会人士聚集在一起，制定了有史以来最雄心勃勃的基督教全面改革计划，新计划本着加洛林王朝“修正”计划的精神，但对其进行了大规模的重新定义。

会议制定的一套教规严厉打击了神职人员的腐败现象。许多行为被禁止，包括任命未成年亲属担任教会职务、买卖教职和公开不守贞洁。会议还尽了最大的努力来执行这些规定。第8条教规规定，对于任何针对神职人员的正式投诉都必须彻底调查，不能试图掩盖事实。修道士也在他们的考虑范围之内：第12条教规要求每个大主教辖区建立一个监督机构（称为分会），以确保辖区之内的修道院严守院规（这一思想是从1205年丹麦和1210年罗马的先例中总结出来的）。

然而，更多的重点放在了广大的非神职人员身上：神职人员有责任尽可能为教区居民提供最好的服务，而作为回报，非神职人员也有虔诚的责任。在众多的亮点中，第21条教规规定所有的非神职人员每年至少忏悔一次，应该通过适当的苦行来赎罪，并在复活节领受圣餐。第10条教规关注的是讲道，这是向大部分不识字的平信徒宣传教义的重要机制。与会者特别担心大型主教教区的安排，担心主教（自古以来负责在基督教内部传教）可能难以顾及全体。第11条教规要求每一位大主教向神父和所有其他神职人员传授《圣经》，因为他们要对信众负责。第19条和第20条教规将注意力转向教堂建筑，要求在教堂内保持圣饼和圣酒

的圣洁状态，并将教堂本身视为只供宗教仪式使用的神圣场所（从那以后，村庄就开始需要与教堂分开的会堂了）。第50条至第52条教规甚至涉及婚姻的问题，要求在教堂里举行婚礼，婚礼已经完全是基督教圣礼了；教会还修改了对乱伦的定义，从原先的禁止七亲等内亲属结婚（坦白地说，根据这一定义，几乎每个人都是不可结婚的近亲），改为禁止四亲等内的亲属结婚。

对于内部联系很深、规模较小的西欧上层阶级和居住地相对固定的农民来说，即使禁止四亲等内亲属结婚的规定（双方不能有共同的高祖父母）也有点棘手。据估计，在19世纪的洛林，近50%的农民婚姻违背了这一限制，而这一限制远远超出了保持基因库健康所需的条件。从整体上说，会议召开后不久，西方基督教世界并没有出现基督教虔诚大规模爆发的情况。但这不是重点所在。

这一雄心勃勃的非凡会议在拉特兰宫的大会堂举行，自4世纪以来，这里一直是罗马教宗的总部。会议由当时的教宗英诺森三世召集和主持，他不仅决定了会议议程，还在开幕式上做了布道。基于《路加福音》第22章第13节，英诺森三世宣告："我很愿意在受害以先，和你们吃这逾越节的筵席。"一语成谶，第二年夏天，7月16日，他就在佩鲁贾去世了；但他当时心里想的并不是自己的死亡。他借着纪念以色列人逃离埃及的逾越节，介绍了另外三种旅程，而这是他议程的核心：亲身前往耶路撒冷的收复圣地之旅（当时，十字军运动是无可争议的事实，英诺森三世本人将发起5次十字军运动），教会从腐败到改革的灵性之旅，最后是每一个灵魂从尘世到天堂的荣耀之旅。

如果说英诺森教宗正在考虑几次新的旅程，那么至少一次旧的旅程已经完成。在第四次拉特兰会议上，终于出现了一个可以被认为是西方基督教界领袖的教宗，他召集大规模的神职人员会议，制定会议的议程，为神职人员和平信徒制定信仰与实践的标准，并试图强制执行这些标准。这与大约400年前的加洛林"修正"计划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当时，按照既定的惯例，皇帝和他的朝廷成为宗教改革的主要动力。英诺

森三世对权力的主张有过之而无不及。1201年，在一份讨论当时神圣罗马帝国众多王位候选人的教令中，他宣称照顾帝国的利益是教宗的职责，因为帝国的起源和最终权力都来自教宗。而且，他宣称的权威并不止步于帝国。在1198年一封同样著名的信中，他用一个天文学的类比来宣称自己的权威实际上高过任何欧洲统治者：

> 正如月亮的光从太阳而来，而且在亮度和质量上，以及在位置和力量上都确实低于太阳，皇权尊严的光辉也是从教宗权威中获得的。(注)

英诺森三世不仅宣称对西方教会拥有绝对的权威，还向聚集在罗马参加第四次拉特兰会议的教会人员证明了自己主张的真实性，但该主张基于这样一个断言，即他的权威高于基督教世界的任何世俗统治者。在从查理曼到英诺森三世之间的这段时期，皇权基于融贯的意识形态，对基督教世界保持了差不多500年的领导权，这种领导权是如何被推翻的呢？

打造教宗权威

查理曼加冕之后，教宗要获得英诺森三世那样的基督教领导权，还有两大障碍。首先是意识形态上的不足。从教宗哲拉修开始，罗马就声称，宗教事务的权威是不同的，不能由皇帝或国王合法地行使，教会之剑应该掌握在圣彼得的继任者——教宗手中。但这一主张还没有得到承认。罗马晚期的皇帝、后继国的国王和加洛林王朝的统治者主张他们是上帝指派的，因此应该以上帝的名义统治教会和国家的事务。自君士坦丁改宗以来，这一主张在理论和实践上都被绝大多数教会人士所接受。

其次，即使有人想承认教宗的最高权威，皇帝和国王在财富和实际影响力方面享有巨大优势，这也构成了另外一个问题。在整个古代晚期

和中世纪早期，在绝大多数西方高级神职人员的生活中，皇帝和国王占据着压倒性的地位。皇帝和国王任命主教和重要的修道院院长，不时出现在他们的所在地，召集他们参加会议，在会议上讨论所有关键的教会问题并通过新的教规。多亏了查理曼，罗马教会富有了起来，但与加洛林王朝的财政收入相比，教会的新财富显得微不足道。此外，还有一个老问题使得罗马城在罗马晚期无法成为帝国权力中心。由于欧洲西部的重心已经向阿尔卑斯山以北转移，罗马在地理上处于边缘地带，考虑到前现代的交通速度，这是一个非常不方便的位置。正如一位4世纪的评论者所言，罗马仍然是“远离大道的神圣地带”，有点像查士丁尼亚纳普里马，对大多数人来说，罗马过于偏远；每次需要裁决或需要解决问题时都把罗马作为焦点是不现实的。(注)

不过，9世纪中期，教宗至少在解决第一个问题上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人们早就承认，罗马教区及其主教——教宗——有理由在基督教世界占据非常特殊的地位，但是，在有大把意识形态力量与实际权力可以调动的国王和皇帝面前，这种承认从来没有太大的意义，仅仅是一种声望，并不能带来实权和影响力。这有点像美国副总统，住的地方不错，要参加很多仪式性的活动，但是除了一些特殊人物之外（如美国副总统迪克·切尼和教宗格列高利），教宗在很大程度上与西方教会的关键运作无关。在加洛林王朝如此，在4世纪甚至更早的时候也是如此。然而，关于领导者的记录即便没有，也大可以创造出来。于是，9世纪中叶，一批伪造的法律文本开始在西方基督教世界流传，这些文本影响深远。

全部4份文本的合集被称为《伪伊西多尔教令集》，它得名于其中最重要那份文本的序言中出现的名字。最初的意图似乎是要将该文本归到塞维利亚的伊西多尔（Isidore of Seville）名下，他是西班牙重要的主教、学者和教会法学者，但后来，一个比较留意年代的人注意到，有些材料写在他去世之后，于是，作者变成了无法确定是谁的伊西多尔·墨卡托（Isidore Mercator）。这4份文本是：来自西班牙和高卢宗教会议的教规，更准确地说，是《欧坦的西班牙和高卢法令集》（*Collectio*

Hispana Gallica Augustodunensis）；教宗哈德良一世（772—795年在位）写给梅斯（Metz）大主教安吉尔拉姆（Angilram）的一封长信，即《致安吉尔拉姆的信》（*Capitula Angilramni*）；修道院院长安赛吉斯编纂的加洛林王朝法令集（我们在第6章提到过）的续篇，即《利未人本笃法令集》（*Benedictus Levita*）；最后是《伪伊西多尔教令集》本身。和前面几个文本相比，最后一个包含了来自更大范围内宗教会议的各种裁决（包括以前所有的大公会议）和大量的教宗教令。它涉及古代的宗教会议、继承国时期高卢和西班牙的宗教会议、加洛林时期的材料和大量的教宗教令，在一定程度上汇集了9世纪中期可以收集到的各种来源的教会法。

然而，整部教令集真假掺杂，十分复杂，只有《致安吉尔拉姆的信》完全是伪造的。《欧坦的西班牙和高卢法令集》中有不少裁决都是真实的，但所用的拉丁语得到了系统性润色，以更符合加洛林王朝的古典化规范，而这让伪造者有机会"调整"一些内容。与此类似，在《利未人本笃法令集》中的加洛林材料中，有四分之一是真的，但其余的仍然是伪造。

然而，最重要的内容是《伪伊西多尔教令集》本身，就像恺撒时代的高卢一样，它由三部分组成。其中两部分基本上是拉丁教会的受众所熟知的真实文本：从尼西亚会议到7世纪的一系列宗教会议的决议，以及从4世纪到格列高利二世（715—731年在位）时期的教宗教令。这部分内容大多与教宗哈德良送到北边给查理曼的《小狄尼修—哈德良教令集》内容相同，后者为后来的加洛林教会立法提供了起点。但是，还是有一些重要的修正。在这些人们熟悉的材料之外，第三部分加进了从1世纪末的教宗革利免一世到教宗梅耳基亚德斯（Pope Miltiades，卒于314年）期间早期教宗的教令集。6世纪早期，小狄尼修编撰教令集时没能找到4世纪晚期之前的成形教令，正如我们在上一章看到的那样，理由很充分：根本就没有那样的教令。《伪伊西多尔教令集》中所有这些声称是早期的教令都完全是伪造的。总而言之，这本教令集就像狡猾的高级骗局，它具有对真实文本的广泛了解、对不同拉丁语风格的深刻把

握，以及对基督教历史不同时期的深刻理解，同时却掺进了赝品。在整部作品中，真实的和人们所熟知的内容被小心翼翼地调动起来，使粗心的读者很容易接受似是而非和伪造的东西。

这部伪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迅速传遍了拉丁基督教世界修道院和大教堂的“缮写室”（scriptoria）。偶尔有人对部分文本提出质疑，但仍有100多份完成于公元950年以前（也就是这部法令集面世之后的100年内）的部分或完整抄本流传下来，这在当时是一个巨大的数字；有30份完整的抄本完成于公元900年以前。(注)

当然，这一成功反映了伪造之高明，但这并非事情的全部。更重要的是，这部教令集出现得恰逢其时，所以能够产生这种影响。9世纪中叶，加洛林王朝的“修正”项目正全面展开，西方教会人士十分清楚，他们的行为应该受到既定教会法的制约，他们也知道教会法的主要渊源是什么。从789年查理曼颁布《大劝谕书》开始，人们就被反复灌输，正确的基督教行为是由大公会议、主要区域会议的决议和教宗教令共同确定的，还会在适当的时候经由加洛林王朝法令的新判例得到更新。然而，要掌握所有相关文本远非易事。在9世纪40年代之前，即使是新近的加洛林王朝的法令，也只是被随意收集起来，而对其他文本的获取仍然是不完整的。抄本证据表明，即使主要的教会图书馆也不一定会收藏所属教会的所有主要文本。因此，在《伪伊西多尔教令集》面世之时，还没有教会法像它那样似乎涵盖了所有必要的资料来源。你所听说过的一切都包含在一部方便的教令集之中，而且它是用优秀的古典化加洛林拉丁语写成的；相比之下，原本可供选择的抄本是混乱和不完整的，例如，大公会议的决议有不止一种拉丁语译本，并且无论是教宗的书信还是会议的决议，都有很多不完整的文集，其材料与其他复制版本在细节上的不同之处则很容易被认为是抄写错误而不予理会。换句话说，《伪伊西多尔教令集》出现的时候，加洛林王朝的教会人士已经足够了解他们需要什么材料，但还不足以看穿它以假乱真的伪造。

但是，如果说在其接受过程中起关键作用的只是时机上的巧合，我

就不需要说《伪伊西多尔教令集》巧妙地运用真假掺半的手法其实完全是有意为之了。这种复杂的劳动密集型伪造工作需要渊博的知识，如果没有明确的目的，是不可能进行下去的。那么，这个目的是什么呢？

第一个线索是该文本对古代晚期基督教权威结构的总体认识。正如我们在上一章所看到的，加洛林王朝的“修正”项目非常强调大主教对主教的权威，这使直接在皇权支持下行事的大主教成为改革进程的主要推动者，负责让其他的神职人员步调一致，包括他们的副手。对于一个合法的基督教权威结构应该是什么样子，《伪伊西多尔教令集》提出了一个截然不同的观点。正如我们在第5章看到的那样，显然，早在8世纪，皇帝君士坦丁向教宗西尔维斯特做出重大让步的观点就存在了，在查理曼征服伦巴第王国之后，这被哈德良一世用来“鼓励”查理曼达到最慷慨的境界。但在《伪伊西多尔教令集》中，这些思想以《君士坦丁赠礼》的形式达到了完全成熟，这个文件完全是伪造的，据称记录了4世纪时皇帝最初的赠予。这份文件清楚地表明，皇帝在前往君士坦丁堡时，将西方教会的全部权力授予了教宗西尔维斯特。注接着，这份伪造的教令集用许多所谓教宗权威发挥作用的实例，强化了这一基本的原则声明。同样重要的是，在教宗的保护伞下，大主教的权力从两个方面被削减了。从上往下看，这部教令集描绘的是古代晚期的教会，教宗任命的宗主教的权威压过了大主教的权威。从下往上看，这部教令集还提升了作为副手的主教的地位，贬低了作为他们上级的大主教的地位，大主教几乎没有权利干涉主教管理自己的教区。值得注意的是，这部教令集还制定了严格的规定，使得将主教从他们的主教区赶走要比9世纪时困难得多。

在查理曼和虔诚者路易的统治下，主教基本上无足轻重。法律程序是要遵循的，但如果你失去了皇帝的青睐，那么你在这个职位上的日子也就不多了。相比之下，《伪伊西多尔教令集》则坚称，如果主教没有承认自己有不当行为，就有必要召集至少72名独立证人，只有在他们都愿意支持所提出的指控时，才能开始诉讼程序。一旦审判开始，对控方来说，事情也不是那么容易。主教可以拒绝负责他的案件的法官，即使

该法官是他的大主教，还可以在诉讼的任何时候（审判前、审判中或审判后）向罗马教宗这个上级当局提出上诉。这完全是胡说八道，实际上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事。然而，《伪伊西多尔教令集》用粗暴的伪造手法，编造出了这样一幅古代晚期的图景：教宗以权威统治着一个有凝聚力的组织，在这个组织中的其他关键人物不是皇帝和大主教，而是由教宗任命的宗主教和教区主教。[注]这部教令集第一次将“罗马主教区是特殊的”这个被普遍接受但还很模糊的概念，转变成一种清晰的认识，即“特殊”在实践中应该意味着什么。一种对过去的虚假认识弥补了意识形态的缺陷，而长期以来，这种缺陷将教宗置于皇权之后极其次要的地位。最后，我们很容易认为，教宗是要行动起来，夺取西方基督教世界权威结构的实际控制权。

尽管有一派学者长期以来一直认为，《君士坦丁赠礼》的文本是在教宗文书院的某个地方伪造的，但另一组线索却表明并非如此。到了9世纪中叶，所谓的加洛林文艺复兴意味着，北部法兰克学者所写的拉丁文比他们在教宗文书院的同僚更加古典化，因为在文书院，新标准尚未确立。《伪伊西多尔教令集》是用完美无瑕的加洛林拉丁语写成的，而且，其中个别伪造作品里有一些特别的时代错误，比如《君士坦丁赠礼》本身，这些都说明，法兰克王国北部很有可能是这些作品的产地。抄本的踪迹也不容置疑：这部法令集起源于北部，然后向外传播。从最早对它的明确使用中也能看出这一点。在852年或853年的某个时候，特里尔大主教蒂特高德（Thietgaud）声称，他的地位高于他的邻居兰斯大主教，理由是他是原罗马行省贝尔吉卡一省（Belgica I）的大主教，而兰斯曾是贝尔吉卡二省的首都。这是第一次有人用罗马晚期的历史来支撑9世纪的主张，这是《伪伊西多尔教令集》在发挥作用一个明显例子，虽然蒂特高德没有直接援引这部教令集。对其文本的第一次直接引用来自差不多的时间和地点，即852年11月1日兰斯大主教辛克马尔（Hincmar）颁布的教令。从那以后，或明或暗地利用这部教令集，甚至直接引用的情况越来越多，而且总是从法兰克王国北部开始，然后向外扩散的。证据是不容置疑的：《伪伊西多尔教令集》对古代教宗权威

的虚假想象不是在罗马产生的，而是在法兰克王国北部产生的。[注]这是为什么呢？

这部教令集很可能是分几个阶段形成的，其中至少有一部分是在9世纪30年代初虔诚者路易和他的儿子们发生争执时首次出现的。根据记录，在关键时刻，科尔比修道院院长瓦拉（Abbot Wala of Corbie）和里昂大主教阿哥巴德（Archbishop Agobard of Lyons）向教宗格列高利四世呈交了有关教宗权威的文本，而教宗本人以前并不知道这些文本。这些神秘文件极有可能是《伪伊西多尔教令集》的一部分。瓦拉和阿哥巴德都坚定支持路易长子洛泰尔的权利，两人都担心，改写817年的王位继承方案，将秃头查理加进来，可能会削弱持续协调行动的可能性，从而危及教会改革。833年夏天，教宗格列高利来到北方，试图促成一项和平解决方案。此时，洛泰尔的派系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试图利用教宗，于是为教宗的权威描画出宏大的图景，以坚定他的决心。教宗是否因此决心在路易儿子们的明确要求下前往路易的营地进行和平谈判，而他们则悄悄吸引走了皇帝的支持者，准备推翻皇帝，目前尚不清楚。但是，这个文本产生的背景大致就是这样的。《伪伊西多尔教令集》是一小群关系很近的法兰克教会人士为了自己的目的而伪造的，他们想加强教宗权威的形象，但并不是为了教宗，而是为了他们自己。虽然这部教令集可能是在833年危机的驱动下开始编写的，但内容的范围很快就扩大了。这部教令集很重视的一点，是大大增加主教被革职的难度，而这源于此前一连串主教被革职的事件。在这里，对教宗权威的利用是偶然的，并不是设计的核心，伪造者之所以赋予罗马更高的权威并加以利用，原因之一是罗马距离遥远。罗马太远了，而且在法兰克王国，教宗没有任何有效的权力杠杆（例如，当时没有教廷法庭和教廷法官），因此利用所谓的古代教宗权威来破坏当时皇帝及其大主教权威的行使，这是十分安全的。把罗马加进来，与其说是增加了教宗的实权，不如说是促进了主教的独立。[注]

虽说这可能是这部教令集的最初目的，但教令集的眼界恰到好处，

伪造得又很巧妙，因此许多其他势力也会加以利用。前面提到，9世纪50年代，特里尔大主教想要复兴一种据说是很古老的大主教身份（他是为了得到更高的地位和更多的收入，因为如果他能成功地宣示自己的优越地位，就能获得对兰斯的某些权利）。9世纪60年代，兰斯大主教辛克马尔的侄子和副手、积极独立的拉昂主教辛克马尔（Hincmar of Laon）试图利用《伪伊西多尔教令集》来摆脱叔叔的权威。最后，这两个计谋都没有成功，小辛克马尔的结局尤其糟糕，不但失去了主教的职位，还失去了双眼。[注]但从长期来看，重要的不是特定事件的结果。真正重要的是，法兰克的许多教会人士为了他们自己的目的，都在利用这部趁手的教令集（老辛克马尔也喜欢用）。渐渐地，教令集获得了教会法的合法地位，对以教宗为首的基督教权威的认识也融入了西方教会人士的意识。此外，它也最终在罗马内部播下了变革的种子。

这次变革也是由一位法兰克教士的个人动机引发的。9世纪60年代初，兰斯的辛克马尔又和副手发生了争执，这次是苏瓦松的洛塔德（Rothad）主教。这次的问题是，他的副手是否有权剥夺教区内一些神职人员的生计，就像《伪伊西多尔教令集》中所主张的那样（这部教令集再次处于争论的中心）。根据加洛林王朝教会的标准做法，辛克马尔认为他无权这样做，并最终决定把他赶出自己的主教区。此时，洛塔德援引《伪伊西多尔教令集》，向罗马教宗尼古拉一世（858—867年在位）提出上诉。尼古拉一世最初的反应是把这个案子交给地方宗教会议，这也是当时的标准做法，而主持会议的是辛克马尔，其结果可想而知。然而，洛塔德很有本事，他索性直接来到罗马，随身带着一本《伪伊西多尔教令集》。尼古拉一世的态度发生了180度的变化。面对古代基督教实践的“证据”，教宗于862年12月24日做出了一项新的裁决。按照《伪伊西多尔教令集》中的规定，他现在要求在罗马听取洛塔德的申诉，由他本人来主持审判。[注]

一种完全为其他目的而在北方制造的武器，现在传到了罗马，掌握在一位敢于使用它的教宗手中，其结果是爆炸性的。尼古拉一世不是那

种害羞、孤僻的人，他一直积极而广泛地参与西方教会的事务，在洛塔德到来之前的860—861年，拉韦纳大主教约翰试图保持独立，尼古拉一世毫不手软地维护了自己的权威。《伪伊西多尔教令集》提供的新意识形态和推荐的做法，将他的野心提升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结果，在他统治的最后5年里，教宗对一些他的前任从来不敢涉足的事务做出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干预，其中最重要的是皇帝洛泰尔二世的离婚案，洛泰尔试图与没有生育的妻子特贝尔加离婚。尼古拉一世之所以插手，是因为在多次争执之后，洛泰尔在862年说服了自己的教会成员，在亚琛的宗教会议上同意他与妾室瓦尔德拉达（Waldrada）结婚。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威，863年10月，尼古拉一世在拉特兰宫举行自己的会议，宣布亚琛会议的裁决无效，甚至将主持亚琛会议的两位大主教处以绝罚。

道路可能有点曲折，但重要的是目的地。教宗尼古拉一世用《伪伊西多尔教令集》将自己武装起来。从他身上，我们看到的教宗终于开始符合其作为西方教会领袖的职责描述。尽管尼古拉一世没有赢得所有的战役，但他至少是在努力战斗，而他的前任们大多满足于坐在罗马，接受时不时到来的赞美。《伪伊西多尔教令集》为公认的教宗威望如何转化为实际权威提供了一个模型，在尼古拉一世的手中，这个模型被付诸实践。他的行动体现了革命的气息，他同时代人的反应也是。编年史家普吕姆的雷吉诺尖刻地评论说，教宗试图“让自己成为整个世界的主人”。甚至在罗马内部，也有一些人觉得尼古拉一世的权力新主张有点难以接受，以至于没有任何纪念他的礼拜仪式。但尼古拉一世作为榜样的基本活力丝毫没有减弱。教宗哈德良二世（867—872年在位）同样坚持教宗干涉北方教会事务的权利，比如在两个辛克马尔争吵的后期，又比如，他教导布列塔尼的统治者应该如何管理他们的教会事务。(注)

因此，如果你盘点一下870年的西方基督教世界，很难不得出这样的结论：建立已久的模式正在发挥作用；皇权对教会的权威正在被罗马主教的权威取代，至少是第一次受到像样的挑战。旅程远未结束。但查理曼利用教宗为自己目的服务的行为，在随后的两代人中得到了大量法兰克教会人士的效仿，尤其是那些想要逃离（即使只是在某个特定的时

刻）作为“修正”项目基础的皇帝和大主教权威结构的人。人在不愿意接受在家附近可能得到的裁决时，就会向一个外部权威申诉，这是人之常情。几年前，我读过一篇精彩的论文，探讨的是女性提起的离婚案件是怎样让英属罗德西亚的殖民法庭应接不暇的，因为与乡村法庭相比，殖民法庭做出的判决通常不至于自然而然地偏向男性。当这种情况经常出现时，个人行动可以相对迅速地改变长期确立的权威模式。教宗尼古拉一世是罗马历史上最后一位名字之前加上“大”字载入史册的主教。你可能会认为，这反映出他将教宗权威积极提升到了全新的高度。他配不配得上这一称号，我觉得自己根本没有资格来评判。然而，有一点是完全明确的：尽管有《伪伊西多尔教令集》作为意识形态支撑，但尼古拉一世对教宗权威表面上的提升实际上基本是一种幻觉。

淫妇政治

897年1月，教宗斯德望七世在罗马教堂的拉特兰圣约翰大殿正式召开了一次宗教会议。这座始建于君士坦丁时期的建筑已不复当年，但仍矗立在同一地点。斯德望召集这次会议，是为了审判他的前任教宗福尔摩苏斯（Formosus，891—896年在位）。在某种程度上，这位前任也算是在场的。福尔摩苏斯在前一年的4月去世，斯德望把他在地下埋了8个月、穿着教宗法衣的腐烂尸体挖出来，放在了被告席上。对他的指控包括下面几条：在891年从原来的波图斯主教调任为罗马主教时，违反了教规（尼西亚会议第15条决议禁止这种行为）；伪誓（福尔摩苏斯曾一度被免去波图斯主教职位，他宣誓不再担任主教）；身为俗人时行使主教的职能（因为他在宣誓后又担任了波图斯的主教）。最重要的是，斯德望指控福尔摩苏斯积极寻求教宗职位，而不是让上帝的意志自行发挥作用，这是他的大罪，而这恰恰是8世纪90年代查理曼拼命想要避免的那种指控。根据一种说法，在审判的大部分时间里，斯德望都在对他前任的尸体大呼小叫：“当你还是波图斯主教的时候，为什么要野心勃勃

地来篡夺普世的罗马主教区呢？”注

福尔摩苏斯的辩护是由一名助祭负责的，据说他并不怎么乐意做这事，他站在尸体后面，不时相当冷淡地予以否认。后来人们对此事的强烈反感意味着审判的记录（最初可能是有的）没有流传下来，但是我们知道福尔摩苏斯被判有罪（真是意想不到呢）。他的教宗宝座被宣布为非法，他的名字被从教宗名录中删除，他在教宗任上的所有正式举措都被废除。尸体则相应被剥去教宗的法衣，福尔摩苏斯祝福时所用的右手的3根手指也被切断了。尸体在一个为流浪汉准备的墓地里短暂停留后，被系上石头，扔进了台伯河。即使是在10世纪末，这一切都与教宗所应有的行为相去甚远（即使是波吉亚家族也干不出如此可耻的事）。因此，斯德望没有威风多久，这也许并不奇怪。同年8月，他被免职，月底去世，是被勒死的。对审判程序的最后评论可能是由全能的上帝做出的，因为在同一年，一场大地震摧毁了审判现场，正如一位同时代人所说，“从祭坛到大门”都被毁掉了。

对福尔摩苏斯的审判想必是整个教宗史上最匪夷所思的事件，但这绝不是教宗彼此谩骂和对抗的孤例。教宗尼古拉一世在位时期表现出伟大的统治才能，但是在9世纪晚期和10世纪，取而代之的是一系列为控制他的教区而进行的暴力斗争，这成了100多年教宗史的主题。从896年到904年，至少有9个不同的人占据了教宗宝座；教宗斯德望的可笑行为属于绝对低谷。在尼古拉的直接继承人哈德良二世去世后的一个半世纪里，教宗制度发生了很多往往很暴力的变化，要想列出一份像样的教宗名单是完全不可能的。经常有多个竞争者同时争夺这个职位。后来，通过区分真正的教宗和非法的对立教宗，一切都将恢复秩序，但这种有时很随意的进程不能掩盖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即周期性的暴力动荡是这一时代的显著特征。从872年到1012年，教宗宝座上多达三分之一的人死于非命。即使他们的命运没有全部被记录下来，我们也能强烈地感受到当时发生了什么。除了控告福尔摩苏斯的斯德望被勒死之外，我们还可以加上一些精彩的情节，如若望十世被闷死（914—928年在位），而希腊的对立教宗若望十六世（997—998年在位）更是饱受残害，他失去了

眼睛、鼻子、嘴唇、舌头和手，但竟然活了下来。在争夺教宗职位控制权的混战中，9世纪第三个25年的所有辉煌都化为泡影。这段时期的较早阶段被克雷莫纳的柳特普兰德（Liutprand of Cremona）贴上了“淫妇政治”的标签，而对福尔摩苏斯审判的可怕而引人入胜的讲述也出自他之手。10世纪上半叶，罗马贵族世家的女性成员对教宗继承权的影响力很大，这让柳特普兰德非常不满。这些人就是他所谓的“淫妇”。但是，对教宗衰落这一更广泛现象的深入分析表明，从更广泛的、去除了性别含义的意义上讲，“淫妇政治”作为整个时期的标签还是十分贴切的。注

要想理解当时发生了什么，重要的是不要用后见之明去寻找蛛丝马迹，然后说这些事带来了我们所知道的那种教宗地位，而是要去考虑所有的历史信息。如果去看加洛林王朝时期的历史资料，我们很快就会发现，即使是在9世纪最辉煌的时期，教宗政治也一直存在激烈的争议，暴力的暗流就潜伏在表面之下。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让查理曼获得完成加冕礼所需要的手段的，是一场威胁到利奥三世眼睛和舌头的暴力叛乱。此外，在利奥统治末期，他还面临另一段不那么著名的反抗。查理曼在8世纪90年代的拯救作用在后来的几次事件中都得到了重演。因此，从结构上讲，加洛林王朝的皇帝实际上限制了一直威胁着圣彼得共和国政治生活的内部暴力分歧。例如，教宗帕斯加尔一世（Paschal I，817—824年在位）在某些罗马民众中非常不受欢迎，以至于他们不希望他被埋葬在圣彼得墓地。为了继续掌权，他还将两位高级别官员分别挖掉双眼和斩首，他们是“地位最高者”狄奥多尔（*primicerius* Theodore）和“命名者”利奥（*nomenclator* Leo）。后来，在其父亲的鼓动下，虔诚者路易的长子、指定的皇帝洛泰尔对此事进行了调查，认为没有必要继续深度干预，但是制定了《罗马法规》（*Constitutio Romana*），为教宗选举规定了一套商定的程序，包括皇帝批准当地候选人的一段冷却期，这一程序正是为了在将未来选举期间发生暴力事件的可能性降到最低。注

但是，帕斯加尔教宗任期内那种明显的内部分歧从未完全消失。他的继任者犹金二世（Eugenius II，824—827年在位）是当地的罗马贵

族，但他是洛泰尔在面对多位教宗宝座竞争者时强加的折中候选人。塞尔吉乌斯二世（Sergius II，844—847年在位）也是通过击败大批反对者才获得权力的，反对他的人支持执事长约翰作为教宗候选人。这场斗争导致许多人殒命罗马街头，但塞尔吉乌斯二世至少拒绝批准处决被击败的对手。类似的斗争还有许多。教宗利奥四世（847—855年在位）的特使拉吉伯特（Ragibert）在前往法兰克王国途中被杀。教宗指责并试图杀死3个罗马领袖：乔治、哈德良和彼得。即使是教宗大尼古拉一世也没能得到普遍的支持——正如我们所见，没有纪念他的礼拜仪式。他的继任者哈德良二世认为，有必要命令神职人员于868年5月8日（也就是尼古拉一世死后的第二年）在特鲁瓦（Troyes）召开一次会议，将他的前任包括在他们的弥撒祈祷中。也就是说，那些神职人员是不会自发这么做的。哈德良自己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他统治期间的著名事件是，一个名叫埃琉提利乌斯（Eleutherius）的人绑架了哈德良的女儿和母亲，可能还强奸了她的女儿，然后杀了母女二人。这一切可能都是私人恩怨（史料没有具体说），但因为埃琉提利乌斯是一个叫阿纳斯塔修斯（Anastasius）的人的弟弟，而这个阿纳斯塔修斯自850年以来一直是皇帝支持的教宗宝座的潜在候选人，所以这种暴力的背后肯定至少有一些利益上的因素。事实上，一连串教宗被暴力致死事件是从哈德良本人开始的，他被自己的随从用棍棒打死，因为他们等不及他们给他下的毒发作。(注)

9世纪的证据传递的整体信息很明确：教宗共和国的政治恶斗不休，很容易分裂。当加洛林王朝尚有力量出手干预的时候，一定程度的秩序得到了维持，因为如果反叛一位经正式选举产生（并因此得到皇帝认可）的教宗，就很可能会受到刀剑的惩罚，而在选举期间任何过于可耻的弄虚作假行为都会引发干预，皇帝也有可能强加一个像犹金二世这样的折中候选人。因此，教宗政治会在那个时候出乱子绝非偶然。从9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随着秃头查理、日耳曼人路易、路易二世和他们的继承人相继去世，加洛林王朝的政治凝聚力最终彻底丧失（第6章）。直接的结果是，在罗马，斗争越发激烈，很快就发展到了897年1

月拉特兰圣约翰大殿所发生的那一幕。但这只会引发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为什么圣彼得共和国的政治生活会受制于这种系统性的分裂？

福尔摩苏斯教宗腐烂的尸体所受到的待遇为我们指明了方向。读者应该还记得，教宗斯德望宣布前任的举措为无效，并砍掉了他祝福时所用的手指，而祝福是仪式的重要组成部分，所有书面的教宗裁决都是通过这种仪式正式颁布的。福尔摩苏斯做的其中一件事显然与斯德望个人有关。斯德望被福尔摩苏斯任命为主教，因此，宣布福尔摩苏斯的举措无效，就不会有人说斯德望犯了从另一个主教区直接登上教宗宝座的罪了，那样做是违反尼西亚会议的第15条决议的，福尔摩苏斯恰恰被指犯了这样的罪。然而，除此之外，我们没有记录显示福尔摩苏斯在任期间在宗教方面有过任何重大的举措，无论是制定教会法律还是鼓励改革，虽然他在当时是位非常认真的教士。在尼古拉一世时期，他被教宗派往保加利亚传道，似乎做了很大的贡献，因为有记录显示，保加尔人的可汗只想要福尔摩苏斯当他们新的大主教，而不要别人。(注)撇开斯德望的特殊问题不谈，被宣布无效的主要不是宗教上的举措，而是种种委任书、授予新礼物的文件，以及福尔摩苏斯在他6年任期内所写的对送出去的礼物的确认函。就像加洛林王朝的皇帝一样，9世纪的教宗是一个国家的元首，即圣彼得共和国的元首。除了宗教职能外，教宗还必须承担世俗的角色。控制教宗宝座，也就控制了属于共和国管辖范围内的所有金融资产的去向，不管是谁统治，都需要花费大量时间来施惠，以偿还欠下的人情，并建立必要的支持机构。

多亏了查理曼和虔诚者路易，9世纪教宗的金融资产存量非常大。在他们父子俩的共同努力下，教宗共和国获得了大量的地产，在意大利其他地区还享有一系列宝贵权利，包括一大部分税收，还有法庭和市场收费，以及种种其他的传统收入。正是有了这样的财源，最早的受益者哈德良一世和利奥三世才得以翻新他们城市的建筑。然而，从长远来看，所有这些源源不断的财富（哈德良和利奥花的是利息，而不是资本）却是个装了毒酒的金杯，至少不利于教宗获得对更广泛的西方教会的宗教领导力。简单地说，教宗有双重职责，他在掌管圣彼得共和国的

同时，又在拉丁基督教世界享有特殊的威望。因为查理曼的缘故，教宗获得了大量财富，这意味他在考虑地方政治时，会更多留意掌管财政大权的职能，而没有太多精力行使更大范围内的宗教职能。

即使在加洛林王朝仍然强大的时候，对财富控制权的争夺也不时威胁教宗的宗教职能。例如，9世纪40年代中期的塞尔吉乌斯二世就以特别糟糕的名声被写入史书。根据多少与其同时代出现的《教宗名录》，在塞尔吉乌斯担任教宗时，他的弟弟本尼迪克特（Benedict）通过出售地产和担任特定职位的权利发了财。然而，在匆忙得出结论之前，一定要注意，塞尔吉乌斯的传记是在他继任者在位的时期写的，而牺牲一位无法回嘴的已故前任来建立自己的声誉，一直是一种很有效的策略。教宗斯德望五世（885—891年在位）就采取了这样的策略，他（根据我们从《教宗名录》中找到的最后幸存的残篇）下令进行一项公共财产清查，以表明在他就任之前，从罗马教堂掠夺圣物的行为已经发生。他还命令恢复圣彼得的神职人员收取服务费这一古老习俗。[注]塞尔吉乌斯二世的政权在敛财方面可能比一些政权更露骨，但我倾向于认为，敛财是常规。否则的话，对教宗宝座的那种非常不合乎宗教规范的激烈争夺就很难理解了。争夺往往在继承问题出现时爆发，因为对于没能从当前的资产分配中获益的人来说，这是一个机会，可以支持一位未来会更关心他们利益的候选人，而既得利益者不会轻易放弃他们的好处，自然会出现激烈的斗争。

教宗仍然把握着对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宗教权威，这只是表象，即便是在尼古拉一世如日中天的时期，这种表象的背后仍然隐藏着潜在的脆弱性。“谁将从资产流动中受益”这个教宗共和国地方政治的固有问题始终存在。在帝国干预的威胁下，由此产生的分歧还能勉强得到遏制；一旦帝国不再是意大利中部一支真正的力量，地方政治就会胜出，将教宗的宗教职责降至第二位。实际上，如果你更仔细地分析9世纪的证据，就能从种种细节中看出更普遍的现象。

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已经在《伪伊西多尔教令集》的伪装中见过这

一现象。一群法兰克帝国教会人士用诡计创造了这个文本，随着其虚构的基督教历史在后来各种场合发挥作用（这是最初的创造者所难以想象的），许多援引、利用和抄写它的人也加入了这个诡计。在所有这一切中，至少在尼古拉一世之前，教宗个人从未扮演过，甚至没有想过要扮演这份伪造文本赋予他们的那种角色。在很大程度上，9世纪的教宗是被动的受益者（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法兰克帝国的神职人员出于自身考虑，想赋予教宗更积极的角色。如果任其自然发展，即使是在9世纪，教宗的宗教职责描述也只会围绕着传统的问题展开，诸如赞助传教工作、同意（或不同意）创建新主教区和大主教区（同样主要是在传教的背景下）。教宗会议一般会响应同时代加洛林王朝对“修正”计划的关注，即使在他们有更宏伟想法的情况下，教宗们也小心翼翼地不去践踏皇帝的既定权利。面对两位想要担任阿奎莱亚（Aquileia）大主教的主教之间的争吵，即弗雷瑞斯的安德烈（Andrew of Frejus）和格拉多的维内留斯（Venerius of Grado），教宗塞尔吉乌斯认为最好是召集一次大公会议。但是，召集这样的会议是皇帝们早已确立的权利，于是塞尔吉乌斯就向洛泰尔寻求许可。注换句话说，没有丝毫迹象表明，9世纪上半叶的教宗们开始认为圣彼得主教区地位特殊，应该可以干预教会的高级任命，或者是生活在意大利领土之外的皇帝、国王、大主教和主教之间的相互关系。

在9世纪的第三个25年间，虽然一些教宗变得比较活跃，但这也只有在加洛林王朝不断演变的结构内才有可能。历史上教宗所取得的一些重大胜利完全依赖于皇帝的支持。860—861年，尼古拉一世最终剥夺了拉韦纳大主教约翰的独立地位，迫使本来可以与他平起平坐的人来到罗马，对他卑躬屈膝。此时，尼古拉一世宽宏大量地原谅了他，约翰重获恩惠，代价是付出拉韦纳一定比例的收入。但是，就像《教宗名录》所记录的那样，这场交锋的关键是皇帝（出于自己的原因）拒绝继续支持大主教约翰独立。注笼统地说，尼古拉一世之所以能够比他的前任们发挥更大的影响力，是因为他抓住了帝国权力掮客间分裂带来的有利时机。实际上，秃头查理和日耳曼人路易一心要继承洛泰尔二世的土地，

在阻止其离婚方面，他们的这种自私欲望所起的作用要大于尼古拉一世的干预。如果当时只有一位加洛林王朝的统治者，如果他想要离婚的话，那么教宗在这件事上就不太可能有影响力了。苏瓦松的洛塔德主教和布尔日的乌尔弗拉德（Wulflad）主教的情况也是如此：尼古拉一世在某种程度上再次击败了兰斯的大主教辛克马尔，但他是在得到秃头查理的积极同意后才这么做的，是国王和大主教之间的一时利益分歧给了尼古拉一世这个机会。教宗被国王用来恫吓大主教，这只是一种短暂的联合。

此外，即使在这个时代，如果加洛林王朝的君主真的一心一意追求特定的宗教结果，教宗也缺乏真正实质性的权力杠杆来改变君主的立场。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对摩拉维亚的传教，尼古拉一世和他的几位继任者支持著名的希腊兄弟美多迪乌斯和西里尔。许多东法兰克教会的人一直对他们怀有敌意，但教宗的支持和皇帝的默许使兄弟二人及其继任者经营了20多年，从862年一直到885年。然而，美多迪乌斯死后，皇帝的想法变了，教宗斯德望五世也表示同意，已故兄弟的门徒立即遭到驱逐。[注]因此，教宗在9世纪的成功要么直接依赖于加洛林王朝的支持，要么就是利用了统一帝国结构开始瓦解造成的裂缝。而在这两种情况下，教宗制度都不是独立于帝国运作的，而且，当帝国在9世纪80年代后期真正瓦解时，教宗甚至无法维持那种偶尔能实现的局部宗教领导模式。不仅不再有帝国来敦促教宗干预和赋予教宗的裁决以效力，而且教宗职位完全成了罗马当地政治进程的牺牲品。

当然，并不是罗马宗教方面的一切都陷入了混乱。对福尔摩苏斯的审判是在动荡的初期发生的，当时，加洛林王朝时期的典型结构已经消失，但还没有出现可以取而代之的稳定的结构。虽然9世纪后期、10世纪和11世纪早期的教宗任期都很短暂，但即使对这一时期来说，9年里有9位教宗也太离谱了。这种程度的无政府状态反映出，所有的利益相关方都在忙着展示自己的实力，以便在一个所有旧的赌注都已作废的新世界里建立一种新的等级秩序。但是，从10世纪第一个十年的中期开始，一种后加洛林时代秩序的基本模式出现了。在没有加洛林王朝制约

的情况下，教宗融入了意大利中部地方贵族的权力结构，对教宗起主导作用的通常是那些在当地确立了政治地位的家族集团。在接下来的150年里，有两个家族在很大程度上轮流掌握着对教宗的控制权。

首先登场的是狄奥菲拉特（Theophylact）家族。其创始人是图斯库鲁姆伯爵（Count of Tusculum）狄奥菲拉特，他在罗马附近有大片的庄园。他本来是加洛林王朝最后一位对罗马事务感兴趣的君主瞎子路易（Louis the Blind）的忠实仆人。瞎子路易之得名，是因为他入侵意大利时失败，被意大利国王弄瞎了双眼。借着瞎子路易的势力，狄奥菲拉特将影响力扩展到了罗马城本身，在那里，他于905年成为军队的指挥官。到了915年，其余的罗马贵族已经接受了他的领导，宣布他为“执政官”，他直接任命的第一个教宗若望十世（914—928年在位）是在前一年上任的。就像加洛林王朝一样，每一代新人的出现，都会在家族内部引发许多阴谋和内斗，同时也为其他派系提供许多在社会边缘确立自己地位的机会。但是总的说来，这个家族在接下来的两代人里继续掌权，先是他的两个女儿狄奥多拉（Theodora）和臭名昭著的玛洛齐亚（Marozia），后是玛洛齐亚的儿子阿尔贝里克二世（Alberic II），从933年到954年，阿尔贝里克二世的荣誉头衔是“罗马人的公爵和元老院成员”。因此，从910年前后一直到950年，绝大多数教宗的任命都掌握在这个家族的不同成员（有时相互竞争，但总是与罗马贵族阶层的其他成员联合起来）手中。10世纪下半叶，这种控制权落到了克雷申蒂家族（Crescentii）手里，他们的庄园位于罗马南部和东部萨宾山区。到了11世纪早期，支配权又回到了狄奥菲拉特的后人手中。作为图斯库鲁姆伯爵，他们依然控制着原来的权力基础。注

这些贵族家族支配教宗职位的动机当然是想要控制经济资源，多亏了查理曼，这些经济资源都任凭罗马教会支配。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所有任命都没有考虑到这项工作的宗教方面。例如，阿尔贝里克二世提拔了教宗利奥七世（931—939年在位），后者与伟大的修道改革家克吕尼的奥多（Odo of Cluny，稍后会详细介绍）长期保持友谊，甚至把他带到罗马，让他帮忙改革这座城市三个古老的修道院，即圣保罗修

道院、圣洛伦佐修道院和圣阿格尼斯修道院。与此类似，11世纪的图斯库鲁姆伯爵家族还（在字面意思上）产生了本笃八世（1012—1024年在位）。本笃八世不仅是狄奥菲拉特家族任命的教宗，实际上还是这个家族的一员。他是10世纪后期图斯库鲁姆家族的首领格列高利伯爵的儿子，在领导了驱逐克雷申蒂家族的反叛之后，从11世纪早期开始统治罗马。尽管生在这样的罗马贵族世家，但他对自己的宗教职责极为认真，与皇帝亨利二世密切合作。亨利二世本人后来也被封为圣徒，可见他们的合作非常出色。

但是，这一时期有认真履行更广泛的宗教职责的“好”教宗，也有对宗教事务不那么感兴趣的教宗，二者数量相当。除了利奥七世之外，阿尔贝里克二世还任命了他自己的儿子为教宗，即若望十二世（955—964年在位）。若望十二世在18岁这个不合乎教规的年龄（主教应该至少有30岁）就任，他最大限度地享受该职位带给他的巨大财富和其他特权，9年后，他因中风去世，据说当时正与一名已婚女子同床共枕。1032年，格列高利的儿子、家族首领的继承人阿尔贝里克三世也任命了他的一个儿子作为教宗，像他的伯父本笃八世一样，他的本名也是狄奥菲拉特。这位新教宗再次模仿他的伯父，自称为本笃九世（1032—1048/1056年在位）。两者的相似之处到此为止。这位新的本笃教宗对宗教事务丝毫不感兴趣，而是沉迷于寻欢作乐（据说尝试了各种可能的形式）和谋取私利，他的无耻行径很快在城中激起了人们的反对，据说他甚至试图暗杀其反对者。

他任期的不确定性反映了他统治时期的动荡。他的第一个任期于1044年结束，当时他被赶出了罗马城。第二年，他强行返回罗马，然后将教宗职位卖给了他的教父，自己好去结婚（这是已知的唯一一个卖掉自己职位的教宗），但后来他又短暂地重回教宗之位，直到最后被废黜。(注)

所有这些都有效地说明，一旦失去了加洛林帝国的结构，教宗的地位就会受到巨大的限制。即使是在9世纪后期那些高调的教宗手中，教

宗制度依然是被动的，总是靠皇帝和帝国教会人员把事务提请注意，还要靠帝国的权威结构来执行裁决。帝国消失后，使某些教宗得以在更广阔的舞台上阔步前进的大多数基础设施也随之消失。直接的结果是，圣彼得共和国陷入了一系列始终无益，有时甚至是可耻的斗争中，他们争夺的是对查理曼赋予教会的资产的控制权。

占据主导地位的贵族家族成员当然都是基督徒，他们也不能置身于宏观的宗教潮流之外。他们或他们任命的人（通常是同样的人，因为图斯库鲁姆家族往往会让家族成员担任教宗）有时可能真的会对整个西方基督教世界面临的问题感兴趣。但最重要的是，教宗职位是这些家族在意大利中部维持权力的资产组合中的关键因素。因此，在教宗的职位描述中，更广泛的宗教领导职责总是排在地方政治职能之后。如果不明智地将《伪伊西多尔教令集》中对于教宗职位的想象，与教宗尼古拉一世时期的实际运作并置在一起，可能会产生一种错觉，但后来所发生的一切会将这种错觉完全打破。让教宗能够在9世纪对西方教会产生更广泛影响的，是加洛林帝国的各种表现形式和各种各样的法兰克统治者和神职人员。由于完全缺乏独立的权力杠杆，教宗完全依赖加洛林王朝的帝国结构来扮演更广泛的角色。这些东西消失后，这个职位就沦为地方政治拍卖会上的典当品。从9世纪90年代起，教宗职位就沦落成了意大利中部贵族的淫妇（厚道些的话，也可以说它是摇钱树），谁出价高就卖给谁。这是不折不扣的淫妇政治。

蛮族教宗

罗马的贵族也许有足够的力量控制教宗，让教宗满足于在拉丁基督教世界充当副总统一样的礼仪性角色，以主持一些重大场合为主要职责，但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其他势力对这种情况很不满意。显然，会对变革感兴趣的是一连串想要称帝的人。因为查理曼，那些想当皇帝的人都希望在罗马加冕，虽然虔诚者路易开创了自己动手的加洛林路线，但始

终没能取代800年圣诞节的象征意义。也是因为有了加洛林王朝的先例，所以想要称帝的人对于罗马的宗教生活质量都有了注意义务，毕竟罗马是拉丁西方最重要的宗教中心。在后加洛林时代的西欧，这两种传统偶尔会重合在一起，于是，想要称帝的北欧统治者来到罗马，既要加冕，又要通过治理教宗腐败的问题来赢得加分。

事实上，正是这些帝国干预的时刻，为图斯库鲁姆家族和克雷申蒂家族的轮流支配奠定了基础。奥托一世打破了图斯库鲁姆家族的第一段支配时期，但这是后来发生的事情。若望十二世（937—964年）是图斯库鲁姆伯爵阿尔贝里克二世的儿子，在10世纪60年代早期，他的恶行就激起了罗马内部的一些反抗。若望十二世因此愿意在962年2月2日为奥托加冕，以寻求重量级的政治支持，虽然他知道皇帝的头衔将给予奥托干涉罗马事务的许可。奥托再次离开之后，若望十二世试图通过煽动拜占庭和马札尔人联合反对奥托来减少损失。于是，奥托又回到这里，让一个新人取而代之，他就是利奥八世。皇帝奥托的注意力被迫转向北方，利奥也很快去世之后，克雷申蒂家族的势力取代了被驱逐的图斯库鲁姆家族。来自克雷申蒂家族的第一位教宗是若望十三世（965—972年在位），他是第一位克雷申蒂的弟弟。没过多久，克雷申蒂家族的势力在10世纪90年代受到奥托三世的侵蚀，在1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又被奥托三世的堂兄兼继任者亨利二世彻底击败。这最终让图斯库鲁姆家族东山再起，这次是从当时图斯库鲁姆伯爵的哥哥本笃八世开始的。[注]但是，至少奥托三世和亨利二世不是只对加冕感兴趣，他们也致力于教会改革的事业。公元1000年的时候，西方教会最热门的两个问题是买卖圣职和教士结婚。英文表示“买卖圣职”的词是simony，这个词源自行邪术的西门（Simon Magus）。《使徒行传》8∶9—24中记载，他拿着钱去找使徒彼得和约翰，说如果他们愿意将按手使人受圣灵的权柄也给他，他就把钱给使徒。很多教会机构（主教区、修道院，还有教区教堂）当时都是私有财产，它们的创始人（和创始人的继承人）保留了对它们的权利，因此在一些地方，新担任教职的人在上任后支付经济补偿是完全正常的。到了奥托三世统治时期，直接购买教职的行为受到了普遍谴

责，但如何定义买卖圣职是个棘手的问题。如果一个人在上任时给拥有教会机构的人送了一件礼物，这是买卖圣职吗？较为激进的改革家主张，无论是否涉及礼物，任何俗人都不应该对教会的任命有任何发言权。但问题又来了：什么人才是俗人呢？国王和皇帝认为自己不属于这一范畴。这次广泛的改革方案起源于9世纪和10世纪的修道改革运动。许多改革者得出这样的结论：世俗利益（尤其是修道院的财富）是阻碍许多修道院接受行为、学习和礼拜仪式新标准的主要障碍。这些新标准最早出现在查理曼和虔诚者路易统治时期。然而，在10世纪的过程中，改革从修道院扩展到了整个教会。对教士结婚的谴责起源也相似，这再次反映了最初修道院对守贞和虔诚之间关系的强调。附属于大教堂的神职人员应该在团契中过无性的生活，放弃私人财产，这先是成为要求，后来变成期望，然后，加上了一点圣礼理论，又变成这样一种论点：结婚或有情人的教士是不适合执行圣礼的。正如11世纪改革的主要支持者彼得·达米安（Peter Damian）所言："如果你与你属灵的女儿乱伦，凭良心说，你怎么敢面对主身体的奥秘？"[注]

奥托三世和亨利二世愿意，也准备好要解决这两个问题，他们把一个经过改造的教宗制度看作可以协助他们完成这一任务的工具。他们持有与查理曼大致相同的观点，也就是使教会的虔诚臻于完美是神赋予他们的职责，但与查理曼不同的是，他们让教宗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更积极的角色。尽管如此，这种合作关系仍然是按照皇帝的条件建立的。奥托三世尤其强硬。他公开批判《君士坦丁赠礼》是伪造品，并明确表示，他过去是，现在也应该被视为联盟中级别更高的那一个。他对罗马的候选人标准不以为然（这个标准原本是教宗若望十五世用来制衡第一位克雷申蒂伯爵的儿子的），还推举了两名北方人作为他自己的教宗候选人。先是他的堂兄布鲁诺（Bruno），即格列高利五世。格列高利于999年英年早逝（死因蹊跷）后，奥托三世指定了欧里亚克的热尔贝（Gerbert），也就是西尔维斯特二世（Sylvester II，999—1003年在位）。布鲁诺是奥托一世的孙子，因此有直接的萨克森血统，虽然他的父亲最终被任命为更南边的卡林西亚公爵（Duke of Carinthia）。热尔

贝来自法国中南部。布鲁诺和热尔贝都在后加洛林时代的欧洲北部教会受过很好的教育。奥托的专职教士格列高利是东法兰克王国大教堂学校的毕业生，而热尔贝则是他那个时代最伟大的学者之一（他精通阿拉伯人保存的希腊数学和科学知识，因将算盘和浑天仪重新引入西方而闻名）。作为修道士，热尔贝是在上奥弗涅的欧里亚克修道院接受的训练，而这座修道院是10世纪最著名的修道院之一。两人都致力于同样的改革方案，热尔贝活得足够久，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亨利二世则满足于与来自图斯库鲁姆家族的本笃八世合作，但本笃八世本人也致力于改革。1022年，皇帝和教宗在帕维亚共同主持了一次改革会议，会议再次敲响了反对位于当前改革方案核心的双重弊端的大鼓。㊟

占据主导地位的统治者和更加积极的教宗合作，这种基督教领导的新模式在公元1000年是必要的，而在200年前则并非如此，原因很简单。在他惊人的征服生涯之后，查理曼在一定程度上将整个西方基督教世界置于自己的直接控制之下；而尽管拥有同样的皇帝头衔，但查理曼的奥托王朝和萨利安王朝继任者已经有了本质上的不同。按照加洛林王朝时期的标准，查理曼的继任者控制了东法兰克王国、意大利北部以及其他一些零星地区。西法兰克王国不在他们的控制范围之内，伊比利亚半岛和中欧东部新改宗基督教的广大地区也不在他们的控制范围之内。到了公元1000年，波希米亚王国、波兰王国和马札尔王国都已经改宗拉丁基督教。这个扩大了的西方基督教世界很大一部分是由那些效忠于其他国王的教会人员管理的，他们不希望看到自己的土地受到单纯来自帝国的直接干预。在这种情况下，教宗就成了更加中立的盟友，教宗参与改革进程，人们就不大会认为改革是政治干预的借口。有了教宗的加入，改革就可以作为整个西方基督教世界的一个问题来提出，这有助于避免再次出现公元500年至700年之间的情况，当时西方基督教世界实际上是以不同的王国为基础、在不同的教会群体中运作的（第7章）。

让皇帝与教宗之间的联盟更加有效，同时使后加洛林时代不至于重蹈后罗马时代分裂的覆辙的，是另外一股重要的势力，那股势力已经准备好让教宗更加积极地参与西方教会的运作。多亏了查理曼及其继任者

发起的结构改革，政治分裂并没有导致宗教和文化的瓦解，即使到了公元1000年，西方教会的许多高级教士仍然在一定程度上意见一致。其中许多人出身大教堂及其附属学校，而大教堂和学校的基本框架是查理曼和他的顾问们建立起来的。随着基督教在莱茵河和易北河以东的传播，教会的图书馆越来越大，新的大教堂也建立了起来。文本继续在教士之间传播，跨越政治边界，教士继续使用基本相同的礼拜和布道仪式，有着相同的训练和神学传统。这些令人敬畏的机构（它们也是主教和大主教招募的主要场所）中出来的人大体上有相同的道德和文化观念，往往世界观相近。例如，亨利二世所有的主教都来自他王国内主要的大教堂学校，当时其他国王和统治者面对的情况通常也是如此。

在第二个千年到来的时候，拉丁基督教世界领导者的另一个主要来源是大修道院，这些领导者也有类似的世界观。大修道院的基本生活模式也是在加洛林时代确定下来的，至少帝国修道院是这样，它们积极响应阿尼亚讷的本笃和虔诚者路易的修道改革方案。因此，这些修道院也有共同的礼拜仪式和文化传统，图书馆的藏书也相近，这些都与大教堂非常相似。此外，后加洛林时代发生了很多变化，通过种种机制，阿尼亚讷的本笃的改革模式传播到了地理和政治背景不同的众多修道院。当时最著名的修道院是位于勃艮第的克吕尼修道院，修道士们在那里自己进行了改革，但他们遵循的是已确立的加洛林时期的本笃会模式。在其他地方，有时（和在罗马一样）在克吕尼修道院的积极协助下，世俗领主或主教（在莱茵兰地区著名的戈尔泽修道院，则是梅斯大主教）需要先接受改革原则。但在各处，同样的宗教生活模式正在西方基督教世界古老的和新得的土地上迅速传播，在文化层面上，这种宗教生活模式与大教堂学校的文化有相当多的重叠。虽然有细节上的差异，比如从哪个教会阶层开始不接纳结婚的教士，如何区分赠礼和买卖圣职，但是从各大修道院和大教堂里出来的人同样致力于公元1000年的宏大改革方案。[注]后加洛林时代的政治分裂并没有带来西方基督教世界宗教文化的分裂，不管是修道院出身还是大教堂出身，高级教士共同文化中的一个方面都让他们接受乃至期待教宗发挥更大的宗教领导作用。9世纪后期和

10世纪，在大教堂和修道院里，《伪伊西多尔教令集》被反复抄写和阅读。早期幸存的抄本绝大多数藏于图书馆，拉丁基督教会的领袖们就是在那些图书馆里接受的训练。就这样，《伪伊西多尔教令集》中关于教宗统治下更美好的古代晚期基督教世界的说法一代代传了下去。10世纪时，人们感到有必要编纂新的教会法令手册，比如普吕姆人雷吉诺和沃尔姆斯的布尔夏德（Burchard of Worms）编纂的那种，而这个时候，《伪伊西多尔教令集》中的许多伪造文本就自然而然地进入了新的法令集。因此，即使最初的法令集已经过期，它也仍然是教宗权威应是西方基督教世界运作的核心这一观点的有力支撑。注

这一观点的影响力还表现在，即使在淫妇政治的时代，西方教会也要求教宗至少履行一些新的职能。这一进程不仅是《伪伊西多尔教令集》的产物，而且还受到9世纪第三个25年的一些教宗所采取的高姿态的推动。虽然该进程有赖于加洛林王朝的帝国结构，但其本身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这部法令集的影响力。最著名的是，各种经过改革的修道院开始将自己置于教宗正式的保护之下，并为此要求书面的特许状。克吕尼修道院于909年开创了这一潮流，当时改革派修道士获得了最初的保护文件，尽管后加洛林时代的罗马正处于最混乱的时期。接着，在随后的一个世纪里，修道院获得了更多的教宗保护文书，并在998年将教宗格列高利五世的名字附在一份完整而重要的修道院财产清单上。正如一项极具影响力的对克吕尼修道院土地所有权的研究所指出的那样，这些教宗保护文件几乎没有实用价值，在10世纪的勃艮第，教宗没有真正的影响力，要想寻求真正的保护，修道院需要依靠其他机制。然而，这些文件宣告了克吕尼修道院在更广阔的基督教世界中的地位。在此意义上，它们的用处足以让许多其他的修道院效仿。从896年到1049年，宗教机构——其中绝大多数是修道院（包括那个时期大部分改革后的修道院）——起草了630份教宗特许状，以确认各种不同的权利，而其中绝大多数与土地持有权有关。大约四分之一的特许状是伪造的——有些机构可能并不想为了从罗马获得一份真正的文件而费心费钱，于是干脆自己伪造。

然而，无论是真实的还是伪造的，想要获得教宗特许状的愿望（在这一时期之前是极为罕见的）清楚地表明，至少在西方教会人士的心目中，教宗的象征作用现在更大了。他们最终还让教宗参与了封圣。在罗马帝国时期和中世纪早期的基督教中，封圣完全是圣徒所在社区的决定。利益相关方编撰一部圣徒生平，建立一个崇拜中心，就看被推崇的圣徒是不是能吸引一批追随者了。在10世纪的最后10年里，当地基督教团体第一次向罗马寻求额外的支持，希望为奥格斯堡主教乌尔里希（Bishop Ulrich of Augsburg）举行宣福礼，他曾是奥托王朝教会改革的重要支持者。993年1月31日，在拉特兰宫举行的罗马会议上，教宗若望十五世十分乐意地确认了他的圣徒地位，这一结果通过教宗诏书正式公布。在这一创新之后的10年中，波罗的海地区的5名在传教中殉道的人被封为圣徒，这个新的程序迅速传播开来。注

奥托三世和亨利二世把教宗当成改革事业中积极的盟友，相当于在肥沃的土地上播下了种子。但要想为西方基督教世界这个统一的文化单元确立整体上的宗教权威，教宗与皇帝的联盟远非完美的解决方案。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大部分都在其他统治者的控制之下，因此人们可能会觉得与帝国结盟的教宗难以公正行事，不可信任。同样重要的是，虽然在皇帝加冕的伟大时刻还看不出来，但10世纪和11世纪的神圣罗马帝国不怎么稳固，其统治者面临着系统性的不稳定，尤其是在刚上台的时候（就像加洛林王朝的统治者一样）。因此，他们不可能始终聚焦于罗马，毕竟还得应付边境上的许多紧迫问题。因此在实践中，不能指望这个帝国（正如不能指望之前的加洛林帝国）始终拥有必要的能力，来确保意大利中部的贵族不会把教宗带回以罗马为中心的争夺，而这些是后加洛林时代所有教宗丑闻的核心。例如，在亨利二世和本笃八世联合主持的会议之后，本笃八世荒淫无度的侄子本笃九世利用教会财富寻欢作乐，其程度不亚于最恶劣的淫妇政治，而亨利的继任者却对此袖手旁观。因此，西方基督教世界要想发挥职能，要想保持宗教上的统一，真正需要的是一个独立于帝国统治的领导结构。但是，如果这个机构是教宗，就还必须找到某种替代机制，使其能够独立于意大利贵族掠夺性的

金钱野心。要想了解这个问题是如何解决的，我们就要讲到最伟大的蛮族教宗：艾吉斯海姆—达格斯堡的布鲁诺（Bruno of Eguisheim-Dagsburg）。幸好他还有一个更短的名字：利奥九世。

这个故事开始时，人们还没有意识到其非比寻常的意义。它是以一种普普通通的方式开始的：欧洲北部的一位君主对罗马产生了兴趣，因为他想要称帝。这一次是亨利三世，他不是亨利二世的直系后裔，因为亨利二世和他的妻子曾发誓禁欲。因此，权力从奥托王朝直系传给了他们的萨利安表亲——奥托一世女儿的后人。亨利在他父亲于1039年去世后继承了北方的权力，花了一段时间巩固势力，到了11世纪40年代中期，他已经准备好要称帝了。此时，他发现自己面前有三位教宗，但他们都有各自的问题。最糟糕的是本笃九世，而他的教父约翰·格拉提安（John Gratian，他以1 000磅白银的价格从本笃九世手中买下了教宗一职）即后来的格列高利六世，是一位公认的改革者，但当时人们很介意买卖圣职这件事，因此考虑到他当上教宗的方式，他根本不适合为亨利加冕。第三位教宗是西尔维斯特三世，即原来的萨比纳主教约翰（Bishop John of Sabina），他显然是在本笃九世的离谱行为所引发的混乱中，由一个或多个未知的派系推举上来的，但除此之外，他的其他方面并不为人所知。亨利不能容忍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于是提拔了他自己的一个神职人员，即班贝格主教苏伊格尔（Suidger Bishop of Bamberg），他成为革利免二世，并在1046年圣诞节正式为亨利加冕。和亨利二世一样，亨利三世也是一位坚定的改革者，看起来，西方基督教世界将会重复皇帝和教宗联盟的主题。然而，事情的结果截然不同，这一方面是因为意大利的气候，另一方面是因为亨利三世指定的下一位教宗惊人的精力。到了1048年夏天，这种气候已经杀死了革利免和他的直接继任者达玛苏二世（Damasus II）。达玛苏二世本来也是亨利的主教，即布里克森主教波波（Bishop Poppo of Brixen），可怜他的教宗任期只从1048年7月17日持续到8月9日，但是如果比起任期之短，他只能排在第七个。

亨利三世指定的下一位教宗是艾吉斯海姆—达格斯堡的布鲁诺，即

利奥九世（1049—1054年在位）。他出身高贵，是萨利亚王朝的皇族，曾在图勒（Toul）的大教堂学校接受教育。据同时代的圣徒生平记载，他从早年就显示出圣洁的气质，他对教宗圣座很忠诚，几乎每年都要造访罗马。这一记录让我们一窥10世纪一个主要教会机构的日常生活，但这并不意味着布鲁诺是个任人摆布的温顺修道者。当年轻的布鲁诺不得不率领他的骑士小分队去作战时，他表现出高超的技巧和谨慎，这在圣徒生平中也得到了毫不吝啬的颂扬。他在1026年被顺理成章地提升为图勒的主教，热心支持反对买卖圣职和教士结婚的改革事业，也热情支持克吕尼改革。所有这些都使他成为那个时代标准的日耳曼贵族主教。让他脱颖而出的是，他对教宗在西方教会可能扮演的更大角色有着清晰的认识，在相对短暂的在位期间，他以充足的精力和想象力开启了一场彻底的革命。

他从一开始就有明确的目标。他被他的皇帝亲戚选中担任这个职位，但他拒绝接受（正如圣徒生平告诉我们的那样，这是必要的犹豫），除非罗马的神职人员和人民愿意全力支持他。很明显，和那些外来的、皇帝指定的教宗人选相比，他想要成就的要多得多，因为那些人一直未能改变自加洛林王朝崩溃以来教宗人选基本来自当地这一事实，而实现这一变化的关键和直接的战略是从西欧各地招募一批志同道合的教会人士来支援。安贝尔（Humbert）是从利奥九世自己以前主教区的穆瓦昂穆蒂耶（Moyenmoutier）修道院引进来的；利奥九世还招募了大教堂的神职人员，比如来自列日大教堂的弗雷德里克（Frederic），他是洛林公爵戈弗雷（Godfrey）的弟弟；此外还有意大利的神职人员，其中最有名的是一个叫希尔德布兰德（Hildebrand，我们很快就会再次讲到他）的人。希尔德布兰德最初是从约翰·格拉提安的随从中被提拔起来的，后来又随他离开意大利，被流放到克吕尼修道院。利奥九世还与著名的隐士领袖、知识分子彼得·达米安保持着密切联系。彼得·达米安最初来自拉韦纳，是在意大利接受的训练。就这样，利奥九世让来自西方基督教世界其他地方的改革者如潮水般涌入罗马，有些来自帝国内部，有些来自帝国之外，他们代表了当时基督教的所有主要分支：大教

堂，修道院，甚至还有更激进的派别，比如彼得·达米安，他认为修道院太奢侈了。他将这些人擢升为罗马高级神职人员，其总体效果是打破了该机构领导层与意大利中部贵族之间的紧密联系，并在此过程中将整个机构的精力重新集中在改革项目上。

在拉特兰宫聚集国际改革家之后，在其任期的剩余时间里，利奥九世把大部分精力用于推进改革方案。他所做的事情有些相对常规。1049年，他召开了拉特兰会议，和1022年的帕维亚会议一样，再次谴责了买卖圣职和教士结婚，但这次的谴责更加激烈。利奥九世宣称所有副执事及以上级别的神职人员都应该保持独身，就教会统治阶层而言，这次的线画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低。他还对苏特里（Sutri）的主教进行了直接的人身指控，说他的教职是买来的，以至于这位主教当场吓死。更让同时代人吃惊的是，利奥并没有将他的活动范围局限于罗马及其周边地区，而是扩展到罗马城之外，甚至是意大利之外，在法兰西和德意志也召开了改革会议，在他5年的任内，会议多达11或12次（这还不太确定）。巡游期间，教宗召集当地主要神职人员参加会议，将改革方案坚定地摆在桌面上，亲自质问在场教会人员中的违法者。最著名的是，1049年圣雷米吉乌斯（St Remigius）遗骸的迁葬仪式（在通常更宏伟的新坟墓中重新埋葬的仪式）变成了兰斯的一次大型改革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利奥直截了当地问聚集在一起的20位法国主教，他们的职位是不是花钱买来的，他们是否犯了买卖圣职罪。朗格勒（Langres）的主教拒绝回答，利奥九世马上对他处以绝罚。戏剧性的事发生了，贝桑松（Besançon）大主教在试图为他辩护时突然变成了哑巴（朗格勒的主教是他的副手之一）。见状，其余的人中有5人认罪，他们获得原谅并重新被任命为原职。只有南特的主教被免职，因为他继承了他父亲的职位，这被认为是完全不可接受的。

突然之间，西方基督教世界要面对一个完全不同的教宗，他真的准备把对上帝的恐惧加在违法者身上。这位教宗不是坐在罗马接受仪式性的访问，签署在实践中毫无意义的特许状，而是在教会事务中掌握主动权。利奥九世引发了一场大爆炸，他利用宗教会议将自己和教宗职位置

于当时改革方案的中心，在同时代的许多评论中都可以看到这场爆炸的冲击波。一位旁听了兰斯会议和审判的目击者许多年之后仍然很激动，记下了整个事件给他带来的恐惧。利奥九世这位领导者很有远见，认识到可以利用教宗的威望来建立权威，在他任内，教宗不再是负责祈祷的高级副总统，而是成了自封的西方基督教世界的领导者。(注)

因此，教宗书信首次直接引用《君士坦丁赠礼》也发生在利奥统治时期，这并非巧合。信的矛头指向君士坦丁堡宗主教，要处理的问题是意大利南部部分地区的管辖权。教宗共和国成立后，君士坦丁堡将西西里岛和意大利南部地区从罗马的管辖范围内收回。利奥想把这些地区要回来，并利用这封信来证明他在东方和西方基督教世界的最高地位。拜占庭人不愿合作，安贝尔（此时已经成为枢机主教）率领的教宗使团毫不犹豫地颁布了将君士坦丁堡宗主教处以绝罚的诏书，由此引发了东正教和天主教之间的大分裂。安贝尔在对拜占庭的长篇演讲中，准确地阐述了利奥九世带给教宗制度的这种新精神：

> 所有的人都十分尊重这位拥有罗马使徒职分的人，他们更愿意从这位教会领袖的口中接受神圣的诫命和传统，而不是从《圣经》和教父著作中。就这样，教宗使几乎整个世界都满怀喜悦和热情地追随上帝。

长期以来对特殊威望的要求现在成了一种积极的教宗至上主义，这被用来证明利奥九世和他的同事们夺取基督教领导权的行为是正当的。(注)

当然，在此之前，教宗也有过辉煌时刻，尤其是在利奥一世和大尼古拉一世的时代。利奥九世发动的革命将会永久改变教宗职位的性质，而这一点在当时并不那么明显。在如此恢弘的开端之后，他的统治在对抗入侵的诺曼人的过程中逐渐结束。诺曼人正忙于占领西西里岛和意大利南部的大部分地区（这就是为什么利奥九世会重新和君士坦丁堡讨论

管辖权的问题），他们先是打败了教宗拼凑起来的队伍（亨利三世被不可避免地牵制在北方），然后又俘虏了教宗本人。虽然他们对利奥九世很恭敬，但还是把他囚禁了大半年，他被释放后不久就死了。他的两任后继者也是北方人，维克托二世（1055—1057年在位，即原来的艾希施泰特主教）和斯德望九世（1057—1058年在位，即利奥九世引到罗马的洛林的弗雷德里克）。但是，由于亨利三世也在这段时期内去世，图斯库鲁姆家族把斯德望九世的死当作了卷土重来的机遇。1058年，他们推出了自己的教宗人选，即本笃十世，在他于1061年去世后，是霍诺利乌斯二世（Honorius II）。

然而，这一次，时钟再也拨不回去了。利奥九世的统治已经在教宗制度的核心创造了团结、自信的领导层，这个领导层是不会放弃他们所发起的计划的。他为罗马高级神职人员群体注入的新鲜血液仍在那里，不会轻易被意大利中部政治运作的旧模式所同化。作为一个整体，利奥九世任命的人准备将这场革命延续到下一代。因此，在斯德望九世死后，利奥九世的直系继续掌权，他们就是教宗尼古拉二世（1059—1061年在位）和亚历山大二世（1061—1073年在位）。尼古拉二世也来自北方，他本名热拉尔（Gerard），出生在阿尔勒附近的勃艮第。亚历山大二世当教宗前，是卢卡的改革派主教安瑟伦（Bishop Anselm of Lucca）。这两位教宗在任期内采取了进一步的关键措施，巩固和扩大了改革的成果。最重要的是，1059年的复活节，尼古拉二世召集基督教世界各地的113位主教来到罗马参加宗教会议，使教宗选举程序的重大改革合法化。从此以后，选举只能由枢机主教团来进行，主教团包括7位枢机主教（来自7个古老的罗马城郊教区）、28位负责罗马主要教堂的枢机司祭（cardinal priest）、18位枢机助祭（cardinal deacon，他们管理着原来的慈善事业）。即使有皇帝，他也是没有发言权的。教宗单方面宣布独立，这是向前迈出的又一关键步伐。利奥九世在兰斯召开的宗教会议虽然声势很大，但是只有20名法国主教参加，还有100多人没有来。这是因为法国国王认为利奥是帝国的产物（这并非没有道理），拒绝让其余的人参会。因此，要想成为真正的西方基督教领袖，教宗最终

必须独立于帝国之外。

正如你所料，北方对此的反应是充满敌意的，以德意志为主的神圣罗马帝国一方也开始任命自己的教宗人选。但帝国的新统治者亨利四世在1056年继承大统时年仅6岁，因此他的政权实际上没有能力干涉罗马。尼古拉二世进一步改变了政策，让教宗更加独立于神圣罗马帝国和图斯库鲁姆家族。1059年，他来了个大变脸，与入侵的诺曼人达成了一项重要的和平协议，承认他们的征服完全合法，以换取他们的军事和政治支持。在短期内，新教宗所需要的正是足够的军事力量，用以维护自身的独立。而利奥九世改革更广泛的方面都已经确立下来，无论是在罗马内部还是外部。

在罗马内部，亚历山大二世担任教宗时期，对教宗官僚机构进行了重大的重组，使其操作系统适应改革者加给教宗的职务描述。特别是，教宗信件的正式登记重新确立为一种行政惯例。亚历山大二世的档案已不复存在，但他的继任者格列高利七世的档案保存了下来。登记工作包括将教宗发出的每封重要信件抄写一份，将其保存在教宗档案中，以核实教宗所做的决定，将欺诈的可能性降到最低。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如果古代一直有这种做法的话，也就不会有《伪伊西多尔教令集》这样的伪造教令了，至少没有教宗的默许是不可能的。这种做法模仿了罗马帝国晚期的书记处（chancery），在更久远的过去，至少在某些教宗统治时期，尤其是格列高利一世时期，有类似的做法（其中一些记录在9世纪的莎草纸上仍然存在），还有一些9世纪的教宗（尤其是若望八世，872—882年在位）也这么做了。在古代晚期和中世纪早期，这甚至可能是完全标准的教宗做法，而在淫妇政治的混乱中，这一做法肯定已经被搁置了。恢复该做法是一个明确的信号，表明改革者明白他们正在创建一个新的教宗制度，由于教宗至上的教义，教宗的每一句话在未来都可能具有重大意义，特别是在法律裁决方面，因此需要认真记录在案。亚历山大二世担任教宗期间，开始对罗马的金融机构进行重大重组（这将成为贯穿整个12世纪的主题），因为改革者试图对罗马所有的收入加强管理，这些收入有的历史悠久，也有的来自加洛林王朝时期的慷慨捐

赠。与此同时，很多教宗地产此前都以非常慷慨的条件租给了意大利中部的贵族成员，让这些地产回归罗马教宗的控制需要一场重大的斗争。

在罗马之外，尼古拉二世和亚历山大二世都成功维护了利奥九世积极发挥教宗作用的传统，特别是派出教宗任命的法官，即所谓的使节，他们在一切可能的情况下积极宣传罗马的主张。尼古拉二世担任教宗期间，彼得·达米安和未来的亚历山大二世（当时仍是卢卡主教）成功迫使米兰教会改变了其任命方式（通常涉及大量的金钱），使其更加符合改革方案。这意味着米兰大主教正式接受教宗的权威，而在尼古拉二世于1059年召开的会议上，他是最不情愿参加的与会者之一。在亚历山大二世的统治下，彼得·达米安被再次派去审理克吕尼修道院的修道士和马孔主教之间的争端，而克吕尼修道院就坐落在马孔主教的辖区之内。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长期以来，克吕尼修道院一直从罗马获得意味着名义上的保护的特许状，而这一次，罗马的保护真正发挥了作用。彼得在索恩河畔沙隆召集会议，会议规定克吕尼修道院完全独立于其主教，不再欠主教任何捐税或义务。此外，亚历山大二世还派出了其他的使节。1070年，他应征服者威廉的邀请向英格兰派出了使节（1066年他曾为威廉的远征祝福），以帮助解决盎格鲁—撒克逊教会的混乱。他的使节还向北进入神圣罗马帝国，裁决班贝格主教和康斯坦兹主教之间的一场争执，并最终说服亨利四世不与妻子贝尔塔（Bertha）离婚。[注]

亚历山大二世本人不是北方人，但他的方案和观点受到了一连串北方教宗的影响，而这些教宗领导罗马教宗制经历了为期20年的持续改革。到这一时期结束时，教宗职位的性质和做法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11世纪的第三个25年，由北方的改革者接管后，教宗制度被重新设计，成为教会权威的活跃来源，教宗也积极支持整个拉丁基督教世界的改革方案。教宗还摆脱了对与帝国结盟的依赖，过去一些教宗曾利用这类联盟获得一时的声望，但结果并不令人满意。借助《君士坦丁赠礼》，他们明确宣称教宗至上，虽然此时只是在与君士坦丁堡争执的背景下做此宣称。革利免二世是这群人中比较没有名气的一个，因为他去世太早，他似乎还创造了一个专门术语papatus（教宗的职位）来描述他

们正在创建的新机构。这个词以episcopatus（主教）为原型，但旨在表明教宗的等级地位明显高于任何主教。到亚历山大二世去世时，教宗已经至少在试图成为西方基督教世界的领袖了。

然而，加洛林王朝时期及其后教宗制度发展历程中最引人注目的特点或许是，这种新型的教宗制度完全不是罗马教会内部野心的产物，而是由消费者需求创造的，是那些来自古罗马人眼中蛮夷之地的改革派教会人士创造的。11世纪中叶，这些北方蛮族人大举进入罗马，着手建立一个教会层面上的新罗马帝国。他们经过深思熟虑，完全清楚自己在做什么。正如彼得·达米安所说：

> 现在，作为使徒们的宗座，罗马教会应该仿效古代罗马人的朝廷。正如古代世俗的元老院努力征服各个民族，使其臣服于罗马帝国，作为普世教会的属灵元老，现在罗马教会的领导者应该依据他们的律令，让全人类服从于上帝，他才是真正的皇帝。注

但是在1173年，这个新的罗马帝国还远未建成。在寻求扩大其宗教权威的职权范围时，改革后的教宗只掌握着极其有限的权力杠杆。在很大程度上，教宗干预教会事务的实际能力仍然有局限，他干预时，要么是受到了邀请，要么是在缺乏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的地区活动。当国王或皇帝十分强大时，教宗权力的范围仍然非常有限，而国王或皇帝仍然坚持古老的教义，认为自己也是由上帝直接任命的。如何获得真正的权力杠杆，用它们来积极实现自己的目的，而不仅仅是被动回应其他方面的要求，这是建立新的罗马教会帝国道路上的最后一个挑战。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借用罗马的皇帝所采用的一个关键机制，他们曾经利用这一机制统治亚欧大陆西部迄今为止面积最大、存续时间最长的国家。

《不协调法典之协调》

快速浏览一下亚历山大二世死后发生的事，你可能会认为实现教宗帝国的传统罗马方法是直接恐吓。这当然是第一个罗马帝国缔造者手中的可靠武器，虽说后来被征服的地方精英逐渐愿意接受罗马的价值观，尤其是从公元2世纪开始，这将帝国的结构变成了一种更加两相情愿的事情。亚历山大的继任者是格列高利七世（1073—1085年在位），即最初是约翰·格拉提安随从的希尔德布兰德。格列高利七世最著名的举措是，在买卖圣职问题上，他将改革后的教宗职位置于与亨利四世的帝国直接对抗的新道路上，这一政策就像巴拉克拉瓦（Balaclava）战役中轻骑兵冲锋那样微妙。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对格列高利七世不太公平。在他那个时代的大多数西欧国家，他也发现了同样的问题。他很聪明，意识到不可能同时解决所有问题，所以他没有去招惹英法两国的国王。在他统治的头18个月里，他也试着说服别人，但徒劳无功，于是，他在1075年1月以教宗书信的形式大张旗鼓地宣布改变方针，这封信被广泛分发到欧洲西部的宫廷和主要教会机构：

> 我几乎找不到一个在职务或生活方式上遵守律法，以对基督的爱而非世俗的野心来统治基督徒的主教。在我所知道的所有世俗的君主中，没有一个把上帝的荣耀放在自己之前，把公义放在利益之前……因为没有君主为这些事情操心，所以**我们**必须保护虔诚之人的生命。

最后一行的挖苦特别针对亨利四世，他具有改革意识的父亲在11世纪40年代开启了教宗制度的变革。格列高利七世选择在帝国的领土上作战。他的特别目标是意大利北部帝国大城市米兰的主教区，那里买卖圣职的现象非常普遍。他所选择的武器是号召米兰的广大民众抵制购买圣职和结婚的神职人员，拒绝参加他们主持的礼拜。从这里开始，争执很快失去了控制。到了1076年1月，亨利四世感到实在无法再容忍格列高利七世，于是开始策划迫使他退位。作为回应，格列高利七世在同年的

四旬斋会议上对亨利四世处以绝罚。教宗这是在故意挑衅，他知道帝国内部的麻烦，一个由德意志诸侯组成的联盟公开反叛，而这对他有利。亨利四世决定妥协。1077年1月，他来到托斯卡纳家族的女伯爵玛蒂尔达（Countess Matilda）位于卡诺萨的城堡外（格列高利七世正在此避难），当众表示忏悔。他获许重归教会，但他们之间的问题并没有解决。防止俗人（包括国王和皇帝）在主教和其他神职人员的任命上有任何发言权，这是格列高利七世的目标。所谓的主教叙任权之争（因为人们探讨的主要是主教的任职仪式）发展到了高潮。到了1080年春天，他们再次发生冲突，格列高利七世第二次对亨利四世处以绝罚，并承认德意志诸侯联盟的领袖斯瓦比亚的鲁道夫（Rudolf of Swabia）接替亨利四世为王。《君士坦丁赠礼》称，君士坦丁在前往君士坦丁堡时将皇权移交给了教宗西尔维斯特；在此基础上，格列高利七世明确认为自己的权威凌驾于皇帝之上，他可以随意罢免任何不能胜任这一职务的人。此时，教宗在宗教权威之外，终于获得了政治权威，而罗马的这种宗教权威是9世纪时在《君士坦丁赠礼》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教宗对皇权的主张终于得到了充分的表达。(注)

但实际上，在一个关键层面上，格列高利七世的政策根本不可能成功。在紧要关头，亨利四世（或者英法两国的国王）不可能将其领地内高级教职的控制权全部拱手让与罗马，原因很简单：中世纪欧洲的主教区和主要修道院的资金来自大量地产的收入。在这个农业占主导地位的世界里，再没有别的方式可以为主要机构提供资金了（在古代也是如此）。对教会的捐赠可以享受税收的减免，在这种政策的鼓励下，经过数个世纪的捐赠，11世纪后期不同宗教机构根据各种条件（不同机构能够从总收入中获得的百分比不同）控制着西欧大片的可耕种土地，通常占当地土地财富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显然，没有国家能够承受如此之大的潜在税基的损失，在当地统治者看来，这些机构都很有价值，能够从中获得种种款项和服务。宗教机构缴纳的款项中，许多是这样或那样的经济税（包括现金和实物），但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税。修道院院长和主教有时被委以王国内大片地区的管理和法律责任，而无论如何，

其中最重要的职责是提供骑士服务。这就要求主教区和修道院在自己的一部分土地上供养一定数量的骑士，在国王需要调动军队时，他们就可以派上用场。读者应该还记得利奥九世的圣徒生平，其中歌颂的就是他在担任主教之前率领这些骑士征战时的领导才能。在英格兰（11世纪的记录比较完整），主教区和修道院提供了国王可以调动的全部军事力量的三分之一。我们没有理由认为这一比例在其他地方会有很大不同，因为主教和主要的修道院院长（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国王任命的。此外，我们的史料来源强烈暗示，来自宗教机构的军事分队在政治上更为可靠。因此，当一个国王陷入困境时，他往往会求助于这些骑士，而不是那些可能忙于算计而无暇露面的世俗权贵——如果国王面临的问题非常严重，世俗权贵可能会考虑转而效忠与国王争权的人。教会控制了大片地区，在政治上又是中世纪王国的重要资源，因此，任何国王都不可能完全放弃他对教会高级职位的任命权。(注)

与此同时，世俗人士的宗教热情缓慢但确定地向改革方案的一些要求靠拢，特别是在教会的世俗所有权问题上。1028—1126年，蒙特卡西诺修道院被赠予了多达193座教堂的所有权，其中186座是由世俗人士赠送的。这并非孤例。在卢瓦尔河谷的昂热，1050—1100年间有44座教堂的所有权从俗人手中转移，在随后的半个世纪里又有102座教堂易手。(注)因此，格列高利七世试图赢得的是一场不可能获胜的战斗，如果他能多想一想，用更明智的方法去处理俗人参与教会运行这一更广泛的问题，或许他能获得相当大的成功，而不至于把改革后的教宗制推向困境。

总体而言，格列高利七世对自己的实力过度自信，而这是灾难性的，尽管他在短期内取得了一些引人注目的胜利。德意志诸侯的反叛并没有强大到足以赢得彻底的胜利，也没有强大到迫使亨利四世在宗教方面做出重大让步。亨利四世也开始任命他自己的教宗，他选择了革利免三世，而格列高利七世本人最终也被逐出了罗马。格列高利七世于1085年在诺曼人的保护下死于海边的萨勒诺（Salerno）城堡，而在前一年，

也是诺曼人将他从罗马解救了出来——当时，他被神圣罗马帝国的军队围困在圣安杰洛城堡（Castel Sant’angelo），诺曼人则趁机洗劫了这座城市，这进一步损害了教宗的声誉。这一切都发生在他的事业已经完全无望的时候，而在那之前，神圣罗马帝国曾表示愿意接受一个独立教宗的存在。

格列高利七世所造成的混乱花了将近40年才理清，这一时期的特点是有很多死胡同，有不彻底的胜利，也有改变效忠的情况。这和查理曼的孙子们之间错综复杂的斗争有一些相似之处，尤其是在1105年，亨利四世的儿子亨利五世（是的，你猜对了）推翻了他的父亲，理由是亨利四世又被教宗帕斯加尔二世处以绝罚，而被逐出基督教社会的国王是不能要求人们效忠的。然而，亨利四世在去世前最终东山再起，而亨利五世也不打算放弃对王国这么大一部分资源的实际控制权。国王和教会双方彼此谴责，互相控诉，直到1122年9月23日（870年之后的9月23日，我的一个儿子出生了）签署了《沃尔姆斯宗教协定》（Concordat of Worms），才最终实现了早就应该到来的妥协。亨利五世和教宗加里斯都二世（Callistus II）最终达成一致：国王和皇帝仍然可以参加主教的就职仪式，但他们只能授予一支长矛作为世俗责任的象征，而不再向主教授予象征着宗教权威的戒指和权杖。当然，这些规定是针对公开仪式的，而在那之前，还有选择把主教职位授予哪一个人这种不那么公开的行为，而在这个方面，国王和皇帝基本上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尽管他们后来确实经常把选择权交给罗马这个橡皮图章。这一协定是在首个新型的拉特兰会议上公布的，这种会议此时被重新定义为整个教会的总会议（而不是像以前那样，只是罗马教会的地方会议）。1123年3月，300名主教和600名修道院院长签署了这份协议。

大家的面子都保住了，但信息很清楚：由格列高利七世领导的轻率冲锋最终陷入了死胡同，教宗付出的代价远远超过了他所获得的。并不是每个人都吸取了教训。《伪伊西多尔教令集》的文本（如《君士坦丁赠礼》）鼓励了教宗的过度野心，而总会有些基督徒乐意提供支持。熙笃会的大学者克莱尔沃的伯尔纳（Bernard of Clairvaux）重新诠释了以

前哲拉修关于两把剑的教义，他的著名观点是，基于《君士坦丁赠礼》，两把剑都属于教宗。每当教宗遇上难缠的皇帝，这类论点就会出现，12世纪，这种争论仍时有发生。皇帝们也会用意识形态来自我辩护，就像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他们永远不会放弃对关键任命的最终决定权。因此，直接对抗往往只产生象征性的变化，而不是根本性的变化，就像在主教叙任权之争中，或者是在亨利二世和托马斯·贝克特（Thomas Becket）之间的争执中那样。在贝克特于1170年12月29日被谋杀后，亨利二世不得不低头谢罪，并接受了教宗关于教会管理的许多新规定，但事实上，他保留了对其教区内关键人员的最终任命权。㊟

实际上，教宗对西方基督教世界的权威的最终巩固，并不是通过格列高利七世之后的一系列高调对抗实现的，而是通过其他更低调的方式。考虑到我们已经观察到的模式，其中一些多少是可以预料的。例如，主教叙任权之争并没有阻止教宗制度本身继续发展。乌尔班二世（Urban II，1088—1099年在位）彻底改革了财务管理方式。他从克吕尼修道院引进了一套制度和做法。克吕尼修道院形成了有效的方法来追踪收入和支出，它建立了众多的附属修道院，在多样性和复杂性上可以与教宗机构本身相媲美。在乌尔班二世的继任者、当过克吕尼修道院修道士的帕斯加尔二世（1099—1118年在位）的领导下，实际上已经形成了教廷（curia），尽管这个词当时还没有得到广泛使用。他建立了教宗府，将书记处、礼拜堂和办公处结合起来，教宗府这个官僚机构实际上成了教宗的得力助手，既处理教宗收到的文件，又负责处理教宗发出的文件。总体而言，教宗制度改革后，产生了不同类型的事务，新的书信形式也随之发展，这一时期，各类书信的旧模板——诞生于5世纪的著名的《教宗日思录》（*Liber Diurnus*）——最终被抛弃。教宗的总部正在缓慢而确实地变成一个具有真正能力的行政中心。此前，教宗官僚机构的作用仅仅是为改革的修道院起草特许状，并对落入意大利贵族手中的资产保留模糊的记录；现在，它正在发生变化，将能处理更多更复杂的事务，包括法律和金融。

在罗马之外，在这段争端时期，教宗对整个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影响

有所扩大。很多其他统治者乐于看到格列高利七世给神圣罗马帝国带来这么多的麻烦，因此，他们接受了格列高利七世的使节（法官代表）在他们的领土上长期存在。在之前的教宗统治时期，这些使节都是临时性的，但是在格列高利七世时期，这种任命要系统得多，比如法国的迪耶主教休（Hugh of Die，后来的里昂大主教），高卢南部和西班牙的奥列隆主教阿玛图斯（Amatus of Oleron），伦巴第的卢卡主教小安瑟伦（Anselm the Younger of Lucca）。这些常驻代表增强了教宗在罗马以外的影响力，也增加了教宗可以施加影响力的教会事务的数量。然而，教宗使节是否能发挥效力，仍然从根本上取决于国王是否愿意接受他们的存在，以及高级神职人员是否愿意将案件提交给他们，因此，整个安排仍然是临时性的。㊟除此之外，乌尔班二世至少延续了教宗利奥九世走出罗马的传统，其中最著名的一次是去到1095年的克莱蒙会议，会上他号召人们拿起武器，就此发起第一次十字军运动。这是教宗走上基督教潮流最前沿的又一个例子，但不能说教宗的控制范围真的扩大了。众所周知，乌尔班二世的呼吁被不同的人以不同的方式接受，最终产生了与教宗的想法完全不同的东西。他希望少数装备精良的军事专业人员走上东征之路，这的确实现了，但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情况，而十字军运动整体是他所无法控制的。㊟因此，虽然在蛮族教宗之后的两代人里，教宗对西方基督教世界宗教生活的影响确实有所增加，但是在这一时期，没有丝毫迹象表明出现了任何正规的政府机制——通过这种机制，教宗可以有系统地定期干预西方基督教世界居民的日常宗教生活，就像英诺森三世在第四次拉特兰会议上所设想的那样。在宗教问题上，教宗只在个别事务的层面上参与，并没有从整体上定义什么是最好的教会实践。这一更宏观问题的解决办法，以及使英诺森三世能够更全面推行教会改革的关键事态发展，将以一种完全出人意料的方式出现。

要想找到它，我们需要回到教会法的话题。在后加洛林时代的10世纪，《伪伊西多尔教令集》的统治地位没有受到持续的挑战，这个伪造品的很多内容被收入了那个时代产生的另外两部主要教令集。主教叙任权之争重新激起了人们对这一话题的兴趣，因为在这个迅速演变为权力

冲突的问题上，双方都试图为自己的立场辩护。格列高利七世和他的继任者们尤其鼓励其支持者中的主要学者编撰新的教令集，以便为他们所主张的帝国权力的立场提供详尽的论证。不出意料，《伪伊西多尔教令集》的文本提供了大部分材料。除了担任格列高利七世的使节，卢卡的小安瑟伦还在1083年创作了第一部改革法令集，其他几部也紧随其后，枢机主教多伊德迪特（Deusdedit）的法令集出现于1087年，同一个10年里还出现了匿名的《七十四篇法令集》（*Collection in Seventy-Four Titles*）。多亏《伪伊西多尔教令集》，尤其是《君士坦丁赠礼》，教宗凌驾于帝国之上的改革主张很容易得到支持。然而，从长远来看，更重要的是，人们普遍认识到，现有的教规文本实际上几乎完全无法操作。有这么多不同的来源，从《圣经》到教宗的声明，而其间有近1 000年的宗教会议，诸多的抄本传统又说了很多不同的东西，即使没有《伪伊西多尔教令集》的刻意扭曲，教规也往往无法理解，也不可能知道一个人在实践中应该怎样做。这个时代最伟大的教规专家是沙特尔的伊沃（Ivo of Chartres），他曾两次尝试解决这个问题。他作品的第一个版本是卷帙浩繁的17卷《教令集》（*Decretum*）。更受欢迎的是较短的第二个版本《全部法》（*Panormia*），共八卷，稍微好把握一点。伊沃很清楚内容不一致这个整体问题，对问题如何解决也有一些想法，我们之后再回过头来说。但是，他自己并没有尝试任何解决方案，因此，即使他做出了有益的贡献，仍然给使用者留下了大量相互冲突的材料。注

11世纪后期，教会法看起来特别混乱，因为致力于改革的教宗们正忙于从教会法中寻求支持，罗马法中伟大的查士丁尼文献正在被重新发现。这本身就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查士丁尼《学说汇纂》的所有中世纪（因此也是现代）文本都来自6世纪的一份抄本。它本来被保存在比萨，直到1406年获胜的佛罗伦萨人把它当作战利品掠走。在比萨，在长达500年的时间里，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有人读过它，尽管不知何故，它并没有被扔掉。11世纪下半叶，有了基于它的第一份抄本（现已佚失），中世纪所有关于这一文本的知识都依赖于此。第一次抄写是分三个阶段完成的，在整个中世纪，这次抄写所产生的三大部分文本通过五

卷本的套装书传播。另外两部分是《查士丁尼法典》的前九册和包括《法学阶梯》在内的最后一册，以及《查士丁尼法典》的最后三册（与前九册分开发行）和《新律》。与特里波尼安和他的委员们在《学说汇纂》中简化和系统化的旧罗马法相比，大量互相冲突的教规文本就像一个拙劣的笑话。11世纪中后期在博洛尼亚新成长起来的罗马法学界人士普遍对教规文本不屑一顾。然而，当罗马法的研究在这些专业人士的手中发展起来时，它的策略和实践很快就被教会法学者们借鉴，后者把大量不相干的原始资料变成了一套有效的成文法律体系。

令人惊讶的是，这一非凡过程的起点是查士丁尼在《学说汇纂》生效令中的主张：

> 至于本书中出现的任何矛盾，如果我们充分考虑到多样性的话，就没有任何矛盾可以在书中占有一席之地，也不会找到任何矛盾。无论多么模糊，终究会发现一些特征，它们能消除不一致的责难，使问题具有不同的面貌，避免被认为前后矛盾。[注]

正如我们在第3章中看到的，这最初是皇帝虚张声势的说法，目的是掩盖《学说汇纂》项目大走捷径这一事实。然而，从其著名的创始人伊尔内留斯（Irnerius）开始，博洛尼亚法学院把这话照单全收，并一代又一代地致力于证明查士丁尼法律体系内实际上没有冲突。为了做到这一点，他们一段一段地通读原文，当遇到明显的矛盾时，就抓住他们能找到的每一个论据，就像查士丁尼所说的那样，去发现“一些特征……使问题具有不同的面貌，避免被认为前后矛盾”，找到绕过问题的方法。他们采用了不同性质的论据。法学家们通常会密切关注文本的具体措辞，有时通过详细的语法和修辞分析来解决问题。然而，他们还做了一件事，那就是将各个段落与法典中可能存在的类似裁决一一对照，当语法和修辞分析被证明无法解决问题时，这种方法为他们提供了另一套可能的解释。对于一些裁决似乎相互矛盾的案件，他们的解决方式是，认为其中的一个或多个应归为只有在特定情况下才允许的例外做法。因

此，它们并不违背他们通过不同的法律来确定的一般规则。事实证明，区分“一般”法律和“特殊”法律是一种很有成效的手段。整个工程可以说是人类用聪明才智来证实一厢情愿想法的一座丰碑。

他们用来呈现所有这些论据的方法是注释。首先列出要讨论的查士丁尼法典中的段落，然后在随之而来的注释中，充分阐释其意义，并提出对任何明显矛盾的最佳解决方式。在12世纪的过程中，许多学者都做了详细的注释，这一传统的后来者对其前辈所提出的解决方式做出评论，整件事眼看就要失控。在1220年到1240年间，一位名叫阿库修斯（Accursius）的法律英雄恢复了秩序，他将100多年来的法律论证整理成了一部200万字的文本，即《标准注释》（*Glossa Ordinaria*），这部作品很快就成了通行注释，成为所有受训和执业罗马法学者的必备工具书。最后，只剩下122个小矛盾没有解决。100年来极富创造性的学术研究几乎证明了查士丁尼是正确的。(注)

在这一切展开的过程中，让同时代的教会法学者兴奋不已的是，罗马法律研究的方法和原则为他们提供了一种解决自己法律困境的方式。罗马法和教会法的材料有相当多的重叠，毕竟罗马晚期的皇帝经常就教会事务立法，大概是因为如此，他们认为借鉴是行得通的。在11世纪的最后10年，沙特尔的伊沃已经意识到这种可能。他的两部法令集都是从相同的旧材料中挑选出来的，但在《全部法》的前言中，他概述了一些可以用来尝试解决教规冲突的原则，其中许多基于博洛尼亚法学院在罗马法方面采用的方法。他本人并没有把这些原则付诸行动，至少没有以书面形式这样做，尽管他在教学过程中可能口头提到了这一点。

大的飞跃出现在两代学者之后，大约在1140年，法学家格拉提安（Gratian）发表了《不协调法典之协调》（*Concordantia disconcordantium Canonum*，通常简称为《格拉提安教令集》）。关于他的其他方面，我们几乎一无所知。格拉提安当时在博洛尼亚和罗马法学者一起工作，但除此之外，就连他作品的成书时间也得靠推断来确定：其中包括1139年第二次拉特兰会议的一些规定，但这些规定尚未得到充分的消

化。格拉提安所做的是按照沙特尔的伊沃的建议，将他同时代罗马法学者所采用的原则应用在教会法的问题上。罗马法学者可以通过从头到尾阅读查士丁尼的文本来构建他们的注释。然而，教会法没有统一的文本，因此，格拉提安必须先设计出一系列的主题标题，根据这些标题从大量的教规文本中收集所有相关的裁决。然后，他遵循罗马法学者的方法，着手整理，减少诸多文本中互相冲突的内容，同时进行一系列的讨论，试图采用一致的分析原则来正确解答所讨论的问题。

这是一种结合了热爱、学识和技巧的非凡劳动。他耐心地应用伊沃所概述的那些原则，删减了大约3 800项原来的裁决。面对矛盾，你应该始终以最权威的裁决为准，在这里，《伪伊西多尔教令集》的影响很明显。教宗教令排在第一位，然后是大公会议的裁决，最后是地方宗教会议的裁决。但格拉提安也援引了直接源自罗马法律论证的其他原则。不可变法和可变法，一般法和特殊法，这些都是他认为非常有用的分析类别；严密细致地分析文本也很重要，包括分析实际使用的语言，以及所做决定的原始上下文。

《格拉提安教令集》标志着一场革命的开始，而不是结束。他的这部作品远远比此前的任何同类作品优秀，在还没有被正式采用的时候，就已经成为以后所有研究的起点。格拉提安的思路与同时代的罗马法学家相似。和罗马法一样，注释是一种特别的武器，而且由于格拉提安本人也使用注释，因此常常很难把他最初的解决方案同那些接续其努力的人所写的区别开来。同样和罗马法一样，最终的成果是一种标准的、绝对必要的超级注释，即另一部《标准注释》。在教会法方面，约90%的工作是在13世纪的前十年由约翰内斯·条顿尼库斯（Johannes Teutonicus）完成的，而13世纪40年代巴托洛梅厄斯·布里克西恩西斯（Bartolomaius Brixiensis）对其进行了增补。两人都在博洛尼亚学习，大部分工作都是在那里完成的，尽管约翰内斯最终回到北方的家乡，成为哈尔伯施塔特（Halberstadt）的修道院院长。(注)《格拉提安教令集》及其所产生的全部标准注释，使教会法成为一种可用的体系。但是，虽然我们知道，《伪伊西多尔教令集》在整个基督教世界的影响根深蒂

固，我们仍未触及在整个西方基督教世界教宗权威系统化的过程中，格拉提安所发挥的核心作用。要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考虑到发展的第二阶段，这一阶段直接承袭了博洛尼亚教会法专家的开创性工作。

《格拉提安教令集》不仅立刻成为进一步学术研究的起点，而且很快成为解决教会实际纠纷的最重要文本。到了12世纪的第三个25年，对高级神职人员来说，对这一文本以及博洛尼亚学术传统的充分了解是绝对必要的。他们要么确保自己掌握这些（我们知道，托马斯·贝克特至少在博洛尼亚待了一年，其他许多人也是），要么聘用其他掌握了这些的神职人员。在担任伦敦主教期间，吉尔伯特·福里奥（Gilbert Foliot，1163—1187年在职）将他的两个侄子和另外一个与他没有家族关系的神职人员送到博洛尼亚，以获取必要的专业知识。到12世纪下半叶，博洛尼亚学校毕业的学生在整个西方基督教世界都非常抢手。先是在博洛尼亚，后来在其他很多地方（尤其是巴黎，那里成为教会法研究的早期中心），教会法在教会争端中的实际应用直接与学术研究相结合，这表明就教会法而言，光靠注释的持续论证过程不足以将原始文本转变成一个完整连贯的法律体系。查士丁尼的法典发挥了作用，但博洛尼亚的罗马法学者是数百年古罗马法律研究的间接受益者，而且他们只有一个法律来源要应付。相比之下，教会法的来源却十分多样，《格拉提安教令集》仅仅是必要的学术法律整合过程的第一步，注释是远远不够的。在很多地方，教会的《标准注释》要么对所遇到的问题没有任何答案，要么只有一个不令人满意的答案。

因此，教会法还需要一套有针对性的进一步裁决，一方面要填补实践和研究中发现的明显漏洞，另一方面要在注释者的标准策略未能提供答案的情况下做出明确的决定。考虑到改革后的教宗制度在12世纪西方基督教世界的突出地位，以及对教宗裁决的法律优越性的承认（这些裁决从《伪伊西多尔教令集》时代开始就存在于不断发展的法律传统中），那么这种进一步裁决在哪里可以找到就很明显了，答案只有一个：罗马。的确，在一段关键的文字中，格拉提安本人保证这是唯一的可能：

> 神圣罗马教会赋予神圣的教规以权利和权威，但不受其约束。它有权制定教会法，因为它是众教会的首脑和枢纽，没有人能够反对其裁决。(注)

12世纪中期，这一进程突然加速。教宗犹金三世（Eugenius III，1145—1153年在位）在他任职期间，6年左右的时间里就颁布了12条正式的裁决，也就是教令；哈德良四世（1154—1159年在位）在5年内只发布了8条。然而，教宗亚历山大三世（1159—1181年在位）在22年内颁布了713条。换句话说，《格拉提安教令集》的影响在西方基督教世界中充分发挥作用，花了大约20年的时间，但是，一旦完成了这一步，教宗的新业务就会接踵而至。这些裁决中有许多是关于日常琐事的，只有相对较少的几条涉及有重大争议的问题，而许多（一些同时代的人抱怨太多了）裁决都是自动给予支持，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教宗在这一过程中真正动了脑筋。但是，如潮水般涌来的请求和教宗做出回应的教令，其总体效果是无论是在实践中，还是在象征意义上，都将教宗置于拉丁基督教世界运作的中心。一旦咨询、请求澄清和提出问题的洪水涌出来，它就永远不会停止。因此，很快就有必要收集教宗们在所有信件中给出的答复了，因为其中有些答复明确地改变了法律。就像查理曼及其继任者的法令一样，收集所有新裁决的必要性似乎并没有马上得到理解，至少上层没有。第一次尝试收集新的教宗法令，似乎是未经授权、自己动手的，或许也是由法学家所为（在精神上，他们是那些在法典得到编纂之前就收集罗马帝国晚期皇帝立法的人的后裔）。1234年，教宗格列高利九世授权出版《格列高利九世教令集》（*Liber Extra*，原意为“外集”）。它是“额外的”，因为它所包含的材料不在《格拉提安教令集》之中。这部作品由1 971条教令组成，分为5卷。1298年，波尼法修八世授权出版《第六书》（*Sixtus*），之所以有这个名称，是因为这是要与其他五部教令集一起使用的第六部。现在大功告成，《格拉提安教令集》及其注释，连同六卷补充教令，一直到1918年都是西方教会法的标准来源。(注)

对于中世纪的人解决由古代教规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所带来的问题的方法，我们的兴趣只是顺带的。在格拉提安的著作出版后的一个世纪里（这也是它对我们的目标来说至关重要的地方），这一逐渐展开的过程也促成了教宗职分的转变，教宗从此成为在西方基督教世界充分发挥职能的行政首脑。甚至在亚历山大三世时期，要想解决任何悬而未决的教会问题，就已经只有罗马一个地方可去了。结果，颁布教令的过程一举两得。首先，遗留的意识形态缺失都得到了充分的补足。500多年来，因为有君权神授的说法，君主们又有实权，所以君主一直凌驾于罗马宗座之上，如今这已经成为过去。教宗在教会事务中的权威是不容置疑的事实。

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的是，由于蛮族教宗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赢得了意识形态之战，这一过程最终解决了交通物流带来的问题，而这类问题曾一直限制罗马对日常宗教生活的支配能力。到了1200年，明确的罗马权威已经可以很容易地传播到西方基督教世界的每一个地区。以前，要想知道教宗的想法，你要么得去罗马，要么得给他寄封信，然后等待回复。从1234年开始，随着《格列高利九世教令集》的出版，情况就不一样了。对于绝大多数问题，都有教宗的书面意见可以参考。现在，利用这种书面意见，教宗许可的法官可以解决拉丁基督教世界各地数以千计的案件。教宗主导的教会法的发展解决了大问题，欧洲各地的宗教生活第一次可以随着罗马响亮的鼓声行进。

就像第四次拉特兰会议上的教宗英诺森三世一样，我们正在接近旅程的终点。多亏了11世纪晚期的蛮族教宗，罗马教宗得以独立于神圣罗马帝国；多亏了格拉提安和教会法学家，在12世纪和13世纪初，教宗终于能够手握实用的权力杠杆，将意识形态优势转化为一个有效运作的教会帝国，尽管是在前现代通信时代，这个帝国却可以在广阔的领土范围内运作。该过程有两个突出的特点。首先，与其前身不同，第二个罗马帝国是在缺乏有意识的罗马设计的情况下建立的。事实上，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在罗马之外建立的。查理曼对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实际创造是关键的第一步。他通过基督教的宗教和文化机构，确保基督教的基本能一代

代准确传承下去，使基督教世界第一次独立于周边政治结构的兴衰。同样，后来所有重大的发展都发生在罗马城墙以外，而且是在非罗马人的首倡下进行的。后加洛林时代的罗马教会本身丝毫没有显示出有能力，甚至没有表现出有意愿，要将其长久以来的使徒威望转变为有效的教宗权力。面对帝国结构无法带来必要的教会统一这一事实，北方的消费者需求促成了这一转变。首先，先是这种要求迫使一系列教宗发挥更积极的作用，然后，来自北方蛮族的神职人员亲自进入罗马，夺取了教宗职位，并按照他们自己创造的新模型对其进行重新设计。这与原来的罗马帝国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当初，所有的权力和设计都集中在罗马内部。到1100年，经过了几个世纪里人口、经济和文化的变化，虽然罗马再次成为帝国的载体，但是所有的权力都已经转移到了曾经是蛮夷之地的北方。

其次，在第一个罗马帝国的历史上，法律结构只扮演了次要的角色，主要是缓和帝国的整体运作。原来的罗马帝国是用武力并以外交威吓为后盾直接建立起来的。后来对罗马法的使用起初只是随着公民身份的授予而缓慢地扩展到帝国各地，而公民身份的授予使得一些被征服民族的后裔成为完全享有公民权的公民。因此，在罗马化的进程中，传播罗马法的更广泛影响是把一个四处征服的国家转变为由在一定程度上平等的群体构成的共同体。而就教宗帝国而言，把意识形态的优势转化为实际统治权的，恰恰是法律体系本身，这种法律体系的主要方法、形式和许多内容借鉴自早期的罗马帝国模式。到了1200年，整个欧洲西部都出现了独立的教会法庭体系，在这样的体系中，由教宗授权的法官实施教宗主导的教会法，任何新的或不明确的情况都必须提交罗马解决。在古代的罗马帝国，民法的传播减弱了帝国权力的影响；而在新的罗马帝国，帝国权力实际上是通过教会法的传播创造的。

如果说，一段旅程在英诺森三世时期随着教宗作为西方教会成熟领袖的出现而结束，那么创造其法律结构的潜在力量将开启另一段旅程。在查理曼和英诺森三世之间，消费者的需求催生了教宗制度，为的是给文化统一的拉丁欧洲教会提供当时所需要的新领导者，而欧洲的政治结

构根本无法提供这样的领导者。换句话说，这个帝国的结构如果不是无意中建立的，那么肯定是通过协商一致而建立的。然而，在第四次拉特兰会议上，英诺森三世发起了将被动变为主动，将协商一致变为约束的进程。消费者所开创的帝国结构的机器即将调头驶向他们。西方基督教世界再也不会和以前一样了。

---

1. 有关英诺森三世和第四次拉特兰宗教会议的参考书目汗牛充栋，优秀的介绍见Morris（1989），c. 17，esp. 447–451；更加全面的讨论见Tillmann（1980），该书译自1954年出版的德文原著。这次宗教会议的教令的英文版，见Rothwell（1975），643–675。英诺森三世信件的新版本（Hageneder et al.，1965–）已经整理到了1208/1209年，Hageneder（2000）全面探讨了英诺森三世对教宗权威的认识。

2. Themistius，Orations 6.83c–d；这就是为什么晚期的罗马帝国不是从罗马实施统治，而是从更靠近关键边境的政治中心进行统治，如特里尔、君士坦丁堡和安条克，见Heather（2005），c. 1。

3. 优秀的介绍，见Jasper and Fuhrmann（2001），135 ff.；154–155和184–186讨论了抄本的传播。

4. 我赞同Fried（2007），特别是c. 4的观点，即伪造之初赋予教宗的只有宗教上的权威。将其措辞扩展到世俗权威领域是后来的发展，就像我们将在本章后面看到的那样。

5. 关于文本的总体观点，见Jasper and Fuhrmann（2001）； Fried（2007）和Reynolds（1995）。

6. Jasper and Fuhrmann（2001），特别是173 ff.；Fried（2007），特别是88 ff.及附录A 115–128（Wolfram Brandes撰写）。与之相比，不同观点见Noble（1984），134–137及充分的参考书目，他认为至少《君士坦丁赠礼》是在8世纪的罗马出现的。

7. 关于833年危机，见上文，参考书目和评论见Jasper and Fuhrmann（2001），173 ff.; Fried（2007），88 ff.。

8. 对两个辛克马尔之间的争执，英文的详细介绍见McKeon（1978），也可以参考Schieffer（2003）。

9. Jasper and Fuhrmann（2001）, 186–195.

10. 尼古拉和哈德良的活动，见Davis（1995）的《教宗名录》译文及相应导言，189–202（尼古拉），249–258（哈德良），书中有充分的参考书目。所有常规的介绍中世纪教宗的英文著作都会提到他们，如Llewellyn（1971）， c. 9; Ullmann（1972）， c. 5; Duffy（1997）, c. 4。

11. Liutprand, Antapodosis, I.30.

12. 对这一时期的总体介绍，见Ullmann（1970）, 111 ff.; Llewellyn（1971）, c. 10;Duffy（1997）, 103 ff.。

13. Noble（1984）, 308–22; Davis（1995）, 1–4.

14. 见Davis（1995）中这些教宗的传记和引言，以及其中包含的争论焦点。

15. 关于让福尔摩苏斯担任大主教的请求，见《教宗名录》107.68 ff., 特别是73–4。尼古拉拒绝了，因为根据尼西亚会议第15条决议，他当时已是主教，不能再担任大主教了。关于与此有关的钩心斗角，见Davis（1995）的介绍和脚注。

16. 《教宗名录》104.40–43（塞尔吉乌斯二世）; 112.6–11（斯德望五世）。

17. 参考Davis（1995）, 72–73; 塞尔吉乌斯之死可能终结了这一举措。

18. 《教宗名录》 107.21–35。

19. 对这些事件的详细介绍，见Davis（1995）, 189–202, 249–258（尼古拉和哈德良的生平介绍）。关于这次离婚，又见Airlie（1998）; Nelson（1992）, 215 ff.;Goldberg（2006）, 292–295。关于摩拉维亚，见Dvornik（1970）; Richter（1985）;Goldberg（2006）, 270–288。

20. 总体介绍见Llewellyn（1971）, c. 10; Ullmann（1972）, cc. 5 and 6; Duffy（1997）,103–109。

21. 关于本笃九世，见Morris（1989）, 82–84，尤其借鉴了Herrmann（1973）。

22. 总体介绍见Ullmann（1970）, cc. 5 and 6; Llewellyn（1971）, c. 10; Morris（1989）,18–33; Duffy（1997）, 103–121。

23. 介绍改革议程的起源和性质的其他英文著作，见Morris（1989）, 28–33和cc.3–4（彼得·达米安的引文出自第103页）; Robinson（2004a）, 1–12, 更详细的介绍，见Cowdrey（1970）。

24. Ullmann（1970）, c. 6; McKitterick（1999）; 参考Reuter（1982）对热尔贝更详细的研究，见Riché（1987）。

25. 相关文献很多，作为介绍，可以参考Gibson（1975）; Reuter（1982）; Morris（1989）, c. 3; McKitterick（1999）; Wollasch（1999）; Leonardi（1999）;Cowdrey（2004）。

26. 关于布尔夏德和雷吉诺，见Austin（2009）, 尤其是第一部分。参考Jasper and Fuhrmann（2001）, 184–186（有充分的参考书目）。Ullmann（1970）, c. 7称此为“伪伊西多尔时代”，这肯定有点夸大其词，因为在实践中，这一文本很少得到使用。

27. 关于克吕尼修道院的地产，见Rosenwein（1989）。更一般的情况见McKitterick（1999）; Wood（2006）。

28. 对于利奥九世，有很多优秀的介绍，这方面的英文著作见Morris（1989）,79–89;

Cowdrey（2004）; Blumenthal（2004）; 以及Robinson（2004a）, 17–36，这部作品中还有对基本同时代的利奥九世传记的翻译，其中I.7讲述了他对骑士的领导。参考Ullmann（1970）, c. 6; Duffy（1997）, 110 ff.。

29. Morris（1989）, 107–108; Fried（2007）, esp. 16 ff.

30. 关于尼古拉和亚历山大，见Morris（1989）, 89–108; Cowdrey（2004）; Blumenthal（2004）; 更详细的介绍，见Schmidt（1977）。参考Cowdrey（2002）, xi ff.。

31. 第97封信，转引自Cowdrey（2004）, 260 f.。

32. 关于格列高利对改革方案的激进扩展，见Morris（1989）, c. 5; Ullmann（1970）,c. 7; Duffy（1997）, 120 ff.; Robinson（2004b）; Blumenthal（2004）。格列高利书信的译文，见Cowdrey（2002），其他与其教宗任期有关的同时代材料，见Robinson（2004a）, 158 ff.，该书36 ff.很好地介绍了他的教宗任期和相关材料。

33. 关于中世纪向教会机构授予土地和其他财政权利的过程，有一部优秀的介绍作品，见Wood（2006）。和英格兰有关的证据非常全面，这多亏了《土地调查清册》 和1166年的《贵族宪章》（Cartae Baronum），见Douglas andGreenaway（1952）, 903 ff.。德意志的情况见Reuter（1982），尤其需要注意《甲士籍》（indiculus loricatorum），981年在意大利遭遇失败之后，奥托二世只向主教区和大教堂寻求支援。

34. Morris（1989）, 60–62.

35. 关于主教叙任权之争以及后来的冲突，更详细的介绍见Morris（1989）, cc. 5,7–8; Robinson（1990）,（2004b）,（2004d）; Blumenthal（2004）。对这一题目更加详细的非英文介绍很多，这些著作的脚注，尤其是Morris书中每一章的文献综述都是很好的指南。

36. 对罗马内外这些发展的深入讨论，见Morris（1989）, 尤其是164 ff.和c. 9;Robinson（2004c）,（2004d）; Blumenthal（2004）。

37. 十字军运动的参考书目浩如烟海，其中比较详细的英文介绍见Riley-Smith（1986）; Tyerman（2006）。

38. 对这些教令集的介绍，见Robinson（1978）; Brundage（1995）, c. 2; Morris（1989）, 126–133借鉴了更加详细的介绍，如Fuhrmann（1973）和Mordek（1985）。关于更深层次的背景，见Austin（2009）。一些有关材料还没有经过适当的学术整理，但佚名的《七十四篇法令集》已经得到编辑和翻译，见Gilchrist（1973）,（1980）。

39. Const. Tanta 13; 15.

40. 对于《学说汇纂》重新发现的精彩介绍，见Stein（1999）, 43–48，其中有充分的参考书目。Clarence Smith（1975）是一部十分有益的群体传记，介绍了12—13世纪的罗马法和教会法学者。

41. 优秀的介绍见Brundage（1995）, c. 3; Stein（1999）, 49 ff.。对《格拉提安教令集》第一部分的翻译，见Thompson and Gordley（1993），作者也提供了十分有益的介绍。

42. Gratian, Decr. C. IX. Q. 1 dictum post c. 16（1011）.

43. 有很多可能的处理方式，见Morris（1989）, 397–416; Brundage（1995）, c. 3;Stein（1999）, 49 ff.。

后记

教父（下）

恺撒、奥古斯都和他们的继任者所建立的旧罗马帝国是非常明确的超级大国。它的缔造者利用经济、军事和人口资源，在周围的大片领土上投射压倒性的力量，这些土地上的人口被迫（如果有必要，在标枪的瞄准下）成为新帝国秩序的一部分。这个新的帝国以罗马为中心，也许，随着时间的推移，被纳入的人口会通过学习拉丁语并穿上托加，加入罗马的帝国工程，但这丝毫不能掩盖这样一个事实：第一个罗马帝国最初是为罗马精英的利益服务的征服国家。

中世纪的教宗罗马帝国则完全是另一回事。教宗的权力实际上是社会学概念“意识形态权威”的近乎完美的例子（用行话说就是“理想类型”）。罗马的主教之所以能够行使权力，正是并且仅仅是因为在整个欧洲范围内，有足够影响力的舆论采纳了教宗应该行使这种权力的一套观点。这套观点源自《马太福音》中耶稣对圣彼得说的话，所有的漏洞都补上了：彼得是罗马的第一位主教；他的权力可以被他的继任者继承；这种至高的宗教权威可以转化为确定教义、制定法律、控制教会高级职位的任命等具体的权利。因为这套思想，罗马的主教们获得了财富和合法权利，甚至士兵，可以用作彰显权力的额外手段。但是，在教宗帝国中，那些常见的帝国权力成分只是次要的象征，它们扩大了教宗的权力，但是并没有创造教宗的权力。教宗权力是接受最初那套意识形态主张的直接结果。

两个罗马帝国之间的另一个巨大差异是：第二个帝国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在罗马之外建立的。这并不是说，在教宗成为拉丁基督教世界首席

执行官这一极其缓慢的过程中，没有过教宗怀抱类似于帝国野心的时刻。罗马帝国晚期的教宗模仿皇帝的敕令制定教令，他们可不是害羞腼腆的摆设。教宗哲拉修在阿卡修斯分裂的高潮时期高谈两把权威之剑，尼古拉一世介入洛泰尔二世的离婚纠纷，他们可毫不腼腆。但是，除了几部精彩伪作，尤其是填补了从彼得到教宗的故事中一些关键空白的《革利免认亲记》，大多数关键行动实际上发生在罗马之外，而且不受罗马主教及其主要行政官员的直接控制。

在财政上，是查理曼做出了关键的举动。他在征服伦巴第王国后向教宗慷慨捐赠的决定是一个分水岭，从此，教宗可用的经济资源大大增加了。尽管这在短期内可能有不好的影响，但其长期的好处是无法估量的。在法律方面，罗马之外的基督徒在两个不同的时刻扮演了关键角色。首先是加洛林王朝的教会人员，是他们拾起了关于教宗西尔维斯特和君士坦丁大帝的一些旧认识，通过《伪伊西多尔教令集》（其中包括《君士坦丁赠礼》本身），把这些认识变成了一种愿景，即以前的教宗对西方教会享有一系列具体权利。他们伪造这些材料完全是为了自己，但是其长期影响是巨大的。在法律发展的第二个关键阶段，人们接受了对于古代基督教组织运作方式的这种认识，于是，从12世纪中叶开始，有大量的新请求涌向罗马。作为回应，罗马教廷随后掀起了一股教宗教令的浪潮，通过这股浪潮，教宗对西方教会法的支配成了具体的、不可逆转的现实。

政治上也是如此，就连将教宗职位转变为西方基督教世界积极主动的首席执行官的野心，最初也只是出现在罗马以外的教会圈子里。直到公元1000年，还有证据表明罗马主教普遍满足于享有至高无上的威望，而不是行使任何形式的至高无上的支配权。有些教宗喜欢偶尔应皇帝之邀参加改革峰会，教宗都乐于赞助传教工作，颁发冠冕堂皇但实际意义不大的特许状。但是，教宗工作内容的重点仍然是：在宗教方面，确保这座城市的圣地保持良好的状态，以便朝圣者能够源源不断地涌入；在政治方面，有效利用罗马主教区的财富，在意大利中部的土地贵族中精心策划野心的游戏。教宗可以被动员起来作为拉丁基督教世界的领袖，

这一套想法的理论表述最初是在9世纪北方的蛮族地区形成的，尽管《伪伊西多尔教令集》的伪造者们想的更多是削弱皇帝的力量，而不是赋予教宗更多的权力。11世纪的蛮族教宗将这套想法变为现实：他们先是利用帝国的军事优势，借助与帝国结盟在罗马掌权，然后改革教宗制度并将其运作转向全新的方向。尽管罗马本身偶尔也会表现出野心，但创建第二个罗马帝国的所有主要野心都起源于罗马城外。

当然，考虑到基督教继承下来的权力结构的总体情况，事情也只能如此。基督教最初是在罗马帝国晚期作为一种普遍的大众宗教而发展成熟的。最初，至高无上的宗教权威被4世纪和5世纪的罗马皇帝所享有，并由后继国的国王所继承，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不仅皇帝财富多得惊人，权力大得吓人，而且古典世界君主权威的古老意识形态将他们呈现为上帝直接选择的代表，而不仅仅是世俗的统治者。在这种情况下，特别是在这个新的世界宗教正在皇帝权威的支持下，忙于重建其行政结构、规则和宗教教义的时候，任何其他人物都不可能与皇帝作为其首脑这一迅速发展的角色相抗衡。而且事实证明，一旦这种模式牢固地确立起来，要推翻它是极其困难的。在君士坦丁统治近500年后，查理曼认为自己实现了上帝的意志，发起了“修正”项目，他的绝大多数教会成员都很高兴地接受了。200年后，具有改革意识的教会人士仍然需要赢得虔诚的政治统治者的支持，比如神圣的罗马帝国皇帝亨利三世和亨利四世，才能有机会将自己的政策付诸实施。

在基督教作为大众宗教的头700年里，拉丁西方宗教权力的杠杆都位于罗马之外，绝对不是由教宗来拉动的。只有当罗马以外的局势以两种关键方式发生变化时，这种情况才会改变。首先，查理曼宗教改革的长期影响产生了这样一个拉丁教会，它有建立在大教堂和大修道院之上的强大制度根基，形成并维持了一个持续的（尽管不是不变的）宗教认同和改革方案，而不管周围的政治局势如何变化。因此，与西罗马灭亡后的情况相比，查理曼帝国的崩溃并没有导致西方基督教世界分裂成多个组成部分。第二，随着加洛林帝国的瓦解和拉丁基督教世界的扩张（这要归功于伊比利亚半岛的收复失地运动以及和北部与东部传教工作

的成功），越来越明显的是，没有一个统治者（即使他被称为皇帝）的优势大到足以有效领导查理曼的制度所催生的基督教社群。因此，拉丁教会人士需要独立于国家兴衰的另一种权威结构，正是这一新的需要从根本上促成了第二个帝国即教宗罗马帝国的诞生，而这与罗马内部发生的一切没有多大关系。

鉴于它的特殊性质以及它诞生的历史，这个新罗马帝国在某些方面比它的前身受到更多的限制。由于缺乏真正帝国水平的军事和政治力量，它基本上总是必须同其宗教管辖范围内的主流政治力量合作。如果教宗把手伸得太远，威胁到这些统治者不可协商的利益，那么结果就会是一团糟，即使最终能找到一种挽回颜面的措辞，教宗通常也不得不在实际上做出让步。当然，主教叙任权之争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教宗们从中学到，他们不能夸大自己在教会高层任命上的影响力，而在中世纪西方的历史上，还有很多相似的例子。例如，在百年战争期间，当时的摄政冈特的约翰（John of Gaunt）邀请威克利夫（Wyclif）等更激进的教会人士，将当时教会的财富与基督及其门徒的贫穷进行对比，实际上借此敲诈了英格兰的主教，让他们增加对其战争的“自愿”捐赠。同样，如果教宗的政策过于偏向中世纪盛期的两个大国（法国和神圣罗马帝国）中的任何一个，那么被激怒的一方可能会回到选举自己的教宗这条老路上来，在格列高利七世之后的几个世纪里，分裂并非孤立的事件。注

但是，在多数情况下，正面对抗得到了避免，而且由于教宗能够动用的意识形态力量如此强大，在中世纪获得成功的教宗举措还是很多的。当被告知他应该考虑当时的教宗在某个政策问题上的意见时，斯大林曾提出一个著名的问题：教宗有几个装甲师？但这就忽略了意识形态的力量有多么强大，尽管从斯大林在其他方面的表现可以看出，他非常清楚意识形态的力量。总的来说，真正让人印象深刻的一点是，尽管中世纪的教宗制度是在某些约束之下运作的，但它能够并确实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整个十字军运动的发生也要归功于教宗，虽然许多远征的具体路线并不在其直接控制之下。此外，教宗还对中世纪政治的形成做出了

巨大的贡献，不仅限于为了建立特定的联盟而允许或禁止有血缘关系的王室成员结婚。这还没有考虑到教宗在中世纪欧洲宗教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从平信徒的日常生活到神职人员性行为的新标准，再到基督教内部大肆迫害异端的不光彩时刻，例如对法国西南部所谓的清洁派教徒（Cathars）发动的多次暴力攻击，背后都有教宗起的作用。注

当然，所有的帝国都有其局限性，所以中世纪教宗帝国面临重要制约这一基本事实本身并不能推翻其帝国地位。传统的帝国（如第一个罗马帝国、大英帝国，或现在的美国）通常出现在其中心的人口、经济、技术资源（或其中一种或几种）出现盈余的时候，它能够通过征服（“正式帝国”）或者是胡萝卜加大棒的威吓（“非正式帝国”）让大片地区服从。这类帝国通常只能在保有资源优势的情况下存续，如果再加上习惯的力量，或许会再延续几代人的时间，直到人们认识到这种习惯力量的消失并将帝国推翻。第一个千年结束时，欧洲大陆在发展水平上出现了一种新的平等，原来的罗马式帝国无法继续存在，这时，新的教宗罗马帝国才得以产生。催生普通意义上的帝国的那种优势通常是有时间限制的，尤其是因为帝国权力的投射扩张无论如何都削弱其原本的优势。第一个千年的欧洲肯定是这样，现在也可以说是这样，美国和西方为了自己的目的而在亚洲进行大规模经济扩张，却可能因此催生了下一个世界经济超级大国。

有鉴于此，教宗帝国必须在严格限定的政治范围内运作，这一事实似乎不再是什么大问题。在另一种意义上，其权力的意识形态基础比罗马帝国强大得多。当然，并非所有帝国都有意识形态的成分。例如，旧罗马帝国非常有效地兜售以城市为基础的理性文明，从哈德良长城到幼发拉底河，所有被征服地区的精英都接受了这种文明，使自己成为罗马人，并至少获得了一些政治权利，尤其是在罗马法之下接受审判的权利。整个过程将原来的罗马征服国家变成了诸共同体联合而成的共同体，当然同时也产生了后来让教宗罗马帝国得以形成的法律体系。但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第一个罗马帝国甚至从未试图将精英之外的大众纳入。对于占人口90%以上的农民来说，他们的工作仅仅是提供税收收

入，为帝国和文明的一切严肃工作提供资金。

在这一点上，它与教宗罗马帝国的对比再鲜明不过了。英诺森三世在第四次拉特兰会议上提出的改革方案在原则上影响到了每一个人。有些人比其他人有更多的事情要做。神职人员收到了比世俗人士更详细的任务清单，但世俗人士也并没有被忽视。从更广泛的角度来看接下来发生的一切，真正吸引我的不仅是结果，即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世俗人士在很大程度上的确接受了英诺森三世的方案，还有带来这个结果的整个过程。在某种程度上，你可以利用对这一过程的研究再次强调教宗权力的局限性。例如，英诺森三世去世之后过了两代人，13世纪60年代，仍然有必要在英格兰西部的伍斯特主教区召开一次全体神职人员会议，以便演练拉特兰会议的方案，让神职人员明白他们应该做什么。换句话说，第四次拉特兰会议50年以后，其议程远没有变成第二天性，即使对神职人员来说也是如此。又过了两代人的时间，有一份非常生动的文件流传下来，它表明，在英国的世俗人士中间，对会议方案的遵守仍然是有限的。1292年至1294年间，教宗任命的巡视员视察了英格兰东南部肯特郡的罗姆尼湿地（Romney Marsh，一个贫穷又相当偏僻的地区，虽然当时是坎特伯雷大主教辖区的一部分），这份记录文件列举了他们发现的所有胡作非为，用了很多页纸，是一份很好的教学材料。在许多村庄的教堂，仍然没有合适的礼拜手册，也没有圣餐礼，神父要么不务正业，要么已经结婚。同时它也戳破了中世纪比现在更“圣洁”的说法（这取决于你如何定义“圣洁”）。因为拉特兰会议的方案包括让婚姻成为完全的圣礼，不正当性行为也在巡视人员的视察范围内；这种情况很多，尤其是在伍德布里奇村（Woodbridge）：

> 人们都知道罗伯特·莱斯特（Robert le Ster）与一个名叫卡特的人通奸。他没有露面，所以我们禁止他进入教堂。
>
> 人们都知道朱莉安娜·德·霍宁布鲁克（Juliana de Hornyngbroke）与拉尔夫·德·培辛戈（Ralph de Pysinghe）通奸。已经传唤该女子，但是她没有露面，所以此案件暂缓。

> 人们知道，前一年在伍德彻奇（Woodchurch）的神父约翰与威廉·勒·赫特（William le Hert）的妻子琼有染。该女子被传唤，但没有露面，案件暂缓，后来再次传唤，仍然没有露面，因此被处以绝罚。
>
> 同一个约翰（显然是个大忙人）被指控与勒斯拜尔（le Spyle）的遗孀有染。

这份清单还很长，在印刷版的40页中，大部分篇幅都在罗列罗姆尼湿地准基督徒们的过失，种类不算太多，数量却很多。[注]

但是，与其关注这些人性的弱点，不管它们多么有趣（或者不有趣，这取决于你怎么看），还不如提出一个更重要的观点。在13世纪的欧洲，第四次拉特兰会议的方案的确推进得非常缓慢（按现代人的标准），但重要的是它确实在推进。事实上，它一直在前进。当然，在整个中世纪及以后，包括许多神职人员在内的人们继续享受着从教会官方角度来看非法的性关系，但拉特兰会议的许多其他要求最终成为绝对标准的做法。神职人员守独身，定期参加弥撒和忏悔，分离出专门的教会建筑，提供适当的礼拜书籍和许多其他用品，到15世纪，所有这些都已经被完全接受，成为西欧标准宗教生活中毫无争议的内容。事实上，上一代学者中一个引人注目的史学趋势是逐渐阐明了两个事实。首先，撇开少数激进人士不谈，即使是在英国，教会改革也并不是由对腐败的教会行为的厌恶浪潮所推动的。拉特兰会议所确立的宗教生活模式被绝大多数人接受，到了15世纪，已经成为日常生活中人们相当熟悉的一部分。第二，到了15世纪，这些标准实际上是由会众本身执行的，会众中出现了一个新的非神职人员阶层，即监理（wardens），以监督标准的执行情况。这可能花了一个多世纪的时间，但教宗最终还是让拉丁欧洲的民众接受了他们对好基督徒的定义。[注]

我认为，在前现代条件下，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当时通信技术非常有限，我们应该停下来想一想这是怎么办到的。关于伍德布里奇的

下一条记录给出了一个线索：

> 威廉·卢卡斯（William Lucas）的儿子威廉致使朱莉安娜·布鲁汀（Juliana Bructyn）怀孕。这个人露面了，承认并离弃了他的罪，被鞭打着绕教堂三圈。后来又准他在游行的时候谦卑地受一次惩罚，因为他是谦卑地露面的。那女子因躺在产床上而被赦免。

情况就是这样：如果你不接受新的行为标准，他们就会打你，甚至更糟，就像欧洲中世纪的许多清洁派信徒，还有犹太教和其他宗教的殉道者在更大的规模上直接证明的那样。事实上，惩罚和宽恕相结合的力量是非常大的。是的，你会挨打，但是只要你不是太恶劣，你也可以被饶恕和重新接纳。这种解决负罪感的办法，大多数时候都非常令人满意。

然而，在我看来更有趣的是另一个问题。对罗姆尼湿地的巡查是由相当重要的教会人士进行的，而他们并不了解这个地区的情况。教会建筑或礼拜手册的任何问题都很容易被发现，但是除了像威廉·卢卡斯的儿子主动承认的那种情况，他们是怎么知道是谁和谁通奸的呢？我认为，答案肯定在于人性中更丑恶的一面，无论人们多么希望不是这样，但没有必要不承认。如果将一个令人生畏的外部权威引入一个小型社区，后面就会发生在很多地方都有很好记录的一种情况。通过非常恶劣的告密过程，已有的地方争斗和紧张关系往往会升级到一个全新的层面。一项对中世纪法国一个被控有清洁派倾向的村庄蒙塔尤（Montaillou）的著名研究表明，宗教裁判官的行动能力正是由告密机制驱动的。罗姆尼湿地肯定也是这种情况。关于村民各种性过失的信息，一定是由其他村民提供的。当然，这也正是使许多国家的安全机构能有效运作的机制。事后，人们才惊觉，有多少人会为了自己或所爱的人能立即得到好处，而去告发自己的同胞。[注]

我要赶快补充一句，我这么说，可没有居高临下的意思。谢天谢

地，我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考验，所以不知道自己会如何反应。但我能肯定的是，拉特兰会议之后的教宗帝国缓慢但坚定地建立了一种宗教上一家独大的国家，使拉丁欧洲大部分人民遵守已经被英诺森三世成功确立的方案。如果你只看15世纪的史料——此时这个过程已经进行了很长一段时间——就会发现这种遵守看起来都是情愿的，但强制的成分显然存在。教宗帝国可能是在罗马之外建立的，在某种程度上是后加洛林时代欧洲基督教领袖和知识分子的消费需求所创造的，这些人都是理想主义者，对他们所要维护的价值观有着真正的信仰。但是，一旦教宗制度被改造以满足他们的愿望，它会一家独大，要求基督徒服从它对宗教生活的设想。尽管在政治和军事上受到限制，但教宗制度依然建立了一个帝国，在某些重要方面比罗马人统治时期更强大、更具压迫性的帝国。第一个罗马帝国价值观的投射从未超出地主精英阶层，而教宗帝国面向的却是全体民众。罗马法在第一个罗马帝国的传播使得人们同意推翻帝国各省之间的限制；而在新的教宗帝国，同意其法律权威实际上是一种对全体人口实行约束的途径。迄今为止，这个新的罗马帝国延续的时间已经大约是其前身的两倍，这可能也是一个原因。

---

1. Tuchman（1979）是一部可读性很强的介绍教宗分裂的著作。
2. 关于十字军运动，见Tyerman（2006）。关于教宗的联姻战略，见d’Avray（2005）。Moore（1987）是一本关于异端迫害的经典指南。
3. Trans. Rothwell（1975）, no. 146, 705 ff.
4. 参考Duffy（2005）; Burgess & Duffy（2006）。
5. 关于蒙塔尤，见Le Roy Ladurie（1990）。

附录

注释

缩写

Acta synh. habit. Romae－《罗马宗教会议纪要》Acta Synhodorum habitarum Romae

Anon. Val. －《瓦勒西阿努斯匿名著作》Anonymous Valesianus

Cod. Just. － 《查士丁尼法典》Codex Justinianus（Code of Justinian），见《查士丁尼民法大全》Corpus Iuris Civilis

C. Th. － 《狄奥多西法典》Codex Theodosianus（Theodosian Code）

Ep. Aust. － 《奥斯特拉西亚书信集》Epistolae Austrasiacae

H.E. － 《教会史》Historia Ecclesiastica（Ecclesiastical History）

ILS － 《拉丁铭文选》Inscriptiones Latinae Selectae，见Dessau（1974）

Justinian Nov. － 查士丁尼《新律》Justinianus Novellae（Novels of the Emperor Justinian），见《查士丁尼民法大全》Corpus Iuris Civilis

Lib. Pont. － 《教宗名录》Liber Pontificali（Book of the Pontiffs）

MGH － 《日耳曼历史文献汇编》Monumenta Germaniae Historica

Nov. Val. III – 《瓦伦提尼安三世新律》Novels of the Emperor Valentinian III，见《狄奥多西法典》Codex Theodosianus

PLRE – 《晚期罗马帝国人物志》Prosopography of the Later Roman Empire

SH – 普罗柯比《秘史》Procopius, Secret History

原始资料

Acta Synhodorum habitarum Romae: text Mommsen (1894).

Admonitio Generalis: text Boretius (1883), no. 22; trans. King (1987), 209–20.

Agathias, Histories: text Keydell (1967); trans. Frendo (1975).

Ammianus Marcellinus: text and trans. Rolfe (1935–9).

Anonymous Valesianus: text and trans. Rolfe (1935–9), vol. 3.

Bavarian Code: text Krusch (1924); trans. Rivers (1977).

Bede, Ecclesiastical History: text and trans. Colgrave and Mynors (1969).

Boethius, Consolation of Philosophy: text and trans. Stewart et al. (1918).

Life of Caesarius: text Morin (2010); trans. Klingshirn (1994b).

Cassiodorus, Variae: text Mommsen (1894a); trans. Hodgkin (1886); Barnish (1992).

Chronicon Paschale: text Dindorf (1832); trans. Whitby and Whitby (1989).

Codex Carolinus: text Gundlach (1892); selected trans.

King (1987).

Codex Theodosianus: text Mommsen and Kreuger (1905); trans. Pharr (1952).

Const. Omnem: see Corpus Iuris Civilis.

Const. Tanta: see Corpus Iuris Civilis.

Corpus Iuris Civilis:

1. Institutiones (Institutes) and Digesta (Digest): text Kruger and Mommsen (1928);trans. Birks and MacLeod (1987), Watson et al. (1998).

2. Codex Justinianus (Justinian’s Code): text Kruger (1929); trans. Scott (1932).

3. Novellae (Novels): text Scholl and Kroll (1928); trans. Scott (1932).

Corripus, Iohannis: text Diggle and Goodyear (1970); trans. Shea (1998).

De litteris colendis: text Boretius (1883), no. 29; trans. King (1987), 232–3.

Deo Auctore: see Corpus Iuris Civilis.

Divisio Regnorum: text Boretius (1883), no. 45; trans. King (1987), 251–6.

Donation of Constantine: text and trans. Fried (2007).

Einhard, Life of Charlemagne: text Waitz (1911); trans. Dutton (1998).

Engelbert: text Dummler (1884), 138–9; trans. Dutton

(2004).

Ennodius: text Hartel (1882).

Life of Epiphanius: trans. Deferrari (1952).

Epistolae Austrasiacae: text Gundlach (1902).

Eusebius, Ecclesiastical History: text Heinichen (1868–70); trans. McGiffert (1905).

Fredegar: text Krusch (1888).

Gregory of Tours, Histories: text Krusch and Levison (1951); trans. Thorpe (1974).

Inscriptiones Latinae Selectae: Dessau (1974).

John of Antioch: text Muller (1868/1870); trans. Gordon (1966).

John of Ephesus, Ecclesiastical History: trans. Smith (1860).

Jordanes, Getica: text Mommsen (1882); trans. Mierow (1915).

Justinian, Novellae: see Corpus Iuris Civilis.

Karolus Magnus et Leo Papa: text Beumann et al. (1966); trans. Godman (1985). Liber Historiae Francorum: text and trans. Bachrach (1973).

Liber Pontificalis(Book of the Pontiffs): text Duchesne (1886–72); trans. Davies (1992) 1995, Davies (2000).

Liutprand, Antapodosis: text Dümmler (1877); trans. Wright (1993).

Malchus: text and trans. Blockley (1983).

Marcellinus Comes, Chronicle: text Mommsen (1894b).

Menander Protector: text and trans. Blockley (1985).

Ordinatio Imperii: text Boretius (1883), no. 136; trans. Dutton (2004),

Orosius, Against the Pagans: text Arnaud-Lindet (1990–1); trans. Deferrari (1964).

Parastaseis: text and trans. Cameron and Herrin (1984).

Paul the Deacon, History of the Lombards: text Bethmann and Waitz (1878); trans. Foulke(2003).

Priscus: text and trans. Blockley (1983).

Procopius, Works: text and trans. Dewing (1914–40).

Regino of Prum, Chronicle: text Kurze (1890); trans. Dutton (2004), 541.

Ruricius of Limoges: text Engelbrecht (1891); trans. Mathisen (1999).

Themistius, Orations: text Schenkl et al. (1965–74); trans. Heather and Moncur (2001).

Theodosian Code: see Codex Theodosianus.

Theophanes, Chronographia: text Niebuhr (1839–41); trans. Mango and Scott (1997).

Theophylact Simocatta, History: text de Boor and Wirth (1992); trans. Whitby and Whitby(1986).

Venantius Fortunatus, Poems: text Leo (1881); selected

trans. George (1995).

参考文献

Airlie, S. (1998). ‘Private Bodies and the Body Politic in the Divorce Case of Lothar II’, Past & Present 161, 3–38.

Alföldi, G. (1974). Noricum (London).

Allen, P. (2000). ‘The Definition and Enforcement of Orthodoxy’, in Cameron et al. (2000), 811–34.

Amory, P. (1997). People and Identity in Ostrogothic Italy, 489–554 (Cambridge).

Arnaud-Lindet, M.-P. (ed. and Fr. trans.) (1990–1). Orose: Histoires contre les païens (Paris).

Austin, G. (2009). Shaping church law around the year 1000: the Decretum of Burchard of Worms (Farnham).

Bachrach, B. S. (1973). Liber historiae Francorum (Lawrence, Kans.).

Barnes, T. D. (1993). Athanasius and Constantius: theology and politics in the Constantinian Empire (Cambridge, Mass.).

Barnish, S. J. B. (1986). ‘Taxation, Land and Barbarian Settlement in the Western Empire’, Papers of the British School at Rome 54, 170–95.

Barnish, S. J. B. (1988). ‘Transformation and Survivial in the Western Senatorial Aristocracy, c. AD 400–700’, Papers of the British School at Rome 56, 120–55.

Barnish, S. J. B. (1990). ‘Cassiodorus, Boethius, Theodahad: Literature, Philosophy and Politics in Ostrogothic Italy’, Nottingham Medieval Studies 34, 16–32.

Barnish, S. J. B. (1992). Cassiodorus: Variae (Liverpool).

Barthelemy, D. (2009). The Serf, the Knight, and the Historian, trans. G.R. Edwards(Ithaca).

Bassett, S. (ed.) (1989). The Origins of Anglo-Saxon Kingdoms (London).

Bavant, B (2007). ‘Caricin Grad and the Changes in the Nature of Urbanism in the Central Balkans in the Sixth Century’, in A. G. Poulter (ed.), The Transition to Late Antiquity on the Danube and Beyond (Oxford), 337–74.

Baxter, S. (2007). The Earls of Mercia: Lordship and Power in Late Anglo-Saxon England(Oxford).

Bethmann, L. and Waitz, G. (eds) (1878). Pauli Historia Langobardum, MGH Scriptores rerum Germanicarum (Hanover).

Beumann, H. et al. (1966). Karolus Magnus et Leo Papa. Ein Paderborner Epos vom Jahre 799 (Paderborn).

Bierbrauer, V. (1975). Die ostgotischen Grab- und Schatzfunde in Italien (Spoleto).

Bierbrauer, V. (1980). ‘Zur chronologischen, soziologischen und regionalen Gliederung des ostgermanischen Fundstoffs des 5. Jahrhunderts in Südosteuropa’, in Wolfram,H. and Daim, V. (eds.), Die Völker an der mittleren und unteren Donau im fünften und sechsten Jahrhundert, Denkschriften der (Osterreich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phil.-hist. Kl. 201 (Vienna), 131–42.

Birch, D. (1998). Pilgrimage to Rome in the Middle Ages (Woodbridge).

Birks, P. and McLeod, G. (1987). Justinian's Institutes (London).

Bischoff, B. (1990). Latin Palaeography. Antiquity and the Middle Ages, trans. D. Ganzand D. O. Cronin (Cambridge).

Bischoff, B. (1994). Manuscripts and Libraries in the Age of Charlemagne (Cambridge).

Bjornlie, S. (2009). 'What have Elephants to do with Sixth-Century Politics? A Reappraisal of the "Official" Governmental Dossier of Cassiodorus', Journal of Late Antiquity 2, 143–7.

Blockley, R. C. (1981). The Fragmentary Classicising Historians of the Later Roman Empire: Eunapius, Olympiodorus, Priscus and Malchus, vol. 1 (Liverpool).

Blockley, R. C. (1983). The Fragmentary Classicising Historians of the Later Roman Empire: Eunapius, Olympiodorus, Priscus and Malchus, vol. 2 (Liverpool).

Blockley, R. C. (1985). The History of Menander the Guardsman (Liverpool).

Blockley, R. C. (1992). East Roman Foreign Policy: Formation and Conduct from Diocletian to Anastasius (Leeds).

Blumenthal, U.-R. (2004). 'The Papacy 1024–1122', in Luscombe and Riley-Smith(2004b), 8–37.

Bona, I. (1991). Das Hunnenreich (Stuttgart).

Boretius, A. (1883). MGH Capitularia, Legum Sectio II, Capitularia regum francorum i(Hanover).

Bourchard, C. (1981). 'Origins of the French nobility: a reassessment',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86, 501–32.

Bowlus, C. (1995). Franks, Moravians, and Magyars: The Struggle for the Middle Danube, 788–907 (Philadelphia).

Braund, D. C. (1984). Rome and the Friendly King: The Character of Client Kingship(London).

Bright, W. (1892). The Canons of the First Four General Councils of Nicoea, Constantinople, Ephesus and Chalcedon, 2nd ed. (Oxford).

Brock, S. (1981). 'The Conversations with the Syrian Orthodox under Justinian (532),Orientalia Christiana Periodica 47, 87–121.

Brooks, E. R. (1893). 'The Emperor Zenon and the Isaurians',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8, 209–38.

Brown, P. R. L. (1967). Augustine of Hippo: A Biography (London).

Brown, P. (1970). 'The Rise and Function of the Holy Man in Late Antiquity',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 61, 80–101.

Brown, P. R. L. (1981). The Cult of the Saints: Its Rise and Function in Latin Christianity(London).

Brown, P. (1996). The Rise of Western Christendom: Triumph and Diversity, AD 200–1000 (Oxford).

Brown, T. S. (1984). Gentlemen and Officers: Imperial Administration and Aristocratic Power in Byzantine Italy, AD

554–800 (London).

Brundage, J. A. (1995). Medieval Canon Law (London).

Bryer, A. and Herrin, J. (eds) (1977). Iconoclasm (Birmingham).

Bullough, D. (1970). ‘Europae pater: Charlemagne’s Achievement in the light of recent Scholarship’,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85, 59–105.

Bullough, D. (2003). Alcuin: Achievement and Reputation (Leiden).

Bullough, D. (2005). ‘Charlemagne’s “men of God”: Alcuin, Hildebald, Arn’, in Story(2005a), 136–50.

Burgess, C. and Duffy, E. (eds) (2006). The Parish in Late Medieval England: Proceedings of the 2002 Harlaxton Symposium (Donington).

Burrus, V. (1995). The Making of a Heretic: Gender, Authority, and the Priscillianist Controversy (Berkeley).

Bury, J. B. (1889). History of the Later Roman Empire (AD 395 to 800), 2 vols (London).Bury, J. B. (1923). History of the Later Roman Empire from the Death of Theodosius to the Death of Justinian, 2 vols (London).

Cabaniss, A. (1979). The Emperor’s Monk: Contemporary Life of Benedict of Aniane(Ilfracombe).

Cameron, A. D. E. (Alan) (1970). Claudian: Poetry and Propaganda at the Court of Honorius (Oxford).

Cameron, A. D. E. (Alan) (1973). Porphyrius the Charioteer (Oxford).

Cameron, A. D. E. (Alan) (1976). Circus Factions: Blues and Greens at Rome and Byzantium (Oxford).

Cameron, A. M. (Averil) (1985). Procopius and the Sixth Century (London).

Cameron, A. M. (Averil) and Herrin, J. (1984). Constantinople in the Early Eighth Century: The Parastaseis syntomoi chronikai: Introduction, Translation, and Commentary (Leiden).

Cameron, A. M. (Averil) et al. (eds) (2000). 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2nd ed., vol.14 (Cambridge).

Campbell, J. (1986). Essays in Anglo-Saxon History (London).

Chadwick, H. (1981). Boethius: The Consolations of Music, Logic, Theology and Philosophy (Oxford).

Chadwick, H. (1993). The Early Church, rev. ed. (London).

Charles Edwards, T. M. (1979).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Land and Moveable Wealth in Anglo Saxon England', in P. H. Sawyer (ed.), English Medieval Settlement (London),97–104.

Chazelle, C. and Cubitt, C. (2007) (eds). The Crisis of the Oikoumene: The Three Chapters and the Failed Quest for Unity in the Sixth-century Mediterranean (Turnhout).

Christie, N. (1995). The Lombards (Oxford).

Christie, N. (1996). 'Towns and Peoples on the Middle Danube in Late Antiquity and the Early Middle Ages', in N.

Christie and S. T. Loseby (eds), Towns in Transition: Urban Evolution in Late Antiquity and the Early Middle

Ages(Aldershot), 71–98.

Christie, N. (2005). ‘Charlemagne and the Renewal of Rome’, in Story (2005a), 167–82.

Clarence Smith, J. A. (1975). Medieval Law Teachers and Writers, Civilian and Canonist(Ottowa).

Claude, D. (1989). ‘Zur Begrundung familiarer Beziehungen zwischen dem Kaiser und barbarischen Herrschern’, in E. K. Chrysos and A. Schwarcz (eds), Das Reich und die Barbaren (Vienna), 25–56.

Colgrave, B. and Mynors, R. A. B. (eds and trans.) (1969). Bede’s Ecclesiastical History (Oxford).

Collins, R. (1990). ‘Pippin I and the Kingdom of Aquitaine’, in Godman and Collins(1990), 363–90.

Collins, R. (2004). Visigothic Spain 409–711 (Oxford).

Collins, R. (2005). ‘Charlemagne’s Imperial Coronation and the Annals of Lorsch’, in Story (2005a), 52–70.

Cormack, R. (1985). Writing in Gold: Byzantine Society and its Icons (London).

Costambeys, M. et al. (2011). The Carolingian World (Cambridge).

Courtois, C. (1955). Les Vandales et l’Afrique (Paris).

Cowdrey, H. E. J. (1970). The Cluniacs and the Gregorian Reform (Oxford).

Cowdrey, H. E. J. (2002). The Register of Pope Gregory VII 1073–1085: An English Translation (Oxford).

Cowdrey, H. E. J. (2004). ‘The Structure of the Church 1024–73’, in Luscombe and Riley-Smith (2004a), 229–267.

Croke, B. (2001). Count Marcellinus and his Chronicle (Oxford).

Croke, B. (2005). Justianian’s Constantinople’, in Maas (2005), 60–86.

Croke, B. and Crow, J. (1983). ‘Procopius and Dara’,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 73,143–59.

Crone, P. and Cook, M. (1977). Hagarism: The Making of the Islamic world (Cambridge). Crone, P. (1987). Meccan Trade and the Rise of Islam (Oxford).

Cubitt, C. (1995). Anglo-Saxon Church Councils c.650–c.850 (Leicester).

Curran, J. (2000). Pagan City and Christian Capital: Rome in the Fourth Century(Oxford).

Curta, F. (2001). The Making of the Slavs: History and Archaeology of the Lower Danube Region, c.500–700 (Cambridge).

Dagron, G. (1974). Naissance d’une capitale: Constantinople et ses institutions de 330 à 451 (Paris).

Daim, F. (2003). ‘Avars and Avar Archaeology: An Introduction’, in Goetz et al. (eds)(2003), 463–570.

Davies, W. and Fouracre, P. (1986). The Settlement of Disputes in Early Medieval Europe(Cambridge).

Davis, R. (1992). The Lives of the Eighth-Century Popes (Liber Pontificalis)(Liverpool).

Davis, R. (1995). The Lives of the Ninth-Century Popes (Liber Pontificalis)(Liverpool).

Davis, R. (2000). The Book of Pontiffs (Liber Pontificalis). The ancient Biographies of the First Ninety Roman Bishops to AD 715, 2nd ed. (Liverpool).

d’Avray, D. (2005). Medieval Marriage: Symbolism and Society (Oxford).

De Boor, C. and Wirth, P. (eds) (1992). Theophylacti Simocattae Historiae (Stuttgart).

Deferrari, R. (1952). Early Christian Biographies (Washington DC).

Deferrari, R. (1964). Orosius: Seven Books of History Against the Pagans (WashingtonDC). de Jong, M. (2009). The Penitential State: Authority and Atonement in the Age of Louis the Pious, 814–840 (Cambridge).

Depreux, P. (1994). ‘Le Comte Matfrid d’Orléans’, Bibliotheque de l’Ecole des Chartres 152, 331–74.

Dessau, H. (1974). Inscriptiones Latinae Selectae, 4th ed. (Berlin).

Dewing, H. B. (1914–40). The Works of Procopius (London).

Diggle, J. and Goodyear, F. R. D. (eds) (1970). Corippus Iohannis (Cambridge).

Dignas, B. and Winter, E. (2007). Rome and Persia in late antiquity: neighbours and rivals (Cambridge).

Dindorf, L. (ed.) (1832). Chronicon Paschale (Bonn).

Dodgeon, M. H., and Lieu, S. N. C. (1991). The Roman Eastern Frontier and the Persian Wars (AD 226–363): A Documentary History (London).

Donner, F. M. (2005). ‘The Background to Islam’, in Maas (2005), 510–34.

Dooghe, D.-G. (2002). Le Comté de Flandre et ses origines (Wattignies)

Douglas, D. C. and Greenaway, G. W. (1952). English historical documents, 1042–1189 (London).

Duchesne, L. (1886–82). Le Liber Pontificalis, Texte, introduction et commentair, 2 vols (Paris).

Duffy, E. (2005). Stripping of the Altars: Traditional Religion in England 1400–1580, 2nded. (New Haven, Conn.).

Duffy, E. (2006). Saints and Sinners: A History of the Popes, 3rd ed. (London).

Dümmler, E. (1877). Liudprandi episcopi Cremonensis Opera omnia (Hanover).

Dümmler, E. (1884). MGH Poetae Latini Aevi Carolini, vol. 2 (Berlin).

Dunbabin, J. (2000). France in the Making 843–1180, 2nd ed. (Oxford).

Dutton, P. (1998). Charlemagne’s Courtier: The Complete Einhard (Peterborough, Ontario).

Dutton, P. (2004). Carolingian Civilization. A Reader (Peterborough, Ontario).

Dvornik, F. (1966). Early Christian and Byzantine Political Philosophy: Origins and Background, The Dumbarton Oaks Center for Byzantine Studies (Washington DC).

Dvornik, F. (1970). Byzantine Missions Among the Slavs: Saints Constantine-Cyril and Methodius (New Brunswick, NJ).

Elton, H. (2007). 'Cavalry in Late Roman Warfare', in A. S. Lewin and P. Pellegrini (eds),The Late Roman Army in the Near East from Diocletian to the Arab Conquest (Oxford),377–82.

Engelbrecht, A. (1891). Fausti Reiensis Praeter sermones pseudo-eusebianos opera: accedunt Ruricii Epistulae (Milan).

Evans, J. A. S. (1984). 'The "Nika" Rebellion and the Empress Theodora', Byzantion 54,380–2.

Fletcher, R. A. (1989). The Quest for El Cid (London).

Fontaine, J. (1967). 'Conversion et Culture chez les Wisigoths d'Espagne', Settimane di studi sull'Alto medioevo 14, 87–147.

Foss, C. (1977). 'Archaeology and the Twenty Cities of Byzantine Asia', American Journal of Archaeology 81, 469–86.

Foss, C. (1990). History and Archaeology of Byzantine Asia Minor (Aldershot).

Foss, C. (1996). Cities, Fortresses and Villages of Byzantine Asia Minor (Aldershot).

Foulke, W. D. (2003). History of the Lombards (Philadelphia).

Fouracre, P. (1986). 'Placita and the Settlement of

Disputes in Later Merovingian Francia', in Davies and Fouracre (1986), 23–44.

Fouracre, P. (2000) The Age of Charles Martel (Harlow).

Fouracre, P. (2005). 'The Long Shadow of the Merovingians', in Story (2005a), 5–21.

Frend, W. H. C. (1972). The Rise of the Monophysite Movement: Chapters in the History of the Church in the Fifth and Sixth Centuries (Cambridge).

Frendo, J. D. (trans.) (1975). Agathias History (Berlin).

Fried, J. (2007). Donation of Constantine and Constitutum Constantini (Berlin).

Fuhrmann, H. (1973). 'Das Reformpapsttum und die Rechtswissenschaft', Vorträge und Forschungen 17, 175–203.

Ganshof, F. L. (1949). La Flandre sous les premiers comtes, 3rd rev. ed. (Brussels).

Ganshof, F. L. (1971). The Carolingians and the Frankish Monarchy (London).

Ganz, D. (1989). 'The Preconditions for Caroline Minuscule', Viator 19, 23–44.

Geary, P. (1985). Aristocracy in Provence: The Rhone Basin at the Dawn of the Carolingian Age (Stuttgart).

George, J. (1995). Venantius Fortunatus: Personal and Political Poems (Liverpool).

Gerberding, R. (1987). The Rise of the Carolingians and the Liber Historiae Francorum(Oxford).

Gibbon, E. (1896–1900).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ed. J. B. Bury(London).

Gibson, M. T. (1975). The Continuity of Learning c.850–c.1050 (Berkeley).

Gibson, M. T. (1981). Boethius: His Life, Thought and Influence(Oxford).

Gilchrist, J. (1973). Diuersorum patrum sententie siue Collectio in LXXIV titulos digesta(Vatican City).

Gilchrist, J. (1980). The Collection in Seventy-Four Titles: A Canon Law Manual of the Gregorian Reform (Toronto).

Gillet A. (ed.) (2002). On Barbarian Identity: Critical Approaches to Ethnicity in the Early Middle Ages (Turnhout).

Godman, P. (1985). Poetry of the Carolingian Renaissance (London).

Godman, P. (1987). Poets and Emperors: Frankish Politics and Carolingian Poetry(Oxford).

Godman, P. and Collins, R. (eds) (1990). Charlemagne's Heir: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Reign of Louis the Pious (Oxford).

Goetz, H.-W. et al. (eds) (2003). Regna and Gen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te Antique and Early Medieval Peoples and Kingdoms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Roman World (Leiden).

Goffart, W. (1980). Barbarians and Romans AD 418–584: The Techniques of Accommodation (Princeton).

Goffart, W. (1988). The Narrators of Barbarian History (AD

550–800): Jordanes, Gregory of Tours, Bede, and Paul the Deacon (Princeton).

Goffart. W. (2006). Barbarian Tides: The Migration Age and the Later Roman Empire(Philadelphia).

Goldberg, E. J. (2006). Struggle for Empire: Kingship and Conflict under Louis the German 817–876 (Ithaca).

Gordon, D. C. (1966). The Age of Attila (Ann Arbor).

Goscinny and Uderzo (1963). Astérix et les Goths (Neuilly-sur-Seine).

Gray, P. (1979). The Defence of Chalcedon in the East (Leiden).

Gray, P. (2005). 'The Legacy of Chalcedon: Christological Problems and Their Significance', in Maas (2005), 215–38.

Greatrex, G. (1994). 'The Dates of Procopius' Works', Byzantine and Modern Greek Studies 18, 101–14.

Greatrex, G. (1997). 'The Nika Riot: A Reappraisal', Journal of Hellenic Studies 117,60–86.

Greatrex, G. (1998). Rome and Persia at War, 502–532 (Leeds).

Greatrex, G. (2000). 'Procopius the Outsider?', in D. S. Smythe (ed.), Strangers to Themselves: The Byzantine Outsider (Burlington, Vt.), 215–18.

Greatrex, G. and Lieu, S. (2002). The Roman Eastern Frontier and the Persian Wars: A Narrative Sourcebook (London).

Grig, L. and Kelly, G. (2012). Two Romes: Rome and Constantinople in Late Antiquity(Oxford Studies in Late Antiquity) (Oxford).

Gundlach, W. (ed.) (1892). Epistolae karolini aevi, MGH Epp. III, Epistolae merowingici et karolini aevi (Hanover).

Gundlach, W. (ed.) (1902). Epistolae aevi merowingici collectae, MGH Epp. III, Epistolae merowingici et karolini aevi (Hanover).

Hageneder, O. (2000). Il sole e la luna: Papato, impero e regni nella teoria e nella prassi dei secoli XII e XIII (Milan).

Hageneder, O. et al., (1965－). Die Register Innocenz III (Graz).

Haldon, J. F. (1990). Byzantium in the Seventh Century: The Transformation of a Culture(Cambridge).

Hallam, E. (1980). Capetian France, 987－1328 (London).

Halsall, G. (2003). Warfare and Society in the Barbarian West, 450－900 (London).

Halsall, G. (2007). Barbarian Migrations and the Roman West 376－568 (Cambridge).

Hanson, R. P. C. (1988). The Search for the Christian Doctrine of God (Edinburgh).

Harries, J. (1999). Law and Empire in Late Antiquity (Cambridge).

Hartel, W. (1882). Magni Felicis Ennodii Opera omnia (Vienna).

Heather, P. J. (1989). ‘Cassiodorus and the Rise of the Amals: Genealogy and the Goths under Hun Domination’,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 79, 103–28.

Heather, P. J. (1991). Goths and Romans 332–489 (Oxford).

Heather, P. J. (1993). ‘The Historical Culture of Ostrogothic Italy’, in Teoderico il grande e i Goti d’Italia, Atti del XIII Congresso internazionale di studi sull’Alto Medioevo(Spoleto), 317–53.

Heather, P. J. (1994a). ‘Literacy and Power in the Migration Period’, in A. Bowman and G. Woolf (eds) (1994), Literacy and Power in the Ancient World (Cambridge), 177–97.

Heather, P. J. (1994b). ‘New Men for New Constantines?: Creating an Imperial Elite in the Eastern Mediterranean’, in P. Magdalino (ed.), New Constantines: The Rhythm of Imperial Renewal in Byzantium, 4th–13th Centuries (London), 11–33.

Heather, P. J. (1995). ‘Theodoric King of the Goths’, Early Medieval Europe 4.2, 145–73.

Heather, P. J. (1996). The Goths (Oxford).

Heather, P. J. (2000). ‘State, Lordship and Community in the West (c. AD 400–600)’, in Averil Cameron et al. (2000), 437–68.

Heather, P. (2003). ‘Gens and regnum Among the Ostrogoths’, in Goetz et al. (eds), 85–133.

Heather, P. (2005). The Fall of Rome: A New History (London).

Heather P. (2007). ‘Goths in the Roman Balkans c.350–

500, in A. Poulter (ed.), The Transition to Late Antiquity on the Danube and Beyond (Oxford), 163 – 90.

Heather, P. (2008). ‘Ethnicity, Group Identity, and Social Status in the Migration Period’, in I. Garipzanov et al. (eds), Franks, Northmen, and Slavs: Identities and State Formation in Early Medieval Europe (Turnhout), 17 – 50.

Heather, P. (2009). Empires and Barbarians (London).

Heather, P. (2010). ‘Elite Militarisation and the Post-Roman West’, in G. Bonamente and R. Lizzi Testa (eds), Istituzioni, Carisimi et Esercizio del Potere (IV – VI secolo d.C.)(Bari), 245 – 66.

Heather, P. (ed.) (1999). The Visigoths from the Migration Period to the Seventh Century: An Ethnographic Perspective (Woodbridge).

Heather, P. J. and Matthews, J. F. (1991). The Goths in the Fourth Century, Translated Texts for Historians (Liverpool).

Heather, P. J. and Moncur, D. (2001). Politics, Philosophy, and Empire in the Fourth Century: Select Orations of Themistius, Translated Texts for Historians (Liverpool).

Heinichen, F. A. (1868 – 70). Eusebii Pamphili Scripta Historica (Leipzig).

Hendy, M. F. (1985). Studies in the Byzantine Monetary Economy, c.300 – 1450(Cambridge).

Herrin, J. (1987). The Formation of Christendom (Oxford).

Herrmann, K. J. (1973). Das Tuskulanerpapsttum (1012 –

1046): Benedikt VIII., Johannes XIX., Benedikt IX. (Stuttgart).

Hillgarth, J. N. (1966). 'Coins and Chronicles: Propaganda in Sixth Century Spain',Historia 16, 482–508.

Hill, S. (1996). The Early Byzantine Churches of Cilicia and Isauria (Birmingham).

Hodgkin, T. (1886). The Letters of Cassiodorus (London).

Holum, K. (2005). 'The Classical City in the Sixth Century: Survival and Transformation', in Maas (2005), 87–112.

Honoré, A. M., (1978). Tribonian (London).

Honoré, A. (1994). Emperors and Lawyers, 2nd rev. ed. (Oxford).

Hooke, D. (1998). The Landscape of Anglo-Saxon England (London).

Horden, P. (2005). 'Mediterranean Plague in the Age of Justinian', in Maas (2005),134–60.

Howard Johnston, J. (2010). Witnesses to a World Crisis: Historians and Histories of the Middle East in the Seventh Century (Oxford).

Howard Johnston, J. et al. (eds) (1999). The Cult of Saints in Late Antiquity and the Middle Ages: Essays on the Contribution of Peter Brown (Oxford).

Humfress, C. (2007). Orthodoxy and the Courts in Late Antiquity (Oxford).

James, E. F. (1988). The Franks (Oxford).

Jarnut, J. (1982). Geschichte der Langobarden (Stuttgart).

Jasper, D. and Fuhrmann, H. (2001). Papal Letters in the Early Middle Ages (Washington DC).

Johnson, M. J. (1988). 'Towards a History of Theoderic's Building Programme', Dumbarton Oaks Papers 42, 73–96.

Jones, A. H. M. (1962). 'The Constitutional Position of Odoacer and Theoderic',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 52, 126–30.

Jones, A. H. M. (1964). The Later Roman Empire: A Social Economic and Administrative Survey, 3 vols (Oxford).

Kaldellis, A. (2004). Procopius of Caesarea: Tyranny, History, and Philosophy at the End of Antiquity (Philadelphia).

Kaster, R. A. (1988). Guardians of Language: The Grammarian and Society in Late Antiquity (Berkeley).

Kennedy, H. (2007). The Great Arab Conquests: How the Spread of Islam Changed the World We Live in (London).

Keydell, R. (1967). Agathiae Myrinaei Historiarum libri quinque (Berlin).

Khazanov, A. M. (1994). Nomads and the Outside World, 2nd ed. (Madison, Wis.).

King, P. D. (1987). Charlemagne: Translated Sources (Kendal).

Klingshirn, W. (1994a). Caesarius of Arles: The Making of a Christian Community in Late Antique Gaul (Cambridge).

Klingshirn, W. (1994b). Caesarius of Arles: Life, Testament, Letters (Liverpool).

Krautheimer R. (1980). Rome: Profile of a City, 312－1308(Princeton).

Kreuger, P. (ed.) (1877). Corpus Iuris Civilis (Berlin).

Kreuger, P. and Mommsen, Th. (1928). Codex Theodosianus (Berlin).

Krusch, B. (1888). Fredegar Chronicorum libri IV cum continuationibus, MGH scriptores

rerum Merovingicarum 2 (Hanover).

Krusch, B. (1924). Die Lex Bajuvariorum: Textgeschichte, Handschriftenkritik und Entstehung.

Mit zwei Anhängen: Lex Alamannorum und Lex Ribuaria (Berlin).

Krusch, B. and Levison, W. (eds) (1951). Gregory of Tours Historiae, MGH scriptores rerum Merovingicarum 1.1 (Berlin).

Kurze, F. (ed.) (1890). MGH SRG, Reginonis abbatis Prumiensis Chronicon (Hanover). La Rocca, C. (ed.) (2005). Italy in the Early Middle Ages: 476－1000 (Oxford).

Lattimore, O. (1940). 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 (Oxford).

Law, V. (1994). ‘The Study of Grammar’, in McKitterick (1994a), 88－110.

Lawrence, C. H. (2001). Medieval Monasticism: Forms of Religious Life in Western Europe in the Middle Ages, 3rd ed.

(Harlow).

Lengyel, A. and Radan, G. T. B. (eds) (1980). The Archaeology of Roman Pannonia(Budapest).

Leo, G. (1881). Venantius Fortunatus, Opera Poetica, MGH auctores antiquissimi 4.1(Berlin).

Leonardi, C. (1999). ‘Intellectual Life’, in Reuter (1999), 186–211.

Le Roy Ladurie, E. (1990). Montaillou: Cathars and Catholics in a French Village, 1294–1324 (Harmandsworth).

Leyser, K. (1979). Rule and Conflict in an Early Medieval Society: Ottonian Saxony(London).

Leyser, K. (1982). Medieval Germany and Its Neighbours, 900–1250 (London).

Llewellyn, P. (1971). Rome in the Dark Ages (London).

Luscombe, D. and Riley-Smith, J. (eds) (2004a). The New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 Volume IV, c.1024–c.1198, part 1 (Cambridge).

Luscombe, D. and Riley-Smith, J. (eds) (2004b). The New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 Volume IV, c.1024–c.1198, part 2 (Cambridge).

Maas, M. (2005).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the Age of Justinian (Cambridge).Macartney, C. A. (1930). The Magyars in the Ninth Century (Cambridge).

MacCormack, S. A. (1981). Art and Ceremony in Late Antiquity (Los Angeles and Berkeley).

MacGeorge, P. (2002). Late Roman Warlords (Oxford).

McGiffert, A. S. (1905). Eusebius: Church History, Life of Constantine the Great, and Oration in Praise of Constantine (New York).

McKeon, P. R. (1978). Hincmar of Laon and Carolingian Politics (Urbana, Ill.).

McKitterick, R. (1977). The Frankish Church and the Carolingian Reforms, 789–895(London).

McKitterick, R. (1983). The Frankish Kingdoms under the Carolingians, 751–987(London).

McKitterick, R. (1989). The Carolingians and the Written Word (Cambridge).

McKitterick, R. (1990). The Uses of Literacy in Early Mediaeval Europe (Cambridge).

McKitterick, R. (ed.) (1994a). Carolingian Culture: Emulation and Innovation(Cambridge).

McKitterick R. (1994b). 'Script and Book Production', in McKitterick (1994a), 221–47.

McKitterick, R. (ed.) (1995). The New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 II: c.700–c.900(Cambridge).

McKitterick, R. (1999). 'The Church', in Reuter (1999), 130–63.

McKitterick, R. (2005). 'The Carolingian Renaissance of Culture and Learning', in Story(2005a), 151–66.

McKitterick, R. (2008). Charlemagne: The Formation of a

European Identity (Cambridge).

MacLean, S. (2003). Kingship and Politics in the Late Ninth Century: Charles the Fat and the End of the Carolingian Empire (Cambridge).

McLynn, N. (1994). Ambrose of Milan (Berkeley).

Mango, C. (1977a). ‘Historical Introduction’, in Bryer and Herrin (1977), 1–6.

Mango, C. (1977b). ‘The Liquidation of Iconoclasm and the Patriarch Photius’, in Bryer and Herrin (1977), 133–40.

Mango, C. (1985). Le Développement urbain de Constantinople (IVe–VIIe siècles),Travaux et Mémoires, Monographies 2 (Paris).

Mango, C. and Scott, R. (trans.) (1997). Chronographia, The Chronicle of Theophanes Confessor (Oxford).

Markus, R. (1997). Gregory the Great and his World (Cambridge).

Martindale, J. (1981). ‘Charles the Bald and the Government of the Kingdom of Aquitaine’, in Gibson and Nelson, 115–38 (Oxford).

Mathisen, R. (1989). Ecclesiastical Factionalism and Religious Controversy in Fifth Century Gaul (Washington DC).

Mathisen, R. (1999). Ruricius of Limoges and Friends (Liverpool).

Matthews, J. F. (1975). Western Aristocracies and Imperial Court AD 364–425 (Oxford).

Matthews, J. F., 1989. The Roman Empire of Ammianus (London).

Matthews, J. F. (2000). Laying Down the Law: A Study of the Theodosian Code (New Haven).

Mayr-Harting, H. (1972). The Coming of Christianity to Anglo-Saxon England (London).

Merridale, C. (2006). Ivan' s War: the Red Army 1939–1945 (London).

Merrills, A. and Miles, D. (2010). The Vandals (Oxford).

Metzger, E. (ed.) (1988). A Companion to Justinian' s Institutes (Ithaca).

Mierow, C. C. (1915). Jordanes Getica (New York).

Millar, F. (2006). A Greek Roman Empire. Power and Belief under Theodosius II 408–450(Berkeley).

Mitchell, S. (1993). Anatolia. Land, Men and Gods in Asia Minor II. The Rise of the Church (Oxford).

Mocsy, A.(1974). Pannonia and Upper Moesia (London).

Momigliano, A. (1955). 'Cassiodorus and the Italian Culture of His Time', Proceedings of the British Academy 41, 215–48.

Mommsen, Th. (ed.) (1882). Jordanes Romana et Getica, MGH auctores antiquissimi 5. 1(Berlin).

Mommsen, Th. (ed.) (1894a). Cassiodori … Variae: i. Epistulae Theodericianae variae. ii. Acta synhodorum habitarum Romae. iii. Cassiodori Orationum reliquiae, ed. L.Traube. MGH

auctores antiquissimi 12 (Berlin).

Mommsen, Th. (ed.) (1894b). Chronica Minora, vol. 2, auctores antiquissimi (Berlin).

Moore, R. I. (1987). The Formation of a Persecuting Society: Power and Deviance in Western Europe, 950–1250 (Oxford).

Moorhead, J. (1992). Theoderic in Italy (Oxford).

Moorhead, J. (1994). Justinian (London).

Mordek, H. (1975). Kirchenrecht und Reform im Frankenreich: die collectio vetus Gallica: die älteste systematische Kanonessammlung des fränkischen Gallien: Studien und Edition (Berlin).

Mordek, H. (1985). 'Kanonistik und gregorianische Reform', in K. Schmid (ed.), Reich und Kirche vor dem Investiturstreit (Sigmaringen), 65–82.

Morin, G. et al. (eds) (2010). Vie de Césaire d'Arles (Paris).

Morris, C. (1989). The Papal Monarchy: The Western Church from 1050 to 1250 (Oxford).Muller, C. (1868/1870). Fragmenta Historicorum Graecorum, vols 4 and 5 (Paris).

Nelson, J. (1977). 'On the Limits of the Carolingian Renaissance', Studies in Church History, 51–67 (reprinted as no. 2 in Nelson (1986b)).

Nelson, J. (1983), 'Legislation and Consensus in the Reign of Charles the Bald', in C. P.Wormald et al. (eds), Ideal and Reality in Frankish and Anglo-Saxon Society: Studies

presented to J. M. Wallace-Hadrill (Oxford), 202–27 (reprinted as no. 5 in Nelson 1986b).

Nelson, J. (1986a). ‘Dispute settlement in Carolingian West Francia’, in Davies and Fouracre (1986), 45–64.

Nelson, J. (1986b). Politics and Ritual in Early Medieval Europe (London).

Nelson, J. (1987). ‘Making Ends Meet: Wealth and Poverty in the Carolingian Church’, Studies in Church History 24, 25–36.

Nelson, J. (1990). ‘The Last Years of Louis the Pious’, in Godman and Collins, 147–60. Nelson, J. (1992), Charles the Bald (London).

Nelson, J. (1998). ‘Making a Difference in Eighth-century Politics: The Daughters of Desiderius’, in A. Murray (ed.), After Rome’s Fall (Toronto), 171–90.

Nelson, J. (2005). ‘Charlemagne the Man’, in Story (2005a), 22–37.

Nelson, J. (2008). Opposition to Charlemagne (London).

Nicol, D. M. (1992). The Immortal Emperor (Cambridge).

Niebuhr, B. G. (ed.) (1839–41). Theophanes Chronographia (Bonn).

Noble, T. F. X. (1984). The Republic of St Peter: The Birth of the Papal State, 680–825(Philadelphia).

Noble, T. F. X. (1995). ‘The Papacy in the Eighth and Ninth Centuries’, in McKitterick(1995), 563–86.

Noble, T. F. X. (2009). Images, Iconoclasm, and the Carolingians (Philadelphia).

Norwich, J. J. (1988). Byzantium: The Early Centuries (London).

Obolensky, D. (1982). The Byzantine Commonwealth: Eastern Europe, 500–1453 (New York).

O’Donnell, J. J. (1979). Cassiodorus (Berkeley).

O’Donnell, J. J. (2009). The Ruin of the Roman Empire (London).

Pallas, D. (1977). Les Monuments paléochrétiens de Grèce découverts de 1959 a 1973(Vatican City).

Perin, P. and Kazanski, M. (1996). ‘Das Grab Childerichs I’, in Die Franken: Wegbereiter Europas: vor 1500 Jahren, König Chlodwig und seine Erben (Mainz), 173–82.

Pharr, C. (1952). The Theodosian Code and Novels, and the Sirmondian Constitutions(New York).

Pohl, W.(1988). Die Awaren: ein Steppenvolk im Mitteleuropa, 567–822 n. Chr. (Munich).Pohl, W. (2003). ‘A Non-Roman Empire in Central Europe: The Avars’, in Goetz et al.(eds), 571–95.

Pohl. W. (2005). ‘Invasions and Ethnic Identity’, in La Rocca, 11–33.

Poly, J.-P. and Bournazel, E. (1991). The Feudal Transformation, 900–1200 (New York). Potter, D. (2004). The Roman Empire at Bay: AD 180–395 (London).

Price, R. (2009). The Acts of the Council of

Constantinople of 553: with related texts on the Three Chapters Controversy (Liverpool).

Pringle, D. (1981). The Defence of Byzantine Africa from Justinian to the Arab Conquest(Oxford).

PLRE = The Prosopography of the later Roman Empire, Jones, A. H. M. et al. (eds), 3 vols (Cambridge), 1971–92.

Prostko-Prostynski, J. (1994). Utraeque Res Publicae: The Emperor Anastasius' Gothic Policy (491–518) (Poznan).

Puzo, M. (1969). The Godfather (London).

Reuter, T. (1982). 'The "Imperial Church System" of the Ottonian and Salian Rulers: A Reconsideration', Journal of Ecclesiastical History 33, 347–74.

Reuter, T. (1985). 'Plunder and Tribute in the Carolingian Empire', in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 75–94.

Reuter, T. (1990). 'The End of Carolingian Military Expansion', in Godman and Collins,391–407.

Reuter, T. (1991). Germany in the Early Middle Ages c.800–1056 (London).

Reuter, T. (ed.) (2000). The New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 vol. 3 (Cambridge),

Reuter, T. (2005). 'Charlemagne and the World beyond the Rhine', in Story (2005a),183–94.

Reydellet, M. (1981). La Royauté dans la littérature latine: de Sidoine Apollinaire à Isidore de Séville (Rome).

Reynolds, L. D. and Wilson, N. G. (1991). Scribes and scholars: a guide to the transmission of Greek and Latin literature, 3rd ed. (Oxford).

Reynolds, R. E. (1995). 'The Organisation, Law, and Liturgy of the Western Church 700–900', in R. McKitterick (ed.), The New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 vol. 2(Cambridge), 587–621.

Richards, J. (1979). The Popes and the Papacy in the Early Middle Ages, 476–752(London).

Riche, P. (1987). Gerbert d'Aurillac: le pape de l'an mille (Paris).

Richter, M. (1985). 'Die politische Orientierung Mährens zur Zeit von Konstantin und Methodius', in H. Wolfram and A. Schwarcz (eds), Die Bayern und ihre Nachbarn,vol. 1 (Vienna), 281–92.

Riley-Smith, J. (1986). The First Crusade and the Idea of Crusading (London).

Ripoll, G. and Velázquez, I. (1995). La Hispania visigoda: del rey Ataúlfo a don Rodrigo(Madrid).

Rivers, T. J. (1977). Laws of the Alamans and Bavarians (Philadelphia).

Rivière, Y. de la (ed.) (2012). Confiscations et l'histoire de l'Empire Romain(Rome).

Robinson, I. S. (1978). Authority and Resistance in the Investiture Contest. The Polemical Literature of the Eleventh Century (Manchester).

Robinson, I. S. (1990). The Papacy 1073–1198: Continuity and innovation (Cambridge).Robinson, I. S. (2004a). The Papal Reform of the Eleventh Century: Lives of Pope Leo IX and Pope Gregory VII (Manchester).

Robinson, I. S. (2004b). 'Reform and the Church 1073–1122', in Luscombe and Riley Smith (2004a), 268–334.

Robinson, I. S. (2004c). 'Institutions of the Church 1073–1216', in Luscombe and Riley Smith (2004a), 368–460.

Robinson, I. S. (2004d). 'The Papacy 1122–1198', in Luscombe and Riley-Smith (2004b),317–83.

Rolfe, J. C. (ed.) (1935–9). Ammianus Marcellinus (London).

Rosenwein, B. (1989). To be the Neighbor of Saint Peter: The Social Meaning of Cluny's Property, 909–1049 (Ithaca).

Rothwell, H. (ed.) (1975). English Historical Documents 1189–1327 (London).

Rouche, M. (1979). L'Aquitaine: des Wisigoths aux Arabes, 418–781; naissance d'une region (Paris).

Rushworth, A. (2004). 'From Arzuges to Rustamids: State formation and regional identity in the Pre-Saharan Zone', in A. H. Merrills (ed.), Vandals, Romans, and Berbers: New Perspectives on Late Antique North Africa (Aldershot), 77–98.

Sarris, P. (2002). 'The Justinianic Plague: Origins and Effects', Continuity and Change 17, 169–82.

Sarris, P. (2011). Empires of Faith: The Fall of Rome to the Rise of Islam, 500–700(Oxford).

Sartre, M. (1982). 'Trois études sur l'Arabie romaine et byzantine', in Revue d'études latines (Brussels).

Schäfer, C. (1991). Der weströmische Senat als Träger antiker Kontinuität unter den Ostgotenkönigen (490–540 n. Chr.) (St Katharinen).

Schatz, K. (1990) Papal Primacy from its Origins to the Present (Collegeville, Minn.).

Schenkl, H. et al. (eds) (1965–74). Themistii Orationes (Leipzig).

Schieffer (2003). Die Streitschriften Hinkmars von Reims und Hinkmars von Laon, 869–871 (Hanover).

Schmidt, T. (1977). Alexander II. (1061–1073) und die römische Reformgruppe seiner

Zeit (Stuttgart).

Scholl, R. and Kroll, G. (eds) (1928). Novellae (Berlin).

Scott, L. R. (1976). 'Aspar and the Burden of Barbarian Heritage', Byzantine Studies 3,59–69.

Scott, S. P. (trans.) (1932). The Civil Law, Including the Twelve Tables: The Institutes of Gaius, the Rules of Ulpian, the Opinions of Paulus, the Enactments of Justinian, and the Constitutions of Leo (Cincinnati).

Shanzer, D. and Wood, I. N. (trans.) (2002). Avitus of Vienne: Letters and Selected Prose(Liverpool).

Shea, G. W. (1998). The Iohannis or De bellis libycis of Flavius Cresconius Corippus(Lewiston, Me.).

Sinor, D. (1977). Inner Asia and Its Contacts with Medieval Europe (London).

Sirks, A. J. B. (2007). The Theodosian Code: A Study (Friedrichsdorf).

Smith, C. (1988). Christians and Moors in Spain, vol. 1 (Warminster).

Smith, R. P. (1860). The Third Part of the 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John Bishop of Ephesus (Oxford).

Somerville, R. and Brasington, B. C. (1998). Prefaces to Canon Law Books in Latin Christianity: Selected Translations, 500–1245 (New Haven).

Sorabji, R. (1983). Time, Creation and the Continuum: Theories in Antiquity and the Early Middle Ages (London).

Sotinel, C. (2005). ‘Emperors and Popes in the Sixth Century: The Western View’, in Maas, 267–90.

Staniforth, M. (ed.) (1987). Early Christian Writings (Harmondsworth).

Stathakopoulos, D. (2000). ‘The Justinianic Plague Revisited’, Byzantine and Modern Greek Studies 24, 256–76.

Stein, E. (1949). Histoire du Bas-Empire, vol. 1 (Paris).

Stein, E. (1950). Histoire du Bas-Empire, vol. 2 (Paris).

Stein, P. (1999). Roman Law in European History (Cambridge).

Stewart, H. F. et al. (1918). Boethius: Tractates, De Consolatione Philosophiae(Cambridge, Mass.).

Stocking, R. (2000). Bishops, Councils, and Consensus in the Visigothic Kingdom, 589 – 633 (Ann Arbor).

Story, J. (ed.) (2005a). Charlemagne: Empire and Society (Manchester).

Story, J. (2005b). 'Charlemagne and the Anglo-Saxons', in Story (2005a), 195 – 210.

Teillet, S. (1984). Des Goths à la nation gothique: les origines de l'idée de nation en

Occident du Ve au VIIe siècle (Paris).

Thompson, A. and Gordley, J. (1993). The Treatise on Laws: (Decretum DD 1 – 20)(Washington DC).

Thompson, E. A. (1946). 'The Isaurians under Theodosius II', Hermathena, 18 – 31.

Thompson, E. A. (1969). The Goths in Spain (Oxford).

Thompson, E. A. (1982). Romans and Barbarians: The Decline of the Western Empire(Madison).

Thorpe, L. (1974), Gregory of Tours: The History of the Franks (London).

Tillmann, H. (1980). Pope Innocent III (Amsterdam).

Tuchman, B. (1979). A Distant Mirror: The Calamitous 14th Century (New York).

Turner, C. H. (1903). 'Chapters in the History of Latin MSS III: The Lyon-Petersburg MS of Councils', Journal of Theological Studies 4, 426 – 34.

Tyerman, C. (2006). God's War: A New History of the

Crusades (London).

Ullmann, W. (1960). The Medieval Papacy: St Thomas and Beyond (London).

Ullmann, W. (1970). Growth of Papal Government, 3rd ed. (London).

Vessey, M. (1993), 'The Origins of the Collectio Sirmondiana', in The Theodosian Code, ed. I. N. Wood and J. Harries (London), 178–99.

Vives, J. (1963). Concilios visigóticos e hispano-romanos (Barcelona).

Waitz, G. (1911). Einhardi Vita Karoli Magni, 6th ed., MGH Scriptores rerum Germanicarum in usum scholarum (Hanover).

Wallace-Hadrill, J. M. (1982). The Long-haired Kings (Toronto).

Ward Perkins, B. (1984). From Classical Antiquity to the Middle Ages: Urban Public Building in Northern and Central Italy, AD 300–850 (Oxford).

Ward Perkins, B. (2005). The Fall of Rome and the End of Civilization (Oxford).

Watson, A. et al. (1998). The Digest of Justinian (Philadelphia).

Watt, J. A. (1999). 'The Papacy', in D. Abulafia (ed.), The New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 vol. 5 (Cambridge), 107–63.

Werner, K. F. (1979). 'Kingdom and Principality in Twelfth Century France', in T. Reuter (ed.), The Medieval

Nobility: Studies on the Ruling Classes of France and Germany from the Sixth to the Twelfth Century (Amsterdam), 243–90.

Werner, K. F. (1980). ‘Missus-marchio-comes: entre l’administration centrale et l’administration locale de l’empire carolingien’, in W. Paravicini and K. F. Werner(eds), Histoire comparée de l’administration (IVe–XVIIIe siècle), Beihefte der Francia 9 (Munich), 191–239.

Whitby, L. M. (1985). ‘Justinian’s Bridge over the Sangarius and the Date of Procopius’

De adeficiis’, Journal of Hellenic Studies105, 129–48.

Whitby, L. M. (1986). ‘Procopiu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Roman Defences in Upper Mesopotamia, in H. Kennedy and P. Freeman (eds), The Defence of the Roman and Byzantine Near East (Oxford), 717–35.

Whitby, L. M. (1988). The Emperor Maurice and his Historian: Theophylact Simocatta on Persian and Balkan Warfare (Oxford).

Whitby, L. M. (2000). ‘The Balkans and Greece, 420–602’, in Cameron et al. (2000),701–30.

Whitby, L. M., and Whitby, J. M. (1986). The History of Theophylact Simocatta(Oxford).

Whitby, L. M. and Whitby, J. M. (1989). The Chronicon Paschale (Liverpool).

Whitelock, D. (1996). English Historical Documents, c.500–1042, 2nd ed. (London).

Whittow, M. (1996). The Making of Orthodox Byzantium,

600–1025 (London).

Wickham, C. J. (1981). Early Medieval Italy: Central Power and Local Society, 400–1000(London).

Wickham, C. J. (1993). 'La chute de Rome n'aura pas lieu. A propos d'un livre récent', Le Moyen Age 99, 107–26.

Wickham, C. J. (2005). Framing the Early Middle Ages: Europe and the Mediterranean 400–800 (Oxford).

Wickham, C. J. (2009). The Inheritance of Rome: A History of Europe from 400 to 1000(London).

Williams, A. (1991). The English and the Norman Conquest (Woodbridge).

Wiseman, J. (1984). 'The City in Macedonia Secunda', in V. Popovic (ed.), Villes et Peuplement dans l'Illyricum protobyzantin (Rome), 289–313.

Wolfram, H. (1988). History of the Goths, trans. T. J. Dunlap (Berkeley).

Wollasch, J. (1999). 'Monasticism: the First Age of Reform', in Reuter (1999), 163–85. Wood, I. N. (1994). The Merovingian Kingdoms (London).

Wood, I. N. (1995). 'Teutsind, Witlaic and the History of Merovingian Precaria', in W. Davies and P. Fouracre (eds), Property and Power in the Early Middle Ages(Cambridge), 31–52.

Wood, S. (2006). The Proprietary Church in the Medieval West (Oxford).

Wormald, P. (1999). The Making of English Law: King Alfred

to the Twelfth Century. Volume 1, Legislation and Its Limits (Oxford).

Wright, F. A. (1993). Liutprand of Cremona: The Embassy to Constantinople and Other Writings (London).

Wright, R. (1982). Late Latin and Early Romance in Spain and Carolingian France(Liverpool).

Wright, R. (1996). Latin and the Romance Languages in the Early Middle Ages(Philadelphia).

致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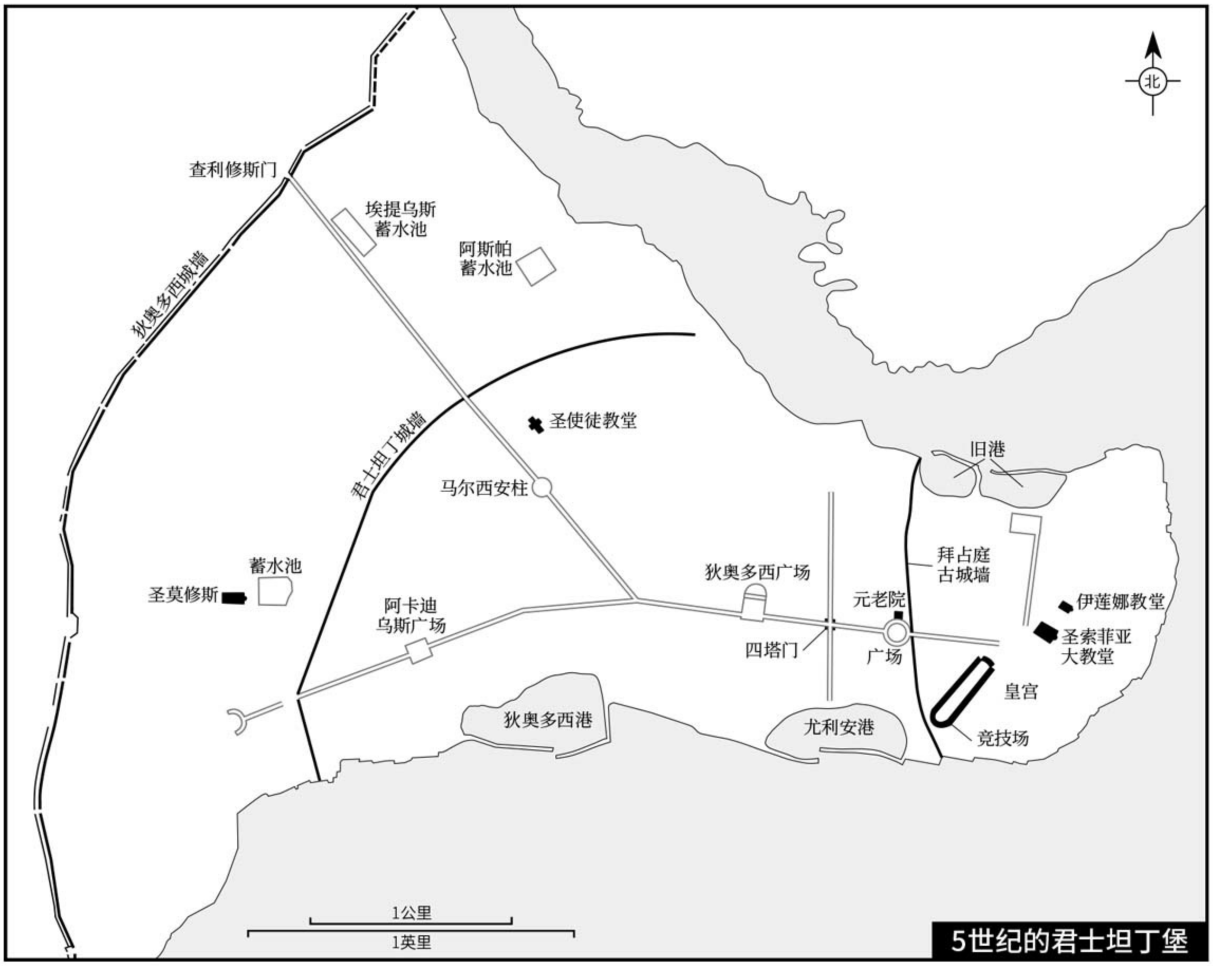
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我得到过很多人的帮助，有知识上的，有实践方面的，也有个人方面的，这里我很高兴能够对所有帮助过我的人表达感激之情。和往常一样，这里提到了一些名字，但还有许多其他应该提到但没有被提到的名字。这部分是因为完整的名单将会完全失控，部分上是因为在现实中任何长篇著作的起源都十分错综复杂，要想准确地重现谁贡献了什么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首先，我要感谢爱因斯坦论坛和《阿维拉纳资料集》（Collectio Avellana）研讨会的组织者桑德·埃弗斯（Sander Evers），他们的邀请让我有机会在更正式的语境中尝试第四部分的论点。我的同事兼朋友戴维·达瓦雷（David d’Avray）的影响也很巨大。在第三部分，我探讨的是我以前仅仅是教过的一个领域，这方面的工作完全依赖于许多同事，这些年来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不过我特别要指出的是温迪·戴维斯(Wendy Davies)和金蒂·纳尔逊(Jinty Nelson)，能够在职业生涯的不同阶段与他们直接共事，我感到非常荣幸。第一部分反映了我长期以来对与哥特人有关的一切的痴迷，但我对普罗柯比和查士丁尼的兴趣可以直接追溯到大学时代，尤其是詹姆斯·霍华德·约翰斯顿（James Howard Johnston）和迈克尔·惠特比（Michael Whitby）的共同影响。无论是在脚注中，还是仅仅在我的脑海中，我对这些学者和其他学者的感激之情都是巨大的，也是发自内心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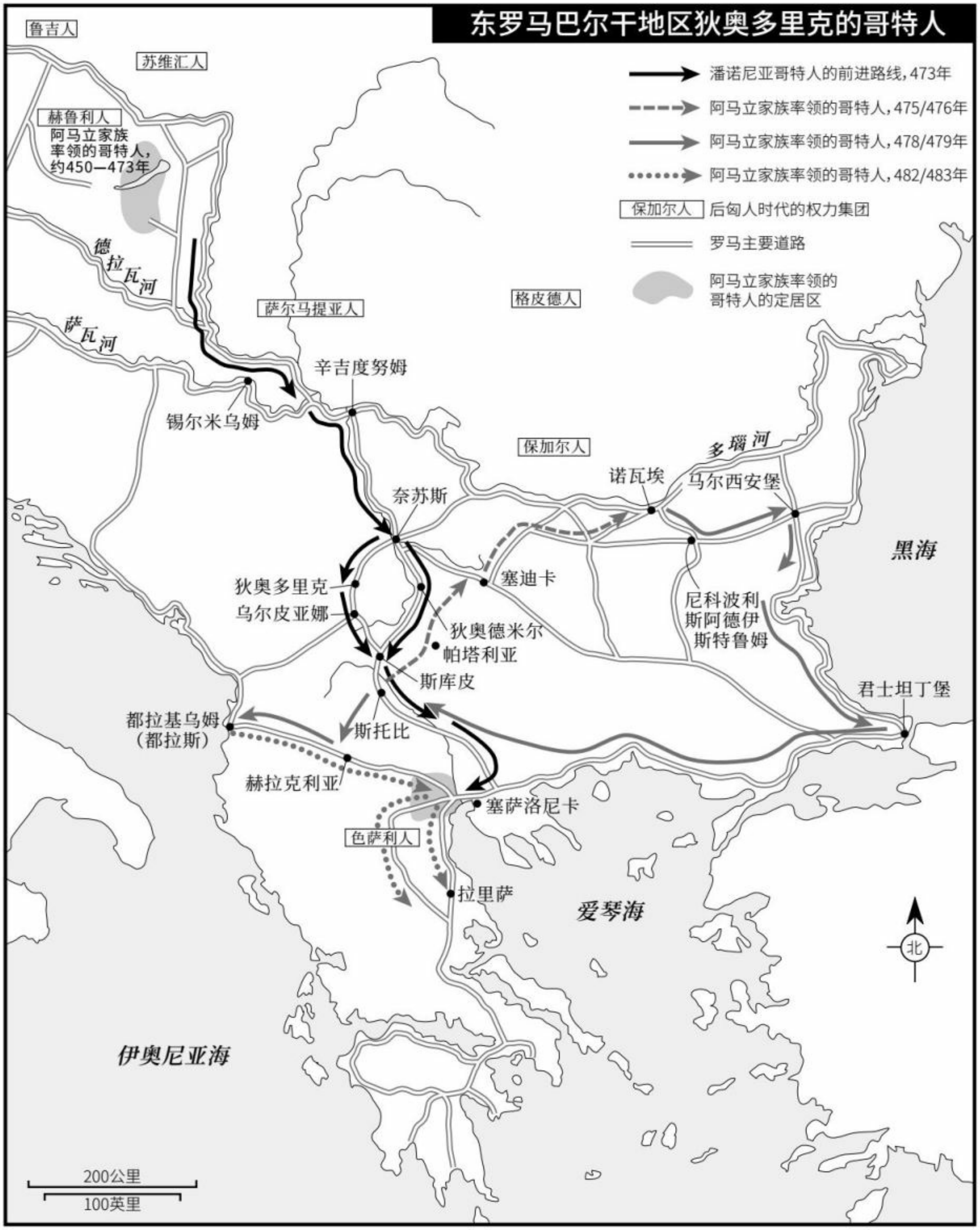
我还要感谢我的经纪人费莉希蒂·布莱恩（Felicity Bryan）和她的团队，感谢他们在写作过程中给予我的鼓励。尤其是费莉希蒂那种愉快的、永不言败的态度，总是一种极大的鼓舞。同样要感谢麦克米伦的编辑乔治娜·莫利（Georgina Morley），在整个过程中，她一直都很

有耐心，乐于助人，尤其是在处理插图的时候。制作团队的其他成员，尤其是尼古拉斯·布莱克（Nicholas Blake）、塔尼亚·王尔德（Tania Wilde）和审稿人大卫·米尔纳（David Milner），他们帮我纠正了无数的错误，并以最高的效率迅速完成了工作。对他们的感激之情，我难以言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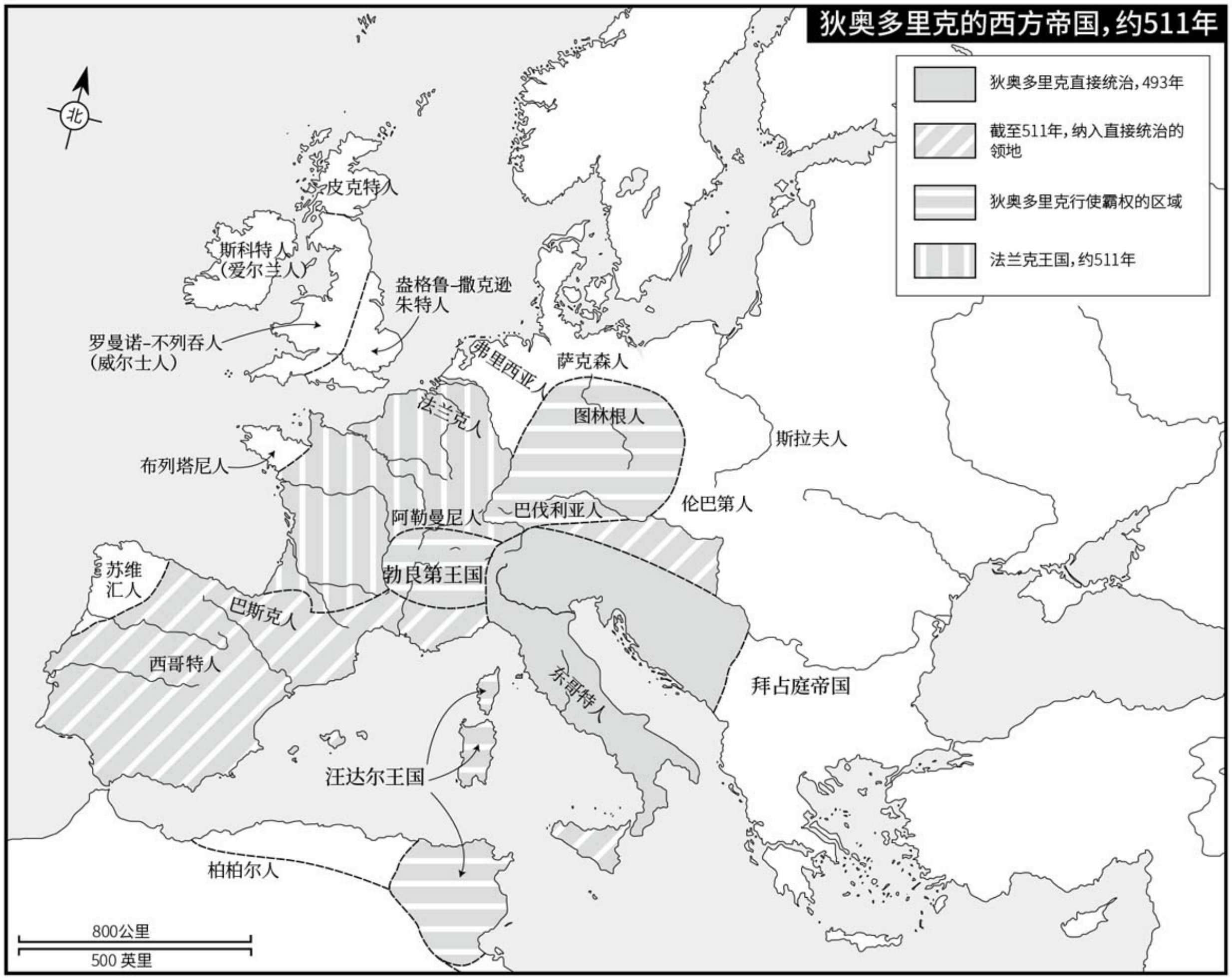
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是，我要感谢盖尔（Gail）、威廉（William）和纳撒尼尔（Nathaniel），他们间接参与到了紧张而漫长的写作过程。我只能为我的多次疲劳和易怒道歉，但我很高兴这个项目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借口来分享一次美妙的伊斯坦布尔之旅。我的宠物托奇（Tookie）、科斯特斯（Custance）、珀西（Percy）、诺特尔（Nottle）和贝拉（Bella）为我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令人振奋的娱乐活动，几乎可以说，它们完全物超所值。例如，它们几乎一直坚持进行健康锻炼的重要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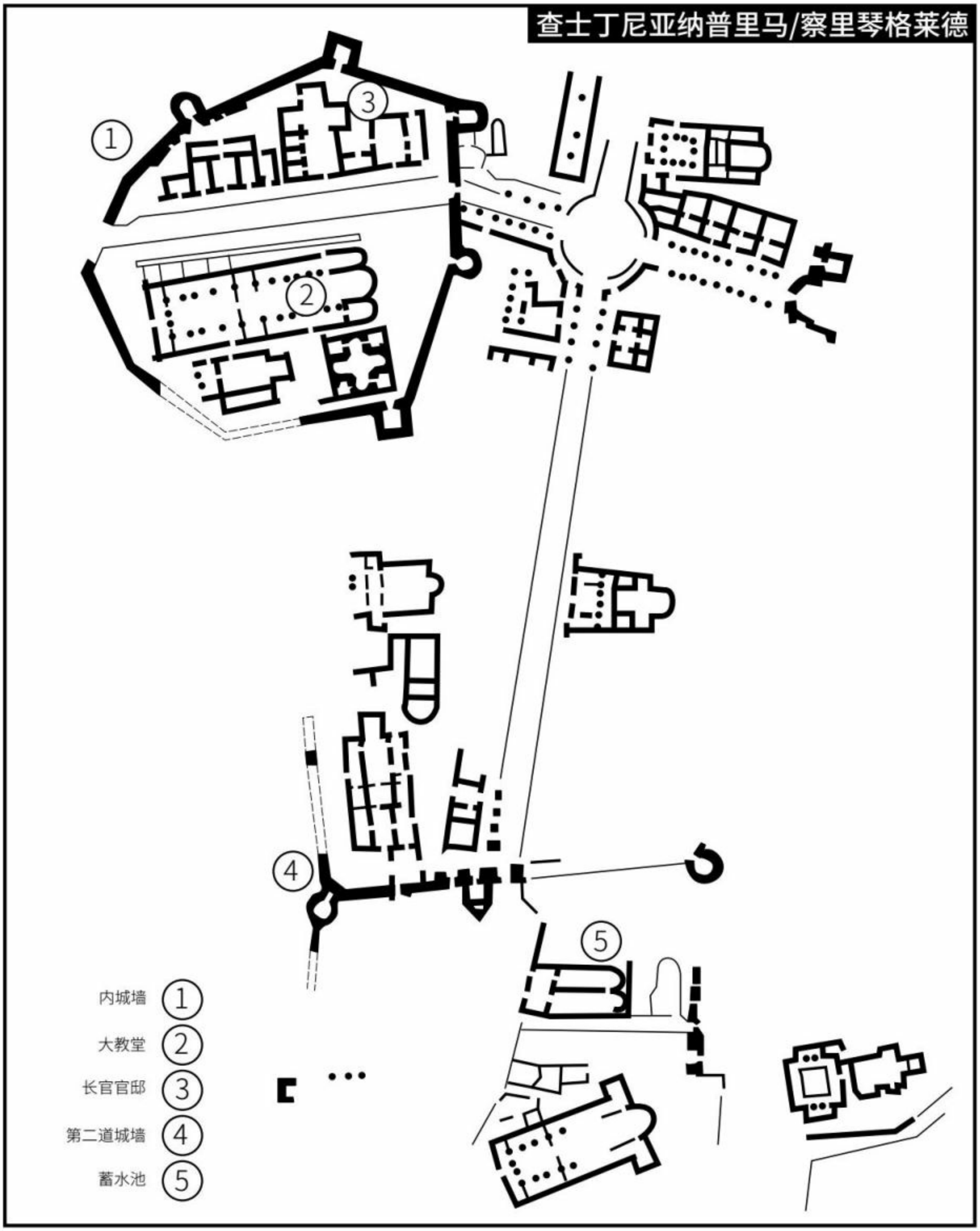
地图1 5世纪的君士坦丁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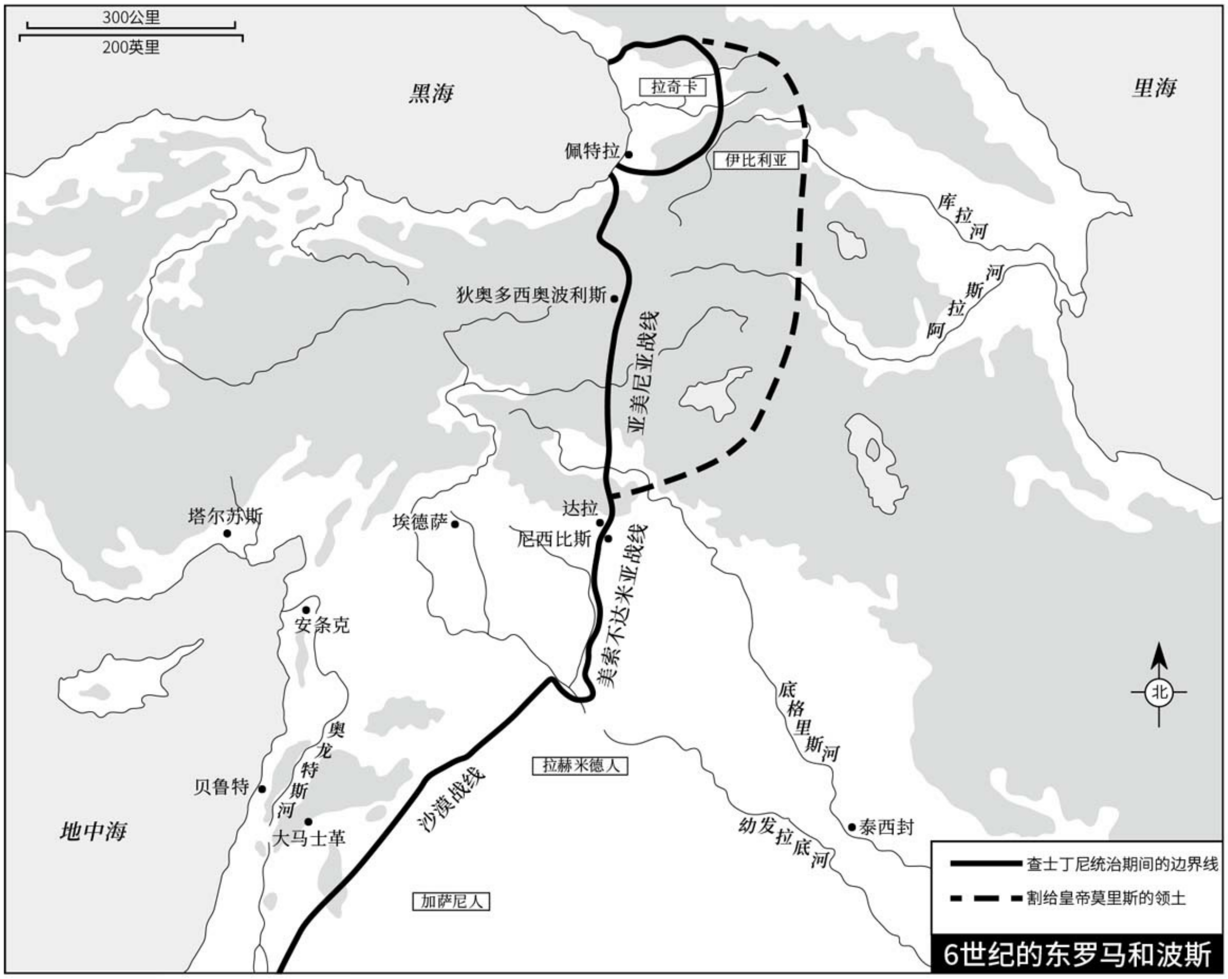
地图2 东罗马巴尔干地区狄奥多里克的哥特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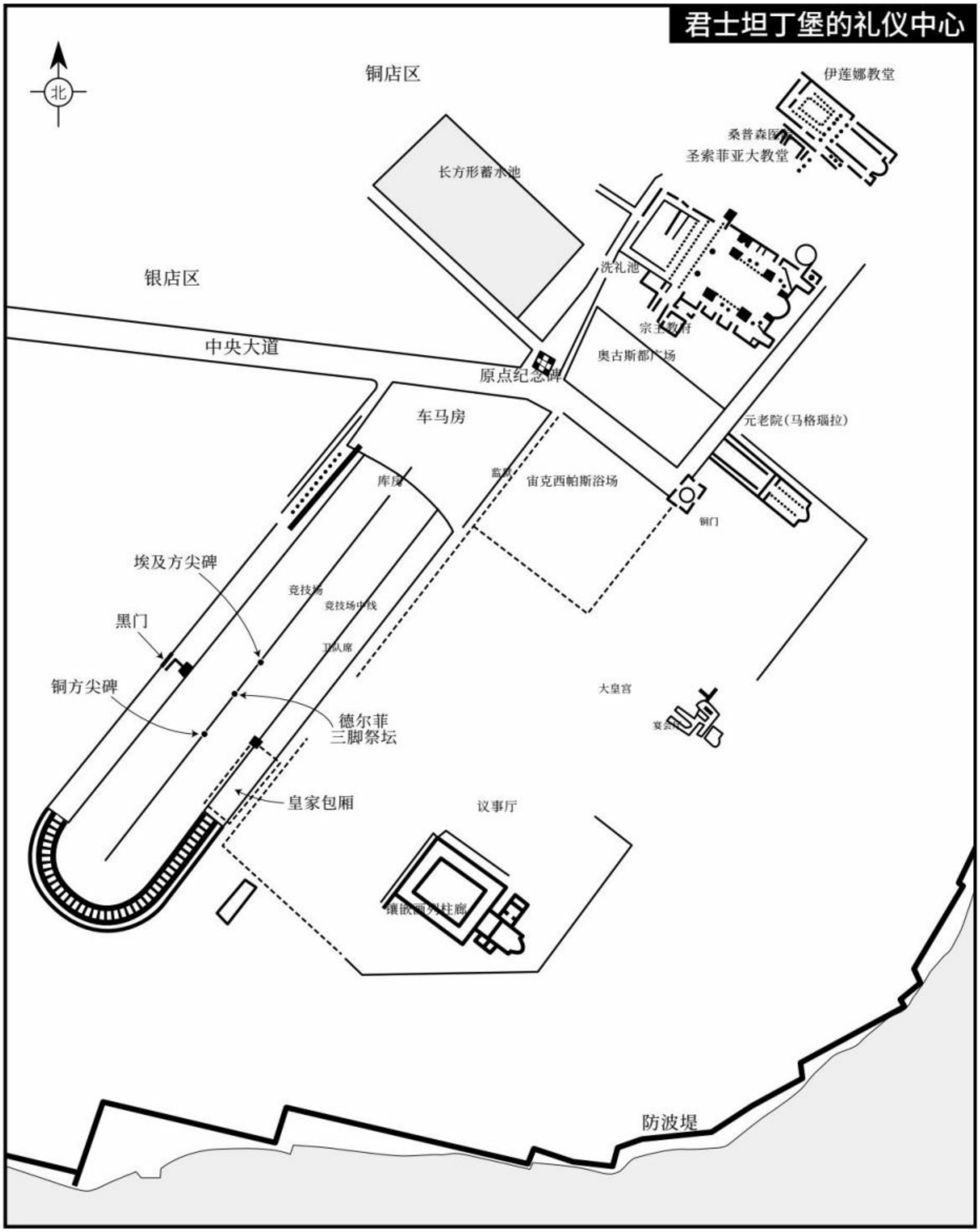
地图3 狄奥多里克的西方帝国，约511年



地图4 查士丁尼亚纳普里马/察里琴格莱德



地图5 6世纪的东罗马和波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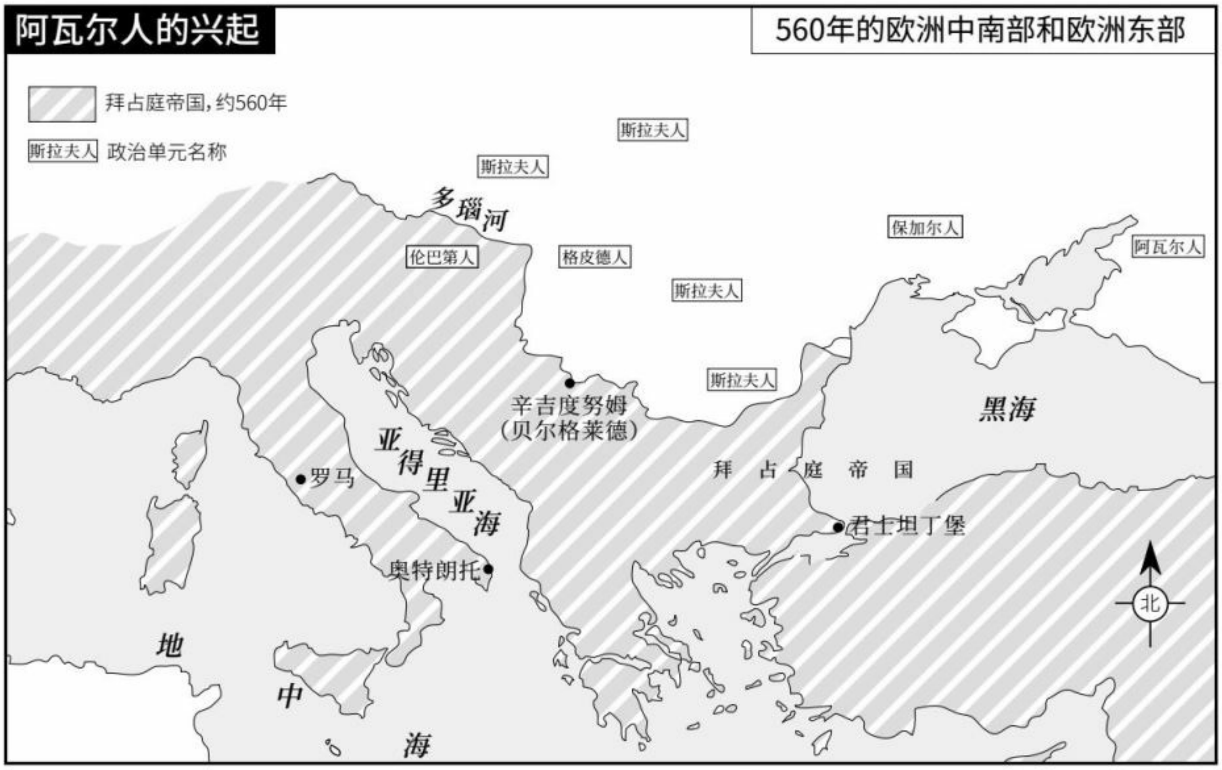
地图6 君士坦丁堡的礼仪中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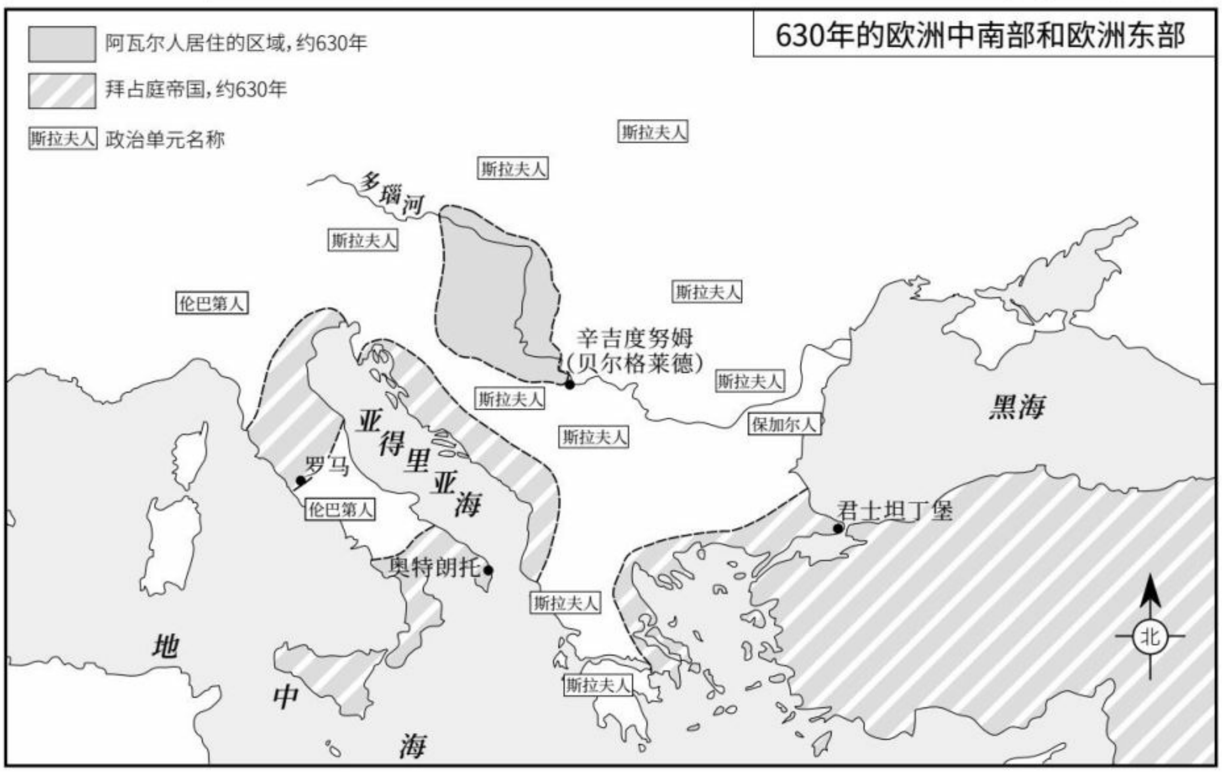

征服北非
北
意大利
撒丁尼亚
第勒尼安海
陶尔米纳
西西里
锡拉库萨
地
中
海
希波
迦太基
特里卡马鲁姆
普罗康苏拉里斯
布拉雷吉亚
十里城
努米底亚
格拉斯
哈德鲁梅图姆
小列普提斯
卡布迪亚角
拜萨西恩
150公里
100英里
三城地区

地图7 征服北非


征服意大利
北
利古里亚
米兰
威尼西亚
波河
埃米利亚大道
阿尔卑斯
蒂埃科
热那亚
奥雷利亚大道
拉韦纳
切塞纳
里米尼
乌尔比诺
佛罗伦萨
佩特拉佩尔图萨
奥西莫
利古里亚海
托斯卡纳和翁布里亚
台伯河
皮切努姆
亚得里亚海
科西嘉
奥雷利亚大道
卡西亚大道
弗拉米尼亚大道
罗马
波图斯
奥斯蒂亚
卡拉布里亚
那不勒斯
536年秋围城后攻下
撒丁尼亚
第勒尼安海
伊奥尼亚海
西西里
535年夏攻下
锡拉库萨
地中海
200公里
200英里

地图8 征服意大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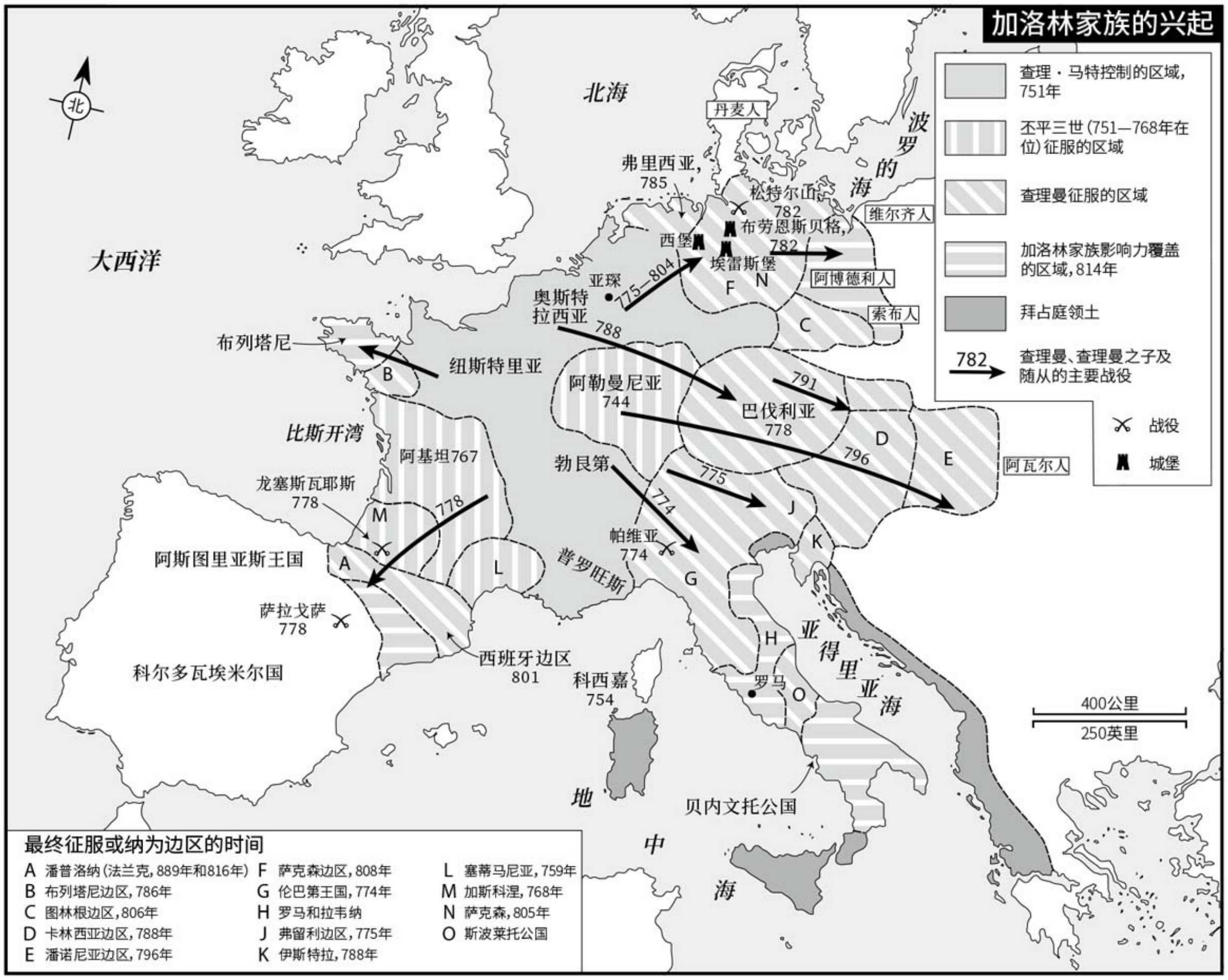

阿瓦尔人的兴起
560年的欧洲中南部和欧洲东部
拜占庭帝国，约560年
斯拉夫人 政治单元名称
斯拉夫人
斯拉夫人
多瑙河
伦巴第人
格皮德人
保加尔人
阿瓦尔人
斯拉夫人
斯拉夫人
辛吉度努姆
（贝尔格莱德）
黑海
亚得里亚海
罗马
拜 占 庭 帝 国
君士坦丁堡
奥特朗托
北
地
中
海


630年的欧洲中南部和欧洲东部
阿瓦尔人居住的区域，约630年
拜占庭帝国，约630年
斯拉夫人 政治单元名称
斯拉夫人
斯拉夫人
多瑙河
斯拉夫人
伦巴第人
斯拉夫人
辛吉度努姆
（贝尔格莱德）
斯拉夫人
斯拉夫人
保加尔人
黑海
斯拉夫人
亚得里亚海
罗马
伦巴第人
君士坦丁堡
奥特朗托
斯拉夫人
北
地
中
斯拉夫人
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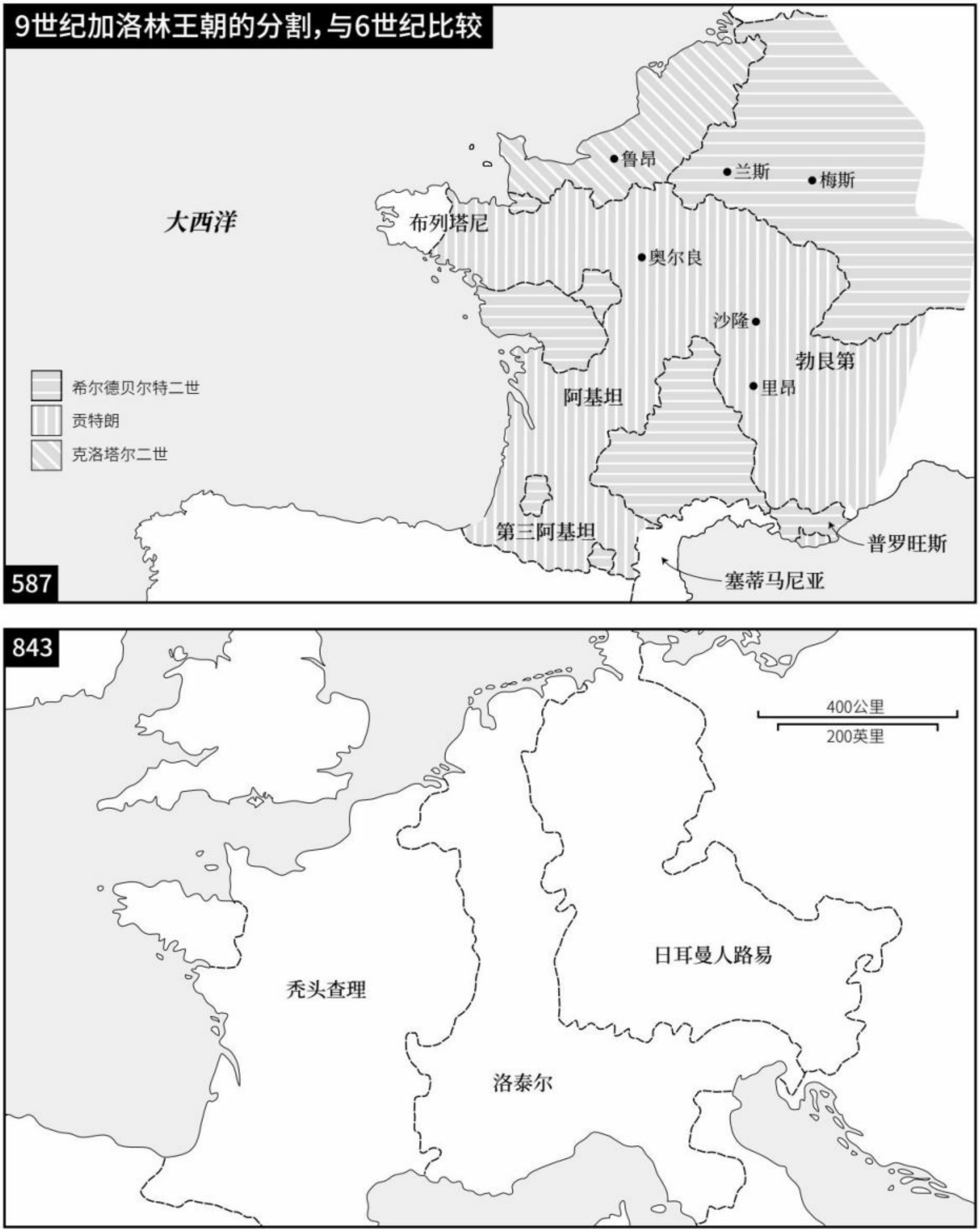
地图9 阿瓦尔人的兴起



地图10 法兰克人的兴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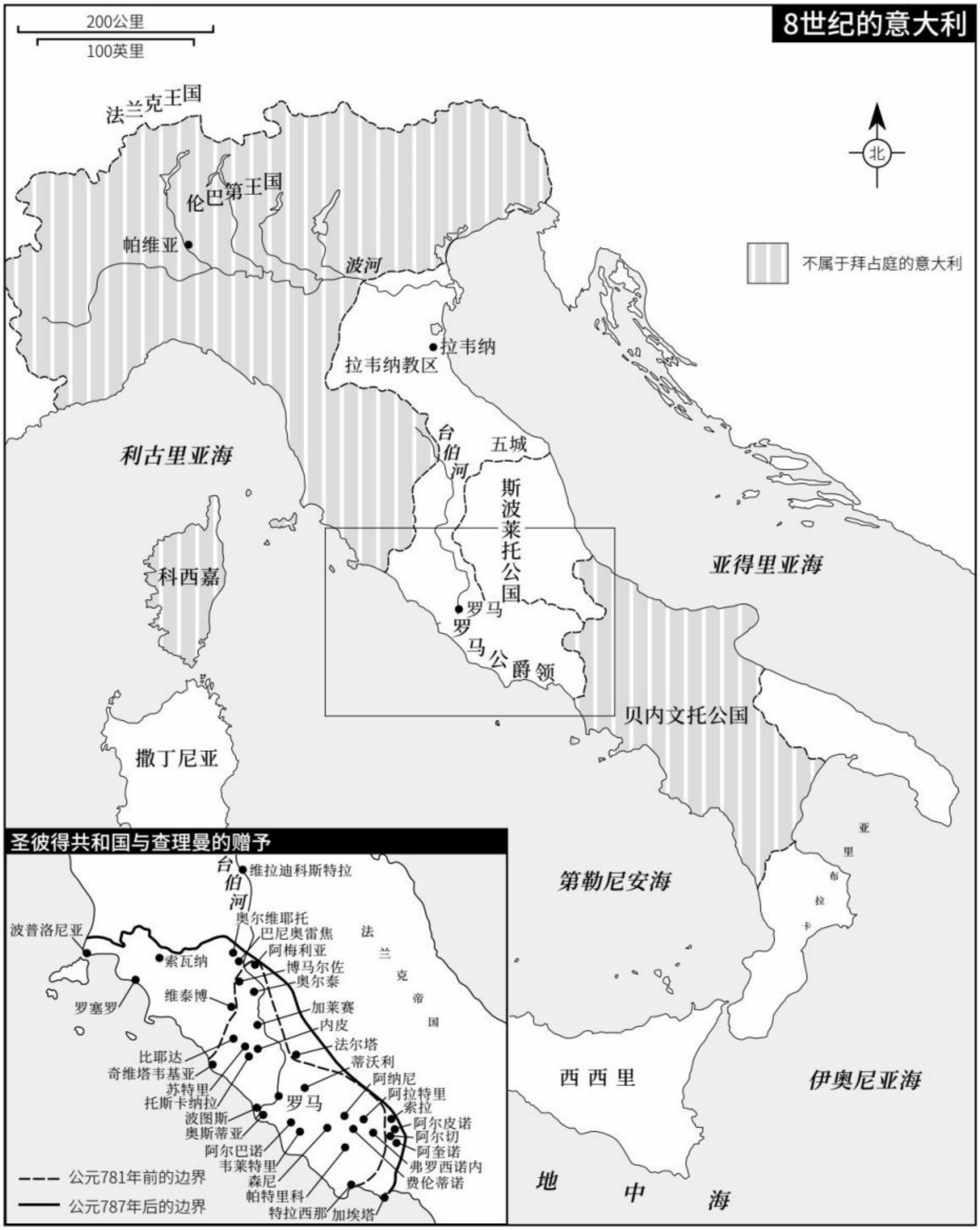
地图11 加洛林家族的兴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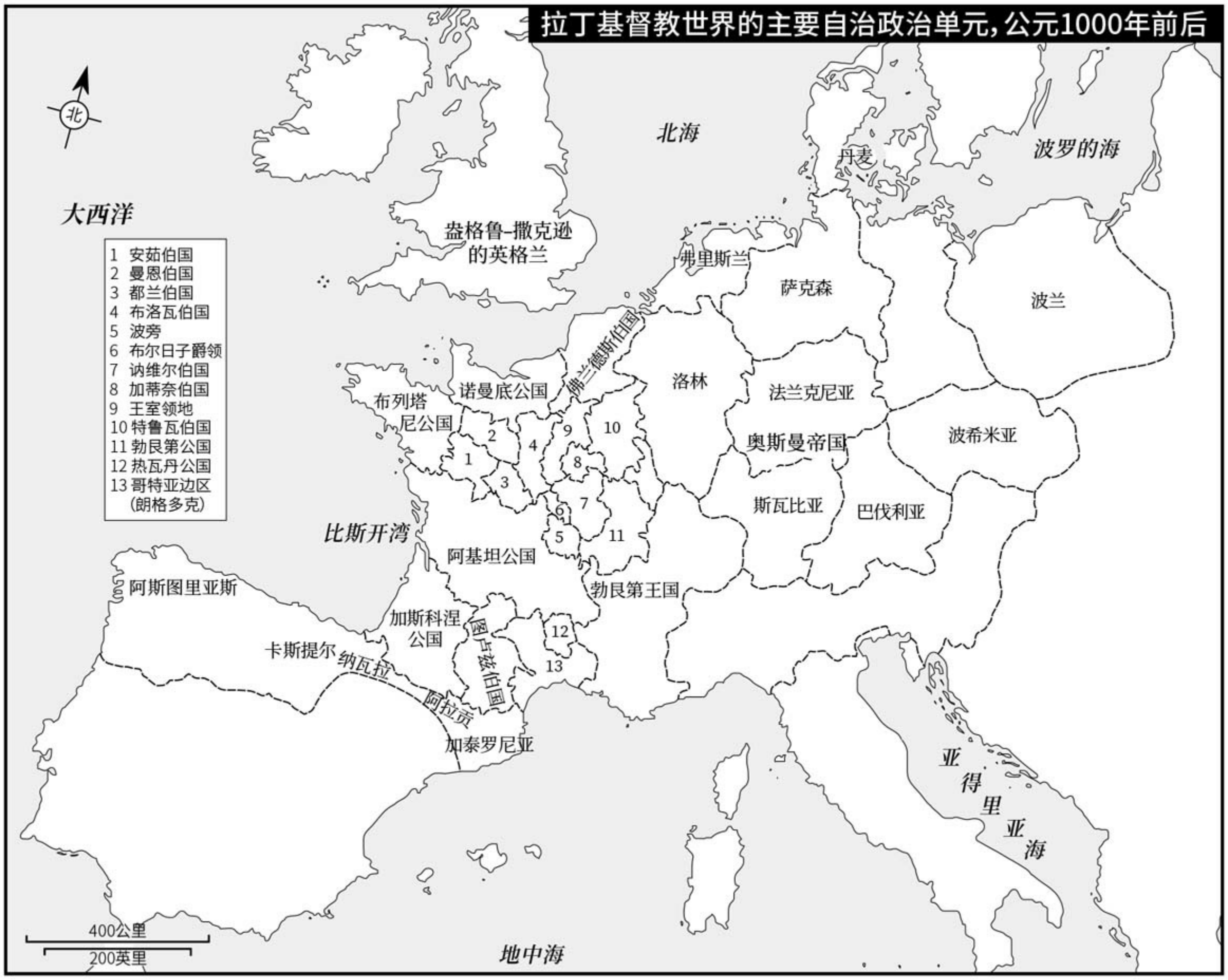
地图12 9世纪加洛林王朝的分割，与6世纪比较


855
布列塔尼
秃头查理的王国
日耳曼人路易的王国
路易二世的王国
普罗旺斯的
查理的王国
400公里
200英里


870
日耳曼人路易的王国
秃头查理的王国
路易二世的王国
400公里
200英里



地图13 8世纪的意大利



地图14 拉丁基督教世界的主要自治政治单元，公元1000年前后



地图15 加洛林时期的学术中心